

海外华人知多少

长期以来，官方与民间对海外华人人数的统计数字，存有巨大的歧异，使人产生困惑。有学者估计，全球海外华人高达3975万余人¹；但也有以下不同的估算：2426万余人²；3402万余人³。其间的差额落差甚大。而国别的海外华人之统计数字，则更是纷呈杂沓，使人难以适从，以印尼为例，就有以下不同的数字：500万人⁴；600万余人⁵；450万余人⁶；及1千万人⁷。

海外华人统计的欠缺准确性，因素复杂，举其荦荦大者有以下数端：

- A. 除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欧、美、澳、日若干先进国家的较具精确统计外，其他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都缺乏精确的统计。原来人口普查是项重大的课题，涉及庞大的人力、财力与物力，须作科学性的调查。而在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华人零星散布各地，穷乡僻壤，穷山恶水，无不有华人的足迹。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放宽移民条例，华人移民偷渡浪潮汹涌澎湃，华人新移民无孔不入，流动性甚大，难以追踪，因而影响到调查的正确性。
- B. 海外华人居留境外，天长地久，已适应了海外的生活，把异乡视为家乡，并世代相传，已入籍当地成为居留国国民，有些人甚至不承认自己为华人。而近二三十年的新移民，也利用入籍之便，有利于谋生之道，毅然入籍。这些入籍的新旧移民，在各国人口普查中，是“本国国民”呢？还是“海外华人”？不同的标准，大大地影响到统计数字。
- C. 几百年来，海外华人先民与当地妇女结合，世代繁衍生息，这些混血后裔无论在语言、血统、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与形态上，已完全同化于当地，融入主流社会。各地具有华人血统的混血儿，都有不同的名称，人口普查的归类标准，也影响到海外华人人数的多寡。

海外华人之被称为“华侨”，大抵滥觞于19世纪80年代。随着革命浪潮的澎湃，尤其是邹容著作《革命军》的广泛流传，以及孙中山与其支持者的普遍使用，一时“华侨为革命之母”的呼声传遍各地，广大人民也以“华侨”自居，并引以自豪。在此之前，中国的官方文献及民间著述，多以“唐人”、“汉人”、“华人”、“华民”、“华工”或“华商”等名称称呼海外华人。或有意更正确指出移民的地域性，多用“闽粤人”、“闽人”、“粤人”、“漳泉人”、“广府人”或“潮州人”等。“华侨”的原意是指短期侨居海外的中国人，终有一天落叶归根，回归故土，中国才是华侨的祖国。

自推翻清朝帝制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加强内部组织，以巩固中国的统一，并增设中央党部海外部，积极笼络“华侨”的民心，取得一定的成效。

战前的国民政府，对海外华人的国籍，一直奉行“血统主义”的原则，即“凡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不论他出生于何地，父母是何人，都是中国籍民。”国民政府尽量设法提高华侨的爱国意识，维系华侨对祖国的向心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适值日军侵华时期，华侨出钱出力，回国参军，抗敌救国，高度发挥了华侨的爱国精神。

战后几十年来，“华侨”一词仍被国民政府所沿用。首先是自1949年国民政府溃败退守台湾后，困守孤岛，挣扎图存，并以此为基地，争取海外华人的支持，以图有朝一日“反攻大陆”。为了笼络华侨，积极推动（华）侨（事）务。直至今日，台湾国民政府仍奉行“血统主义”，把海外具有中国血统的人视为“华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萧规曹随，沿用旧有的华侨政策，本着血统主义的原则，视海外华人为中国籍民。不过这也给中国带来很多麻烦，“华侨”常被诬指为中国的“第五纵队”，制造纷乱与麻烦；也被指为盘剥者与寄生虫。为了缓和与邻国的种族矛盾，以突破外交上的孤立，中国政府毅然放弃了血统主义的原则，1955年与印尼政府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标志了中国政府国籍法的改弦易辙。在该政策下，中国政府鼓励居留地华人参与当地政治，成为当地籍民，今后不再是“华侨”身份，而改变为“华人”。倘若不愿加入居留地国籍，则保有中国国籍与侨民身份，须遵从当地法律。所以中国官方及民间学术人员，已经对“华侨”与“华人”作了明显的界定，所谓“华侨”，即指居住在海外、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华人”则是指入籍居留地，成为他国公民的中国人。不过尽管“华人”是指入籍居留地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但就其血缘及文化而言，仍然是倾向中华民族属性及中华传统文化⁹。

以上的不同称谓，都是以“中国人”为核心，与“（外籍）华人”的身份并不完全吻合。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经过了长期繁衍与成长，其思维、价值观及国家认同等方面，与中国境内的中国人大相径庭。为进一步区别起见，官方文件及学术界又创立了“华裔”一词。“裔”是“后代”、“血统”，其涵义较明确，涵盖面也较“华人”广泛，一般上指入籍的华人，及第二、三、四代或更长远的华人移民后裔，他们是具有较淡薄、或完全没有中国意识的族群。所以我们说“华裔美国人”（Chinese American），即具有美国籍的华人；“华裔新加坡人”（Chinese Singaporean），即指拥有新

加坡国籍的华人。他们与中国境内的中华民族不同，王赓武教授甚至说这些人是“不再认为自己是华人的华人后裔”¹⁰。此外也有用“华族”（Ethnic Chinese）来泛指“广大华人族群”的。构成“华族”的成员是出生于当地，加入居留地国籍，并全盘认同于居留国的华人。也有人给“华族”下了如下的定义：由保持华人意识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稳定群体，是当地族群之一，构成当地国家民族的组成部分。

再谈谈“海外华人”一词的称谓。有人认为该词是以中国为核心，“海外华人”有依附中国而存在的寓意，与海外华人的身份与独立性不相吻合，似乎把海外华人边缘化，具有贬义，因此建议用“全球华人”或“世界华人”来取代，但这又使人联想到包括“中港台”的中国人，容易引起混淆。不过“海外华人”（Chinese Overseas）一词已被学者广泛采用，泛指中港台以外的华人。

海外华人是个庞大而复杂的族群，他们在不同时期到全球各地移殖、定居，并世代繁衍下来。他们来自中国各省各县，口操各地区不同的方言，南腔北调，彼此不易沟通。他们受到传统思想的浸濡，尊崇儒道释的宗教信仰，祭拜关公、妈祖及地方神祇，并延续中国的传统习俗。不过由于经过数个世纪的繁衍，时移境迁，潜移默化，已经有不少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受到当地的同化，中华族群意识淡化，其中华文化的传统也日渐消失了。

战后十余年间，中国与世界局势，都发生了风云激荡的剧变。在中国，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政府剑及履及，雷厉风行，推动了一连串翻天覆地的大改革：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跃进及人民公社运动，消息传来，是也非也，海外华人茫然不知所措，从而亦动摇了多年来“落叶归根”的意念。至于在海外华人的居留地，民族主义运动激昂澎湃，殖民地要求独立的呼声响彻云霄，争取自治独立。不幸的是，大多数主导独立国的政客，抱着狭隘的种族主义思想，以土著利益至上，推动排华运动，企图从政治与经济上置华人于死地。在这危机四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华人挣扎求存之道，便是入籍居留地，成为当地公民，寻求法律保护的权益。入籍居留地的前提，便是华人须改变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观念，从认同于中国改变为认同于居留国。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掀起入籍的序幕以来，经过了数十年来奔走与波折，才完成了华人的心愿。

华人的入籍居留国，在不同的国家，其境遇也不同。大抵而言，新马较顺利，大约50年代末即已解决。印尼与菲律宾则满途荆棘，由于官员的刁难，繁文缛节诸多麻烦，所以华人必须利用旁门左道，破财消灾，通过贿赂的手段，才能完成心愿。直至80年代，入籍问题基本上才迎刃而解。至于泰国华人之入籍，鉴于两族历史渊源的深厚以及长期以来的种族和谐相处，因此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中印半岛的国家如越南、柬埔寨、缅甸与寮国，到了80年代，也基本上解决了入籍问题。

另一方面，不同的东南亚国家，其文化认同的程度不一。有些国家如新马，华人分别占了全部人口的76%与25%，族群意识强烈，所以维系了以华文为核心的文化认同。有些国家，华人人数虽多，但占整个人口的比例小，如印尼与菲律宾，长期以来受到执政者文化的摧残，华社与华教备受压制，以致华人同化程度较深，相对地中华文化日薄西山。不过近年来由于中国的崛起，影响所及，中华文化有绝处逢生、扭转乾坤的态势。

另一类型的海外华人，则是完全同化的混血华人。经过了数百年来异族通婚，生儿育女，语言相互吸纳，生活习俗融化，其后裔已被当地土著融化，血统上呈现大混合，在形貌上已与汉人大异其趣了。

混血华人普遍存在于东南亚各国，在新马称为峇峇娘惹（Baba Nyonya），在印尼称为土生华人（Peranakan），在菲律宾称为中菲混血儿（Mestizo），在泰国称为洛真（Lukjin），在越南称为明乡（Minh Huong）。新马、印尼、菲律宾等地的混血华人，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与社会上，都高居重要地位。

混血华人也普遍存在于南太平洋地区。如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大溪地与西萨摩亚，他们有的在经济上崭露头角，有的在政坛上出人头地，如新几内亚的陈仲民爵士，就曾经两度荣任总统。

混血华人也散布在印度洋各岛及非洲，如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留尼汪岛及南非等地。至于南美洲的秘鲁、墨西哥、古巴、智利、洪都拉斯及巴西等国，也无不散布着混血华人的足迹，其人数之多，社区之广，较之其他发展中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公元前221 - 206年）、汉（公元前202 - 公元220年）时期，中国人已通过海路与陆路，与中亚、东南亚及东北亚发生联系与交往。此后历经唐（618 - 907年）、宋（960 - 1127年）及元（1271 - 1368年），前往海外的中国人络绎不绝，他们大多是商贩与僧侣，也有官方使节。而中国沿海一带，也崛起了泉州与广州等国际商港，商船辐辏，万商云集，形成了一幅繁华的景象。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之际，尽管官方明令海禁，禁止人民移民海外，但利之所在，移民海外的浪潮仍此起彼伏。有的从此定居海外，与当地妇女成婚，于是东南亚各地如巴达维亚、马六甲、旧港、北大年、宋卡、马尼拉及堤岸等地的华人社区先后出现。

从鸦片战争（1840—1842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年间，除了短期间受到客观因素的遏制外，中国移民呈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其间更出现了波澜壮阔、空前未有的高潮。

鸦片战争标志了丧权辱国的肇始，在西方帝国的侵略下，中国小农经济走向解体，农民失去了土地耕作，手工业者也大量破产，导致失业浪潮澎湃。民不聊生，横尸遍野，广大的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另谋出路。而另一方面，西方帝国也在19与20世纪的长期间，加深了对殖民地经济的拓殖与剥削。在东南亚，随着港口的兴建，城市的发展，交通的铺设，亟需中国劳工。在美洲、非洲及澳洲等西方殖民地，随着亚热带经济作物如香料、咖啡与甘蔗的种植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庄园经济日益扩大，对劳工需求迫切。于是，广大的中国移民，以自由民或契约劳工的身份，从中国城乡往世界各地去服劳役。

百年间经历过高潮与低谷。20世纪20年代是移民的高潮，30年代却陷于低谷。兹以新加坡与印尼为例加以说明。自1922至1930年间，作为转口贸易站的新加坡，因胶锡市价看俏而受惠，工商业繁荣，经济蓬勃发展，城市建设扩展，亟需劳工；加上中国政局动荡，民心思动，所以南来移民倍增。1926年，登陆新加坡的中国移民高达34万8593人，翌年更创下了35万9262人的纪录¹¹。印尼亦呈现移民激增的趋势。20世纪20年代，印尼的经济蓬勃发展，造成华人移民蜂拥而至，介于1920年与1930年间，高达42万4175人¹²。然而，到了1930年，全球金融陷入萧条，经济急剧衰退，胶锡价格暴跌，工商业不振，失业浪潮澎湃，民生凋敝，饿殍遍野。这期间，新加坡与印尼等地的移民都呈现负面的增长。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初期，欧、美、加、澳等国废弃了战前的限制移民政策，大开方便之门，广纳各国移民，以致在三十多年间，涌现了几股华人移民大浪潮。首先是在50、60年代，香港新界的客家人，大批迁徙到英国去。在1967年英国4万5千名华人中，有约3万人是从新界移居过来的。新界的移民及其后裔，嗣后又辗转流落到欧洲其他城市去。

与此同时，在印尼掀起了另一股移民潮。1949年印尼宣布独立后，一批又一批华人（多数是土生华人）相继移居荷兰。1959至1968年间，印尼爆发了多次排华运动，许多华人惨遭杀害，财物被掠夺，房屋被焚毁，华人成了惊弓之鸟，纷纷向外逃亡，有的逃到欧、美、澳，有的逃到港台与新加坡，更多华人逃往荷兰去安身。

自1975年越南赤化后，境内华人惨遭迫害，难以生存，南越华人被迫沦为“船民”，投奔怒海，很多“船民”不幸葬身鱼腹，沉冤海底。欧、美、澳、加等国家基于人道立场，予以接纳收留。美国收留的印支华裔移民，估计有30万至40万人。澳洲接纳了约4万人，法国收留了7万至8万人，英国、加拿大、荷兰、德国及意大利等欧美国家，也接纳了成千上万的印支华裔难民。

此外，亚洲国家（如新马、泰国、菲律宾）、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地的华人移民及其后裔，也纷纷以留学生与移民身份，再移民到欧美先进国家去，造成欧美各国的新移民人数激增。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西两大集团对立，中国在外交上陷于孤立，政府也严禁华人出国。另一方面，与欧美站在同一阵线的国家，反共抗俄，禁止中国移民入境，也不许华人返国省亲，因此50与60年代出国的移民浪潮基本上是处于停滞状态。

然而到了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风云激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中国政府开始放宽出国条例。而随着中国的进入联合国，中美的僵局开始解冻，东南亚国家也纷纷与中国建交，打开移民大门。这期间出境的移民，大抵是以“家庭团聚”为由出境的，人数虽不多，但已开始涌出出国潮。1982年4月，中国政府更宣布给予归侨、侨眷出境探亲特殊照顾，规定“只要对方不限制，我方应尽快批准”。而欧美国家也基于人道主义，并视移民出国是意识形态的胜利，因此国人多被批准出国。

80年代以后迄今，中国移民又呈现了另一高潮，他们一批又一批涌向西方发达国家。他们有些是公费或自费的留学生，有的是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但更多的是农村及乡镇的群众，他们知识水平低下，又无一技之长，因此“要致富，就偷渡”，冒着生命的危险，受尽人蛇集团的盘剥，酿成了多少人间悲剧。此外，大批来自港台、东南亚及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也纷纷向西方发达国家进军。据美国世界移民报告估计，每年移往外国的中国移民超过40万人，其中美国、加拿大、欧洲及澳洲等发达国家是新移民的首选地；而南美、南太平洋国家则是转向发达国家的中转站。另据福建科学院的调查，1980至1999年间，大陆新移民由正常途径移居外国的超过100万人，其中移往美国、西欧、澳洲和日本的有90多万人。目前大陆新移民约为300万人，加上非法移民，估计人数已超过400万人。

经过战后几十年新移民轮番大洗牌之后，原先华人的分布状况与各大洲华人所占比例与增长率也跟着发生了变化，倘若比较20世纪50年代与2005年两个不同的阶段，各大洲所占比例的变化如下：亚洲从96.45%滑落至78.7%；美洲从2.12%跃升至14.4%；欧洲从0.31%骤升至4.1%；大洋洲从0.81%晋升至1.7%；非洲则从0.31%晋升至0.39%。又根据一项统计显示，1980年代各大洲增长率如下：亚洲2.4%、美洲8.0%、欧洲3.2%、大洋洲8.5%及

非洲2.1%。

亚洲华人简介

亚洲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地区，总人口超过3000万。仅仅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就占了全亚洲华人总人口的90%以上，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菲律宾和越南的华人口皆超过百万。

最早定居在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大抵滥觞于15世纪初年。那时，在马来半岛、印尼群岛及印度支那的商港，已有闽粤移民建立起来的聚落，只是规模不大，聚落人数从数百人至数千人不等。华人大规模迁徙到东南亚，始于19世纪下半叶鸦片战争结束之后，鸦片战争标志了华人移民的分水岭。

早期华人移民多来自广东省及福建省。广东省包括广府人、潮州人、客家人与海南人，福建省主要是漳州、泉州及厦门人。他们有的以自由移民的身份出国，凭着刻苦耐劳及坚韧不拔的精神，赤手空拳，闯出一片天；也有的以契约劳工（卖猪仔）的身份应聘而来，从事开荒拓土、修路开矿的工作，流血流汗，把榛莽丛林化为绿油油的农园。

华人移民埋头苦干，克勤克俭，经营各行各业，创造财富。华人的经济活动，以商业为主，商业资本最为雄厚，也以经商的业绩最为辉煌。嗣后，华人资本家又把企业扩大到工业、种植业、建筑业、地产业、服务业与金融业等等。随着时日的推移，华人开始具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大大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大约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东南亚各国更冒起了不少华人企业财团，它们以雄厚的财力，展开跨国与多元化的业务，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如马来西亚的郭氏家族、印尼的三林集团及菲律宾的陈永栽家族等等，都是赫赫有名的华人企业集团。

在战前，除了土生土长的华人外，绝大多数的中国移民都以中国国民自居，期盼有朝一日，便落叶归根，回归故国。但战后时移势迁，归国无期，华人不得不改变身份，代之以落地生根的观念。改变国家认同的思维，归化为当地公民。时至今日，大部分华人均已入籍，与当地人共存共荣。

过去的华人“在商言商”，不过问政治。但战后以来，为了适应时势变迁，华人不得不参政议政。至于曾经盛极一时的华校、华团及华报，在某些国家里，一度被禁止和封闭。不过自中国崛起，尤其是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批中国移民涌入全球各地，亚洲的形势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华社注入了一股新生的力量，似乎有春回大地的迹象。

在东南亚以外的亚洲国家，定居华人人数相对较少。除了日本有70余万华人以外，其他地区如南亚、西亚与中亚，在上世纪70年代前，只有零零落落的华人。70年代以后，港台、中国大陆掀起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情势才大大改观。

亚洲

新加坡

引言

新加坡坐落在赤道边缘，平均海拔不到15公尺。这个集国家、首都、城市于一体的袖珍型岛国，得到上天格外的眷顾，不受火山、地震、海啸与飓风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它处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十字路口，为连接亚洲、大洋洲、欧洲和非洲的交通咽喉。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登陆占领后，锐意把新加坡发展为转口贸易站。由于它地理位置优越，水深港阔，适合船只的停泊及货物的搬运，加上后来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使远近各国商人蜂拥而来经商。

1959年新加坡举行新宪制下议会大选，人民行动党以压倒性的姿态胜出，土生华人李光耀荣任自治邦总理。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成员包括马来亚、新加坡、砂拉越与沙巴。然而，因为政治理念的分歧，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之初，缺乏天然资源的新加坡政府面临难题重重，前途茫茫。原本已高达14%的失业率，在1971年英军撤退之后更为严重，如何养活200万人民，成了政府最头痛的问题。

此外，错综复杂的种族问题也是国家发展的绊脚石。那时，新加坡各族之间的猜疑频生，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亦出现紧张的局面。同时面临内忧外患，新加坡政府当时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幸得李光耀等的精英领袖们运用过人的睿智，实施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加上全民同心，最终才化险为夷，迈向成功的大道。

如今，华人与各族之间互相信任，和睦共处。经过举国上下40多年来的努力建设，终于成功将新加坡打造成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社会井然、民生安乐的典范国家，并先后被权威机构评选为亚洲地区最具竞争力，生活素质最高、犯罪率最低、及最适宜居住、工作和休闲的国家。占新加坡全国总人口超过四分之三的华人，也安享着这个花园城市的安逸与舒适。

- 新加坡是梵语“狮子”的谐音。据《马来纪年》记述，1150年左右，苏门答腊室利佛逝王国的一位王子乘船到此时，看见一头狮子，于是称之为“Singa（狮子）pura（城）”，后来也把它简作为“星洲”或“星岛”。

华人移民简史

新加坡华人有积极向上、坚韧不拔的特性，他们所面对的压力越大，就越能发挥扭转乾坤的魄力，并且具有放眼世界的远大视野。新加坡的发展过程，同时亦是华人苦尽甘来的血泪史。

早在14世纪中期，已有福建泉州人来到这里经商。元朝商人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一书中，将新加坡称为“淡马锡”（Temasek，马来语“海城”之意），这个源自梵文Tamarasa的词，意即“黄金”，仿佛预告了新加坡将来势必欣欣向荣的前景。

1819年，莱佛士乘船在新加坡河口一带盘桓，试图在印度与中国之间寻找并建立一个贸易站。独具慧眼的莱佛士，看准了当时还是沼泽地的新加坡有巨大的发展潜能，于是从柔佛统治者手里租下这片土地。1824年，新加坡正式成为英属殖民地，并因地理优势而成为英国海峡殖民地（包括新加坡、马六甲与当年称为槟榔屿的檳城）的行政中心。

莱佛士在这里设立贸易站的消息一经传出，便有华人移民从四面八方接踵而来。最早到达的华人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来自马六甲、檳城的海峡华人，男性称峇峇、女性则叫娘惹。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发展得非常成功，成为海峡华人中的商业巨擘，例如薛佛记、陈笃生、陈金声等人。而另一批受过英文教育的海峡华人，则成为专业人士，为殖民政府所用，是海峡华人社会中较有地位的一群，著名的有林文庆、宋旺相等人。第二类是来自邻近的马来半岛及印尼群岛的华人，他们企图到此闯出一片天。第三类则是来自中国广东和福建沿海一带，也是华人移民最大的群体。1821年，第一艘载满自由移民及契约华工的帆船从厦门开抵新加坡，自此以后，登陆新加坡的华人移民源源不绝。

在这一批远洋南来的华人移民中，以福建人居多，其他的是潮州人、广府人、客家人与海南人。殖民地政府把他们安置在不同的社区，如福建人聚集在直落亚逸（Telok Ayer）和厦门街（Amoy Street）；潮州人在新加坡河畔；客家人在克罗士街（Cross Street）落脚；广府人则聚集在现今已发展为唐人街旅游区的牛车水一带。

直至鸦片战争（1840至1842年）之前，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可谓细水长流，逐年增加。1840年，岛上的华人已有约1万7千人，占了总人口的一半，成为最大的族群。但自鸦片战争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百年间，除了经济萧条或其他特殊原因外，掀起的一波波华人移民浪潮，其波澜之壮阔令人瞩目。尤其是1926年及1927年，移民浪潮达致顶峰，每年入境的华人高达35万人。

- 从早期新加坡华人家庭的留影中，已经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融合，男性身穿西服，其妻则穿着传统服装。
- 20世纪40年代，由中华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所发出的“华侨登记证”。

从华南来的移民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由移民，另一类是契约华工，亦称“苦力”或“猪仔”。自由移民是指那些自备旅费南来的移民，登陆新加坡后，对任何人都没有义务，行动自由，有权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是构成移民的主体。

而契约华工，则是指那些来自农村的贫农或城市失业的贫民，受人利诱拐骗而来，如猪仔般被贩卖到农园或矿地工作，受尽折磨。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1845年到1875年之间，是苦力贸易的鼎盛时期，新加坡成了著名的苦力贸易中心，牛车水一带“猪仔馆”林立。

早期，不同籍贯的华人有着不同的职业分野。福建人、潮州人多数经商务农，同时又在银行、橡胶业有所建树；广府人擅长木工、水泥工、矿工、造船、经营酒楼及杂货店；客家人则多是裁缝、鞋匠、铁匠；海南人先是从事农业，之后多为洋人包办伙食，或在洋人家庭里帮佣，他们多数对经营咖啡店颇有心得，海南咖啡更是远近驰名。

- 来自广东三水，刻苦坚强的“红头巾”妇女是牛车水当年建筑业的主要劳工。她们头戴红头巾、身穿蓝色碎花衣服及黑色裤子，出现在早期新加坡的许多建筑地盘里。南洋大学、文华大酒店及中国银行等宏伟建筑物，都沾染了她们辛勤劳动的汗水。“红头巾”三水妇女为新加坡的建筑发展付出了不少的血汗，闹市中立有她们的塑像。

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超凡卓越的智慧，是华人能够在新加坡站稳脚跟的主要因素。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他们开始涉足橡胶、罐头加工、肥皂制造等轻工业及金融业。此后，华人的经济发展日趋完善，百花齐放。

二战期间，新加坡曾被日本占领，华社遭到巨大的冲击，数以万计的华人被无辜杀害。战后，英殖民政府恢复了对新加坡的统治，实施严格限制移民入境的政策，移民活动宣告结束。不过，由于自然增长率所使然，新加坡华人在战后的十年依然激增，直至1957年，增加了37万人，其中约30万人是当地出生的。

新加坡建国后，政府深知人才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于是积极招揽精英。随着中国大大放宽人民出境的限制，及在1990年正式与新加坡建交后，大批中国新移民才陆续移居新加坡。这些来自中国的商人、科研专才、知识分子、留学生及劳工，成了新加坡华人的一分子，与土生土长的华人共同为社会作出了不少贡献。

- 19世纪的华人移民以男性占大多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到了20世纪初期，新加坡的华人女性移民才逐渐增多。尤其是在1930年至1934年的经济大萧条期间，政府实施移民限制法令，严禁男性入境，妇孺则不受限制，于是女性移民激增，才使新加坡华人男女比例的差距日益缩小。

马来西亚位于赤道北缘，处于东西方航路要冲。全国分为东马来西亚（东马）和西马来西亚（西马）两个部分，两者之间隔着南中国海。西马半岛共有11州，北依泰国，南临新加坡。东马则有沙巴（Sabah）和砂拉越（Sarawak）两州，与印尼的加里曼丹和汶莱为邻。

公元初马来半岛有羯荼、狼牙修等古国。15世纪初的马六甲（Melaka，中国古籍称为“满刺加”）是个强大的王国，也是个举世瞩目的贸易海港。

自16世纪起，马六甲先后沦为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地。1874年以后，英国更把势力伸展到整个马来半岛。

至于东马，砂拉越自19世纪中叶，便受英国人的拉惹王朝所统治，长达105年。到了1946年才让渡给英国，沦为英国殖民地。另一方面，1870年英国的渣打公司，也先后与汶莱苏丹及苏禄苏丹签订割让条约，取得了沙巴的主权，并于1946年把统辖权拱手让给英国，成为英殖民地。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赢得独立，成立马来亚联合邦；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合了新加坡、砂拉越和沙巴成立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幅员辽阔，蕴藏着丰富的矿产和石油；还有延绵不绝的沿海区域，渔产取之不尽；境内覆盖的热带雨林，则提供了丰富的林业资源。它得天独厚，既无酷暑也无严寒，更无台风、地震、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的侵袭。而这里的人民也没有辜负上天赐予的一切，他们在肥沃的土地上开荒拓土，辛勤劳动，发展工农矿业，来建立美好的家园。

马来西亚是多元民族国家，华人作为第二大族群，是除了中国和新加坡外华人比例最高的国家。华人在当地享受着温饱宽裕的生活，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和其他民族和谐相处，早已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了；但他们也依然坚守着从祖辈传承下来的传统习俗，可以说是海外最具中华文化特色的华人社会。## 当今生活风貌

引言

在那段凄风苦雨的华工移民浪潮期间，华人的祖辈们受尽了皮肉之苦，饱尝了精神折磨，为的仅是能过上安逸的日子，求得足以温饱的生活。

他们或许曾梦想过，将来有这么一天，一个安逸而富足的福地会出现，并渴望自己有幸在这样的一个人间乐土上快乐地过活。他们万万没想到，当年自己不屈不挠的努力，造就了这个梦想——新加坡，一片大家打造出来的福地真的出现了。

今日的新加坡，一般人民都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粮仓囤积了充足的米粮；每一天，都有形形色色的蔬菜水果从各国源源输入；超过80%的国民都“居者有其屋”；交通系统四通八达，各类的公共交通工具更是日夜不停地川流不息；摩天大厦林立，展现了动感之都的魅力；全岛的绿化更让新加坡成为姹紫嫣红的花园城市国家。

在此处，衣食住行样样都方便，这不就是我们的祖辈们，当年只有在梦里才敢想象的世外桃源吗？

新加坡是两岸三地以外，世上唯一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在占全国总人口超过75%的华人人数当中，福建人约占40%；潮州人约20%；广府人近20%；客家人则不足一成。作为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虽然华人在人口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但无论在任何领域，每个种族都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华人依然在没有特权的情况下与其他族群公平竞争。

尽管当年如猪仔般被卖到全球各地当劳工时，华人曾是受尽欺压凌虐的一群，但今日的新加坡华人，在努力打造了全球公认的安居乐业之地后，与他族共享这个人人向往的理想家园，为世人树立了一个宽容的好榜样。

- 牛车水的马来名称是“Kreta Ayer”（此乃古时的拼字法，若依现今的规范马来文则应写作“Kereta Air”），意为水车。早年的新加坡没有自来水供应，人们只好用牛车把安祥山（Ann Siang Hill）的井水运载到住在这里的各家各户，故华人惯称此区为“牛车水”。另一种说法则是，为了冲洗尘土飞扬的街道，当地居民每天都用牛车从远处把水运来，故得此名。如今，牛车水的老房子和金融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展示着新加坡的过去与未来。

经济发展快速稳健 狮城华商与时俱进

华人是新加坡经济的火车头，活跃于各个领域，也乐于和其他族群共同努力把国家经济一再推向高峰。

独立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茁壮，新加坡华人的资本紧依政府经济策略的调整，从传统行业转向新兴科技工业。1968年新加坡成为全球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之后，华人的金融服务业更是突飞猛进，全速发展。旅游业则是华人多元经济领域的另一重要支柱。新加坡华人从事的职业无所不包，从祖辈的传统生意，到新兴工业都有华人经营。

由于出色的经济发展，新加坡涌现大批财力雄厚的华人财团和富商，在世界富豪排行榜当中，新加坡华商至少有十位入榜，其中包括远东集团的创办人黄廷方、大华银行的总裁黄祖耀、城市发展的执行主席郭令明、银行界的翘楚邱德拔家族、华侨银行的前主席李成伟等，都是闻名的杰出华人。不少长袖善舞的华人企业家更进军海外，建立了家喻户晓的国际品牌。新加坡华资企业成功转型，也引领着更多年轻华裔创业家，从新加坡境内走向国际。

新加坡有许多已属百年基业的华人企业，品牌深入人心，如“余仁生”传统保健品、“广祥泰”调味品、“美珍香”食品等，不仅长期占领国内市场，还成为知名的国际品牌。20世纪后期的高科技产业也羽翼丰满，纷纷在国外建立据点。如今，由华人经营的优质品牌在国外设立多家分店的新闻已是司空见惯。

在多家华资银行当中，以大华银行和华侨银行的资本最雄厚，除了在新加坡国内有上百家分行外，其业务已扩展到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此外，近年来新加坡的中资企业已有2000家左右，是海外中资最为集中的地区。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也纷纷进驻新加坡，并在此挂牌上市。

除了在商界发展，也有新加坡华人选择加入政府机构当公仆，为民服务。与其他国家的华人相比，这里有更多的华裔青年投身警、军界，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此外，在新加坡的华人专业人士也不少，包括医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等，齐心协力地为这个发展一日千里的国家付出，同时也为他们本身带来了美满富足的生活。

华裔精英主导政坛 力保各族和睦共处

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政府，其行政管理向来举世瞩目。政策对症下药，效率协调统一，也继承了中国古代“父母官”的作风，对国民的照顾就像父母待子女般，不分种族，从住房、医疗、水电补贴；到结婚、生育、养老各方面，凡事考虑周到。政府甚至细心地为人民充当红娘，设立专门替未婚男女介绍理想结婚对象的官方机构。生活在这里的华人，可谓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

新加坡华人奉公守法也是举世闻名的。绿灯未亮，哪怕路上无车行驶，华人还是不会越过雷池半步；排队守序也是新加坡华人自小养成的好习惯。用餐时分，生活节奏快速的华人停下急促的脚步，耐心地排队等候入座。在文明修养方面，为世界华人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这里是个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多元的移民社会，“家和万事兴”，华人深知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促进族群融洽的重要性，从不因是第一大族群而恃势凌人。

大多数新加坡人对政治不热衷，并非出于不关心，而是因为政府家长式的管理，早已为人民打点好一切，人民根本毋需为衣食住行等等的烦恼而操心，只需尽情享受生活。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取得今日的成就，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就是首任总理李光耀及他的优秀团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 在新加坡，各族人民相处融洽，还一起欢庆对方的传统佳节。

- 作为最大族群的华人与其他民族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新加坡的繁荣昌盛。

社会祥和井然有序 生活安逸诸事便捷

多少国家的执政者难以实现的“居者有其屋”理想，新加坡却做到了。这里逾80%的人民居住在政府组屋内，这是一种由政府投资兴建、价格大众化而设施完善的单元楼房。

许多新加坡华人家庭都对组屋充满独特的情感。这种与熟食中心、各类店铺、诊所等连成一片的独特住宅区，有着外表看来朴实无华的房子，里面却宽敞舒适，楼房有两房、三房、四房及五房式，是不少华裔子弟诞生、成长和养老的地方。

在“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下，政府极力发展组屋区，打破了早期的新加坡华人依籍贯聚居在不同地区的格局，把各种族、籍贯的人民安置在同一个屋檐下。政府还为选择居住在父母家附近的子女提供购屋津贴，鼓励子女发扬孝敬父母的优良传统。

华人与各族人民在组屋区可享有优渥的福利和完善的社区设施，游乐场、托儿所、菜市场、小贩中心、休闲公园等设备一应俱全，且环境优美、鸟语花香。他们甚至可在组屋底层举办婚礼、丧礼或烧烤会。另外，同一个社区内的组屋之间都由有盖走廊连在一起，大部分还会连接到巴士站，让大家在出门或步行到巴士站时，不必日晒雨淋，非常贴心。

不仅如此，组屋的底层还辟有“学习角落”（Study Corner），为那些喜欢清静读书的人提供了好去处。每个学习角落都有十来张桌椅，可以容纳二三十人。有的是供单人使用的桌椅，有的是两张桌椅连在一起，让一个小组的成员进行讨论。此外，学习角落还提供了电风扇、公共电源插座等设备，十分方便。

在组屋的公园区内，还备有各型各类的简单运动器材和娱乐设施，有些范围较大的社区，甚至还有四五个不同球类的球场，力图让人们住得舒适、活得健康。难怪有些华人其实已经有能力住在高级公寓或独立洋房，却情愿与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住宅区“长相厮守”。

然而，还是有一部分较注重隐私，又不介意多付一些生活费的华人，选择住在私人公寓。这是一种由私人发展商兴建、入口处有门卫把守的高层楼房；较为富裕的家庭，则住在独家独院的房屋。

新加坡土地资源有限，却保留了52公顷的土地建设植物园，甚至在高楼组屋或商场顶楼也建有美丽的空中花园。这里葱笼苍翠，赢得了“花园城市”的美誉。

无需被混乱的交通状况弄砸一整天的心情，也是新加坡华人所拥有的幸福。这里的各类公共交通设施完善，快捷方便。华人经常挂在嘴边的“MRT”，就是新加坡地铁的英文简称，如今所设立的路线几乎遍布全岛，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的巴士往往准时抵达巴士站，误点几率超低；日夜川流不息的德士也提供了24小时的服务，即使没有私家车，华人出外也不会有任何不便。

想要拥有汽车的华人，最关注的课题莫过于“拥车证”，这是根据每年淘汰车辆的数量所发放的证件，让有意购车者竞标，中标者才可购买汽车。华人时刻关注拥车证的价格，情况就如香港人每晚打开电视留意楼盘价格那般“紧张”。这些车主平日的话题也避不开俗称“ERP”的“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即为了控制车流量而在闹市设立的先进电子收费区。这两项措施让人口密集的新加坡，并没有其他大城市交通拥挤的烦恼。

此外，华人缴付水电费、电话费以及其他杂费，完全不必赶在上班时间与他人挤在一块儿，因为全岛都有随时可办理付费手续的先进设备，就连租借电影光碟、购买邮票，也不必劳驾任何店员，即使是三更半夜也没有问题。新加坡华人的钱包内，多数也不会少了乘搭地铁所需的“易通卡”，定期给这种亦可在某些商店当作现金卡使用的小卡片加额，也成了本地人生活的一部分。

城市花园美食天堂 吃喝玩乐应有尽有

能够生活在“亚洲美食天堂”，对民以食为天的头号拥护者新加坡华人而言，是一桩幸福美事。好些新加坡华人或不精通向旅客介绍当地的旅游景点，但是一谈及美食，肯定会忍不住说个不停，如数家珍。中文媒体也一直热衷于推广各项“美食运动”，几乎每份中文报章都少不了美食专栏。

这里汇集了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和欧洲的多种美食，各类菜系相互交织渗透，并且日益“新加坡化”，是岛国多元文化另一层面的真实写照。

具有代表性的新加坡华人美食多不胜数，海南鸡饭、肉骨茶、粿汁、叻沙、鲜蛤炒粿条、蚝煎、福建炒虾面、沙爹米粉、炒萝卜糕、卤面、鱼丸面等，全部都远近驰名。新加坡四面环海，华人品尝海鲜的热衷程度自然是不在话下。海鲜的种类和吃法很多，如胡椒螃蟹、辣椒螃蟹、碳烤魔鬼鱼、醉虾、烧烤虎虾、奶油虾、龙虾沙西米、清蒸石斑鱼、铁板生蚝以及各种各样的贝类，其中辣椒螃蟹这道佳肴，更是华人向外国人推荐狮城特色美食的头号首选。

此外，充满地方色彩、南洋风情的各式甜点也是独树一帜的消暑良品，如红豆冰、杂果冰、仙草荔枝冰、海底椰、文头雪、蜜瓜西米露、摩摩喳喳、红宝石，以及结合了本地特产的水果如榴莲、红毛丹、红毛榴莲的许多新旧口味甜品，都深受大家喜爱。

与马来和印度同胞相处了好几代，华人也十分喜爱融合马来或印度风味的辣食，如咖哩鱼头、亚三叻沙等；一些娘惹佳肴及娘惹糕点——多数由椰浆、班兰叶、糯米、糖等食材制成的美食，五颜六色、小巧玲珑、风味独特。同时，各籍贯的华人也热衷将家乡小食进行改良，综合新加坡风味并发扬光大，成为新加坡的独创美食，如潮州人的水粿、客家人的酿豆腐等。

新移民也带来了各自家乡的美食。如今，川菜、北方菜、湖南菜、台湾菜或上海小吃餐馆，如雨后春笋遍布各个角落，令新加坡华人拥有更多选择，大饱口福。

有人说新加坡华人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这一点都不夸张。餐饮业在这富而小的岛国里发展蓬勃，除了餐馆，还有无处不见的熟食中心。无论是在观光区、办公区、工厂区、购物中心、社区中心或地铁站附近，华人都可轻易找到熟食中心，品尝不同风味而又价格廉宜的佳肴。因此，熟食中心里往往都可看见人头涌动的华人食客。身在富裕的社会里，进食对华人来说已不仅是为了充饥，而是一种生活的乐趣。

碰上美食节，他们更是举家出动，热闹欢腾，常让外国人体验到新加坡人热爱美食的盛况。除此之外，常年轮流上阵的电器展、科技展、书展和旅游展，也是人山人海，热络不绝的华人往往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新加坡华人家庭的周末，永远不寂寞。

购物、旅游，都是新加坡华人主要的消遣活动。新加坡华人消费能力高，每逢周末或假日，无论是售卖日常用品的商店或是名牌专卖店，都是人潮汹涌。如果碰上大型促销活动，更会出现全家总动员疯狂抢购的画面，因此有人打趣地把购物形容为新加坡华人的全国性运动项目。

而华人人龙出现得最为频密的另一个地点就是投注站。生活在平静安逸的国度里，合法的赌博活动成了许多华人小市民喜爱的消遣。大彩、多多和万字票投注站无所不在，超市或便利店内也可见其踪影。在一些投注站，许多华人风雨不改地在固定时段排队下注。“小赌怡情”——许多新加坡华人的座右铭。他们盼望通过这小小的投资，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的梦想早日成真。每逢周末，新加坡克兰芝赛马场也非常热闹，当然少不了华人的身影。

新加坡华人很喜欢出国旅游，到外面去感受更广阔的天地。隔岸的马来西亚成了他们的主要选择之一，只要越过一条新柔长堤就可以到彼岸，尽情享受消费较低的吃喝玩乐及购物之旅。这里的旅行社也备有许多两、三日出国游的配套，让他们在无后顾之忧下享受出国游玩的乐趣。

平日勤奋工作的新加坡华人很懂得慰劳自己，就算没时间出国，他们也会到东海岸或附近的岛屿，租间度假屋或搭上帐篷，游泳、滑水、烤肉，不亦乐乎。再不就三五成群到克拉码头（Clarke Quay）的酒吧一边观赏足球联赛电视直播一边聊天、去舞厅跳舞松松筋骨、结伴高唱卡拉OK，或到新加坡的旅游景点去消磨时光。

完善教育中英并重 全民动员掌握双语

新加坡华人与全球华人一样，对教育十分重视，更何况这里是竞争激烈的国际大都会，教育可谓是他们的人生大事。经济能力许可的华人家庭，送孩子出国深造是平常不过的事情。

在这里，多数华人都懂得至少三种语言。早期的华人是以地方语言如福建话、潮州话、广府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兴化话或广西话为主，通马来语，初通华语，及少许的英语；现代的华人则方言、华语皆通，并懂得说英语。不只通一种方言者也大有人在，若是父母分属不同的籍贯，邻居或朋友又属另一方言群体，相互交流的日子久了，自然就懂得对方的方言。

新加坡政府把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和英语并列为官方语文，但鉴于英语的国际地位及作为各族群消除语言隔阂的共同语，而给予高度重视，是所有学生必学的语言。同时，政府也注重母语教育，培育双语精英。许多国际名流选择把孩子送到新加坡来求学，正是看中了这里可以很好地掌握双语的学习环境。

教育工作者洪丽环说道：“这里一般的学校从幼稚园到中学，都备有华文这一科目任华人选读，除非你放弃母语课，否则，是没有所谓华人在学校无法学习华文这回事的。”

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有人讲华语的环境中，就算是平常较喜欢以英语来沟通的年轻华人，还是能说得上一口流利的华语。随着许多中国新移民的到来，华语更成了大街小巷最为普遍听到的日常用语。近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备受世人重视，因此把华语学好已成了新加坡华人的全民运动。政府也相当支持这类运动，鼓励大家多讲华语的电视广告片段、四处张贴的相关宣传海报从来没有间断过。

尽管这里严禁学校或媒体使用方言，如把香港的粤语或台湾的闽南语电视节目和电影经过规范的华语配音后才可播放，但新加坡年轻华人依然能够向主要的方言使用群——他们的长辈讨教学习。香港和台湾流行文化的盛行，也间接有助于新一代掌握广府话及福建话。

对于中华文化，老一代的华人都很珍惜。新生代尽管也不乏热爱中华文化者，但毕竟受西式教育的影响，难免还是有些洋化了。新加坡著名的文化人韩山元分析说：“大体而言，新加坡华人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受传统华文教育者，这都是一些老人，属于稀有品种；第二类是边缘人，他们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左右逢源。现今的大多数年轻人即属此类别，他们既懂中文，又通晓英文，具有很大的优势；第三类则是彻底洋化的华人，极其推崇西方文化，但这种华人还是属于少数。”

现实生活中，在新加坡的任何一个角落，招牌、路标和广告上依然可以看到熟悉的方块字；在街头巷尾仍然能够听到亲切的华语。虽然英语成了主要的工作语言和官方用语，但是华语依然是最多新加坡华人使用的日常语言。然而，华人在各种社交场合还是体现出对其他种族的包容。只要有一名友族同胞在场，大家都会很自然地用英语来沟通，真正贯彻了社会大同、民族和谐的宗旨。

- 崇福学校是福建会馆属校，如今也招收各族学生，提供华、巫、印3种母语课程。

趁着年少积极进取 年老无忧逍遥快活

很多人或许会认为新一代新加坡华人的生活过得舒适安逸，有高科技玩物件随着他们成长，又不必为柴米油盐操心，必定觉得自己很幸福。其实，他们也有充满压力的一面，忙碌的学习生活构成了许多无形的压力，密密麻麻的时间表，不断催促着孩子们“赶场”。

根据统计，约96%的新加坡孩子有参加各类的课外补习班。补习中心的布条、传单及广告满街招摇，招生广告日日见报，以致有人戏称“补习补习，不补没出息。”来形容这个状况。

对新加坡华人家庭来说，课业补习不过是一顿孩子必进的“正餐”，许多华人家长还会为孩子提供学习绘画、音乐、舞蹈、书法、中国画、手工艺品等的“营养补助”，欲培养孩子成能文能武的国家栋梁。

这群新华人身在可轻易购得新颖科技产品的大都会，加上处于资讯发达的年代，所以在勤读书、忙工作之余，也会把时间花在打电动、用时髦的随身听聆赏音乐，以多功能的智慧型手机与朋友上网聊天等等；有表演天分的则积极参加各项艺能竞赛，以期踏上明日之星的康庄大道。

此外，许多华裔青年也活跃于义工活动、服务社会、或献身文化事业；各类大型的活动，不论是严肃的庆典，还是文化艺术表演的场合，他们都会帮忙维持秩序。双十年华的方洋，就是其中一名经常为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等单位服务的在籍女学生。她表示：“申请担任义工的过程很简单，只要到各主办单位的网站去浏览，哪些你感兴趣的活动有空缺，就在网上填写申请表格，非常便捷。虽然这类工作都是无薪性质的，但我们其实都只是志在参与，为能够替人文活动贡献一份力量而得到满足感、同时又结交不少朋友，这一些收获才是当义工真正的吸引力。”她的古道热肠，也证实了新加坡的年轻人并非都是只懂得追求物质享受的“月光族”。

在专门提供给大众进行活动的广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一大群活力十足的华人子弟正在练习相声、舞蹈、演讲、舞台剧等。总体而言，新加坡的华人青年都是上进心很强的一群，无论在知识的追求与学习，或是创意的发挥，都能见识到他们的积极。街头上三五成群手提划桨等体育用具或大提琴等乐器的华人青年，兴致勃勃地赶往练习场的画面随处可见。

老一辈华人，有些清早5点多就起身，邀约数名同好到小贩中心的食阁，叫上一杯香浓的热饮，聊一聊每日的新鲜见闻、或讲述过去的美好回忆，一聊就过了一个多小时。这时，俗称“巴刹”的菜市场内，各类摊档的叫卖声开始此起彼落，渐渐热闹了起来，老人们才言犹未尽地道别，前去巴刹采购当天所需，为上班的儿女准备餐点；有的还相约共饮下午茶，继续天南地北地享受聊天的乐趣。

也有许多乐龄人士一早便到社区中心、公园或球场练习健身操，扇子舞、太极，甚至舞刀弄枪。清晨时分，他们动作划一地在齐心健身的壮观场面，朝气蓬勃，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新加坡华人在这里生活都深感有安全感，这不单是指人身安全方面，也包括心灵上的安全感。已经60开外的乐龄妇女林爱华坦言，身在新加坡，纵然年纪渐大却不会有感自己的晚年没有保障。“尤其让我欣赏的是，政府为选择住在父母家附近的子女提供购屋津贴，鼓励他们发扬孝顺父母的传统美德，令我们感到十分温暖。这里也有很多照顾老人的措施是很多国家所没有的。在新加坡，年老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语毕，林爱华还露出满足的笑容。

这里几乎每个社区都设有“老年人活动中心”，里面有各类的娱乐设施，电视机、收音机、游戏牌、象棋、报刊杂志，更少不了爱唱歌的乐龄人士最需要的卡拉OK设备，应有尽有。一些社区甚至还有按摩椅，组屋旁则有公众使用的各类健身设备，适合给乐龄人士们锻炼身体。他们闲来无事，便相约到这里来聊聊天、打打牌，唱唱歌，乐不可支。也有一些身体比较健壮的乐龄人士到小贩中心、快餐店或购物商场从事一些能力所及的工作，有时不是为了生计，而是为了消磨时间，或不想与整个社会脱节、或希望能够自力更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

珍惜传统保留习俗 融汇各方优良文化

通晓中英语是新加坡华人立足世界舞台的重要筹码，这优势促使新加坡成为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国际走廊，无数的文化活动或节日庆典也让新加坡绽放绚丽的光彩。至于华人传统文化与节庆，老一代的华人珍惜如昔，也保留得周全。

为了鼓励年轻一代更为热衷了解各节庆的真正意义，新加坡华人民间组织和政府机构近年来积极推广各类华族文化庆典，并加入一些新加坡独有的本土元素，以期华族的传统文化与节庆得以传承下去。新加坡华人最为重视的节庆，就是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和中秋节。他们至今还保留着除夕夜吃团圆饭、派红包、穿着红彤彤的新装去拜年、舞龙舞狮等习俗。

春节来临之际，新加坡可说是满城洋溢着浓厚无比的新春气息。每年元旦刚过，新加坡华人就开始置办年货，买新衣服。春节前家家户户进行大扫除，有些比较传统的华人家庭还要在门上贴春联、倒贴“福”字；除夕夜全家老小在一起吃团圆饭。有些家庭吃过年夜饭后，还会赶到牛车水年货市场，人挤人，凑热闹。到了午夜时分，家长们祭神拜祖先；有的则前往当地著名的两座寺庙——观音堂及天福宫上香祈福。

- 天福宫是新加坡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张灯结彩、绚丽夺目的牛车水，是体验新加坡华人迎接新春佳节盛况的最理想地方。除了可以观赏年年有新意的春节装饰，那里更是最热闹的年货市场，到处是五颜六色的年花、色香味俱全的年货、五花八门的装饰品，琳琅满目。春节前的十几天，牛车水夜夜灯火辉煌、人山人海、欢腾的气氛有增无减。随著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去旧迎新的活动就越是高潮迭起，群众尽情选购、讨价还价、情绪亢奋。尽管过了午夜12时，牛车水的年货市场人潮仍然没有减退，华人多如过江之鲫，忙着享受办年货的乐趣，将牛车水挤得水泄不通。

大年初一，寺庙前一早便万头攒动，华人争先恐后插头柱香，场面极为壮观。华人在春节期间所吃的食物也很讲究，如鱼象征“年年有余”，年糕代表“年年高升”，发菜是取“四季发财”中发财二字的谐音，桔子表示“大吉大利”等。一些传统习俗如大年初一不能扫地也沿用至今。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华人拜年时有一个特色，就是携带两颗桔子，祝贺对方“大吉大利”，而对方也会礼尚往来，在你道别时奉上两颗桔子作为回礼。

许多华人企业、社团和家庭在新年时也会一起“捞生”。“捞生”是以鱼片、姜丝、萝卜丝、辣椒丝、袖子、花生、芝麻等拌成的七彩鱼生，大家用筷子把鱼生高高捞起，边捞边说吉祥语，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捞得风生水起，事事如意。

- 华人在春节时期“捞生”，象征“捞得”风生水起”。

在滨海湾举行的“春到河畔迎新年”，也是贺新春的重点活动之一。许多华人到这里猜灯谜、逛年货市场、品尝传统小吃，欣赏港台及本地艺人的歌舞和特技表演，到处人潮汹涌，洋溢着新春气息。

- 每一年都会举办的“春到河畔迎新年”，成了新加坡华人新年的一项新“传统”。

一年一度配合春节而隆重登场的“妆艺大游行”，除了是新加坡人一年当中最期待的节目之一，也是吸引外国游客特地前来观赏的重大盛会。这个与新加坡华人息息相关的艺术大汇演，为春节注入了现代与时尚的元素。随着夜幕降临，路上就像一个露天的大舞台，一辆辆装饰华美的花车鱼贯登场，各种奇装异服、曼妙歌舞轮番上演，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长达两小时的表演犹如一次梦幻之旅，演出结束之际，烟花绽放，彩带飞舞，人人兴高采烈地

涌至马路上，现场瞬间成了公共舞池，将普天同庆的气氛推向最高点。

农历八月十五是人们赏月吃月饼的中秋佳节。除了传统的莲蓉、豆沙、五仁等馅料的月饼外，这里的华人每年都创新不同口味的月饼，如绿茶、黑芝麻、冰淇淋、各类水果味等。然而，最受欢迎的终究是内含咸蛋黄的莲蓉月饼。中秋节当晚，华人会在组屋楼下或庭院内举办称为月光会的赏月会，泡上一壶热茶，品尝月饼和水果，欣赏花灯与月色，有的还会举家到新加坡河畔放河灯祈福。孩子们则提着造型特出的灯笼，呼朋引伴，欢欣快活地四处游行，洒下一路欢笑。

在婚礼习俗方面，新加坡华人与其他地方华人的情形基本上大同小异，只是西方色彩比较浓一些。通常是未来新郎拜会未来岳父岳母，请求长辈将女儿许配给他，在女方家长答应以后，准新郎、新娘双方家长互赠首饰与佳酿等礼品。于大喜之日当天，新人会向长辈们一一敬茶，之后宴请亲朋好友。除了在酒楼宴客、行夫妻交拜之礼以外，狮城男女结婚的最大特色，是在婚姻局注册后便马上排队申请政府的组屋，共筑爱巢。

维护各族宗教自由 互容互纳皆大欢喜

新加坡华人大多信仰佛教或道教，他们在家里设香台，日日烧香祈福，初一十五还固守吃斋的习俗。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的也不少，而无神论者日益增长的现象亦愈加显著，约占华人人数的15%。

民间信仰也深深影响着新加坡华人。早期华人经水路艰苦跋涉到此，因此新加坡大部分寺庙都供奉护航女神妈祖，譬如历史悠久的天福宫和粤海清庙。天福宫在19世纪初由福建人兴建，采用正统闽南建筑风格，主体建筑完全没有用到一根钉子。1973年，天福宫被列为新加坡国家遗迹，如今已是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而粤海清庙建于1827年，1850年才扩建至今天的规模，前去祈拜的善男信女以潮州人居多。

其他充满华人色彩的庙宇还包括了坐落在俗称“四马路”的奎因街（Queen Street）的观音堂。此庙常年香火鼎盛，每逢大年初一，信徒都涌往观音堂抢插第一柱香，希望来年鸿运当头。

新加坡华人成长在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因多元种族的环境带来了多元宗教，但这里的回教堂、佛寺、道观、兴都庙、基督和天主教堂一直都融洽地共处。各族间也能更了解各个宗教及文化，避免愚昧的偏见和误解带来不必要的纷争，同时发挥有容乃大的高尚情操。所以，在小印度可以看到回教堂；牛车水可找到兴都庙；阿拉伯街亦设有藏传佛教场所，是难得的和谐画面。

此外，华人至今仍保留着相当完整的华族丧礼和出殡仪式。如果有亲人过世，他们会在中文报上刊登讣告，有的则是好友至交为亡者刊登挽词，代表对亡者的追思。

新加坡部分宗乡会馆拥有本身的义山，如福建人的咖啡山、客家人的双龙山和丰永大、海南人的海南山、潮州人的泰山亭和广东人的碧山亭。早期的义山只开放给同乡会员，到了后期才开放予各籍贯人士。

随着土地陆续被政府征用，大部分坟场已改建成安放骨灰瓮的灵塔。灵塔一般采用多层式设计，向高空发展，整洁美观。一些义山的设备也趋向多元化，如历史悠久的广东碧山亭建立了先贤碑、公所、安老院等，再经美化，成了寻根问祖的好去处。

实际功能不如往昔 存在价值依然重要

会馆原先是为了办理华人的身后事、或祭祖拜佛而设的。早期很多客死异乡的华人都是举目无亲的一群，因此需要成立理事会来管理坟场、神庙。后来，会馆的作用逐渐扩大到凝聚华人社群的力量。

华人社团多以地缘、血缘与业缘为组织基础。来自同一乡县的地缘组织，有晋江会馆、花县会馆；同宗同姓的血缘组织，如台山黄家馆、四邑陈家馆；同一行业的业缘组织，如建筑工会、渔业公会等。此外还有许多文化团体，包括运动、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及校友会等；宗教团体包括孔教、基督教等；其他的华人社团还有进行休闲活动的俱乐部等。

早期的社团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里扮演着维护和发展华人社会的角色，是早期移民的精神依托，也是凝聚华人的重要据点。在新加坡独立初时，这些乡团会馆曾经设立登记站，协助会员申请成为新加坡公民。

今天的新加坡华人社团中，代表多数华人社团的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是规模较大的一个。它成立于1986年1月27日，由福建会馆、潮州八邑会馆、广东会馆、福州会馆、南洋客属会馆、琼州会馆及三江会馆为基干，共有183名成员，几乎涵盖所有活跃的宗乡会馆；其宗旨包括：促进新加坡各宗乡会馆之谅解，推动文教和社交活动，及鼓励、赞助研究华人传统文化。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则是最具威望的华人社团，成立于1906年，是新加坡历史悠久的商业团体。总商会不但是当地华商最高的领导机构，在国际商业舞台上享有良好的信誉，同时也是世界华商大会的创办机构，并拥有广泛联系世界各地华人企业的商业资讯网站《世界华商网络》（www.wcbsn.com.sg）。

社团是老一辈华人消磨时间的好去处，而管理工作也多由他们负责。新一代华人平时忙于工作、进修、运动，对参与会馆、社团活动并不热衷，导致许多会馆、社团面临青黄不接的状况。新移民对家乡的情感犹浓，于是成了这些社团、会馆的新生力量。近来更出现了不少新的会馆组织，如天府会、华源会、九龙会等，在新移民初到异域，人地生疏之际，及时伸出援手。

时至今日，好些早期的华人会馆依旧屹立于原处，然而风雨飘摇，当年的盛况已经不再。尽管如此，它们作为华人曾经的依归，也见证了华人的移民史，仿佛是一部对华人子弟诉说着祖辈们的丰功伟业、光荣背后的辛酸血泪故事的播放机。

-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大厦，建筑充满中华气息。
- 华人家长们携带孩子参加会馆活动，追根溯源。

各界名将成就斐然 新晋人才后劲十足

阅读中文刊物是许多新加坡华人的日常习惯，新加坡中文报计有《联合早报》、《新明日报》、《联合晚报》、免费双语报章《我报》，以及十余种中文杂志如《I周刊》、《女友》等供选择。邻国马来西亚出版的中文报刊《新生活报》、《中国报》、《民生报》等，在新加坡也购买得到。主流报章《联合早报》每天的销量约有20万份，读者群主要是老一代华人，而新移民的出现，也给中文报刊带来了销量创新高的曙光。

在新加坡，电视台华语节目的收视率高于英语节目。或许对华人来说，华语还是比较亲切的。华人家庭的餐桌一般都是对准电视机的，而许多华人经营的咖啡店也装上电视机，让食客们时时刻刻都能观赏中文节目。除了8频道及U频道，还有一些须付费的中文有线电视频道。新加坡的中文电台也不少，计有动力频道、城市频道、醉心频道等。

有人曾批评新加坡重理轻文，是一片缺少底蕴的文化沙漠。的确，文化事业在新加坡不被视为经国大业，但却无疑是受到重视的。新加坡华人推广中华文化活动的努力向来不曾间断过，还将这些活动提升到国际层次，较为突出的有“牧艺大游行”、“新加坡华艺节”、“国际华文书展”、“端午节龙舟比赛”等。

其实，在文化艺术方面，新加坡是人才辈出的，尤其是近年来，他们竞放异彩，使新加坡不再是文化沙漠，而成了一片绿洲，洋溢着十足的活力。如多元艺术家陈瑞献、戏剧家郭宝坤、享誉海内外的音乐指挥家朱晖、在海外发展的电影配乐师Ricky Ho、著作等身的作家尤今，都是脍炙人口的美谈。

上世纪80年代，一批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创出了清新质朴的“新谣”，不但开辟了一条属于新加坡华人独有的音乐道路，在全国掀起一股“新谣运动”，同时也崛起成为亚洲中文乐坛的一股新力量。当时的音乐工作者梁文福、许环良、黎沸挥、李伟菘、李思菘等，创作过无数耳熟能详的好作品，多数都在各国华人社会中传唱多年。至今，他们仍是中文乐坛举足轻重的创作人或制作人。

歌手如孙燕姿、林俊杰、阿杜、蔡健雅也突破地域的限制，凭着悦耳的歌声、丰沛的创作力，征服了歌迷的耳朵，成为全球华人爱戴的新生代偶像。近年来，新加坡的乐坛更是新人辈出，不论幕前幕后都充满潜力，歌手因表现出色而到港台发展的新闻，已让人司空见惯。

新加坡中文电影亦独具一格，大部分作品都反映了本地华人的心声，因此颇受大家的喜爱。尤其是由梁智强执导的作品，通过嬉笑怒骂的方式，赤裸裸地点出新加坡的社会现象和华人的生活面貌，一系列深受欢迎的电影如《小孩不笨》、《钱不够用》等，让观众在笑中带泪的剧情中找到共鸣。其中一部作品《我在政府部门的日子》，还让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一次发表演说时点名谈论。

除了梁智强的通俗喜剧，文艺气息较浓的导演如陈子谦，曾以新加坡华人独特的七月歌台文化为题材，拍出了《881》电影而掀起一股热潮，引起年轻人关注中元节期间的歌台表演。其他出色的新加坡导演邱金海、唐永健等，一旦有新动向都会引起话题，并在国际间与各国电影业者有良好的互动，是新加坡中文电影界不容忽视的一股动力。另外，新秀导演们频频获奖扬威国外的消息也时有所闻。总体而言，新加坡华人不论在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方面都交出了漂亮的成绩，是华人的骄傲。

热爱艺术的华人，一年当中总会赶上多场的艺术之约。每当翻开报章的活动介绍栏目，星空下的露天芭蕾舞、湖面上的大型歌剧、新加坡国际电影节、以亚洲各语言进行的剧场表演、热门音乐会不胜枚举，叫人眼花缭乱。经典歌舞剧如猫（Cats）、歌剧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也都曾在此上演。来自世界各国的顶尖流行乐手或古典音乐名家更是不在话下，几乎每周都有国际巨星到来献艺。

现今的新加坡华人生活在文化气息浓郁的大都会里，这得归功于政府一直努力把它打造成一个充满艺术与人文气息的环境，以致许多超大型的国际艺术表演、一连串的盛大艺术节不断轮番上阵，而且一般免费供民众观赏，令所有华人艺术爱好者乐不可支。

幸福的新加坡华人也活在一个注重文明建设的国度里，政府积极耗资建立博物馆、文明馆、美术馆及艺术中心等机构，以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又创立艺术学院及戏曲学院，培育更多艺术人才；成立了国家交响乐团及华乐团；而且，每年举办盛大的艺术节，为整个城市增添热闹的气氛。新加坡政府也设立古迹保存机构，不遗余力保护文化遗产。对于有出色成就与创意的文化人，还颁发文化奖，以资鼓励。

喜欢阅读的华人必定对新加坡每个社区都有一间图书馆的安排，十分感恩。在这里，一家大小前往图书馆借书、参与读书会的热衷程度是令人鼓舞的。印刷业者傅佩佩透露：“新加坡的中产阶级平日的工作时间不短，在家陪伴孩子的时间有限，所以会非常珍惜在周末与他们共处的时光。最常陪他们到图书馆的原因，除了学习，也是因为新加坡的图书馆设有亲子阅读特区，环境的设计又那么地宽阔优美，而且图书馆当局还会常在报章上介绍每周上架的新书内容呢！那种鼓励大家阅读的服务精神，总是叫我万分感动。”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及各分馆中文书籍总数近200万册，占总藏书量的四分之一。目前在新加坡正式的中文读书会，共有20多个，而且还在增长中。至于中文出版社方面，数量虽然不多，但也算活跃，生命力颇强。

新移民努力融入 本土华人宽容以待

独立40余年后的今日，新加坡仍续写着“华人移民史”，只要有才，移民厅的大门永远敞开。毕竟，对这个天然资源匮乏的国家而言，人才是它最大的财富。

新加坡生活水平高，使一般年轻华人不愿多生育；加上新一代受英文教育为主，到西方国家发展并不困难，导致社会老龄化的现象进一步加剧。新移民的到来，刚好缓解了这一问题。国父李光耀、前总理兼国务资政吴作栋及多名部长曾异口同声表示，由于华人婴儿生育率偏低，新加坡若要继续发展经济，必须广纳外来人材。

年轻、高学历、熟练的技能，是新一代移民的最大特征。拥有学术资格或特别技能的新移民，为新加坡各领域提供了较高层次的劳力资源；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健将如冯天薇、李佳薇、陶李等，如今已是新加坡体坛响当当的名字。

激烈的就业竞争，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是新加坡华人和新移民之间急需解决的问题。尽管如此，对于新移民，大部分新加坡华人都抱着宽容友善的态度，而新移民也努力克服语言障碍、跨越文化差异，积极融入这个多元社会。

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也被称为“跨国华人”，他们对祖国和居住国都有所贡献，摆脱了非“落叶归根”即“落地生根”的情感归宿，在两者之间游走，试图在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框架里取得平衡。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特邀研究员、联合早报《新汇点》主编周兆呈认为，在新加坡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中，移民只能说是一大批人的背景符号，并非是一个完整的利益社群，不必也无法结合成争取所谓权益或政治地位的特定群体。与其他来源地相比，这在某种程度上却又反证了中国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的有利环境。不过，如今的网络时代、交通工具的便利，移民与出生地的联络成本大大降低，联络机会和能力大大增强，造成出生地和移居地时空同步，在极为便利掌握中国动态的同时，对认同新加坡亦可能形成新的挑战。

华人迁徙、打拼、融入的故事，在新加坡不断上演，昨日的历史和今日的生活纵横交错，丰富了这个岛国，也为华人社会注入更多元的色彩。

其他资讯

新加坡之父——李光耀

李光耀是一位极富魄力、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从上世纪50年代初参政至今，在政坛纵横60余年，直到2015年逝世前，仍在担任内阁资政，关心国事民疾。

李氏祖籍广东省大埔县党溪乡，1923年9月16日出生在新加坡一个海峡华人的家庭。他曾以优异的成绩，考获英国剑桥大学法律系荣誉学位，1949年毕业回国后，取得律师资格。50年代初期，新加坡政治动荡，左翼工会势力庞大，工潮与学潮接二连三地爆发。这时的李光耀，经常挺身而出，为工人与学生辩护。

1954年，人民行动党成立，李氏就任秘书长一职。1959年，人民行动党参加新宪制下的自治邦议会大选，在51个议席中赢得43席，组阁成立新加坡自治政府，李氏荣登新政府首届总理，时年35岁。

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奈何之后又因双方意见分歧而退出。独立建国之初的新加坡面临经济、国防及民生等诸多难题，幸而在李氏40年的任职总理期间，在同僚的合作、以及广大人民的支持下，成功突破重重难关。他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使经济多元化；落实工业区，以吸引国外财团来投资设厂；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创立公积金制度、成立贪污调查局、解决人民的屋荒困境、进行教育改革，及进行环境绿化等各方面的努力，使新加坡成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今天新加坡的政府以高效率及廉洁而闻名，人民安居乐业，这一切都得归功于李氏率领的政府，创造了“新加坡模式”的奇迹。

李氏于1990年11月辞去总理职务，自1991年起任总理公署内阁资政至今，仍然对政府的施政积极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卸下总理职务后的李氏，也一直担任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的主席，管理新加坡的政府外汇储备。

李氏在国际上极负盛名，多位政坛名人如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均对他表示赞赏。李氏始终提倡“亚洲价值观”，认为亚洲国家不应全盘依照西方的那一套行事，西方民主不能强加于亚洲人民身上。2000年，李氏获香港中文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2005年，上海复旦大学授予李氏名誉博士学位，表扬他对促进中新两国关系所作出的贡献。

综观李氏的一生，充满了战斗的色彩。50年代争取自治独立期间，他跟殖民主义者斗争；在治国的道途上，与左翼人士斗争；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后，他又与种族主义者斗争。他一生不息的斗争，显示了其倔强坚韧的个性。而他对新加坡不可磨灭的贡献，使他赢得“新加坡国父”的美誉。

“没有李光耀，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这句话，相信没有人会反对。

南洋大学——海外第一所中文大学

今日的华裔馆，是海外华人课题研究的重镇，原为南洋大学的行政楼。

南洋大学是中国以外的全球第一所中文大学。1953年，当时的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倡议创办一所中文大学，还率先捐出500万元，并以福建会馆主席的身份捐献该会馆位于裕廊路的500英亩土地作为大学校址。陈六使的呼吁马上获得了华人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大学筹委会很快便成立，且将大学命名为“南洋大学”。

当年7月，南大破土动工。新马各地的华人掀起了献捐热潮，短时间内就募得数百万元建校基金。南洋大学于1956年1月开始招生，首批录取的新生有330名。海外华人创办的第一所中文大学诞生了，这是海外中文教育史上空前的创举。至此，新加坡建立了一个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中文教育系统。

1958年3月30日，由新加坡总督顾德爵士主持南大落成纪念碑揭幕礼，社会各界前往观礼者有十多万，将通往校园的裕廊路挤得水泄不通。

然而，南大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它是一所民办大学，在创办过程中受到殖民政府的多方阻挠；学生毕业后，学位得不到政府的承认、毕业生难以找到理想工作的境况一直困扰大学多年。但是，南大毕业生的杰出表现慢慢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南大的社会声誉也越来越高。

到了1968年，新加坡政府宣布承认南大学位，但仍未获邻国政府的承认。随着新加坡经济的迅速发展，华语人才的出路越来越窄，于是1975年在政府的建议下，南大开始将教学语言改为英语。1980年，南大与新加坡大学合并，共组新加坡国立大学。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就是在南大的旧址上发展起来的。

南大开办25年，共培养了1万2千多名毕业生。这些人后来成为新马华文师资的主要来源，也有很多人在商界、政坛、新闻出版界作出了很大贡献。南大虽然消失了，但那份自强不息、逆流而上的“南大精神”，成了海外华人捍卫中华文化的坚定决心与顽强意志的象征。

夜夜歌舞升平的中元节庆典

每逢农历七月十五，新加坡华人将会庆祝中元节，与春节相比，重视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有二，一是被政府分置到不同组屋区的同乡可以趁中元节共聚；二是华人可藉这个节日举行募捐、办义卖会，展开公益活动。

中元节与佛教的盂兰盆会重合，因此佛道两家都设坛拜祭，使得这个节日热闹异常。一向被世人冠以“清洁国家”的新加坡也不得不为这个节日让步，无论是繁华的市中心或是百姓的住宅区，都会看到华人焚烧冥纸祭品，致使满城灰烬飘绕，蔚为奇观。

这段期间，华人还会在全岛各地举办超过500场的“歌台”表演，艺人们在台上使尽浑身解数，载歌载舞，流行曲、歌仔戏、诙谐表演悉数登场，以精彩的表演“娱乐”孤魂。通常，舞台下最靠前的一排空着的椅子，是特别预留给阴间“好兄弟”的贵宾座。各类表演除了在全岛的街边和操场唱响，一些社区还会搭起台子，让居民自娱自乐，唱方言歌，跳民间舞，演地方戏，欢腾热闹足足一个月。

据悉，新加坡是中国以外，传统戏曲保留得最完整的地区。闽剧、潮剧、粤剧等的传统地方剧种和木偶戏，每一年都会把中元节当作展示和延续民俗文化的平台。

- 每逢中元节，除了有载歌载舞的现代舞台，还有不少传统戏曲表演。
- 大部分新加坡华人都非常重视中元节，这段期间所举办的活动也多不胜数。

结语

踏海而来的华人移民，已经习惯了风袭浪尖的生活，就算是再汹涌的狂潮，他们也应对自如。掌握了中英两种全球最广泛使用的语言，使他们无论身处东方或西方社会都无往不利，再顺势搭上全球化的发展列车，全速迈向自己理想的生活。

华人在新加坡的生活，正如其国家发展般，变化巨大而迅速。他们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也不特别强调民族主义；他们活出自己的特色，走出自己的道路。在这里，他们无须背负太多国际责任，只求经济蓬勃发展，生活持续稳定。

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保存之完好，叫全球华人称美不已。去看看牛车水，还有那里的原貌馆，就会惊叹于他们在这方面的毅力和决心。

与其他民族相处，他们也发挥出有容乃大、和而不同的精神，避重就轻地消除了民族之间的纷争与摩擦，彼此互纳互容，共同塑造一个和谐的“大新加坡”社会。

就如看透新加坡社会精髓的著名海外华人研究专家王赓武教授所说：“在这里（新加坡）每个人都是典型的新加坡人，因为他代表这多元族群和文化中的一员；每个人又不是，因为从一个人身上，无法看到真正的新加坡人的全貌，要把很多人放在一起，才是多元。”新加坡华人，也力求达到多元精神。

马来西亚

引言

马来西亚位于赤道北缘，处于东西方航路要冲。全国分为东马来西亚（东马）和西马来西亚（西马）两个部分，两者之间隔着南中国海。西马半岛共有11州，北依泰国，南临新加坡。东马则有沙巴（Sabah）和砂拉越（Sarawak）两州，与印尼的加里曼丹和汶莱为邻。

公元初马来半岛有羯荼、狼牙修等古国。15世纪初的马六甲（Melaka，中国古籍称为“满刺加”）是个强大的王国，也是个举世瞩目的贸易海港。

自16世纪起，马六甲先后沦为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地。1874年以后，英国更把势力伸展到整个马来半岛。

至于东马，砂拉越自19世纪中叶，便受英国人的拉惹王朝所统治，长达105年。到了1946年才让渡给英国，沦为英国殖民地。另一方面，1870年英国的渣打公司，也先后与汶莱苏丹及苏禄苏丹签订割让条约，取得了沙巴的主权，并于1946年把统辖权拱手让给英国，成为英殖民地。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赢得独立，成立马来亚联合邦；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合了新加坡、砂拉越和沙巴成立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幅员辽阔，蕴藏着丰富的矿产和石油；还有延绵不绝的沿海区域，渔产取之不尽；境内覆盖的热带雨林，则提供了丰富的林业资源。它得天独厚，既无酷暑也无严寒，更无台风、地震、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的侵袭。而这里的人民也没有辜负上天赐予的一切，他们在肥沃的土地上开荒拓土，辛勤劳动，发展工农矿业，来建立美好的家园。

马来西亚是多元民族国家，华人作为第二大族群，是除了中国和新加坡外华人比例最高的国家。华人在当地享受着温饱宽裕的生活，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和其他民族和谐相处，早已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了；但他们也依然坚守着从祖辈传承下来的传统习俗，可以说是海外最具中华文化特色的华人社会。

华人移民简史

华人最早移民马来半岛，大抵可追溯到15世纪初的马六甲王朝。1408年，当明代航海家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他的随从费信曾载述道：“（满刺加）男女身肤黑漆，间有白者，唐人种也。”

到了葡萄牙统治马六甲（1511-1641）初期，马六甲已有一个中国村（Kampong China）；而在荷兰人统辖马六甲时（1641-1824），由于华人人口越来越多，荷兰政府先后委任了七名甲必丹（Kapitan，指华人领袖或头目）来管理华人事务。那时候的华人，大多原籍福建漳州。

打从那时起，华人已零星地移居到东南亚经商，有的还选择了长期居留。一些华人和当地妇女通婚，其混血后裔被称为土生华人（Peranakan），或称海峡华人（The Straits Chinese）。土生华人男性也俗称“峇峇”（Babas），女性则称“娘惹”（Nyonyas）。这个特殊族群受到马来人、华人及西方人士的影响，具有驳杂的文化形态，如生活方式接近马来人与西方人，但却保留非常传统的华人风俗习惯，而语言也掺杂了福建话、马来语和英语。

- 峇峇与娘惹是在一个特定时代所产生的独特族群。

战前的海峡华人，无论在商界、航运界、金融界或专业领域都出类拔萃。1960年代以前，峇峇娘惹在马来亚拥有土著身份，但后来被政府归类为华人。在二战后，华人与当地人通婚的情形大量减少，后来的混血儿也不再自称为峇峇。因此峇峇族群逐渐没落，迄今仅有少数居住在马六甲和槟城（Pulau Pinang）。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清廷锁国大门，贫穷和战乱迫使许多华南沿海居民离乡背井，远赴南洋谋生。而当时马来亚还是一个人烟稀少、荒凉落后的地方，英殖民政府试图开拓荒土，因此就从印度和中国输入大量的廉价劳工。有迹象显示，早在19世纪初，槟城已输入了中国契约华工。有人甚至被半哄半骗，成了“猪仔”被贩卖至这里。对于未知的土地与未来，这些自愿和非自愿的“新客”（早期定居者对后来者的称呼）只能寄托于命运。

在“推力”与“拉力”的牵引下，马来亚华人移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高潮。据统计，1871年马来半岛的华人人口为10万5千人；到了1941年，华人已增至261万4千人。

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移民来马才基本停止。此后，马来亚华人人口增长，完全依赖自然出生率，而非移民。

早期华人移民一般先在种植园和锡矿场做苦力稍有积蓄后就转向零售业、饮食业、土产收购、加工业、矿产开发、种植业甚至银行业。当时华人的行业基本上是按籍贯来划分的：福建人多从事港口贸易；海南人一般开咖啡店和餐厅；潮州人集中于种植业及土产贸易；客家人则主要开采锡矿。

锡与橡胶，曾经是马来西亚的经济命脉，华人在胶锡的种植、发展与经营上，一直扮演着先驱与策动的角色。当年，华人还一手开发了首都吉隆坡。

早期，吉隆坡还是个人口稀少的落后小镇，直到一位来自广东的华人领袖叶亚来开发并吸引前来采锡的华人大批涌入后，吉隆坡才逐渐地发展繁荣起来，独立后更成为国家的定都之地。

砂拉越的华人移民，大抵滥觞于19世纪初年。那时期，在西部的石隆门（Bau）散居着一些客家人矿工，他们都是从西加里曼丹华人金矿地移居过来的。后来受到英国人的武力镇压，华人不得不改行，改种胡椒、甘蜜维生。与此同时，在砂拉越河口的古晋（Kuching），也有潮州人种植胡椒与甘蜜。

19世纪下半叶，随着英国人政权的巩固与疆域的扩大，吸引了更多华人移民的到来。境内几条大河流域，也由于华人的增加，经之营之，逐渐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城镇。如拉让江河口的诗巫（Sibu）等，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商埠，是得力于福建闽清人黄乃裳的开发。

1900年，他与砂拉越统治者签定协议，从中国招募农工来开发诗巫。两年间，共有三批福州人1118名到诗巫拓荒垦殖。此后诗巫华人人口激增，市容面目一新，所以诗巫别称“新福州”。

沙巴华人的大量移民大概始于1882年。那一年，“英国婆罗洲公司（简称“公司”）成立，试图在沙巴大事扩种烟草，需要大批劳工，于是从广东龙川、五花等地招募一批客籍人士到沙巴来，为数有96人，被安置在古达（Kudat）荒区垦殖。

嗣后，又有广东东江紫金、惠阳、宝安、东莞及花县等地的客家人继续入境，华人人数因而激增。

除了香港、华南及海峡殖民地以外，“公司”代理人更到中国北方招募华工，1913年，大概有430多名河北人抵达沙巴，定居在亚庇附近地区。“公司”除了给他们分配耕地外，还给予津贴金。因华工领头是山东人，所以他们的聚落也被称为“山东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公司”苦于劳动力严重短缺，因此制定许多有利于移民政策，以鼓励移民携眷前来定居，其中包括免费供应船票给有意前来的移民。此外，他们还可以获得耕地垦殖。新计划果然奏效，在1921年之后，有9千多名华人入境，其中绝大部分是客籍人，包括不少女性，他们大多被安置在东西岸的农地耕作。

此外还有一大批自由移民入境沙巴。他们或在种植园成为农工，或在城市寻求工作，成为工匠或普通工人。1937年，自由移民的入境人数，就高达7912人。

直到二战之前，远赴南洋的侨民和家乡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不只等待落叶归根的时机，还主动发起支持祖国的各种运动。当时，华人聚集地之一的檳城正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在海外宣扬革命理念的重镇。

二战期间，日军侵占了马来亚，当地华人纷纷从戎投军。这段抗日岁月也成了马来西亚华人重要的历史事件。大难当前，华人也对眼前保卫的这块土地产生浓烈的感情，成为日后选择留居此地的一大契机。

1945年，日军才刚投降，英殖民者又卷土重来。为了歼灭以马来亚共产党为首的武装力量，英政府实施了紧急状态法令，强制把华人迁入临时建立的480个新村里，并用铁丝网与外界隔开，严厉限制他们的行动。如今，除了城市地区，各个新村也是华人的集聚地，拥有浓厚的华人色彩，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957年马来亚独立、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大多数华人对这块土地已产生情感，他们都愿意落地生根，纷纷从侨民身份转变为当地公民。独立后百业待兴，华商们捉住了良好的商机，凭着高瞻的远见和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逐步把投资扩张到制造业、食品加工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带动了国家经济发展，也为自己立下了稳固的基业。

人口比例不低的华人在经济上的强大，招致友族的忧虑和猜疑；在一些居心不良的政客煽动下，终在1969年爆发了“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此后政府推出了“新经济政策”，试图平衡各族间的财富，增加土著的公司股权，使华人在经济发展方面有所限制。

但大体而言，华人依然在种种挑战下寻求发展，至今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领域上的表现皆有目共睹。

- 孙中山于1910年11月间在马来亚的檳城开会，密议广州“三·二九”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而在这次起义中牺牲的黄花岗72烈士中也有不少是马来亚华人。此外，华人人口密集的檳城也出了一位兼通中英语言及文化的学者辜鸿铭，除了获得13个博士学位，也是将《论语》、《中庸》翻译到西方的第一人。

当今生活风貌

引言

马来西亚华人约占全国人口的25%。这里奉行出生地原则，多数华人已加入当地国籍。由于战后极少有中国新移民到来，华人现在大多是土生土长的第三、四代。他们早已落地生根把这里当成祖国，并热爱着这块土地。但他们也依然保持着鲜明的华人特色，其中以拥有大中华圈外最健全的华文教育体系，最为人所称道。

据研究所示，90%以上的西马华族，聚居在马来半岛西海岸的城镇，包括吉隆坡、檳城、怡保（Ipoh）、马六甲、新山（Johor Bahru）、芙蓉（Seremban）及巴生（Klang）。至于东马的砂拉越与沙巴，也有同样的现象。砂拉越68%的华族人口，集中在古晋、诗巫与美里（Miri）三大县区；沙巴67%的华人，聚居在亚庇（Kota Kinabalu）、山打根（Sandakan）及斗湖（Tawau）三大县内。

当地华人的祖籍多为中国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四省，其中福建又以闽南人、福州人为主；广东则以广府人、潮州人、客家人最多。各籍贯华人的聚集地也非常明显例如半岛北部多福建人，广东人集中在吉隆坡、怡保等城市地区，而诗巫则是以福州人为主。

马来西亚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辽阔的土地，因此人民拥有广大的生活空间。在这里，人们只要肯努力，要谋得生计，糊口于四方，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倘若能把握机会，富甲一方也非罕见的事。

在这个新兴的土地上，华人挥洒自如，充分利用独到眼光和勤奋个性，填满了每一个发展空间。他们有建党结社的权利，并享有宗教、教育与言论的自由。华人可以礼佛拜神祭祖，也可以庆祝传统节日、舞龙舞狮，连春节都享有两天公假。虽然在某些方面不能尽如人所愿，但华人都以整个国家与全民利益为前提，发挥容忍与包容的精神，以达致全民团结、和谐共处的目标。

华人创造经济辉煌

华人在马来西亚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涉足土农工商各行各业，其中以从商的人数最多，而商业中主要以零售业与服务业最为活跃。华人零售商经营的形式，包罗万象，从近乎绝迹的刻匾店、祭拜香店，到茶室、杂货店、中医药材店铺、汽车修理店，再到牙医诊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以及建筑师工作室等，无一不有。两家著名的华资银行——大众银行和丰隆银行，其分行遍布全国。不论是在喧嚣闹市或是穷乡僻壤，随处可见挂着华文招牌的商店。

在过去三四十年间，陆陆续续冒起了若干华人企业集团。目前在马来西亚的华人企业集团大约有40家，其中较大的有郭鹤年集团、林梧桐集团、丰隆集团、骆文秀集团、李莱生集团、陈志远集团、杨忠礼集团及郑鸿标集团等等。它们拥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及多元化业务，经营稳定后也逐步迈向国际市场，例如郭鹤年集团已将业务范围伸展到亚、欧、美等十多个国家。

砂沙两州，都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柱，其中尤以棕油、橡胶、胡椒、椰子及可可等农作物，给国库带来巨大的收入。这些农作物的小园主，大部分是华族的小资产家。而受雇佣的农工，也以华人为主。

砂沙两州丛林密布，盛产木材，成为重要资源。两州的锯木厂，业主多是华人。其产品除部分供应国内市场外，也出口、销售国外市场。因经营伐木业而致富的华族资本家比比皆是，其中佼佼者有砂拉越的张晓卿和刘会干，及沙巴的郑昭明。

迄今，华人控制马来西亚经济命脉的说法已不太准确。在70年代初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试图重新分配各族间的财富后，大大地限制了华人的经济发展。不过华人企业家仍灵活地采取各种应对之策，积极投入新的产业，总体上还是获得相当顺利的发展。

“马来西亚世界级的华人富豪不少，但那毕竟是少数。”拉曼大学中文系教授林水濠说，“总体而言，大部分华人在社会各阶层就业，收入高低皆有。不过，与其他族群相较，华人的经济确实比较优渥，大多都过着比较宽裕的小康生活。”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华人仍有能力生存下去。不过我们依然希望可以争取到公平的待遇，因为这是人民的权利。”马来西亚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前任会长吴德芳表示。名列马来西亚成功企业家之一的他不无自豪地说：“目前，华人是马来西亚缴税最多的民族。”

长期以来，华人对马来西亚经济的贡献一直备受肯定。檳城的开埠者莱特就曾写到，华人是政府唯一不必拨出费用和作出特别努力，便可以从他们身上增加收入的东方民族。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也称赞，全靠华人的奋斗与经营，马来西亚经济才有今天的活力。

- 从传统行业到新兴行业，从大商场到小贩摊，都有华人的足迹。

积极参政 社团林立

除了经济，马来西亚华人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自抗日战争后，华人的政治意识不断提高。1949年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公会）成立，开启了华人涉足政治领域的新页后，几十年来参政的华人不计其数，他们多以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为目标。

马华公会在1955年与巫统、印度国大党结成联盟，参加大选获胜，组成执政政府，并向英殖民政府寻求独立，立下大功。1972年，联盟容纳了更多政党后所组成的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参加历届大选均获胜利，长期执政。如今马华公会依然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政党，拥有多达110万名党员，是海外华社中数一数二的大型华人政党。

几十年来政坛上也出现了多个华基政党，如民政党、民主行动党（简称行动党）等。成立于1968年的民政党，原是反对党，在1969年的大选中夺得了以华人居民为多的槟城州政权。1972年加盟国民阵线，成为执政联盟之一员。在以后历届州选举中，民政党一直执掌槟州政权，长达40年，直至2008年，才被民主行动党所取代。

民主行动党成立于1966年，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主张种族、社会与经济平等。自创党以来，敢于仗义执言，扮演着监督政府的角色，因而获得一部分华人的支持。

至于沙巴，以华人为基干的政党有团结党、沙巴华人公会、沙巴中华统一党、沙巴华人党及沙巴进步党；砂拉越则有砂拉越人民联合党。

其他标榜多元种族的政党，也都有华人参与，如公正党等，共同构成华人在政治上一股重要的力量。在历届国会与州议会大选中，华裔的选票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不但华人基干的政党候选人，因华人的投票中选，即使是标榜多元种族政党的候选人，也得力于华人投票而中选。

在马来西亚2010年的中央政府，共有6位华人出任部长，9位华人担任副部长，在政府决策中占有一席之地。

进入21世纪，华人参政的目的已不再是为华人利益代言。更多年轻的华人政治家抱着极大的政治热情，想要发挥华人优势，与其他民族一起共同建设马来西亚家园。

此外，马来西亚华团成熟而独立，也是华社一股重要的力量。百余年来成立的华人社团可说是多不胜数，它们在各个时代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早期华团多属地缘、血缘与业缘组织，如地缘组织有福建会馆、广东会馆、潮州会馆、番禺会馆等；血缘组织如槟城李氏宗祠、马六甲赖氏宗祠；业缘则有笨珍树胶商公会、吉隆坡布业联谊会等。

- 已有百年历史的陈氏血缘组织“陈氏书院”，是吉隆坡很有代表意义的华人文化建筑，古意盎然。
- 直到现在，许多会馆仍是华人茶余饭后、消磨时间的去处，也是组织举办活动的推动主力。

早期社团的功能，主要联络情谊、互惠互助，并处理祭祖拜神、教育及死后的善后事宜。因此一些规模较大的社团，都有筹建寺庙、义山与学校。

“独立后的几十年间，华团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各方面为华人仗义执言，代表抒发华人的心声。各华团虽不直接参加政治活动，但在各个相关课题上却力争到底，试图纠正政府的偏差决策。尤其在教育发展和文化保存方面，华团更是坚持原则。”为华团付出许多时间和心力的吴德芳表示。

根据马来西亚华总前任会长林玉唐在《马来西亚华团总名册》中的献辞披露，目前，全国各地共有8千多个华人社团，而且数量还不断地在增加之中，非常活跃的也不在少数。其中最重要的华人社团有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活跃于工商业领域的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以及致力于华教发展的董教总等。

“近年来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多元化，以及教育普及，马来西亚华人已经从保守迈向开放，各种团体组织的创办已超越昔日地缘、血缘和业缘组织，还扩展到宗教团体、青年会、体育会、文化组织等，至今仍是推动华人社会发展的动力。”吴德芳说。

华文教育体系完整 海外罕见

马来西亚华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再穷也不能穷教育”。他们说，那是先辈们长久以来坚持的教育理念。

虽然大部分早期华人移民都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但他们知道，教育是延续文化的不二法门，也可以使下一代摆脱贫困，所以筹办教育就成了一项时代的使命。自从在此地扎根以来，他们便致力发展华文教育事业。1819年，华人在槟城建立第一间私塾“五福书院”；而第一间现代华校则是创立于1904年的槟城中华义学。

自此在这块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华文教育就不曾间断过，百年来后代对于祖辈们的理念更不曾动摇。当地华社通过自力更生、坚忍奋斗，建立起一个从小学、中学到大专院校的完整教育体系，这在海外其他地方是非常罕见的。而这些大大小小的学校，全靠华社自主经营，其投入的心力财力之大，也属独一无二。

如今，1280所华文小学、60所华文独立中学、3所民办学院伫立东西马各地，是当地华人引以为荣的成就。他们骄傲地说，这是马来西亚华社长期力争，甚至不惜以血泪生命来换取的成果。

“维护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是一件艰难的任务。由于华人群体庞大，文化底蕴深厚，让政府感到压力，进而推出了一波波的教育单元化政策，给每一个时代的华教发展造成巨大的阻力。”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前首席执行官任莫泰熙说。

然而，阻力越大，华人反弹力越强。他们众志成城坚守着华教，多年来毫不松懈。只因他们坚持，每个人都有选择母语的权利，也坚信语言乃是保持文化薪火不灭的种子。

“所幸马来西亚宪法赋予人民选择教育的自由，可选择就读各语文源流的学校就读。据了解，90%以上的马来西亚华人都愿意把子女送进华文小学，接受6年免费的华文小学教育。”

仅在只有35万华人的沙巴州，就拥有华校80多间，在校学生近5万人。有条件的马来人、印度人也开始送孩子到华校读书。

但看似前景明朗的华文小学，其实也面对着许多棘手问题。

莫泰熙说：“华文小学的良好口碑，加上近来华文地位水涨船高，使其他族群的小孩也蜂拥报读华小。但华小却一直保持原来的数目，甚至面临关闭的命运。此外，师资、拨款不足也是一个华小长期面对的绊脚石。”

原来，华文小学虽被纳进国家教育的体制内，但政府对于华文小学的投资却极其有限。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华社唯有靠自己想办法，为筹资各尽其力。政府要关闭华小，华人就群起抗议，坚持华小一间都不能少。

小学毕业以后，华人子弟又要在华文独立中学、国民中学或改制中学之间作出选择，让他们陷入两难之中。

所谓改制中学，是60年代一些华文独立中学接受政府部分津贴后改制而成，除了每星期各8节的华文和英文课，其他科目的媒介语都是马来文。而在国民中学，华文则作为非正式的选修课，每周只上课一两小时，而且要求必须凑足至少25名学生方能开班。

以华文作为主要媒介语的独立中学，完全由华人社会自主经营，政府不给予任何津贴。由于独中学校不多，加上学费较为昂贵，许多华人往往只能选择国民中学和改制中学。目前，只有约15%华人学生在60间独立中学就读。

- 以民间力量维持数十年的华文独立中学，是华社的骄傲。

“独中颁发的统考文凭受世界各国大学承认，其中不乏顶尖大学，但却独缺大马政府。这也就意味着独中生无法进入国立大学深造，所以他们往往都会到私人学院或国外去升学，毕业后也只能在私人界发展。”一名独中老师缓缓道出独中生的难处。

如此多元而复杂的教育体系，不但难以三言两语向外人说清楚，而且也培育出一群中文程度不同，思想、经验、身份认同各异的年轻一代。如今，有的华人完全不谙华文，思想和文化更接近西方；但大部分华人，还是因接受了6年的华文小学教育而拥有不错的华文底子，可以说、读、写华文；也有为数不少的华人，坚持用华文完成每个教育阶段。

这些在华文教育底下长大的年轻一代，成了保持马来西亚华社文化特色的一批生力军。他们对文化的坚持态度，让老一辈感到骄傲。

-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凭一己之力，在90年代成功创立3所民办非营利大专学府，即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和韩江学院，为华人学生提供了深造的机会。

华文报刊成华人文化家园

华文报刊也是马来西亚华社耕耘出来的一朵奇葩，是陪着华人在风雨中走过来的精神良伴。华人对华文报刊的执著，与坚持华文教育的理念是相同的——他们认为每份华文报都是一颗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种子，所以长久坚持保护它们。

目前马来西亚约有16家华文报章，其中《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东方日报》《光华日报》和《光明日报》6家影响较大。据了解，《星洲日报》是发行量最大的报刊，每日发行超过35万份，读者人数逾百万。

华人人口较少的东马，华文报章却异常发达，两州的华文报章多达十家，如沙巴州有《华侨日报》、《亚洲时报》、《晨报》等；砂拉越则有《国际时报》、《诗华日报》、《中华日报》等，这些报章都只在当地发行，地方色彩浓厚。

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一些华文报纸还发行到柬埔寨、汶莱、印尼、新加坡等周边国家，覆盖层面非常广。

中文日报多采用横排，版面整齐美观。中文报纸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地从繁体字转换去简体字。有趣的是，如今有报纸的标题还是用繁体字，内容却已全是简体的了。“繁简并茂”正反映了马来西亚华人对旧文化的不弃对新文化背负起了传承的使命。

资深报人古玉梁说：“一早醒来阅读华文报纸，已是大部分华人每天的生活习惯。报章是华人宣泄心声的平台，及联系华人群体的桥梁，也是华人关注国际的耳目。”

除了本国新闻，华文报章也特别注重与中国和海外华人相关的新闻。报上的评论也常以中国的时事为论点，因此大马华人对中国的脉动了如指掌。每当从报章中读到一些与中国或华人相关的事件时，无论悲或喜，当地华人都会特别关注，感同身受。

“马来西亚政府规定，所有印刷媒体每年必须重新申请准证，因此中文媒体在言论上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尽管如此，华文媒体仍然守法经营，整体上茁壮健康地成长着，而且读者也还不断地在增长中。”对中文报章的发展了若指掌的古玉梁如是道。

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章除了像其他地区的报纸扮演着新闻报道和服务社会的角色外，也承担起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华文媒体本身也积极主办与传承华人文化有关的各种活动，如《南洋商报》主办十大歌星义演为华教筹款、《星洲日报》主办“花踪文学奖”等，都对当地华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为争夺华人读者市场，华文媒体之间也经常展开各种竞争。但在发扬中华文化、维护华人文化权利的基本立场上，它们却保持着一致。”古玉梁说。

另外，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也是培养马华文学作家的主要媒介，可以说，华文文学在马来西亚得以发芽及成长，华文报章是最重要的推手。

- 东西马共有十多份中文报章，算得上琳琅满目，充实着华人的精神生活。

马华文学是中国大陆、台湾以外的另一华文文学重镇。它自1919年受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而发轫，至今已有九十多年的历史。历经几代马来西亚华人作家的努力，马华文学已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焦点之一，许多作家如黎紫书、李永平等也都闻名海内外。华文文学在马来西亚并非主流文学。它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却拥有着强韧的生命力，数十年来屹立不倒，而且后起一之秀辈出。马华作家协会经过8年时间编纂、出版了十册的《马华文学大系》，收录自1965年到1996年间，大马400名作家创作的诗歌、评论、小说、戏剧、散文等，被当地华社誉为马华文化史上的“双峰塔”。

- 马华文学独具一格，也成为海内外文学研究者的研究方向之一。

至于电子媒体方面，目前国营和私营电视台都设有华语新闻播报时段，还长时段播放华语、粤语和闽南语的电视剧、娱乐综艺及访谈节目。华人也可通过卫星付费频道，与中国大陆和港台等地区同步收看中文节目。此外，当地还拥有3个华语电台和两家华文新闻网站，为华人提供更多的生活资讯和时事知识。

- 《光华日报》为全球最长寿的华文报。1910**年孙中山为宣扬革命而在檳城创立，初期为中国革命党人在马来亚最重要的机关报，并曾推动马来亚华人捐款中国协助抗日。目前《光华日报》为北马最畅销的报纸之一。

- 马来西亚华社也出了许多出类拔萃、享誉国际的影视艺人和流行音乐歌手，其中就有闯荡好莱坞的巨星杨紫琼，还有广为海内外华人所熟悉的光良、梁静茹、李心洁等歌手影星，还有著名导演蔡明亮等，为世界华人歌影坛增添了缤纷灿烂的色彩。

节庆习俗 古风犹存

在强大的教育体系、华团和华文报章作为后盾下，马来西亚华人保存了相当完整的文化传统。他们保留中华传统节日之齐全，往往让人感到惊讶，一些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已逐渐消失的节日或习俗，在这里依然流传着。

从某个角度来说，马来西亚的人民是幸福的，各民族的隆重节日，都列为公共假期，大有普天同庆的味道。春节是马来西亚华人最重要的节日，更有两天的公假和浓浓的佳节气氛。佳节前夕，各商场人头攒动，各个车站都挤满了游子的身影，大街小巷上各种语言的祝贺布条及大红灯笼高挂，热闹欢腾的新春佳节气氛萦绕着整个国家。

“除夕夜里，全家大小都会聚在一起吃团圆饭；过后，长辈还会根据吉时迎接财神。派压岁钱、舞龙舞狮、赌博更是少不了的春节活动。而且我们的庆祝活动将延续到正月十五的元宵节。”谈及春节的热闹气氛，马来西亚华人不无自豪。

在马来西亚，元宵节也是华人情人节。这一天，除了吃元宵、观灯、赏花、猜谜，未婚男女还会在浪漫的夜色中，彼此抛柑和苹果，寻求如意郎君或温柔女孩。

春节期间，这里还盛行一种独特的活动叫“捞鱼生”，寓意新的一年能够“捞”得风“生”水起，步步高升。此外，各华团和政党也会举办团拜活动，并开放门户欢迎各族民众登门拜年，促进和谐关系。

- 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会忙着添购礼品与装饰品。
- 春节在马来西亚是个普天同庆的大日子，各族人民都会聚在一起庆祝。
- 在春节前夕，大家小户也会忙着制作传统的应节糕饼。

除了春节，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当地华人也非常注重孝道，因此清明节祭祖、扫墓的风气历久不衰。“老一辈人以前会担心传统节日会逐渐消失，但看到清明节时路上车水马龙的状况，疑虑往往就一消而散。”马来西亚华社研究者陈亚才笑着表示。

此外，端午节、中秋节、中元节、冬至等大大小小的传统节日，在这里不但一个不少，而且华人都会遵循礼俗，欢度佳节，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过得非常热闹。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中秋节赏月提灯笼、中元节举办盛大普渡会等，都是这里常年不衰的节日活动。

随着时间过去，这些节日流传到下一代那里，不但不见消失，气氛反愈加浓厚。“年轻一代还赋予它们更深厚的文化内涵。例如端午节也是诗人节，文学团体举办诗歌朗诵会；中秋节则延伸成亲子节，一家人会聚在一起吃月饼、提灯笼，一些华团也会在那天举行‘传灯’文化活动，象征文化源源不息。”陈亚才如是道。

在这里，中华文化所散发出来的生命力源源不绝，民间自动自发、不计回报的力量，不但维持，还创新提升文化，他们的坚持让人感动。

马来西亚华人享有宗教自由，可以公开地信奉各种宗教。将近80%的华人同时信奉佛道二教或民间宗教。他们既到佛堂祈福，也在道观拜神，以及在家里祭祀祖先。至今，许多华人家里还摆设有神台，供奉菩萨、关公等神明，神台下面是土地公，旁边则是祖先灵位，厨房里还有灶神坐镇；此外，屋外还有天公神龛，这往往也是识别华人住宅的最佳标志。

在这里，拥有百年历史的寺庙也不少，有些还成了著名的旅游名胜地。马六甲的青云亭始建于17世纪，是马来西亚最早的华人庙宇，迄今香火不断。在一些华人集中的地区，如檳城、吉隆坡等，大大小小的寺庙庵观更是随处可见。信徒们除了到庙里祭拜神明、求签问卦，一些庙里头还驻有乩童神婆，为人们消灾解忧。此外，风水占卜、算命看相在这里也非常盛行。

九皇爷诞为当地华人，尤其是福建人所重视的盛事。每年农历九月初一至初九，信徒们都会坚持不杀生、吃素净口，并拜祭九皇爷来消灾解难。他们还会在海边设立祭坛迎神送神。九皇爷回天之夜，成千上万名信徒穿上洁净的白衣白裤，护送九皇爷绕境游行，场面非常壮观。

另外，农历正月十九到廿二的柔佛古庙游神，至今也已发展成10万人大游行。整个游神长达八九公里，气氛热烈，充分展现出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旺盛活力。参与抬神游街的大部分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脱下平时时髦的装束，换上统一的服装，争相抬神，投入的精神不亚于他们的先辈。

一些台湾有名的宗教团体如佛光山、慈济、法鼓山等也在马来西亚建寺立院，开设道场，而且信徒众多。此外，在这里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华人也不在少数，约占15%，这国度西方风气浓郁，加上不少华人是接受英文教育，都是基督教和天主教在此盛行的主要因素。其余的华人有4%是穆斯林，1%的华人则信奉兴都教或其他宗教。

- 青云亭是最早的华人庙宇，翻修后金碧辉煌，至今仍香火不断。
- 每逢重大节日，马来西亚的各大小庙宇通常都香火鼎盛。
-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马来西亚华人的婚礼采取中西合璧的仪式。结婚时新人都穿西式礼服。在家里举行传统的仪式后，才到酒店宴请宾客。在婚礼中，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大妗姐，也叫送嫁娘。她是结婚当天新娘的“贴身保护人”，有时还会担任婚礼的主持人，把婚礼喜庆的气氛推到最高点。
- “拿督公”是马来西亚华人的本土地方保护神，神像容貌似马来人、穿着马来民族服装，本土色彩浓厚。“拿督”（Datuk）即是该国君主册封有功人士的封号，有部分拿督公更有马来名字，如也法、苏勿兰等。此外，拜祭拿督公的祭品也不可有猪肉食品。

文化碰撞 擦出火花

在马来西亚的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看到马来人或印度人经营的小食档——又称嘛嘛档（mamak），深受华人的喜爱。一位华人青年说：“嘛嘛档的食物和饮料价格不高，而且营业时间长，有的甚至24小时不休，我们一班好友知己最喜欢夜来聚集在这里长谈。”可以说，“泡嘛嘛”在这里的华社中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融合现象。

- 嘛嘛档是马来西亚社会特色，也是华人最爱“泡”的地方。

事实上，在数十年来与各族共处，接受多元文化的熏染下，这个坚持保留母语和传统文化的华社也有着其开放多元的一面。尤其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点滴中，既可见他们对传统的坚持，也可感受到他们高度融合的一面。

“华人对自己的文化非常坚持，但也非常接受友族的文化，我们可以说已发展出一个独特的混杂文化，是马来西亚华人独有的。”致力于保护槟城古迹的文化人林玉裳说。

相反地，华人本身的文化也渐渐融入友族的生活和文化当中。“例如华人春节会派红包，马来人和印度人也有样学样，只不过他们将之改成该民族的喜庆颜色，变成‘青包’和‘紫包’。”陈亚才表示。“此外，其他民族也将华人的饮食文化进行改良，变成符合他们文化习俗的美食，如包子、油条等。”

- 中华文化也渐被友族所接受，他们写起春联来也有模有样。

生活在多元族群、籍贯的圈子中，当地华人随时随地都需要准备好几种语言去面对各层面的人事，因此除了华语和本身的方言外，他们也会说马来语及英语，一些人还通晓不少其他籍贯的方言，如福建话、客家话、广东话等。无怪乎许多人都把当地华人称为“语言天才”。这也造成他们用语混杂的现象——讲华语时，掺杂英语、马来语和方言的词汇和语法，反之亦然。

在一段话中多语并用，听起来固然新鲜有趣，有时候外人却难以理解其意思，不过，这恰恰成了该国华社的一大语言特色，被戏称为“罗惹”（Rojak，当地特色小吃，类似水果沙拉，在马来语中有“大杂烩”的意思）。

马来西亚的城镇已走上现代化，生活条件不错，衣食住行都令人满意。这里的屋价低廉，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房产；建筑风格各异，有中国式的楼阁庭院，构思美妙；有西式的洋房别墅，恢宏坚实，美观实用；更有中西合璧的建筑，兼具两者所长，蔚为奇观。

马来西亚华人对饮食也非常讲究。他们除了保留很多中国南方闽粤的食物，还结合了其他种族的食物特色，创造出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食品，花样繁多，如巴生肉骨茶、槟城叻沙、罗惹等，都是叫人垂涎欲滴的美食。此外，华人也善于在饮食中融入南洋风味，如酸辣鱼、马来风光、印度式咖喱、泰式东炎等，都是华人的桌上佳肴。他们也因此养成了无辣不欢的饮食口味，例如香辣的马来椰浆饭、咖喱都成了许多华人的最爱美食。

当地华人也有着混杂多元的服饰文化。他们衣着轻便随意，加上当地气候炎热，因此除了会在正式场合穿上西服外，T恤、短裤和拖鞋就是街头最常见的打扮。在许多正式与非正式的场合如宴会、各类仪式中，华人身穿马来或印度传统服装的情况也非常普遍；更有不少华人把舒适的纱笼（马来服饰）作为家居服来穿，图个凉快。

在娱乐方面，华人也尽显自身的多元文化优势。他们既可赶场去看西洋乐队表演，也喜欢听本国歌星西蒂·诺哈丽扎（Siti Nurhaliza）演唱的马来歌曲。他们既爱观看好莱坞动作大片，也喜欢本地著名演员 P·南利的喜剧小品。

当然，最让他们感到息息相通的，仍是自己的民族文化。

在这里，粤剧、潮剧等传统戏剧不乏观众；而对于中文影视和流行音乐，华人更是如数家珍。中国大陆、香港或台湾各年代歌星演员的作品，在这块土地上都获得广泛热情的回响。此外，阅读如金庸、余华、张爱玲等中、港、台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是许多文艺爱好者的休闲活动之一。

无论如何，对于通婚，华人却显得相当抗拒。

的确，当地华人较少和外族人士通婚，一般都保持纯华族血统。尤其是出生即为回教徒的马来人，华人家长通常都不允许子女与他们通婚。因为一旦结为秦晋之好，华人将被强制变成回教徒，这样就等于要放弃自己的文化，甚至中文名字。“虽然华人可以通过通婚获得‘土著’身份，享有‘土著’的一些特权，但比起要放弃自己的文化，还是得不偿失。”一名华人青年如是说。不过，在东马，与原住民通婚的华人就相对较多。一些原住民信奉天主教，因此华人比较容易接受。

从通婚的多寡情况看来，中华文化显然还是当地华人最为坚持的一环。对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他们来说，忘祖弃宗可是一项严重“罪名”。

- 在一些华人新村和小镇里，还有许多华人传统住宅，在朱漆脱落门梢上可以看到诸如“陇西”、“清河”、“太原”、“建丰”等这样的姓氏郡号。
- 当地华人虽已进入第三、四甚至第五代，尽管许多人并没有真正去过自己的祖籍地，但大部分人对祖籍都还很清楚。他们名字英语的拼写方式也是以祖籍地方言发音为标准，因此经常同一个姓有多种不同的拼法，可以轻易从姓氏中认出他们的籍贯。例如，同样是姓陈，广东人拼为“Chan”，客家人拼为“Chin”，福建人拼为“Tan”，福州人拼为“Ting”，潮州人拼为“Tang”。

对身份的认同与困惑

因通货膨胀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马来西亚新一代华人开始选择减少生育，家庭结构越来越趋于小家庭式。这促使华人人口日益趋少，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华人害怕他们的权益可能会受到侵蚀，因此人口问题成为当地华社的一大忧虑。一些华团为鼓励华人多生育，还曾推出多生有奖的活动。

这忧虑来自于何？若问起当地华人，往往可以在其言谈中感受到对当地政府的一丝怨叹。当年，华人人口比例也较高，在政、经、文、教等各领域的发展非常顺利。但随着人口的缩小和政治上的无能为力，加上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让华人觉得自己作为公民的平等权益遭到侵蚀。

“不过华人也明白，这并非政策问题，而是执行的偏差所造成。”陈亚才说。

在坚持保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当儿，华人也不断遭受到是否爱国的质疑；当地政府的偏差待遇更让年轻华人难以适应及困惑，有些人甚至发出“我爱这个国家，奈何国家不爱我”的感慨。“尤其来自独立中学的华人子弟，往往因被国家体制拒绝而有疏离之感，也导致他们和主流社会的鸿沟越来越大。”陈亚才叹道。

有不少人选择离开，移民他国。如今许多国家如新加坡、台湾、澳洲、英国等都可以找到马来西亚华人的踪影，当中不乏许多精英在各行各业大放异彩；但更多的人扎根已深，早已视马来西亚为一己家园。对土生土长的华人来说，马来西亚才是他们的家乡，他们热爱这块土地，并效忠于这个国家。只是在那血液里的“文化基因”，他们无法全然切断。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追求本民族文化的权利，而国家和文化认同可以截然分开，更可以并行不悖。马来西亚华人常常强调：“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的华人。”在他们强调身份之时，也正是他们寻找身份之时。如何在“坚持”与“融合”的天枰上寻找平衡点，成了马来西亚华人长期以来念兹在兹的问题与困境。

- 在保留自身语言和文化的同时，如何适时地融入当地社会，是年轻一代华人必须面对的挑战。

其他资讯

马来西亚华族族魂——林连玉

- “族魂”林连玉之墓，每年华社都会举行公祭，让年轻一辈了解他的精神和贡献。

提起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就不得不提起林连玉。

林连玉1901年出生在福建永春，自上世纪20年代便开始投身杏坛教育耕耘，来马后依旧操持故业，为华文教育耕耘。他不但将毕生积蓄投入建校，还致力于维护华文教育，主张民族、语言平等，并推动了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和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的成立，成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及华人公民权益的代言人。

在出任教总主席的8年间，他面对一次次不利于华教的冲击却毫不退缩，以智慧和勇气保住了早期摇摇欲坠、花果飘零的华文教育。最后，他却被马来西亚政府褫夺公民权并吊销教师注册证。林连玉坚信，文化是民族的灵魂，而教育就是民族的文化堡垒。他也会振臂高呼：“我个人的利益早置之度外，为华文教育牺牲永不后悔！”

他为马来西亚华社树立了一个不可动摇的精神典范，于是大家都尊称他为“族魂”。

二十四节令鼓和高桩舞狮 马来西亚华人原创

马来西亚华人不但完好地保留中华文化和习俗传统，而且还不时为之注入新的元素，通过创新把华人文化发扬光大。除了传统的华乐、扯铃、茶道、书法、武术之外，他们最引以为荣的是自创的二十四节令鼓和高桩舞狮。

在没有二十四节令的国度里所创立的二十四节令鼓，可谓独创之举，也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智慧再现。其主要创始人是陈徽崇和陈再藩（小曼），宽柔中学二十四节令鼓队则是世界首创的队伍。他们在1988年为新山的“端午诗节”及吉隆坡天后宫的“源之夜”演出后，1989年为马六甲第六届全国华人文化节的序幕礼做了一次空前的露天演出，更是惊艳全场。

二十四节令鼓由二十四面单皮鼓和二十四名鼓手组成，每面鼓代表一个节令，表演融合鼓乐、舞蹈及书法艺术。鼓声、呐喊声与鼓手合为一体，气势振天，让中华文化焕发出无穷的活力，流传不息。

如今，除在原创地有超过5千名鼓手之外，它也传至新加坡、印尼、中国大陆、台湾甚至澳洲、欧洲等地，享誉全球。特别是在台湾的小学，二十四节令鼓已蔚然成风，甚至还有专门的暑假培训营。

- 二十四节令鼓气势震天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原创。

作为传统中华文化的舞狮舞龙，曾被马来西亚政府明令禁止。“他们觉得狮子和龙怪异，要舞就舞马来西亚特产的老虎。”华人哭笑不得之余，反而更加坚持维护传统文化，不但在禁令下舞得更多更起劲，还精心专研中国舞狮，创出动作惊险、更具观赏性的高桩舞狮，在世界性的比赛是著名的长胜军。

如今禁令已除，舞狮不但获得各民族喜爱，在各场合中经常亮相，2007年高桩舞狮更被马来西亚政府列为本国50大国家文物遗产。它也北上中国，获得了国际龙狮总会的表扬，并推广到世界各地。

- 惊险的高桩舞狮已成为所有马来西亚人民喜爱的活动。

结语

经过了繁衍生息，代代相传，今天的马来西亚华人，早已落地生根，视这片土地为家乡。只不过，对藏在血液里的文化之根，他们并不愿意斩除。他们坚信自己可以用生命把中华文化世代传承下去，就像河要长流、灯要长明一样。

“每一条河是一则神话，从遥远的青山流向大海；每一盏灯是一脉香火，把漫长的黑夜渐渐点亮。”短短的一首《传灯》，是马来西亚华社的精神之歌，广为华社传唱，歌中字句，道出的是华人心底对文化传承的期望。

印尼

引言

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地跨赤道两侧，拥有1万7千多个岛屿，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这里处处青山绿水、椰风蕉雨，被誉为“赤道上的翡翠”；土壤肥沃、资源丰富，也为它赢得热带宝岛的美誉。

17世纪初，荷兰殖民势力首先侵占爪哇，接着便向外岛扩张势力，到了20世纪初，整个印尼沦为荷兰殖民地。1945年，印尼宣告独立。独立多年以来，政局动荡，军人跋扈，经济萎靡，贪污盛行，民生困苦。今天，政府极力推动改革措施，逐步导向正轨发展。

华人移民印尼的历史悠长，他们曾用生命来捍卫这片土地，并与当地人共同参与艰辛的建国工程。奈何，政治变天，华人的性命、文化一度岌岌可危，但他们总是咬紧牙根，意志坚定地熬过连串排华事件。在血泪斑斑的苦难史迹上，印尼华人凭着不屈不挠的精神改善自己的命运，在荆棘满布的道路上走向光明。

华人移民简史

早在17世纪荷兰的势力伸向爪哇（Jawa）之前，华人已涉足印尼。据马欢（郑和随从）的《瀛涯胜览》记载，15世纪初，爪哇北岸的杜班（Tuban）、锦石（Gresik）、苏儿把牙（Surabaya，即泗水）等港口已出现了华人聚落，有的聚落有千多户人家，都是广东人与漳州人。

爪哇西部的万丹（Banten），16、17世纪时是个繁荣的商港，胡椒的集散地，各地商贾云集。当时的华人人口多达3千至4千人，当中有的耕种，大多数经商。

到了1619年荷兰占领了巴达维亚（雅加达）后，积极发展，很多华人便被吸引过去。巴城华人人口迅速增加，1629年已达3千多人，他们的职业形形色色，有种植水稻及甘蔗等作物的农夫，有手工业者与劳工，有从事制糖业与酿酒业者，更多的是商人。

早期爪哇的中国移民，绝大部分是男性，一旦有了稳定的生活，安定下来之后，便与当地妇女结婚。异族通婚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他们的后代便成了混血儿，世世代代繁衍下来，人数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族群，即所谓的土生华人（Peranakan），在爪哇的人数很多，势力雄厚。

为了阻止华人经济实力扩张，荷兰从17世纪末开始，多次立法禁止华人入境，甚至于1740年谋划了“红溪大屠杀”惨案，怂恿当地人屠杀和劫掠华人，导致近万名华人被杀害。后来，荷兰发觉印尼的经济发展必须靠华人去推动，才废除了华人入境的禁令。

19世纪下半叶的几十年间，爪哇各地掀起了中国移民浪潮，中国移民所到之处，促进了地方的开发，城市的兴起与经济的繁荣，爪哇一系列的城市如万隆（Bandung）、三宝壟（Semarang）、茂物（Boyor）与玛琅（Mellang）等，都是因华人的涌入而发展壮大的。

华人移居外岛，源远流长。据《瀛涯胜览》载述，东人陈祖义曾携眷逃亡旧港（Palembang，即巨港），沦为海盗，剽掠过客。郑和率领兵卒将他擒拿伏诛。那时，旧港也有其他华人流寓，他们多是广东人与漳泉人。17世纪的亚齐，是个繁荣的商港，中国商贾来这里经商，有些做完生意后，便扬帆归国；有些则定居下来。

可是，一直要等到19世纪下半叶，才有大批契约华工踏足苏门答腊（Sumatera）。西方资本家已在苏岛投下巨资，拓殖发展庞大的种植园，栽种经济作物。他们首先在海峡殖民地招募华工，嗣后更打中国华工的主意。他们通过代理人，在香港、澳门、厦门、汕头及广州等地，用劝诱、拐骗及掳掠的手段，要华工签订合同。

签约后，华工就被送往苏岛东岸的日里（Deli）的烟园去服劳役。据统计，在1930年，日里的契约华工有2万6037人。合约期满后有些华工回国，有些则留下来。华族移民的涌入，促成了棉兰（Medan，日里的首府）的崛起。

18世纪之前，加里曼丹（Kalimantan，即婆罗洲）很少华人。直至18世纪中叶，华人矿工蜂拥而至，在三发（Sambas）及坤甸（Pontianak）等矿区组织了公司，进行采矿。矿工多属客籍，鼎盛时期多达好几万人。兰芳公司后来更扩展为共和国，组织严密，职权分明，独霸一方，公然与荷兰政权对抗。1888年，在荷军的猛烈围攻下，不幸被击溃，共和国遂告寿终正寝。除金矿工人外，这里的华人也务农，从事水稻、蔬菜等的种植，现在被誉为西加里曼丹的粮仓如邦夏（Pamangkat）、山口洋（Singkawang）等地区，都是那时开垦出来的。

邦加（Bangka）与勿里洞（Belitung）锡藏丰富，18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获得了锡矿的开采权，便通过代理人，从华南招募劳工前来采矿。自18世纪中叶以后，前来的契约华工络绎不绝，至1921年，受公司雇用的邦加矿工已高达2万3400人，勿里洞的矿工也有2万865人。

随着大批矿工的到来，商人亦接踵而至，华人聚集的地区，逐渐形成了喧闹的城镇。这就是西加里曼丹比其他地区开发较快速的原因。

与早期的中国移民不同，19与20世纪的移民不仅掀起了巨浪，女性移民也越来越多，男女的比例逐渐趋向平衡，因此减少了异族通婚的现象。这些后期的移民，建立了华人的家庭，保留了中华文化与华人的传统习性，形成一个庞大的华族群体，就是所谓纯血统华人（Totok），纯血统华人除居住在爪哇外，尤多散布在外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内外情势的变迁，不再有中国移民入境，印尼华人人数的膨胀，主要是基于自然增长的缘故。而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华人又逐渐恢复过去的经济地位。不幸的是，他们渴望迎来安定的生活，却接连爆发排华事件。

1960年，当地政府禁止华人在县级以下的地区居住，华人唯有涌进城内，造成50多万人失去生计；1965年的政变，华人更是遭遇了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印尼以铲除共产党的名义，滥杀了许多无辜的华人。那时有任何风吹草动，华人都提心吊胆。在几十公尺外听到砰砰的关门声，华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把自己的店门也关上。”走过那场九·三十排华风暴的老华人，至今仍记忆犹新：“至少有30万华人死在那血腥的暴行中，多么惨痛啊，但我们又无能为力。”

此后，华人走入了“被合法歧视”的黑暗时代。印尼华人的居民证上注有“非原住民”的记号，且经常被称作带有歧视意味的“支那”（Cina）。前印尼总统苏哈多所实行的强制同化政策，使得华人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包括禁止使用中文，中文学校遭关闭，中文刊物、招牌等遭禁，华人改用印尼文名字，不容许在军警部队和国立学校担任公务员，甚至不能公开进行任何中华文化活动。因此，华人大多从商，靠做生意累积财富。

在战后的数十年间，印尼间歇性地爆发了排华暴行，尤其是1998年的“黑色五月”，华人店铺和住宅被抢掠及焚烧，华人妇女在光天化日之下惨遭侮辱和强暴，造成华人的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并构成难以磨灭的创痛。

幸而在苏哈多总统下台后，印尼改朝换代，排华暴行逐渐消失，华人才得以喘一口气，重新振作起来。

- 印尼华人文化公园的设立，显示了政府对中华文化的认可。
- 印尼山口洋市于2009年初建起龙柱交通圈，显示华人地位的提升。
- 在强制同化政策下，绝大部分华人都改名换姓了，有些不愿舍弃本身姓氏的，便把中文姓氏的发音融进印尼文名字里，如姓林的改为Salim，姓陈的改为Tadjuddin，Tandjung，Tanto或Chandra，姓苏的改为Susilo或Sufeni，姓许的改为Sunarko，姓黄的改为Widjaja：或Wantah，姓叶的改为Yaputra，姓何的改为Hondir，姓吴的改为Soedargo或Gunawan，姓谭的改为Hamdami，姓丘的改为Hiunardy，姓颜的改为Gani或Gandraputra，姓古的改为Kusima，姓李的改为Rusli或Liman等等。

当今生活风貌

引言

印尼华人口到底有多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30年荷兰殖民政府做了一次人口普查，共有123万余华人，占总人口的2.03%，相隔70年后才有另一次人口普查的统计，华人约有241万，占总人口的1.2%。据印尼研究学者廖建裕、Mary Somers Heidhues、陈怀东、《亚洲周刊》及《远东经济评论》等的估算，印尼华人口介于500万至600万之间，约占总人口的2.6%。但印尼学者达哈纳（A. Dahana）认为有772万，而印尼报人李卓辉却认为已高达1千万。印尼华裔总会主席许世经甚至说：“到今天为止，我相信全印尼共有1500万华人口，大概占印尼总人口的6%。”

落差之大，关键在于对“华人”定义的不同。混血的土生华人是否算是华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估算数据自然“高估”，否则就是“低估”。此外，在长期的排华环境下，为了避免麻烦，有些华人否认自己的“华人”身份，也引起调查上的混乱。

一般而言，福建人多聚集在爪哇各地、苏门答腊东部、西部与南部、加里曼丹东南部、苏拉威西与马鲁古等地；客家人多居住在爪哇、苏门答腊北部、邦加、勿里洞与西加里曼丹；潮州人多散布在苏门答腊东岸、廖内、西加里曼丹等地；广府人则多聚居在加里曼丹东南部、苏门答腊东部、邦加、苏拉威西、马鲁古及小巽他群岛。

印尼华人大部分来自中国南方省份，福建和广东各占约40%，海南、广西、江苏、浙江、山东及湖北等省籍者共占约15%。目前，90%以上的华人已入籍成为印尼公民。

印尼华社曾有过辉煌的岁月，可惜经历了多次排华浪潮，文化内涵已冲淡不少。近十年来，反种族歧视政策纷纷出台，华文学校、华文媒体、华人社团组织、华人文化活动接连复办，为华族文化的复兴掀开序幕。这里的华人，正整装待发，重新上路。

华人掌控印尼经济？

“华人都很富有”、“华人是吸血鬼”、“华人控制了印尼70%的经济”等以讹传讹的言论，让许多人信以为真，也成了排华的催化剂。

其实，印尼的华人社会，阶级分化，呈现金字塔形，下层阶级的人数最多，中层阶级成员居次，上层阶级的人数最少。上层阶级成员包括大企业家、金融家等，他们腰缠万贯，资产雄厚；中层阶级包括中小型企业、商人、专业人士、服务业与运输业业主等，收入不错，生活舒适；下层阶级成员包括工人、农民、渔夫、流动小贩、店员与矿工等，散布在爪哇与外岛，地位低微，生活穷困。

从商是印尼华人经济最重要的一环，其中以经营零售业如百货、五金、电器、药材等占多数，也有的是从事进口贸易或开设餐馆。近年来，华人经营的超级市场，处处设立分店，引人注目。在城镇里，触目所见都是华人商店，使人产生错觉，以为华人控制了大部分商业活动。实际上，根据经济学家哈林·佐迪帕的调查显示，无论是大、中、小商人，原住民都要比华人多，说华人支配了商业，是站不住脚的。何况乡村的零售店，自1959年政府立法强制华人停业，全盘由合作社与土著接收后，华裔在乡间便销声匿迹了。

曾几何时，华人在某些经济领域占尽优势，如纺织业、面粉加工业、成衣业、木材加工业等。1970年代以后，大型华人企业集团逐渐冒起，资产高达几亿或几十亿美元，较著名的有林绍良的三林集团、黄奕聪的金光集团、蔡道行的盐仓集团、李文正的力宝集团、彭云鹏的巴里多太平洋集团等。他们投下巨资设厂，经营银行、汽车、木材、水泥、房地产、纺织、塑料、食品、酒店等行业，数十家华人企业的年营业额超过一万亿盾。可是，这毕竟是少数，而且跟国营企业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

国营的石油、天然气、邮电、大种植园、通讯、电力、铁路及航空，完全操纵在政府手中。根据印尼中央统计局发布的数字，90年代初印尼全国资产总额为2500亿美元，其中各类私营公司资产总额占12%，即300亿美元左右。即使这300亿美元资产中的一半是华人资产，所占比例也不过6%，说什么华人控制了印尼70%的经济，何以自圆其说。

华人的经济实力不如传言般雄厚，却在国家经济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减缓了当地的人口就业问题，并增加国家财政税收，为促进印尼的繁荣与富强作出卓越的贡献。

“印尼200大企业家排行榜里，有170个是华人。根据统计，华人大企业约有500家，中小企业则有30万家左右。不过，劳动阶层还是占多数，超过华人总工作人口的80%。”印尼《国际日报》总编辑李卓辉说出了华社贫富悬殊的现象。“大多数华人还是得靠双手劳动，每天省吃俭用来维持生活的。有的华人还住在茅草屋里，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就会让女儿嫁到国外去，以改善家里的经济环境。”出生于西加里曼丹山口洋市的林展理表示。

在后苏哈多时代，印尼已经没有可资垄断的行业，很多行业都有土著参与。目前仍由华人独领风骚的领域，可能就只有零销代理。许多国外品牌的电器、交通工具等，主要都是由华人引进代理销售。“华人凭着良好的商誉和勤俭、讲信用的美德，才能屹立不倒。”班芝兰唐人街的玩具批发商黄耀鸿如是说。

“华人在印尼的经济发展显得非常活跃，更在中产阶级中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印尼华人研究学者廖建裕分析说：“华人的优势是住在城市，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接触更多外界资讯，加上与世界各地华人保持联系，让他们轻易在印尼建立起覆盖面广泛的销售网络，日常用品销路坚挺，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华人踏足印尼，为的是寻求更美好的生活，至今他们仍然对这片土地怀着梦想。“这里资源丰富，市场庞大，劳力低廉，对脑筋转得快的华人来说，找生活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政治保持稳定，这个国家肯定前途无量，我们的未来也一样。”华人总是这样想。

普遍上，华人的平均收入比当地人高，物质生活也较为充裕，也正是这些差距，引起部分人心理上的不平衡。“华人要做好生意，也要搞好国家经济，更要积极参与印尼的建设。”印尼工业界闻人郑年锦语重心长地说。

为国家建立良好的经商环境，推动更多建设工程，协助土著创业，是印尼华人目前的首要任务，也是拉近与当地入距离的最佳途径。

- 印尼华人多经营小生意。

华人“印尼化”文化不断根

印尼华人社会结构多元，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各具特色。

土生华人是早期华人移民与印尼土著通婚的结晶。他们只有印尼文名字，中文姓氏与祖籍或许已不可考，有的甚至会把自己归类为土著族群的一分子，生活中参杂了许多当地特色。他们大多已失去说中文的能力，平常以印尼语或当地方言沟通。会说中文的华人群体，就把这群和其他不懂中文的华裔称为“侨生”。

土生华人已没有使用筷子和汤匙的习惯，反而入乡随俗，像当地人那样用手来吃饭，食物口味也偏辛辣。有人形容，土生华人的生活习惯已接近土著，但依然传承了华人的传统文化。“虽然他们不知道很多习俗背后的意义，有些甚至已被其他地区的华人群体扬弃了，但他们还是完好无缺地保留下来，如拜堂和祭祖仪式等。”难怪有些土生华人会说：“完全看不懂Lian（春联），但每逢新年还是会请人来写。我们就是比其他华人更华人！”

纯华人和20世纪上半叶才移居印尼的新客华人，则是民族意识较强的一群，也是较常被提及的印尼华人社群。他们口操华语或家乡话，还保留着不少华人习俗。基于殖民制度，他们没能很好地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依旧活在华人圈子里。

比如一些爪哇以外的外岛华人，很多都是18世纪中叶招募到当地从事开采活动的华人矿工，后来矿源枯竭，他们转而耕作、当木匠或做小生意，与多数是商家的爪哇华人有别。他们散居各地，并保有更纯粹的华人传统文化。西加里曼丹的坤甸和山口洋市亦是如此，潮州话和客家话响遍天际，栖身其中，仿佛在一个淳朴的华人小国里漫步。

苏哈多实行了30多年的同化政策，让许多新客华人的后裔，尤其是住在大城市如雅加达者，也逐渐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不过，即使入了籍、改用印尼姓名，他们当中有些仍保留着中文姓名；无法在当地接受中文教育，就把子女送到邻近国家学习中文；没有中文读物，就通过卫星电视或进口影碟重温中华传统文化。

随着中国崛起，国内政治气氛逐渐开放，印尼华人积极开展文化寻根之旅，坊间也兴起一股学习中文的热潮。

- 华人吃印尼巴东餐（Nasi Padang），也用手抓饭，显示了华人的同化。
- 现今的华人店还挂着“金花红绸”的传统饰品。
- 华人送花牌庆贺的习俗，也在其他族群之间流传。
- 山口洋有全印尼唯一公开售卖猪肉的市集。
- 出席正式场合，华人总是喜欢穿上具印尼特色的峇迪（Batik）服饰。
- 印尼住着300多个族群，文化交融的现象处处可见。在印尼语词汇中，Tauge（豆芽）、Tauhu（豆腐）、Kuchai（韭菜）、Caisim（菜心）、Teh（茶）、Lobak（萝卜）、Beca（马车）、Bihun（米粉）、Bakmie（肉面）等，都借用了闽南语的发音。直到今天，土著还是习惯以“Jipak”（一百）、“Gohchap”（五十）来叫价。

天堂地狱 一线之隔

对华人来说，印尼既是地狱，又是天堂。每当发生排华暴乱，恶浪铺天盖地而来，转瞬间成了人间炼狱；雨过天晴，一切恢复正常之后，这里又是华人的天堂。

“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家！”血洗的历史固然惨痛，但华人并没有带着仇恨和恨意，因为他们知道多数的印尼人并不赞成排华的恶行。“印尼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大多数印尼人都很善良，他们原本就很单纯、乐观，也没有坏主意，如果你对他们好，他们会对你更好。杀害华人并非他们的本意，只是有心人从旁煽动罢了。”有的华人这么说。甚至有人说：“华人在这里不是异类，我们是印尼人，是一体的。”

这里交通秩序紊乱，只需花1千或2千盾，就有人替你开路，让你通行无阻；出门用餐不打伞，下雨也不着急，身边随时有人为你撑伞遮雨，每次酬劳大约5千盾。华人笑说：“在印尼有几千盾就可以获得如帝王般的享受。”

1998年爆发了排华事件之后，华人提高了警惕性，并从现实中吸取教训，体悟出一些道理来。“只要你摸索出一套生存之道，日子还是可以逍遥自在、无拘无束的。”这是印尼华人的生活体验。华人言行举止也收敛了不少，不再大事铺张，过着低调的生活。

一般来说，印尼华人的生活是较为舒适的。多数华人属小康家庭，都会聘请帮佣打理家务，如洗衣烧饭、搞卫生、带小孩，或充当司机，这样一来，华人便能心无旁骛，专注事业的打拼。在一些大城市如雅加达，帮佣或许还不止一个。一些华人雇主坦言，失去了帮佣，他们的生活会变得一团糟，1998年骚乱爆发之际，也是这些帮佣站出来维护华人雇主。

纵使排华事件已经过去，但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心理上还是有些害怕，所以会选择住在华人居多的新村，并且聘请保安看守，晚上出门也会找人陪伴。”难怪许多华人住宅，都用高高的围墙区隔开来，大门铁栅至少有两公尺半高，上面还有锋利的铁丝。“以前做生意没有那么多顾虑，商品总是堆满整个仓库；现在由于担心暴乱重演，一切可能在瞬间化为乌有，因此经商手法变得保守，不敢存货太多。”华人商家这样说。

不过，这一切都在改善中。

在苏哈多时代，华人丝毫不敢张扬，深恐泄漏了炎黄子孙的身份，会惹来飞来横祸；现在，华人可光明正大在屋外拜天公，甚至贴上春联或挂上红彤彤的大灯笼，再也不避讳了。

印尼华人终于可以踏上公众的舞台，毫无顾忌地唱起中文歌曲来。许多脍炙人口的中文歌曲如《月亮代表我的心》，都谱上印尼文歌词，这首歌也是许多大型晚宴指定的演唱歌曲。年长的老华人喜欢在聚会上载歌载舞，即使是不谙中文的年轻华人，也会以拼音的方式来背诵中文歌词。

在文化多元的印尼，华人的生活也显得多姿多彩。“印尼这么大，到处都有明媚的景色，闲来与家人在国内旅游是一种至上的享受。”因此，不难理解华人家中为何总是有一台7个座位的多用途轿车。

提到未来的远景，印尼华人总是说：“突破华人圈子的围墙，与其他族群融为一体，创造和谐安宁的社会！”

华人节日普天同庆

在苏哈多时代，当世界各地的华人燃放鞭炮，敲锣打鼓迎接新年之际，印尼华人碰到亲友却只能偷偷拱手作揖，低声说“恭喜恭喜”。

“在苏哈多时代，华人到庙里烧香膜拜，大家都行色匆匆，不敢长时逗留，气氛不比现今热闹。那时候，庙里不得不取下有中文字样的牌匾，或用布遮盖，而印上中文字样的蜡烛，也得换上特别订制的印尼文蜡烛。”历史最悠久、香火最鼎盛的金德院管理员梁佑益回忆说。

今天的情况却大异其趣。自2003年开始，华人新年被列为全国公共假日，而舞龙、舞狮等大型活动，也堂堂正正走上街头。在印尼，元宵节的热闹气氛更胜年初一，有说是因为当年政府禁止任何庆祝活动，华人在年初一只好低调地串门拜年，到了元宵节就能以宗教名义，抬着神轿出游，举办盛大庆典，让春节有个圆满的句号。每年成千上万的游客到山口洋观赏元宵庆典，就发觉到它的魅力有多大。

- 政治人物趁春节来临之际，挂上中文布条，向大家拜年致意。
- 现在，华人终于可公开过年过节，年获种类令人目不暇给。

尽管农历新年被禁了30多年，但华人还是保留了一些过年的传统习俗。初一到十五都有特定的习俗，比如初五到墓园向死者拜年，初七要吃7样菜，初八到8间庙宇祭拜等等。当然，华人节日也参杂了一些印尼本土特色，比如在除夕夜，咖哩鸡（Kari Ayam）和沙爹肉串（Satay）就是饭桌上少不了的佳肴。

农历新年以外，华人最重视清明节。就算是在外地工作的游子，都会趁清明时节赶回家乡拜祭祖先。另一个重要的节日是中元节，俗称“鬼节”。

华人节日如今不再纯粹属于华人了，印尼人也同时分享节日的气氛。

- 华人新年在印尼文中称为“Perayaan Imlek”，借用闽南话“阴历”的读音，而印尼传统食品“Lontong”也打动华人的欢心，演变成“Lontong Chap Goh Mei”（元宵饭团）。印尼华人新年采用孔历算法，即从孔子诞生的年份开始算起，如2009年，也是孔子诞辰2560年，庆祝的就是2560年的新年。

社团风起云涌 参政不遑多让

1966年以前，印尼有大约2100多个华人社团，与数量庞大的中文学校、中文媒体，构成发展成熟的华社。在苏哈多时代，政府接连取缔华人社团，只保留少数以基金会（Yayasan）形式成立的华人团体，以及一些姓氏、慈善宗教社团。这一来，社团的华人色彩变淡，融入更多的本土元素，也有的社团改以宗教或慈善团体的形式，暗地里地从事社团工作。

直到1998年以后，印尼华社呈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日渐式微的中华文化如同久旱逢甘露，华人社团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可能情绪压抑得太久，政策放松了，大家组社团、办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转瞬间，印尼各地涌现了各种各样的社团组织，特别是雅加达、万隆、泗水、棉兰和三宝瓏等华人集中的地方。”但也有华人认为，无节制地组织社团，会减弱华人的凝聚力。

大大小小的华人社团，散落在全国各地，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包括早操队伍、歌唱团体、学术协会等，保守估计有近千个。印尼客属联谊总会开办了崇德三语学校；一些原中文学校校友会、姓氏和宗亲会、地缘组织，购置会址充当活动场所；全国性综合社团如印尼华裔总会、印尼百家姓协会等，要求撤销种族歧视法令，并且积极争取印尼华人享有与其他民族同等的权益。

经历了1998年的排华风暴，华人不再只是一味埋头经商，取而代之的是纷纷参政议政，以提升本身的地位。4个由华人主导的政党相继成立，即印尼融合党、中华改革党、印尼大同党和印尼佛教民主党。在1999年大选中，唯一获准参选的印尼大同党赢得3个国会议席，有8名华人当上国会议员，郭建义更当选为人民协商会议副议长兼内阁部长。

“华人政党在印尼还成不了大气候，但华人参政为大势所趋，无论加入哪个政党，整个华社就是强力的后盾。”印尼华裔总会和印尼百家姓协会创办人黄德新，鼓励更多年轻华人踏上参政之路。

近年来，华人的政治表现可圈可点。2003年，西加里曼丹华人张锦坤当选为上候县县长；2004年的国会大选中，参选政党分别推举170名和130名华人为国会及地方议会议员的候选人，同年十月，冯慧兰被委任为贸易部长；2009年，约有1千名华人参与国会和地方议会的选举。

走上改革道路后，印尼政府逐步改善当地华人与主流社会的关系，华人也以实际行动来落实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印尼华人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 同生肖的华人也聚在一起成立联谊会，只要本身或配偶出生在该生肖年，就可以成为会员。现有属虎、属狗、属蛇以及属兔的生肖联谊会，其中威虎联谊会成立得最早，已有4**年历史。华人社团活动，大多沿用华人传统仪式，如瑞狮迎客等，但致词或开会时，则主要使用印尼语。

信仰自由 百花齐放

印尼有接近90%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有说当年把伊斯兰教传入这千岛之国的，就是中国的航海家郑和。然而，在这里生活了很久的华人，皈依伊斯兰教的却不多。

早期华人以民间信仰为主，由于当时福建人占多数，因此福建地区的民间信仰流传最广。大大小小的寺庙遍布全国各岛，许多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古庙，至今仍香火鼎盛。雅加达著名的金德院，早在1650年已建立，主要供奉妈祖、观世音菩萨、关帝等。华人居多的山口洋市，更被称为“千庙之城”，多是供奉大伯公的庙宇。

“华人庙宇不纯粹是宗教场所，同时也积极投入社会慈善工作，有的设立西医诊疗所为人民看病；每逢初一、十五或发放救济品时，我们也不分种族、不分信仰地给予援助。”梁佑益说。

1965年印尼发生流血政变，华人担心被扣上“无神论者”或“共产党人”的帽子，纷纷皈依基督教或天主教，特别是受西方或中文教育的华人。据学者统计，1953年，在印尼华人中只有10%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但是到了1991年，人数已超过20%，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为了更容易融入主流社会，也有人曾呼吁印尼华人加入伊斯兰教，但华社的反应却相当冷淡。

可能原因有三。首先，基督教与天主教跟华人习俗的冲突比伊斯兰教小。其次，基督教和天主教自殖民时代沿袭至今，印尼有不少原住民都是信徒，华人也信奉同一宗教，意味着与土著达到某个程度上的融合。

另外，当年中文学校遭关闭后，许多华人家长把孩子送到教会开办的学校就读，而这些原本信奉佛教、道教或民间信仰的家长，对孩子宗教的转变并没有太大的抗拒。经过时间的推移，许多华人家庭已逐渐过渡到西方宗教信仰，印尼华人还凭着自己的力量，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华人基督教堂——弥赛亚大教堂。

曾几何时，印尼政府把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佛教，及以华人信徒为主的孔教列为国家的六大宗教。孔子的儒家教义、思想，受承认为国家宗教之一，这是东南亚地区乃至全世界罕见的现象。不过，后来基于政治因素，苏哈多政府以“妨碍同化”为由，宣布自1900年开始在印尼发展的孔教为非法宗教，使当时约有300万信徒的孔教转为地下和家庭活动。

1999年，自称有华人血统的瓦希德当上总统后，恢复了孔教的合法地位，他还出席了孔教会所主办的春节联欢会。会上所宣布的孔历华人新年，也推广到全国各个阶层，并沿用至今。继任总统也大力支持孔教会在春节期间所办的活动。

“孔教会在全印尼大约有100多个分会，相信有超过几百万信徒，在侨生华人群体内流传极广。”雅加达近郊丹格朗（Tangerang）孔教庙的负责人罗伟源如是表示。

孔教庙每周日以类似基督教崇拜诵经的方式，进行祭孔仪式，不过，教义内容都是四书五经翻译成的印尼文版本。“侨生看不懂中文，但却十分了解传统习俗，教会还成立了舞狮舞龙队伍，以吸引更多的年轻华人参与。”

“孔教不仅仅是宗教，也是人类生活哲学的最佳指引，以免误入歧途。”侨生信徒以印尼语这么说。

印尼建国宪法“潘查希拉”（Pancasila）的第一条就是“信仰神道”，即政府承认人民有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经历了接近半个世纪的磨难，华人在这里终于呼吸到宗教自由、多元化的新鲜空气。

- 孔教在印尼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孔教庙更是遍布全国各地。
- 在一些华人庙宇里，神明也配上印尼文名字。

中文媒体重整旗鼓

中文报刊在印尼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但经历坎坷。

20世纪初，印尼华人自办的中文报纸陆续出现，有1901年创办的《理想》、1902年的《泗水新闻》、1908年的《泗滨日报》，以及《新报》和《天声日报》等。日本占领印尼并勒令所有中文报纸停刊前，大约有20多家在发行。

印尼独立后，中文报纸进入群雄争霸的发展阶段，主要分为亲中国大陆、亲台湾和标榜中立3类报刊，其中《新报》、《生活报》和《天声日报》影响力较大。后来，排华浪潮把印尼13家中文报刊卷入停刊寒流中；九·三十政变后，更是中文媒体走向衰落的开始。一声令下，中文报刊悉数被关闭，政府为了向只懂中文的华人群体传达信息，于是在1966年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日报》8个版面中，保留了4版中文，成为中文仅存的活动空间。

1998年瓦希德上任后，中文报禁解除，新闻自由的尺度也变宽了。“现在的印尼，可说是东南亚区域新闻和言论最自由的国家。”住在这里的华人，都有这种感受。

自2001年台湾联合报系在印尼出版了首家外资中文报——《世界日报》后，陆续出现的中文报有《和平日报》、《新生日报》、《国际日报》、《印度尼西亚商报》、中文和印尼文互译的《华文邮报》及《千岛日报》等。曾经垄断市场的《印度尼西亚日报》于2006年与马来西亚最大的中文媒体星洲集团合作，易名为《印尼星洲日报》，改变办报风格及开辟电子版，继续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由美国国际日报集团于2001年斥资创办的《国际日报》，目前是全印尼发行量最大，也是唯一在雅加达、棉兰、泗水、坤甸4个城市同时印刷发行的中文报纸，包括东爪的《泗水晨报》、西加的《坤甸日报》和苏北的《棉兰早报》。

“全印尼的中文报纸发行量有十多万份左右，许多仍是亏损地经营着。不过，随着中文教育复苏，加上中国迅速发展，可以预见中文读者群将会不断扩大。”业者大都对中文媒体的发展前景表示乐观。

无可否认，目前中文报业的发展还是处于过渡期。

“经历了30多年的文化断层，中文人才严重短缺。许多中文报馆的员工其实对中文一知半解，排版员大多是不懂中文的印尼人。”李卓辉感慨地说，《国际日报》就有四分之一的员工不谙中文。也有些报馆直接从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引进人才，以填补人力资源上的不足。“可能还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接上轨吧！”有人这么认为。

不仅是平面媒体，印尼的中文电子媒体也面临相似的窘境。由于缺乏中文造诣较高的人才，广播时经常出现发音、语法等问题。这一切，都在慢慢改善当中。

启播于2000年的加科哇拉（Cakrawala）第一华语广播是雅加达首家中文广播电台，除了播放中文歌曲，也播报新闻，同时制作一些时事和清谈节目，深受华人社会的欢迎。这个初期只有老华人收听的电台，后来也吸纳不少年轻的听众，主持人甚至用印尼语与听众沟通，以拉近与新一代华人的距离。迄今，印尼仍未有覆盖全国的中文广播电台，发展空间不小。

中文电视台在印尼则仍是个梦，不过2000年启播的美都电视台（Metro TV），却开创了每天早上播报中文新闻的先例，惟播报时间不断缩减。

自禁令解除后，这个中文一度湮灭的国度，处处林立着中文招牌和广告牌。中文媒体也跟着浴火重生，期望有朝一日能百花齐放。

- 印尼目前仅有一家中文书局，可公开販售中文书籍。

中文教育枯木逢春

苏哈多统治时代，制定了法令禁止发行和销售中文报刊，没收并烧毁中文书籍，禁止中文的教授与应用，即使用印尼文拼出中文语音也不允许，似乎要把中文从印尼华人的脑海里连根拔起。

1965年以前，印尼原本有42万5千名学生在1600多所中文学校上课，后来在不同阶段被全面关闭了。“最后一天上课时，老师和学生都坚持把最后一堂中文课上完，即使那时校园已站满军人。我们心中其实并不害怕，只有激动，因为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中文教育从巅峰跌入谷底。”华人说，这是他们胸口永远无法痊愈的痛。眼见当年投下不少心血建立起来的华校，不是遭废弃就是任由破坏，更是令他们感慨万分。

查禁中文的年代，还是有一些教育斗士翻山越岭，冒着被捉和被打的风险，到华人家庭教导中文，继续传递薪火。“上课时只能默读，不能发出声音，担心引起左邻右舍的注意。”西加中文教育协调机构副主席陈惠珍，道出了当年华人对中文教育的坚持。有些华人，甚至把祖辈遗留下来的武侠小说当入门，自学中文。

1998年苏哈多倒台后，被禁了30多年的中文，终于重现曙光。可惜，中文教育已经断层多年，40岁以下的华人几乎无法掌握中文。李卓辉分析说：“爪哇岛内或许只有18%的华人说中文，懂得书写的剩下70万人左右，全国也不过一百多万人。”

中文教育风光不再，但印尼华人没有气馁，自解禁后开始筹办中文补习班，并期许中文学校复办。1999年以后，民办中文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发芽，后来政府也把中文列为国立学校的外语选修科目。到了2007年，全国共有1万6千所中学开办中文课，吸引了近2千万人来学习。

“中文教育复办得相当快，但基础却没有了。国立学校每周有两节到五节中文课，由校长决定。从中学才开始学中文，成效可想而知。目前这个阶段，我们只能要求数量上有所增加，接下来再提升质量。我们要把中文教育塑造成不仅仅是华人，而是整个印尼民族的事业，如此才能长期发展下去。”雅加达中文教育协调机构主席蔡昌杰这么说。

印尼中文教育目前最迫切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它普及化。

这就是2004年雅加达中文教育协调机构成立的大背景。目前全国共有18个省份设有协调机构。“阻力虽然很多，但大气候已经形成，我们必须从这个缝隙努力扩展，争取其他国立学校也开办中文班。”蔡昌杰说，从以前不准讲中文到现今可教中文，耳边传来孩童朗朗的读书声，是许多华人无法想象的画面。“为了应付国内庞大的中文师资需求，印尼政府甚至提供师资培训资金，而教学大纲也是本地编写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勇于踏出第一步。”

印尼中文教育可分为三类：一是台湾商人开办的中文学校；二是国立学校开办的中文课程，把中文列为外来语；三是以印尼语、英语和华语来授课的私立学校、特殊学校或国际学校，开办幼儿班至高中课程，这也是当地华社所指的三语学校。

中文教育的大门虽然已经打开，但政府仍禁止设立华校，也未把中文列入国家教育体系内。不谙中文的印尼华裔人数众多，年轻一辈绝大部分已本土化，无法用中文写作或阅读中文读物。“这里的环境根本就没有机会说中文。”新一代华裔无奈地说。

中文要在这南洋翡翠岛国健康成长，显然并非易事。所幸，随着当局放宽中文政策，加上中国崛起，印尼也掀起一股中文热，让华人看到中文复兴的希望。

“前路是曲折的，也是漫长的，但我们肯定会坚韧不拔地走下去，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经历过中文教育的兴衰，曾是中文教师的鬓白老华人坚定地说。

- 中文广播电台有的以传播资讯为主，有的纯粹让公众演唱卡拉OK，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消遣管道。
- 一些友族修毕大学中文系后，到三语学校教导中文。
- 茅草盖顶的山口洋福律华文补习所，培育出许多“小老师”，使当地出现“祖孙辈一同教学”的现象。

其他资讯

兰芳共和国——第一个华人共和国

- 位于西加东万律的罗芳伯墓地。

早在18世纪，华人曾在西加里曼丹（简称西加）建立起一个小国。

那时，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有许多华人来到加里曼丹谋生，大部分集中在西部沿海的坤甸市，他们除了种植农作物外，也开采矿产和煤炭。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华人也组织了会社。

1770年，广东梅县客家人罗芳伯在西加设立了兰芳公司，从会社发展为贸易公司，为当地商人或酋长提供服务。后来，罗芳伯在当地的势力大增，把“兰芳公司”改为“兰芳共和国”，全称为“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并担任大唐总长（相等于现今的国家元首）。以东万律为首都，并把立国之年定为“兰芳元年”。罗芳伯还参照西方国家的法制，制定一套完整的行政、立法和司法系统，把地方分成省、府和县三级来管理。

不过，“兰芳共和国”的合法性曾引发争议。但若以当时兰芳拥有独立政府、民主选举公推的国家元首、人民、土地、法律、国防和钱币来看，似乎已符合一个共和国的成立条件。而荷兰史书上也曾记载过“Republic of Lanfang”这个名称。

这个华人小国后来遭到荷兰围攻，顽强抵抗后战败，最终于1888年左右灭亡，结束了一百多年的建国历史。

印尼西加“黄门三杰”

印尼西加省华人精英多，出现了“黄门三杰”！

现年42岁的黄努山（Ria Norsan），于2009年4月13日宣誓为坤甸县首位华裔县长。出生于山口洋市的他在丹戎普拉大学毕业后，在政府部门工作了11年之久。

在山口洋市出生的第六代华裔律师黄少凡（Hasan Karman），于2007年选举中击败包括原任市长在内的4组候选人，在自己的家乡扬眉吐气，当选为全国首位华人市长。今年47岁的他毕业于印度尼西亚大学法律系，过后攻读生态环境博士学位。他从事过企业管理工作，并开设律师事务所、广播电台、餐馆等。

全山口洋市有20万人口，华人占了62%。“在全印尼华人比例最高的地方当选市长，背负的责任当然重大，想要达成的目标也很多。最重要的是全面整顿市政，把这里打造成一流的文化旅游都市。”黄少凡雄心勃勃地说。

第三代华裔黄汉山（Christiandy Sanjaya）于2008年当选为西加省副省长，这是华裔在印尼担任省级地方行政长官的第一人。他与竞选搭档以超过40%的选票胜出。他大学毕业后在高中教书，投身教育界为他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后来曾任坤甸市地方议会代表。任期的5年内，他竭尽所能为西加省全体民众服务。

三“长”同姓黄，一时传为佳话，同时也提升了华人的政治地位。

- 黄少凡（左）与黄汉山。

结语

“印尼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园，只是偶尔有点脏。我们坚信，只要用心去打扫，最终会变得清洁明亮。”印尼华人如此形容孕育他们成长的国家。对于过往惨痛的历史，他们铭记于心，却也把它当成前车之鉴，如今努力回馈祖国，为印尼的繁荣作出贡献。

华人深信，这是个种什么都能生存的美好国度，而自己的根，早就牢牢地扎在这里，开枝散叶了。“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当然也要终老于这里。”身处印尼，华人深深了解国徽中的格言——“异中求同，殊途同归”。

菲律宾

引言

菲律宾位于亚洲东南部，西濒南中国海，东临西太平洋，是一个群岛国家，由大小 7107 个岛屿组成。

1542 年，西班牙航海家来到这里，为了在亚洲炫耀西班牙帝国的“国威”，便按照西班牙皇太子菲力（Philip）的名字，把群岛命名为菲律宾群岛。自 1565 年起，西班牙在这里开始了长达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

1898 年，美国击败西班牙，占领并统治了菲律宾；1941 年，日本入侵菲律宾；二战结束后，美国重新恢复对菲律宾的统治。直到 1946 年 7 月 4 日，菲律宾才终于赢得最后的独立。

菲律宾自然资源丰富，有“西太平洋明珠”的美誉。因其地理位置接近中国东南沿海，长期以来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移民到这里打天下。今天，他们已成功在当地打造出一系列商业王国。

华人移民简史

早在西班牙人于 1570 年占领马尼拉以前，这里已经有华人的足迹。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之后，殖民政府因建设和贸易的需要，于是积极招募华人前来。此后，从中国抵达马尼拉的航船便络绎不绝，也载来了大批的中国商品和移民。在短短 30 年间，这里的华人人口激增，直至 1600 年，菲律宾的华人已有 2 万人，他们主要聚集在吕宋岛（Luzon Island）的马尼拉。

17 世纪，马尼拉道路两旁已是华人商店林立，唐人街逐渐形成。那时，就连穷乡僻壤也遍布着华商所经营的菜仔店（Tienda de Sari-sari），贩售各式各样的日用品。殖民政府对华人可谓爱恨交织。刻苦耐劳的华人是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对地方建设以及经济发展的贡献甚大；可是，一旦华人人口膨胀，人数若是超过西班牙统治者，又令殖民政府深感不安。于是，殖民政府开始对华人加以限制和打压，例如强迫华商缴纳重税；限定华人居留在马尼拉城外的“八连区”（Parian），没有通行证不得擅自离开等等。此外，当时的殖民政府还经常找借口将华人集体驱逐出境。

华人终于无法忍受而群起反抗，却遭致更为残酷的镇压。1603 年和 1639 年，殖民政府对华人展开了大屠杀行动，当时受害的华人数以万计。之后，从 1662 年到 1762 年之间，屠杀华人的悲剧又一再重演。

18 世纪后期，由于殖民政府需要劳动力，便开始改变对华人的政策，不但将移民和居留法令放宽，还积极地招募契约华工。这一来，华人人口逐年增加，致使华人的足迹遍及各岛，除了马尼拉市以外，在帕奈（Panay）、那牙（Naga）、宿务（Cebu）、三宝颜（Zamboanga）等地都有华人聚居。

到了美国统治菲律宾的 40 年间，殖民政府因为要笼络人心，不惜牺牲菲律宾华人的利益，实施了严格限制移民的政策。尽管如此，试图入境的华人还是千方百计以各种途径踏入这块土地，其中的一个方法便是冒充当地华商的儿子，正因如此，也导致了今日菲律宾华人在中英姓氏方面的混乱现象。

1935 年，美国予以菲律宾自治权，民族主义者以及政客于是大肆利用舆论来鼓动排华情绪，同时还滥用手中的职权，推行了好些种族性政策，以致种族关系日渐紧张。

1946 年，菲律宾获得了真正的独立之后，民族主义者的排华呼声更是响彻云霄。结果，国会通过一连串的非化法令，华人首当其冲，被剥夺了多年以来经营传统行业的权利，只得另辟蹊径，委屈求全。

独立之后的 30 年间，菲律宾华人，尤其是年长的一辈，仍然具有浓烈的中国意识以及故乡地域观念。但是进入 70 年代之后，华人的历史开始迈入新纪元。1975 年，菲政府简化华人的入籍手续，许多中国移民才因此而入籍。

今天，在菲律宾华人当中，有90%以上已经入籍成了菲律宾公民，他们基本上与当地人获得同等的待遇，且大多已融入主流社会，将菲律宾视为自己的家园。

- 菲律宾国父何塞·黎刹 (Jose Rizal) 和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 (Corazon Cojuangco Aquino) 皆有华人血统。他们属于中菲混血儿 (Mestizos)，这一个特殊群体在菲律宾的社会发展，尤其是独立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当今社会风貌

引言

菲律宾华人人口向来缺少确切的统计，粗略估计大概有100万人。一半以上的华人聚居在马尼拉市，其他则分布在宿务、达沃 (Davao) 及三宝颜等城镇。

来自漳州和泉州的福建人，占了菲律宾华人人口的85%至90%，余者则是原籍南安、惠安、同安和厦门的福建人，以及一些广府人。

菲律宾华社主要由3个群体构成，即老华人、土生华人和新移民。老华人指的是50岁以上的华人。他们有的出生于中国，自幼南来；有的在当地出生，已是第二或第三代。

土生华人是最庞大的群体。由于成长的家庭背景与所受的教育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各异其趣。那些在传统家庭长大、接受华文教育的华人，有较强的传统意识；而那些没有传统文化和教育背景的华人，则没有中文姓名，更遑论会说写中文。无论如何，这两个群体都已融入菲律宾社会，认同自己为菲律宾人。

至于新移民，则是指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自港台及中国大陆移民过来的一群。港台的新移民大多是投资移民及技术移民；而近年来则有越来越多的大陆移民，据粗略计算，目前他们的人数多达10至20万，其中以福建人居多。这新一波的移民浪潮，其人数之多大大地冲击着菲律宾原有的华社，引来一丝忧虑。

逆境求存引领经济潮流

华人善于经商，福建人更是以精于营商之道而闻名。菲律宾华人在当地的人口比例虽低，但他们在菲律宾百年来的经济发展史上一直扮演着先锋的角色，对菲国的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菲华商人在东南亚国家中的人数比例最高。在16世纪西班牙建立殖民政权之后，中菲贸易随之展开与扩大，绵延了数个世纪。后来虽遭到殖民政府和独立后的菲化政策打压，华商命运几度浮沉，但他们凭着独到的眼光、勇气、勤劳和信用等营商“法宝”，在逆境中坚持下来，奠定了稳固的基石。

“1950年代菲化政策禁止华人涉足零售业，华人被迫放下这传统的行业，转向批发业和工业。谁知坏事变好事，这种转型对华人来说反而是好的。它让华人可以进军更多行业，也因此出现了不少大企业家。”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陈本显说。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危机可能就是转机。菲华的经济至今还在持续飞速地发展，他们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经济，并且也赶上国际经济发展的步伐。

如今，菲华商业触角延伸到各行各业。从木材加工业到钢铁制造业，从餐饮业到房地产业，从轻纺化工到进口贸易业、电信业、食品业、金融业等，都有华商涉足其中，并形成跨领域的经济模式。菲律宾首富陈永栽，就因其生意遍及不同领域，而被誉为“航空大王”、“啤酒大王”、“烟草大王”及“金融大王”等。

在各领域执牛耳的菲华企业家还有“百货业大王”施至成、“食品业大王”吴奕辉以及“本土快餐大王”陈觉中等。他们经营的都是家族式的企业集团，资金雄厚的集团所涉及的领域包括零售百货业、房地产业、银行保险业、通讯运输业、制造业等。

由陈觉中领导的“快乐蜂” (Jollibee) 快餐集团，更是一举打败了世界快餐业巨头麦当劳和肯德基，占据了菲国快餐市场65%的份额。

当代菲律宾华商虽迈向现代行业，但他们的传统行业在该国仍是举足轻重，颇具分量。据菲华商联的资料显示，2001年涉足杂货及贸易业的华商已有8500多家。近年来他们更积极兴建大型商场，以满足广大的市场需求。

菲律宾华商经营银行业也颇具历史与规模。在上世纪20年代，菲律宾出现了3家银行，即中兴、华兴及民兴；不过在3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以下，最后硕果仅存的只有中兴。如今，菲华经营的银行已超过十家，在菲律宾国内、香港、台湾及美国等地皆设有分行，逐步发展成为国际性企业集团。

除了大型企业，菲华也是中小型企业的主力，尤其是纺织服装业。除了外销，在华人聚居的岷伦洛区（Binondo）也可以看到林立的服装店，林林总总的成衣让人目不暇接。该区也是流动商贩聚集的地方。每天早上6点多，辛勤的小贩（其中包括不少新移民），就推着货物到街上摆卖成衣和纺织品，一直到晚上8点才打烊。每逢周末，这里更是万头涌动，热闹非凡，喧嚣的人声交织出独特的生活乐章。

此外，华人经营的餐馆也比比皆是。走在马尼拉市，几乎每一条街道旁都可以看到华人餐馆和小吃店，供应各种风味的中华美食。

新移民则多数以从事零售业为主，马尼拉著名的一路发商场，即是中国新移民做生意的主要场所。他们多贩卖价格廉宜的中国商品，和当地中小型华商形成新一波的竞争。此外，也有一些新移民在华文学校、报社和工厂等单位工作。

土生土长的菲华青年通常都能口操流利的菲律宾语和英语，所以他们的发展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商业领域。他们多能顺应潮流，掌握经济脉动，进军银行、法律、会计、建筑、设计等行业。华人的生意也不局限在传统的岷伦洛区，而陆续迁至菲政府重点发展的马加地（Makati）商业金融中心。

- 华人大多聚居在马尼拉市，市内中文招牌随处可见。
- 一路发商场，售卖各式各样的廉价商品。
- 打败快餐业跨国集团的本土快餐“快乐蜂”，成为菲律宾华人的骄傲。

融会贯通中、西、菲文化

今天，虽然绝大部分菲律宾华人已融入当地社会，而且多信奉天主教，但他们仍强调尊师重道的中华文化，并保留不少传统的习俗礼仪。

不过，由于菲律宾长期处于西班牙和美国的统治下，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华人所保留的文化习俗也不可避免地打上西方文化的“烙印”。

这种东西文化的交融，使菲华社有别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社会。

每逢春节、中秋等传统佳节，菲律宾华人都会热热闹闹地聚集在岷伦洛大事庆祝。他们也非常重视圣诞节。出门在外工作或求学的华人，无论远近，总要在圣诞节赶回来和家人团聚，就像是中国人匆匆忙忙赶回家过春节一样。他们会在平安夜吃团圆饭，欢聚的热闹气氛丝毫不亚于除夕的年夜饭。

此外，菲华依然保留传统的婚丧习俗，但也将本地人和西方的仪式融入其中。例如，华人婚礼一般会在教堂举行，但他们在家里依然遵循传统习俗，给聘金、过大礼、敬茶仪式等一件不可少。

菲华裔青年联合会创会会长洪玉华也说：“菲律宾华人虽信奉天主教，但他们还是沿袭传统的葬礼习俗，为死者穿上寿衣，并焚烧元宝、蜡烛及纸扎物品等给往生者。”

菲律宾华人还有一句话：“死后的安息地要和生前的身分地位对等”，所以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为逝世的先辈建造一座住宅（俗称“阴宅”）。占地约54公顷的马尼拉华人义山也因这些造型各异的阴宅，而成了菲华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义山内分为土葬区、灵骨塔区以及吸引无数观光客前往参观的佳城区。所谓“佳城”就是墓宅，是以大理石砌成的房屋，用来置放灵柩，以让后人前来祭祀。

这些阴宅建筑风格各异，既有排屋式也有独立式，有西式洋房也有中式庭院，楼高一至两层，有的甚至3层，非常特别。据说，一些富豪墓宅犹如别墅，各种设施如空调、抽水马桶、电视机、电冰箱、沙发等一应俱全，平时还有佣人专门照料，与一般生人住宅无异。

建造如此壮观墓地之举，除了是后代子孙对先人的尊敬和爱戴，体现了“孝”的传统文化之外，其背后还有一个历史因素。一个已移民美国的菲华说，很早以前菲华被禁止购置屋产，但墓地却不受禁令的影响，于是华人就在这方面大兴土木，算是满足了“安家”的心愿。

除了祭祀先人，这一栋栋宽广的墓宅还是一个聚会的场合，有着凝聚家族成员的作用。

除了传统清明节，每年11月1日的万圣节，也是菲律宾人的“亡人节”，菲华称之为“番子清明”。菲人会在这一天到亲人墓地去献花悼念。但生性乐天的他们，不但会在墓前点上蜡烛念诵圣经，还在一旁野餐打牌、唱歌跳舞、通宵守夜，颇有与逝去亲友同乐的味道。

菲华在文化上能兼容并蓄，在宗教上也体现出类似特色。事实上，一种把天主教、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融为一体的混合宗教在菲华社会中极为流行。

因此，在许多菲华天主教徒的家庭或商店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同时供奉佛祖、菩萨和关公等；此外，在唐人街上，则可以看到人们对着缠满红黄绸缎的十字架烧香膜拜；在马尼拉华人义山的神龛上，圣母、耶稣和佛像也摆在一起供人祭拜。

在不少当地华人心中，圣母和观音的形象已经融为一体。在巴当加斯省（Batangas）的塔尔镇（Taal），凯萨赛圣母（Virgin Caysasay）被当地人视为妈祖化身来膜拜；而在加巴朗牙（Capalonga），黑耶稣（Jesus Nazarene）也被华人当作保王善士来供奉。

菲律宾一些教堂建筑也隐约中具有中国风格。1587年，不少华人工匠参与建造了位于古马尼拉的圣奥古斯丁大教堂（San Agustin）。它融合了欧洲古典建筑风格和元素，教堂大门前和庭院内还各摆放了4尊中国狮子石像。

- 马尼拉华人义山那风格各异、犹如生人住宅的“阴宅”，是菲华社会的一大特色。
- 菲律宾华人宗教中西融合，独具特色。图为菲华正对十字架烧香膜拜。
- 教堂外有着中国特色的石狮子并不见突兀，反显中西文化融合的特色。
- 闻名全菲律宾的“马面”（Mami），是当地华人马文禄所售卖的面食。食用时先把面放入沸水浸透，再盛进碗内加上鸡丝碎肉和鸡汤。起初，来自广东省的马文禄只是挑着担子在马尼拉街头叫卖，后来开设面店。虽然马文禄已去世30多年，因其面食在菲律宾曾流行一时，所以现在马尼拉，人们一般仍然把面食叫作“马面”。

“菲华三宝”贡献社会

菲律宾的华人社团有上千个，它们当中多数是在美治时期，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成立的。菲国独立后迄今，华人新社团仍继续出现。林林总总的社团包括地缘的同乡会、血缘的宗亲会、业缘的同业公会，以及慈善、宗教、文化、体育与娱乐等组织，其中有代表性的社团包括菲律宾华裔商业联合总会、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菲律宾华人体育总会以及马尼拉中华商会等。

于1954年成立的菲华商联总会，是领导全体菲律宾华人团结的重要机构。

目前仍活跃的团体约有两三百个，除了关注当地华人的福利与权益外，也与中国家乡有所联系。如中国发生自然灾害，华团便汇去巨款赈济灾黎，并且对家乡的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也无不慷慨解囊，全力以赴。

此外，菲华社团也协助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其中各华团所合力打造的“菲华三宝”，展现了华团积极融入主流社会的一面。所谓“华社三宝”，一般指的是“华团、华文报和华文学校”。至于“菲华三宝”，其独特之处则更意在融入社会：第一宝指的是，华商不仅资助华文学校，他们同样出钱出力捐建菲律宾农村的校舍，让菲律宾孩童拥有好的读书环境；第二宝是助人助己的华人志愿消防队，他们服务不分种族，只要有火灾和天灾都赶往现场施予援手，令当地人赞颂不已；第三宝则指的是深入穷乡僻壤的菲律宾华人义诊队。他们解决了各山地民族的医药需求，其悬壶济世的精神受到菲律宾人的高度敬佩。

“这三宝不仅对菲律宾主流社会贡献良多，亦促进华人和菲律宾人的关系，化解了一些政客和异议分子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使排华的声音随之消弭。”陈本显表示道。

此外，文艺团体如菲华作家协会等则有着文化传承的责任，例如，菲华作家协会自成立以来，不但广开门户，不囿于信仰派别，成为华文创作者的大家庭；更致力于培育华文文学新秀的工作，出版了许多文学丛书，被誉为菲华文艺界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及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承者。

但是时下不少菲律宾华人传统社团一直面对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窘态。这一点既表现年轻一代对传统活动不感兴趣，也反映出年青一代在民族意识和感情上的变化。

- 这些挂在菲华历史博物馆里的照片，都是一些为救人而捐躯或受伤的华人义务消防员，成了人们心中的英雄。
- 在一些节日庆典，仍看到一群热爱中华文化的老华人苦心经营的剧团，到各地演出传统大戏。

融入中找到认同与归宿

伴随着绝大部分华人的入籍、通婚和菲化运动，越来越多华人或主动或被动，逐渐融入主流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思想与价值观已经西化和本土化。他们不但拥有许多菲律宾人朋友，而且也有越来越多人参加菲人团体。“不同年龄和阶层的菲华在融入的程度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应该融入主流社会，包括政治、文化、思想意识和感情。”当地著名报人吴文焕如是说。

虽然对中年以上的华人而言，一时要他们完全放弃中国意识和中华文化，完全融入主流社会，似乎不是朝夕间能办到的事；可是对年轻人而言，融入主流社会不但可能，而且他们愿意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态度，加快融入的脚步。

上世纪80年代末，菲律宾发生经济危机，华人又差点成了代罪羔羊。在女中豪杰洪玉华的倡议下，一群来自各阶层的华裔青年，认为唯有促进种族间的了解、加强种族间的凝聚力，以及扩大华人的生活圈子，主动融入主流社会，才一是解决种族矛盾和促进和谐的关键，于是在1988年筹组了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

他们在《宣言》中这么表示：“我们把菲律宾当作是自己的国家，是我们世代生活下去的地方。我们决心融合到菲律宾大社会中去，同菲律宾人共同建设这个国家……我们感到有需要促进华菲之间的了解，改善华菲之间的关系，并愿意为此竭尽我们的努力。”

基于这个目标，联合会开展了各项活动，不断改善菲律宾人对华人的认知，致力减少彼此的隔阂和化解矛盾，这包括出版华文周刊《融合》与英菲文月刊《桥》，针对有关融入和社会问题发表意见，作为沟通种族的桥梁，并参与社会活动，以贯彻“华菲融合，亲如一家，共同建设美好的菲律宾”的目标。

位于古马尼拉，创办于1999年的菲华历史博物馆，也是菲律宾华人试图让外界更了解菲华移民史和奋斗史的一大桥梁。这个世界上少数由华人民间团体所创办的博物馆，通过展示华人如何在菲律宾艰苦奋斗、落地生根的历史，以“分享”作为主题，表现了华菲不可分离的共同命脉。

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菲华社会终于熬过最艰苦的时期，成功融入社会并有了今天受人尊敬的地位。然而，近一二十年来新移民的大量涌入，改变了华社的结构。由于语言的障碍、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使新移民往往自我孤立，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中，无法顺利加入当地主流社会，从而延误了华人融入的进程。这是目前菲华社会普遍认为不得不面对的一项重大课题，他们担心菲华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华菲良好关系会毁于一旦。

于是菲华社积极展开沟通活动，例如举办新移民座谈会，向新移民解释本地的移民法和营商法令。此外，许多华文学校也为照顾新移民学生，还开办特别班教导新移民了解当地文化及学习英语，以方便沟通和融入当地社会。

- 在菲华历史博物馆里有一首名为《我是菲律宾人》的诗歌，透露着当代菲华融入社会的心声，也显示出他们的身份认同。

菲华教育的困境

菲律宾独立后，菲政府推行华文学校菲化政策：规定不许注册新华文学校；现存的华校中文课只能作为外语教授，每天授课不得超过100分钟；禁止采用台湾编印的教科书，中文教师也只能在当地聘请。

华校菲化导致当地华裔学生的中文水平及对中华文化的认知程度急剧下降，但这也加强了学生对菲律宾的认同，加速融入主流社会。

目前菲律宾有150多间华文学校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131间归属在菲律宾华文学校联合会旗下。虽然华文学校数量不少，但华人子弟学习华文的意愿并不强，再加上学费不菲，最便宜的也要每学期一万比索，最贵的则高达十多万，所以辍学率日益增加。

据了解，在这几年里，华文学校华人学生的人数锐减30%至50%左右，发展情况令人担忧。

虽然中国的崛起让菲政府开始致力提倡中文，然而，当地华人的学习热忱非但没有提升，反之每况愈下。大多数青少年会把学习菲律宾语和英语放在第一位，不重视华文的学习。加上市场上多使用方言和英语，在大环境之下，华语往往被放弃。

因此，菲华商联总会、华教中心、各华文学校都竭尽所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菲华商联总会引进不少中国师范大学的志愿老师，捐建华校，创办华教中心的双联课程，修订课本，保送学生赴中国厦门进修，与菲律宾著名的雅典耀大学开办孔子学院等，期望把华文教育向前推进。此外，华文教育也获当地华人商会和不少校友热心支持，包括提供助学金和贫寒子弟奖学金。

除了生源问题，菲律宾华校如今面对的问题，还包括教学语言问题：华校究竟应该用闽南话还是华语（普通话）来教学？

菲律宾的老移民和新移民大都来自福建，他们会把闽南话放在首位，认为闽南话是华人社会的通用语言，也是菲律宾主要的商业语言，先学闽南话是理所当然。另一方面，一些家长和商界人士则认为，从中国崛起的长远发展来看，华语的使用范围会比闽南话来得广，所以各华校应该以普通话授课。也有人主张，在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用闽南话教学，小学高年级开始用普通话授课。

这种情况在菲律宾各华文学校体现出来，可以看到课堂上语言的使用往往相当混乱，出现了闽南话、英语、菲律宾语和华语一起使用的现象。

如何提高华人下一代对华语的兴趣，及用何种语言教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过从菲律宾华团、校方和各界人士的热心付出与参与中，可以看到在菲律宾华文的前途，仍透射出希望的曙光。

- 为了培养下一代对华语的兴趣，一些华人家长从幼稚园就开始让孩子学习华文。

其他资讯

绑架问题成菲华梦魇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菲律宾华人的生活一度被绑架的阴影所笼罩。

早期殖民政府长期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挑拨种族间的感情，加上后来种族主义分子和政客的曲意渲染，使菲律宾人相信华人是经济剥削者，或华人都是富有的一群，于是华人便常常成了被绑架的目标。

在1993年至2003年期间，菲律宾治安不靖，令华人闻之丧胆的绑架案不断上演。单单在2003年8月，当地就发生了约20起华人遭绑架案。令人费解的是，面对绑架问题的华人却鲜少报警，往往只是选择默默忍受。

华人深怕自己成为绑匪的下一个目标，所以只好紧闭家门，足不出户，即使出门也得大费周章，要经常更换上班时间、路线和交通工具。华裔的生意也因此大受影响。

公民反罪恶行动组织主席，有“华社花木兰”之称的学者洪玉华曾带领菲华裔青年联合会等华团进行和平示威，除了呼吁政府正视绑架问题，也教育人们如何应对及报警的重要性。

有鉴于绑架案日趋严重，总统阿罗约特别向华社做出承诺，加强军警巡逻并成立专门打击绑架罪犯的部门，也出动军队搜捕绑匪，解救人质。如今，在各方的合作下，菲律宾治安已日渐好转，华人的信心也逐步恢复。

结语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菲律宾华人的生活一度被绑架的阴影所笼罩。

早期殖民政府长期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挑拨种族间的感情，加上后来种族主义分子和政客的曲意渲染，使菲律宾人相信华人是经济剥削者，或华人都是富有的一群，于是华人便常常成了被绑架的目标。

在1993年至2003年期间，菲律宾治安不靖，令华人闻之丧胆的绑架案不断上演。单单在2003年8月，当地就发生了约20起华人遭绑架案。令人费解的是，面对绑架问题的华人却鲜少报警，往往只是选择默默忍受。

华人深怕自己成为绑匪的下一个目标，所以只好紧闭家门，足不出户，即使出门也得大费周章，要经常更换上班时间、路线和交通工具。华裔的生意也因此大受影响。

公民反罪恶行动组织主席，有“华社花木兰”之称的学者洪玉华曾带领菲华裔青年联合会等华团进行和平示威，除了呼吁政府正视绑架问题，也教育人们如何应对及报警的重要性。

有鉴于绑架案日趋严重，总统阿罗约特别向华社做出承诺，加强军警巡逻并成立专门打击绑架罪犯的部门，也出动军队搜捕绑匪，解救人质。如今，在各方的合作下，菲律宾治安已日渐好转，华人的信心也逐步恢复。

泰国

引言

旧称“暹罗”（Siam）的泰国，民风淳朴，是举世闻名的“微笑之邦”。最早的素可泰王朝（Sukhotai Dynasty）建立于1238年，现有76个一级行政区，是东南亚唯一不曾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君主立宪制下的政府主管国事，但泰王地位崇高，受到人民由衷的爱戴。

这个盛产稻米、崇尚和平的“黄金佛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印半岛上重要的鱼米之乡，同时也是南传小乘佛教的重镇。这里有许多诱人的名胜古迹，又被一层神秘诡异的宗教氛围笼罩着，各地游客长年蜂拥而至，怀着一种期待的心情，急于揭开面纱看个究竟。

踏上这块神秘胜境的人们，往往在僧云寺海中获得崭新体验之外，也为泰国人友善的目光，以及遍地是华人的境况，暗暗感到诧异。那一股无法形容的柔畅之风，伴随着仿佛亘古永存的祥和之气，缭绕在千尊佛陀的圣像之间。

数百年来，华人和泰人早就“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一代代的华人，就在这祥和的土地上安居乐业。

华人移民简史

华人到泰国来谋生及定居的历史，已经达8个世纪之久。早在素可泰王朝时代，中国东南各省份的华人便已陆续移民泰国。

那时候，克拉地峡（Kra Isthmus）两岸的春蓬（Churnphon）、六坤（Ligor）与素叻他尼（Surat Thani）等商港相当繁荣，以致南来的移民日渐增加。在15世纪初，有华人以暹罗使者的身份到中国去朝贡，而郑和下西洋的事迹就发生于阿瑜陀耶王朝（Ayudhya Dynasty, 1350 - 1767 年）的统治时期。

到了16世纪，已有华人矿工开始于泰南建立基地。与此同时，中国的江洋大盗林道乾携同部众约2千多人到北大年（Pattani）落户，并与当地女王成婚，在当地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华人社会。

16世纪初，阿瑜陀耶城就有了华人的聚集区。那时，华人和日本人、葡萄牙人展开了十分激烈的商业竞争，华商总是占上风，最终更成为皇家贸易的代理人。直至17世纪末，暹罗的华人人口约有十万人，他们多数来自福建和广东，属于商贸移民。

在1767年，缅甸大军压境，并且攻陷阿瑜陀耶城，华人和当地人齐心合力抗敌。最终中泰混血儿郑昭率领部队突围出城，接着领来援军。成功击退缅甸大军。由于阿瑜陀耶城已经成了焦土一片，他就将首都迁往湄南河西岸，并建起吞武里王朝（Thouburi Dynasty, 1767 - 1782年）。

郑昭的原名是郑信，母亲为泰国人，父亲郑镛则是广东澄海人，移民至暹罗之后才发迹。英勇善战的郑昭在战后全力削平其他势力，收复失地统一暹罗。在郑昭统治暹罗的15年间，极力鼓励潮州人前来经商或种植胡椒与甘蔗等。故此，湄南河东岸附近的王城处，出现了一个新的华人聚落。

郑昭逝世后，曼谷王朝（Bangkok Dynasty, 1782年至今）成立，此后皇家贸易也空前繁盛。华商大批涌入，市场一片兴旺。国王拉玛一世在曼谷核心地带兴建了一个华人商业区。随着1850年代经济蓬勃发展，华人的移民步伐更是大大加速，加上大批劳工移民蜂拥而至，19世纪末时华人已遍布泰国各地。

泰国大部分华人来自福建及广东。20世纪初，潮州人占了绝对的优势，总数的40%，其他是海南人18%、福建人16%、客家人16%、广府人9%。潮州人之所以居多，除了因为郑昭当年的大力招揽，另一个原因是曼谷和汕头之间的海运往来频繁。

- 为了纪念郑王的丰功伟绩，后人在吞武里区建立了郑王庙和纪念碑。
- 每年12月28日，泰国人民都热烈庆祝郑王朝祭大典。
- 郑王庙的墙上，嵌入了中国的蓝白陶瓷，展现了中泰合一的独特建筑风格。

当今社会风貌

引言

要准确统计泰华社会的人口，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在泰国近6千万人民当中，约2千万人拥有华人血统。据估计，泰华的人口约有700万左右。

除潮州人外，另外还有海南、客家及福建人等，多聚居在曼谷、清迈（Chiang Mai）或合艾（Hat Yai）等大城市里。

泰国的每一步发展，都留下华人的足迹。华人在经济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主导金融、钢铁、汽车装配、房屋开发等工商领域，正大集团、盘谷银行、律实他尼集团等，更是平地崛起，成为一批跨行业、跨地区乃至跨国界的大企业机构。

除了经济，华人在政治上的表现也非常突出，各党派人才辈出，其中不乏内阁部长及总理。在负责保家卫国的军警队伍当中，华人不在少数。

多年来，华人广泛吸收泰国文化，并把许多中华传统融入泰国社会。与其说泰华社会被“泰化”，倒不如说它是中泰文化融汇的产物。

曼谷的耀华力路（Yaowarat）一带是历史悠久的唐人街。在这里，中文招牌、中华美食、华人庙宇触目可见，整条街从白天喧腾到黑夜。走出这里，中文招牌少了，但遍地依然是华人的身影。如果不是耳边的泰语呢喃，或那些从身旁呼啸而过的七彩“Tuk Tuk”车，人们会误以为自己身在香港的闹市之中。

泰华源流四大群体

在泰国政府的公平政策下，华人在此找到了归属感，自然将自己看作“泰国人”，并引以为荣，尽管拥有华人血统，却不会刻意提起。尤其是中泰通婚家庭中的混血儿，更是强烈认同“泰国人”的身份。

泰国华人人数众多，大致可以分成四大源流：老华人及其后裔、泰北中国老兵及其后裔、中国大陆新移民及台商。这四大源流的华人，在泰国社会各具特色，形成一个多元的泰华社会。

老华人及其后裔，是泰国最大的华人群体，以潮州人为主。他们在泰国生活了两三代以上，持泰国国籍，普遍与泰人通婚。第二、三代华人后裔的长相虽还具有华人的特征，但其他方面已经完全融入当地，与一般泰国人无异。

泰北的中国老兵，是非常特殊的华人群体。国共内战后期，国民党部队93师被击败，退居泰北，后来协助泰国平定了北方的骚乱，获泰王颁赠泰国国籍，从此在泰北一带安居乐业，繁衍生息。他们以云南人居多，几乎都已有泰国国籍，不少人也与泰人通婚。泰北华人大多聚居在一起，因此将云南文化和特色保留得非常完整。

至于台商和中国新移民，则是带着投资的动机移居而来。台商更早登陆泰国，大多投资于工商领域，如餐饮、旅游、科技业，或设厂发展制造业。中国新移民，则在中国开放之后，纷纷涌入泰国进行投资，涉猎领域相当多元，包括科技、化工和制造业等领域。

不管是台商还是新移民，他们大多拥有不错的经济实力和 cultural 水平，当初都是为了挣钱而来。但逗留的时间一长，他们往往爱上了泰国的多元与民主。许多人在此住了一二十年，始终舍不得离开，他们已渐渐将泰国当成一个避风港。有不少人干脆就在此安家落户，与当地人通婚，加入了泰华社会大家庭。

经济开发先驱

从移民变成国民，有些华人的民族特质逐渐淡化，但社会地位却获得提升。在此开枝散叶的华人，一般以家族生意起步，凭血缘联系铺下商业网络，在东南亚创造了经济奇迹。难怪有人说，华人是泰国资本主义的先驱。

泰国华人早期从事大米贸易，之后跻身新兴商人阶层，大大刺激当地的商业发展。凭着多年的从商经验和雄厚资金，华人至今仍在工商界扮演着主导的角色。

全国十几家银行中，超过三分之二是华资银行，泰国规模较大的盘谷、大城、京华、泰华农民等银行，主要股东都是华人。此外，在商界呼风唤雨的泰华不胜枚举，包括曾获泰国一等白象勋章的金融大王、盘谷银行总裁陈有汉博士，以及碾米业大王黄作明、保险大王马灿雄、鳄鱼大王杨海泉、林业火锯大王陈卓豪及泰国橡胶种植业巨掌许心美等。

泰华经济并非成于朝夕之间，而曼谷唐人街，见证了华人的经济成长和转型。

曼谷唐人街是泰国最古老的商业区，由三聘街（Sampeng）、耀华力路和石龙军路（Charoen Krung）3条主要街道组成，外加几十条围绕着主街道的小街。这些纵横交错的小街，大多以行业来命名，如布街、童装街、米街、咸鱼街、蚊帐街、打锡街等。许多华人老店铺，都在这里经营了好几代，残旧的老屋诉说着华人走过的历史。

密密麻麻的中文招牌、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摆满摊档的走廊跟络绎不绝的人潮，共同构成了唐人街繁华的景象。

如今，唐人街的热闹依旧不减当年。耀华力街上，三五步就看到华人开设的金行，百年老字号比比皆是。泰人喜欢买金保值，从金行的兴旺便可以看出端倪。当时尚女性嫌黄金俗气，纷纷转戴白金饰物时，唐人街金行的人潮却依然络绎不绝。诸如金链、耳环、手镯、等金饰都深受欢迎。

除金店外，唐人街还有数不完的华人钟表店、中药店、餐室、杂货店等。店铺大多保留了残旧的原貌，却焕发勃勃生机。华人店铺一般不大，货物从地面排到天花板，华人“物尽其用”的本色可见一斑。令人惊奇的是，老板总能在杂乱拥塞的环境中，第一时间找出顾客想要的东西。

唐人街上许多店铺，都是老一辈华人奋斗多年的成果。如今，年轻一辈都已走出老街，足迹踏遍全国。第三、四代的华人，有些还传承父业，但更多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纷纷投入金融、科技、服务等领域。

华人当中也不乏爱挑战、思创业的年轻人。这群新崛起的青年才俊，不像父辈那样，局限于家族生意或传统行业。他们另辟蹊径，积极投入地产开发、汽车制造、出口贸易、旅游、酒店、科技、零售等新型行业。

另一些年轻人，则将家族企业打理得有声有色，通过先进的管理方式突破瓶颈，把企业重新定位，式突破瓶颈，把企业重新定位，携带巨资，往泰国设厂发展成衣、五金等制造业，均取得不俗的成绩。

此外，泰华在政治舞台也很活跃，历任泰王总爱委任华人为大臣。担任过总理或副总理的华裔，计有阿南、差猜、素金达、披猜、挽限、川立沛及前首相达信等，曼谷几任的市长，也都由华人来担任。

- 历久不衰的唐人街，车辆和人群川流不息。
- 华人开创了泰国的彩票行业，图为唐人街上售卖彩票的摊档。
- 唐人街上售卖干货的店铺。
- 泰国曼谷有一长约50公尺的“演说街”（Thanon Mangkon），为孙中山1908年到此宣扬革命思想的历史遗迹。
- 华人每年的春节庙会活动，泰国公主诗琳通都会前来参加，操一口流利华语的她极受爱戴。此外，耀华力路口的“圣寿无疆”大牌坊，也是由她亲手题赠。

共聚天伦享美食

泰国各省都有华人居住，但主要集中在城市里。“动感之都”曼谷人口密集，超过半数的居民拥有华人血统。走在街上，迎面而来的多是熟悉的华人脸孔。纯华人一般拥有较白皙的皮肤，样貌相当容易辨认。中泰混血儿则有更多泰人特征，如皮肤较黝黑，华人特征较难察觉。

这是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对多元、新颖甚至奇异的文化都能兼容并蓄，但又遗存了亚洲社会的保守风气。

在这独特的氛围下，华人打扮时尚入流却绝不暴露，在公共场所的举止都很有分寸。华人平日多用泰语交谈，语气温和，与一般的泰国人没有两样。

泰华社会中，出身小康者居多，但家财万贯的富豪也大有人在。有人说：“泰国是块好福地，消费低廉，赚钱容易，发达的梦想绝非遥不可及。”只要肯努力付出，华人一般在十年之内就能住洋房、开大车，家中还有佣人服侍。泰国的房产价格合理，多数华人都拥有个人的产业。

几百年来，中泰文化早已水乳交融，连华人、泰人的家居风格，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泰国，人民对“全民偶像”泰王极为尊敬，华人也不例外。他们家里未必会挂上传统的对联或山水画，但泰王的照片、海报，或其他印有王室徽章、肖像的装饰品却少不了。由于大多是佛教徒，华人也爱摆设佛像、佛珠，甚至会在风水方面下工夫呢！

与泰人家居有所不同的是，华人保留了供奉土地公及祖先的习俗。主人家是否有华人血统，一进门就能看出端倪。大部分华人家庭，对传统信仰、习俗都相当重视。他们一般会在客厅里安置土地公神龛，临近天花板处则摆放祖先的牌位，早晚按时上香。即使在海外生活了好几代，饮水思源的华人仍希望子孙能通过种种传统习俗，如春节酬神祭祖等活动，牢记自身的根源所在。

对华人来说，泰国就是“美食天堂”。无论是泰国餐、传统中餐，还是各国料理，华人都无法抗拒。每逢周末假日，华人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身影闪现在泰国各处的大小餐馆。不管是洽谈生意、家人团聚、朋友聚会还是情侣相会，都少不了满桌的佳肴美馔。

受泰人饮食习惯的影响，当地华人的口味也开始变重。他们不但嗜辣，也对泰式酸辣冬炎汤、凉拌木瓜沙拉等酸咸滋味非常喜爱，就连吃起中餐，也不忘拼命加上辣椒粉或辣椒。不过，曼谷华人特别嗜甜，总是潇洒地在中式面汤或一般食物上，撒下大把白糖。此外，华人传统美食，如猪脚饭、清汤面、叉烧烧肉等几乎随处可见，作为高级食材的鱼翅和燕窝，更是获得华、泰人民一致认同的珍品。

在曼谷唐人街的三聘市场，可以很方便购买到中餐食材，选择也相当齐全。泰国的华人家庭，一般还是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规矩，由太太负责全家人的起居饮食。她们的烹调手艺，主要传承自母亲，因此保留了不少家乡风味的菜式，同时也会烹制传统的应节食品，如端午节的肉粽、中秋节的月饼等。

- 许多华人的客厅里，都设有常年供奉的土地公神龕。
- 泰国潮州人的猪脚饭很有名，广受国人及游客欢迎。

华教迈入新纪元

在曼谷街上，中文招牌处处可见，会让人有一种中文十分通行的感觉。不过，当你真用华语跟当地华人交谈，却会迎来一脸的错愕。

其实，泰国会说华语或能看懂华文华人非常少，讲华语的大半是年过半百的长辈。华人早已经融入泰国社会，泰语说得比华语还溜。年轻一代的华人，多半对华语一窍不通，而第三、四代潮汕人，多数也已经不会说潮州话了。

华语会在一代代华人的生活中消失，与泰国的教育政策息息相关。

自1930年代开始，基于政治的因素，泰国禁止学习华文。原有的300多所华文学校，在禁令颁布后无法公开教授华文，华人只好偷偷开办华文补习班。二战之后，泰国政府采取统一政策，推出泰语教育，以泰语为第一语言，英语为第二语言。

在一片凄风苦雨中，华教在泰国没法修成正果，华文补习班几十年来，始终无法重振声威。直到1992年，中泰恢复友好的关系，华教才开始露出曙光。

如今，泰国政府积极推广华文教育，华文正式享有与英、法、德、日等外语教育同等的地位。小学华文从过去的4年级，改成授课至6年级，华文也成为中学外文的选修科之一。国内著名大学，如朱拉隆功大学（Chulalongkorn University）等，都开办了华文专业，以作为招生的卖点，并培育了一批精通华文的硕士生。

另一方面，华文补习学校也与日俱增，泰国76个一级行政区的华人社团所开设的华文补习学校、夜校、培训班、华文讲座等不胜枚举，其中东方文化书院的规模最大，属于个中翘楚。

由于精通华文的人不多，致使泰国华教面临师资短缺的严重问题。清莱的皇太后大学（Mae Fah Luang University）成立了“泰国华教促进会”，举办华文师资培训班，并计划在曼谷开办一所华文师资培训中心，以期能彻底解决华文师资问题。此外，基于师资问题的紧迫性，泰国华文民校协会也屡派教师赴中国培训。

泰国华教能否扭转乾坤开创一片天，令人关注，毕竟在许多华人社群中，泰语已成为日用语言。尽管上了华文学校，但由于缺乏使用华语的大环境，许多毕业后的华人子女，华语还是不太流利。在这里定居多年，泰语早已取代华语，根深蒂固地渗入了泰国华人脑海深处。

现今，除了大量增加的中国游客，数以万计的华人新移民，也为泰国华文教育带来新契机。如果华人新移民的人数不断增加，甚至超过泰化的华人口，那么华文教育的重生指日可待。此外，华人家庭开始重视孩子的华文教育，对泰国华教发展而言，也是一次重要的转机。

- 直到今天，泰国的商家、政要主要还是潮汕人。据统计，泰语中的外来语，超过300个是用潮语发音，如“耀华力”、“新正如意”、“食斋”等。泰国潮汕人“称王入相”，举国上下充满“潮味”，堪称“海外潮汕”。
- 华人的后裔和道地的泰国人一起在潮州中学开设的中文班里学习。
- 泰华社编辑出版的汉语教科书，多以中国汉语教材为范本。

华报雨后见曙光

过去，中文报刊是华人和泰国主流社会之间的沟通桥梁。

然而，随着华人逐渐融入泰国社会，中文报刊的存在价值备受考验。泰国目前拥有6家中文日报，即《世界日报》、《星暹日报》、《中华日报》、《京华中原联合日报》、《亚洲日报》和《新中原报》。这些中文报刊，大多拥有超过30年历史。除了《世界日报》将读者群锁定为新移民及台商之外，其余5份报纸的主要读者都是老华人。

这6家报章的总销量，目前大约只有6万至7万份。这么小的市场，同业间的竞争岂不是更激烈？大部分报人认为，竞争还谈不上，大家眼前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提升市场需求，让中文报继续生存下去。

当地的泰文报纸，都用国内新闻来当头条，而中文报章却以国际新闻为头条，弥补了泰国报纸内容上的不足，固定的读者几乎都是老华人。他们仍抱着落叶归根的心态，非常关注中国的动向，希望通过华文报获取更多相关信息。至于年轻华人，由于强烈认同“泰国人”的身份，因此对泰国的关心甚于中国，一般只选择泰文报或英文报。

除了读者不多，中文报业也面临新闻从业人员青黄不接的问题。

华文教育停滞了数十年，导致中文新闻从业人员出现巨大的断层，报馆都靠老报人在把关操持。中文程度较高的泰北华人是报馆的生力军。

近年来，新移民不断涌入泰国，稍微缓解了人才短缺的问题，加上中泰密切合作，华文教育逐渐受到重视，必定进一步推动中文媒体的发展。报人们普遍认为，中文报业应该把握良机，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

- 泰国中文报的读者群没有显著增加，且年龄偏高。

社团林立系华社

华人和社团的关系可谓唇齿相依，华人社会的发展靠社团的扶持，而社团的壮大与否，又取决于华人事业上的成就。

泰国的华人社团很多，最久的达百年历史，但大多数都是在二战之后才成立的。它们大致分为5大类，即乡土团体、宗族团体、慈善团体、宗教团体和商业团体。

泰国九属会馆是一个团结乡亲、凝聚泰国华社力量的最重要的社团。它由潮州、客家、广肇、海南、福建、江浙、台湾、云南和广西9个会馆组成，成立时间各不相同。历史最悠久的广肇会馆，已有超过120年的历史；而最年轻的广西总会，成立还不足30年。目前，人数最多的潮州会馆，担负着领导九属的重任。

泰国中华总商会算是最高的侨团机构，负责推动泰华工商界的团结与合作，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除了老华人，新移民和台商也成立了不少组织。泰国华人青年商会凝聚了年轻有为的新移民企业家，彼此相互扶持以提升竞争力。台湾商人也成立了台湾总商会，促进台商在泰国的发展。

深受当地认同的华人慈善团体，更为所有需要协助的泰国公民，带来了无尽的温暖，其中以报德善堂、明满善堂为代表，积极推动慈善、公益活动。

尽管大部分华人已经同化，但泰华团体却想方设法培育出新一代的接班人，以继续维持、发扬中华文化与精神。

- 孙中山先生创办的中华会馆，突破血缘、地缘等藩篱，只要是华人都能成为会员。

虔诚礼佛亦拜神

宗教信仰是泰国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泰华亦然。华人以佛教徒居多，基督徒和回教徒所占比例极少。曼谷的唐人街有一座著名的华人庙宇——龙莲寺，长年香火不绝，信徒无数。

此外，藏身于大街小巷中的华人寺庙如关帝庙、观音庙等，也有不少膜拜的信众。泰国的寺庙多如繁星，华人不怕找不到上香之处，只愁没时间走访所有的寺庙。

扶老携幼前往寺庙烧香拜佛，可说是华人全家参与的活动。在泰国的寺庙里，随处可见衣着前卫的年轻华人，携带着供品如鲜花水果、各色糕点、蜡烛、香枝和金银元宝等，虔诚地在烧香礼佛。

每逢喜庆节日或佛诞，庙里更是香火鼎盛、人潮涌动，袅袅的白烟，缭绕着男女老幼虔诚的心。祈福的、还愿的、捐钱行善的人群，整日络绎不绝。

华人大多为佛教徒，但潮汕人由于受到祖辈影响，对传统的民间信仰也很虔诚。除了礼佛，他们也崇拜神明、神话或历史人物，如八仙、林默娘、孙悟空等。从商的华人一般供奉财神，祈求大发利市；有些则崇拜关公，希冀团结乡亲，把忠孝节义的精神传承下去。

- 泰国华人崇拜神明的态度十分虔诚。

古风民俗一脉留

泰华社会多元丰富，一方面融入本土的风俗人情，另一方面又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和习俗，真可谓百花齐放，特色鲜明。

在华人密集的曼谷，最热闹的日子并非在春节期间，而是在春节前一个月左右，大家开始办年货的时候。唐人街一带，放眼尽是排山倒海的人潮，以及琳琅满目的年货，诸如对联、金元宝、假红炮、十二生肖装饰品等，四处一片红彤彤，令人目不暇接。小贩们还售卖各色引人垂涎三尺的应节食品，如芦柑、糕饼和肉干。

办年货的人太多，唐人街经常被挤得水泄不通。

然而，春节前的繁华景象却在春节期间消失了。曼谷华人说：“虽然春节不是法定假日，但华人大多会休假，曼谷街头因此显得特别冷清！”留在当地过年的华人，则会相互拜年，举行家庭聚餐。

若身在距离曼谷北部约300公里的北榄坡（Nakhon Sawan），则更能够体会到春节的热闹气氛，因为这是华人春节习俗保留得最完好的城市。每年春节，这里都会举办游神盛会，至今已有七、八十届了。活动内容洋洋大观，有中国民间艺术表演、舞狮舞龙、武术表演等，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色。

除春节外，华人也庆祝端午节和中秋节。在曼谷的唐人街，常年都买得到粽子，逢端午佳节更是不在话下；说到中秋节，早期唐人街一带，家家户户会在农历八月十五设好神坛，摆上祭拜月亮娘娘的供品，而如今在曼谷的各大商场，中秋前后都设有“月饼专卖柜台”，推出传统及其他口味的月饼，包装特别讲究。

话说回来，其实泰华社会，对泰国的传统节庆更感熟悉。许多土生土长的华人，从小就在当地度过大大小小的泰国节庆。例如元旦当天，华人会依当地习俗，前往9家寺庙去膜拜，水灯节也会一同到河边去点水灯祈福。但最热闹的，莫过于泼水节这个举国欢庆的节日。每逢其时，在炎炎的天气下，华人泰人不分你我，互相泼水祝福对方，体现出华人与泰人之间深厚的情谊。

- 春节前，唐人街挤满了办年货的人潮。
- 唐人街售卖春联和春节饰品的摊档显得喜气洋洋。
- 元旦当天，泰国佛寺挤满前来膜拜的信众。

其他资讯

泰北有个华人村

在泰国北部，素有“泰国香格里拉”之称的清莱府一带，有一群华人在山林里居住超过半个世纪。他们是当年滞留于此的国民党93师军人及后裔。这里仿佛是一个中国云南人聚居的部落，村子主要由云南人组成。近年来，也有不少台商来这里投资和定居。

清莱府最有名的华人村叫美斯乐（Mae Salong），绿浪起伏的山头，种植着品质优良的茶叶和蔬果，人们不再需要扛着枪过日子，他们从事种植或旅游业，生活安定平静。跟城市华人相比，泰北华人大半仍过着清贫的生活，房子简陋。不过近几年，茅草房都改建成洋灰房，水电也已一应俱全。

邻里之间都说云南话或华语，中文在这里比泰文更通用，华人经营的店铺都有中文招牌。此外，泰北有80多所中文学校，孩子们可在闲暇时间，到学校提升自身的中文水平。尽管得不到政府的认可，但中文学校却在华人的支持下走到今天，造福了不少华人子弟。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往城里跑，掌握中、泰双语的他们很快就能找到工作，许多人当起华裔的助理、翻译或中文报馆的编辑、打字员等。

泰北华人热爱中华文化，保留了大量的云南人生活习惯和礼仪。他们用碗筷吃着道地的云南菜，热烈庆祝华人的喜庆节日，并遵守传统的中华风俗习惯。富丽堂皇的云南会馆，正是他们自豪的展现。为了让后人记得祖辈的付出，以及泰王和国家对华人的恩惠，他们在美斯乐建立了一个泰北义民文史馆，让泰北华人的历史永远流传下去。

扶贫济弱的报德善堂

华人到寺庙烧香拜佛之外，另有一桩绝不会忘记的事，那就是捐款。行善首要在心意，善款多寡倒是其次。泰国崇佛的华人大抵相信因果，毕竟“须念世上苦人多”呀！

原本供人烧香膜拜的寺庙，也成了凝聚华人力量的场所。寺庙毅然办起了慈善事业，并逐渐发展为善堂。

报德善堂是泰国规模最大、声望最隆的慈善机构，成立至今已近百年。1910年，泰国侨领郑智勇与12名华人在唐人街共襄义举，购地修盖了大峰祖师庙，取名“报德堂”，后改称“暹罗华侨报德善堂”。早年来到泰国的华人普遍贫困，那不幸客死异乡的，死后甚至无人领尸，善堂便负起了收埋无名尸骨的责任，后来还开设了华侨医院，造福同胞。

报德善堂初期只用了2千泰铢注册资金，如今拥有的资产接近数十亿泰铢。善堂能有今日的规模，除了热心华人的支持，也不能不提第二任掌舵者郑午楼的热心灌溉。郑氏将企业管理的丰富经验运用到慈善事业上，将善堂办得有声有色。除了医院，还设有华人义山及华侨崇圣大学，大学还开办中文系。善堂的成就，赢得了当地一致的肯定和赞扬。

泰华拥有数百个大小不等的慈善团体，名声传遍东南亚各地。多年来，它们在泰国社会修桥铺路、创办学校、提供医药服务及筹募善款。这种无私的付出，不但令华族、泰族之间的隔阂消弭于无形，更促进了彼此的情感交流。

- 长年香火鼎盛的报德善堂，是泰国最著名的华人寺庙和慈善机构。
- 泰国华人乐善好施，报德善堂不乏善心人士的支持。

结语

佛教的慈悲和宽容，似乎渗透入每个泰国人的心灵。八方云集的朋友，不分你我，安然共处于这片气氛和煦的土地上。

有人说，这里的华人已经被泰化。但从另一面来看，华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影响力，何尝不是深入泰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曼谷，这个华人最密集的泰国城市，不正每天展现着华人社会强盛的活力吗？

当许多海外华人感叹孤儿命运之际，泰国华人，却已经在这“微笑之邦”中谱写出一段又一段美好的家园故事。

寮国

引言

寮国有“万象之国”的称号，北临中国，东与越南接壤，西以湄公河为界和泰国相隔。它是印支半岛上唯一的内陆国家，80%的国土是山地和高原，森林覆盖面积很广。如此地理环境，造成寮国交通不便，开发起来更是困难重重。因此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它较为落后贫穷。

不过，这里的人民却出奇地乐观知足，68个民族融洽相处，安居乐业。华人人口排在三大少数民族——越南人、柬埔寨人和缅甸人之后，但他们对寮国的经济却贡献良多，并且与寮国人感情融洽，广受社会欢迎。

1997年，奉行社会主义的寮国加入东盟，逐步走向市场经济，吸引着世界各国的企业前来投资。为迎接2009年的东南亚运动会，它更是全力发展硬体设施，振兴经济。

寮国，似乎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华人移民简史

根据记载，在数世纪以前，华人已经来到寮国。他们翻山越岭从中国云南以及广西边境进入寮国。

那时，寮国境内经济不发达，只有一些被称为“马帮”的华人商队，每年2月会来到这里经商，通常只逗留一两个月后就离开。

19世纪末，华商开始从越南及柬埔寨移居到寮国来，并且在琅勃拉邦（Luang Prabang）和万象建立家园。

1893年，寮国成为法国保护国后，殖民政府为了开发寮国，于是颁布种种优惠政策以吸引华人移民前来，例如允许他们开垦土地、可自由出入境、出入口货物皆可免税等。当时不少本已离去的华人，因此卷土重来。

二战过后，寮国于1945年取得独立。为了解决国内资金的问题，政府大力鼓励外侨投资。这时，华人移民的数量自然略有增加。

然而，1962年寮国发生政变，不少华人所开设的工厂均被没收。稍后，华人重整旗鼓，并于70年代初达到了巅峰时期，估计当时的华人人口至少已达十万人之多。

那时的华人大多数相当富有，他们主要居住在接近泰国的湄公河流域，过着安定舒适的生活。与此同时，华人社团纷纷成立，华文教育也迅速发展，当时共建立了20多间华校，学生人数少则数百，多则数千人；而华文报刊也随着出版。

1975年到1984年之间为寮国华人社会发展的停滞期。这期间，由于寮国与越南结盟，1979年又跟随越南公开反华，导致中寮关系紧张。当时的寮国政府甚至没收华人的财产，封闭工厂及商店，只允许华人进行小本生意，华文教育以及华文报刊亦遭到全面禁止。

当时有九成华人纷纷逃往泰国、印尼和新加坡，或转往欧美各国，其中不乏财力雄厚者；而留下来的，则大多数是幼童或中老年人。在大逃离事件发生后，华人人口遂锐减至5千多人。

而今，每当提起这些陈年往事，寮国的华人总是轻描淡写。许多年长者觉得，寮国华人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这里并没有发生过真正大规模的排华行动。即使是在中寮关系最紧张的时期，善良的寮国人与华人依然和睦相处。

到了1986年底，中寮终于恢复往来，为当地的华人华侨带来了新希望。

近20年来，随着两国之间展开亲密的邦交，许多中国的创业人士及企业家，纷纷迁移到寮国。

此外，不少东南亚华人以及少数早年离开寮国的华人，也都选择到这里发展。华人人口的数量因而再度上升，使寮国华社又迎来了一个春天。

- 寮国华人多数为生计奔波，几乎无人愿意参与政事。有“华人之光”称号的华裔凌绪光（宋萨瓦·伦萨瓦），是寮国政界凤毛麟角的华人之一。他曾出任寮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又当选为寮国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当今生活风貌

引言

寮国华人有这样的说法：万象以南，多为广东潮汕人；万象以北，则是云南人的聚集地。

除了潮州人和云南人，寮国也有客家人、广府人、福建人和海南人。据万象中华理事会登记在册的华人大约为3万人，其实边远山区的华人和流动性大的新移民却无从统计，确切人数不得而知，据估计全国华人人口超过十万。寮国华人主要居住在万象、百细（Pakse）、琅勃拉邦和沙湾拿吉（Savannakhet）等城镇。

如今，超过95%的老华人已经取得寮国国籍。他们和寮国人的通婚率高达90%以上，在第三、四代的土生华人中，半数以上都是中寮混血儿。寮国的经济发展缓慢，但大部分华人都过着安稳的生活。这里财力雄厚者并不多，华人多数是投资于中小型企业、经营小商店的小老板。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多在私人公司或政府部门任职。

1975年的大逃亡事件，使华人社会元气大伤。但留下来的华人，并没有放弃中文教育和中华文化，但同时也吸取教训，更开明地接纳当地文化，淡化了那浓郁厚重的华人色彩。

近几年，中国和寮国之间经济往来频密，中国在寮国投资的发展项目越来越多，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企业家、商人、技术人员陆续到了寮国，这个群体人数不断增长，当地人把他们称为“寮国新华侨”。他们不仅为寮国经济注入活力，也把丰富的中华文化带来这里。

健康生活的哲学家

万象是寮国华人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它虽为一国之都，看起来却像一个小城镇。这里没有摩天高楼，城中最讲究的建筑物就是庙宇。市内有许多老店铺，泛黄的招牌上偶尔可以见到熟悉的方块汉字。由于是内陆地区，万象有一股挥之不散的沉闷气息。无风的下午，一切看起来是静止的，仿佛连时间也睡着了。

没错，这是21世纪的寮国，但这里的人们，仿佛依旧过着上世纪的生活。寮国华人保持着一颗单纯的心和淳朴的生活方式。他们并不一定受过高深教育，但谈起生活，个个都是哲学家。他们走路悠然自在，脸上也常常挂着笑容。

近几年来，世界各地都在拼命推广“慢活”、“有机饮食”等健康概念，或许这群寮国华人不曾听过这些新颖名词，但他们却都是健康生活的实践者。一名华人说：“这里的蔬果都没有农药，牛羊猪等都是用天然饲料喂养，可以放心吃。我好几年都没生过病了！”

寮国医疗设备虽不发达，但华人一般都非常健康长寿。这没有污染和压力的生活环境，一直是华人深爱寮国的原因。

寮国华人虽不富裕，但日子过得写意；生活作息很有规律，睡得早，也起得早。一般华人店铺在清晨六七点开始营业，到傍晚六点左右打烊。睡午觉则是寮国人不成文的规定，不少华人商店也墨守陈规，在中午休息一段时间。因此，午后的寮国，总是特别宁静。

大部分华人的商店都是家庭式经营，因此休假时间较自由。一般的商店都会在星期日休业，但是有些华人商店在星期日也照常营业。

虽然寮国华人努力上进，却也甘于平淡，对物质不会过份要求。他们既不需要住大洋房，也不喜欢开大房车。永珍善堂的林主任说：“大部分华人像寮国人一样，骑着摩托车自由穿梭在大街小巷，遇到熟人便挥手打个招呼，或者停在路边闲聊起来。”

寮国华人社会中甚少出现年轻人不婚或不生育的现象。华人的家庭观念浓重，成家立业的秩序从不颠倒。寮华青年在25岁左右，就开始组织家庭。生儿育女，打造幸福家庭是他们最大的志愿。因此，许多看起来还像个大学生的年轻男女，其实已为人父母。

寮国地价便宜，买房子或租房子的负担都不大。但孩子成家后大多都会与父母同住；经济能力较好的家庭，几乎是整个家族住在一起。

在繁忙的大城市，很多人只能在每年除夕和家庭成员团聚，一起吃一顿年夜饭。但在寮国，华人的家庭成员几乎天天齐聚在餐桌上；尽管吃的是粗茶淡饭，但他们享受的却是天伦之乐。

每逢周末或休假，则几瓶冰凉的寮国啤酒，就可以陪伴许多华人和寮国人度过一个悠长的下午。这里娱乐活动不多，年长的华人常常和三五好友一起喝酒、聊天、下棋或打球；而年轻人则喜欢相约一起逛街、看电影、唱唱卡拉OK。

许多华人的亲友在移民热潮时都已经移民到法国、美国、澳洲等地，因此每逢假期，一些寮国华人也不时会飞到国外探访亲友，小住一段时间。年届80岁的老华侨郭玉兰女士说：“虽然不少寮国华人都曾走访国外，甚至周游列国，但是他们仍然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寮国一样，让他们这么轻松地过日子。”

华人与寮国人通婚的现象，比一般华人之间结合的情况还要普遍。在华人的生活圈子里，他们与同族接触的机会太少。从校园到社会，华人身边接触到的几乎都是寮国人。华人能说流利寮国语，彼此拥有同样的成长背景，加上寮国人天性热情善良，成了华人最好的朋友和人生伴侣。因而目前第三、四代在寮国出生的华人，多半是中寮婚姻的结晶。

在许多中寮通婚的家庭中，华人在饮食方面已融入寮国特色，他们的三餐都非常简单，以蔬菜为主。中寮混血儿许文华说：“只要一点辣椒，一些青菜，配上一点糯米饭，就是我们的一餐了。”虽然喜欢刺激的年轻人认为寮国菜比中餐更吸引他们，不过，年长的华人始终认为中餐更为温和可口。

早在移民初期，人数众多的潮州人就把许多传统的潮州美食带来这里。如今，不少华人后代仍然经营着祖传的潮州鸭肉面，或者售卖中式牛肉面、云吞面、叉烧面等等。华人的小食如包子、豆花和豆浆，也成了寮国社会最受欢迎的早点和夜宵。

在佛国中礼佛拜神，不忘祭祖

寮国是一个佛教国，人民多为虔诚的佛教徒。这里的大街上佛寺林立，许多寮国少年都出家成为僧侣，因为寺院里会提供免费教育，这是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最需要的福利。他们大多在学满后还俗，利用所学专长，在社会上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华人一般来自小康家庭，甚少人因为经济压力出家，不过他们依然像寮国人一样，尊比丘、礼佛像。每天清晨，不少华人会布施给托钵的僧侣；每逢佛诞等节庆，华人也会到寺庙浴佛。

除了佛教，华人也奉行传统信仰。在许多华人家里或店铺里，都可以看到置放在墙上的祖先牌位，而地面上则有土地公；此外，一些华人也供奉财神和泰国神像。

虽然寮国处处有佛寺，但华人依然建立了供奉传统神像的庙宇。这些庙宇的屋檐、屋顶、圆柱上，少不了龙凤雕刻等具中国风味的设计。在万象有两间华人庙宇——福德庙和伏波庙，平日前来烧香的人不多，但每逢节庆或者华诞，信徒们就会把庙宇挤得水泄不通。华人还通过庙宇发起了慈善基金、福利金等活动，来扶贫济弱，回馈社会。

提起华人传统节庆，当地人最熟悉的是清明节。寮国人死后一般都会进行火化仪式，之后将骨灰撒落河中或安放在寺院里，而寮国华人则遵行土葬。每逢清明节，华人总会扶老携幼，带着食物、香烛、纸扎等供品，到郊外的坟山祭拜先辈。仪式过后，一家大小便席地而坐，在先人的墓碑前，边吃边闲话家常。原本荒凉的坟山，这时候充满了生气。

除了清明节之外，琅勃拉邦的华人也仍坚持春秋二祭的习俗，只不过他们把秋祭改定在每年冬至。冬至的早晨，雾色还未散尽，琅勃拉邦的新旧义山已经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中华理事会引领着当地华人和寮国人一起进行公祭活动。虽然没有吃汤圆过冬至节，但他们却以另一种方式，和阴阳相隔的家人团圆。

- 举行公祭时，祭品除了传统的酒肉、水果、鲜花外，还有寮人最爱的长面包。
- 选择火化的华人，把骨灰埋在传统的寮国骨灰塔，不过华人骨灰塔附加了刻上中文字的石碑。
- 寮国共有7座华人义山。每逢清明节，坟山人头拥挤，祭祖结束后，亲友在坟前野餐，热闹无比。

华文学校成“国际学校”

在寮国，寮语是最通行的语言。另外，泰语在当地也非常实用，和泰国货币一样，在寮国处处通行，是寮国华人掌握得最好的第二语言。华语因在寮国使用的机会太少，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不少50岁以上的华人，曾受过良好的中文教育。今天，虽然他们的华语因为少用而生疏，但是他们对汉字的热爱还是不减当年。这些爱看中文书、听华语歌曲的华人，都坚持把孩子送到华文学校学习。许多不谙华语的华人、寮国人和其他国籍人士，也乐意送儿女到华校就读。因此，有人把寮国的华文学校形容为“国际学校”。

寮国目前共有五所中文学校，大都创办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们是万象寮都公学、琅勃拉邦市的新华学校、甘蒙省（Khammouan）他曲（Thakhek）的华侨学校、南部沙湾拿吉的崇德学校以及百细市的华侨公学。长期以来，寮国政府对华文教育不闻不问，让其自生自灭。近年来，华人人数大量流失，要维持华校也不容易。

五所华文学校，全部隶属于寮国各省的中华理事会。从筹集办校基金、争取地方政府对华校的支持到解决师资或教材问题等大大小小的事项，都由理事会派专人负责处理。

这些学校中，位于万象的寮都公学校成功实行了华寮双语教育政策，学生人数多达千人，为五校之冠。学校里教授的科目包括华文和中小学的数、理、化和英文等科目，都采用中国中小学教材。与此同时，华文学校也教授寮国中小学的必修课程。

在寮国的中小学校统考中，寮都公学的学生一直名列前茅。这骄人的成绩成了学校的活招牌，吸引很多政府公务员以及在寮国经商的外国人，争相把孩子送进寮都公学就读。

然而，华人人数不多，许多省份的华校都陷入生源短缺的困境。以琅勃拉邦的新华学校为例，校内近700名学生中，拥有华人血统的学生竟不足1%。

为了解决生源问题，学校只好对教学政策进行修改，教学媒介语从华语改为寮语。华文和英文一样，被列为外语课，每天各有一小时的学习时间。

一般寮国华人对教育都十分热心，愿意慷慨解囊来分担学校的经费。学校更为贫寒家庭的子女提供半免或全免学费，让他们可以安心学习，完成学业。

经济能力较好的华人家庭，多会在孩子高中毕业后，把他们送到西方国家学习。

近年来，到中国升学渐渐成了另一股风气，其中北京和广州是大部分学生的首选。华文学校也为成绩优秀的学生提供留学中国的奖学金，他们毕业后都会回返母校执教，将所学知识传授给下一代，也不断提升寮国华文教育的水平。

- 课堂上，华、寮、中寮混血的学生济济一堂，快乐地学习华文。
- 每天放学时，新华学校内传出童稚的中文“放学歌”歌声。

小生意中找寻安定人生

留在寮国的华人，野心不大。一盘小生意，一份安稳工作，已经让他们心满意足。

做生意，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寮国的华人，偏偏就少了“地利”的优势。寮国是内陆国家，山多又交通不便，让它长期以来都走不出经济困境。因此华人只能经营中小型企业，财力雄厚的大集团或机构寥寥无几。

1975年反华事件后留下来的华人，多半都是出于各种原因而无法离开。对于前景，他们虽感到彷徨无助，然而反过来看，市场上竞争对手已所剩无几，却也是一个大展拳脚的机会。许多原本住在万象以外的华人，都在那时候纷纷入城，伺机而动。

等到局势稳定后，华人或经营残存下来的小餐馆、谷物店与建筑公司，或投入新领域发展，比如汽车代理、电器代理等。许多后来成功的华人企业家，就是在这期间找到了他们人生的第一桶金。

自1997年寮国加入东盟，走向市场经济后，华人再次控制了建筑业与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在摩托车进口业、木材加工业与家私业方面，均有不错的表现。

目前，华商大多数为小老板，经营着各类小生意。实力较雄厚者，则投资于各种行业，如餐饮、金银、服装、日用百货、土产、酿酒、碾米、木材加工、汽油零售、汽车及摩托车销售、电器五金以及机械维修等。

随着旅游业兴起，华人也开始转向银行、酒店等方面发展。泰国、越南、柬埔寨的不少华人，也纷纷到寮国来投资。一些寮国华人与外来华商合作开发天然资源，如伐木与锯木业，也联营纺织、化学肥料、橡胶树种植、酒店及银行业等。

- 万象安康大酒店的老板李龙白手起家，现在是寮国成功的企业家。
- 当年从外省迁移到万象，这家万象唯一的华人西饼店一直坚持到今天，老板娘和女儿虽曾周游列国，但始终不愿离开寮国。

新移民带来新气象

如今，华人社会的结构，已经迈入一个全新的时期。

近年来，大批来自中国云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广西等省的新移民持着商业签证到寮国发展，估计人数已经突破十万人。新移民大多是由亲友引进，前来寮国做生意；他们中有的开档口做杂货买卖，也有的开店和办工厂。

在万象的三江国际商贸城和琅勃拉邦的中国市场里，触目所见的都是新移民商人。他们多数售卖衣服、五金、电器等商品，销售对象主要是寮国人和泰国人。他们一般都不算富裕，但三餐温饱。当中有些人已经在这里逗留了五年以上，但生活空间却只局限在市场里。

自寮国加入东盟后，旅游业成了寮国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原本万象市内只有几家门前冷落的潮州餐厅、泰国餐厅和越南餐厅，但随着旅游业的兴盛将市场扩展后，新移民赶紧把握时机，把各式各样的中华美食引进万象，似乎有意将昭阿努路和兴文路这两条华人商店聚集的唐人街，打造成中华美食天堂，以期让游客流连忘返。

除了那些售卖潮州鸭肉面和广式点心的老字号外，新移民更首创先河，将北京烤鸭带到万象唐人街，让吃惯烧烤鸭爪的寮国人，尝试鸭肉的新吃法。来自云南、四川和辽宁的新移民也陆续在寮国办起了餐馆，把过桥米线、田七气锅鸡、麻婆豆腐、重庆火锅和水饺等美食带进来。

中餐馆的主要顾客群，大部分是在寮国生活的华人、中国使馆人员、华人游客以及寮国的中上层社会人士。除了餐饮业之外，目前一些新移民也开始经营旅馆、卡拉OK厅和按摩院，发展日渐多元。

大部分新移民到寮国的目的都是为了创业挣钱，一旦赚够了钱就会离开这里，衣锦还乡。他们长时间拼命地工作，极少与寮国社会交流。

然而，寮国始终是一个会让人情不自禁爱上的地方。日子久了，一些新移民发现他们竟习惯了这缓慢的生活节奏，喜欢上这淳朴的民风。有些人更把一家大小接过来一起生活打拼，有些则干脆申请永久居留，正式加入寮国这个大家庭。

- 寮国唐人街上醒目的中文招牌。
- 继泰国盘谷银行和农民银行在寮国设立分行后，澳、泰、港、台和寮国的华商，联合寮国政府集资一千万美元成立万象商业银行。该集团旗下投资的项目包括寮国芭莎大酒店、友谊大桥免税店、法国标致汽车、万象国际开发公司等，协助寮国走向发展大道。

其他资讯

寮国华人舞出热情和自信

无论是华人结婚或中寮通婚，摆喜宴招待亲友，都是不能不遵行的礼仪。

寮国社会信奉小乘佛教，每年阳历11月末至1月之间，正好是小乘佛教的解夏节之后的宜婚旺季。这时候可谓请柬如飞雪，婚宴连场转，华人几乎每一天晚上都要赴宴。开店做生意的华人，都得提早打烊，以便准时赴宴。

一般寮国华人婚嫁，白天依然会进行接新娘、拜天地、敬茶等传统仪式，晚间则设宴招待亲友，宴会的仪式融合了华人与寮国人的文化。当地宴客少则数百人，多的话可达数千人，场面非常壮观。

寮国社会非常重视婚宴，宾客们都会盛重打扮。女士穿上传统寮国裙子，发型妆容和服饰搭配都费了不少心思。男士则穿上笔挺的衬衫或西装，皮鞋都擦得发亮。出席婚宴的男女老幼，个个都难掩兴奋之情，像是高中生要赴毕业舞会一样。

婚宴上最大的特色，就是少不了美酒、音乐和舞蹈，美食反而成了配角。寮国人是天生的舞者，全身细胞在音乐一响起就马上活跃起来。寮国华人对舞蹈的热爱和投入，更是令外人咋舌。当一对新人在众人的掌声中跳完第一支寮国舞蹈后，所有宾客便迫不及待地涌入舞池，在不停歇的现场乐队伴奏下，翩翩起舞。

华人通常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民族，不过在这里他们却学会了寮国人的豁达。他们不再含蓄，尽情地在舞池中释放热情。出席过寮国婚礼的人都可以深深体会到，寮国社会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华人和寮国人之分。这两个族群已经相互融合，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统合寮国华社的中华理事会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华人离开寮国之后，许多华人组织都已经消失。

如今，在寮国华人集中的五个省份里，中华理事会是唯一的华人组织。除了团结当地华人，它也为华人提供文化、教育、福利等方面的服务和帮助。在中华理事会服务的华人都属义务性质，只谈奉献而不问回报。

万象中华理事会称得上是寮国华人全国性组织，也是各地中华理事会的“老大哥”。该会除了团结华人并热心社会公益，也致力促进中寮友好关系。万象中华理事会属下除了有寮华公学之外，也设有永珍善堂、伏波庙、福德庙、妇女会、少狮团、校友会等机构和产业。无论在经济、教育、文化等各领域，该会都积极发挥华人的力量，促进寮国的社会发展。

今天，万象中华理事会不但在华人社会中广为人知，它也成了寮国政府和华人之间的沟通桥梁，同时也是中国大使馆和华社紧密联系的管道。

- 中华理事会属下的永珍善堂，积极协助社会贫困的一群。每年农历七月普渡盛会，该堂都会举办派发白米活动，充分表现了华人和寮国人之间的互助精神！

结语

寮国华人对居留地和人民，都拥有一份深厚的感情。许多在寮国生活了好几代的华人，虽然有能力强移民到国外，但是他们却宁愿留在这个内陆小国，过着朴实无华的日子。也许只有在这里真正生活过的人，才能感受到寮国无穷的魅力。无论男女老幼，他们都希望在这里悠闲自在过一辈子。物质不一定是快乐与幸福的保证，寮国华人早已经悟出这道理。他们将快乐融入生活，让生活回归本源。

柬埔寨

引言

柬埔寨位于中南半岛南部，与越南、泰国、寮国毗邻。它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建立了扶南王国，公元10至13世纪，是柬埔寨文明最灿烂的时代，也称为吴哥时代。境内湖光山色，景色秀丽，富有艺术气息的佛寺与古迹，使它赢得了“东方巴黎”的美誉。柬埔寨于1863年沦为法国保护国，直到1953年才独立建国。

自独立以来，柬埔寨的局势一直处于动荡的状况，政权更迭，战乱连年，直到80年代末才逐渐稳定。今天提起柬埔寨，除了马上令人想到举世闻名的历史古迹吴哥窟之外，还有骇人听闻的红色高棉恐怖大屠杀，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地雷场”。

柬埔寨的天然资源虽然富饶，几年前还发现藏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可是多年战乱，使柬埔寨沦为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国家长期依靠外援，人民生活极其艰苦，教育水平低落。

今天，这片正被开发的土地，充满着危机与商机。历经风雨的华人，能否如浴火重生的凤凰，展现其更为斑斓的羽翼呢？

华人移民简史

早在宋朝，就已经有华商到柬埔寨活动，那时候，华人被当地人称为“唐人”或“新唐人”。根据元朝使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1295年）所记载，当时柬埔寨境内已有不少华人旅居于此。

1405年郑和首次下西洋时，也曾经抵达柬埔寨沿岸港口，往后接踵而来的华人越来越多。

17世纪，为了逃离清政府的政治迫害，有更多的华南居民乘船南下来到金边。19世纪，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以及民不聊生的困境，人民被迫离乡背井，向南抵达柬埔寨。在柬埔寨成为法国保护国之后，亟需劳动力，因此吸引了大批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居民移居柬埔寨。20世纪上半叶，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军北伐、日军侵华等动乱，均是迫使更多华人移居柬埔寨的因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严格限制人民出国，移民浪潮才因此受到遏制。直到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政府允许国人出境，再次掀起了移民浪潮，涌入柬埔寨的中国移民至今未曾间断。

当代生活风貌

引言

柬埔寨现约有60万华人，首都金边有40万人左右，其他人口分布在公贡布省、马德望省、磅湛省、甘拉和茶胶等经济较发达的省份。金边市是华人口中的“潮州城”，那里有80%的华人是潮州人，潮州话是华人最常使用的方言。

今天绝大部分华人已入籍柬埔寨，很多华人家庭已迎来第三、四代。华人与柬埔寨人和睦共处，他们说柬语、听柬歌、吃当地食物，生活随遇而安。虽然华人的根已深扎在柬埔寨，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仍保留中华传统习俗，代代传承中华文化。

有人说，现在可算是华人处境最好的时期，因为机会处处，只要肯吃苦打拼，就能闯出一片天。

柬埔寨华人总算苦尽甘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似乎可以在他们身上获得印证。

从废墟中站起来

华人在柬埔寨的处境，起伏跌宕，命途多舛。

20世纪50至70年代，华人的处境较好，不过依然受到歧视，例如华人被禁从事某些行业。1970年，美国支持朗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政府，柬埔寨华人厄运正式开始。

朗诺掌权后，便以“散播共产主义思想”为由将华校和华报关闭，还鼓动排华情绪，导致华人首次遭到高棉人杀害。

1975年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后，展开消灭阶级和种族的行动，强迫城镇居民到乡下劳改。当时多是资产阶级的华人，惨遭拘捕和杀害，许多华人在下乡途中因饥饿、疾病、过劳而丧命。

近十年的战乱，不仅摧毁了柬埔寨，也导致华人人人口锐减。据调查，在短短3年8个月的红色恐怖中，华人死亡人数高达20万人，占死者总人数的一半。

1979年红色高棉政权垮台，劫后余生的华人战战兢兢地回到金边和各省份重建家园。昔日繁华的金边市，那时已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鬼城，十室九空，路上汽车绝迹。

历经连年战乱，华人成了惊弓之鸟，为求安全只好隐姓埋名，不敢张扬华人的身份，甚至不再说华语或方言，而一律使用柬语。

华人就这样“销声匿迹”，在柬埔寨社会沉寂了约20年。直到1989年，曙光才重新照射在华人身上。

1991年，西哈努克以国王身份重回金边，取消所有对华人的法定歧视和限制，让华人享有跟当地柬埔寨人同等的法律地位。从此，华人重新回到起跑线，以勤勉耐劳的精神从小生意做起，参与国家重建发展。历经苦难折磨的华人，反而被淬砺得更加坚韧不拔，更努力打拼。

一路风雨走来，这个国家曾经重重地鞭挞华人，在华人身上烙下伤痕累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昔日的伤痕逐渐消退。华人并没有瑟缩于过往那段令人战栗的“红色记忆”，而是紧跟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创造属于他们的未来。

战后的柬埔寨，政局逐渐稳定，国家推行经济开放政策，百废待兴。从90年代起，华人的地位渐渐回升，他们活跃地参与各种经济活动。

今天，华人在柬埔寨的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当地人眼中，华人往往具有“老板”的形象。八成的柬埔寨华人以经商为生，其中大部分经营传统的杂货铺和零售摊，大多是小本经营。他们有些在路边或市场里摆摊，有些则开设商店，售卖日常食品。

据说，当地不少成功的华商都是从市场摆摊中赚得第一桶金。“要在柬埔寨开店不难，营业准证很容易申请，营业税也不高。在中央市场向政府租用一个摊位，5年的租金不过是300美元。”在中央市场卖手表的林先生说。

除了从事传统的零售、批发和进出口生意，华商的触角也渐渐延伸到金融业、制造业、房地产等行业。此外，金边的中餐馆也多是华人所经营。目前约有500家中餐厅遍布柬埔寨，其中284家就坐落在金边。

不管开设的是零售商店、中药店、小吃店、餐厅，还是在市场里摆小摊位的华人，都是勤恳实地工作。

华人积极投入商业活动，使柬埔寨的经济一片欣欣向荣。近十年来，国家税收很大部分是来自华人公司、工厂和银行。

柬埔寨政府意识到擅长经商的华人，是振兴国家经济的一大动力，也是连接海外华人的桥梁。于是，政府鼓励他们投入各种商业活动，同时联系海外亲戚朋友，吸引外资前来柬埔寨投资。

处于建设发展中的柬埔寨，投资环境虽不及越南成熟稳定，但政府推出优惠外商的政策，加上低廉的劳工成本和适中的地理位置，还是吸引了不少中、港、台、澳以及马、新华商前来投资，投资的领域从加工业、纺织、电力、食品、酒店、农林产品到开设医院诊所等等。

当地华人社会用以下的顺口溜来形容柬埔寨的华商：“香港人办贸易，台湾人炒地皮，大陆人搞机器，各行各业都有华人。”

华商不断涌入柬埔寨投资设厂，制造了不少就业机会。外来华商需要透过通晓中柬双语的翻译员或中介，才能与当地政府和人民交流沟通。于是懂得中柬双语的华人，又增加了许多工作机会。

华资建设的华夏大酒店、百乐大酒店，都成了金边市的重要地标；还有金边最大的苏利亚购物中心，最大的加华工业区，最大的加华银行等大型企业，都是华人心血的结晶。

随着经济能力的加强，华人的政治地位也日渐提高。目前，柬埔寨内阁中超过半数的成员具有华裔血统，譬如现任国会议长谢辛、新闻部长吕来盛、国务部长占比塞，还有内阁部长索安都是华人。此外，还有不少华裔第二、三代也在政府行政机构担任高官要职。

- 很多柬埔寨华人靠小档口养家糊口，甚至起家发迹。
- 柬埔寨被誉为东南亚下一块投资热土，华人在这方面居功不少。
- 华资苏利亚购物中心，客似云来。
- 出生于广东揭阳普宁的黄意，是唯一一位出任柬埔寨首相的华人。品性耿直的他在1945年出任首相，在位期间为柬埔寨的独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黄意不只是华人的骄傲，同时也深受柬埔寨人民的爱戴。

苦难过后的生活哲学

华人在柬埔寨的生活虽说不上大富大贵，却也三餐温饱，生活安稳。华人生活的节奏，可说是随着国家的经济轮盘而不停转动。

“柬埔寨这几年的变化很大，我们必须紧跟国家的发展，才能及时掌握时机，获得成功！”在柬埔寨土生土长的黄永昌兴奋地说。虽然已经 50多岁了，但他丝毫没有退休的意念，仿佛是迈向人生的另一个起点。

华人总给人勤劳可靠的良好印象。他们充分发挥刻苦耐劳的美德，辛勤工作，不放过任何机会。尤其随着中国日益壮大，到柬埔寨经商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柬埔寨华人明白现在绝对是他们拼经济的好时机。

华人商店几乎起早摸黑就开门做生意，一直到日落天黑才打烊，而从事零售业、服务业或在工厂打工的华人，也都是早出晚归，先苦后甜，累积财富，为下一代铺路。

华人都安于这种刻苦而平淡的生活，并不打算离开。“我们在这里有吃有住，家人亲戚也全在这里，还要去哪里呢？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让孩子们接受好一点的教育。”55岁的潮州人郑利群如是说，他在金边市开设中药店已有十多年之久。

育有4名孩子的他透露，大儿子打算明年到当地的私立大学修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老实说，开中药店赚不了大钱，不过既然儿子想继续念书，我还有能力的话就会供他念下去。”这可以说也是大部分柬埔寨华人父母的想法。他们不求大富大贵，总想办法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

由于多年的战乱，柬埔寨的娱乐比较少，不过中华美食倒相当精彩。

在金边最常见的是潮州食物。在乌西亚和戴高乐街华人聚集区，到处都是售卖潮州食物的摊子，如各式肉丸、卤鸭肉、炸油条、炒粿条、炒面、粥品等，都可以在这里一饱口福。其中，粿条汤可算是最受欢迎的食物。不只华人，连柬埔寨人也爱吃这道美食，并跟着潮州人叫它做“goateo”。

近年来，金边的治安问题虽然显著改善了许多，但持刀抢劫、抢摩托车的新闻仍时有所闻，所以入夜后华人尽量留在家里看电视，夜生活并不多。但年轻华人和新移民还是可以找到不少娱乐活动。

华人日复一日过着这种忙碌充实又平淡无奇的生活。然而，一家人能够在一起生活，吃饭聊天、分享苦乐，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 华人为三餐忙忙碌碌，经常得牺牲休息和娱乐的时间。
- 金边有一条中国美食街，短短一条路上就有十家中餐厅。

社团获政府认同

现在，华人受到政府宽容和公平的对待，政府也允许华人组团结社，推广中华文化。柬埔寨最有权势的华人团体——柬华理事会，就是 1990年在政府的鼓励之下成立的。柬华理事会是柬埔寨华人共同的骄傲。过去帮派林立、一盘散沙的情景，如今已不复见。

“没有几个国家的华团，可以像柬华理事会，成为一个很有系统的组织。”柬华理事会副会长蒙美连自信地说。

柬华理事会是由潮州、福建、海南、客属、广肇五大宗乡会馆的会长来兼任理事会的副会长或常务理事，并在各地设立分会，建立起一个由上而下的一元化管理模式。这样一来，柬华理事会就能够直接管理会馆、华校、庙宇与乡团，有效地凝聚所有柬埔寨华人的力量。

柬华理事会目前有一百六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分会、四十余座庙宇和三十余个舞龙舞狮团。柬华理事会跟当地政府关系良好，还获授权处理涉及华人的事务和权益等相关事宜。

华社领袖在柬埔寨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是华人与政府的桥梁。这些领袖在为华人谋福利之余，也尽量支援政府救灾和配合接待国家贵宾，为国家作一些贡献。

潮州会馆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会员人数最多的华人社团，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自然不小。大部分会员不是从事商贸，就是经营企业，所以会馆的经济实力较强大。该会馆自成立以来，在社团福利、文教等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除了出钱盖学校，还建立了协天大帝庙、中华医院、潮州义山等。

此外，当地华人也基于血缘关系成立了13个宗亲会，协助料理会员的红白事，并组团到中国寻根。随着中柬合作关系日益密切，华社也特别成立柬埔寨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目的不仅是帮助华校发展，为华校筹款及开办华文培训班等，同时也举办文化活动，比如举行中国书画展览。

- 在柬埔寨，庙宇、社团与华校有着密切的关系。潮州会馆就坐落在历史悠久的协天大帝庙里。

柬华的骄傲——东南亚最大华校

“如今，三四十岁的华人都不懂华语。”一名当地华人甚感惋惜。

在战乱的年代，华语被禁用，华校遭封闭，绝迹了二十多年，中华语文出现断层现象。随着国家逐渐开放，柬埔寨华人才不忌讳说华语及方言。

内战结束后，为了让华人子弟可以接受华文教育，柬埔寨华社筹集了资金，把被柬埔寨人占为民居的校舍一间一间赎回来。

“华文教育能在夹缝中生根，并且继续繁衍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全是华社凭着不屈不挠的精神换回来的成果。”端华学校李辉明校长一脸骄傲地说。这位年过七旬的老校长在谈及华教的复兴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是的，纵使日子再艰苦，大环境再混乱，如今华人总算还是保住了传承中华文化的根。

后来，在洪森总理说了“懂华文，易谋生”以后，华文在柬埔寨的地位便大大提升。来柬投资的外商中，使用华文华语者占大多数，华语于是成为市场上及工厂里主要的沟通语言。打开报纸，各公司企业征求员工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懂得华语。

对华族新生代来说，要在社会上立足，就必须掌握中、英、柬三语。如今在金边会说中柬双语的人才非常抢手，很容易便能在华商公司找到一份月薪约200美元的“好工作”，而柬埔寨人一个月的工资还不超过100美元。

华人学生的学习生活是极度紧张而忙碌的。

“早上到华校修读半天中文，下午再到柬校学习半天柬语，晚上还得到补习班学一小时英文。每天东奔西跑，有时候觉得压力很大。”对于紧凑的学习生涯，就读初三的张凤玲表示已习以为常，身边同学朋友大都过着相同的日子。

年轻华人至少拥有华校小学六年级的程度，一般具备基础的华语水平，有的在家里还会跟父母说潮州话或广东话。但对很多年轻的华人来说，柬语才是他们的母语，是他们在生活中与家人、朋友沟通的语言，而华语只是工作上必备的外语。所以，他们认为华语只要具备基本听说读写的能力，便足以找到一份工资不错的工作。

如今柬埔寨共有70所华校，近4万多名学生，其中80%是当地华人，其余是越南华侨和柬埔寨人。直属潮州会馆的端华学校，已有50多年历史，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华文学校，其学生人数共有1万3千人。

这些华校多由乡团或是会馆直接管理，政府不给予津贴，柬华理事总会负责统筹学制、教材和师资调配。

端华学校设有幼儿园、小学、初中和专修班四个等级，学制算得上相当完善。相等于高中的两年制专修班，教授中柬翻译、中英翻译、电脑和会计等实用课程，学生毕业后即能马上投入就业市场。

随着全国柬文学校即将实行全日制，华校也实行全日制，半日教华文，半日教柬文，这样一来学生就无须每天来回奔走于华校和柬校之间，同时学生也可以多领一张柬文文凭。华校生拥有中柬两张文凭，等于多了一个优势。

“这样一来，华校毕业证书一直不被政府承认的问题，也连带迎刃而解了。”李辉明校长表示，这对华校无疑是一项非常有利的教育政策，从而可以解决华校的困境。一旦文凭受到政府承认，加上华文日渐倍增的市场价值，势必为华校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力。

华人一向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柬埔寨华人也一样，宁愿让孩子接受更多教育，很多家境好的孩子，中学毕业后就被父母送到国外读大学。最近几年，还有不少华人把孩子送到新加坡念书。不过，很多在海外留学的孩子毕业后还是会选择回国与家人团聚，同时帮忙父母做生意。

- 端华学校是东南亚最大的华校，被中国国务院侨办称为“世界华文学校之最”。
- 莘莘学子专心上课。

香烛袅袅中的和谐气氛

华人虽在柬埔寨居住了逾百年，也融入了当地社会，然而他们仍保留着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

柬埔寨华人社群依旧会过中国潮汕的“时年八节”，即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冬至、除夕以及春分、秋分二祭。而且，柬华也十分敬仰祖先，每户华人家庭通常会把祖先供奉在大堂正中央的位置，其他神明如观音、关公则供奉在祖先两侧，祖先在华人家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有的华人家庭还供奉土地公和天神，一些虔诚的信徒也供奉灶神。

“华人对神明很虔诚，每逢初一和十五，鲜花、水果、奉香是必备的，遇上祖先诞辰及忌日、神明诞辰、华人节日等，更是为祭祀忙得不可开交。”一提起柬埔寨华人传统习俗，在金边生活多年的华文补习老师林美发，就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

他透露，清明节对柬埔寨华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节日，各大华团还纷纷举行公祭，登报号召同乡参加集体扫墓，前往公共墓园祭祀先辈以及失去香火的无主孤坟。

当地有三间香火特别旺盛的华人庙宇——协天大帝庙、天后圣母宫、保生大帝庙都有逾百年的历史，还有大大小小约50间华人庙宇遍布全国。庙宇是慰藉心灵的庇护所，也是维系华人传统、凝聚华人文化的媒介，且往往还是宗乡会馆，甚至是学校的所在地。90年代，端华、集成、民生等华校都是先修复庙宇再复校的。莘莘学子就在香烛袅袅的庙旁上课，快乐学习，茁壮成长。

在习俗和宗教上，华人和高棉人这两个民族深深地互相影响。

例如，在华人所开的商店里，甚至是一些银行门外，都一定会供奉土地公，以祈求经商顺利，招财进宝。慢慢地，一些做生意的柬埔寨人也依样画葫芦，在店里供奉土地公，希望生意兴隆。

华人也跟着柬埔寨人一起过节日。在柬埔寨新年、亡人节、泼水节时，华人都会跟当地人一样到庙里拜祭，有的华人也对一些德高望重的柬埔寨僧侣相当敬仰。

同样的，柬埔寨人在端午节和中秋节也吃起粽子和月饼，清明节则会去上坟扫墓。华人过春节浓烈欢腾的气息，连柬埔寨人也深受感染。虽然春节没有被列为公共假期，但很多政府机关在这期间根本没人工作，而华校则会放假20天，柬校、工厂也有至少三天的假期。可以说，华人春节在柬埔寨已变成了一个举国同庆的节日。

“信奉佛教的柬埔寨人，性格质朴温和，包容性较强；而对华人来说，佛教虽不是大部分人的信仰，但也是为他们所熟悉的宗教；柬埔寨人跟华人一样喜欢相互拜访，所以两个民族在情感上比较能够接纳对方。”当地华人这样分析两族和谐，和睦共处的原因。另外，华人和柬埔寨人日益普及的通婚现象，也反映了两族融合的情况。

拜同一个神、过同一个节日、吃同样食品，甚至到通婚混血，两个民族在宗教和习俗上已经做到不分彼此。华人的根将在这里，继续繁衍壮大。

- 柬埔寨华人虽已融入当地社会，但依然保存着自己的信仰和文化，家里供奉的神佛一个都不少。

其他资讯

郑棉发：从难民到慈善家

32岁前，他是金边乡下一个小商人；39岁前，他是栖身在越南南部的华侨难民；50岁后，他是柬华社著名的慈善家。

1974年12月14日，柬越边境即将闭关的消息已经沸沸扬扬。郑棉发携带全家族在这一天从南线逃往越南，赶在闭关的前一天成功进入越境。7年间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1981年，郑棉发带着家人，和近万华人难民一起沿湄公河返回满目疮痍的金边。他在奥林匹克市场附近摆小食品摊谋生。靠着经验和眼光，他迅速重建事业，在十年间就累积了一笔庞大的资金。1994年，他购买土地，建起了品牌香烟生产线，产品出口到马来西亚等国，生意十分火红。

郑棉发不愿意公开谈论自己的财富，但身家过亿的事实，让他成为华社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领袖。作为潮州会馆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进行慈善捐助时，却不局限在潮州帮内部。全柬埔寨80%的华文学校和许多华人庙宇、金边孤儿院等都曾接受过他的捐助。

1998年，郑棉发在金边被绑架震惊了华社，他在付出数十万美元赎金后获释，但绑匪一直逍遥法外。为此，郑氏以投资移民的身份移居澳洲。但大多数时间，他依然在柬埔寨管理家族产业。

从难民到事业成功的商人再到慈善家，郑棉发可以说代表了柬埔寨华人从苦难人生走向美好将来的写照。

文化融合的中柬婚礼

对柬埔寨的老一辈华人来说，自由恋爱等同“伤风败俗”，会引来垢病，所以婚嫁惟有劳烦亲人或同事做媒促成。当地华裔男子的结婚年龄平均是24岁，但女子更早出阁。传统家庭的华裔青年在婚前，都会与交往对象保持相当的距离。

但无论如何，随着游客大量涌入柬埔寨，带来了文化的开放，青年男女在街上的亲密行为日趋普遍。自由恋爱也不再招来异样眼光。

如今，华人和柬埔寨人通婚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在婚礼习俗方面，婚礼一般采取中柬结合的仪式，先进行华人婚礼，再行柬埔寨的传统婚礼。

婚礼开始是先通知亲友，然后在第二天早上，男方父母和亲友手捧礼盘，在家门前排成一行，由司仪、童男童女和新郎带领到女方家。结婚的礼盘装有猪脚、糕点、水果、酒，以及象征富有和甜蜜的龙眼，一般为88盘、99盘、144盘或更多（吉利数字）。礼盘越多、排行越长，女方越有面子。

结婚当天，新人先拜天地，再给祖宗上香，告知祖先，后继有人了。华裔新人的礼服通常都融入了浓厚的柬埔寨特色，他们也会依当地习俗进行剪发、洗脚和拴绳仪式。婚礼全程都播放悦耳的柬埔寨歌曲，以增添喜气。

在柬埔寨人习俗中，结婚后男方得住进女方的家，等于是“嫁”进老婆的娘家。有趣的是，华人也受到一些影响，一对新人结婚后要入住男方家或女方家，就取决于哪一方比较富有。

- 华人出席柬人婚礼特地穿上定做的改良式柬服，以示尊重。

结语

在别人眼中，或许不解华人生活在柬埔寨这个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里，为何能够如此乐天知命地过日子？然而，当你经历过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痛失财产的巨大悲怆之后，就会深刻体会，平淡也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幸福！

老一辈对安逸生活的渴望，年轻人对自由不羁的向往，华人都在这个贫穷的国度找到了。就算移民到先进国家，日子也不一定能过得如现在般舒服自在。认清这点后，柬埔寨华人放开了胸怀，迎接生命带来的各种惊喜。

越南

引言

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部，十世纪前，越南是中国的藩属，之后才摆脱中国，建立封建国家。1874年沦为法国殖民地。二战结束后，于1945年宣布独立。与此同时，法国势力卷土重来，爆发了抗法战争，长达9年之久；1954年国家分裂为南北越；1959年北越又跟支持南越的美国展开战争。直至1975年，北越才统一全国，正式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战后二三十年来，越南烽火连天，兵连祸结，民生疾苦。孰料苦难尚未终结，1979年又爆发了中越战争。

跟美国和中国交恶后，越南在政治上陷于孤立的困境。长期的战争及与世界的隔绝，导致越南的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最终致使超过150万难民在70年代后期逃离越南。

1986年越南推行改革开放，全力发展国家经济，逐步走向成功之路，并分别于1991年和1995年跟中国和美国恢复邦交。改革后的越南，经济蓬勃发展，并于2007年加入了世贸组织。近几年，越南更被一些专家及媒体以“中国式的奇迹”、“亚洲新势力”等字眼来形容它的崛起，发展前景备受看好。

华人移民简史

在十世纪以前，越南与中国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宗藩关系，而早期华人移居越南，有些是中国官吏，有些是逃避战乱而来。

华人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移居越南的现象：第一次是发生在明末清初的时期，一些不甘心受他族统治的明朝遗臣，带领部下、家眷以及老百姓逃往越南；第二次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有一部分革命志士因为受清廷追捕而流亡越南；第三次则是日本侵华之后，不少人从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地区南逃至越南。

在越南定居下来之后，华人大多经营小本生意，也有一些华人从事农业、矿业、渔业或运输业。越南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商业发展尚未发达，对善于经商的华人而言，简直就是一块未经开垦的“宝地”，使华人大展拳脚的余地。

商业的发展使得越南的一些城市兴盛繁荣起来。对南方的开发，尤其是胡志明市（旧称西贡）的迅速发展，华人可说是功不可没。

早在17世纪中叶，华人就已经跟越南人一同南下开发西贡与堤岸。到了18世纪，西贡已经是东南亚著名的繁荣港口，堤岸也逐步成为华人最大的聚集地。

华人在越南的地位载浮载沉，几经风雨变迁。

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中期，是华人在越南最为受到礼遇的时期。虽然被法国殖民政府压迫，但是那时期中越关系良好，因此越南人对华人也特别友好。

“那时候，华人的社会地位比较高，部分华人甚至愿意投入抗法斗争的洪流，为越南独立而牺牲。”在堤岸居住了半个世纪的陈先生，在遥想那一段华人最美好的岁月时如是表示。

不过，那时候的华人还是抱着十分强烈的民族意识，多数人都持有中国国籍或者双重国籍。

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越南一分为二。越南政府推行一系列不利于华人的政策，如强迫华人加入越南籍，限制华人从事屠宰、杂货、碾米和木材等11种行业，并且禁止学校使用华语教学，还解散侨团，关闭侨校以及侨报等。

1975年，越战终告结束，越南新政府为了推行社会主义，诋毁华人资产阶级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并进行劳改，又把华人强行驱逐出境。不少华人或穿越莽林，或投奔怒海，逃离越南。这期间，不知有多少人死在逃亡路上。

在投奔世界各地的100万越南难民中，有60%是华人。越南华人人口锐减，从100多万降至数十万。

“那时候，能离开的华人都是有点钱的。而没钱的只能留下来听天由命。上了船，大家都已经有九死一生的心理准备。不是每艘船都能幸运地被搭救，也有很多人在船上因染病而死，或因为船只被大浪打翻而葬身鱼腹。”时过境迁三十载，忆起那段大逃亡的悲惨日子，逃到丹麦的越南华人马桂谊至今仍历历在目。

- 安康盛旺，大概就是历尽苦难的越南华人最大的愿望。

- 早期华人来越南，都是乘搭大中华商轮，这种船每次都是三艘船同时开航，越南人因此习惯称华人为“三船人”，不过现已很少听到这类称呼。

当今社会风貌

引言

目前越南约有100万华人，他们大都已经加入越南籍；其中以广府人最多，其依序为福建人及海南人等，广东话在当地华人社区普遍通用。

如今，胡志明市是最大的华人集中地，约有50万华人。华人主要聚居在第五、六、八、十和十一郡，其中第五郡的堤岸区又被称为“中国城”。

80年代以后，越南推行改革政策，对华人比较宽容，并将华人列为54个民族共同体之一，赋予他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经济上获得政府的扶持之下，华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生活逐步改善。

浩劫之后，华人走出悲情，积极融入越南社会。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共同生活，如今华越两族相处融洽，大部分华人已把越南视为永久家园，并为越南的建设做出各种贡献。

重振经济雄风地位逐渐提升

越南推行改革开放后，华人积极参与工商业活动，抓紧契机以复苏经济。

华人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早前被摧毁的经济基础，还急起直追，尤其是胡志明市的华人更是干劲冲天。在当地的50万华人中，大部分从事小工业生产和商贸活动。他们已成为越南经济发展中的活跃分子。

胡志明市的华人在贸易领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涉足的行业很广泛，从制造业如成衣、纺织、食品、制鞋、塑料、五金、黄金首饰到饮食、建筑、旅游、金融、进出口贸易和零售业等，所经营的大小商店企业达5千多家。

目前胡志明市的华人企业大部分仍以中小企业为主。平仙集团、新强盛电线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商业银行等，都是越南规模较大的华人企业。

“从1986年革新至2002年，短短的16年间，华人企业家的数量就占了胡志明市企业家总数的20%至30%，也就是说，在全市两万家企业当中有6千家华人企业，而华人口只占胡志明市总人口的5.6%。”《西贡解放日报》的财经记者李伟贤说。

堤岸区的批发市场大部分也是由华人经营，如同庆市场、金边市场、陈政照市场、平西市场、安东贸易劳务中心、新城市场、东医药市场等，这些批发市场现已成了越南南部的货物供应中心。

华人在经济上的杰出表现，让政府看到华人的利用价值。

1995年，越南政府有意进一步借助华人善于经商的力量，推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于是颁布了“有关在新形势下加强华人工作”的62号指令，以鼓励华人更积极参与国家经济的发展。

在此指令下，华人得到有力的扶持。政府除了在经济上放宽对华人的种种限制，开放他们在商业领域的经营之外，同时也发还一些没收的华人产业，并允许创办小型企业，从事进出口和金融业务，还允许他们与外资合作。

在政府打下一支强心针后，华人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几年内经济快速起飞。在国家为华人创造的有利环境中，许多华人生产的品牌被视为“越南优质国货”，还入选胡志明市的“工业生产支柱百强榜”。

“几年前胡志明市公布了19项国家支柱产业，其中有六家是华人企业。华人再次以傲人的成绩，证明了他们的实力和努力。”李伟贤兴奋地说，言语之中难掩他为越南华人感到骄傲的心情。“华人很讲信用，做生意不用签约，只需口头协议即可。还有华商之间有着很强的网络，这是华人做生意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少华人企业家就这样凭着坚韧勇敢、克勤克俭的精神，在越南闯出了一片天地。

朱应昌是越南家喻户晓的华人企业家，就是最好的例子。1986年越南改革开放，他凭着独到的眼光成立了艺昌家具，将许多被人们弃如敝屣、只当柴薪的木材，摇身变为一件件古意盎然的木制家具，从此打开了华人在越南从事古艺家具的响亮名声。

“80年代时，我本来有离开越南的机会，但是我对政府的革新政策有信心，所以决定留下来。现在，事实证明我是对的。”一脸慈祥的朱应昌坚定地说，今天这番成就全凭他刻苦耐劳、敢打敢拼而来。

另一方面，越南政府鼓励外商投资，拟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力图将越南打造为进入东南亚市场的桥梁。以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为主体的亚洲华人资本，已成为越南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此外，近年回国投资创业的越南华侨也逐年增多。

如今，越南已成为亚洲经济成长第二快速的国家，连续几年的经济增长都达7%以上。2007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越南开始在世界经济舞台崭露头角。

随着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华人的经济地位势必水涨船高。然而，伴随迅速发展而来的，是激烈的竞争。华人必须更加拼搏，保持竞争力，才能在经济发展洪流中稳住阵脚。

- 图为胡志明市一家华人企业开幕的热闹情景。

爱泡咖啡小馆 生活多姿多彩

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华人跟越南人已经融合在一起，分不清你我。

“有些华人说起越南话，流利畅通与越南人不分上下。”一名越南人认真地说。再加上越南人的外貌、肤色近似华人，让人难以辨认两者之间的差别。在文化语言、生活习惯、教育背景甚或宗教信仰方面，两个族群也都已非常接近。

日常生活中，华人在外的举止言行，俨然就像个越南人，跟越南人也和谐相处。回到家中，又很自然地过着华人方式的生活，吃中餐、看中文电视节目，家庭成员之间也多以方言沟通，偶尔掺杂几句越南话，听起来格外亲切。

在饮食上，华人仍习惯吃中式料理。越南的街头巷尾满是兜售美食的路边摊，华人轻易就能品尝到地道的中国菜。不过清淡少油的越南菜也广受华人喜爱，许多华人已习惯在食物里加入鱼露（一种越南调味料）。说到越南最有名的河粉，华人跟越南人一样爱不离口，习惯每天最少吃上一碗。另外，用法国长棍面包制成的三明治，也是很普通的一种越南小吃，华人通常喜欢把它当作早餐或下午茶点。

同样的，越南人也喜欢吃中华料理，如海鲜羹、炒饭烩面、潮州糕点等，只要食物的味道好他们就照单全收。上茶楼吃点心，或在路边买珍珠奶茶、粤式凉茶，对越南人来说已成为家常便饭。华人区开满琳琅满目的饼家、食摊、酒楼、餐厅，吸引了不少越南人的光顾。

被法国统治近百年，华人也学会了几分“法式浪漫”，跟越南人一样爱泡咖啡厅。

胡志明市有不少咖啡厅和咖啡座，顾客多是男士。他们喜欢坐在咖啡厅外，一边喝着加了奶的冰咖啡，一边观看往来经过的行人，形成一幅有趣的街景。“一天喝上三五杯咖啡是稀松平常的事。咖啡厅的气氛轻松悠闲，点杯咖啡跟朋友聊天下棋，一个下午不知不觉就溜走。”一名当地华人笑咪咪地说。

华人也住在又长又瘦的越式房屋。屋子一般多是有两三层，若居住在临街的房屋，他们通常会把一楼充作店铺，不是自己做生意卖东西，就是出租赚取租金。屋子的空间不大，华人大都是一家人住一起，有的甚至住了几户人家。加上屋内还得停放几台摩托车，因此家居摆设通常极为简单。

与越南人一样，华人习惯在屋外活动，华人喜欢在屋外摆几张矮凳和矮桌，吃饭喝茶、纳凉休息、跟邻居聊天，都在这里进行。街道上，川流不息的摩托车熙熙攘攘地往来着。这在越南是最平常的一幅街景——匆忙之中，洋溢着一种无形的活力。

在越南生活了大半个世纪的彭世杞，很满意现在含饴弄孙的晚年生活。“我平时最喜欢收看有线电视播放的广东节目，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播报的新闻，更是每天必看。”在家里跟儿子媳妇说广东话，媳妇三餐也都煮中国菜给他吃，逗弄牙牙学语的小孙子更是他一天里最开心的事。

生活虽然简朴平淡，然而对于经历过战乱贫穷的彭老先生来说，却深切地明了平淡是福的道理。他说，只要一家人能生活在一起，衣食无忧，夫复何求？

30岁以下的年轻华人，没有经历过动荡不安的时代，是幸运的一群。他们多会说越语、广东话、华语及英语，与越南人相处得融洽友好。他们生活关心的重点是工作及玩乐，而不太在乎国家大事和世界时事。在他们身上，已看不到上辈华人的悲情痕迹。

经济蓬勃发展的胡志明市像个巨大的游乐场，娱乐形式多种多样，娱乐场所遍布各处。入夜以后，整座城市充满动感与活力，散发出自由的气味，蛊惑人心。尤其在经济繁荣的第五郡、第十一郡华人区，大街小巷到处都闪烁霓虹灯，在卡拉OK厅、咖啡厅、舞厅都能见到年轻华人的身影。

“遇上心烦意躁的事，只要骑摩托车到街上兜兜风就一扫而空。”少了父辈们认命的沉重感，年轻人的烦恼轻易就消散了。明日太阳升起，又是充满希望、崭新的一天。

国家的开放和全球化，也使越南年轻人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不已，因此这里出国的风气很盛。不过，越南近几年的发展还是让不少人充满希望。“我曾想过要出国发展，但已打消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现在胡志明有让我发挥才能机会。”27岁的杨明龙对越南的前景抱着乐观的态度。

- 咖啡厅是华人跟朋友交换讯息、聊天的地方。有趣的是，他们都喜欢在屋外“排排坐”看街景，殊不知本身也成了街景的一部分。
- 坐在屋外小凳上喝茶聊天，是华人向越南人学来的日常习惯。
- 民以食为天，不管华人还是越南人都很爱吃相互分享对方的美食。

行善不分种族 华人懂得回馈

越南华人的会馆都是馆庙合一，既是宗乡会馆，也是抚慰华人心灵的宗教场所。越南目前有六大华人会馆，分别是穗城会馆、温陵会馆、二府会馆，义安会馆、海南会馆及崇正会馆。

华人会馆在越南华社起着很大的凝聚作用。各个会馆都相当活跃，尤其在发展华文教育、保存中华文化方面，向来都是他们首要的使命。例如，各个会馆每年必定会颁发奖学金或助学金给清寒华人子弟，让他们顺利升学。

在越南华社，热心公益，爱做善事的风气，也极为盛行。

“在越南华人心里，‘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想法已经根深蒂固，热心公益已成为越南华社每一个人的优良传统。”年轻的成功商人林日民指出了越南华社的一大特色。

越南华人不论老少，都是抱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想法，透过会馆、宗祠或同乡会来表达爱心。除了帮助自己的同胞，华人每年也都会捐助大笔款项做善事回馈越南社会，只要政府呼吁人民救济天灾灾民，华人大企业大都会积极响应，协助推展社会福利。

“很多华人做善事都是自动自发，不是为了名誉，而且不分种族。”林日民进一步解释，华人不遗余力地支持多项国家推行的福利慈善项目，如兴建情义屋、温情屋、奉养英雄越南母亲、参加贫穷病人辅助会、励学、消饥扶贫、帮助少数民族同胞等等。

华人积极投入慈善事业，赢得了越南人的尊崇。越南人一般认为华人是善良优秀的民族。这也是越南人不会仇视华人的主因。他们得到华人的友善对待和帮助，也会感恩图报。

越南华人借庙宇和会馆，维系中华传统习俗，为华人子弟争取受华文教育的机会，同时热心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利人又利己。在华人社区里，六大会馆将各籍贯华人紧紧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稳固的网络。

- 华社举办的活动，多跟慈善筹款有关。
- 在华人举办的任何活动上，仪式开始时都会由司仪先以越语开场，然后才以广东话或华语进行，这是为了顾及可能有越南人来宾出席，同时也是华人对这块国土表示尊敬的方式。

懂中文易求职 冀办双语学校

越南华文教育的发展，和华人的命运一样大起大落。

1975年越南统一后，三百多所侨校被勒令关闭。到了80年代，政府才放宽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允许华人在夜校和补习学校学习华语，之后华语的发展就一日千里。

胡志明市目前共有20多家华文中心及外语中心，学生人数约有3万名。其中，比较有名的华文中心计有：颍川华文中心、麦剑雄华文中心、陈佩姬华文中心、启秀华文中心、礼文华文中心等。

虽然政府允许华人学华文华语，甚至允许华人兴办大学，但毕竟越语学校才是正规学校，同时教育政策要求学生必须在学好越语的前提下才可以学习华文。最近几年，各华文中心学生的人数逐年减少，主要原因是越语学校的功课过于繁重，造成华人子弟学习的压力过重。有些学生因而无法兼顾学习华文。

近年来，中、台华商涌入越南投资设厂，中文的市场价值日益提高。越南的大公司主要都是外商投资的，需要懂华语的人才。土生土长的关裕华语带轻松地说：“我觉得生活在越南不错，机会很多，这里尤其缺乏翻译，其工作量和压力都不会太大，生活相对轻松一点。”

“随着就业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多越南人学习中文，学习有关中国的知识。目前有八间大学开设中文系，学生人数约达1千人，大部分学生是越南人。”胡志明市社会人文科学大学东方学系的华语主任黎教授说。

早期华人父母不鼓励孩子升大学，认为拥有中学学历就已足够。那时候年轻的华人普遍懂华语，只要有一张越语学校的文凭，再去报读个会计或电脑技能课程，很容易便可以在台湾人或中国大陆人开的公司找到工作。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公司开始注重大学文凭，华人子弟上大学的人数也有上升的趋势。一些家境好的就到英、美、澳、纽、新加坡等国深造，但他们主要目的还是学习英文。

可以说，尽管华语很吃香，但其发展仍跟不上越南社会的需求。

胡志明市华文教育辅助会的彭秘书长感叹：“越南的华文教育仍处在‘打游击’的情况，华文中心始终不是正规学校，所开办的课程和颁发的文凭都不受政府承认。”他认为，由华人民办一间受政府承认的中越双语正规学校，是最有利于华人子弟的。

然而，目前的现实是，华人子弟必须拥有越语学校的文凭，才能在社会立足。一些华人为了获得更好的迁升机会，不惜牺牲下班时间，到夜校修读越校课程以考取越校文凭。26岁的黄宝燕每天下班后就赶到夜校上课，已度过了两年奔波的生活，再熬一年就能毕业。她说：“年轻时，不知道越校中学文凭的重要，现在只好半工半读，希望辛苦几年拿到文凭，那么工作的选择就会更多。”其实，像黄宝燕这样半工半读的年轻华人并不少，这些年轻人乐观地相信，有了文凭，未来的出路必定更加宽广。

总的来说，基于商业市场对华语人才的需要，越南学习华文风气尚算盛行，间接使得整体的华语水平有所提高。可以预见的是，通晓华语的人将会越来越多。

- 在越南华文教育的发展虽不尽如人意，但也算相当平稳顺利。

两族越靠越近 华人意识渐淡

华人在越南享受很多中国传统节日，他们仍然十分注重传统风俗。越南有近千年是中国的藩属，越南人在文化上长期受到中国极大的影响，因此不管在民俗风情还是文化习惯上，华越两族都很相近。越南人对汉字并不陌生，很多越南寺庙和店铺都写有汉字。

春节是华越两族人民最重视的传统节日。春节期间举国欢庆，过节气氛浓厚。在越南还能感受到浓厚的广东风俗，春节前家家户户都忙着办年货，逛花市也是华人过春节重要的活动之一。不管华人还是越南人，过春节都有贴春联的习惯。不过，不同的是，越南人的春联是由越文拼音写成。

“越南华人是幸福的，能在越南享受很多中华节日，而且越南人甚至还沿袭华人的节日，跟华人一起过端午、清明、中秋节。”当地华人说。实际上，越南人所过的传统节日跟华人的几乎相同。

长期受到华人的影响，越南人很欣赏中华文化，不断向华人学习，希望变得跟华人一样勤奋节俭。有鉴于此，越南华人益发珍惜自身的传统文化，致力发扬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近年来，华人和越南人通婚的现象也非常普遍。

对于通婚，一般人持着开通的态度。一些越南父母认为华人拥有优秀的传统，华族男子对家庭较有责任感，懂得顾家，所以希望女儿能嫁给华人。

随着两族关系越来越融洽，华人新生代对越南文化产生了更深的认同感，培育起强烈的国家意识，血液里的中华民族意识则渐渐稀薄，最后名符其实成为一名效忠国家的越南人。因此，一些老华人对于年轻一辈不会讲广东话感到焦虑，担忧他们就此失掉华人的根。

随着对国家的认同感日渐深厚，有越来越多华人参与政治活动。政府也在华人聚居的胡志明市，设立专门处理华人事务的“华人工作处”，培养华人干部为华人和国家效力。胡志明市华党员迄今有597人，其中426人是在1995年之后入党的。

越南改革迄今20多年，华人对政府逐渐恢复信心，加强了华人对越南的认同意识。

- 汉字加越文的字联和春联是华越文化融合的体现。

结语

经历过七十年代浩劫的华人，曾经活在巨大的阴影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往昔的悲情终将消逝。命运多舛的越南华人，始终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走出阴霾。

如今，苦了大半辈子的华人终于能安度余生，而新生代也在这里看见希望，国家意识愈益浓烈，相信努力就能出头。

越南华人最终摆脱了任人鱼肉的命运，迎向更美好的明天。

缅甸

引言

位于中印半岛西部的缅甸，是中印半岛上最大的国家，东北与中国接壤，西边和印度毗邻。自古镶嵌于两个古文明大国之间的它，被一种浑厚而多元的氛围笼罩着。它拥有135个民族，以缅族为主（60%），掸族、克钦族等是法定少数民族，而华人和印度人则为非法定少数民族。

这个曾被英国统治，又被日本占领过的“佛塔之国”，在独立之后有过一段辉煌时期。20世纪60年代，它是东南亚最富裕的国家，是著名的“鱼米之乡”。除盛产鱼虾、海蜇皮、丹老咸鱼、鱼露外，它还拥有丰富的农产，也一度被誉为世界最大的米仓。

1962年军政府执政后，推行一系列的“国有化”运动，反而打击了缅甸的经济发展。后来军政府打压民主运动，也导致以美国为首的欧美诸国长期对它实施经济制裁，使它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状态，发展停滞不前。

为了摆脱困境，近年来缅甸政府努力与世界各国重建友好关系，逐步走向开放。这些年来中国一直对缅甸伸出友谊之手，雪中送炭。这不只促进了中缅的经济合作，更拉近了两国人民的距离。

从当地华人随遇而安的祥和神色中，仿佛看到希望的曙光。

华人移民简史

缅甸自古与中国毗邻，两国之间的漫长边界绵延相连。长期以来，两国一直都有边境贸易活动。

根据记载，首批定居于缅甸的华人，是数世纪前从云南省移入缅北克钦帮山区的玉石商家。此外，缅甸北部丰富的矿藏也吸引了许多华工。自18世纪起，每年约有5万名云南西部居民前来缅甸当矿工。

1861年，第一个广东籍商人经由新加坡来到缅甸的曼德勒王朝古都。

英国于1885年侵占缅甸，并把它纳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份之后，引起大规模的华人移民热潮。这些移民一般通过海峡殖民地由海路迁入缅甸，主要是两广和福建的劳工；另一批移民则是从云南陆路南下来到缅甸。

到了20世纪30年代左右，缅甸华人移民人数激增。二战期间，华人人口约有二三十万人，占总人口的1%，当时，经商有道的华人个个都取得不俗的成绩，还创办了华校、华报以及华团。

那时候，华人与缅甸人也浑然没有你我之分，彼此情感融洽，共享安居乐业的日子。

二战结束，缅甸终于摆脱了英国和日本的殖民统治。缅甸政府鼓励华商转向工业领域发展，把外贸让给不善于经商的缅甸人去尝试。华人积极响应，全心投入，他们的工业投资在当时占了缅甸私人工业约75%，经济发展可说是达到巅峰。

缅甸分别在1958年及1962年爆发了两起毁灭性的政变，主导人物就是号称“铁腕军头”的奈温将军，从此改写了华人的命运。

自1962年起，奈温开始推行“国有化运动”，把银行、商店、学校和媒体都收归国有，导致缅甸华人辛苦挣来的财富，一夜间化为乌有。到了60年代中期，缅甸共有1万5千多个企业被“国有化”，许多华人商家濒临破产，导致一千多名华人被迫含泪离开，流亡到台湾、中国大陆或美国。不过，还是有不少华人仍然怀着期待留下来，没想到却等来了一场令他们家破人亡的暴乱。

1967年6月，缅甸华人最黑暗的时期骤然降临！在一场激烈的排华暴动中，杀人放火的暴民们恣意践踏了好几个华人城市，仰光唐人街更是首当其冲。

华人骤遭飞来横祸，然而老一辈的华人却决定稳守家园，只把孩子送往国外。许多父母和子女就此一别数十载，直到缅甸开放之后才得以重逢。这当中，不知上演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

从政变到排华，整个过程当中共有十万名以上的华人离开了缅甸。暴动后，他们大多数移居澳洲、泰国、新加坡等地，其中有5万多名华人移居至澳门，在当地形成了著名的“小缅甸”。

- 19世纪后期，大批涌入缅甸的华人当中，福建人大多身穿长袖衫，自称“唐人”，而广东人则一般身穿短袖衫，自称“汉人”，当地人通常由衣著来区分他们的籍贯与行业。

当今社会风貌

引言

在华人眼中，缅甸如同一颗被沙土覆盖的宝石。曾在繁华盛世下生活过的华人，都见证过它慑人的光芒。老辈回忆起60年代的仰光，脑海中总是闪现出那些热闹、淳朴而人清味浓郁的场景。

今天，缅甸成了世界十大穷国之一，但留下的华人早已学会随遇而安，嘴上并无太多抱怨。华人说：“笑中干关过，愁内百事哀”，他们踏实而知足，只求三餐温饱，生活安定。无论住的是洋房、公寓还是木板屋，大家都安于现状，依照自己的经济条件去生活。

缅甸华社如今主要由云南人、福建人、广府人和客家人组成。当地习惯以“上缅甸、下缅甸”来划分华社：所谓“上缅甸”，指的是缅北地区，以曼德勒（Mandalay）为中心，另还包括腊戍（Lashio）、密支那（Myikyina）、当阳（Tangyan）及东枝（Toungyi）等，皆是云南人的集中地。“下缅甸”指的则是坐落于南部的仰光及其周边地区，这里是福建人和客家人的天下，而早期人数最多的广府人现已所剩无几。

在一派悠闲、对从商兴趣不大的缅甸人眼里，华人是勤快聪慧的商人。缅华大多都是小老板，生活虽称不上富裕，但却比一般缅甸人民过得更安稳踏实。当地人说，在战后缅甸的经济复苏上，华人居功不小。

在大力促进当地商业繁荣的同时，华人并没忘记在苦涩的过去与诱人的前景之间，播撒下中华文化的种子，默默推动华文教育和社团活动。老一辈华人对缅甸感情深厚，大多没有离开的打算，但他们却鼓励下一代走出缅甸，到外头去追求更精彩的人生。

缅华“三不谈” 低调拼经济

缅甸言论自由有限，华人常笑称他们有“三不谈”的话题，那就是政治、“女人”和美元。

在奈温将军时代，不少华人积极从政并身居要职。物换星移，如今华人已无法在政治上大展拳脚，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变得异常冷淡，也不愿触碰政治这敏感话题。而所谓的“女人”，也与政治息息相关——她是缅甸的民主斗士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多年来为了缅甸的民主大业与军人政府抗争，成为政府眼中棘手的政治人物。原本就不热衷政治的华人，为避免祸从口出，也尽量不提这“女人”的名字。

美元在近几年与缅元的兑换率浮动很大，严重影响了从商华人的收入，理应成为最受关注的对象。不过鉴于缅甸已禁止公民拥有和收藏美元，因此华人只能买金保值，导致他们只谈“黄金”，避谈“美金”。

对缅甸华人而言，也许经济上的富庶、生活的安稳才是最实在、也是最重要的目标。

1988年12月，中国和缅甸重新开始了边境贸易往来。这个划时代的政策落实后影响深远，致使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商家都纷纷前往缅甸投资，大大拓展了当地华人的商机。接着1989年缅甸开放经济后，许多华人的生活获得大幅度的改善，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如今，缅甸华人的经济地位，已逐步恢复到60年代国有化运动之前的鼎盛时期。他们带旺了许多城市地区，迎来生机勃勃的市场。在仰光或曼德勒的市中心，金行大多由广东人经营；福建人则从事土产或农产贸易；云南人掌握着玉石、矿产的开发和买卖；潮州人从事塑料袋生产、轮胎代理等与塑料相关的行业。此外，华人的中餐馆、药行及加工厂等也都不少。

在工业方面，华人主要的领域是机械修配、食品加工和成衣制造；商业领域则以杂货、餐饮和金饰业为主。据了解，全缅甸共有2万5千多家的华人杂货店。

随着缅甸旅游观光业的开放，不少华人也纷纷投资与旅游相关的行业，如旅馆、旅游代理或购物商场等。近年来经济蓬勃发展，部分华人已经走向经营大型企业，出现了不少成功的企业人士。

缅甸兢兢业业地把家庭事业和私人企业办得有声有色，也为下一代铺平了道路。

华裔子弟一般都到缅甸大学深造，出路较好的医学和工程系，往往成为成绩优秀生的首选，因而造就了许多医学人才。但由于在缅甸从医的待遇不高，因此很多医科毕业生都考虑到国外去发展，造成人才外流。至于其他科系的毕业生，毕业后要在当地学以致用也并不容易。缅甸华商总会干事苏天宝就指出：“华人可说是被逼着从商。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好工作，便接手父母的生意，或自行创业。”

尽管在经济上获取了不俗的成就，但缅甸华商在多变的政策中，仍是冒着不小的风险。亚景金铺珠宝商行董事长谭景铨回忆说：“缅甸有过3次被停用的记录，因此华商手中的血汗钱，有可能一夜之间就成了废纸。”此外，面对高达20%的营业税及为数不少的“茶水费”，华商亦只能默默承受。

缅甸还长期面对电力不足的问题，无论商店还是住家几乎天天都有电力中断的困扰。一些资本雄厚的商家，干脆就动用自备的发电机。这里的人们常苦中作乐笑称：缅甸就是“免电”的意思。

电力不足、电讯设施落后再加上法制的健全，让有意前来缅甸投资的外商往往静观其变，裹足不前。

当外界对缅甸的经济内幕尚存疑问，而投资者也面临种种挑战之时，缅甸华商商会自然就成了沟通国内工商企业界，及海外投资家的主要媒介。

成立于1909年的缅甸华商商会，在缅甸的华社中拥有很高的地位和权力，共超过500名缅甸华人企业家都是该会的会员。他们不但是国内经济的强力推手，还积极向海外宣传、吸引以华商为主的外资。该会除了接待中资公司代表和中国政府代表团之外，也主办海外考察团，让缅甸企业家开拓人脉网络并扩大市场，可谓贡献良多。

- 缅甸华人所经营的旅馆。
- 仰光的昂山市场又称为玉石市场，珠宝、玉石摊档大多由华人经营。
- 在缅甸，有不少高层人物都与华人通婚。早期社会党总书记、缅甸代总理兼国防部长吴巴瑞的夫人，就是一名姓陈的华人。此外，原缅甸革命委员会委员丁佩、原山友总统以及丹瑞大将军的夫人，也都是华人。

华文教育曾遭禁 今露曙光

缅甸社会的华文教育，三代华人可说遭遇各异，也导致了他们拥有不同的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

50岁以上的缅甸华人，多数接受过传统的华文教育，是缅甸华教辉煌时期的产物。他们的华文造诣较高，能说一口流利的华语，对中国和中华文化也有一种强烈的认同和情感。

30岁至50岁的华人，则成长于缅甸华教的断层期。他们主要以缅甸语沟通，大部分不谙华语，顶多略懂方言。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与缅甸人接近，尽管在形式上仍保留不少中华文化的传统习俗，但灵魂深处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认知，是陌生且有隔阂的。

至于30岁以下的年轻一代，就有幸再次与华文教育接轨，从小就有机会学习缅甸语和华语。这使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还能掌握不错的华语。缅甸社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当地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有着密切关系。

20世纪50年代，缅甸曾是东南亚的教育中心，华文学校在社团的支持和推动下蓬勃发展。当时全国拥有200所以上的华文小学及约300所的中学，课程水平极高，在东南亚华人圈中树立了一流的口碑，还吸引了其他国家的学子前来就学。例如，当时广为人知的南洋中学及华侨中学，培育出的优秀人才如今遍布国内外各领域。

然而，在60年代实施的“国有化运动”，几乎把华文教育给摧毁了。

华校全都收归国有之后，不但校舍没了，学生也不准公开学习华文。这个政策严重打击了华教在缅甸的发展。缅甸华人只好上下求索，心机费尽，在逆境中默默地维系着华教。许多老师在家偷偷开办华文补习班，为了避嫌，他们教学时多采用小班制，还不时更换地点。华文教育就在这种悲惨的状态下暗渡陈仓。但在强硬的政策下，其效果毕竟十分有限。久而久之，华人社会就出现了巨大的文化断层。

到了80年代末，缅甸政府调整内外政策后，才对华教放宽了限制。一些家庭补习班开始进行整合及扩充，华团则以补习班的名义开办华文学校，获得热烈反应。因此，尽管缅甸至今没有正规的华校，但教授华文的机构却不少。

从90年代开始，华教以多种不同的名义生存下来，最普遍的就是以宗教或孔学的名义来传授华文，设立华文补习班。此外，有些中心还设立了幼儿班，以及服务在职人士的华文速成班，以应付不同的需求。

在缅北地区，基于与中国的边境贸易需要，对华文教育的需求更高，诞生了许多非正规的华文学校，学生反应热烈。总体说来，上缅甸地区的华文教育水平，要比下缅甸来得高，成绩突出的学生还会到中国去留学。

2002年以来，中国国务院侨办每年派遣讲学交流团，到缅甸培训华文教师，当地也通过函授方式自己加以培育。昌华国际学院还与新加坡在课程上相配合，该院的毕业生能被保送到新加坡工艺学院去升学。

福庆语言电脑学校李祖清校长说：“如今，掌握了华文的毕业生前景相当乐观。根据就业市场的需求，一般缅甸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只懂缅语者月薪有2千缅元，掌握缅语和英语者则有3千多缅元，但同时掌握缅语、英语和汉语者，月薪却可高达5千缅元！”

为了孩子的将来，几乎所有的华人家庭都让孩子学习中文。他们通常会利用课余时间，每周六天到华文班去上课。至于那些幼年时错过了机会的青年，往往也积极利用工余时间，到华文速成班去学习。现在，在清晨微凉的晨风中，或夕阳的余晖里，常常可以听到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熟悉的华语飘荡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 孩子们正在福庆学校的华文班学习。
- 缅甸的华文教材，简繁体体的使用仍未统一。
- 幼儿们在字正腔圆地背诵着一首首的唐诗。

缅甸华校能知天下事

在上世纪的50年代，处于全盛时期的仰光曾号称“东南亚伦敦”。但近几十年来，缅甸与外界的联系却很少，予人一种在政治铁幕中，资讯十分封闭的印象。

前《缅甸阳光人民报》记者赖保罗感慨说：“当时华社兴盛，我们拥有四家华文日报和三家周刊。但国有化运动却使华文报章完全消失。”

直到1998年，缅甸才重新对华文报刊解禁。终于，经过几十载的等待之后，《缅甸华报》发刊了！当时，国内外的缅甸华人无不对这难能可贵的消息感到雀跃。

遗憾的是，六年后政府又宣布禁止所有外文刊物的出版，结果《缅甸华报》也被迫暂时停刊。

2007年，终于又传来好消息——由缅甸政府出版的《金凤凰》华文月刊在2007年10月1日正式面世。缅甸华人都希望这一份华文报刊是一个美好的起点，除了作为缅甸的精神粮食，还可以拉近华人和缅甸人民的距离，并联系起世界缅甸同胞，积极推动回缅探亲、旅游和投资等方面的发展。

除了当地出版的报章外，缅甸华人若想阅读国外的报章或杂志，除了托人携带入境之外，还可以到仰光广东大街上的缅甸华侨图书馆去。这家图书馆大约有三万册藏书，华人都喜欢来这里借书、阅报、看杂志或卫视新闻。

图书馆馆长欣慰地说：“每日前来阅览的人数多达一百人左右。在这里，读者不但能找到新鲜出炉的缅甸报章或泰国的《世界日报》，还能寻获一些过期的海外报刊，如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等。”

超过60年历史的图书馆显然有些残旧，多年来靠华社各界人士出钱出力，确保这个小小的知识库能够维系下去。

近年来，电子媒体的发展弥补了平面媒体的不足之处。自从几年前缅甸政府允许人民安装卫星电视后，一般经济良好的华人家庭，都成了卫星电视的用户，享有一百多个频道的选择。有了它，当地华人就能即时掌握国外的最新资讯。最受华人欢迎的是资讯台，而年轻人则偏爱中、港、台的娱乐节目，举凡海外华人所有的流行资讯，他们可是一点都不陌生。

此外，年轻一代也通过网际网络跟世界保持联系，信息封闭或匮乏的问题已不复存在。缅华互助会更一马当先，创立了部落格，其理事长陈民昆说：“缅甸华侨散居在各地，如澳门、台湾、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心底仍关心着缅甸华社的状况，因此我们的网站成了最佳的信息和感情交流站。”

- 在缅甸华侨图书馆内专心阅报的华人。
- 曼德勒有一所缅甸华人与政府合作开发的信息中心，是缅甸的骄傲。

走过苦难 唐人街续谱繁华

在前首都仰光，华人俗称的广东大街，以及附近几条街道所组成的唐人街，估计住了15万名华人。华人曾在之里推动了唐人街的繁华，至今他们所经营的店铺依旧布满了整条唐人街。

这里有高高耸立的上海国际商厦、通街川行的二手日本车、还有那看不尽的人潮盛况。

仰光市禁止摩托车及脚踏车穿行，于是汽车就成了华人家庭的代步工具。在缅甸，一辆车龄十年的日本二手车，还要叫价五万美元，简直是天价！但经济能力好的华人家庭，通常都会拥有一部汽车，以方便出行。而仰光地区以外，就是自行车和摩托车的世界。

在唐人街，华人的金店最是显眼，数量多达几十家。店铺虽不大，但闪闪的金饰琳琅满目，使人眼花缭乱。

由于汇率浮动的关系，缅甸人总爱把金钱兑成金子来保值。金店老板表示：“当金价一攀高，许多缅甸人就会拿金饰到店里来典卖，那时我们就忙得不可开交。”此外，华人也经营手表、服装、眼镜、中药和五金等店铺，在这里中缅文并写的招牌随处可见。

唐人街上也有很多茶楼，华人都喜欢聚在这里喝茶吃点心。其实缅甸华人的饮食口味非常多样，连当地人的饮食风格都加以吸收。除了华人的粽子、肉包子令缅甸人食指大动，华人也同样热爱当地的鱼汤面、椰汁面和咖喱鸡饭。因此这里街道两旁的小食档总是高朋满座，热闹无比。

由于缅甸长期供电不足，各地恶作剧式地轮流停电，让人哭笑不得。因此，发电机就成了民生必备品。每当夜幕笼罩，家家户户一齐开机发电，电油味八面扑鼻而来，“风味”十足！

华人家庭里一日三餐仍以中餐为主。逢年过节，必定杀鸡宰鸭来祭祖，大家也习惯在饭桌上天南地北闲聊，联络感情。传统节日一到，妇女们也往往大展身手，让一家大小品尝传统的美味。

曼德勒华侨妇女联谊会主席寸守斌说：“在大城市，很多家庭必须靠双收入才能支撑一家人的生活，但在这里，物质要求很低，只要一个人工作就可以养活全家，加上房子便宜，三代人住在一起很平常，家里每天都很热闹。”

缅甸华人很重情义，逢工余或假期，他们就会跟家人朋友们聚在一起，或一起到茶铺去喝茶聊天。缅华青年也热爱各种球类运动，篮球、羽球、足球和藤球，都是他们喜爱的玩意儿。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在小巷里踢藤球，引来大批围观者的欢呼助阵，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单纯的快乐。

缅甸华人说，这里淳朴的民风深深系住了他们的心；他们跟缅甸人也有着兄弟般的情谊。在长期的濡染和浸透下，他们都拥有知足常乐、随遇而安的温良个性。

- 广东大街的观音古庙前是热闹的市集。
- 在唐人街上，随时可见拥有几十年历史的传统老店，售卖华人的传统食品。
- 如果你在街上看到穿着筒裙和拖鞋的男子，不要以为他们是缅甸人，因为当地华人也爱这身打扮！缅甸传统服装统称“笼基”，男装称“布梭”，女装则称“特敏”。炎炎夏日，缅华穿上“笼基”，感觉舒适凉快。此外，华人妇女和小孩也爱学缅甸人把“檀那伽”香木浆涂在脸上，除了一脸的清凉外，还能护肤呢！

节庆不忘慈善 短期出家成风尚

尽管已经融入缅甸社会，华人大多还保留着传统的习俗和礼仪。他们一般都会在家里供奉祖先，门口还贴上红彤彤的对联。

在缅华心目中，春节还是头等重要的节日。除夕夜的团年夜饭外，春节期间各乡团举办的团拜活动及热闹的醒狮团等，都令大家万分期待。20世纪80年代，缅甸慈善会还组织了缅华贺年团，从除夕到初九这段新春期间，派出花车和乐队，挨家挨户去拜年。收取的红包钱都作为慈善会的善款捐助给各界，以急人之难。

后来，贺年团改为室内团拜，大年初一在酒店开办一百多席，配合妇女会等单位呈现的文娱表演，大伙儿齐心协力，共庆佳节。

迈入新时代，缅华妇女也开始参与社会福利的工作。纷纷成立的妇女会，主要负责推动社会福利和文娱方面的工作。在缅甸，凡华人举办活动都不愁人手不足的问题，更不必担心遇上出席者寥寥无几的冷清场面。浓浓的同胞爱，就体现在含蓄而热切的氛围中，温暖了这块古老的土地。

除了春节之外，大大小小的传统节日如清明、端午及中元、中秋等，缅甸华人也都欣然欢庆，毫不马虎。

每年的4月13日是缅历新年，俗称泼水节，华人也会与当地入一同欢庆，向路人泼水以示祝福，并享用风味独特的椰汁面和咖喱鸡饭。其他当地节庆，如瓦梭月盈节、点灯节，也少不了华人热心的参与。

缅甸的华人社团，多数是地缘性的宗亲团体。例如曼德勒就有著名的四大乡团，包括云南会馆、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及多省籍会馆。除了供奉祖先，会馆也是当地华人联谊的好去处。

此外，宗亲团也负责管理华人义山，协助会员处理丧葬事宜等。筹建会馆之外，华人往往也在同一块土地上兴建庙宇，以致馆与庙的数量成正比地发展，日益壮大。

缅甸全国佛塔林立，笼罩在一派佛光梵影的氛围中，被世人称作“佛塔之国”。长期在佛光的熏陶之下，缅甸人民大都有种善良淳朴的个性，在单纯的意念中，缓慢地度过悠悠岁月。

缅甸华人也是如此。他们的生活朴实恬淡，构建了一个重人情、爱传统的华人社会。生活在这治安良好、邻里守望相助的悠闲国度中，华人个个看来也都异常敦厚老实。

虽然这里也有基督和穆斯林信仰，但大部分缅甸人民，包括华人在内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华人佛教徒还有短期出家的风尚，他们一般会选在小乘佛教的大日子——泼水节期间出家，短则三五天，长则一个月，各完成其祈福、还愿的心意。

除佛寺外，缅甸也有很多华人传统的庙宇，其中不少还是超过百年历史的老庙，里头主要供奉观音、大伯公和土地公。在仰光唐人街就有两大著名的观音庙，分别是福建人建的庆福宫，以及广东人建的观音古庙。络绎不绝的信众带来鼎盛的香火与人潮，使它们成了旅游热点。此外，还有十方观音庙、十方极乐寺和中华寺等，也都各具特色，香火不衰。

- 当地老人庆祝80大寿，妇女会会员踊跃参与的温馨场面。
- 多古色古香的传统建筑，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洞谬观音寺（右下）、曼德勒的福德庙（左）及云南会馆（右上）。

结语

在西方媒体的渲染下，缅甸成了一个封闭、专制又落后的国度。外界一般会猜想，缅甸华人一定也在苦难中度日如年。然而，如果亲眼目睹了当地华人脸上的憨笑，这印象将不攻自破。

尽管“自由”对缅甸华人而言，仍是遥不可及的梦幻，但他们早已学会如何在有条件的自由里悠然度日，随遇而安。

缅华用最低的生活欲望，成就了最善良的世界。发展的缓慢，让美好的华人传统都得以保存下来。浓浓的人情味，牵绊着多少华人离开的步伐。

然而，古城外有更精彩的花花世界在招手，不少年轻人终于咬咬牙，还是离开了。

文莱

引言

文莱在马来语中是“和平之邦”的意思。它位于加里曼丹岛的西北隅，北面临海，其他部分与马来西亚砂拉越州（Sarawak）接壤。文莱自1888年起成为英国的保护国，迟至1984年1月1日才取得全面的独立。

自1929年发现了石油，寂寂无名的文莱顿时成了婆罗洲的一颗明珠。丰富的资源，使这个人口仅40万的小国人均年收入高达2万多美元，成为东南亚第三大产油国和世界第四大液化天然气生产国，赢得了“东方科威特”的美誉。

文莱施行“马来、回教、君主”的政治制度，苏丹（Sultan，即君主）身兼总理、国防部长及财政部长，拥有绝对的权威，备受全国子民的爱戴。

华人就在这富裕的和平之邦过着安逸的日子。

华人移民简史

文莱和中国交往的历史十分悠久，近年来，在文莱河出土的唐宋文物，即为最佳佐证。根据《明史·渤泥传》，文莱国王加那（Maharaja Karna）曾经远赴明朝朝贡而不幸病逝于南京，当时的永乐皇帝还给予厚葬，并且立下王墓。

15到16世纪期间是文莱的黄金时期，其贸易发展的蓬勃，黄金矿产的丰富、还有胡椒以及香料的资源引来了大批华人。不过，定居于此的华人并不多，他们大半是往来两国的过客。根据第一次人口调查，1911年文莱仅有736名华人。

华人移民大幅度增加，可追溯到1929年，那一年在文莱发现油田。丰富的油藏使这个小国备受世界瞩目，并且吸引了大批华人涌入。1931到1947年间，不少砂拉越、香港以及新加坡的华人技工前往文莱从事与石油工业相关的工作，使这个国家的华人人口激增。

二战之后，文莱开始积极展开国家的基础建设，制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因此又吸引了一大批华人迁入。1958年，金门发生八·二三炮战，致使一批金门人通过亲属关系移民过来。

从1947至1981年，华人人口增长的速度十分惊人，1981年，文莱已有了近4万名华人，几乎占当时全国人口的20%。不过，自此之后，移民人数就再也没有明显的增加。

这些从华南来的移民，依旧习惯在他们本身熟悉的环境里生活。

18世纪初，大部分华人皆聚居在一个名为甘榜苏丹拉玛（Kampong Sultan Lama）的水村中。由于那里有90%以上的居民都是华人，当地人后来便称之为“华人水村”。在兴盛期间，村内的住户多达250家，人口则超过两千人。

村里的木屋一间挨着一间，住在此处的华人大多以闽南语交谈。在这里常能看见运载货品以及粮食的小舢舨在四处流荡兜售货物，摊贩与居民熟络地闲话家常，及小孩子在高脚屋下嬉水的情景。

“逢年过节或邻家有喜事，华人一定给左邻右舍派送食品或礼品，彼此间感情融洽亲密，并且守望相助。”一名在水村长大的华人，对童年那段水上生活缅怀不已。

华人快活无比的水村生涯，随着1981年一场无情的大火而结束，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华人水村也从此走进历史。而那些在水村从事流动贸易的商人，也只好逐渐将重心转移到陆地。

文莱政府不轻易接受入籍，申请者必须在当地居住超过20年，并且通过马来文考试之后，才能成为合格的公民，而永久居民的申请条件也十分苛刻。

“我们虽然有护照，但上面的国籍那一栏是空的，意即我们仍然没有国籍，很多华人住了一辈子都还是无法入籍。”一名持永久居留证的华人感叹道。

国籍的问题，造成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批华人专业技术人才的流失。一些非公民华校留学生，毕业后也不愿再回到文莱。

而今，四万多名华人之中，仅有大约23%是公民，另外一万多人为永久居民，其余的华人则是手持工作准证的临时居民。

然而，华人也深深明白，除却无法入籍的缺憾之外，这里确实是一块营建理想家园的沃土。

- 文莱国小民稀且富裕，是个安置家园的天堂，然而政府定下严格的移民条件，新移民想要入籍难如登天。
- 当地华人习惯将文莱称作“汶莱”（读音同“文”），是因为他们相信“文莱”加“水”会带来好运。

当今生活风貌

引言

文莱华社主要由福建人、广府人、客家人、潮州人与海南人组成。如今，超过60%的华人集中在文莱一摩拉县城区（Brunei-Muara），其中福建、金门人多聚集在首都诗里巴加湾，客家、广府及海南人则多分布在马来奕县（Belait）。

在这富裕的穆斯林小国，华人过着如鱼得水的生活。文莱马来人开放、开明的胸襟令两族之间相处和睦，未曾有过种族纠纷。华人也毋须信奉伊斯兰教，而只要效忠苏丹即可。除此之外，当地华人也享有组织社团、发展华教的自由，完好保存了华人的传统习俗、思想及语言。

华人多年来勤奋打拼，在经济上取得杰出的成绩。他们大多经营家族式生意，多从事杂货业、迷你超市及百货业。此外，华人社团积极参与国家活动，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

随着岁月的推移，华人对文莱的情感日益深厚，尽管大部分华人仍然无法入籍，但他们已将这小国视为终老的归宿。

富裕小国生活悠闲

“这里很太平，步调不快，工作也毋须太拼命。”当地华人如此形容这小国惬意的生活。

文莱面积不大，85%国土为原始森林所覆盖。这里空气清新，生活安适，多数人毋须为三餐而忙碌烦恼，整个社会的氛围悠闲惬意。华人也渐渐习惯把步调放缓，平衡而健康地生活。与其拼命工作，他们宁可多花时间在家庭、运动、休闲及宗教上，以追求素质较高的生活。

“我们平时会多花时间在家庭成员和亲戚之间的互动上，例如经常举办家族活动。”来自大家庭的林芳芳表示，由于文莱华人家庭的凝聚力较强，无形中加深了年轻一辈对华人身份及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

当地华人在生活上仍保持华人的传统习俗，以中餐为主食。虽身在回教国家，但华人并未被禁止吃猪肉，每天仍可吃到从东马进口的新鲜猪肉。

此外，华人也融入当地，都能接受辛辣味浓的沙爹、椰浆饭、马来炒面、烤鱼等马来食物。

当地的房屋面积一般都很大，宽敞的空间令人感到相当舒适。在洋房周围还有很大的空地以供停放多辆汽车。富裕的文莱人拥车率极高，每户至少有两部车子，当地华人常开玩笑说：“文莱的水比汽油贵，在文莱开车最划算了。”华人因此也习惯以车代步，还打趣说：“商店要是开在不便停车的地方，肯定要关门大吉。”

文莱全国禁酒，娱乐场所也不多，因此民风比较淳朴，但生活相对较为沉闷些。华人平时的娱乐就是收看卫星电视节目或看影碟，几乎家家户户都安装卫星电视，通过收看电视新闻，掌握世界各国的最新动态。

出了家门，华人不是逛街买东西，就是与家人朋友齐上馆子品尝美食，再不就到百货公司去吹冷气闲逛。华人兴致勃勃地说：“周末最大的娱乐就是跟家人朋友开车到邻国马来西亚的东部城市美里（Miri）或林梦（Limbang）去游玩，车程仅耗时一两小时，东西无论买的或吃的都很便宜。”

文莱地方不大，华人出门容易遇上熟人，彼此或多或少都有点亲戚关系，人情网络密实。此外，华社还有个有趣现象，即华人到餐厅里用餐时若碰上朋友或亲戚，彼此一定抢着替对方付账。这里还流传一种说法：“在文莱无论如何都不会饿死，因为一定有人愿意请你吃饭。”从中可体会到当地华人浓浓的人情味。

或许，正是这种亲切熟悉的感觉，迎合了华人心中对家园的向往。虽然国籍成问题，但他们懂得“有得必有失”，卸下了心中的疙瘩，眼前就是一片海阔天空。

百货行业独领风骚

和许多国家的华人一样，不少文莱华人也是由经商起家。

走出水村之后，华人涉足的商业领域很广泛，包括百货、医药、电器、机械、五金及钟表等。20世纪60年代，文莱大兴土木扩建基础设施，引进不少华人工程师、技术人员、机器技师、销售人员、建筑工人和经理等各方面的专业人士，扩大了华人的职业范围。

到90年代初，华人已在批发、零售、饮食、旅馆及建筑等行业占了重要的位置，还有一些人从事金融、保险、地产、投资与服务工作。一名开杂货店华人说：“1997年那一波金融风暴，令十几万名外劳撤出了文莱，消费市场陷入一片低迷之中。”在金融危机下，生意人自是首当其冲。

然而，华人凭着不畏艰苦的精神，以灵活多元的手法度过了难关。

天然资源是文莱的经济命脉，而其90%的物品包括食品、日用品都需依赖进口。由此，华人很快看出了市场的需求，并抓住商机，迅速在百货、杂货业中站稳脚跟。

华人的百货公司与超市遍布各城镇，而金门人所经营的，多属于家族式的传统杂货店、迷你超市等更占了当地市场的50%。无论在大街或小巷，这些百货公司、超级市场或迷你超市随处可见，相隔几条街就出现一家。

一名百货公司经理指出：“百货业的竞争很激烈，大家各出奇招，使出特价促销、抽奖送礼、产品区隔等策略来吸引客人。”大规模的百货公司财力雄厚，市场庞大，能从中港台地区大量进货，提供较低廉的价格。至于传统杂货店或迷你超市则难与竞争，生存的空间日益窘迫。

华和百货及第一百货，是文莱家喻户晓的华人百货商场，成为当地人购置日用品的好去处。

现年80岁的金门人林国民，是文莱著名的“百货大亨”。1947年，他孤身一人过来投靠叔叔，从杂货店助手做起，凭着勤奋刻苦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并于1976年在当地最兴旺的商业区施丽开设了第一百货。如今，集团旗下已有16家子公司，在主要地区都设有分行。

林老先生以闽南语总结多年打拼的心得：“拼搏、积极和勤俭，是我们华人成功的原因。此外在文莱不用交税，生意比较好做。”由于国库不依靠人民税收，政府实施免缴个人所得税、企业免收营业税的政策，这对开店经商的华人无疑大为有利。

然而，身处这过于安逸的环境，也使文莱人缺乏创业精神，因此未有大企业家出现。

政府在经济上还是以扶持马来人的发展为重点，规定某些特殊行业或重要经济行业只能由马来人经营。此外，唯公民才享有土地所有权和买卖权，华人从事各行都须与文莱公民共同经营。因此非公民的华人若想开店就得找个“人头”，而往往遭对方“吃掉”的事也就常常发生。这些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华人在当地的经济活动。

不少年轻华人到外国念大学，毕业后有两三成会留在国外工作几年，家长一般上也非常鼓励他们留在国外，他们认为：“文莱就业机会不多，先吸取一些外国工作经验后再回来会更好。”

那些选择回国的年轻人，很少会愿意继承父母的传统生意，而会从事会计、律师、电脑工艺等专业工作，另外少部分人也会选择自行创业。

文莱的种种福利是依靠石油、天然气收入来支撑。意识到石油终有枯竭的一天，文莱苏丹在十几年前提出了经济多元化的发展计划，近几年更积极鼓励外商前来投资，但收效仍不明显。

- 文莱的华人在百货业闯出一片天，当地马来人是最主要的顾客群。

华人社团积极活跃

“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道理，文莱华人了然于胸。

“一直以来，文莱华团都积极响应国家的活动，出钱出力，参与程度绝不亚于马来人，以此表达对国家和苏丹的效忠。”诗里巴加湾中华总商会会长林再云的这番话，显示了当地华社已主动靠向主流社会。

当地华人社团现有50个左右，以业缘、地缘性的团体为主，比较活跃的则约有十几个。其中，成立超过60年的诗里巴加湾中华总商会是少数影响力较大的团体，对内调解华社矛盾，对外则代表华人权益。

另外，成立9年的福建会馆则拥有最多会员，在华社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会员大多来自金门。除了给会员提供服务外，它还大力配合政府推行的政策，积极参与华社或政府举办的活动。

福建会馆主席林成国屈指算道：“会馆近期参加的活动有王储世纪婚礼、苏丹陛下华诞庆典、国庆日庆典、华社新春团拜、开斋节贺年、捐助国家孤儿基金会，以及参与文莱苏丹陛下登基25周年纪念碑和60诞辰纪念碑的筹建。”

华团和政府间每年都有互动，固定参加一些国家重要活动，如每年1月1日的独立日，福建会馆必全力配合皇室的庆祝仪式；7月15日的苏丹诞辰，则由中华商会承接烟花燃放等祝寿节目。平时皇室有什么婚丧喜庆，华团领袖也都欣然出席，以表关心。

除了先辈的努力，只有靠更多华人不断为国家付出，主动融入社会，他们始能为下一代争取更多的认同以及更大的保障。

华人以“凝聚我族，贡献国家”的方式融入文莱社会。对于国家，他们奉公守法，积极参与，尽力回馈；对于华社，他们维护华教，寻根溯源，肩负着重大的使命。

华团在支持华教、维护中华传统方面功不可没，大家都保持着“维护华教，支援华教”的精神，每年春节，不少华团都会颁发奖励金给会员的子女。

长期默默地付出，终于看到一丝回报。有九名长期为华社出钱出力，并对国家贡献良多的华人领袖，他们是林清注、方国珍、林德甫、方汶汀、黄迪福、温瑞祥、林玉成、吴景进和刘锦国，受到苏丹的表彰，被封为宫廷大臣（Pehin或不显）。

- 文莱华团除了代表华社参与政府和皇室活动，也不忘举办一些发扬传统文化的活动，可谓积极融入又不忘根本。

文莱华校 三语并重

只要能力许可，海外华人都会兴办华文学校，力保中华文化的根，文莱华人也不例外。

文莱目前有8所华校，其中5所是小学，另3所则同时开办幼儿园、小学部及中学部。为了配合国家教育政策，这些华校皆注册为非政府学校，但除了经费自主外，课程安排、教学时数及教员聘请均受教育部管制；小学、初中及高中毕业生，也都得参加教育部的统一会考。

这里的华校教学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大相径庭。除了华文及道德课以华文教学，马来文以马来语教学外，其他科目一律以英语教学，并且采用新加坡的英文教材。因此，这里的华校生都具备相当高的英语程度，毕业后只要考取剑桥A水准文凭，即可申请就读文莱大学或国外大学。

尽管目前华文已不是主要的教学语文，但由于学校前身是纯华校，学生也多为华人，因此华文学习的环境还算良好。下课后，学生多以华语交谈，学校的行政事务则以中、巫（马来语）、英三语并用。

汶莱中华中学许校长自豪地说：“华校生升学的机会与政府学校学生均等，甚至他们还多了一项优势——华文。”

如今，文莱华校生给当地社会大众的印象是：品学兼优。

华校重视课外活动，不仅要求学生拥有好的学业表现，还通过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组织及社交能力，使他们不仅在全国考试中脱颖而出，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一样可圈可点。醒狮、舞蹈、华乐等团体因表演水平高，多次获得政府和华团的邀请登台表演。

由于华校三语并重，并在政策上与政府相配合，加上华文的价值日益提升，如今华校的办学方针还得到了友族的认同。许多马来人、印度人及其他土著纷纷报读华校，学生人数日增。例如，2007年报读汶莱中华中学的马来人就有612人，占学生总人数的18%。

当地华校生能享有今日的地位，是靠前人一点一滴地争取而来。华校曾度过一段艰难岁月。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政府策划将中学改制为国民型学校。经八校董事部长达18个月的积极争取，才总算保住了它，但从此却失去了政府津贴，教纲也须依循教育部的规定。当时，董事会与华社出钱出力，一同捍卫华教，这薪火才得以传到今天。

一路走来，身为校友的许校长眼见母校的壮大，欣慰地说：“虽然每月要付一百多元学费，华人普遍上还是乐意将孩子送到华校来。部分孩子较多、学费负担较重的家长，也愿意让孩子读到小学毕业，奠下华文基础后再转到政府中学去。”

先辈们撒下的文化种子，如今都开成一朵朵艳丽的鲜花。随着中国的崛起，文莱华校也将拥有更多发展的契机。

- 华社最高学府汶莱中华中学校创校已八十多年，现有学生人数超过3千名。

新春佳节 列为公假

尽管住在回教国家，华人依然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半数以上的当地华人信奉道教，家中一般供奉多尊神像和祖先。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人数也占华人人数的25%。

在文莱首都，至今仍有一座香火鼎盛的华人庙宇——腾云殿。这座重建于1960年的古庙殿内供奉多尊神明，包括广泽尊王、玄天上帝、关圣帝君及保生大帝等。除了每月初一、十五外，每逢华人传统节日或各个神诞，腾云殿的香客总是络绎不绝。

“广泽尊王虽是福建人的神明，但在这里不同籍贯的华人都会来拜祭。我们相信腾云殿的神不光保佑福建人，也保佑全文莱的华人。”当地华人如是说。农历八月二十二的广泽尊王诞辰是腾云殿最热闹的一天，会重金聘请国外的歌仔戏团到文莱表演酬神戏，祈求善男信女永保安康，文莱国泰民安。

文莱是少数将华人新年列为公假的国家之一。当地政府规定大年初一为公定假日，举国放假一天。为了表示对华人传统的尊重，政府于2008年还宣布解除长达45年的燃放爆竹禁令，让华人能在新春时节开怀欢庆，为文莱增添几许热闹的新春气氛。

当地华人说：“文莱的春节气氛并不怎么浓烈，市区街道比平时还要安静，因为大家都利用难得的春假举家出国旅游去了。”其中，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文莱人最爱的旅游景点。

中秋佳节的气氛反倒较为浓烈，各大商家推出各种造型及口味的月饼，还有五色斑斓、神采各异的灯笼，营造出浓厚的佳节氛围。

- 多年前幸蒙苏丹开恩，腾云殿逃过了被拆除的命运。

邻国媒体开眼界

国小，眼界却不能小，文莱华人明白当一只井底之蛙的危机。

文莱当地虽没有出版华文报刊，但马来西亚的《诗华日报》、《星洲日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等华文报都在文莱设有办事处，每天发行文莱专版，一般在华人的书报社或茶室即能买到。

每天早上必到茶室喝早茶的陈先生，从手上的华文报中探出头来说：“一边吃早餐，一边看报纸，是这里许多年纪较大的华人的习惯。”

文莱华人每天都有阅读华文报的习惯，而且至少阅读一份，一些人家里还分别订购华文、英文报各一份。但一如其他国家的情形，这里的年轻华人也不太有兴趣阅报，多从电视、杂志及网络取得资讯。

有趣的是，这小国由于新闻不多，国民反而留意起邻国及世界的时事动态。譬如新加坡的华文报《联合早报》及英文报《海峡时报》，就有不少文莱的读者。

书报社老板透露：“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读者最多，因为资讯丰富，内容全面，是政府官员们最爱看的报纸。”此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发行的娱乐时尚或美食类的杂志也备受欢迎。

文莱的广播电台旗下，自1957年设立了一个中文台，至今开播超过50年，每天播放5小时的综合节目，丰富了文莱华人的生活。中文台的黎经理指出：“除了每天早晚各播出15分钟的华语新闻外，我们尽量制作较生活化的节目，提供实用的生活资讯，因此吸引了不少女性听众。”

此外，还有邻国马来西亚的国营中文广播电台“爱FM”和古晋中文台可供选择，让当地华人轻易就能收听到华语歌曲，并掌握邻国的最新动态。

说到网络媒体方面，则不得不提到[易华网](#)。这是一个专为文莱华人开设的网站，集合了50多个华人社团的资料及杰出华人的成功史，让全世界轻易取得文莱华人的资讯。

多年来，文莱始终都有一批爱好华文文学的华人，在孜孜不倦地创作。虽然不如邻国马来西亚或新加坡文坛那般的成熟而活跃，但几名当地华人也凭着对华文文学的热爱，成立了“汶莱华人作家协会”，相互勉励。

该协会曾与厦门大学联合主办“第六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并于2006年在文莱承办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由此可见当地华人热爱华文文学的程度，并不亚于其他国家的华人。

- 文莱国小事少，新闻不多，华人都爱看邻国的报纸。

其他资讯

改良中餐受欢迎

文莱国情开明，这里的马来人对中餐的接受度非常高——这情况在其他回教国家相当少见。

“马来人很爱吃中式料理，经常光顾华人餐厅，港式点心尤其合乎他们的胃口。”华人餐厅老板说。

为了吸引更多马来食客，一些华人还专门开设了清真式的中餐厅，采用符合回教规定的食材，以其他肉类取替猪肉，但菜肴仍保持中华风味，让马来人在兼顾教规的同时，也能品尝中华料理的美味。

例如，皇家汶莱饮食集团就在首都开设了几家清真点心茶楼，配合马来顾客的口味推出鸡肉烧卖，成了马来人最爱的点心。

- 马来人对中华料理的接受度很高。

苏丹与华社共庆春节

2006年，是文莱华社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

华社与王室共庆农历新年，即始于2006年丙戌春节。自文莱于1984年取得独立以来，当地华人首次邀请苏丹出席华社举办的“华社新春联欢团拜”。

自2006年起，新春联欢团拜成了华社每年年初的重头大戏。为了将华族文化的精髓完美地呈献于苏丹和皇室成员面前，筹委们都尽心尽力，积极凝聚华社力量为此活动筹款，并精心安排节目。

除了一系列富有华人传统文化色彩的表演如舞龙、华乐及华族舞蹈外，筹委会每年还精心筹划一个以文莱华人为主题的展览。

2007年的“十二生肖”展览及2008年的“参与与奉献”图片展，加深了苏丹及皇室成员对华人传统文化的了解，以及华人从早期到近代对文莱所作出的贡献。

这项活动对华社意义极大，除了展现华社的团结及爱国情操外，更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了解与融合。

- 华社领袖和苏丹、政府官员、皇室成员共聚一堂，体现了民族间的融洽。（照片由星洲日报提供）

结语

从漂泊到扎根，华人对这个朴素、富裕的袖珍小国日久生情，渐渐爱上这与世无争、宁静和乐的生活。如今，虽身处安居乐业的顺境，华人的心灵深处却不忘居安思危，除了对文莱“贡献与参与”外，也同时壮大华族的实力，以期能继续享有眼前的好日子。

东帝汶

引言

东帝汶地处东南亚努沙登加拉群岛最东端，西部与印尼相接，东南则隔帝汶海与澳洲相望。

犹如世外桃源的东帝汶，却有着坎坷的身世。它自16世纪开始就被葡萄牙统治，二战期间曾遭日本入侵。1975年脱离葡萄牙之际，却被印尼的军队进攻占领，此后这里战火不断。1999年，人民公投决定自治，经联合国托管两年半后，于2002年正式宣布独立。

饱经战火摧残的东帝汶，目前正处于重建阶段，社会 and 经济发展只能依靠外国援助推动。这里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却缺乏开采技术，超过70%的国民生活在贫困线下；咖啡、橡胶和紫檀木统称“帝汶三宝”，务农者超过总人口的80%，但粮食却无法自足。

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苦，但这里淳朴的民风，秀丽的景观、洁净的海滩、苍翠的丛林和绵延的山脉，都叫人流连忘返。有些华人，相信亦是因此而留在此地。

华人移民简史

虽然帝汶岛和中国远隔重洋，来往不便，但是华人却很早就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南宋的赵汝适在《诸蕃志》记载了华人曾经到这个盛产檀香的地方经商：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也提及泉州吴姓家族到东帝汶从事贸易活动的事迹。当时的华人大多数选在顺风时节扬帆南下，上岸之后就与当地土著进行交易。东帝汶的商品价格极低，商人们往往都能获得巨利而返。渐渐地，华人便开始在此定居。早在殖民势力入侵之前，华人聚落就已经成形。

根据资料显示，1511年，有3名广东人到东帝汶的欧库西砍伐檀木。3年后，又有两名华工随葡萄牙商人而来到东帝汶，并把檀香木运载回国销售。

华人最早靠岸的地点，相信是东帝汶以西的力帝山市（Liquica）。1800年，当这里的首都迁到帝力之后，从广东省前来东帝汶做生意的华人数更是大幅增加。1816年，荷兰的科尔夫少校从荷属西帝汶来到葡属东帝汶帝力的时候，就看到许多华人在这里生活。

在东帝汶的华人，也有来自澳门的。由于两地同是葡萄牙殖民地，当时不少澳门华商都到东帝汶寻找商机。

此外，东帝汶也曾是澳门华人囚犯的流放地。根据居留澳门的东帝汶裔神父弗兰西斯科·费尔南德斯（Francisco Fernandes）的说法，因为澳门地小，在殖民时代，葡萄牙殖民政府每年都会从首都里斯本开出一艘大船到澳门，将一批囚犯送往东帝汶服刑。大部分囚犯在恢复自由身之后，都会选择留在当地工作，甚至和当地土著通婚，落地生根，形成了早期的华人社群。

20世纪初是华人移居东帝汶较为频密的时期，这时前来的华人绝大部分是粤东闽西的客家人。华人社团、庙宇、学校和坟场也因而纷纷建立了起来，华商的身份和地位越来越高。根据统计，1935年这里共有3500名华人，占了总人口49万的0.71%。

在二战期间，日军侵占东帝汶作为进攻澳洲的跳板，华人遂无辜地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死伤无数，也导致1950年的华人人口减至约3100人。

1975年，印尼政府派军入侵东帝汶，这里的华人世界自此便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华人一直以来都掌握着东帝汶的经济命脉，可是在印尼入侵之后，华人的财产或被摧毁，或被没收。许多华人更担心会遭受排华行动的迫害，纷纷迁移至澳门、葡萄牙和澳洲；那些走不了的中低阶层，只好留在原地静观其变。

直至1999年的20余年间，东帝汶的华人数已从高峰期的两万人骤减到数千人。

然而，华人的悲惨命运并没有就此完结。1999年，在东帝汶获得独立之际，印尼民兵进行了大规模的烧杀掳掠，帝力市超过90%的面积均烧成焦土，这对华商造成的冲击尤其巨大。许多华人即使后来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保护之下重返东帝汶，但是面对着满目疮痍的家园，重建之路并不平坦。

独立之后，有些华人回来了，更有许多新移民从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文莱、香港、中国大陆以及印尼等地前来寻觅商机。

2006年，东帝汶爆发内战，受波及的华人再度逃亡，只剩下大约3000名华人。直至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东帝汶并且平定局势后，华人数才逐渐回升，帝力市的各行各业，也再次出现华人活跃的身影。

东帝汶华人失去了很多，但得到的也不少。尽管受尽磨难，他们对这片国土依然爱护有加，充满信心，有些甚至已经做好准备，决定要与它共同进退。

- 许多东帝汶土著至今仍然保存着中国的古钱币作为祭祀之用。这些钱币相信是在清朝时期，由来自华南沿海一带、香港或澳门等地的华人，到东帝汶来做生意时所留下来的。
- 离开了26年，卜念龙再度回到东帝汶经营旅游生意。手持着1969年在Laga中华学校拍摄的6年级毕业照，他对那段美好时光始终难以忘怀。

当今社会风貌

引言

刚独立的东帝汶，百废待兴，在短短的几年里，各地华商蜂拥而来，雄心万丈试图在这里开创新天地，这些华人新移民，有的是来投资的，有的从打工到创业做生意，有的把这里当作跳板，住上一段时间就会称居到澳洲。

早期的新移民主要来自东南亚各地，近年来则大多来自中国大陆的鞋民，他们以福建人为主，其次是浙江人。在此开店经商的个体户，加上中资机构员工、私营企业外派和建筑工人等等，目前东帝汶估计有超过2000名新移民，大多居住在帝力市。

土生土长的老移民，有90%是广东梅县客家人。他们大多已在这里繁衍超过4代，有的甚至是第20代了。然而，超过90%的老华人，早在几次动乱中已移居国外，留下的10%，或许没有能力离开，又或许是为了不忍舍弃辛苦建立起来的事业而坚守至今。

3500名保留东帝汶籍的老华人当中，只有1000人左右定居于此，其余的则在澳洲和东帝汶两地之间来回穿梭。还有一小部分的华人，被老华人称为“新侨”，他们是在印尼入侵时代到东帝汶做生意的印尼华人，主要是客家人、潮州人和福建人。

中文学校、华人社团、中华文化，在印尼占领前曾有过一段辉煌时期，但这一切都在随后遭到严重破坏。复办中文学校仍在争取当中，而中华商会已重新开放为华人服务。对于华社的未来发展，华人还是相当乐观的。

黄金遍地 商机无限

越乱的地方越多商机。许多华人秉持着这个信念，踏上这片土地。他们坦言：“这里使用的美金，看在眼里就是黄金了。”

1999年经历暴乱后，东帝汶满目疮痍，犹如一座死城。灾后重建，物资严重匮乏，平常5分钱的泡面，那时竟然要价6美金。“一大货柜的物品，区区14天就被抢购一空。”来自马来西亚，经营Sunly贸易公司的何万财如是说。

一切从零开始，竞争小，吸引了大批新华人涌入，连土生华人也回返家园开创事业。脑筋转得快的华人，迅速控制该国超过90%的零售和杂货生意，大街上的店铺，几乎都是华人开设的。

然而，他们今天的成就，却是冒着生命危险换回来的。

2006年爆发内战，炮火连天，但有胆量留下来守护店铺的华人，都说那是最赚钱的好时机。New 88餐厅老板曾德源表示：“最乱的时候，滞留在东帝汶的联合国和大使馆职员都打电话来订购食物，然后系派配有手枪的人来领取。货源来得不易，食品价格当然也水涨船高。”

如今，战乱时代过去了，局势渐趋稳定，华人经济如同枯木逢春。

手工、建筑、地产、贸易、零售业是土生华人的传统行业，他们大多开设超市、五金店、从事咖啡、布料等当地特产买卖。新加坡华人多数从事二手汽车以及汽车零件买卖生意，也有不少人在这里开餐馆和酒店。由新加坡华人经营的樱花酒店（Hotel Sakura）有5层楼高，为目前东帝汶最高的建筑物。新加坡华人也计划投资开设东帝汶首家购物广场，占地约19万平方公尺，并兴建拥有450间客房的酒店。

大部分印尼华人经营电器店，而马来西亚华人大多开设杂货店和餐厅，杂货货源主要来自印尼，食品则经由新加坡和澳洲入口。生活必需品都依赖进口，这里生活水平之高可想而知。

联合国进驻东帝汶以后，常驻机构人员和驻军成了当地的消费主力。仅是维和部队的人数，就曾高达8950人，现今仍有数千人在当地执行任务。2000年至2003年期间，加油站数量一度暴增，而且大多张挂着中文招牌。后来，市场趋向饱和，加油站生意一落千丈，直到最近联合国驻军增加才有所回升。

外资公司也是华人商家重要的生意来源。许多外国大企业都会在这里购入大量杂货，然后到贫民区派发给需要救济的人。

在华人眼中，东帝汶就像是新生婴儿，备受国际社会呵护，未来发展值得期待。为了进一步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东帝汶政府也逐步放宽移民政策。

近年来到东帝汶探路的，以福建人占多数。帝力市中心内，超过一半是他们开设的日常用品进口、批发和零售店铺，甚至形成了几条华人批发街。这些新华人有部分最初是建筑工人，后来开始摆摊子做买卖，租借店面当老板。建立起生意基础后，他们开始把亲朋戚友接到东帝汶来。家族式的大批移入，使东帝汶华人群体日渐庞大。

对黑眼睛黄皮肤的华人，东帝汶人也总是怀有一份感激之情，皆因中国政府一直对东帝汶施予援助，中国曾捐赠超过8000吨大米和50吨食油，以解决饥荒问题。此外，中国还为东帝汶政府援建外交办公大楼、总统府，并派遣医疗及维和部队到当地服务，协助灾后重建。

此外，当地人相当信任中医疗法。“身体出了毛病，他们都不愿意动手术，而向中医求诊。”华夏专科门诊黄连心医师如是说。目前，帝力市共有3家华人诊所，兼售中药和西药。

至于饮食行业，华人除了开设传统的中式、葡萄牙式、东南亚式餐馆外，也经营西式快餐店、售卖汉堡包、炸薯条等套餐，颇受当地人欢迎。

如何区别老华人与新华人的商店，有两种说法：一，老华人和土著一样有午睡的习惯，中午吃饭后是不开店做生意的，开店的都是新华人；二，挂上中文招牌的一般是新华人，走在印尼华人为主的电器城大街，则几乎看不到一个中文字。

东帝汶刚走上经济改革之路，新兴行业的发展空间很大。华人登陆东帝汶的故事，相信还会延续下去。

- 葡萄牙时期所使用的东帝汶纸币上印有手写的中文数字，反映了当时华人在当地经济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 东帝汶满目疮痍。仍处于灾后重建期，商机无限。
- 华人投资经营的加油站处处可见。
- 大部分华人商店没有张挂中文招牌，却贴着显眼的对联。
- 来自福建省的新移民，在帝力市大量“复制”杂货零售、批发商店，数条批发街渐渐成形。
- 通讯业在东帝汶才刚起步，3家手机店皆由华人经营。

文化差异 磨合需时日

东帝汶土著有着乐天知命的性格。他们可以到海边呆坐一整天，肚子饿了就投入大海，捕捉大自然赐予他们的鲜虾活鱼当食物。物质生活不充裕，有的还住在家徒四壁的茅草屋，孩子在烈日当空下赤脚行走，必须走上好几公里路去上学。

“可能是个性使然，有些土著比较懒散，每天无所事事，男人们也不出外工作挣钱。发薪后，他们会买酒畅饮，或到高级餐馆大吃一顿，两三天内就把工资花光，然后预支下个月的薪水。”及时行乐是他们的生活态度，这令许多华人老板感到不解。

不过，也正因如此，华人在这里找到了赚钱良机。“土著售卖蔬菜、水果、海鲜，都是以一堆两堆或一只两只，而不是以重量来计算，结果成交价可能还不到实际售价的一半。”华人笑说。

在思想观念方面，华人和土著也大不相同。以手机为例，华人是为了生活所需，而土著却只为了炫耀之用。

东帝汶3家手机店皆是华人开设，华人说：“当地人对手机这玩意儿相当着迷，有的甚至不惜花上整个月的薪水来购买，可是却没有多余的钱买手机SIM卡。”对一些土著而言，手机仿佛不是用来联系沟通。而是握在手中的装饰品。

土著爱面子，也可以从他们办喜宴的方式看出来。即使经济情况不允许，土著始终坚持以烧猪、烧鸡、甜品等葡萄牙美食来招待客人，最终换来一屁股债，但他们总是这样回应：“明天的事，明天再打算吧！”

土著追求悠闲游哉的生活，但由于长期营养不均，加上缺乏医疗设备，他们的存活年龄一般不到60岁。

退休后到东帝汶从事酒店管理的新加坡华人郑汶昇曾有过啼笑皆非的经验。他笑着说：“有个土著员工对我说，老板你好可怜呀，这么老了还没死，还得在这里辛苦工作，很可悲啊！我听了之后无言以对，真不知是好气还是好笑。”

可是，跟土著相处久了，华人或许会爱上他们的善良和单纯。

“他们非常介意别人用粗言秽语辱骂其父母。只要彼此以礼相待，凡事讲理和互相尊重，他们也会以诚相待，甚至以最好的方式回报你。”何万财贯彻这种相处之道，认养了几名土著员工当干儿女。

面对思想差异的冲击，华人仍然努力寻找着最好的磨合方式。

东帝汶法律制度仍欠完善，加上政局动荡不安，1999年到2006年间更接连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暴乱，留下来的华人心有余悸，只好把命运交给上天。

“在帝力生存，必须要勇于面对现实。”这是许多新移民的心声。土著喜欢喝酒精浓度高的土酒，一旦醉酒就会行凶闹事，如向路过者抛掷石头、砸破车窗或闯进店铺抢劫等。“土著不喝酒时是好朋友，喝酒之后就翻脸不认人。”华人百般无奈，店铺打烊后只好乖乖呆在家中。

庆幸的是，这里没有太多排华情绪，共同为国家打拼的精神反而更浓烈。

华人要面对的，还有致命的蚊症。据说，东帝汶70%的蚊子带有登革热（骨痛热症）病毒，其他的还会传播疟疾，令人闻之丧胆，但土著自有对策——以木瓜叶来治蚊症，尽管功效未经科学验证，但许多华人已纷纷跟进。

东帝汶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华人说：“很多事情即使有钱都办不到，生活枯燥得像坐移民监一样。”多姿多彩的娱乐消遣是一种奢望，但是对一些华人说，只要能放开胸怀去感受这里的原始风貌与怡人景色，闲暇时唱唱卡拉OK、搓搓麻将，或爬山潜水、到海边烧烤、累了还可以飞到邻国的旅游天堂巴厘岛度假，日子过得还是挺写意的。

这里年久失修的道路，华人开着四轮驱动车穿过坑坑洼洼的路面，电单车与贴上联合国标志的维和部队车辆呼啸而过，迎面而来的客货车挂满需要风干的海鲜，加上路旁猪狗成群，都是此处司空见惯的景象，也是华人眼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 东帝汶华人大多数都在商界打拼，不过也有一些例外，这些华人则选择了投身政界，如基础设施部长黎世芳（Pedro Lay Da Silva）及旅游与商业部长Zil Aves。
- 何万财与其干女儿相处愉快。

商会华教 破茧而出

东帝汶中华商会成立于1912年，为当地首个华人社团，它后来还协助筹设当地唯一的华人义山及十多间中文学校等。除了商会之外，当时还有约15个不同性质的华人社团组织。

早期的东帝汶华人，中文水平还算不错，全国各县包括山区都曾开办中文学校。“那时，很多华人家庭一般有6个孩子，每个县平均有300名华人子弟学习中文，就连身边的土著朋友都会说上几句中文。”符孝勤如是说。最具规模的要数创校于1911年的帝力中华学校。它最初只是租用小房间授课，1962年通过募捐，合众人之力兴建校舍，全盛时期约有1000名学生。

当年的中文教育体系相当完整，可从幼稚园、小学读到初中、高中，毕业后还能到台湾深造。然而，1975年印尼入侵，实行同化政策，这一切便彻底被摧毁了。

印尼政府关闭中华商会及所有中文学校，并占据了会所与校所。中文教育不复存在，中文刊物也禁止流入东帝汶，华人子弟顿时丧失学习中文、传承中华文化的机会。此外，华人社团组织遭取缔，并终止一切活动。

随着东帝汶局势趋稳，中华商会于2003年重振旗鼓，开始从事一些文化及慈善活动，如在春节和独立日表演舞狮、捐赠救灾物资等，获得当地社会的赞赏。商会除了充当东帝汶经济发展的桥梁，也肩负着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并努力协助新移民融入当地社会。

“这里华人社群不算大，几乎做生意的华人都加入了商会，大家互相认识，也没什么争吵和摩擦。新老华人文化大致相同，但老华人因曾在这里经历过种种艰辛，知道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来之不易，所以希望新华人多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尽量与土著和睦共处。”现任中华商会会长符孝勤如是说，可见商会任重道远。

经过多番争取，政府已协议归还商会会所的拥有权，但目前仍需租借给政府作办公之用。商会紧接着要做的，就是索回帝力中华学校的校舍，并出版当地首份中文会讯。

目前，商会每星期开办3堂中文补习班，下午5点半开始上课，为时1小时。学生一般是华人子弟，在家里大多以客家话交谈，在学校学习的是葡萄牙文、英文和印尼文，唯一有机会接触中文的，就只有在补习班。

中文教育经历了数十年的断层，如今东帝汶有整整两代华人不会说华语，对中华文化不甚了解。

“我们要复办中文学校，唯有向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取经，引进大量的中文教师。这条路很漫长、崎岖，但我们抱持希望，一定会坚持下去。”符孝勤踌躇满志地说。

- 华社筹建的华校，自印尼入侵开始就被政府占用至今，一些华人家庭只好把子女送到国外求学。
- 随联合国维和部队到东帝汶的中国警员在中文补习班授课。

土著拜关帝 华人叹不如

建于1936年、位于帝力市中心的关帝庙香火非常鼎盛。“庙宇每天早上7点开门，一直到中午12点关门，至少有20多人来上香膜拜。华人一般只会在初一、十五来上香，平常以土著占多数。”74岁的庙祝方良遂说。

土著膜拜关帝的虔诚，华人常常自叹不如。有部分信奉天主教的土著甚至天天到关帝庙求签烧香，祈求神灵保佑。

当地人称关帝为中国神，他们深信，关帝保佑华人的同时，也对当地人一视同仁。这里流传着一个说法：二战时期联军向关帝庙投下两颗炸弹，结果竟然都没有引爆，令当地人啧啧称奇。“纵使国家多次遭受战乱破坏，周遭千疮百孔，但关帝庙丝毫无损。”土生土长的方良遂以粤语说道。

1977年，关帝庙旁增建了观音堂，面积稍小，加上庭院共占地1000平方公尺。红墙绿瓦，在众葡萄牙式建筑中显得独树一帜，也是帝力市内仅存的中华特色建筑。

较偏远的力帝山市，仍保留着超过百年历史的关帝宫和观音宫。“以前这个城市住了很多华人，关公像和观音像都是先人在上个世纪从中国带过来的。后来大家都搬走了，目前这里只剩下五六户客家人。”73岁的钟奇甫一直守着古庙，兄弟姐妹早已移民国外，唯独他与土著妻子和子女们不曾离开过。

帝力市近郊有座华人坟场，占地十多公顷，矗立着约1500座传统样式的华人墓碑。最古老的一座建于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年），印证华来到东帝汶的悠久历史。

立墓碑者以黎姓、赖姓和杨姓居多，而较具规模的墓碑，不少是来自澳门的成功华商。“这里不分宗教，而且免费提供墓地，只要死者家属出钱立碑即可，因此每座坟墓的设计和大小都不相同。”管理员说，春祭和清明节期间，大批华人都会前来拜祭。

华人在保留自身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不忘欢度当地节庆，如元旦时举办派对和大跳西方舞蹈，圣诞节派发红包等等。

- 关帝庙香火鼎盛，土著也经常到庙里求签祈福。
- 华人坟场内矗立着各式各样的墓碑。

结语

这里还是一个未定型的华社。

老华人大多眷恋这片故土，但年轻一代却伺机而动；有朝一日，老华人可能将跟随后辈移居他国。陆续到来的新华人，或许只是过客，又或许会像前辈一样，作长久居留的打算。

无论如何，华人依然细心灌溉，希望它茁壮成长，迎向更美好的未来，诚如该国所提倡的口号——“Goodbye the conflict, Welcome the develop”（告别纷争，迎向发展）。

- 从战火创伤中慢慢修复的东帝汶百业待兴。

圣诞岛

引言

圣诞岛位于印度洋东北部，北距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约500公里，东南距澳洲的西北角约1565公里。四面环海，沿岸大多为悬崖峭壁，约70%的面积是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来自英国的威廉·迈纳斯（William Mynors）船长于1643年的圣诞节发现了这个岛屿，于是把它命名为“圣诞岛”。1946年起，它成为英属新加坡的领地；1957年，新加坡以290万英镑把它转让给澳洲，圣诞岛自此成为澳洲的海外领地。

岛上族群由华人、马来人及欧洲人组成，多元文化兼容并蓄。早期华人远渡重洋来到这座孤岛，如今已成为该岛的最大族群。他们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习俗，在这里展开新生活，既逍遥又自在。

华人移民简史

根据记载，1898年有200名从广西来到这里的契约华工，和磷酸盐矿公司签了3年合约。当时，他们的右手背上都各有号码的烙印。

在短短10年间，磷酸盐矿公司陆续从广东省以及海南岛引进更多华工，致使华人从最初的200人增至1100人。可是，由于物资匮乏，加上华工又长期缺乏营养，结果有超过一半的华工患上脚气病，客死异乡。此外，岛上的磷酸盐矿在1914至1918年间产量大减，更导致华工的人数急速下降。

华工每天在日晒雨淋下以锄头和铲子挖掘磷酸盐，再以手推车将盐矿从山上运到山脚下，吃的是大锅饭，住的是茅寮，日子过得非常艰苦。在那个年代，岛上完全没有娱乐，只有随处可见的鸦片馆及赌馆，许多华工因而染上烟赌恶习，结果欠下了大堆债务由于债务缠身，合约只好一续再续，故而长期留下。

来自海南岛的何达华于1930年踏上圣诞岛。根据他回忆，当时每天的工资是9毛新币，并被分配到一包米、4罐牛油、两罐牛奶，工作不算十分忙碌，生活也可说是颇为轻松。履行了3年合约之后，他便回到海南岛成婚，并将妻子接过来，之后的岁月都在这个岛上度过，从此再没有返回家乡。而今他已年过90，是岛上最年老的华人，口操流利的海南话。他的孩子则大多数已移居澳洲，只剩下幼女和他相依为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磷酸盐矿的开采工作被迫中断，员工受到战乱波及，也必须撤离到澳洲去。二战结束之后，磷酸盐矿的开采工程重新启动，盐矿公司开始通过代理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招聘大量华工。由于征聘启事列出优厚待遇，华人毫不犹豫便签下3年合约，决心到该岛打拼。

抵步之后，华人始发现这个岛上除了磷酸盐矿外，就一无所有，异常荒凉。然而，合约都已经签订，后悔莫及，华人唯有硬着头皮留下来再作打算。

华工们有的负责开车，有的推泥粉车，有的挖矿；而他们的薪金也有技术人员及劳工之分，前者每日有12元新币，后者则有8元新币。克勤克俭的华人在下班之后还兼职替人除草、煮饭、打扫等，希望能多赚一点钱。

在这里，吃一顿饭只需要大约25分新币，加上根本无处可消费，华人要储蓄并不算太难。

由于房屋有限，只有工头和技术人员可以申请房子，并获准将家眷带来；而劳工所居住的单身宿舍，则只有8平方米大的空间，能容下一张床及一个柜子，设备十分简陋，也没有热水供应。“当时我们每天用冷水洗澡，每天都是边跳边洗。”在岛上住了近40年的何胜光，对这一段过往的生活经历，好气又好笑。

1970年代为移民浪潮的高峰期，岛上的华人约有三四千人，虽然人数很多，地位却非常卑微。当时白澳政策无孔不入，一些泳池和俱乐部都只限白人使用；华人只要一步入白人居多的银城（Silver City），警察就会前来干涉。此外，华人开车不可越过白人，华人与白人同工却不同酬，欺压华人的行为层出不穷。

华人若是不慎逾越雷池，其工作证上便被盖上NTR(Not To Return，即不得入境)的字样，然后被遣送回国，永远不得重返圣诞岛。华人不想丢了饭碗，所以只能忍气吞声。

直至1975年，圣诞岛职工总会正式成立，工人的权益才开始受到重视，经过许多次的罢工及谈判，华人终于得以享有同工同酬的待遇。之后，随着白澳政策的废除，圣诞岛才逐渐形成一个既包容又开放的社会。

权益得到了提升，华人的生活也因此逐渐改善。但是到了1984年，磷酸盐矿公司减少开采活动，因而献议员工接受自愿被裁退的计划，自愿者每人将可获得2万3000澳元的赔偿金。当时，在澳洲购买房子只需要3万澳元，于是有许多华工都接受了这项献议，向一起打拼的工作伙伴告别，离开了这个生活多年的海岛。

当时华工是分3批离开圣诞岛的，第一批有249人，第二批是百多人，第三批的人数最多，有500人左右。此后，就鲜少有新移民迁入，岛上华人人数有减无增的状况维持至今。

- 何达华把青春奉献给了圣诞岛，大半辈子不曾离开，余生也将在此度过。

当今社会风貌

引言

圣诞岛华人从高峰期的三四千人下降至现今的400多人，其中以来自马来西亚的占多数，也有部分来自新加坡。由于少有新移民涌入，加上年轻一辈陆续移居澳洲，岛上华人人口老化的现象愈加显著。

华人以打工为主，约200名华人在磷酸盐矿公司工作。经商的华人不过十多人，商铺屈指可数，只有3家杂货店、两家中餐馆、两家汽车修理中心、两家出租车公司、一家迷你市场、一家宾馆及一家建筑公司。另有华人在政府部门工作，包括两名华人警察及3名税务官员。

圣诞岛地方不大，主要道路只有3条，华人每天不外乎上班、下班、休息，生活悠闲、有规律。华人社会就像一个大家庭，彼此常相约聚餐，见面总是寒暄一番，那浓厚的人情味弥漫在整个海岛，是金钱也买不到的亲情。

部分华人已入籍澳洲，并在当地置产，为孩子教育及日后的生活作好安排；有些保留原有的国籍，落叶归根，有些则在家乡与圣诞岛两地往来穿梭，漂泊不定。

华人说：“有福份的人才会来到这里。”的确，这里赚钱不难，存钱更易，毕竟消费的地方不多。更重要的是，这里治安良好，那份安全感，叫人乐以忘忧。

打工一族 轻松自在

圣诞岛流传着一句话：“打工比当老板好。”

的确，磷酸盐矿工的上班时间从上午7点至下午4点，工作9小时，扣除喝早茶、吃午饭及喝下午茶的时间，每天工作不过6小时。工作轻松，年薪却最少有3万多澳元，加上每月的生活津贴、每年的调薪，收入相当可观。这种优差，当然比当老板好。

高薪以外，福利也很吸引人：每年6个星期年假，另加两张免费的双程机票，可选择回家乡探亲或到澳洲探望留学的子女。这些福利令许多打工一族称羡不已，因此在同一个领域、同一家公司服务超过30年的华人比比皆是。

在这里永远不会出现手停口停的状况。万一失业，华工依然可以领取失业金和福利津贴。单身者，双周可领取498块澳元，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每月则可以领取千多块。换句话说，失业者不单生活费不成问题，还有能力出国度假。

没有穷困潦倒的忧虑，没有负担和压力，华人的生活过得轻松惬意。

“快快乐乐，有工做工，没工找阿公（政府）。”王益瑞在岛上住了32年，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怡然自得。

华工的奋斗历程也不是一路平坦。1980年代末，澳洲政府曾以环保为由，关闭了磷酸盐矿区，后来在职工总会的斡旋下，工人们群策群力筹集了300万澳元，于1991年接管磷酸盐矿公司，并在热带雨林资源不受破坏的条件下恢复开采活动。1998年，磷酸盐矿公司与澳洲政府签订为期21年的矿产开发租约，直至2019年。

当地华人说：“少了磷酸盐矿，圣诞岛就什么也没有了。”的确，磷酸盐矿是圣诞岛的经济支柱，也基于此，才延伸出其他经营项目。该岛的杂货店及中餐馆数量，刚好能应付岛民的需求量，少一家问题不大，多一家则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万一开采合约不获延长，华人或许会因失去工作而离开，并引发骨牌效应，导致中餐馆、杂货店结业。

除了磷酸盐矿，圣诞岛其实还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那碧绿的印度洋、浩瀚的热带雨林、壮观的红蟹大迁徙、珍稀的野生动物，都有着过人的吸引力。

每年11月尾至翌年2月，成群的红蟹从浩瀚的林海迁居到大海产卵，再从大海返回丛林的怀抱。千万只红蟹遍布岛上主要公路，宛如一张色彩亮丽的红地毯，蔚为奇观。当局为了保护红蟹，还特地建造一座桥让红蟹过路。

遗憾的是，该岛的旅游设施不够完善，往返该岛的机票价格高昂，始终无法招来太多游客。

- 圣诞岛早期移民多来自广东省，因此许多路牌都以粤语直译，如Tong Yan Loh（唐人路）、Xian Sang Loh（先生路）、San Mao Loh（山猫路）、Shang Zhai Loh（生仔路）等等，趣味十足。
- 在磷酸盐矿公司工作轻松，薪水高、福利好，很多华人一做就是30多年。

悠闲快乐 与世无争

起初，华人抱着淘金的心态到来，心想3年合约期满，挣够了钱就离开。或许是习惯，又或者是容易满足，合约续了再续，时间消逝，一晃眼黄金岁月都在这岛屿上消耗了，心里更衍生出一份归属感。

“去到哪里都不习惯，还是回来了。”经营旅馆的陈森吉不是未曾离开过，只是这里的一景一物和人情味，让他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决定回来。“这个地方就是那么奇特，总是令人想念，来了就想待下来。”

华人的休闲生活从下班后才真正开始。下午4点过后，有的华人相约打羽球、跑步、散步，晚上再到餐馆用餐，或者在家煮几道小菜。饭后，看看电视、串串门子、到酒吧解闷，或到半山公馆赌上一两把，生活清闲自在。

纵使没有购物商场和娱乐中心，物质生活并不丰裕，精神生活却无比富足。

“或许有人说我们和外界脱节了，不过，我们在这里一样看新闻，一样知道世界大事。这里生活平静、安全、无忧无虑、车子、房子不上锁，也从不担心。”杂货店老板娘黄梅心非常享受这里的生活，已把它视为第二故乡。

周末，华人喜欢出海钓鱼、郊游、野餐、烧烤，节目非常丰富。也有的出席宗教聚会，洗涤心灵。聚餐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华人喜欢轮流请客，烹煮几道菜肴，邀约几个好友，边吃边聊，时间过得特别快。没有强大的竞争压力，日子轻松简单，胜过一切荣华富贵。

华人、马来人及欧洲人在岛上和睦共处。这里没有冲突、歧视，大家尊重彼此的宗教、文化及语言。每逢节庆，各种族也打破藩篱，邀请友族同胞一同参与。

身处在一个宁静的岛上，做事似乎不需要太急躁。在这里，工作气氛是轻松的，步调缓慢是可以被接受、被原谅。接到任务后，大伙都很有默契地等到第二天才去处理，不会赶在一天内完成。

“追不上时代的步伐，习惯什么事情都不紧张，还是留在本岛好。”家庭主妇谢水玉习惯了岛上的生活节奏，那清幽的环境更叫她难以割舍。

圣诞岛四面环海，孤傲地伫立在海中央，华人形容它就像一座自由的监狱，可以在岛上自由活动，却不能随意离开，皆因该岛对外就只有班次有限的空运和船运。

生活是自己选择的，享受与否在于心态，只要接受了，就会把它的优点放大、缺点缩小。在这座孤岛上，没有抢劫、没有勒索，犯罪率几乎是零，加上地方小，彼此互相认识，任你偷窃犯案，也无处可逃，最重要的是，大家丰衣足食，根本不必作奸犯科。难怪有人说：“警察只负责管交通就好。”

生活素质好，不拘谨、不约束，烦心的事情不多，简简单单，华人感觉越活越年轻。“没有人能看出我们的真实年龄。”华人自豪地说着，眼神清澈，浑身充满活力。

日子过得轻松自在，但由于岛上物资匮乏，吃的和用的都依赖进口，运输成本增加，导致物价高涨，消费水平甚至比澳洲还要高。

进口食品主要靠空运或船运，不过，该岛的飞行航道短窄，降落时得花一番功夫，若遇上天气不好，可能须折返，致使食品无法如期抵步；至于船运的货品，偶尔也因浪大，船只无靠岸，而延迟交付。

食品进口取决于天气，因此家家户户都有囤粮过日的意识。每逢星期一，飞机降落或货船靠岸后，大伙儿就一窝蜂涌到杂货店，选购新鲜的蔬果、肉类，以填满一星期的需求。进口的食品多来自马来西亚及澳洲，除了罐头食品外，都是一些冷冻食品，如包子、糕点、粽子、蔬菜、肉类等。

人口少，消费市场小，摆在杂货店陈列架上的罐头食品有时候会囤放至过期、及时发现的消费者或许会要求业者退钱或换取其他货物，有些则把食品丢掉。基于此，华人购买食品或酱料时，都会特别留意生产日期及有效期限。

位于半山（Poon Saan）的咖啡厅提供早午餐，是华人最爱光顾的地方。餐厅每天只卖一道面食作早餐：星期一咖哩面、星期二炒粿条、星期三云吞面、星期四卤面、星期五虾面；午餐是三菜一汤的套餐，每份十块澳元。没有眼花缭乱的选择，你只能选择吃或不吃。

这里用餐按时按点，早餐从上午6点至11点，午餐从上午11点至下午2点，晚餐则从晚上6点至10点，岛民也因此养成有规律的饮食习惯。万一误点就得饿肚子，或者自己在家里烹煮。

随着磷酸盐矿区重开，华人开始在当地置产，把原先租用的房子买下，以保障未来。华人集中居住在3个地点，分别是银城、半山及车头仔（Drumsite，又称山上）。

银城是欧洲人留下的，设计具欧洲度假村格调，有前院、后院、客厅、饭厅、3间睡房、厕所，环境宽敞舒适；半山有3栋建于1960年代的组屋，具有新加坡特色，楼高3层，设计简单，内有浴室、厨房和两间卧室，空间虽小，但设备一应俱全；车头仔的独立式洋房，跟银城的很相像，只是可用面积较小。

前院有神龛，摆放着一两盆富贵花，是华人房子的特色。客厅的天花板有一把大风扇转动着，墙上挂着日历，用金银饰品、佛像、中国结、扇子、山水画等加以点缀，即使换了新环境，华人还是依照家乡那套方式生活着。

华人出门习惯穿背心短裤，外加一双拖鞋，在气候干爽的海岛上，舒适自在的装扮最适宜。这里没有服装店，华人的衣物都是每年回乡或出国度假时购买的。

圣诞岛的交通不方便，巴士每两个小时才川行一次，华人鲜少会顶着大太阳在候车亭等巴士。因此，每户华人家庭都至少拥有两台车。

这些车都是澳洲的二手车，虽然有点残旧，但胜在价格廉宜，在岛内驾驶，问题不大。至于喜欢户外活动的华人，则必备一台四轮驱动车，方便开进丛林游山玩水。

有人形容这是退休的好地方，也有人认为这里不适合退休生活，因为除了工作，就什么都没有。唯有长居于此的华人才明白，什么留住了他们的脚步。或去或留，他们早已心里有数。

- 圣诞岛盛产“山虾”（即椰子蟹），在岛上出世的孩子被称为“山虾仔”或“山虾妹”，老一代的移民则被称为“老山虾”，用来形容他们像山虾一样长居该岛。另外，山虾具有往后退的特性，比喻华人待久了，行为思想退化。
- 华人晚上到酒吧喝酒聊天，轻松度过每一天。
- 飞机降落或货船靠岸，就是华人忙着采购新鲜蔬菜的时候。

望子成龙 两地相思

圣诞岛社区学校，集学前预备班、小学及中学于一身，目前共有160名学生，其中华人子弟约占65%。一直以来，该校只提供初中课程，学生念完初中，必须到澳洲升学，或者转到岛上的技术学校就读；直到2002年，该校增设高中班，华人子弟可以在当地念完高中，才到澳洲升学。

学校按照澳洲教育体制教学，以英文为主，校舍面积虽小，但设施完善。由于华人学生众多，中文被列为外语，每星期共有两节课。

学习时间有限，成效不大，因此华人子弟大多只能掌握简单的中文字。相对来说，他们更重视到澳洲留学。“孩子以后步入社会，不懂中文，影响不大。”谢水玉在家和孩子以福建话沟通，认为孩子不懂得写中文没关系，会说就足够了，这也道出许多华人父母的心声。

即使孩子没受过中文教育，不少华人仍坚持在家中以华语沟通，和朋友交谈则以粤语或福建话为主。这里犹如马来西亚小镇的缩影，各种籍贯的人齐聚一堂，华语、福建话、客家话、粤语、潮州话不时会在耳际响起，既亲切又温馨。

为了方便孩子到澳洲留学，华人一般会在澳洲置产，母亲则充当陪读，同时替孩子打点家务。随着妻子及孩子离开，圣诞岛上也就出现许多“单身爸爸”。

这些“单身爸爸”留在岛上工作挣钱养家，为了孩子的前途，和妻子、孩子聚少离多，饱受思念之苦也在所不惜。一家团聚，必须等孩子放假或父亲请假，他们协议每半年往返澳洲或圣诞岛一次，为维系感情作出努力。

天底下也唯有父母亲，会无怨无悔为孩子奉献及牺牲。思念的煎熬化成前进的动力，苦尽甘来或许是华人所期盼的吧！

- 圣诞岛社区学校里，三大种族一同学习，气氛融洽。

风俗延续 人情味重

圣诞岛华人对维护文化传统及风俗习惯，可说尽心尽力。岛上十多家庙宇被打理得井然有序，华人传统节日深获重视。

春节是华人最重视的节日，而澳洲政府也把春节列为圣诞岛的公共假期，岛民可享有两天假期。另外，该岛也配合春节推出生肖邮票，那一枚枚精致的邮票，除了说明春节的由来，也显示华人地位受到重视。

春节期间，华人有的回家乡团圆，有的留在当地。每逢除夕夜，华人吃过团圆饭后，都会到庙宇供奉神明，祈求家人平安，度过丰衣足食的一年。大年初一，舞狮团队到每家每户拜年，锣鼓喧天，一片喜气洋洋。社团也会在这天举行大团拜，华人互相拜年。

清明节及中元节也是岛上非常热闹的节日。华人一般会在社团负责人的带领下到先祖的坟墓祭拜。华人公墓有两个，一个位于大路旁，另一个则在深山，必须穿过崎岖险峻的羊肠小道。

位于深山的公墓原是一个乱葬岗，早期华人患上脚气病去世，为了避免病菌传染，都被埋葬在这里。由于没有确切的死亡人数及名字，华人公馆在该处立下逾百个墓碑，碑上刻有“圣诞岛开埠先辈之坟”的字样，除了纪念先辈的贡献，也希望先辈安息。

中元节也称为“鬼节”，华人公馆每年都会举行中元法会，从外地邀请道士来诵经，普渡往生的先辈。长长的桌子摆满祭品，焚烧一袋又一袋的冥纸，拜祭仪式从下午进行至晚上，几乎全岛的华人都会出席观看这一年一度的盛事。

至于其他的节日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及冬至，华人也不会忽略。应节的食物及礼俗，华人都依照家乡的传统，有时甚至保留得比家乡更完整。

华人的宗教信仰非常多元，有民间信仰、天主教及基督教等。其中民间信仰者占多数，他们家中摆放着供奉神明、祖先的桌子，门外设有神龕；早晚上香，祈求神明保佑，农历初一、十五则到庙宇上香。

圣诞岛面积不大，可是庙宇数量之多，叫人大开眼界。全岛共有13座庙宇，据说都是先辈搭建的。在那个物资不充裕的年代，先辈使用仅有的材料，盖了一间又一间的庙宇，虽然简陋，但至少让精神有个寄托。

每间庙宇都有一个管理委员会，负责策划每年的节日庆典，并且定期清理庙宇。庙宇庆典是岛上的一大盛事，华人都出钱出力。而香火最盛的庙宇首推位于八厂的顺天宫，该庙历史悠久，立在偏远的车头仔，背山面海，环境优美，华人不辞劳苦，周末或农历初一、十五都会开车到来上香。

民间信仰略带迷信色彩，但作为华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如何保留和传承下去显得更为重要。

- 圣诞岛配合春节推出12生肖的邮票，深具意义。
- 华人公馆为先辈立的墓碑，纪念先辈对圣诞岛作出的贡献。
- 圣诞岛共有13间庙宇。

社团组织 各有千秋

华人人数虽然不多，华人社团却有好几个，包括妇女协会、华人公馆及半山公馆。各个社团形象鲜明，各司其职。妇女协会由各大种族组成，重点放在慈善及妇女福利上；华人公馆则着重文化传统的保留，带动华人参与节庆；半山公馆则以娱乐为主，会所设有赌桌，供人们消遣之用。

有趣的是，也许是人口少的缘故，一人分饰多角在华人社会是司空见惯的事。

华人公馆是最早成立的社团，前身是业余阅报社，早在1940年代之前就已创办，目的是让华人有个可以阅读报章、杂志及下棋的地方，以杜绝当时猖獗的赌风。

在那资讯落后的时代，书信都通过华人公馆传送，而华人也全赖家书，才得以了解故乡亲友的消息，即使是片言只语，也倍觉温馨。

“前辈传承下来的活动，会依样进行下去，群众发起的活动则会尽量配合。”曾担任13年公馆主席的王益瑞如是说道。

随着时代的变迁，华人公馆不再局限于让华人读书写信。为了加强华社的凝聚力，它和半山公馆达成共识，每年轮流举办或联办活动，以免出现活动重叠、资源耗损或抢会员的状况。

半山公馆于1970年代成立，其前身是亚洲人公馆。位于半山区的会所里头，摆放着许多赌具，下午供打麻将，晚上8点后则有赌局。不少华人抱着小赌怡情的心态玩牌九，也有人纯粹到来凑凑热闹，在旁围观。

成立于1989年的妇女协会可算是目前最活跃的社团组织，也是一个集合3大种族的组织。这个社团成立前，本来是学习中心，教导妇女语言、烹饪技巧，久而久之，人数增多，资金充裕，就形成了社团，宗旨是为了维护妇女权益及开扩妇女的社交圈子。

早期，部分华人沉迷赌博，家暴案件特别多，妇女协会介入调解，把妇女从家暴中拯救出来。“社团工作吃力不讨好，为了社群，会员努力地做出成绩，才令人刮目相看。”该会主席表示，在协助妇女的过程中，曾受到男性的指摘，但她们始终不言弃，坚持到底。

妇女协会也经常举办慈善活动，募款捐助天灾的受害者。2009年初，澳洲维多利亚森林发生大火，该会通过义卖会筹款，获得各种族的热烈回响，其号召力可见一斑。

华人对参政也相当热衷，在9名市议员当中，华人就占了6名，足见华人的影响力。4年一次的选举，华人总是踊跃地出席投票，以履行公民的责任。

“市议员就是市政府的左右手，负责审核商业执照、投资申请，以及规划圣诞岛的发展计划。”市议员李国民是岛民选出来的代表，每个月都会出席会议探讨各项计划。

当地有个国营的民众广播电台，每周安排两个中文时段，主要播放中文金曲及岛上的活动讯息。周六有“晨光选曲”，从上午8点播放至11点半，周日则是“与你同在”。两位主持人都属义务服务，分文未收。

在简陋的播音室里，主持人从选曲、主持、播报新闻，都一手包办，听众偶尔也会叩应点唱。这里没有现代化的数码选曲，主持人只好手动转换唱片。收音机传来一首首悠扬的粤语、华语及福建金曲，而忠实听众则在缅怀过去的美好时光。

此外，圣诞岛每月推出一份《岛民简讯》，薄薄的一份册子，概括了岛上的活动通告、广告、电视预告及巴士时间表等资讯。顾及岛民的多元化，内容同时以英文、华文及马来文3种语文来呈现。

- 妇女协会举办义卖会筹款活动，获各大种族支持，场面热闹。

结语

华人赤手空拳到来，一步一脚印，努力打拼，换来了今天的成果。这里没有奢华的生活，反而突显出平淡中的那份踏实感。

留下或离开的念头都曾掠过华人的脑海，要不移居澳洲和家人团聚，要不落叶归根回到故乡，要不留下来做个无忧无虑的快活人。只是一切都还没定夺，华人沉浸在静谧的氛围中，继续展开精彩的人生旅程。

- 圣诞岛华人生活悠闲自在，经常举办活动拉近彼此距离。

蒙古

引言

蒙古是中国北方的邻居，这里的人以放牧为生，以草原为家，蒙古曾经是中国最亲密的兄弟，也曾是中国最顽强的宿敌。

元朝时蒙古族曾统治过中国，但于明初失去政权退回塞外。清朝时，蒙古各部逐渐成为清朝的臣属，不过，漠南（即今内蒙古）跟中国关系较密切，而漠北（即喀尔喀蒙古，或称外蒙古），则和清朝关系较疏远。1945年，中华民国曾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蒙古通过公投决定独立。不过，1949年民国政府在联合国通过《控苏案》，再次表明不放弃对外蒙古的主权。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49年10月16日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1992年，蒙古推行多党制，实行议会制，国名改称为蒙古国。

7、8月是蒙古美丽而短暂的夏季，到了9月，蒙古开始飘雪，进入漫长寒冬，温度达摄氏零下40多度，常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5度。在自然环境与民族文化的影响下，畜牧业一直是蒙古的经济基础。不过，蒙古辽阔的大地之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自从9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矿业成了蒙古主要经济来源，也吸引了大批华商涌入蒙古采矿。

蒙古地广人稀，国土面积156万6500平方公里，却只有区区260万人口，首都为乌兰巴托。在1956年蒙古人口普查时，华裔占了总人口的1.9%，而美国于1987年的报告则推测华裔人口占了2%，即约4万人。来自《中国侨网》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在蒙工作的华人超过万人，多在建筑领域。

华人移民简史

中国与蒙古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渊源。早在公元544年，蒙古先民室韦就曾经遣使东魏。1206年，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使蒙汉两族的命运从此交织在一起。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之下，蒙古族建立了庞大的帝国。1279年，南宋最后一支抵抗力量全军覆没，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全面统治中国，一直到了1368年，才被明朝所取代。

因为戈壁沙漠以北的外蒙古并不适合农耕，所以早期很少华人移居到外蒙古。到了1725年，清政府勒令汉族农夫到蒙古种地囤粮，以协助清军对抗北方的游牧民族，此后，外蒙古的鄂尔浑（Orkhon）、土拉河盆地以及科布多（Khovd）等地才出现了汉族的聚落。然而，在清代到蒙古去做生意的华商却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些华商大部分都集中在库伦（即今日的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及科布多。他们长期在中蒙两地间频繁奔走，有者还娶了蒙古女子为妻。

在苏联的支持下，外蒙古于1921年宣布独立，蒙古境内的上万华人成了排华行动的受害者。

之后，随着蒙古的局势逐渐稳定，开始有一些华人农民、商人以及手工业者再次进入独立后的蒙古谋生。这段时期过来的移民以河北人和山西人为主。与此同时，苏联的势力操纵着蒙古政局，蒙古开始了俄化的过程。

在1950年代，蒙古迎来了另一波华人移居热潮。那时，中国政府为支援蒙古建设社会主义，于是征召数万工人到蒙古去协助基建工作。这一些工人大部分来自靠近蒙古的阳原县，他们携妻带子定居于蒙古。

从1957到1959年，是蒙古最多华人移民的一段时期。这时的华人人数多达8000人，他们大部分集中居住在名为“一百户”的地方。

1960年代，中苏关系宣告破裂，而以苏联马首是瞻的蒙古，与中国的关系也日趋恶化。当时的蒙古人对华人大多抱以仇视的态度，导致华工纷纷逃离蒙古。

上世纪的50年代之前，多数蒙古华人是手工业者，如木工、裁缝、鞋匠、钟表修理师或银匠等，此外，也有商人、司机或工人等。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情况有所改变，大多数华人从事建筑装修业，一部分人则仍旧从事裁缝、种植蔬菜、司机、木匠等行业。

1983年，蒙古再度发生了严重的排华事件，当时的蒙古政府指华人为社会寄生虫，于是大规模地驱逐华人，并不允许华人住在乌兰巴托，还计划在偏僻山区建立一个农村，将华人都安置到那里去。华人过去考察之后，发现那里环境太差，根本就不适宜居住，便大举迁回中国。

今天在蒙古境内的老华人，就是那些当年留下来的华人及其后代。排华浪潮过去之后，蒙古政府没有再坚持要华人迁离，于是他们就一直留在乌兰巴托。其间，虽然蒙古政府不断积极地游说这些华人归化蒙古，但他们大部分还是坚持保留中国国籍。

中蒙关系在1987年开始逐步恢复正常，加上数年后蒙古又实行改革，华人社会也逐渐恢复活力。华人成为中蒙经贸往来的重要媒介，处境自然也获得显著的改善。在90年代，这里的老华人开始开公司、办企业，经济实力已经大为提高。

- 中式风格的甘登寺，说明蒙古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 甘登寺的清朝古鼎，见证了中蒙悠久的历史关系。

当今生活风貌

引言

中蒙两国陆地边界线长达4700多公里，两国人民皆可轻易进入对方国境。近年来，随着蒙古改革开放，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进入蒙古的华人，多得难以统计。根据《蒙古消息报》2008年的官方资料，蒙古有1819名侨民及3万2272名临时居留外国人。而这当中，高达90%是中国公民。

华人大部分集中于乌兰巴托，还有部分华人散居在达尔汗（Darhan）、额尔登特（Erdenet）等地。这些华人中，70%祖籍为河北省阳原、怀安、万全等县和张家口市，其余则来自山西、内蒙古和山东等省份。

蒙古共有两个华人社团。由老华侨组成的旅蒙古国华侨协会，是蒙古最活跃的华人社团。另一个则是2002年由华商成立的中华总商会，会员多是新移民。此外，蒙古也有一所旅蒙华侨子弟学校，提供小学至中学完整的课程，并受到当地政府承认。

充满机遇与陷阱的大地

蒙古广袤无垠的大草原，给了无数华人辽阔而美丽的想象。可是，抱着这种美丽的梦想到蒙古的华人，恐怕飞机尚未着陆，幻想已先破灭。当飞机进入乌兰巴托上空时，乘客往下看，都看不见城市，因为整个乌兰巴托，已经淹没在层层烟霾废气之下。

这也预示了华商们在蒙古的境况——前景难测，却也充满机遇与变数。

从机场到市中心，道路坑坑洞洞，触目尽是简陋的房子与蒙古包。冬天时，从工厂到蒙古包，都冒着烧煤产生的黑烟，这便是空气严重污染的原因。

蒙古基础建设很差，经常断水断电。市中心多座雄伟的俄式建筑，多已老旧失修。市内道路缺少修缮，而且到处塞车。虽然破车旧车不少，但豪华车子也很多，而且有的驾驶座在左边，有的驾驶座在右边，颇为奇特。这些景象，充分说明了蒙古社会正在经历着急剧的变化，改革开放造就了新兴的富豪，但整个国家仍有36.1%的人生活在贫穷线下，贫富悬殊。这里一切百废待兴，欠缺严谨的市场规划与法律规范，于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犹如剽悍的垦荒者，来此赌一把运气。

蒙古商机蓬勃吸引来的华商高达四五千。这些新移民挟着雄厚的资本而来，在蒙古的经济发展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资料显示，蒙古的中资企业有700多家，投资额占外企在蒙投资总额的一半。

其中，建筑业是华商在蒙古最耀眼的行业。蒙古经济近年突飞猛进，对建筑的需求大增，乌兰巴托看上去就像一个大地工地，到处都是建造中的民房与商业区。一般估计，蒙古几乎80%以上的房子都是中国人盖的。由于中蒙地理靠近，劳务输出方便，因此，不管投资方是否是中国，到最后施工的总是中国人多。他们生活在工地上，极少机会到外头走动，所以走在街上，很少看到中国人的身影。

曾经，畜牧与成衣业等是在蒙华人热衷投资的项目。近年，随着蒙古大力推行改革开放，华商转而关注房地产、矿业与石油开采这些大项目。矿业是个一本万利的行业，不少华商在此掘到宝藏而暴富。可是，花了上百万美元购买采矿证和探矿证却被骗得精光的案件，也时有所闻。

“蒙古商场尔虞我诈。以前中国人欺骗蒙古人，后来蒙古人也学精了，倒过来欺骗中国人。中国人更是欺骗中国人。”现代房地产公司的副总经理马工说，“不过现在情况比较改善了，慢慢有了规范。”

“蒙古很像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不确定因素很多，办事效率也让人很头痛。”在蒙从事采矿与房地产已经3年的中国商人王孟泳说。因为国内市场饱和，又听朋友说蒙古矿业有发展潜力，他到蒙古考察了半年，并用几百万美元买下采矿权。矿业取得成功后，他又进军房地产。政策稳定是华商主要的忧虑，王氏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蒙古政策有变化。中蒙关系如果发生变化，对我们这些华商影响很大。”

纵横在蒙古这片土地上，过人的胆识、有力的人脉、灵活的手腕，缺一不可。

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在蒙古打拼，来自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也在蒙古发展的黄金时期前来分一杯羹。在蒙古登记的台资企业有40余家，不过，仍在运作的其实只有十余家，长期在蒙古生活的台湾人约30多名。

为了更好地协助台商在蒙古进行投资，鼓励台蒙双边贸易，“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在乌兰巴托成立了乌兰巴托台湾贸易中心（以下简称台贸）。台贸现任主任为古裕梁。古主任指出，2005年以前到蒙古投资的台商多是卫星电视、电脑买卖、纺织品生产等中小型企业。可是，由于纺织品配额取消，在蒙古设纺织厂已经失去优势，于是台商纷纷将生意转向大陆。2007年后，开始有台商在蒙古做房地产与采矿等大型投资，台蒙双边贸易近来突飞猛进。

另外，蒙古也有约15名新加坡华人。新加坡大专学府莱佛士大学（Raffles University）和著名的虎牌啤酒公司（Tiger Beer）都在蒙古取得不俗的成绩。莱佛士大学蒙古分校于2004年成立。刚开始时，学院只有100名左右的学生。短短数年间，学生已增加到300多名，英语部更有200多名学生。目前，学院共有9名讲师，其中3名是来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莱佛士大学把在新加坡办学的成功经验完全移植到蒙古，令蒙古多了一所现代化与国际化的高等教育学府。

蒙古人好酒，新加坡著名的虎牌啤酒很早以前就进军蒙古，并且销量颇佳。有鉴于此，新加坡总公司决定在蒙古设厂，以确保在蒙古销售的啤酒更新鲜，还可节省运输费。2006年6月，虎牌啤酒动工建厂，隔年正式投入生产。目前该公司共有两名新加坡籍和一名马来西亚籍华人职员，其他职员全是蒙古人。

- 房地产公司副总马工（中）和两名蒙古同事巡视工地。
- 莱佛士大学不但把新加坡式的教育完整地搬来蒙古，连校园的建筑也非常新加坡式。新式校园在市内其他老旧建筑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朝气蓬勃。

老移民赶上时代的转机

20世纪50年代，蒙古的华人移民人数达到高峰。他们在蒙古繁衍生息，如今已到第三代，约有2000多名。这批人与他们的后代，被统称为老华侨。

当年，第一代华人赤手空拳到蒙古讨生活，经历亲华与排华两个时期，在两国的恩怨夹缝中求存，并寻求继续保存自身文化与身份，却又能融入主流社会的方式。凭着勤奋踏实的民族特性，几经艰辛，他们的生活逐渐安稳下来。尽管收入比起当年已经大为提高，这些老移民仍然不住豪宅，因为他们深明树大招风的道理，尤其在蒙古如此局势不稳的国家。

一些精明能干、洞悉先机的老移民，已经借着蒙古经济开放的浪潮先富起来。现任旅蒙华侨协会会长白双占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胆大心细，在蒙古还未掀起掘矿热潮之前，就看准了一块宝地，向蒙古政府买下采矿权，掘出金矿。此外，他也开设肠衣厂，生产羊肠制成的手术线及香肠，充分利用了蒙古丰富的羊资源。

随着中国在蒙古经济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老移民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桥梁优势。他们有丰富的当地人脉资源，对蒙古文化了如指掌，更没有语言障碍，在商场上无往不利。有了他们牵线搭桥，中国公司到蒙古投资利得多。许多年轻一代也开始自己做起中蒙贸易，或是在中国公司当翻译。

这些老移民对中国感情深厚，坚持不加入蒙古籍。中蒙关系不好时，蒙古政府曾找过侨界领袖，希望他们鼓励侨民加入蒙籍，但愿意入籍的华人少之又少。不过，一些老移民自小在蒙古长大，对蒙古同样充满感情。“我出国时想念的是蒙古。想蒙古的亲友、饭菜。我也习惯吃牛羊肉，不吃蔬菜了，到了中国，还要回过头来想念蒙古的饭菜。”在襁褓时期就随父母到蒙古的白双占笑说。

比起父母，年轻一辈的华人更加认同蒙古。白会长坦承，许多蒙古年轻华人，到中国只是办公事，办完了就回蒙古，对中国感情没那么深。在蒙古，年龄层介于20至30岁的华人青年约有五六百人。和蒙古青年一样，华人青年大多早婚，18、19岁就结婚生子的大有人在。华人青年虽然和蒙古青年感情很好，却很少和蒙族通婚，结婚对象一般还是选择华人，近来也有一些华人到中国寻找配偶，华人青年白庆坤表示：“那是因为华人和蒙古人风俗、习性、生活理念等都不一样。我们从小看到许多和蒙古人通婚的长辈都离婚，妻离子散，因此引以为鉴。另外，我们父母也不会赞成。”

老移民一般都认为，他们这个独特的社群还是会维持下去，不会被同化。“没必要完全变成蒙古人。我们现在更占优势，蒙古和中国两边通吃。”老移民们说。

老移民在1950年就成立了一个旅蒙华侨协会，其会员主要是长期居住在蒙古，但仍持有中国护照的华人。会长白双占表示，他们几代人之间都互相认识，只要是蒙古华人，就自动是旅蒙华侨协会的会员。

多年来，旅蒙华侨协会积极投入公益事业，发展华文教育，并负起沟通华人与中国驻蒙使馆，以及向当地政府传达华人心声与建议的责任。每当中国国庆、春节等节日，协会都会搞活动庆祝，夏天时也会组织郊游团，让大家联络感情。一些老弱病残的华人生活有困难时，协会也会伸出援手。

许多海外华人社团都面临领导层青黄不接的窘境。可是，旅蒙华侨协会却一直积极培育下一代继承者。一年前，协会正式成立了青年会，让35岁以下的华人青年加入。

另一个较为活跃，亦较有规模的华人社团当属中华总商会。商会于2002年成立，会长为张春山。中华总商会共有100多名会员，主要来自企业界。

中文媒体方面，蒙古仅有一份华文报刊《蒙古消息报》。该报的前身是蒙古工会出版的《工人之路》。1964年，蒙古通讯社接管该报，并更名为《蒙古消息报》。《蒙古消息报》是蒙古政府机关对外宣传的工具，除了宣传国家政策，也把新闻焦点放在中蒙两国的互动上。除了中文版，蒙通社属下还有英、俄、日几个外文版本。

《蒙古消息报》一周出版一期，每份400蒙图，一年订阅费2万800蒙图。目前，该报发行量为1500份，订户主要是中资企业以及学习汉语的蒙古人。此外，该报也有少量海外订户，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内蒙、台湾、香港，都是在蒙古有生意的华人。不过，当地华人很少阅读《蒙古消息报》，许多华人甚至不知道这份报纸的存在。

该报报社共有5名职员。现任社长密·娜仁扎雅年方30，毕业自蒙古国立大学中文系。其余职员，包括一名责任编辑、两名翻译及一名排版设计也全是蒙古人。社长娜仁扎雅透露，蒙通社未来会为《蒙古消息报》建立网站，内容全面上网，不过上网阅读须缴费。

- 旅蒙华侨协会会长白双占多才多艺，亲手设计及雕刻了旅蒙华侨协会的牌匾。

风雨飘摇华教路

真正在蒙古生活、定居的华人，只有区区2000多人。这2000多名华人，传承中华文化与中文教育的决心却坚如磐石。

1950年代，蒙古有一所华校——培才学校。当时，中国大力支援蒙古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两国关系空前友好。中国送来大批华工协助从事铁路、公路等基建。为了让中国工人的孩子有个念书的地方，中国援建了培才学校。该校建设规模在当时可谓数一数二。学校共有5座大楼，宿舍、体育馆、教学楼、食堂、礼堂一应俱全，体育馆还是当时蒙古最豪华的体育馆。后来，中蒙关系转恶，培才学校于1973年被蒙古政府收回，现在成了蒙古国立大学经济系的大楼。

相比之下，旅蒙华侨子弟学校当初的处境要艰苦得多。该校创办于1955年，赵廷源为第一任校长，现为蒙古唯一的华校。当时，该校学生全挤在一所四合院上课。在蒙古漫长的酷寒冬天里，学生必须带煤带柴到学校来生火上课。直到2001年，在国侨办、中国驻蒙使馆、香港浸信会联会、侨协等单位的援助下，才建成了一所1440平方公尺的新校舍。旧校舍后来成了旅蒙华侨协会的会所。

1998年，江仙梅出任校长后，大刀阔斧改革华侨子弟学校。首先，因蒙古90年代初掀起汉语热，学校广收蒙族学生，招生不再局限于华人子弟，江仙梅乃将学校改名为旅蒙华侨友谊学校。

另外，在此以前，华人子弟就读的学校没有向政府注册，学生毕业后，文凭得不到政府承认。江仙梅认为华人要融入当地社会，必须要精通当地语言，了解当地文化，因此把学校改为双语制。改制后的课程完全按照蒙古政府的要求，并以蒙文为教学媒介语，但每周仍有11至15节中文课。

友谊学校的毕业生可分别获得蒙古与中国都承认的毕业证，出路更广。许多华人子弟毕业后选择到中国留学，有的学生还进入北大、复旦等名校，成绩骄人。至于蒙古学生则多数选择在蒙古念大学。

友谊学校分全日制和周末班。全日制提供由小学至中学的完整教育课程。周末班则让在蒙古学校念书的学生上汉语课。目前全日制学生共有504人，周末班学生则有114人。有趣的是，友谊学校发展到今天，华人子弟只占全日制学生的10%，就连周末班也仅有半数华人子弟，余者皆是蒙古学生。当地约有一半的华人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或蒙古学校，另一半则把孩子送到友谊学校。送孩子到蒙古学校念书的家长，一般都把孩子送到周末班学汉语。

蒙族学生的父母，许多都跟中国人有生意往来，知道中文的重要性，才把孩子送来。蒙族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会对中国产生感情。不难预见，这些学子将成为蒙族与华人友谊的桥梁。

友谊学校的学费每年50万蒙图，在当地收费较高。可是，学校不获任何补贴，经费全由自己承担，学生缴交的学费，仅够付教师薪水及应付各项杂费。友谊学校还面临校舍不足的问题。因为课室不够，学生必须分为上、下午部，每年还得拒收30至50名学生。不过，江仙梅校长表示，华人学生一定优先录取。

盖一座体育馆，成了江校长的心愿。“体育馆除了上体育课，还能办活动，如节庆、周会等。每次学校办活动，都因为地方太小，必须把学生分成几组。”江校长无奈表示。

“我热爱中华文化，坚持办华文教育。我虽然没在中国受教育，但能说这样的汉语，已经该满足了，我会尽自己的绵力，给下一代创造机会。”江校长短短的几句话，说出了许多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者的心声。

- 政府一声令下，培才学校被关闭，宏伟校舍后来成了蒙古国立大学的经济系大楼。
- 江仙梅校长眺望残旧的友谊学校旧址，回首过去种种艰辛，更能体会学校今天的成绩得来不易。
- 中蒙两族的学生同在友谊学校上课，两族是互信与谅解，在此建立基础。

其他资讯

守护幼苗的家族中心

台湾儿童暨家庭协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家扶）隶属国际性非政府非盈利组织家扶联盟。蒙古是目前台湾家扶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直接服务当地社区的国家。

家扶基金会蒙古分事务所代表李桂平介绍，家扶中心2004年在蒙古成立，共有22名工作人员，4名是台湾人，其余都是蒙古人。“在家扶工作的这些台湾人，都是志愿过来的。他们来到这块发展落后的地方，不是为了钱，可说全是为了一股热忱。”他说。

家扶有两大工作，其中之一是社区工作，包括设立饮水器，让蒙古贫民有干净的水喝。他们也出资协助蒙古建立幼稚园，虽然家扶不参与直接管理，但却规定幼稚园只能录取贫穷儿童。此外，他们还建立了家扶村。村里有25个蒙古包，约100人左右，村民多是单亲妈妈。家扶给他们提供技能培训，等他们能自立后，鼓励他们向政府申请土地，并送他们蒙古包，让他们自力生。

此外，家扶也进行经济扶助工作，每个月发放5000蒙图给贫童。约有4000多名儿童在这项计划下受惠。本来蒙古人对这些远道而来“到处派钱”的台湾人心存怀疑，可是，在家扶中心的努力下，他们疑虑渐消，相信这个公益团体，确实是真心扶助蒙古贫民的。

- 家扶基金会蒙古分事务所全体台湾职员。左二为李桂平代表。

结语

蒙古对华人的政策随着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影响时有变化。蒙汉两族关系时好时坏，移居蒙古的华人，在历史的巨轮下颠簸前进，身不由己，唯有小心翼翼地活着。

到了二十一世纪，蒙古华人的处境渐露曙光。虽然华、蒙两族之间的关系仍然有待改进，可是，随着社会的开放与发展，中蒙两国经贸上的合作，必定越来越密切。蒙古华人期望，偏见与仇恨，将如蒙古严冬的积雪，在夏天初升的旭日下，慢慢消融。

尼泊尔

引言

这个位于南亚的高原小国，境内岗峦起伏，地势错落，耸立着8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巍峨高峰，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就蜿蜒在尼泊尔和中国两国的边界上。

作为古代亚洲主要的交通枢纽，它是商旅、香客们往来印度和中国的必经之路。今天，中、印文化仍深深地浸透着这块充满灵气的神秘土地。

尼泊尔以农业为主，工商业发展缓慢而落后，属于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列。20世纪90年代，尼泊尔开始实行“自由、开放和出口型”经济政策，以吸引外资。然而，政局动荡、基础设施简陋，收到的效果却差强人意。

目前，尼泊尔正积极推动旅游业，寄望那天赋的清奇胜景、幽古的人文气韵，再加上世界第一高峰的魅力，能招徕世界各地寻幽探胜的旅客，一同沉醉在古国的魅力之中。

华人移民简史

尼泊尔与中国号称千年友邦。尼泊尔的学者称，自6世纪以来，西藏便已是尼泊尔人进行商贸往来的主要对象，和中国的外交关系也极受重视。早在盛唐时期，两国之间的往来十分频繁，当时，尼泊尔的赤真公主千里迢迢地来到西藏和赞普松赞干布联姻。唐玄奘西行求法时，也曾经遍访尼泊尔各地，包括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之地兰毗尼。

到了元朝时期，尼泊尔著名的建筑艺术家阿尼哥远赴元朝的都城大都，监造北京白塔寺，这不只让他官运亨通，而且还名留青史。

200多年以前，尼泊尔王国成立首个外交部门，主要任务便是处理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后，尼泊尔也成了唯一在西藏的拉萨设有总领事馆的国家。

1955年8月1日，中国与尼泊尔正式建交，使这一段源远流长的友谊更上一层楼。作为友好邻邦，从1965年开始，中国向尼泊尔提供了多次的无偿援助，且承担尼泊尔数十个发展计划的建设。中国的物资援助包括了卡车、无轨电车、粮食以及食盐等，这些慷慨义举，深入每一个尼泊尔人的日常生活中。在尼泊尔，那曾经举办不少大型国际会议的比兰德拉国际会议中心、农民浇灌庄稼的灌溉系统，以及加德满都最为重要的环城公路，都是在中国的援助之下营建起来的。

长期以来，华人陆续到尼泊尔来投资，当中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商特别多。他们终日奔波于中尼两国之间，但是真正定居于尼泊尔的华人其实并不多。

尼共总书记尼帕尔就曾经指出：“长久以来，尼泊尔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一直都是深刻、全方位并且扎根在人民心里的密切关系。”在当地人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国家，而中国人则是最受欢迎的朋友。

今后，尼、中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仍然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尼泊尔十分欢迎中国的商家们到这里来创建合资企业，让双方继续携手走向美好的明天。

当今社会风貌

引言

据官方统计，尼泊尔的华人有5万名左右。其中有九成多是持难民身份的藏族人。扣除了使馆和中资公司人员后，真正在尼泊尔生活的汉族华人只有1000名左右。他们主要来自青海、山西及四川等内陆省份，大多聚居在加德满都、博卡拉（Pokhara）这两个城市。

当地华人主要从事贸易、餐饮、旅游、服装、中医、食品加工及建筑等行业，其中也包括那些在尼泊尔服务的华语教师、医师。跟当地人相比，华人的生活水平较高。

在华人眼里，尼泊尔就像一颗未经雕琢的蓝宝石，有无穷的价值蕴藏其中。许多华人来此有一个明确的动机，就是挣钱，因此他们大半持商业签证逗留下来。经商之外，有些华人也在尼泊尔找到了另一半，于是在此安下了家，孩子也就在中尼文化的熏陶下长大。

目前，仍处在发展阶段的尼泊尔华人，除了在经济领域小有成就外，其他方面的发展仍一片空白，在当地未成气候。不过，随着中、尼交往日益密切，来投资的华商越来越多，华人在尼泊尔的发展潜力令人瞩目。

异地慧眼觅商机

有部分华人，将尼泊尔视为进驻印度的一个驿站，在当地市场仅作牛刀小试，刺探行情而已。然而，有些华人却将尼泊尔当作生意基地。他们多数以进出口贸易开启尼泊尔的创业生涯。他们奔波往返于中、尼之间，在当地考察市场、经营生意。这个可能令他们发达的地方，却一般不会成为他们的家。个个华商心底抱定的想法是：生意能做就做下去，做不下去就卷铺盖走人，另谋出路。

他们大多来自四川，在西藏樟木往往拥有稳定的家族生意。家人负责在樟木口岸把关，他们则到尼泊尔开发新市场。尼泊尔人谈不上富裕，但购买能力不错，渐渐地，也就留住了华商们的脚步。

中国80年代开放初期，不少商人将中国的食品、杂货及电器等引进尼泊尔。近年来，竞争开始激烈，生意也越来越难做了。许多与华人合作的尼泊尔人，在多次随同华人到中国去办货之后，自己也摸熟了贸易的门路，转而成为华商强劲的竞争对手。

在尼泊尔耕耘多年，华商已成功开拓了庞大市场，中国电器如“美的”、“康佳”等品牌在尼泊尔非常红火，连当地人所吃的苹果、骑的摩托车等，都基本来自中国。近来，加德满都还开设了“中国商品城”这个大型的综合购物中心，占地一万多平方公尺。架上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大半源自中国。

在当地，餐饮业是华人发展得最蓬勃的行业，入行的门槛也最低。随着尼泊尔的华人游客和投资华商逐年增加，无形中刺激了中餐的勃兴。其中，加德满都的金牛餐馆营业超过十年，吸引了无数中国使馆及中资公司的人员。如今，华人的中餐馆已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加德满都、博卡拉的大街小巷。

讲究效率的华人老板，遇上了尼泊尔人这群慢郎中，往往叹息不已。大部分老板不是亲自掌厨，就是从中国招聘主厨。一名华人厨师洗、切、煮、炒都一手包办，20人的饭菜，半个小时便能利落上桌。若换作是尼泊尔厨子，客人可能要第二天才能用餐。

- 杨建国首次将中国出产的苹果，引进尼泊尔。
- 金牛饭店的老板、老板娘在店前留影。
- 王氏夫妇的长城宾馆，是泰米尔区第一所华人开的宾馆。

此外，当地侍应生的素质也让华人老板们苦恼。尼泊尔人天生随性，上班迟到、待客马虎，老板须寸步不离地守着他们，避免他们工作上有任何差错。近年来，民间的员工组织也招来不少麻烦，他们老扛着“民主”的大旗，不时向老板无理取闹，替犯错的员工撑腰，让老板伤透了脑筋。

除了员工的烦恼，食材也得千辛万苦才能到手。不少华人要到西藏樟木口岸去采购中国的食材及调味料。此外，这个内陆国家的海鲜得之不易，中餐的选择只能以鸡、猪、羊、牛肉为主，比较单调。

近年来，尼泊尔政局动荡，罢工、游行如家常便饭，加德满都还发生过一星期都买不到煤气的事件。跟懂得未雨绸缪的华人相比，尼泊尔人开的餐馆，往往因此被迫暂停营业，损失难以计数。

尼泊尔常年游客不绝，华人游客数量更是逐年提升。政府开放投资后，华人旅馆大增，遍布加德满都的旅游旺区——泰米尔街上。其中，高档的如中国大酒店、凤凰宾馆等，是商务人士最爱的歇息处；价位大众化的如龙游、泰山、长城宾馆等，则是华人游客的首选。春节来临，大批中国旅行团涌入尼泊尔，带动了旅游相关行业的繁荣。华人开的旅馆，往往比当地人开办的更占优势，因为业主充分掌握了华人旅客的需求。

走进华人经营的旅馆，彬彬有礼的服务生口操流利的普通话，在充满中国格调的建筑里，提供殷勤周到的服务，会让你感觉宾至如归。旅馆附设的中餐厅，服务也是一流的，除了各种令人垂涎的中餐可供选择外，还有卫星电视、机票订购及专为中国游客设计的旅行配套等设备和服务。这一切，都令旅人倍感亲切。

中医是尼泊尔另一项深具发展潜力的行业。由于中医原理与尼泊尔传统医疗理念相近，便于推广，加上尼泊尔生产各类草药，价格低廉而易得，令成本大为降低，因此

收费远比西医便宜。因此，大多数平民都负担得起，使它倍受欢迎。

在加德满都，还有一家中尼合资的“中尼联合医院”，成立于1992年。院内来自中国的医生们，结合西医、针灸、拔罐及中成药为病人治疗，求医者络绎不绝。

对华人而言，尼泊尔并不是一个容易掌握的市场。踌躇满志而来，却垂头丧气而回的华人不在少数，因为这里商机虽多，但局限也很多。

华人投资家分析：一是市场容量小，购买力有限；二是当地属于低端市场，高档货很少有人问津；三是政局前景不明朗，没人知道明天会怎样。在这些限制下，华人一般只尝试小本投资，不敢轻举妄动，对长远的发展更是举棋不定。

尼泊尔的燃料全从印度输入，能源运输总是受到南部罢工事件的影响。此外，靠水力发电的尼泊尔，逢旱季必停电，情况严重。各区域轮流停电两小时，会演变成一天停电8小时，这些，都会令华商心焦不已。

除此之外，创业初期的华商，还得面对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头疼事，如效率低下、贪污横行等。要想办事顺利，总免不了花上更多的耐心和金钱。此外，因文化差异、语言隔阂带来的困扰，也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

- 中尼联合医院的医师们。
- 中国山餐厅的老板张仁文（右），也是尼泊尔华人商会筹委会的骨干。

生活有烦扰 温暖依旧在

随便翻开一本旅游手册，对尼泊尔总是满纸的赞叹，字里行间尽是迷人的描绘。然而，悠闲旅客的短暂陶醉，跟华商长期落脚当地所尝尽的滋味儿，完全是两码事。

加德满都是尼泊尔华人最多的地方。十年前到达的前辈感叹，当时的加德满都悠闲从容、人口适中，是一个美丽的都市；今天，这里人口飚升了十倍，但基础建设却没有随之改善，结果它成了一个拥挤、脏乱的城市。

尼泊尔并没有特定的华人住宅区，他们大多租赁当地人的房子，住在斑驳的木板、黯淡的石灰搭建成的房子里，屋内设施陈旧而简陋。一些经营旅馆、餐厅的华人，干脆就住在店里；经济较好的，则住在尼泊尔的高级住宅区里，错落有致的小洋房，精致而美观。

生活在当地的华人，常常会受到种种困扰。这些困扰，渗透在生活小事当中，譬如洗澡。尼泊尔天气寒冷，有时达到零度以下。尼泊尔人可以咬咬牙，往身上浇淋冷水，或每星期只洗一次，但华人无法完全仿效，每当想洗个热水澡时，往往要大费周章。由于尼泊尔的热水供应器多用太阳能，如果当天不见太阳，家里也就只有冷水。虽有电热水炉备用，但因供电不稳定而经常无用武之地。

提到尼泊尔严重的停电问题，当地华人往往大摇其头，心中万分无奈。他们对于当地的停电时间表，要比九九乘法表还要熟悉，否则生活作息必定大乱。除了停电，旱季还有停水的苦恼在等着他们，连用水也得小心翼翼，惜水如金。

近几年，动荡的政局也扯痛了华人的神经，常有华人向驻尼中国大使馆求救。尽管外国人都不易在当地的动乱中成为代罪羔羊，但由此而来的担惊受怕，却是免不了的。此外，频频发生的罢工事件，也给华人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生活烦扰一言难尽。

最显著的问题，就是罢工经常影响能源供应。加德满都及一些周边城市，常常一夜之间陷入燃料荒。汽油、柴油、煤气一下子都没了，路边停满了因缺油而瘫痪的车子，抢购燃油的人潮触目惊心。华人为了购买燃料，往往通宵大排长龙。经营餐馆的，煤气不可缺少，可怜的老板无计可施，只好将钞票大把地抛向黑市换取煤气供应，忍痛撑着。

然而，当地人友善、相敬如宾的态度，多少抚慰了华人于异域中的惶惑，烘暖了他们在忧患中受寒的心。

华人和尼泊尔人之间，虽无法完全跨过语言障碍和文化隔阂，然而一旦生活在一起，却总是守望相助、和睦共处。尼泊尔人的性情中，最令华人欣赏的就是温和及耐性，当地极少看到争吵、打架的场面。因此，尼泊尔政局虽然动荡不安，但社会治安却并不很混乱，华人终究还能拥抱一片和煦的安然，用心地生活。

在这印度教盛行的国家，日常生活中有着形形色色的宗教活动。华人的宗教观念虽然很淡，但好奇心却很浓。因此，初来乍到的华人，对于当地人友好的邀约，总是来者不拒。于是，他们不是天天忙着出席尼泊尔人的婚礼、宗教庆典，就是走访于尼泊尔大大小小的印度庙宇之间。

不过，居住时间长了，初来的兴奋之情，就渐渐化为司空见惯的平淡。平日下班后，华人没有什么休闲活动。在没有卡拉OK、电玩中心等休闲场所的尼泊尔，他们的夜生活除了聚餐，就几乎没有其他娱乐。在这里，即使周末、假日，华人也没多少地方可去。

除了日常生活的平淡，尼泊尔的华人圈中，也缺乏让大家热闹起来的喜庆活动。幸好，加德满都还有一家赌场，让华人在闲暇时还能去小赌怡情一番。否则，就只能邀三五好友，到家中打打牌、搓搓麻将，大不了再聚聚餐、逛逛街，或到当地的风景区去走走看看，生活可谓平淡如开水。

然而，如果遇上了华人、尼泊尔人通婚的婚宴场面，就一定特别热闹。华人亲友白天出席尼泊尔式传统婚礼，晚上则参加人数过百的中式婚宴，宾主同欢共醉，往往兴尽而返。至于白事，尼泊尔华人一旦去世，家人会将遗体火化，将骨灰存放在家里，只有简单的仪式，并不张扬。

即使最重要的春节，尼泊尔华人也没有盛大隆重的庆典，只会在过年期间，和亲友聚餐，简单地庆祝一番，华人之间也会轮流请客。一名华人说，每逢春节，他们一家人从初一到初八，都忙碌地出席朋友们的聚餐和联谊。身在异乡，华人的友谊变得更加真挚、更加牢固。其他节庆则是悄然地溜过。

唯一值得欣慰的，就是每逢春节及中国国庆节、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都会举办庆祝活动和聚餐会，让漂泊海外的华人同胞，可以相聚一刻，共享丰盛的中式大餐，欣赏充满中华气息的文娱表演，在异地携手迎春

- 华人聚会常打牌娱乐。

中文教育蹒跚起步

尼泊尔华人总是难得与家人团聚在一起。为了教育，许多父母必须和孩子们分隔两地。由于尼泊尔的教育理念与华人大相径庭，华人父母多将孩子送回中国读书，交给亲友看顾，夫妻俩则留在尼泊尔打拼。

华人对教育态度务实，强调按部就班及效率，希望孩子毕业后，能练就一身看家本领。尼泊尔的教育方式却很随性，孩子学习过程充满乐趣，但未必能看到具体的成绩。

尽管对尼泊尔的教育不放心，但华人却普遍认同，这里是学习英语的理想环境。英语作为尼泊尔的官方语言，使得这里几乎人人都能以英语沟通，塑造了一个广泛使用英语的大环境。

至于中尼通婚的家庭，则多让孩子留在尼泊尔学习。在尼泊尔学校里，学生主要学习尼泊尔语及英语，华语则在家靠父母或补习老师的指导。由于缺乏完善的中文学习环境，因此有许多中、尼混血儿，即使能操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却往往一个华文字也不识。

目前，正规的中文教育，仍在尼泊尔等待发展的机会。2005年，第一批来自中国各师范大学的志愿教师不远千里而来，走进尼泊尔各大中、小学校去教导中文。这些志愿教师，在教学上面对不少考验，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中文课本的短缺。学生们只能一字一句地抄写老师所教的内容。上课时，师生们在黑板及作业本上，认认真真，一笔一画地抄写。

除了在尼泊尔开展中文教学，志愿教师们也联合一些当地团体，筹办许多有趣的文化活动，如“中国节”、“中国语言文化日”等，促进中华文化的普及，意义非凡。他们希望能在尼泊尔掀起一股汉语热潮，为尼泊尔人打开一扇通向中华文化的大门。

尽管在尼泊尔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播不容易，但这群年轻的教师却不轻言放弃，有些还申请留任，继续奉献。他们被看作是华人和当地人之间的文化使者，在尼泊尔展开了不一样的人生。

- 在尼泊尔教授中文的曹老师（左）和霍老师（右），都来自中国。

让华人扎根的理由——中尼通婚

有很多华人，一开始的想法都是挣够了钱，或在市场不景气时就马上走人。然而，尼泊尔也并非坏到呆不下去的程度，那些还过得去的华人，也就一年年的留了下来。只是，华商们始终抱着落叶归根的想法，往往认定自己是尼泊尔的过客，总有一天是要回家去的。

能改变华人“归根”初衷的，或许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在尼泊尔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归根”的定义，也就有所不同了。

华人若在尼泊尔安了家，心也就在尼泊尔扎了根，从此不离不弃。

由于种姓制度观念在尼泊尔社会牢不可破，因此中尼通婚不但罕见，也特别珍贵。目前，当地中尼通婚的例子虽然不多，但基本上家庭幸福、生活美满。这些通婚家庭，大部分都有了第二代，甚至已经三代同堂了。

华人男子娶了尼泊尔太太后，多半都自组小家庭。在父亲的影响下，孩子往往对华人的文化、身份都有强烈的认同。然而，在生活习惯、语言方面，母亲的熏陶则有更重要的影响。

尼泊尔语是孩子的母语，孩子从小就跟随母亲，参加当地的宗教庆典。耳濡目染之下，不少中尼混血儿尽管肤色、长相像极了华人，但言行举止、生活习惯和打扮等，却极像尼泊尔人。中华文化对他们来说，既亲切又陌生；可尼泊尔的一切，却是从小就融入了他们生活的每一天。

不过，如果是华人妇女嫁给尼泊尔人当媳妇，情况就有所不同。尼泊尔家庭保守而传统，儿子要讨外籍媳妇，就仿若要闹家庭革命一般，是件伤筋动骨的大事。多年来，不少到中国留学的尼泊尔男子，虽与中国女同学谱出恋曲，但成功踏上红地毯的却不多。一般而言，只有那些教育程度较高的尼泊尔家庭，想法开通，较能用平常心去接纳华人媳妇。

远嫁尼泊尔的华人妻子，几乎都要学习融入丈夫的家庭，与公婆同住。尼泊尔人家庭观念极强，即使结了婚，儿子们仍需与父母、兄弟姐妹同住一个屋檐下，十分热闹。于是，华人媳妇要面对的，往往就是这么一个一家老小济一堂的大家庭。

如果嫁到经济条件较优渥的尼泊尔家庭，华人媳妇就不需要为家务操心，家中自有佣人负责打理，且会为一家大小准备三餐。简单来说，华人媳妇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会如何与尼泊尔家人和睦相处，并快乐地生活在这个由尼泊尔文化主导的新家庭中。与此同时，举凡尼泊尔的大小宗教庆典、传统服饰及食物等，新成员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融入。

在教育方面，华人母亲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她们一般会教孩子一些简单的中文词语，如果丈夫也曾在中国留学，那中文就有可能成为家人沟通的语言。逢年过节，他们也会为孩子添购一些华人的传统服装。在成长过程中，孩子因为受了母亲的影响，尤其能感受到自身中尼混血的独特身份，也对中华文化有了一份微妙的感情。

- 在尼式婚礼上，华人新娘张琦身穿鲜红莎丽。
- 中尼混血儿大多数皮肤白皙、长相酷似华人。

其他资讯

亚公——首名定居尼泊尔的华人

亚公原名叶孟新，来自印度的大吉岭，在尼泊尔度过了悠悠40年岁月。现年74岁的他，每天准时到自己开设的“亚公中国鞋店”工作。亚公回忆，1962年中印战争之后，印度富裕的华人都移民到欧美，囊中羞涩的他则因为太太是尼泊尔人，就带着妻小移居到这儿来。

在尼泊尔小小的华人圈子里，一提起“亚公”的大名，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学徒生涯结束后，他开设了营业至今的“亚公中国鞋店”。鞋店规模不大，还保持着当年的模样，每天可生产十双手制皮鞋，月入两万卢比左右。一如典型的华人，他大部分时间都手脚不停地忙碌着。尽管过了退休年龄，亚公还是一星期做足7天，每天做足12个小时。

忆起尼泊尔生活的点滴，他不但没半句怨言，还表示喜欢这里虽不富裕，却很安定的生活。善良淳朴的尼泊尔人，从来没有排斥过他，彼此结为好友的很多，一点也不寂寞。

除了流利的华语，亚公的印度语、尼泊尔语也是很棒的。因此，“老叶翻译”是他的另一个身份，专为那些到尼泊尔投资的中国人当翻译。他乡遇见华人同胞，亚公总是非常高兴，彼此往来的信件他也一一珍藏。他偶尔也到佛教道场当翻译，让信徒能突破语言障碍，一同修行。

- “亚公鞋店”的手制皮鞋深受欢迎。
- 亚公把制鞋手艺传给了儿子。

本小利大的新行业

在尼泊尔，一件不起眼的小东西，往往都有意料之外的商机。

例如华人爱吃的豆腐，这种方方正正、白白嫩嫩的普通食品，在这里竟大有市场。尼泊尔人之前不知豆腐为何物，于是华人在此设厂，用简单技术制造出新鲜的白豆腐，如今已成为尼泊尔人的日常食品。在生意上，华人总是走在前端，除了引进新器材，更增制种类繁多的豆腐产品，把尼泊尔的这条商路继续深拓下去。

此外，许多国外流行已久的小玩意，华人也陆续引进了尼泊尔。例如来自中国的大头贴机器，就摆在人来人往的商场中，受到年轻人的追捧。拍一次要价150卢比，约是在尼泊尔两顿饭的消费，但年轻的情侣、好友们花得毫不心疼。结果，一部小小的机器，竟曾创下一个月4万卢比的盈利，超过尼泊尔普通国民一年的收入，令人刮目相看。

在加德满都，有两家华人经营的美甲中心。这个由日本人发起的美容热潮，是华人率先引进了尼泊尔。爱漂亮的尼泊尔妇女对美甲非常好奇，纷纷在尝试之后，深深爱上了它！华人美甲店所需空间小，设备也很简单，只提供基本的美甲服务，但天天门庭若市、顾客不断。如今，还有些当地女性要求老板娘开班授艺，亲自传授呢！

- 华人在尼泊尔带动了美甲潮流。
- 尼泊尔菜市场上，华人制作的豆腐是抢手美食。

- 对拍大头贴情有独钟的尼泊尔青年们。

结语

尼中两国往来日趋频密，在两国政府的友好合作下，似乎有更多的商机，陡然展现在华人的面前。

然而，在这个高深莫测的国度里，华人老像是局外人。经济和生活上，总隔着一层无形的屏障。「永远都搞不懂他们的价值观，还有那宗教的热忱。」华人摊摊手，耸耸肩说。

没人能预言，尼泊尔的华人社会何时才能形成。也许，中尼通婚家庭混血的新一代，将成为华人在这氤氲古国中悄然勃兴的起点。

- 加德满都杜巴广场也有华人的身影。

吉尔吉斯斯坦

引言

吉尔吉斯斯坦（以下简称吉国）和中国的共同边境长达1100公里，两国之间虽然有高耸入云的天山作为屏障，却阻隔不了两国人民互相迁移。

吉尔吉斯曾是突厥汗国的一分子。840年时，吉尔吉斯族攻灭回纥，建立汗国。他们曾与西藏和阿拉伯势力组成联盟，阻挡了唐朝势力入侵。10至12世纪，在黑汗国的统治下，伊斯兰教在中亚迅速传播。随着成吉思汗的崛起，中亚被蒙古人统治达数个世纪之久。直到1758年，清政府打败卫拉特蒙古人，此区域始落入清政府势力范围。

19世纪，沙俄势力伸入中亚。1918年，苏联成立。1924年，在民族划界的政策下，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成立，加盟俄罗斯联邦。1936年升格为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91年8月31日，吉尔吉斯正式宣布独立，改国名为吉尔吉斯共和国。独立后，吉国政局仍然动荡不安，阻碍了经济与社会发展。

吉国有四分之三的国土位于海拔1500米以上，畜牧业是主要产业；此外，农业也是吉国的经济支柱，主要作物包括小麦、甜菜、棉花、烟草、蔬菜及水果。吉尔吉斯有丰富的矿藏，唯缺乏石油和天然气。1990年代以前，98%的吉国产品出口到苏联其他地区。苏联解体后，吉国丧失广大市场，经济严重萎缩。1998年吉国经过经济改革后，加入世贸组织。近年吉国经济稍有好转，政府也意识到吉国山水优美秀丽，开始大力发展旅游业。

华人移民简史

有史学家推测，诗仙李白的出生地碎叶，就在今日吉国境内的托克马克（Tokmok）附近。碎叶古城是唐朝的安西四镇之一，也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丝绸之路南北两条路线，皆在碎叶这个地方会合。自古以来通过丝绸之路而进入吉国，就此停驻下来并成为当地一分子的华商，不知凡几。

清朝后期，宁夏、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回民起义反清，被左宗棠采取强硬的手段加以镇压。回军于清廷的围剿之下节节败退，为免被赶尽杀绝，回民分三批出走中亚。1877年，回族将领白彦虎以及其他将领，带领了千多人至3000多人不等的陕西、甘肃回民，在楚河的两岸定居下来，吉国的托克马克附近正是其中一个主要聚居点。1878年，又有千余名新疆与吐鲁番的回族从中国逃了出来，并在吉国南部的奥什居住下来。

1879年，4000多名回民由新疆伊犁区进入中亚，并选择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附近，以及吉国的伊塞克湖定居。这些移居的回民后来被称为“东干人”。

这些进入中亚的回民不但没有遭到驱逐，他们后来还得到了俄国国籍。然而，他们没有资产，加上语言不通，刚开始的时候，生活并不好过。所幸这些回民都是庄稼能手，他们从中国带来了不少蔬菜与农作物的种子，辛勤地开荒种地，不但丰富了中亚的蔬菜种类，而且还把相对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中亚来，贡献不小。

此后，这批回民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从20世纪初中亚反抗沙皇的统治，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再到二战时期阻止德军入侵，他们都积极地参与。其中，由回民马三成所组成的东干骑兵团更是威名赫赫。他们已经被当地社会所接受，甚至被视为多元民族社会的一部分。

近代，从中国移居到中亚的汉族、吉尔吉斯族、维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在少数。他们大部分是为了谋生而来到此处，譬如在沙俄时期、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就有大量的华人劳工进入中亚，修筑铁路、建设基础设施。1962年，中国的伊犁和塔城地区，有大批居民外逃至苏联，史称伊犁事件。当时出走的华人人数高达6万余，他们之中后来定居于吉国的不在少数，并且形成吉国早期的华人社会；他们遍布各行各业，他们大多从事农业生产，也有许多人从事买卖。

与当地人民一样，早期华人在这个历经磨难的国家之中成长、壮大，对吉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 *奥什市集，是比什凯克最大，最繁忙的市场。*

当今生活风趣

引言

吉国到底有多少华人？是个连驻吉国中国大使馆也说不清的问题。据中国大使馆表示，他们能掌握的数据，就是去年共有1万2000名中国人搭飞机入境，而从陆路过来的则更多，估计每年有2至3万中国人入境。他们多数只持有旅游或短期签证，却逾期逗留在吉国赚钱讨生活。在吉华人中，福建人占了约三分之一，河南与新疆过来的也很多，此外，东北人也有一些；非法劳务则以陕西人居多。中国大使馆的领事粗略估计，吉国约有4万名中国籍人士。

如果加上早期即从中国到吉国定居，并已入籍吉国的回、维、吉等少数民族，那更是难以计数。有资料显示，维族、回族（即东干人）已达17万之众。早期过来的少数民族华人各自成一群体，维族居住在该国的11个维族村，回族散居托克马克、小葫芦（Sokuluk）、亚历山多夫卡（Alexandrofka）、肯北洛夫（Kenbelov）和密梁川等地。他们成立社团、自己出版刊物，早已把吉国当成他们的家园。

近期赴吉的华人虽然也有活跃的华人社团，可是，对大多数新移民来说，吉国毕竟只是个赚钱的地方，并无长居的打算。

- *伊斯兰教是中国回族人生活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图为东干村小葫芦里的回教堂。*

华商开拓新天地

吉国被联合国评为最贫困国家之一。1990年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爆发大规模种族冲突，政府严重贪污。2005年，又爆发郁金香革命。

近几年，一切乱象渐渐稳定下来，吉国经济与和平渐有起色，随之而来的，正是滔滔而至的华商。

时代的巨轮轰隆碾过，在吉国首都比什凯克留下了数不尽的时代见证。采颐大道（Chuy Prospektisi）上，阿拉图广场、国家博物馆、音乐厅等俄式建筑，还有比比皆是的铜像，气势恢宏。可是，市区内的建筑以及道路，却大多老旧失修。而且，这里通讯与其他基础设施差，断水断电是家常便饭。和距离区区180多公里的哈萨克斯坦城市阿拉木图相比，比什凯克显得落后许多。

不过，2008年的比什凯克和数年前比较起来，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华人虎玉梅回忆1999年刚到吉国定居的情况时说，比什凯克当时非常落后贫穷，城里没有多少商店，商店里的货架全是空的，街上空荡荡，毫无生气。每逢星期六、日，市区更成了空城，因为市民多来自乡下，一有假日就全都回乡去了。

如此生活环境难免寂寞，可是，却是个赚钱的好地方。吉国17年前刚独立时，新疆一名年轻人白玺眼见到中国探亲或旅游的吉国人，回国时必带一台冰箱回去，心里便琢磨吉国的市场肯定不错。亲自到吉国一看，那里果然物价高昂，无论从中国发什么东西到吉国售卖，利润都能翻倍。于是，他毅然跑到吉国发展，成了吉国独立后最早进入的中国人。他曾在吉国做钢材生意，也开货运公司。

“这里做生意与居住的环境都很不错，华人来了之后都不想走了。”白玺笑说。1994年，白玺还开起了餐厅。目前，他的北京餐厅是吉国规模最大的中餐馆，也是当地中餐馆里唯一的一级餐厅。吉国举行六国会议时，江泽民、钱其琛都在这里用餐。

像白玺一样最早进入吉国的华人掌握先机，都赚了不少钱，在吉国打下了稳固的基础。近年来，越来越多华人进入吉国，可说中国各省市的人都到齐了。吉国矿产丰富，许多大型企业皆被吸引而来。中石油、中石化在此进行勘探，最近，华为也进来了。中国的建筑公司也不少，此外，中国政府也在托克马克投资造纸厂。

不过，更不可忽视的是众多勇于闯荡的民间华商。这些小商人有的在此把原材料出口到中国，有的从中国运货过来做贸易。2004年，哈萨克斯坦开始严重排华，大批华商转到吉国发展。曾经，哈国的巴拉霍可是中亚最火红的批发市场。如今，吉国的中海批发市场，已经取代了巴拉霍可的地位，邻近国家的小商人都前来中海办货。中海的华商高达2000人，他们在此批发各种各样的货物，从电器、药品、化妆品到装饰品，不一而足。中海附近的多利多义，则是服装批发市场，华商也很多。

此外，吉国还有一个叫“大唐”的购物商场，也聚集了200家左右的中国商户，主要以零售业为主。很多在中海做批发的华商，都在大唐租个单位兼做零售。

据新疆阿凡提物流公司吉国代表曾庆贺的统计，单是大唐就有五六家物流公司。而中海的物流公司更有上百家，由此可见吉国华商的盛况。此外，吉国南部的奥什市也有5000至6000华商，以福建莆田人居多。

- 大唐购物商场以零售为主。
- 中海批发市场虽然简陋，华商却在此赚了不少钱。
- 中海批发市场里的店铺，有上下两层集装箱搭起，下层卖货，上层当仓库。

跟着货物跑 天涯到海角

福建人沈玉贵在中海从事电器贸易。多年前，他在福建的贸易公司工作，发现发到新疆的货品特别多，直觉告诉他，那里肯定有个庞大的市场。跑到新疆做了几年贸易后，他又发现新疆的货品都流到中亚，于是，2006年，他终于来到吉国。

像沈玉贵这样跟着货物跑的华商不在少数。他们这几年在吉国确实赚了不少钱。然而，政治的不稳定，是华人最大的隐忧。2005年，吉国发生郁金香革命，总统被推翻，全国呈现一片无政府状态。不管是中国人、土耳其人还是其他外国人开的商店，一律被打、砸、抢。2006年，吉国两度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中海被迫关门3天。由于这层因素，许多中国大企业到吉国考察后，最后都决定不投资。

“如果我是大老板，我也一样只会在这里做灵活、短期的投资。中长期的投资行为如涉及固定资产、厂房建设等的投资，我不会去做。因为这里不稳定，投资环境也对外国人不利。在这里投资啊，进来容易出去难。”曾庆贺语重心长地表示。

近两年，华商开始抱怨在吉国经商利润越来越低，以前可赚30%，现在只能赚15%或以下，甚至面临赔钱危险。

问他们是否会在吉国就此安定下来，他们全都摇头。明天会在哪里？回国，或是另一个天涯海角？他们不知道。也许继续跟着货物跑，哪里更有利可图，他们就会出现在哪里。当他们觉得累的时候，自然会找一处叫“家”的地方停靠。

- 福建人沈玉贵和父亲，跟着货物跑，来到吉国。
- 从事药品批发的魏德雄与从事物流业的安文。
- 中国青年曾庆和，只想在中国吸收一些在国外经营公司的经验，未来还想回到中国发展。

中亚五国最活跃的华人社团

在中亚五国中，唯有吉国的华人社团得以蓬勃发展。

早在1991年，一群60年代到吉国、已经失去中国国籍的老华人，就办了一个吉尔吉斯华人协会。该协会当时共有会员300多人，成立至今，换过3任会长，第一任会长李德昇，第二任会长汪民昇，第三任会长石作山。由于老华人们年事已高，而年轻一辈的又不愿意接任，协会面对青黄不接的问题。

2001年，另一个华人社团吉尔吉斯斯坦华侨协会成立了，会员是仍然持有中国护照，较晚期才到达吉国的新移民。2003年，会长白玺找上有丰富侨务与社团经验的华人

虎玉梅出任常务副会长。虎玉梅为协会写章程，召开会员大会，并设置了各个机构，令协会正规化。

后来，在中国大使馆的建议下，两个协会于2004年合并，成为吉尔吉斯斯坦华人华侨联合会。在联合会下，维、吉、回、汉、俄5个民族都有一个副会长，联合会会长由白玺出任。

联合会在友谊宾馆租了一间办事处，虎玉梅天天在那里为华人处理问题。她表示，新移民还是以小商人居多，由于法律常识不足，常在吉国碰上问题，譬如护照被没收，被人欠货款、受骗，货物被扣押等等。

为了提高新移民的法律常识，联合会每年召开两三次大会，请专人给会员讲解法律知识。联合会和中国大使馆配合无间，也是当地护侨工作做得特别好的原因。

至于老华人，许多辛劳一辈子，老来生活条件还是不太好。联合会充分体现了华人孝亲敬老的精神，经常组织会员捐钱，给家境贫寒的老华人买油买米修房子，每年给贫困华人送救济金。

联合会也曾经办过一份《华侨报》，请来一名当地老华人当编辑，再请一名留学生当采访记者。可惜，《华侨报》因为经费问题而停办。联合会后来曾和新疆《经济报》联办《华侨报》，由于对当地缺乏深刻了解，内容不符合侨民兴趣，因此回响不大。

2005年12月，吉国发生了一宗震惊华社的事件。一名从伊犁来吉生活已有十多年的华人刘柄超，住在比什凯克附近的一个小镇，平时种地为生。由于该年农作物歉收，刘柄超到比什凯克买机票想把妻儿送回国，却被人打成重伤，送院不治身亡。刘柄超家境贫寒，连治丧的经费也无法筹措，刘妻于是找上华人华侨联合会，向虎玉梅哭诉其遭遇。

虎玉梅立刻写了一纸文情并茂的文告，影印后找来其他理事、副会长帮忙分发，吁请华侨解囊相助。文告一发出，马上有人打电话捐献，3天内获3700多美元捐款。“当时，连一名货物被抢、断了腿的小伙子也来捐款，虽然有20多索姆，却是他一天的饭钱。”虎玉梅回忆当时情况时表示。

联合会顺利为刘柄超筹办了丧事，买棺材，并把遗体运回中国。在追悼大会上，虎玉梅念了悼词，感谢与肯定华人团结互助的精神，场面动人，许多人热泪盈眶。吉国华人本来如一盘散沙，这件事可说是改变吉国华社精神面貌的转折点。它大大刺激了吉国华人的自豪感，也把吉国华人团结起来，令大家领悟到，人在异乡，唯有发挥互助的精神，才能度过种种难关。

- 吉尔吉斯华人华侨联合会首届会员大会。（照片由吉尔吉斯华人华侨联合会提供。）
- 当地华人把《华侨报》办得有声有色，可惜该报后来因为经费问题停办。
- 东干人生活水平已经大大提高。王富英夫妇住在右边的房子里，院子很大，孩子成家后，又盖了左边双层的屋子给他们住，前院有小泳池，后院还种菜。

东干人 清朝文化的活化石

在吉国的大地上，住着一批既谦卑又骄傲的回民。130多年前，他们为逃避清军的追剿而进入中亚。多年后，又有更多回民因为政治迫害流亡中亚。这批回民从最初的数千人，开枝散叶，发展到今天，已有6万人左右。虽然仅占总人口的1.1%，可是，他们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民族特性，并没有被主流社会同化而消失。

在人口普查中，他们被称为“东干人”。有一种说法，指回民从前住在黄河东岸，因此东干是“东岸”的变音。可是，他们更喜欢自称回民。世世代代，他们思念着遥远的家乡，对故土仍然怀着浓烈而深厚的感情。他们对文化、语言、传统的坚持，更令人动容。

今天的东干语，其实就是甘肃、陕西口音的汉语。而东干文，则是以斯拉夫字母拼写的陕甘方言。有趣的是，由于长时间与汉语世界隔绝，没有随着时代演进，今天东干语的许多词汇仍停留在清朝时代。他们管政府叫衙门，称警察为衙役。把商店称为铺子，把女人或妻子称为婆娘。近代新发明的事物，他们不懂得汉语如何称呼，因此，他们把飞机称为风船。至于电脑、冰箱这些东西，他们多依靠俄语、阿拉伯语或吉尔吉斯语的音译。不过，随着近年东干人和中国的联系越来越多，电视、冰箱这些新词汇也开始慢慢被东干社会接受了。

许多逐渐失传的华人民间艺术与文学，东干人还保存着。他们爱唱曲子，如《孟姜女》、《绣荷包》、《高大人领兵》等等。口溜儿（顺口溜）、倒扣话（绕口令）、娃们的曲子（儿歌）、古今儿（故事）和猜话（谜语）等，更是一代代口耳相传。一句“千买卖、万买卖；不如地里翻土块”的口溜儿，传神地表达了回民早先重农轻商的传统。

虽然城市里的东干人衣着和一般现代人的装扮无异，可是，去到乡下，还是到处可见扎着腿带子、穿着腋下开襟旗袍的女人。拉面、面片儿等等陕甘美食仍然是东干人的日常主食。由于受到俄罗斯族、维族等其他民族的影响，手抓饭、馕、罗宋汤，也成了东干人饭桌上常见的佳肴。不过，东干人也把拉面发扬光大，今天，在吉国任何一家餐馆，几乎都可点到拉面（Laghman）。

“我们吃的和甘肃人吃的看起来是差不多一样，可是蔬菜种类不太一样。而且甘肃食物太麻辣，我们不会吃辣。”有个汉族名字的东干人王富英说。不同水土出产不同蔬菜，桌上的食物难免会有所变化，可是，华人饭桌上的标志——筷子，却从来没在东干人的饭桌上消失过。

东干人婚嫁与传统节日的仪式，更是百年不变。新娘们穿的大红袍、高底儿鞋，仍然保留着清朝时候的样式。而新娘头上繁复的发髻“燕燕头”，在中国已濒临失传，吉国却还有老太太们会梳。开斋节和古尔邦节是东干人的两大节日。有经济能力的东干人会趁着古尔邦节到麦加朝圣，没能力负担昂贵旅费的则会宰牛宰羊庆祝节日。回族老先生哈琪哈赤曾去过麦加朝圣，不久又要再去一次。“到麦加朝圣的旅费一次就要2400美元，对我们来说是不小的开销。”哈琪哈赤说。哈琪哈赤有3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当司机，老二和老三在市场卖货，家庭不算太富有，可是还是坚持到麦加朝圣，由此可见东干人的虔诚。除了这些宗教节日，东干人也庆祝华人传统节日如端午节等。

当然，正如其他国家，农村对传统民间文化的保存，总是比城市来得强。农村学校还有东干语课。反观比什凯克，年轻一辈都说俄语，有的甚至已经不会说东干话了。不过，近年中国在中亚越来越有影响力，年轻一辈又开始热衷学起东干语，甚至也有部分东干领袖主张开始尝试华语教学。

跟吉国其他民族相比，东干人的教育水平相当高。他们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如今，大学毕业的东干人高达20%至30%。而东干人更遍布各行各业，不再局限于种地。目前，留在农村种地的东干人约占40%，其他的都开起公司。此外，东干人也出了很多科学家与学者。

今天走到东干人聚居的村落，不难发现东干人的生活水准是相当不错的，家家有车有房。在通往东干村落小葫芦的路上，一群吉尔吉斯族少年蹲在路边。细问之下，原来这些吉族少年竟然是结伴到东干村来找工作的。刚在吉国定居下来时，东干人一贫如洗，只能给人干活、种地。今天，却轮到俄族和吉尔吉斯族给东干人开车、打工。

东干人很少跟外族通婚。东干知识分子王洪山说：“家里管得很紧，不让年轻一辈和外族通婚啊。”问他为什么不鼓励年轻一辈和外族通婚，他解释说：“东干人很少。跟外族通婚，久了这个民族就消失了。”

吉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的东干人聚居在楚河两岸，两国东干人来往很密切，而且通婚频频。“你的妹妹嫁到哈萨克，我的儿子娶了吉尔吉斯的东干人，大家都是亲戚。”王洪山笑说。

对东干人来说，民族身份认同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国家认同。他们深爱着生活了多年的吉国，但心里还是认为中国是第二个家乡。“心里很想念，可是，也只能去走走了。”木哈麦说来，无限惆怅。

回民坚毅的生命力，就如他们耕种的田地，春天一来，就长出了满地绿油油的蔬菜。

- 王富英和亲家哈琪哈赤，在厨房的炕上享用传统回族糕饼。东干人不赞成外族通婚，而东干人人数又不多，因此出门都是亲戚。
- 在东干村菜市场里做生意的东干妇女。

其他资讯

回族文化吉国续

1962年，家在甘肃的尤苏波夫一家被划入地主阶级，受到批斗。尤苏波夫爷爷带着几名孙子逃到吉国。“刚到吉国时，我们语言完全不通，不过，这里已经有很多回民，他们更早就到这里了，我们便给他们种地。父亲一定要我们上学。当时我只有16岁，因不懂俄语，只好从小学一年级念起。不过，我只花了5年就念完了小、中学。”尤苏波夫哈密说起往事，语气毫无辛酸，更多的是骄傲。

如今，尤苏波夫哈密家里兄弟几人，都已学有所成。老大尤苏波夫哈密的汉族名字叫王富英，毕业自农业经济系。老二尤苏波夫拉西德，汉族名字王吉山，是比什凯克人文大学的教授兼顾问，教国际经济。老四尤苏波夫木哈麦，汉族名字王洪山，则是物理系出身，曾给苏联军队设计飞机、电脑等。苏联解体后，他开了家公司，提供工业设备及软件等。

兄弟几人之前都没有出版刊物的经验，却共同出资，办了一份《回民报》，一份《回族》杂志，两份刊物都使用斯拉夫字母拼写的东干文。《回民报》乃半月刊，共有8版，主要报导吉国时事与当地回族社区的新闻。《回民报》有一名编辑，4名记者，另有一名美编负责排版设计。《回民报》的订阅费一年为200索姆。由于东干人口本来就不多，因此报纸的发行量只有1500份。虽然如此，《回民报》却办得相当专业，排版大方，印刷精美，而且内容充实，不是一份浑水摸鱼赚取广告费的刊物，创刊以来，赢得极佳口碑。

至于《回族》杂志则每年发行一次，内容包括经济、农业、商业、运动、文学等等，记录了吉国回族的生活与感情。杂志一本150索姆，发行量约500至1000本。《回族》杂志的主编正是王家老二王吉山。课余时间，王吉山就在办公室里处理杂志的编务工作。而老四王洪山，则是《回民报》的技术编辑，负责印刷等技术层面的工作。老大王富英为退休人士，闲时喜欢舞文弄墨，投稿到《回民报》与《回族》。兄弟几人齐心协力，不辞劳苦，但求属于东干人的报纸与杂志，能延续下去。

“我们每年都在赔钱。每印一份报纸、一本杂志，都要自己掏钱出来补贴。”王洪山说，“可是，如果我们不干，就没人干了。久了，年轻人连话都不会说了，我们的民族文化慢慢就消失了。”

兄弟几人还印刷东干文课本，免费派给农村的学生上课。正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努力，一个人口仅占区区1.1%的族群，却能一代一代，在异地把文化和语言传承下去。

- 王洪山（左）与哥哥王吉山，为回族文化的传承不遗余力。

结语

未来，吉国还须面对许多挑战：国营企业私营化、西方势力的扩张、种族问题以及悄悄抬头的恐怖主义。凡此种种，皆令华人担心吉国政局的变化，会影响他们在吉国的投资。

不过，无可否认的是，吉国仍是中亚五国当中，对外国最开放，对华人最友善的国家。也因此，吉国华人在中亚五国里，人数最众，也最为活跃。如果吉国在各方面能再加以改善，华人也能多些回馈当地社会，那么，资源丰富、风景壮美的吉国，不难成为华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国度。

哈萨克斯坦

引言

哈萨克斯坦（下文简称哈国）曾是强大的匈奴帝国的一部分，盛况维持了数百年。继之而起的突厥人也在中亚地区建立了许多汗国。11至15世纪，契丹人和蒙古人的铁蹄又踏入了这片土地。留存下来的突厥蒙古后裔信奉了回教，后来再分裂出乌兹别克与哈萨克两族。哈萨克汗国于15末世纪建立，分为大帐、中帐和小帐。18世纪30、40年代间，中帐和小帐被俄罗斯吞并。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当地于1936年以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名义加盟苏联，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才宣布独立，并改国名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长期归属苏联的历史，令哈国多了许多俄罗斯人；今天，俄罗斯族是仅次于主体民

族哈萨克族（下文简称哈族）的第一大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此外，还有乌克兰族、乌兹别克族、德意志族、鞑靼族，维吾尔族等100多个少数民族。为了增加国内主体民族的人口比例，哈国政府曾呼吁世界各地的哈族回归故土，吸引了不少中国境内的哈族移入。目前，在哈国生活的华人不在少数，但是华人人口并没有被官方归入少数民族人口的组成部分。

哈国天然资源丰富，石油、天然，以及煤、锰、铜、铅、锌等矿物，为国家带来庞大的收入，加上近年来政治稳定，该国经济成长高达8%以上，表现一枝独秀，成了中亚最富裕的国家。

华人移民简介

哈萨克和中国山水相连，一直以来，中哈人民在两地之间迁徙的情况，非常普遍。

1877年，甘、陕、宁回民起义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余部被迫流亡至中亚，后来，他们在楚河两岸定居下来，逐步形成一个新族群，被称为东干人。

清朝末年，民生困苦，有大批中国劳工远赴中亚谋生，其中以维吾尔族居多。1920年代，每年赴中亚的维族以及吉尔吉斯族就有多达2到3万人。而前苏联在这段时期所修筑的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就凝结着许多华工洒下的血汗。

早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俄国曾强征哈萨克人做苦工，这引起哈人群起反抗。那时，至少有15万哈人死在俄国的残酷镇压之下，近20万人逃往中国。20世纪30年代，在苏维埃政权的强制集体化过程当中，哈国更有超过150万人死于饥荒，导致大量的哈族再度逃往中国，并且在中国落地生根，成了中国公民，却对故国念念不忘，为哈萨克斯坦于1991年独立后，大量中国哈族回归故国的情况埋下伏笔。

在1966年前后，由于各种因素，不少中国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出走中亚，其中有一部分是回民。这些回族新移民在哈国受到早年过来的东干人照应，再加上本身的刻苦耐劳，他们很快便在当地扎下根来。在中国时，回族已是务农好手，来到哈国之后，因为语言不通，他们唯有以务农为生。哈族是游牧民族，因此对于农业不感兴趣，而回族人从中国带来大量蔬菜以及其他农作物的种子，大大丰富了哈国的农业生产。此后，当地菜市场的蔬菜，有60%以上都是回族人供应的。

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些来自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哈国生活得越来越好，尤其是东干人以及维族的生活水平更是大幅提高。新一代东干人所涉足的行业遍布各领域，当中不乏工程师、教授等知识分子。

90年代之后，也有许多汉、满族人被哈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吸引，而来到这里经商。这些新移民的人数曾高达数万人。

当今社会风貌

引言

由于中亚存在着许多从中国移居过来的哈族、维族等少数民族，而他们中不少人以华人自居，因此，在谈到哈国的华人时，不能忽略了他们。

大部分华人，特别是汉、满新移民，在哈国活得小心翼翼，连出门都能免则免，更别提参加什么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了。哈国的华人到底有多少，迄今仍无精确的统计。据推测，哈国汉族华人人数最多的时期有几万人，目前只剩两千多人。他们大多在批发市场里做贸易，或在中资企业里打工。华人绝大多数集中于哈国最大城市阿拉木图。此外，哈国首都阿斯塔纳也有一些中资企业的华人职员。

来自中国的回族与维族，经过数代繁衍，人数比汉族多得多。至于来自中国的哈族，由于入境或定居都很容易，因此人口极其庞杂，再加上许多人都是中、哈两边跑，流动量也大，所以无法精确统计。曾有一个说法称中国籍哈族高达60万人。

不能承认的身份 不能言明的悲哀

“来哈萨克斯坦太危险了，没事千万别来。”若有人想到哈国生活或旅游，向哈国华人征询意见，都会得到这样的答复。

若是一定要到了哈国，那里的华人会特别叮嘱：“没事别出门，出门别说话，以免暴露身份。暴露身份就完了。”

哈国华人，就是如此胆战心惊地过着日子。

哈国是中亚最富裕的国家。阿拉木图道路笔直宽敞，行人道上种满葱葱郁郁的绿树，空气格外清新。这个俄式城市很宁静，也很少看到随意丢弃的垃圾。但是，平静安宁的外表下，掩盖着哈国严重的排华问题。哈国华人说，哈国普通百姓对华人虽然谈不上友善，但至少不会拳脚相向。

走在街上，中国人总是小心翼翼，最担心的是碰上假警察。曾有华人被自称便衣警察的人拦住，要检查他们的护照，然后“警察”一口咬定护照是假的，把不知所措的华人推上“警车”，载到荒无人烟的地方洗劫一空。于是，哈国华人互相告诫：如果被警察查身份，要保持镇定，不要上所谓的“警车”，因为警察无权随便抓人。如果对方没有穿着警察制服，则更不要相信对方的身份。

哈国自2004年开始出现大规模针对华人非法居留的扫荡行动后，华人就一直没有安宁的日子。这几年，华人成了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导致大批华商被迫含泪离开。今天，在哈华人（中国籍汉族）的人数，已经从2004年以前的数万人之众，锐减到两千余名。

- 宁静的阿拉木图。

走钢索的人

仍留在哈国的两千多名中国人，主要是中资公司的职员、在批发市场做民贸的华商，以及留学哈国的学生。

在这3个不同的群体当中，中资公司的职员无疑是比较幸福的。中石油、中石化在哈国规模很大，都有常驻的中国籍员工。虽然他们也偶尔会遭受警察的骚扰，不过这些高级职员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清楚自身的法律权利，比较懂得如何应对。而且多数中资公司都有专门聘请的律师，中资公司员工若在路上被警察拦截，只要打通电话，律师就会过来帮忙处理。

在大企业的保护伞下，中资公司员工不必心惊胆战过日子。在商场里，偶尔还能看见他们自在地闲逛。

在哈国从事贸易的华商就没那么幸运了。华商大多数集中于阿拉木图市的巴拉霍可。那是一个长达数公里的批发市场，市场里有个亚联商场，曾是华商的天下。如今，到亚联商场转一圈，依然摆卖中国货；但店内，却已不再是中国人。

问那些仍然留在巴拉霍可的华商生活过得怎样？“苦啊！苦啊！中国人在这里苦啊！”这是某个华商的第一反应。问他们既然生活与前景都不好，为何还留在当地？他们说每个华商刚到哈国时，都至少投资了几十万，这些都是他们的血汗老本，无论如何也要把货卖完才走，因此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呆在哈国。

早在1990年代，就有华商进驻哈国。当时哈国排华现象并不严重，华商在此赚了不少钱。但自2004年开始，警察常到巴拉霍可不分青红皂白地捉中国人，搞得市场鸡犬不宁。“警察一来，中国人就跑。那场面啊！像拍港产警匪片。”一名华商说。

现在，巴拉霍可只剩200名左右的华商。许多中国老板不敢露面，把货交给当地人卖，晚上才到店里收钱。如此做生意，终究不妥，当地员工偷货或卷款私逃的事件时有发生。

另一名华商则指出，当年巴拉霍可的华商有上万人，整个市场很旺，哈国周边国家的商人都慕名前来办货。随着华商的撤出，亚联商场的繁荣也一去不返了。

在哈国，华商们成了走钢索的人，纵然危机四伏，却又无路可退，只能咬牙坚持走下去。

- 巴拉霍可的亚联商场是华商集中地。
- 亚联商场的华商柯美莲。
- 巴拉霍可内的华人超市。

同为华人 际遇不同

同样是华人，持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护照的华人，受到的待遇却截然不同。

哈国约有十名马来西亚华人和20多名新加坡华人，虽然同样必须面对其他华人所面对的困境，但是，新马华人至少没有受到粗暴对待。

“哈萨克人确实不喜欢华人。我向哈萨克人介绍自己时，只会提自己是新加坡人，就算别人问起，我也会强调新加坡和中国文化不同，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一般都会接受。”新加坡华人郭国仲说。

其他新马华人对此皆有同感，马来西亚华人甚至更感到自己在哈国受到礼遇。“我刚到阿拉木图那年，电视上经常播出有关马来西亚的新闻和纪录片。哈国政府把马来西亚视为回教国家的典范，有意朝马来西亚的方向发展。因此哈萨克人对马来西亚人很有好感。”马来西亚华人周惜珠说。

新马华人数虽少，却分布在多个不同的。哈国目前大约有5家新加坡公司，其中位于阿拉木图的新加坡科技电子有限公司（Singapore Technologies Electronics）、新加坡吉宝企业有限公司（Keppel Corporation Ltd），以及阿斯塔纳的新加坡科技工程有限公司（Singapore Technologies Engineering），都取得良好业绩。

这些新资公司多聘用当地人，以新加坡科技电子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以培育当地人才为目标，平时只有两名新加坡职员，只有当进行大型项目时，才会短期外派十多名新加坡职员到哈国。

新资公司在哈国展现了很强的企业责任感。“取诸社会，用诸社会。ST在哈国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因此也希望回馈当地社会。公司有个奖学金计划，提供给哈国教师，让他们能到新加坡进修。”新加坡科技电子有限公司哈国分公司的董事长曾兆亮（Gary Chan）指出。

这些到过新加坡的哈国教师，都对新加坡留下很好的印象。他们眼中的新加坡，科技发达、犯罪率低、人民礼貌、环境干净、办事有效率，建国短短40年，就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值得哈国借鉴。在新加坡的生活经历，开拓了他们的眼界，相信也许通过他们，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哈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

旅居哈国的新马华人来往密切，对初来乍到的新马华人也特别照顾。大家经过互相介绍而认识，生活上互相扶持，并且常常举办餐聚以联络感情，只是缺少一个形式上的社团名称而已。不过，新马华人跟中国大陆华人几乎没有任何交往。新马华人坦言，他们和中国大陆华人文化差异较大，并且，也感觉大陆华人自我保护意识太强烈，难以接近。

新马华人在哈国，并不全然以赚钱为目的。有一部分的新马华人，在非政府组织里工作。来自新加坡的郭国仲隶属神召会，在哈国当顾问。他很喜欢哈国：“哈国有一些新加坡已经失去的东西。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密切。”后来他还娶了当地哈族女子为妻，并育有一女。

同样来自新加坡的黄来春，已经54岁了，却跑到哈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当社工。她在一家孤儿院服务，也在阿拉木图附近的一个小镇Taleykorgan办起一家让智障儿学习的学校。刚来时，她很不喜欢这地方，觉得当地人很慢、办事效率又低。可是，住下来之后，她却发现了哈族乐于助人、好客、善良、尊敬老人的美德，又渐渐喜欢上了哈国。

还有一名香港女子卢淑英，在哈国创办了黄金种子公共基金会，宗旨是开启当地年轻人的视野，带给年轻人正面的影响。由于哈族青年酗酒问题严重，卢淑英希望通过教育，让他们改变坏习惯。她开办语言中心，让学生学习英语、俄语和汉语。中心还设有图书馆，藏书丰富。她的语言中心吸引了许多来自中国的哈族青年。他们在此学习俄语，互相鼓励，一起面对新的生活。

- 新加坡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有重大项目进行时，会多调派一些新加坡职员到哈国。
- 来自新加坡的郭国仲在哈国生活多年，还娶了哈族女子为妻。
- 54岁的黄来春，在哈国向孤儿与贫童们伸出援手。
- 香港女子卢淑英（右）12年前到哈国创办了黄金种子公共基金会。

夹缝间的人

上世纪前半叶，哈国人曾两次大规模逃往中国。他们在中国繁衍生息，后代都在中国出生、成长，且持有中国护照，是中国公民，但在心灵深处，部分人仍然认定哈国才是自己的家园。

哈国独立后，总统号召全世界所有哈萨克族回国定居。于是，一场大规模“回归故乡”的运动就此拉开了帷幕。为了鼓励哈族回归，政府制订了《公民法》和其他措施，以优惠政策奖励哈族新移民，譬如回归家庭可申请生活补助金，一个人可得2000至4000美元等。条件是一个家庭里至少要有一个人放弃他国国籍，成为本国公民。

哈萨克斯坦给了境外哈族一个玫瑰色的愿景。可是，海外归来的哈族，在哈国的生活却非从此一帆风顺。

看似中性，其实带着贬义的词。回归者总爱对外宣称自己和本国哈族共享同一语言、文化、信仰，一切和本国哈族并无二致。可是，从思想、价值观，乃至衣着、口音和生活习惯，他们都和本国人有区别，很容易被一眼区分出来。

另外，哈国哈族认为早年出走到中国的哈萨克人，都是民族的叛徒，国家有难时远走高飞，国家经济好了，就要回归。他们也不满回归者享受着政府提供的种种优惠和福利。

在巴拉霍可市场卖胶带的波拉提夫妇，从中国迁回哈国已有十年之久。他们坦言在哈国受到歧视。波拉提无奈表示，很多出走中国的哈族家庭，当年都是因为受到政治迫害，才被迫背井离乡的。以他们家为例，当时被划为地主阶级，叔叔都被整死了，父母才逃到中国。

虽然哈国政府近年大力提倡哈语，可是哈国的主要沟通语言仍是俄语，尤其在大公司及银行等机构工作，更必须懂得俄语。从中国移民过来的哈族不通俄语，因此很难找到好工作

另一方面，中资公司也不太愿意聘请回流的哈族。“他们认为自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工作不勤奋。”一名中国籍华人雇主说。

移居哈国的中国哈族，多数都是从中国农村过来的，教育程度一般都不高。当地哈族人看不起他们，中国公司也不愿聘请他们。因此回归者在哈国求职常常碰壁，经常面临失业问题。

于是，为了生存，他们在哈国多从事劳力工作，如在餐厅打杂、在乡区放牧等。不过，他们在哈国的收入比在中国时高，可是近年哈国物价暴涨，生活成本大增，很多人又考虑再回去中国。

来自中国木垒县的哈族青年吴轩，举家迁来哈国已有6年之久。当初，吴轩父亲因为不希望下一代被汉化，另外也考虑到事业与孩子的教育等问题，抱着回归祖国的心态来到哈国。目前，吴轩父亲在学院教中文，母亲在政府部门打杂，而吴轩本身则在阿拉木图经济学院（相等于职业高中）就读。吴家的情况，已是回归者当中属境况不错的了。

吴家只有吴轩母亲持哈国护照，其他人都还保留中国户籍。不过，吴轩也在考虑明年是否要入籍哈国。他认为哈国才是祖国，中国只是他成长的地方。哈国赚钱多，消费高，中国虽然发展迅速但竞争激烈。中国籍哈族在两个国家之间举棋不定，许多人保持观望态度，静观两国未来的发展。

每年都有大量回归者从中国到哈国定居、打工。有的从此扎根哈国，也有许多人返回中国。在中哈两国，他们大多属于弱势群体。他们当中，有的更认同中国，有的却认同哈国，不过，大多数人都对自己的国家和身份认同模糊不清。也许，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友善、更平等的生存空间，比他们的身份认同更为重要。

- 波拉提夫妇在哈国育有一对子女，父母则留在中国。
- 来自中国的哈萨克族青年吴轩。

结语

自建国以后，哈国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中国人前来淘金。在高峰时期，一百三十多万人口的阿拉木图市竟然涌进了数万名中国人。如此庞大的异族大军骤然压境，任何国家都会备感压力。

其实，华人移民许多生活上的焦虑，以及哈国人对华人的一些负面看法，当中，是存在着不少有待斟酌的地方，只要双方进行更多的沟通，在彼此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之后，相信大家还是可以在这片美丽的国土上相处得更加愉快。

- 哈萨克斯坦商场里的华人摊档，顾客络绎不绝。

土耳其

引言

位于地中海与黑海之间的土耳其，领土横跨欧、亚两洲。它有97%的领土在亚洲，其余3%则在欧洲。

土耳其一词由“突厥”演变而来，在鞑靼语中意为“勇敢”。它曾是东罗马帝国的中心。15世纪中叶，东罗马帝国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所灭，建立了奥斯曼帝国。16世纪末开始没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同盟国作战，战败后帝国瓦解。1919年爆发了革命，1923年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它拥有6500年的历史及13个文明的历史文化遗产，古迹星罗棋布。

这里四季分明，三面环海，散发东西方文化的独特风情。灿烂的文化，明媚的风光，热情的人民，使它具备了充足的旅游资源，吸引了外国旅客的到来。

土耳其资源丰富，农业发达，工业基础扎实，经济增长迅速，极具发展潜力，理应会吸引很多华人前来谋生与发展。但基于种种因素，目前只有约3000名华人居留在这个国度。

华人移民简史

据说，第一个到土耳其来的华人是一名祖籍上海，成长于香港的朱姓人士。现年已90多岁的他，仍然在当地经营羊毛衫以及皮鞋工厂。

而第二个到来的华人恰巧也姓朱，同样来自香港，华人分别称他们作老朱和小朱。小朱是一名工程师，逗留的时间不算长，在当地娶了一名希腊女子后就随妻到希腊发展，已于多年前与世长辞。

第三人则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刘炳汉，有个别名叫刘大麻子。毕业于黄埔军校的他蒋介石身边的军官。在土耳其留学时，刘炳汉与老师的女儿共结连理，婚后两人返回中国。之后刘氏夫妇迁居数次，从南京到上海、香港，最后在台湾落脚，结果还是因为刘妻无法适应台湾的生活而重返土耳其。

1955年9月，来自中国重庆的王曾善一家9口踏上土耳其的国土。身为中国与土耳其交换学生计划的首批学员，王曾善过去曾因中国动乱而举家逃至巴基斯坦，后来因为伊斯坦布尔的一名教授同情他的困境，邀他到伊斯坦布尔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和文化课程，王曾善欣然接受邀请，于是携带家眷而来。

那时的土耳其仍然处于贫穷落后的阶段，不论电话通讯还是公共设施均不完善，加上言语不通，其生活之困窘可想而知。

说得上一口流利土耳其语的王曾善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的生活，但对只懂家乡话的妻子和子女而言，却是个大挑战。如今，女儿王荷丽回忆说：“当时父亲只教了一句土耳其语‘什么’，让我们自个儿去学去问。我们便到家对面的水果档，指着各种各样的水果不断地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我们也常与邻家小孩一齐玩耍，不知不觉就从完全不懂土耳其语到学会了它。”

王曾善一家儿女多，开销大，除了教书之外，他也开中餐馆以补贴家用，而这家名为“中国饭店”的小餐馆，正是当地的第一家中餐馆。那时的土耳其物资匮乏，中餐材料和酱料奇缺，太太马昌玉就在家种植豆芽，自制豆腐与酱料。

那时候，当地人对中餐可说全然陌生，马昌玉不厌其烦地引导食客如何享用中餐。渐渐地，土耳其人不但开始不排斥中餐，还爱上了中华美食。

土耳其并非移民国，除了血缘或姻亲等理由，并不接受外来移民，居留审核也非常严格，限制又多。因此，在两名朱先生、刘炳汉以及王曾善一家之后，极少华人前来定居。

在1980年代，土耳其采取了对外开放的自由经济政策，于是华人企业便开始前来开拓商机，到了这时候，从中国及东南亚过来的新移民才逐渐增加。

- 土耳其第一家中餐馆“中国饭店”。（照片由当地华人提供）
- 王曾善一家9口是土耳其第一个华人家庭，如今已开枝散叶，多代同堂。（照片由当地华人提供）
- 早期通婚华人的中西合璧婚礼。（照片由当地华人提供）

当今社会风貌

引言

土耳其对外来移民并不抱持鼓励的态度。

这些年，华人大多是通过婚姻或工作而来，人数在3000名左右。他们主要来自中国浙江、安徽及东北，少数来自香港或台湾，多数聚集在首都安卡拉及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Istanbul）。

当地华人主要经营餐饮业、小型杂货店、服装店及礼品批发等，有些则从事导游、翻译、英语或汉语教员等工作。然而，政策的诸多限制，令华人的生意无法扩大。

华商之间甚少往来，言行谨慎。因此，部分通晓土耳其语的华人以当地人为主要社交对象。然而，过埠新娘们却保持着紧密联系，每月还通过自组的妇女会举办餐聚，闲话家常。

当地只有一家网络中文媒体，让华人相互分享生活资讯及情报。此外，华人子女一般都在国际学校接受教育，对英语、土耳其语的掌握比汉语好得多。

土耳其气候宜人，治安好，华人生活总算安定。尽管单调了些，但只要刻苦耐劳，三餐温饱并不成问题。

生意难做 勉力支撑

早期，人数不多的土耳其华人主要以经营中餐馆为业。中国国营企业于1980年代末姗姗而来，开拓了商机，于是纺织业、机械制造业开始进驻市场，华人的经济活动才逐渐走向多元。

然而，土耳其政府对中国纺织品的进口诸多阻拦，中国货品要打入当地市场并不容易。因此，从事这行的商家无法持之以恒，只好转而售卖中国礼品。

土耳其是全球节日最多的国家之一，几乎两三天就有一个节日，民众都互相送礼庆贺。几名华人看准了礼品市场的潜力，就在伊斯坦布尔的Sark Han批发城内开设礼品批发店，无论精美的餐巾、桌布、吊饰或首饰等，都广受当地人喜爱。

礼品畅销异常，华人也就一窝蜂地投入其中。这些批发商大多来自中国安徽，原本在当地零售店里打工，凭自身工作经验在中国组织货源，再批发到土耳其。

刚开始，礼品批发生意本小利大，前景大好，有些人甚至连开两家分店。但后来礼品店越开越多，货品大同小异，市场趋于饱和，再加上熟悉当地市场需求的土耳其商人亲自到中国去办货，竞争日益激烈。

“一个馒头两个人吃，还能饱，20多人分一个馒头，岂能饱？”批发商叶云打趣的比喻，清楚显示了礼品生意的前景。

生意难做，批发商只好压低价格。另外，当地政府实行反倾销，针对进口的中国礼品征收标准不一的进口税，令生意成本激增。此外，日益高涨的店租更重重压在当地华商肩上，使他们失去了信心。

伊斯坦布尔有50多家中餐馆，菜式以粤菜为主，其中糖醋鸡、酸辣汤、铁板牛肉及宫保鸡丁最受顾客欢迎。中餐馆的档次及价格都稍微偏高，最低消费13至50美金不等。

然而，中餐馆生意因受到非典型肺炎事故及金融风暴的冲击，一度跌入谷底，许多撑持不住的业者纷纷倒闭。其中，设于伊斯坦布尔的中国国营企业——广州远洋饭店首当其冲，被迫歇业；余者则凭着一股顽强毅力，苦苦撑持，才熬过了低迷的谷底。

激烈竞争下，不少中餐馆改为自助快餐店，顾客只须缴付十里拉，即可开怀大吃。这种超前的经营方式广受当地人欢迎，掀起了一股崭新的饮食风气。其中，东方大酒楼沿用了这种经营模式，分行开了一家又一家，如今有9家分店遍布各大超市。

这里的华人，若想如欧洲华商一般赚大钱，几乎是不可能的。各行各业的华商们，都不愿眼巴巴看着辛苦经营的事业毁于一旦，再怎么艰难都想稳守岗位，撑持到底。

- 华人批发的礼品价廉物美，深受当地人喜爱。
- 传统中餐馆格调高雅，主攻中上层消费市场。
- 自助餐式中餐广受土耳其人的欢迎。

政策多变 无所适从

“土耳其的政策，朝令夕改，使人难以适从。”当地华商怨声载道。

大部分华人未曾入籍，一般持居留证。过去居留证每3年更新一次，2004年起，改为每年都要更新。而申请更新，往往不获批准，逾期居留者，常遭警方扣留。

当局或批准了一家新公司的开业申请，但又以劳工保护条例加以约束，间接阻遏引进外国员工，业主不得不雇佣本地人，造成中餐馆员工多是土耳其人。

这一切，都令华商对前景失去信心，不是有意离开另谋出路，就是回流中国重新发展。

另外，过去只要跟当地人通婚，两年后即可入籍。如今条例较严苛了，结婚3年才能申请入籍，住满5年才能取得身份证及土耳其护照。

也许少点抱怨，生活就能简单一些。尽管华人满腹牢骚，但这四季分明的国度，却以清新的空气、宜人的气候留住了他们的脚步。

衣食住行 自成一格

当地华人，无论衣食住行都自成一格，某种程度上仍延续着家乡的生活习惯。

以饮食为例，华人三餐都以中餐为主，炖煮式的土耳其菜始终无法符合他们的口味。土耳其菜讲究繁复的烹调，加入大量番茄酱及酸奶酪，味道甜滋滋的，主食则舍米饭而取面包，也难怪华人不太欣赏。跟土耳其人十分讲究饮食不同，忙于工作的华人用餐较随意，饭菜全摆上桌后，便各自端盘用菜，各取所需，一般用餐时间也不过半小时左右。

华人的早餐有中、西式两种选择。中式早餐为稀饭或面食，西式则有面包、小黄瓜、蕃茄、干酪、腌橄榄、小香肠及热红茶。至于午餐和晚餐，华人喜欢在家烹煮，一菜一肉一汤配上香喷喷的白米饭，简单的菜式吃得有滋有味。他们偶尔也想念家乡的小吃，心血来潮时会自制包子、馒头、饺子等中式点心。

由于当地政府对房地产买卖有严格的限制，因此华人一般都赁屋而居，住在租来的公寓里。小型公寓空间狭小，只有一个设在卧室里的小卫生间；较大型的公寓则有两间卧室、一间客房、两间卫生间及阳台，相对比较舒适。三房一厅的租金从600到1000里拉不等，租金较低的则是设施简陋的地下室单位，连藉以取暖、烧饭的天然气都欠缺，但总算是个栖身之所。市区租金贵，低收入的单身华人一般住在郊区。

华人也注重起穿着和仪容，在这个穆斯林国家里，女性的服装绝不暴露，一般领口不低于锁骨、不用透明布料，以宽松的上衣配搭长裤；至于男性，平日多以衬衫配搭长裤，出席较隆重的场合，则西装笔挺。

拥车的华人不多，市区有地铁、有轨电车、公车或出租车服务，交通方便。

华人每天辛勤工作，休闲时刻不多。充其量不过是到购物中心、餐厅、咖啡厅及卡拉OK歌厅去；或去郊游、旅行；或跟朋友聚会搓麻将及观赏数码影片。

- 华人经营的杂货店，成了当地华人选购食材和日常用品的好去处。

中华文化 努力维护

当地没有中文学校，华人子弟一般都选读国际学校，也有些到土耳其公立学校就读。土耳其的教育制度是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4年，公立学校提供免费教育，而国际学校每学期学费约1000里拉。接受当地教育的华人子弟，都只学习土耳其文及英文。

台北驻安卡拉办事处，曾于1998年开办过中文班，约有十名华人孩子报读，每逢周六上课一次，教材由台湾侨务委员会提供。后来，中文班因缺少导师而停办。家长们只好自己在家想办法让孩子们学习中文。他们让子女观看中文影片及连续剧，从中学习新词汇。一些富裕的华人，也趁暑假之便，将孩子送回家乡去濡染中华文化。

当地没有中文报章，自2007年元旦起才有了一个中文网络媒体——《T号外》，负责人为中国新移民。《T号外》与当地服务机构相联系，为打算前来土耳其经商、留学或旅游的人士提供一个信息平台，也为华人打开一扇了解土耳其的窗口。

土耳其的官方媒体广播电视总局“土耳其之声”，一向以26种外语广播。该局于1981年7月1日增设中文部，每日下午两点广播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内容包括十分钟当日新闻、5分钟土耳其各报摘要，以及各种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人文、旅游及新闻等相关的介绍与评论。

中文广播节目有5位工作人员，包括组长、副组长和3位编制人员。组长马赫穆德·费理哲是哈萨克族人，副组长是1989年移居土耳其的维吾尔族人，3位编制人员则分别由两名华人、一名土耳其人担任。

土耳其是个伊斯兰教国家，却奉行宗教自由的政策，因此华人可自由决定宗教信仰。华人以信仰基督教、佛教者居多，也有少数归依伊斯兰教的华人，部分则属无神论者。由于当地没有华人庙宇，华人佛教徒多半在家中供奉佛像。

基督教在当地发展稳定。2005年，新加坡的基督宣教士前来土耳其传教，并租用瑞典大使馆隔壁的楼房作为会所。目前有50多名信徒，包括商人、小贩、厨师及留学生，其中以温州人居多。教会经费主要来自教友捐献；每逢星期日，教友们便齐聚一堂，吟唱诗歌，聆听牧师布道。

华人的社团组织，有土耳其华商会、中土商人友谊协会、伊斯坦布尔妇女乡亲联谊会及安卡拉妇女乡亲联谊会。

华商会成立于2004年，主要目标是维护土耳其华人的商业利益，并促进华商的联系。华商会也负起排难解纷的责任。中土商人友谊协会是一个新成立的华人组织，致力于为中、土两国的商贸往来提供咨询。另外两个妇女组织，成员都是过埠新娘。她们每月聚会一次，分享各自带来的佳肴，在谈笑声中，促进了彼此的感情。

- “土耳其之声”每天播放一小时的中文节目。
- 图为华人基督教会布道会一瞥。
- 安卡拉妇女会与伊斯坦布尔妇女会每月聚餐，促进感情。

结语

尽管土耳其并非长住久居的理想地，但华人既来之则安之，无论如何，华人都会坚定地走下去。

或许，有一天蓦然回首，发觉前路不通，华人也将毫不踌躇地毅然离去，另找出路。

- 华人饰品深获土耳其人喜爱，中华元素逐渐注入当地生活中。

伊朗

引言

今日的伊朗，在1935年之前长期被称为波斯，是一个具有四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曾创造了灿烂的波斯文化。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向东挺进，一路势如破竹，波斯被划入希腊版图。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希腊文化的影响很快消退，最后被安息帝国取代。萨珊王朝继安息王朝而起，被称为波斯第二帝国，奉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7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势力大举入侵，波斯成了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此后，波斯又先后落入蒙古人和突厥人手中。16世纪，伊斯兰教什叶派建立了萨非王朝，迁都伊斯法罕，波斯成了中东重要的文化中心。

到了近代，英、俄、德、土耳其逐鹿伊朗，以图控制波斯油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斯南部与北部分别被俄国与英国控制。1925年礼萨汗推翻卡扎尔王朝建立巴列维王朝。在美国扶植下，伊朗曾是中东强国。巴列维王朝推动白色革命，依照美国模式改革伊朗农业与工业，给予妇女选举权、工人参加分红并限制宗教势力等等。虽然改革初期工业产值大幅提高，但利益只被少数人掌握，导致贫富悬殊，又因经济结构不健全，最终经济陷入困境。

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宗教领袖霍梅尼掌权，废除君主制，改国名为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教义贯彻政治与法律各领域，国家权力由阿訇执掌，议会的权力有限。从此，伊朗奠定了宗教治国的政局，与西方民主体制抗衡。

伊朗的石油储量占世界储量的10%，天然气更占世界总储量的16%，居世界第二位，可惜却因与伊拉克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以及受到国际制裁等因素，国力难以强盛。伊朗近几年经济发展较快，地毯制造业举世闻名，也是中东地区唯一还制造汽车的国家。

华人移民简史

古时候的中国与波斯，同样都是历史悠久的强大帝国，两国之间长期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各自的文化在亚洲两端互相辉映。在《后汉书》等史籍当中，描述汉朝张骞出使西域时屡次提及的安息和条支，所指的正是波斯。在东西文化的交流史上，波斯可说是占据着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波斯的来往就更为频繁。根据《魏书》所述，波斯使臣曾经多次到中国去觐见北魏皇帝。到了唐朝，阿拉伯帝国入侵萨珊王朝，末代国王的儿子俾路斯还曾经逃到中国，并请求中国的皇帝出兵援救。

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于元朝时期在波斯东北部建立伊儿汗国。伊儿汗国和元朝保持着密切来往，并且设置了驿站通道，使东西方的交通更为通畅，中国与波斯两地商人的往来也更加频繁。在这段时期，两地在科学、艺术和医药方面的交流，可谓空前兴盛。

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期间，其船队曾经3次到达波斯湾的忽鲁谟斯，也即是今日的霍尔木兹（Hormuz）。而郑和在斯里兰卡所立的石碑上，也是以中文、淡米尔及波斯3种文字所写成的，足见当时中国对波斯的重视程度。

这两个文明古国在当时交通极为不发达的情况下持续交往，从文化到物产，都深深地影响着对方。到了近代，两国之间却是越来越陌生，就连近代中国出现的移民潮也未将华人带到伊朗。

1971年，中伊两国正式建交。这十多年来，两国扩大经贸合作规模，尤其是天然气以及石油领域。2005年末，中伊之间签署价值1000亿美元的石油合作协议，中国自此成了伊朗至为重要的石油贸易伙伴之一。

此外，在伊朗境内的通讯、五金以及汽车等领域，都有中资企业的参与。在工程承包方面，随着中资公司标得地铁、铁路、公路、桥梁等多项基础建设项目，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中石化、中信等中资公司，皆成功在伊朗扎根。

当今社会风貌

引言

伊朗是个中东大国，总人口高达7000多万，而且和中国有着极深渊源，可是，华人却非常少。据了解，伊朗华人只有2000人左右，当中60%至70%来自中资公司，包括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工程师等等。不过，他们在此多是属于短期外派性质，很少人长期留在伊朗。

个体经商者不多，大部分集中在德黑兰。自从霍拉姆沙赫尔（Khorramshahr）盖了一座中国商城后，又来了一批贸易商，目前商城内约有200户华商。小部分华人在伊朗公司及政府单位上班，这些通晓波斯语的华人一般负责翻译工作，接洽中国客户。

嫁到伊朗的华人女性共有50多名，也有数名华人男性娶了伊朗女子。至于华人留学生，则介于150至200人之间。伊朗有一家华语广播电台，隶属伊朗新闻部，电台内的职员大多数来自中国。

两大古老民族和平共处

伊朗在新闻媒体上总是和核子武器、恐怖分子、邪恶轴心国等名词扯在一起。政府扣留民运人士与外国记者的事件层出不穷；与伊拉克、以色列等周边国家关系紧张……种种负面新闻，都令人对伊朗望而生畏。

可是，问任何一个在伊朗生活过的华人，他们都会说，伊朗并不如外界描绘般局势动荡、安全堪虞。虽然核武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但是，伊朗百姓的生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社会也没因此紧张不安。事实上，许多华人甚至认为，伊朗治安良好，生活平静，比起许多国家，都安全得多。

伊朗，就是一个如此让人意外的地方。

8年的两伊战争，令伊朗百姓倍加珍惜和平，首都德黑兰的街上，没有到处持枪巡逻的警察，也不见神色木然、语气冷漠的路人。相反地，伊朗人热情开朗，对外国人尤其充满好奇与好感。华人不管是出外逛街、吃饭或搭地铁，常碰上伊朗人前来搭讪。

伊朗人乐于助人，更是讲究礼貌的民族。中国南方航空德黑兰办事处总经理王歌帆表示，伊朗人最令他印象深刻的优点，就是特别彬彬有礼，待人接物让人很舒服。另外，德黑兰拥有1400万人口，却没有大都市常见的脏乱，卫生环境不错，这一点，也令许多华人叹服。

德黑兰的伊朗女性一个个穿着合身及膝的外套，头上仅松垮垮地围一条五彩缤纷的丝巾，露出一张张高鼻深目的脸。身穿大黑袍，蒙着面纱，把全身严密地包起来的女性反而不多见。这一切，都和一般人想象中的极权宗教国家大相径庭。

可是，阿曼、科威特、卡塔尔这些中东国家，虽然要求本国女性出门时要穿黑袍戴头巾，却不会把相同的要求强加于外国女性。而在伊朗的华人女性，则一律被强制要求戴上头巾，衣着也不许暴露，上衣下摆必须把臀部遮盖起来。换言之，伊朗人怎么穿，外国人也必须怎么穿，没有特别待遇。男女之间举止也不能过于亲密，否则很可能被宗教警察找麻烦。

伊朗也没有过多的娱乐场所，只有一些小型俱乐部和咖啡屋。喜爱热闹的华人，难免觉得伊朗沉闷。不过，伊朗到处有青翠的公园，到了春暖时节，更是百花齐放，赏心悦目。久而久之，华人也养成了闲暇时间到公园散步运动的习惯。德黑兰北方还有厄尔布尔士（Alborz）山脉，峰顶白雪皑皑。冬季时，前往山上滑雪成了华人少不了的活动。

华人与伊朗人和平共处。中华饭店的主厨王国兴表示，伊朗人常说中国和伊朗一样，是文明古国，因此对华人相当有好感。穷人基金会的范跃铭则表示，伊朗人对华人的普遍印象是勤快、办事效率高。另外，由于中国对伊朗没有劳务输出，在伊朗生活的华人，大都是中资公司的高级行政或管理人员，层次比较高，也普遍受伊朗人尊重。

虽然对外国人友善，可是，伊朗人普遍存在“外国人的钱，就该多赚一些”的观念。不管是酒店、出租车或餐厅，只要不是伊朗人，顾客都要付双倍或更多的钱。令华人感叹，要在精明的波斯人的土地上讨口饭吃，还真不容易。

- 为了解决德黑兰的塞车现象，伊朗政府在1970年代便计划建造地铁。地铁后来因为两伊战争而搁置。直到1995年，伊朗政府才和中国中信集团合作，重新启动了地铁建设计划。德黑兰市民引颈期盼的地铁于2000年开通后，获得了普遍肯定，华人的形象在伊朗也相应提升。

- 公园里席地而坐的伊朗人，与家人亲友共聚天伦。
- 在德黑兰抬头北望，即可看见雪峰。华人“冬季时”常到山上滑雪。

条条框框多 生意难做

在伊朗2000多华人里，中资企业员工占了绝大部分，个体华商可说少之又少。德黑兰有千多万人口，中餐厅却只有3家，其中两家还是伊朗人开的，真正由华人开的中餐厅，只有一家。

其中缘由，从4名华人青年在伊朗的创业故事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两年前，陈思远随父亲到伊朗考察市场，和伊朗客户交流后，萌生了在伊朗搞餐饮业的念头。“伊朗没什么娱乐，人们平时的休闲活动，就是到餐厅吃吃饭，因此在这里开一家有格调的餐厅，肯定可以吸引人。”陈思远说。不过，更主要的是，他想把餐厅当作一个发展平台，通过餐厅认识当地商界人士，建立人脉，寻找商机，以方便日后做生意。

回到杭州后，陈思远向几名朋友提起这件事，大家都很有兴趣。于是，王晶解、张勋勋、沈弋、陈思远4名20多岁的年轻人，大胆地跑到伊朗，展开了创业大计。

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一样，规定外资公司必须让伊朗人占51%以上的股权。不过，机缘巧合下，陈思远通过当地朋友，知道伊朗有个外商投资部门，能发出外商投资许可证。有了这张许可证，就可独资经营，不必找伊朗人当股东。要申请这张许可证，他们得向当局证明自己的生意对伊朗的文化和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并且对当地人的产业没有冲击。几个年轻人写了很久的报告，最后成功获得许可证。他们的公司，成了伊朗第一家中国人拥有100%股权的公司。

虽然有了一个好的开始，不过在伊朗做生意，却没有他们想象中简单。单单是要找个合适的铺位，他们就看了四五十个地方。“有时好不容易找到合适的，价格都谈好了，和房东提出要将老旧的店面重新装修一番时，房东却不愿意。伊朗人不容易接受外来事物，总觉得自己的东西比较好。”陈思远苦笑。

餐厅取名茶怡，装潢由中国公司负责设计，伊朗承包商负责执行，餐具等其他用品全从中国进口。餐厅的装修格调高雅，在伊朗算是相当高级的餐厅。茶怡初期投资成本高达300多万人民币，开了一年多，生意没有想象中火爆，不过总算收支平衡。

王晶解表示：“在伊朗做生意最大的困难是租金太贵，而且每年都在涨。硬件软件都跟不上。办理清关速度很慢，办签证也很困难，请外国员工需要办工作许可证，一张许可证每个月最低要缴500美元，如果是经理级的，更要1000美元。”

为了节省成本，茶怡餐厅除了一个烧得一手好菜的杭州厨师，其余都是伊朗籍员工。王晶解表示，当地员工比较散漫，需要特别花时间培训与沟通。茶怡还曾发生过因为开除表现不佳的员工，而被员工告上劳工部的事情。“伊朗人和中国人也有文化上的差异。伊朗人很友善，和他们谈生意，什么都说没问题。不过，接下来，问题就接二连三浮现。”王晶解说。不过，几名年轻人都乐观面对种种挫折，“在伊朗创业的这段经历，就当锻炼、学习。不管这里能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是值得的。”王晶解表示。

除了餐厅之外，4名年轻人也在伊朗做起贸易，并且开始有了一些成绩。在伊朗的生活诚然没有中国那么舒适，可是，陈思远表示：“只要有钱赚，没生命危险，到哪里都一样。我们父辈都在做生意，影响了我们这些下一代，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干出一番事业。”这几个年轻人成长的环境比父辈优越，但华人飘洋过海打天下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并没有泯灭。

伊朗的华人企业，不管是中资企业或民间华商，多集中在德黑兰。不过，自从阿巴丹市（Abadan）开了一家“伊朗中国商贸城”后，许多华商纷纷被吸引到这个地方来。

阿巴丹市在两伊战争前曾是繁华港口，2005年，伊朗国会通过在阿巴丹市开辟阿尔万德自由区的决议，允许外国人在此经商，并给予工作许可签证。这项计划吸引了杨平源、陈志中等几名华商。他们知道伊朗的货物向来从中国进口，而且阿尔万德自由区和伊拉克又只是一水之隔，等于面对着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巨大潜在市场，因此决定在此建立一座商城。

经过3年的努力，“伊朗中国商贸城”终于正式开业，经营期限为30年。这是一座集批发、仓库、物流、公寓、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商城。商场计划设1500个铺位，目前只完成了第一期，有500个铺位，已经入驻的商户约有200多家，他们多是来自江浙一带，或在迪拜、俄国有经商经验的商户。

商贸城刚开张时，生意非常火红，而且利润很高，华商都赚了一笔。伊朗政府原本是将阿尔万德自由区划为保税区，可是，一段时间后，由于各种原因，伊朗政府取消了保税政策。如今，华商的货物要进入伊朗，都要缴付关税。伊朗的关税特别重，令华商压力大增。

除了经常会因政府朝令夕改的政策而头痛外，在伊朗经商还需了解当地的文化。王歌帆分享他在伊朗设立公司的经验时表示，“伊朗因为受美国制裁，社会相对比较闭塞，规矩、文化也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伊朗很保护自己的市场，不是开放型经济。伊朗人自古即有经商传统，善于赚钱，团结对外。因此外国人在这里做生意，容易和当地社会产生冲突。”

在经商文化上，华人重视口头承诺，因此常感伊朗人出尔反尔。王歌帆表示，“在伊朗，一切都要白纸黑字，仔细地设定条款。入乡随俗，我们既然到了伊朗，就要照这里的游戏规则去玩。了解当地的文化，是成功经营的基础，特别是在伊朗。”他说。

层出不穷的问题让华商却步，因此，尽管中国是伊朗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前景看好，但在伊朗经商的华人依然不多。

- 中华饭店是伊朗第一家中餐厅。从巴列维王朝时期开始，这间餐厅就存在了，到如今已近50年。那时候，有很多港台商人在德黑兰经商，这些华商大都是中华饭店的常客。不过后来两伊战争爆发，华商都撤走了，中华饭店生意额大受影响。20多年前，对中餐情有独钟的伊朗人Morteza Talbi买下了中华饭店，一直经营到现在。中华饭店未转手前就在那里工作的香港主厨许福隆，在伊朗工作了34年，后来加入伊朗籍。许福隆几年前过世，享年75岁。
- 中国年轻人王晶解（左）和陈思远（右）勇闯伊朗打天下。中为茶怡餐厅厨师。
- 中国南方航空德黑兰办事处总经理王歌帆。
- 中华饭店的家具摆设有很多是老厨师许福隆从香港买过来的，历史悠久。

中伊通婚家庭的文化碰撞

虽然到伊朗发展的华商不多，可是，华人和伊朗人通婚的例子，却比其他中东国家来得高。目前，伊朗共有50多名嫁给伊朗人的华人女性，也有两名华人男子娶了伊朗太太。

中伊通婚的夫妇，多数都是伊朗男性在中国做生意而认识了华人女性，也有一部分是双方在第三国家打工或留学时认识的。嫁伊女性中以汉族女性为多。伊斯兰教规定非穆斯林女性嫁给穆斯林后，就得皈依伊斯兰教。

中国汉族女子黄薇结婚时曾找阿訇主持了入伊斯兰教的仪式。不过，她表示许多嫁到伊朗的汉族女性，婚后生活并无多大改变。只是无可否认地，由于伊朗华人太少，长期留在伊朗居住的中伊混血孩子，对中华文化都很陌生。

黄薇曾是地铁工程师，婚后和丈夫做起了生意，她笑着表示，伊朗女人婚后一般都不工作，社会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女人虽然不必工作，但是伊朗男人却很尊重太太，太太俨然是一家之主。她未嫁给阿里布佳时，公公婆婆受电视影响，得到中国女人都是逆来顺受，对丈夫千依百顺的刻板印象。儿子娶了中国太太后，他们才发现其实中国媳妇非但不是嫁鸡随鸡的人，而且非常能干。

1996年和伊朗人结婚的赵军，则是中国回族女性。赵军笑道，汉族女子最常抱怨的是伊朗的饮食。至于回族的饮食文化，则和伊朗很接近，都是以烧烤牛羊为主。虽然伊朗的餐厅都是卖Kebab（一种烧烤肉串），略显单调，可是家庭饭菜却种类繁多，非常丰富。

赵军指出，伊朗人的家庭观念特别强。“伊朗人有钱，就会先搞好家居环境，一定要住得舒适，不像华人，爱把钱花在名牌时装和包包上炫耀。中国人只在过年过节时才互相拜访；但伊朗人每逢周末都互相串门子，轮流做东请客，有矛盾也暂时放到一边。伊朗亲戚间见面时不会互相炫耀、比较，这种家庭聚会感觉很好，令人放松。”

赵军也很欣赏伊朗人待人接物的方式。“伊朗人非常讲究礼貌，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他们很热情，就算见面是谈公事，也会先关心对方一番，再进入主题，道别时更不忘祝福别人，客气话特别多。”她说。

不过，伊朗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恰恰相反。伊朗人在公众场合交谈时，会尽量压低声量，以免吵到别人。因此，赵军的丈夫阿里侯赛因贾德初到中国时，对中国人不管何时何处总是大声说话，公众场合一片喧哗的现象，感到很不理解。“不过，后来我渐渐接受了中国人的这种表达方式，因为这是一种淳朴、简单、直率的表现。”阿里笑着表示。

询及为何华人和伊朗人通婚的比例比中国和阿拉伯人通婚的比例高，赵军认为也许是阿拉伯人自我保护意识太强，较为封闭，因此不太愿意和外族通婚。这也和华人女性对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印象有关。“一些阿拉伯国家太严格，只准许女性穿黑袍。这难免造成华人女性的不安，担心阿拉伯国家太严格，到阿拉伯国家生活会不习惯。”赵军说：“而伊朗女性对服装的要求比较宽松，因此令人感觉比较开明。”

其实，除了不少华人女性嫁给伊朗人，也有华人男性娶伊朗太太的例子。本国女子嫁给外国男人，在阿拉伯国家是不太可能的。由此可见。波斯民族还是比阿拉伯民族开放。虽然政府在政治与文化上走保守的宗教路线，可是，伊朗民间却相当开放，对外国人普遍持欢迎态度。这令伊朗的政府和民间，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 黄薇和丈夫阿里布佳经营的高级时装店，相当成功。

华语电台 华人了解伊朗的窗口

伊朗政府深知自身国际形象不佳，因此近年努力通过媒体扩大对外宣传。隶属伊朗新闻部的伊朗华语广播电台，宗旨便是向世界解释伊朗的外交政策和政治立场，以及让全世界的华语听众都能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教义。

华语广播电台共有9名职员，其中7名是中国人，负责翻译新闻、播音的工作，此外也翻译一些时事评论。该台的新闻主要来自伊朗广电总局新闻中心，也透过路透社、新华社等新闻网获取新闻。

台长马生贵于1989年到伊朗留学，是第一批留伊中国大学生。在马什哈德（Mashhad）的大学毕业后，他继续在德黑兰大学研究所深造，学习伊斯兰和波斯的历史文化。原本他打算毕业后回中国找工作，碰巧当时伊朗有意委任他创立华语广播电台。于是，1995年，他正式上任为伊朗华语广播台台长。

这个电台也设有一个网站（<http://chinese.irib.ir/index.php>），内容甚为丰富，除了有新闻报道、时事分析、古兰经、领袖讲话、书籍园地等栏目外，也积极和听众交流，回答听众对于伊斯兰教和以巴问题等时事的疑问。

马生贵表示，还未办电台前，中国人对伊朗的了解很肤浅，只能通过西方媒体间接了解伊朗。“伊朗华语电台为中国人打开了通向伊朗的窗口。中国人曾经误以为伊朗支持疆独，对伊斯兰教不理解。通过电台，听众了解到原来伊斯兰教内部也有很多派别，疆独和伊朗没有关系，也逐渐明白穆斯林里也有理性、温和的，不全是塔利班那样的。”他说。

除了马生贵，在伊朗政府机构办事的还有穷人基金会国际旅游组织的范跃铭。这个组织负责开通伊朗与全球的旅游互动。近年伊朗意识到华人旅客市场的庞大，于是找上范跃铭创建了中港台组，负责伊朗文化宣传、旅游宣传、地接等工作。中港台组刚成立时，半年都接不到一个团。经过一番努力，中港台组业务今年大有起色，每个月平均有100个中国人到伊朗旅游。

- 伊朗华语广播电台台长马生贵（左）和穷人基金会国际旅游组织中港台组组长范跃铭（右）。

其他资讯

从留学生开始重续文化交流

中伊两国自古交好。今天，华人对世界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但是对伊朗反而生疏起来。许多华人热衷学阿拉伯语，但学习波斯语的，却少之又少。

目前，在伊朗留学的中国学生介于150至200人之间。他们选择到伊朗留学，一是因为伊朗许多宗教色彩浓厚的大学会给外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二是掌握波斯语的人不多，而中国和伊朗两国经贸合作又越来越紧密，因此许多华人学生都看好学波斯语的前景。据悉，目前在义乌批发市场，波斯语翻译员非常抢手，收入也很高，一天可赚200美元。

华人留学生大部分选修波斯语文学系，也有一些选择会计、音乐、艺术及神学系。来自河南的留学生王超是一名穆斯林，曾在中国学习阿拉伯语，目前在伊玛目霍梅尼国际大学进修波斯语。这所大学坐落于德黑兰附近的城市加兹温（Qazvin），大概有30名左右华人学生，以男生居多。

王超表示，在伊朗求学的日子，悠闲自在，除了学习没有太多的事做。由于这里没有太多的娱乐场所，所以留学生课余时间，就上网聊天、给家人朋友打电话，或是看看小说、打牌下棋，偶尔和朋友们逛逛街，到伊朗餐厅吃一些风味独特的食物。

有时候华人留学生也会组织一些活动，“在这里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第一次和学校里的中国人去山脚下烧烤。大家准备好材料，包车去那里一边抓螃蟹一边吃烧烤。那时我才刚到伊朗两个月，还没适应外国生活，这次烧烤会令我烦闷的心情舒缓不少。”王超说。

“朋友们都羡慕我能够出国留学，但他们不知道在外求学的苦况。在这里两年，我学会了独立生活，原来在家里的陋习全都改掉了，毕竟在外求学凡事都要靠自己，只有学会独立才能不依赖别人而活。”王超说。

毕业后，王超打算回国，他说：“无论以后是打工或自己开公司，都不想留在伊朗发展。外国人在这里开公司受到很多限制，所以大部分中国人都选择回国。”

虽然中国留学生毕业后未必会留在伊朗，但这些在伊朗生活过的学生，对伊朗肯定有更深层的了解。他们将成为未来中伊两国间的桥梁，不论是中国人到伊朗发展，或是伊朗人到中国寻找商机，他们都将起着重要作用。

- *留学伊朗的中国学生和伊朗同学到马什哈德旅游。*

结语

伊朗和中国在经贸上的合作越来越密切。在伊朗市场上，中国货占了很大的市场份额。遗憾的是，伊朗市场上的中国货，多由伊朗商人前往中国采办，或通过迪拜转口到伊朗。直接前往伊朗开公司的个体华商，相对来说少之又少。

进入伊朗的华商不多，但为了爱情而来到伊朗的华人女性却不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她们来到伊朗，重新认识这片古老的土地，并渐渐爱上这个热情而有礼的国度。回首千年风霜，这段由迢迢遥遥的丝绸之路串联起来的情缘，原来不曾断绝。

- *为爱而踏上伊朗的华人女性，在这里找到了另一片天。*

科威特

引言

在阿拉伯文中，科威特意为“近水的城堡”。但是，科威特绝大部分国土被沙漠覆盖，国内全无河流，极缺淡水。夏季气温高达50℃，夏长冬短，炎热干燥，湿润多雨。

多年来，这个海湾六国中最北端的国家，一直强调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可是，夹在伊朗和伊拉克两大强邻之间，科威特注定难以独善其身，常保安宁。

7世纪时，科威特原是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1756年，萨巴一世（Sabah I bin Jaber）被推选为科威特第一任酋长；至今统治着科威特的酋长，就是萨巴一世的后代。1871年，科威特成为奥图曼帝国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沦为英国的保护国。1961年，科威特宣布独立，并于同年成为阿拉伯国家联盟和联合国成员国。

自1930年发现油田后，科威特的经济开始腾飞，成了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人均生产总值全球排行第四；截至2007年，科威特已发现油田的储存量位居世界第5。石油、天然气工业是科威特的经济命脉，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国家出口收入的92%。

华人移民简史

科威特于1971年和中国建交，是海湾六国之中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两国之间的交流也分外密切。科威特一直都把中国视为重要的外贸合作伙伴，并于1980年代签订了一系列的协定，以促进两国的经贸关系。

虽然中国与科威特有许多方面的经贸交流，但是真正将大批中国人带入科威特的还是工程及劳务承包。早在1970年代，中国就已经有对科援建项目，以协助科威特建筑民宅。

80年代是中国工程及劳务承包在科威特的全盛期，中国公司的人力成本低廉，技术水平又良好，在科威特极受欢迎，当时来自中国的建筑劳务人数高达1万5000人。

至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在科威特的中国工程劳务承包公司至少有14家，所承包的项目以政府投资的普通民宅为主。当时中国公司并不是总承包，只是纯粹提供劳力而已。中国人盖起房子来又快又好，科威特的住房有75%以上都是他们所建。

科威特今日的繁华，说是由中国劳工的汗水灌溉出来的也不为过。

海湾战争爆发期间，外籍人士纷纷撤走，包括大部分中国籍及其他国籍的华人。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华人不得不留下来，在受到严重污染的科威特工作。

部分留下来的华人，由于受到贫铀弹的核辐射，加上其他不知名的化学武器的影响，结果患上了“海湾综合症”。海湾综合症的患者会产生染色体变异，神经、免疫、呼吸、内分泌和生殖系统等都会受到破坏。这些不幸的华人当中，就包括了从1989年开始便在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工作的孙渤。他在战时留在科威特，曾经帮助过240多名中建公司的中国人及时安全地撤离，并负责清理战场和搜集材料等工作。

海湾战争结束之后，来自中国的工程与贸易公司是国际间最快重返科威特，并参与战后重建工作的企业。伊拉克在撤退之前，纵火点燃科威特的多处油井，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也及时派出灭火队，给予科威特极大的帮助。

在海湾战争以前，中国工程以及劳务承包多数为低端承包。但是在海湾战争之后，因为西方公司不敢贸然回到海湾，中国工程和劳务承包公司便趁此时机，标到了许多战后重建工程的总承包合约。

由于中国工程承包公司已经发展到全方位及更专业的阶段，因此出现在科威特的中国人也不再是建筑民工，而是多了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建筑师、研究人员等专业人士。

美伊战争在2003年爆发之后，造成波斯湾一带人心惶惶。科威特与伊拉克的距离最为靠近，与伊拉克积怨极深，科威特华人无不担心美伊战争会波及科威特，因此能走的都走了。但是，一些到科威特工作的华人都已经签署了合约，若是合约未到期就擅自停工，多个月的薪水便将付诸东流，因此，这些华人最终还是决定继续留守。后来察觉局势并没有怎么恶化，离开的华人又纷纷回到这里。

科威特小国寡民，又曾经发生多次变乱，可是不管局势如何，华人始终对这个地方不离不弃，每一次危机过后，华人总是会回到这里重新开始。

- 华人对科威特的建设功不可没。

当今生活风貌

引言

科威特的华人人数，经几次剧烈变动，至今有5000人左右。根据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统计，科威特的华商约有150至200人左右，护士约20人，体育教练约25人，工程与技术人员约50人，大学教授与研究员等专业人士约30人，保健按摩与美容院从业者约150人，中餐馆从业者约60人，民营劳务承包公司的劳工约300人。这些来自民营小型公司和以个人名义到此打工的华人加起来不超过1000人。其余的华人，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国有企业及相关公司带来的员工及劳务人员。由于华人稀少，工作单位也各不相同，科威特没有明显的华人聚居地，在全国6省，都可找到他们的踪影。

和其他海湾国家一样，科威特不接受移民，甚至不发永久居留证。同样是宗教色彩浓厚的阿拉伯国家，这里禁酒、禁猪肉，也缺乏其他城市多彩刺激的娱乐生活。

快乐也许难以实物衡量，不过，有许多华人愿意把孩子接到科威特受教育，更多华人愿意长居于此，也愿意聚在一起分享生活，从这些实况可以看出，相较其他海湾地区的华人，科威特的华人似乎有着更高的快乐指数。

建筑业撑起科威特半边天

不久后的将来，科威特皇宫旁，将矗立起一座240公尺高的壮观新地标——科威特中央银行。作为科威特最重要的金融机构，科威特中央银行的图样也将被印在科威特的钞票上。而负责把这座地标性建筑一砖一瓦建起来的，正是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科威特中央银行的合同总额高达4.06亿美元，这次获标，说明了中国工程承包公司已经开始进占高端建筑工程的总承包业务。除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冶集团也成功获标承建奥林匹克大厦的结构工程。其他在科威特取得不俗成就的中资公司尚有葛洲坝集团、中交集团（前中中港）等。

这些规模浩大的建筑工程，除了需要大量的劳工，也把中国建筑、石化、工程等专业人才带到科威特。单是科威特中央银行一个项目，就引进了800至900人。不过，随着中资公司进军总承包项目，这些高端项目的建筑团队也越显国际化。科威特中央银行的建筑团队里，虽然从最低层的工人到最高端的管理阶层和工程师都有中国人，可是，外国籍员工也不少。中建总公司副总经理杨春森指出，在国际化的市场，一个多元化的团队有助中资公司在当地站稳脚步。

和1980年代中资机构初进入科威特市场时比较，现在中国籍的工程师待遇好多了。当时，中国籍工程师一个月薪水只有130多美元，而当地及欧美籍的工程师则享有至少1000美元的薪水。今天，拥有两三年工作经验的中国籍工程师有2000多美元的薪水，5年以上的则在3000美元以上，虽然仍然和外国工程师的待遇有一两倍的差距，但差距已明显缩小。

杨春森表示，中国籍工程师做事比较有系统，而且对建筑规范的理解很全面。可是，由于不了解科威特的惯例，跟业主打交道需要时间才能慢慢上手。“这些都是经验的累积；只要肯努力，中国工程师能比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做得更好。”杨春森表示。

中建总公司的工程师李彪抱着到国外学习的心态来到科威特。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一代中国年轻人勤奋好学，很得上司赞赏。对科威特酷热的天气，李彪不以为苦。“我们语言（英语）比较不行，趁着在国外的日子好好学，对将来有帮助。”李彪说。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人均收入提高，中国工人的薪水也水涨船高。不过，中国工人的工资虽相对较高，却比印度、巴基斯坦工人更有效率和经验，因此，很受劳力市场欢迎。此外，中国工人喜欢承包制，按量计算工钱，而印、巴籍及越南籍的工人，则习惯按日计算工钱。

中国工人在中东曾屡次发生罢工示威事件，不但延误在建工程的进展，也严重影响中资公司的形象。为了避免工人被不实宣传误导以及受到中介公司欺诈，中资公司近年已经逐渐采取直接面对工人，直接跟工人签合同、付工资的策略。而随着经验的积累，建筑公司也发现，输入工人最迟必须赶在三或四月份前，让工人逐步适应科威特的天气。如果工人六月才抵达科威特，一开始就得承受科威特夏天惊人的高温，又以为科威特一年到头都是这样的天气，难免怨气满腹，觉得自己被骗到人间炼狱工作，因此很容易闹事。

除了中资公司，来自中国的民营小型工程公司也在科威特取得不错的发展。这些民营小型公司多数来自江苏东海县，在中国是股份制的劳务中介公司。他们获得分包后，就自己组成建筑团队，从中国输入大批民工。

到科威特的工人一般都签两年的合同，两年能赚1万2000美元左右。许多中国工人都迫切希望，随着人民币汇率的上调，他们的工资也能提高，但这样的工资水平，从上世纪90代到现在都没有调整过。不过，由于赴科工作的手续费比较低，而且不必经过考试和培训，因此还是有不少中国工人愿意到科威特工作。

1997年就到科威特发展的民营工程公司代表葛宜兵表示，在科威特工作其实没有比在中国累，这里机械设备先进，所以工作起来没有太吃力。虽然科威特温度高些，但是，由于气候干燥，工人工作起来反而比较舒服。夏季时，也会避开最高温的时段，甚至改在夜里施工。工人生活的环境比较好，闹事的情况便也减到最低。

经过过去芜存菁的过程，目前在科威特的民营工程分包商多是信誉比较卓越的，譬如马俊坤与葛宜兵等。葛宜兵表示，做工程就跟做生意一样，有时也会赔。但是，一定要维持信誉，以后才有做下去的机会。

在海湾六国中，科威特发展得比较早，保护劳动工人的制度也比较完善。科威特的建筑工人一天工作9个小时，每周休息一天。如果超过9个小时，资方需要征求工人的同意才能加班，并且给予双倍酬劳。科威特政府也会通过监理公司调查工人的施工与生活环境，风沙眼镜、安全帽等设备都要齐全，以确保工人的安全，宿舍里也要有冷气等设备。

中国建筑劳工在科威特的基本生活条件获得一定保障，唯一的无奈，也许就是生活比较单调。每周的休息日，他们的活动不外是洗衣、打扑克牌、看电视、逛超市。许多工人工作的工地，就在大沙漠中央，要上哪儿都不方便，生活的范围，就只有那窄小的宿舍。举目四望，滚滚黄沙无边无际，想到家乡妻儿，难免倍感寂寥。

每当沙尘暴来袭，人的身影在漫天风沙里显得格外渺小。可是，撑起科威特半边天，令这个沙漠上的富国得以持续繁华的，正是这些渺小的身影。

- 中建总公司的工程师（左起）李彪、尧善发、副总经理杨春森，及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主席董泰康。
- 葛宜兵与生产经理吴瑞在工人宿舍里。
- 沙尘暴来袭，天地被沙子遮蔽，变得灰黑一片。

高薪高职机会多

除了中资机构和民营工程公司，科威特也吸引了不少华人专业人士。这些白领精英，主要分布在石油与电信服务两大行业。科威特人力资源非常匮乏，加上科威特希望在2020年可以增加一倍石油生产量，达到日产石油400万桶的目标，因此，在未来十几年内，科威特的工作机会还是很多。

为了吸引全球精英，科威特提供优渥的薪金与福利予顶尖专业人才。可是，对华人专业人士来说，科威特最吸引他们的，其实不是工资，而是机会。

很多华裔专业人士毕业自欧美国家的大学，他们在欧美工作所得工资和科威特相比，其实差不多。可是，在欧美国家，华人往往只被赋予执行与技术上的工作，要坐上负责“决策”与“管理”的职位，还是比较困难；来到科威特，他们却能进入公司高层，了解整个公司的运作。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事业上的突破。

就算不想长期呆在中东，有了这些履历，他们以后在别的国家求职时，要坐上管理层的位置，也比较容易。比如从加拿大应聘到科威特国家石油公司工作的高级工程师叶林，不到两年内，在石油勘探分析领域里有新的突破，大为公司赏识，并加级奖励，成为其他华人白领们的楷模。

相对其他国家来说，海湾国家的工资已算很高。而在海湾国家中，科威特的工资似乎更为优渥。大学生的基本月薪从600至700第纳尔起跳；普通小型公司的秘书也可拿到200至400第纳尔的月薪，大型石油公司的秘书月薪可高达600第纳尔；一般的行政级人员，月薪介于2000至4000第纳尔之间。如果是管理阶层或专业人士，薪水更是远远高于此数。

此外，科威特尚有许多华人技工分布在全国各家工厂里，譬如在Al Meer石油天然气控制台生产与销售商工作了两年的苗俊昌与莫建龙。在Shamlan制管厂，也有6名来自中国的工人团队。

这些中国技术工人虽然英语不好，可是，由于他们的工作属于技术性质，因此沟通不便对工作的影响不是很大。事实上，科威特的雇主对华人员工的表现一般都非常满意。工作认真是华人员工最大的特点，Shamlan制管厂的中国工人，有的因为气候不适皮肤长了肉瘤，有的被硫酸灼伤，可是，他们仍然坚持上班完成工作。

Al Meer公司的生产经理Reda E.Ahmed对他厂内的两名中国员工更是赞不绝口。Al Meer厂内的大型精密机械购自中国，中国供应商委派莫建龙协助Al Meer使用与维修机械。Ahmed非常欣赏莫建龙的工作表现，于是向中国厂方强烈要求，把莫建龙留了下来。他表示，中国人从不请假，学习能力强，且非常聪明，总是能解决生产线上的疑难杂症，还懂得利用电脑来改善生产程序。

和许多海湾国家的华人比较起来，科威特华人显然是对居留国家更为乐观。到其他海湾国家如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经商或工作的华人，都把妻小留在原居国，或把孩子送到欧美国家受教育，忍受两地分隔的痛苦。可是，在科威特的一些华人，却愿意把家人接到科威特，让孩子在科威特受教育。这一现象，不局限于领着高薪的专业人士，连当护士的、开小饭店的华人，都把孩子接过来。他们有钱的就把孩子送到英国人、美国人办的国际学校；没钱的，就把孩子送到菲律宾人、巴基斯坦人办的国际学校。

在科威特国家科学院工作的赵永平，曾在美国生活多年。比较起科威特与美国，他认为科威特是个更适合家庭生活的地方，除了待遇好、免税，公司提供住房、孩子教育的津贴，生活与工作压力也没那么大。“科威特是个福利国家，隐形福利已经涵盖了生活的基本需求。在美国，太太需要工作，收入才能和在科威特的所得持平。”赵永平说。赵永平也和其他华人一样，忙着送孩子上才艺班。由于科威特是个富裕的小国，因此，要为孩子找到一流的老师并不难。在其他国家如美国，父母往往需要挤破头，才能把孩子送到比较好的学校及才艺班。有的父母甚至还笑着说：“科威特诱惑少，不必担心孩子学坏。”

哈萨阿布瓷砖加工厂的工人霍海营，在科威特生活了7年。除了收入不错，他在这里也有许多朋友，大家通过科威特伊斯兰教宣传中心及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办的活动认识后，保持良好关系，互相扶持。他每个星期五都到伊斯兰教宣传中心，还成了虔诚的回教徒。由于深深觉得科威特是个好地方，所以，他不但把妹夫、弟弟都接到科威特工作，不久前，还把大儿子也接到科威特来，并为儿子安排了一份按摩的差事。

科威特没有五光十色的生活，但是，住下来后，许多华人家庭，渐渐喜欢上这里平淡安稳的生活。

- 成立于**1983年**的“孔雀餐厅”是科威特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中餐厅。它坐落于丽笙酒店（**Radisson SAS**），是整个中东地区最奢华，格调最高的中餐厅之一，顾客以科威特皇族与商贾为主，中国大使馆有时也会在此宴请贵宾。餐厅的招牌菜如炸虾土司、四川辣酱鸡、北京烤鸭等，陪伴许多科威特有钱人家的孩子长大。由于顾客对这些菜式都很熟悉，点菜时可以直接叫出这些菜式的号码，所以中餐厅的菜单一用就是**20多年**，不敢随意更

换。

- Al Meer公司的生产经理Reda E.Ahmed (右)表示苗俊昌与莫建龙是表现最佳的员工。
- Shamlan制管厂中国工人的宿舍。
- 在科威特国家科学院工作的赵永平与妻子黄芳、儿子赵博文。

等待春天的个体华商

科威特的个体华商不多。他们多是夫妻档或由二三个亲戚，一同经营着微型贸易公司。其中，贸易商余美娟，已经是相当成功的玩具供应商。为了节省开支，余美娟没有租店面，甚至没有住房，夫妻俩和大伯一块住在仓库里，开着小货车到处卖货。由于看准在这里做生意的人不敢倒账，她是少数肯赊账给顾客的供应商。余美娟认为，科威特打击商业罪犯严厉，如果顾客倒账，只要发货单上有顾客的签字、店名、地址等，把发货单拿到警察局，对方就不能出境。由于她生意手腕灵活，经过磨合，跟科威特各路客人关系都很好。

除了余美娟，床具贸易商王素霞和首饰批发商申志江也都在科威特闯出了春天。“在科威特做生意，规模很难做大，一个产品如果发两个货柜的货，肯定卖不出。所以别指望能发大财。不过，要养家糊口，不是问题。”申志江表示。

对许多华商来说，科威特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而是出于偶然——碰巧有这样的机会，就过来姑且一试。申志江在科威特安定下来前，曾在俄罗斯做过生意，王素霞也曾在迪拜做过买卖，他们都深觉科威特不似其他地方政治腐败，商场凶险。这里没有苛捐杂税，政府廉洁，商场稳定，生意虽然很难做大，但竞争不至于太激烈，加上这里治安良好，生活有安全感，因此都爱上了这个地方。不过，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很多科威特的商家已经开始直接到中国订货，科威特华人进口商的生意，也越来越难做。

虽然如此，科威特华商仍然不轻言放弃。伊拉克的局势已经趋向和平，重建伊拉克，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而科威特就是进入伊拉克的门户。这就是科威特华商的契机所在。只要守得下去，就会遇上这个契机；只要守住科威特，就能得到伊拉克这个大市场。科威特华商相信，终有一天，科威特会成为繁华商埠。

- 科威特华商（左起）王素霞、余美娟、申志江。

守护华人的白衣天使

科威特的华人是幸运的。有一群降临人间的天使，总会在他们碰上病痛时，适时出现，为他们解困。这群天使，便是科威特的华人护士。虽然只有区区20多名，华人护士却是科威特华人社群里的灵魂人物，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国，来自港台的护士只有三四名左右。

1990年，中国政府鼓励劳务输出，于是卫生部搞起护士劳务项目，从全国选派了35名护士到科威特。于玲英是这35名护士里的其中一人，回忆当时的情况，由于选拔后就碰上海湾战争，他们是等到科威特解放后，于1991年9月才到达科威特。当时，科威特黑烟熏天，不利一些慢性病如糖尿病、哮喘病等病人的健康，医院里病人很多，但许多外籍护士都还没回来，护士短缺，所以他们连培训的时间都没有，就直接上岗。那段时间，护士们工作非常紧张，上了早班又要上夜班，而夜班只两名护士，工作量非常大。

今天，首批来到科威特的中国护士，只剩她一人。不过，此后陆续有许多批中国护士来到科威特，顶峰时期曾达到300多名，可是，他们大部分都在数年后选择到别的国家或回国发展。目前仅剩的20多名华人护士，散布在全国6个行政区不同的医院里。资历较久的护士，除了于玲英，尚有1995年到达科威特的刘芳和1996年到达的臧凤。中国护士在整个科威特护士群体里，还不到1%，他们绝大部分是通过国家派送到科威特的，只有极少数几个如刘芳，是自己来到科威特申请工作的。

刚到达科威特的华人护士，英语明显比菲律宾、印度籍的护士差，由于面对语言障碍，电话响了不敢接，交班的时候，和其他护士也难以沟通。可是，经过几个月勤学苦练，他们都能克服语言障碍。有些华人护士如臧凤，不但练就了流利英语，还学会阿语。

虽然语言能力不如其他国籍的护士，但华人护士却赢得科威特社会一致赞赏。阿拉伯人性子急躁，可是，当他们一看到中国护士，态度马上变得很好，不敢乱发脾气。医生对中国护士的态度，和对待印度、菲律宾籍的护士比较起来，也明显特别尊重。

这是因为中国护士比较逞强，希望各个方面都做到最好，专业水平也最高。也因此，中国护士往往被挑到特殊护理病房去，病人要打针时，也常指定要中国护士代劳。刘芳表示，中国护士少，只要一出错，就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她们更要自强。

不过，科威特却也不特别热衷聘请中国护士，第一，中国护士英语较差；第二，很多中国护士都把科威特当跳板，英语练好了，培养好了，就跑到欧美国家；第三，中国护士比较认真，医院或上级有什么不对，都会直接反映出来。也因此，在科华人护士的数量，大不如前。

在科威特华人社群里，华人护士深受大家敬爱。这里看病手续繁冗复杂，医院又分区域和等级，从一个等级的医院转到另一个等级的医院，需要介绍信，因此有时看个病得拖上很久。许多华人英语不好，因此看病时备感困难。华人护士总是尽自己的能力，义务当华人病人的翻译，帮他们处理看病手续、拿报告等，甚至想方设法为经济有困难的华人筹款治病。许多华人一生病，不直接到医院挂号，反而先给护士们打电话。

这群白衣天使虽不是有钱有势之辈，却是尽了他们的力量，守护科威特的华人。

- 在科威特服务的华人护士（左起）臧凤、刘芳和于玲英

活跃的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

和海湾地区其他国家比较起来，科威特华人无疑更有凝聚力和归属感。而把科威特华人串连起来的，正是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这是科威特唯一的华人社团，比起邻国阿联酋的众多华人社团，在数量上虽较逊色，可是好的社团一个就够了。

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成立于1997年，是一个由民间和官方共同创立的社团。当时，科威特的华人体育教练碰上一些麻烦，于是请来资深华人董泰康帮他们向大使馆反映困境。经此一事，中国驻科威特大使张志祥意识到科威特需要一个民间华团组织，作为大使馆和在科华人的桥梁，因此提议并协助董泰康成立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

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创办人董泰康一直担任会长至今。十多年来，该协会办过许多活动，譬如2005年，与景德镇陶瓷工厂合办了中国景德镇陶瓷文化展览会，向科威特介绍中国陶瓷之美；非典、南亚海啸、四川大地震等灾难发生时，发动筹款运动等等。

每年的春节联欢会更是科威特华社不可或缺的盛事。近年来，春节联欢大会由科威特华华人协会与科威特宗教福利部联合举办，2005年举行时，共有300人出席；到了2007年，人数已增加到600多人，出席人士上至科威特宗教部次官阿迪勒·法莱赫博士、中国驻科威特大使吴久洪，下至中资机构、华人华侨、留学生代表等等，一些当地科威特人士也应邀出席，科威特国王Amir特发贺电祝中国人民幸福。

不仅出席率逐年升高，春节联欢晚会也办得一年比一年精彩。联欢会现场挂满红灯笼，丝竹之韵夹杂着噼里啪啦的爆竹声，春节气氛非常浓厚，远离亲人与故乡的华人在热闹喧嚣中，重新感受故乡的温暖人情。中国驻科威特使馆文化处曾经在一个晚会现场举办一个以“春节”和“窗花”为主题的展览。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还特地请来新疆杂技团，为嘉宾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演出；而生活在科威特的华人华侨子女以及科威特阿拉伯俱乐部的青少年朋友，则表演了歌曲、中国功夫等节目。当晚的“年夜饭”，是一顿丰盛的饺子宴。晚会结束前还有中科友好关系知识竞赛和幸运抽奖。

春节联欢晚会获得科威特国家电视台、科威特通讯社、舆论报、消息报等当地媒体报导，说明了这项晚会已经受到当地社会重视。春节联欢晚会除了让平时难得聚首的华人得以共聚一堂，更提高了华人在科威特的知名度，让科威特人得以体验华人春节的喜悦，促进了中科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

不过，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成为在科华人心目中一盏明灯的原因，并非这些官方活动，而在于协会会长与理事们对会员私底下的帮助与付出。该协会的理事来自各个领域，包括医护人员与熟悉当地法律的公务员等，举凡华人碰上困难，无论是生病、签证出现问题、遇上法律麻烦等，协会的理事们都会尽量帮忙。十多年来，部分理事足迹走遍了当地警局、监狱、法院及机场，为近600多名华人排忧解难，捍卫着华人在科威特的正当权益，甚至坚持数年为突发车祸而丧身的侨民家属争回应得社会索赔或保险费用。

除了大型活动，协会也常常举办茶会，有时邀请小型公司的商人们，有时邀请建筑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士，让有相同背景，相同话题的一群人聚在一起，联络感情，交换生活讯息，认识新来乍到的朋友。这些小小茶会，虽然规模不比大型活动，却实实在在地把散布在各个领域、地方的科威特华人串联起来。

和其他海湾国家的华人社团比较，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显得特别有活力。虽然同样是非移民国家，但因为有了社团积极地把当地华人联系起来，科威特华人的生活，也因此仿如枯燥的沙漠里，多了一股汨汨温泉般，生气盎然。

除了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IPC（Islam Presentation Committee，伊斯兰教宣传中心）也是一个深为科威特华人熟悉的机构。IPC隶属科威特宗教部，是一个文化交流机构，为各国侨民提供文化咨询，亦开办阿拉伯语文班，免费让侨民学习阿语。除了和华侨华人协会联合办春节联欢会，IPC办的活动还包括带工人去郊游等，因为体谅工人收入低，参加郊游的工人甚至还能获得IPC的交通补贴费。IPC有几位中国老师，熟悉法律事务，精通阿语，中国人遇上什么困难，尤其是法律方面的难题，都会向他们求救。多年来，马俊坤、陈道亮这些中国老师，为华人到处奔走，帮工人办工伤保险，深受爱戴。

- 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会长董泰康（中）、理事王平与臧凤

其他资讯

杰出的新生代

在小小的科威特华侨华人群体中，有一群崭露头角的新生代，他们秉承着父辈的优良传统美德，又怀着自己的青春梦想；他们在学校品学兼优、名列前茅，还具有出众特长，并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和文艺演出。

他们当中，有优秀少年武术运动员、有朗诵可兰经的最优秀获奖者、有芭蕾舞和民族舞的尖子，更有乐坛的新秀，例如：冯梦竹于2008年，获英国皇家音乐学院8级证书，并连续得到海湾青年音乐大赛木管乐器冠军，现已进入英国大学深造。

又如：15岁的李飞雪，自幼学弹钢琴，成绩优越。她获得科威特肖邦钢琴比赛第一名、海湾肖邦钢琴比赛第一名、波兰大使特殊奖，科威特宫廷事务大臣特殊证书、阿拉伯金帆船奖、2010年海湾肖邦钢琴大赛总奖，被报界普为中国的金凤凰。她还应邀参加2010年8月在波兰举办的伟大音乐家肖邦诞生两百周年的盛典！而她6岁弟弟李海威，学习钢琴才一年多，就获科威特肖邦钢琴大赛（9岁以下级别）第一名，海湾肖邦钢琴大赛波兰大使特别奖，公评为小神童。

- 天资过人加上后天的努力，令李飞雪获奖无数。
- 年仅6岁的李海威一鸣惊人，技惊四座。
- 获颁阿拉伯金帆船奖的李飞雪与弟弟李海威不断为华人争光。

董泰康——见证科威特华人历史

如果说，有一双手，把散落在各个领域的科威特华人，穿针引线，编织成紧密的一个团体，那么，这一定是董泰康的手。如果说，有一双眼，见证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历史，看尽了华人在科威特的跌宕起伏，那么，这也一定是董泰康的眼睛。

董泰康是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的创办人与现任会长。早在1985年，董泰康就接受妻子姑父的聘请，到阿联酋阿布达比打理红木家具的生意。1987年，董泰康被调往科威特开拓红木家具的市场。当时，中国的红木家具深受阿拉伯人的欢迎，因此公司赚了不少钱。可是，董泰康看到了科威特庞大的石油、建筑市场，加上本身的大学专业是自动化控制，希望能学以致用，因此，两年后，他和担保人各拿出1万5000美元，组成了一家贸易公司。

岂料，1990年，公司刚成立不久，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战后，许多商人不敢踏足中东，董泰康却趁着科威特百废待兴的时机，迅速拓展生意，公司从此上了轨道。

1997年，董泰康成立了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在董泰康积极经营下，该协会成了中东地区最活跃的华人社团之一，为当地华人作出许多贡献。该协会的理事孙亚茹女士表示，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能办得如斯成功，主要是因为领导人董泰康特别热心，该协会办活动，很多时候都由会长一个人掏腰包出经费。“没有董先生的努力，就没有今天的科威特华侨华人协会。”她说。

董泰康育有二女。两个女儿都在科威特念中学，并先后到加拿大念大学。目前，一个女儿留在加拿大发展，另一个则到了深圳，只有太太留在科威特陪伴他。

虽然已经有点年纪，可是，身为Zahra-MAPCO公司董事总经理的董泰康，仍然充满雄心壮志，他期待着伊拉克战后重建工作的商机，把他的事业带上另一个高峰。

- 在科威特华人社会当中德高望重的董泰康。

结语

酷热的气候，加上文化差异，令许多在海湾国家生活的华人无法适应，因此流动率很高。可是，许多来到科威特的华人，虽然明知道不能入籍，却有长住下来的迹象。

不管是长居或短住，他们对科威特的怨言，都比其他海湾国家的华人来得少，更能享受异乡的生活。这也许是因为科威特有个很活跃的华人社团，把科威特华人连接在一起；也许是因为科威特健全的社会制度，令外来者的生活有一定的保障；也许，这更是因为，科威特的华人，肯用心去生活，发掘平淡日子里小小的快乐。

- 科威特华人家中常邀约亲朋好友聚集一起，促进彼此感情。

卡塔尔

引言

卡塔尔是个从沙特阿拉伯向北延伸至波斯湾的小小半岛，南北全长仅160公里，东西宽80公里。属热带沙漠性气候，夏季酷热干燥，气温高达摄氏50度以上，冬季比较凉爽，最低气温达摄氏7度，年降雨量仅125毫米。

公元7世纪时，卡塔尔属于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1555年并入奥斯曼帝国，被土耳其统治了200多年。1846年萨尼·本·穆罕默德建立了卡塔尔酋长国。1882年沦为英国保护国，直到1971年9月3日宣布独立。

卡塔尔曾是个靠渔业和珍珠养殖业支撑全国经济的贫穷小国，直到1940年代发现石油与天然气后，经济才开始起飞，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1995年，埃米尔（酋长）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发动政变，从父亲手中夺取政权。在他的统治下，卡塔尔开始一系列现代化改革，社会开放，妇权提高，而代表阿拉伯势力与西方抗衡的半岛电视台也随之诞生。他也建立君主立宪制，任命内阁首相。

为了减少对石油与天然气的依赖，卡塔尔近年致力把首都多哈发展成区域金融之都，又建设科学技术公园，鼓励发展知识与商业活动，开始向外国人打开大门，吸引了近5000名华人的到来。可惜卡塔尔的发展始终不及邻国阿联酋迪拜般，举世瞩目。

华人移民简史

卡塔尔与中国自汉唐时期就已经有来往。特别是在唐朝时期，两地商贸往来频繁。卡塔尔曾盛产珍珠，多哈则是珍珠的聚散港，当年郑和极有可能是为了取得历史上著名的“湾珠”而来到阿拉伯半岛北岸。

1988年7月9日，中国和卡塔尔建交。那时卡塔尔仍然未大事发展，市场更暮气沉沉，只有6名中国人在此居留。1995年，在埃米尔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夺权上位之后，他积极地利用石油及天然气所带来的资金，大力发展国家的基础建设，改革国家的经济，在推动商业活动方面不遗余力。

然而，快速的城市建设是需要大量劳工的，但卡塔尔国小民寡，所以建筑劳工需从国外大量引进。于是，除了印度人及巴基斯坦人外，华人劳工也开始在卡塔尔出现。

从1997年到2007年，卡塔尔的华人人数从60人增长至大约5000人，除了大量的建筑工人，也有一些是工程师、空服人员、体育教练等。

2004年，新加坡积极地发展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政府鼓励之下，许多新加坡公司纷纷在卡塔尔设立了子公司，因此，在卡塔尔的土地上，逐渐出现了大批以华裔为主的新加坡人。

- 卡塔尔的建筑没有门牌。寄信时，所有住宅或商用建筑都用“P.O.Box”。就算某条路在地图上标有路名，路人或司机也不会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因为这里的路名常常改变。所以，告诉出租车司机自己要上哪儿时，最好能说出目的地附近的一个地标，譬如某家大酒店或商场。当地华人邀请朋友到自己家，都必须亲自给朋友带路一次，以后朋友才能告诉出租车司机怎么走，不然很难找到。
- 整个多哈市到处都是工程。

当今社会风貌

引言

虽说卡塔尔有约5000名华人，可是，要发现华人的身影，不是件易事。主要是因为占了这数据绝大比例的建筑劳务，日常多呆在工地里，鲜少到街上走动。而这5000人的数据，也只是当地华人的粗略统计。上千名华人劳工随着工程的开展而来，亦将随着工程结束而离去。因此，人数的起落颇大，往往在数月间相差好几千人。

近年卡塔尔加速经济与城市建设，世界各地的华裔理工精英，如工程师及建筑师等，也纷纷被卡塔尔提供的高薪优职吸引而来。此外，卡塔尔的华人还包括商人、餐饮业者、空服员、技术工人等。

外来者占了卡塔尔人口结构很大的比重。据统计，未来两三年内，移居到卡塔尔的家庭数量将达到20万户，至2012年，这个数字预料将攀升至50万户。为了吸引更多人到此就业，卡塔尔法律允许持有工作准证的人把家人都申请到卡塔尔来住；一家人不但可以到移民局申请身份证，获取健保卡，考取驾驶执照，还能把孩子送到学校念书。可是，外国人无论在卡塔尔住上多久，即使是在卡塔尔出生的孩子，都很难成为卡塔尔公民。换句话说，卡塔尔欢迎外国人，却不接纳外国人成为他们的一分子。

生存不难 发达不易

卡塔尔原是个贫困落后的沙漠国家，完全引不起华人的兴趣。十几年前、卡塔尔政府几近破产，虽然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三位，却必须向他国贷款才能开采。直到2000年，卡塔尔掌握液化天然气技术后，经济腾飞，成了暴富国家，才开始引起华人注意。根据联合国及世界银行的资料，2007年卡塔尔的人均收入已达7万2795美元，位居世界第五。而卡塔尔现任埃米尔也有意走迪拜的路子，积极发展金融业。在两个飞速发展的国家中，阿联酋暂时占尽上风，成为全球瞩目的钻石，形成华人大量涌进阿联酋的局面。

然而，也有小部分华商，看准卡塔尔庞大的消费潜力，市场竞争不似迪拜般激烈，虽然人口少市场小，但市场还未被过度开发，进入市场的门槛较低，比较容易生存，因而到此寻求商机。

中国金信商店的老板张胜育就是一例。7年前，他来到卡塔尔做起百货批发贸易，从2002年到2003年，他在多哈连续开了4间店，生意扩展得很快。今天，他已经是卡塔尔规模最大的华人贸易商，产品以服装为主。

卡塔尔店租近年涨幅惊人，而且由于房屋短缺，要找间店面也难，因此，像张胜育一样有店面的华商，只有3人。其他的华商，多数都是近期才从迪拜过来碰运气、探市场的。没有根据地，他们就在街头兜售；这些华商来来去去，流动量很大，难以计算。

卡塔尔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做生意不必缴税，入口货物报关方便，只要无知识产权问题，一般不会有什么麻烦。没有复杂的报账程序，做生意变得很简单，连会计都不必请，任何收入支出，只要抄一抄自己明白就好了。

- 别看这家Chinese Center店面窄小拥挤，多哈电房租高昂，能拥有自己的一间店，已经很不容易。

华商的货一般都批给在附近做生意的印度人、孟加拉人、索马里人。可惜的是，卡塔尔市场有限，吞吐量不够，不能把生意做大。像张胜育一样一年营业额达到1000万人民币以上，利润有100至200万人民币的华人小型企业，在卡塔尔并不多见。

在这里经商，最叫华商头痛的，还是卡塔尔的担保人制度。卡塔尔法律规定，外国人在当地开公司必须有卡塔尔人做担保，而且担保人必须持有至少51%的股份。为了开公司，许多华商于是和卡塔尔人签下协议，生意由他们完全出资、操作、卡塔尔人只需挂名，赚来的利润大家分享。此外，当地的经营审批、租房、引进劳工、办理驾驶执照、开通电话或有线电视、个人离境等一切活动，都需要一个卡塔尔人做担保签字。因此，

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担保人，成了华商生意能否成功的关键。

由于卡塔尔人在法律上占有51%的权益，加上卡塔尔法律完全偏袒当地人，要是双方闹翻，最终吃亏的只会是华商，而且有可能连血本都要不回来。尽管卡塔尔人恶意欺诈的情形并不多，这种担保人制度还是令华商不安，尤其小型华商，更不敢在此地做大手笔的投资。

囿于市场发展空间，再加上对外来投资者不利的担保人制度，华商皆无长期在卡塔尔发展的打算。卡塔尔，只是他们的一个跳板，许多华商坦承，他们都在其他国家找着投资的机会，就连已在卡塔尔基础稳固的张胜育也不例外。

- 张胜育表示，资本雄厚的生意人看不上卡塔尔的市场，缺乏资金的又很难在当地将生意做大，因为店铺租金太贵。

华商们在卡塔尔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对当地教育缺乏信心，华商们多数把孩子留在原居国，或送到欧美受教育。偶尔，妻子会过来卡塔尔小住几个月，陪伴他们。其他时候，华商只好通过网络视频，跟家人聊聊天。他们的生活被工作占满，从早上9点上班到晚上10点，就陷在高高的柜台后，视线所及，都是满坑满谷的货。他们不讲究生活享受，卡塔尔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赚钱之地。一旦离去，他们对卡塔尔，不会有太多留恋。

华人教练获得认可

卡塔尔热衷体育。国土虽小，卡国的足球队却足以和中国队抗衡，十几年来，多次成了中国进军世界杯的绊脚石。确定承办2006年亚运会后，为了在亚运会上吐气扬眉，卡塔尔更是重点发展体育运动，重金礼聘外籍运动员和教练加盟。

身高体健的非洲裔球员最受卡塔尔足球队青睐。而经验丰富的中国籍体育教练，则是卡塔尔体育局频频招手的对象。目前，卡塔尔共有11名中国籍体育教练，排球教练占了4名，乒乓教练占了6名，还有一名是射箭教练。其中两名最资深的中国体育教练，分别是排球教练虞重华和射箭教练李玲娟。

61岁的虞重华在卡塔尔当排球教练已经11年，是体育总局公派卡塔尔的援外教练，目前在阿赫里排球俱乐部当技术指导。2006年，阿赫量俱乐部在虞教练的率领下，获得卡塔尔全国联赛第3名，这也是该俱乐部历来最好成绩，唯虞重华谦虚表示成绩仍可更好，可惜俱乐部给的资金有限，很多训练方案难以实施。

虞重华在卡塔尔生活多年，为人热心，俨然成了当地华人心目中的侨领。许多初到卡塔尔的华人，都受过他的照顾。其实，虞重华早萌去意，只是每次合约期满，都受到盛情挽留，只好一年又一年地留了下来。

在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代表中国拿下射箭银牌的李玲娟，则是卡塔尔体育界的彗星。卡塔尔近年才开放让女性受教育，很多女孩长到20多岁了，还是很少出门，甚至一生只去过四五次购物商场。卡塔尔申办亚运成功后，有意成立一支女子射箭队，于是，大力宣传体育，鼓励家长把孩子送进国家队训练，因此那些少女们才有了接受体育训练的机会。

2002年，李玲娟受聘来到多哈后，一手创立了卡塔尔第一支女子射箭队。2006年多哈亚运会上，卡塔尔射箭女队一举拿下团体铜牌。翌年，在开罗的泛阿拉伯运动会上，卡塔尔射箭女队又获得金牌，举国欢腾。由于卡塔尔射箭女队没有专业选手，队员多是学生、护士、教师，只在下班后训练两个小时，能在亚运会得到如此成绩已算难能可贵。

回忆起刚开始训练这些女孩的情形，李玲娟笑说，一点也不容易。男孩子好胜，训练时还比较认真；女孩子却把训练场当成玩乐的地方，爱来就来，不爱来就不来，令她很头痛。不过，李玲娟敬业乐业，以身作则，渐渐赢得队员的尊敬。

卡塔尔并非华人体育教练的热门选择。除了虞重华和李玲娟，因为成绩特别杰出，又与当地社会相处得不错，屡次受到热切挽留才在此工作多年之外，多数教练都和其他领域工作的华人一样，少则两年，多则四五年，很少人愿意长留。

在卡塔尔当体育教练，不如在中国风光。在这里，体育教练被视为工作人员，在训练场上权利不大。卡塔尔想怎么处置国家队，教练无权过问。各国教练的待遇又不平等，来自欧美的特别受尊敬，待遇工资特别高；东欧与中国的教练同一个档次，菲律宾教练的待遇更差。卡塔尔体坛完全不是看成绩，而是视国籍来决定待遇，这令许多中国籍教练心灰意冷。

无论如何，中国籍教练对卡塔尔的贡献，还是慢慢受到了认可。卡塔尔奥林匹克委员会体育部主任哈利勒·伊卜拉克·贾巴尔给予中国体育教练高度评价：“中国教练的教学水平有目共睹，他们为卡塔尔奥林匹克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排球教练虞重华，在卡塔尔生活了11年，是资格最老的华人之一。
- 卡塔尔女子射箭队教练李玲娟。

受聘卡航的华人空服员

卡塔尔航空近年开始意识到华人市场的重要性，因此频频在中、港、台、新等地招募懂华语的空服员。如今，卡塔尔的华人空服员已达200多人。这些年轻华人男女都是大学毕业生，时尚漂亮，在卡塔尔自成一个群体。

卡航空服员首两年的基本月薪加上其他津贴，约有1500至1800美金，视航班多寡而定。在消费高昂的卡塔尔居住，这样的收入不算太高，不过，因为税务全免，加上住房、水电、来回机场的交通都是免费的，收入还算颇有余裕。

他们热爱工作，喜欢飞行生涯，可是卡塔尔这个地方，对这些年轻男女来说，实在太无聊了。“台湾或香港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每一天都发生很多事，见了很多人。可是，在卡塔尔，每一个人都可以三言两语就把每天的生活交待完毕。”来自台湾的刘潞璘说。

没有飞行时，他们在宿舍里自己做饭，上网聊天，很少出门。这里交通很不方便，不但出租车难截，车费也很贵。在外头吃饭，消费一样高昂，且不合胃口。他们也很少到中餐厅用餐，中餐厅为了配合中东人，味道都变样了。问10个卡航的空服员，他们最喜欢到卡塔尔哪个地方玩，10个都会面有难色，想半天才答：“自己的房间。”

在卡塔尔，空服员住在不同的宿舍，飞机航班表各不相同，很难碰在一起。他们也很少和当地人交上朋友。一些中东人对华人不太尊重，并且存有错误观念，一看到华人女子，就趋前“问价钱”，把他们当成妓女，更放肆的，甚至还会对他们“动手动脚”，台湾空服员郭秀娟就曾被一名中东男人跟到家门口，还企图伸手抓她，吓得她掉头就跑。不只女生，男性空服员被性骚扰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有的空服员一坐上车子，司机的手就放到了他们的大腿上。

许多港、台华人空服员，工作满两年就离职。进入卡航时，空服员签的都是3年合约。工作首两年，卡航每个月都会扣押他们一部分薪水，直到做满两年，才一次过发回给他们。这也意味着，两年后这张合约就没有约束力了，因此空服员都选择此时离开。愿意在此呆上两年，只是为了拿回全部薪水，由此可见他们多渴望离开卡塔尔。

沉闷的生活，令许多卡航空服员热衷写起部落格。今天，网络上留下了许多这些空服员的生活印记。这群年轻人的部落格，仿佛沙漠里掠过的微风，掀开了中东世界神秘面纱的一角，使广大网友得以一窥华人在多哈的生活实况。

- 外型亮丽的卡航空中服务人员。

快乐的新加坡华人

如果说，卡塔尔有哪一群华人是较为快乐的，那一定是新加坡华人。

据卡塔尔新加坡社交组织“Red Dotters”估计，来到卡塔尔工作的新加坡人约有400多名。他们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月薪至少有2万至2万5000里亚尔，月薪高达五六万里亚尔的也不少，生活优渥。他们主要分布在工程领域，土木工程师占最多，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师也不少。当中，华人占了80%以上。由于人数众多，加上生活背景接近，新加坡人自成一个圈子，相处得很融洽。

五六年前，卡塔尔的新加坡人其实也不多。2004年，新加坡积极和中东国家建立经贸合作，新加坡贸工部长杨荣文率团访问卡塔尔开拓商机，并探讨签署自贸协定。李显龙总理也随后和卡塔尔酋长哈马德、首相阿都拉会晤，签订避免双重课税等3项协定。在新加坡政府的鼓励下，新加坡公司纷纷前往卡塔尔设立子公司，做为进军中东的基地。

2005年可说是新加坡人在卡塔尔的分水岭。此前，赴卡工作的新加坡人不多，而且大部分都是被卡塔尔公司聘请过来的。2005年后，新加坡公司纷纷涌现，新加坡人人数激增，新加坡总公司外派过来的员工成了主流，占了80%至90%。

被卡塔尔公司聘请的新加坡人，除了丰厚的薪金和福利外，通常还可获得家庭配套，把配偶、孩子接到卡塔尔生活，所有费用由公司承担，包括孩子的教育费。而被新加坡公司外派到卡塔尔的，通常都是只身前来。不过，他们的待遇也不差。由于愿意远赴卡塔尔工作的新加坡人不多，一般上，愿意来的，都能获得加薪50%以上，还不包括汽车与房屋津贴。不过，对他们来说，接受调派卡塔尔最大的动机，还在于出国工作的经验，对工作履历很有帮助。

无论有家人陪伴，或是只身前来，新加坡华人在卡塔尔的日子，一般都过得相当惬意。这里的工作压力没有新加坡那么大，上班时间一般为早上七八点至下午三四点，很少加班，而且，也不必像在新加坡一样，每天把大量时间花在塞车或地铁上。周末时，不必奔忙于亲戚朋友间的应酬，可以静下心来和家人度过悠闲的一天，或是参加派对，好好享受异乡生活。

当然，工作上的烦恼与冲突，还是免不了。中东的企业文化和新加坡很不一样，新加坡总部依循新加坡效率制订的工作进度表，卡塔尔往往赶不上，令总部大发雷霆。可是，卡塔尔子公司又不配合，在卡塔尔的新加坡人，就成了两地文化差异的夹心饼。

新加坡人也不满中东国家种族歧视的现象。在卡塔尔，欧美人和阿拉伯人备受尊重，亚洲人遭到歧视。有些场合如娱乐场所，明文规定亚洲人不许入内。商场或海滨公路办起家庭日时，也规定亚洲人，尤其是亚洲单身男子，不准入内，阿拉伯或欧美单身男子入内却没有问题。对重视平等的新加坡人来说，这种堂而皇之的种族歧视，令他们难以忍受。

在卡塔尔，来自新加坡的高薪上班族得以过上一段优游自在的日子。可是，他们心里明白，这里只是他们生命里的一个驿站。两年，是一般新加坡人给自己的期限。

- 多哈中餐厅近年欣欣向荣。北京饭店与长城饭店是多哈的老字号，北京饭店在卡塔尔历史最悠久，于1998年3月开张，老板丁学超是巴林国王的医生。另外，开在Villaggio的香锅饭店和开在City Center的上海花园，则显示着中餐厅已经进驻高级购物商场，成了时髦的选择。
- 虽说多哈住房紧张，可是，新加坡专业人士仍能获得很不错的住房福利。工程师高俊城夫妇俩就住在一栋半独立式洋房里。

其他资讯

卡塔尔温情的Red Dotters

在卡塔尔工作的新加坡人成立了一个社交组织，这个组织，就叫Red Dotters。Red Dotters成立于2006年新加坡国庆日当天。同年11月，新加坡总理到访卡塔尔，为Red Dotters主持了正式的开幕仪式。当时，卡塔尔连新加坡领事馆都没有，Red Dotters在有心人的推动下，应运而生，让新加坡人认识彼此，互相帮助。刚抵达卡塔尔的新加坡人，只要和Red Dotters联系上，该组织都会带他们到各部门办理居留证等证件、考取驾照等等。后来，新加坡领事馆成立了，Red Dotters就成了纯粹社交联谊的组织。

Red Dotters经常举办一些周末聚餐、节日聚会、打保龄球、出海钓鱼等活动，甚至还办过瑜伽课，请一名修习瑜伽多年的会员给其他会员免费授课。每逢农历新年及圣诞等节日，策划一个大型派对更是不可少的节目。

目前，正式注册成为Red Dotters会员的新加坡人共有200多名。Red Dotters的现任会长曾春生，也是该会创办人之一。他指出，Red Dotters的管理层，正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很多人告诉他，Red Dotters要是有活动，他们愿意从旁协助，可是，却没人愿意担任主席、财政、秘书等职。也因此，从创会至今，几个会职，都是由他们人轮流担当。这除了是新加坡人个性低调使然，也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工作之外，给自己平添更多责任。

- Red Dotters现任会长曾春生。

结语

在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占了近四成人口的卡塔尔生活，华人显得格外孤独。除了劳工之外，华人分散在各处，联系不多，生活低调而平静，虽然偶尔也会和其他华人朋友聚在一起，聊聊天、打打牌，但基本上，都过着各自的生活，没有形成明显的华人社区。大家抱着过客的心态，凑合着过日子，只等时间一到就走。

华人会否在这片土地开出繁盛的枝叶，华人又将在这片沙漠写下怎样的历史篇章，

全看卡塔尔以后的发展和政策，是否能留住更多华人。

阿联酋

引言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下简称阿联酋）位于阿拉伯半岛的东南部，除了赫赫有名的迪拜（Dubai），尚有阿布扎比（Abu Dhabi）、沙迦（Sharjah）、哈伊马角（Ras al-Khaimah）、阿吉曼（Ajman）、乌姆盖万（Umm al-Quwain）、富吉拉（Fujairah），共7个酋长部落。阿联酋境内除最东部为哈贾尔山地外，其余多为低平沙漠，属热带沙漠气候，年降雨量仅75毫米左右，夏季气温高达40至50℃。天然环境虽然恶劣，阿联酋却盛产石油，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出口国。

公元7世纪时，此区域属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16世纪，殖民主义抬头，波斯湾各小国迭遭葡萄牙、法国、荷兰等国相继入侵。19世纪初英国人开始侵入波斯湾，各酋长国逐步沦为英国的保护国，直到1971年，它们才摆脱英国统治，6个酋长部落组成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翌年，哈伊马角加入，形成今天的阵容。

各酋长国保持相对独立性，在经济、司法、行政和外交上有一定自主权，但7个酋长国之间可自由往来，无需签证。石油产量最丰的阿布扎比是阿联酋的首都，迪拜是享誉世界的国际贸易城市，沙迦则被定位为穆斯林宗教与文化城市。联邦经费主要由阿布扎比和迪拜两个酋长国承担，阿联酋境内的华人也多集中在这两个酋长国。

华人移民简史

远在汉代时期，西域都护府名将班超就曾经派遣副将甘英出使罗马帝国，并且途经波斯湾地区。那时，波斯湾地区已经有不少商埠，包括迪拜与豪尔费坎（Khor Fakkan，即今天的沙迦）等。在哈伊马角城北的沿海地区，还曾经挖掘出聚勒法尔城的遗址。自十世纪开始，这座城即与东亚地区有商贸往来，而且一直持续到17世纪。聚勒法尔城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中国瓷器，即可证明当时已有很多人来往于中国与阿拉伯之间。可惜的是，17世纪后，两国之间却再无交往。一直到了1984年，中国与阿联酋才正式有建交关系。

之后，中国在海湾地区设立不少以工程为主的中资机构。直至90年代，在阿联酋已大约有十多家小型华资贸易公司，其中较早进驻阿联酋并取得成功的是台湾厂商。台湾的宏基电脑公司于1992年在迪拜的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Jebel Ali Free Zone）建立装配厂及发货中心，两年后，该公司的营业额即达到2500万美元以上，市场占有率在多个海湾国家中排第一。1995年，台湾的神脑无线电公司也在阿联酋成立分公司。但是，这时候阿联酋华人还不足100名。

那时，阿联酋已凭着石油而暴富，但却缺乏物产，大部分商品只能依赖进口。按理说，这段时期本该是商人们最佳的进场时机，可是，由于当时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战争导致中东局势极度不明朗，加上阿联酋又具有十分浓厚的保守宗教色彩，以致态度谨慎的华人存有疑虑，结果错失了这段黄金时期。

90年代末，迪拜酋长穆罕默德·马克图姆（Sheikh Mohammad Maktoum）开始积极地把迪拜提升为中东地区的商业、文化、旅游和金融中心，大刀阔斧地建设迪拜，并提供外资许多优惠。

从1998到2002年，迪拜的中资机构激增至100家以上，单是拥有居留签证的中国人就多达两万人。

最先到阿联酋做生意的是福建人及浙江人。他们精明能干、吃苦耐劳，在阿联酋已经有了深厚的根基。台州和温州商人尤其众多，在商场上甚具影响力。温州人初到迪拜之时，大多数都从事皮鞋和服装业。到了今天，他们的身影已经遍布房地产、机械设备、五金工具等领域，可说在温州有的行业，在迪拜也几乎都有了。

上海人则大部分从事零售业，早期在迪拜沿街兜售手表或墨镜等小商品的，多数便是他们。至于东北人，就以从事餐饮业为主。不过，由于少数害群之马在此从事诸如当蛇头等非法勾当，以致阿联酋对东北人的入境管理比较严格。

近几年来，阿联酋华人增长率更是惊人，保守估计已经超过16万。在历史上，很少国家能像阿联酋这般，在短短的几年间就吸引了那么多的华人。而且，这一切还只是一个开端。

当今生活风貌

引言

阿联酋可谓近代华人人口膨胀得最快的国家。全球华人工程师及其他专业精英，纷纷被丰厚的薪水和优渥的福利吸引而来。而数以万计的华商，更被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巨大的商机吸引，前仆后继到此拓展业务。

大部分的华商集中于迪拜的德拉（Deira），从事批发贸易，纺织品、生活用品、建筑材料、汽车配件等。夫妻或几名合伙人组成的迷你型企业，成了德拉批发市场独特的商业景观。这里的华商主要来自浙江、上海、福建、江苏、广东、新疆及东北三省。除了批发贸易，也不乏华商从事零售业、旅游业及饮食业。

阿联酋虽然投资政策开放，对移民问题却很保守。非阿拉伯人要拿到阿联酋的公民权，非常困难。也因此，这里的华人，犹如匆匆过境的候鸟，只想赚够就走，很少人在此建立家园。

淘金天堂变惨烈战场

阿联酋的迪拜，是现代华人心目中的“金矿”。华商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只要脑子没问题，到迪拜做生意，准能发达。”近20年来，迪拜在酋长谢赫穆罕默德·马克图姆致力打造下，成了整个中东区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而迪拜能如一颗超级磁石般，把华商吸引到阿联酋，不是没有原因的。

首先，阿联酋地理位置优越，处于中东、南亚、非洲、欧洲之间的心脏地带，迪拜的拉昔（Rashid）港和杰贝阿里（Jebel Ali）港被超过125条世界主要海运航线列入站点，运输方便，有利国际贸易发展。再者，迪拜是个名副其实的免税天堂，公司和个人所得税全免。贸易商进口一般商品，只征收5%的关税。至于在此设厂的生产商，进口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时，不必缴关税，出口商品亦同样免关税。

迪拜的经济政策非常自由，资金的流入与流出没有限制，这也表明，华人企业的资本和所获利润可随时汇回本国。而且，政府部门廉洁，贪污、商业欺诈等问题比较少。

迪拜也是充分国际化与现代化的城市，公路、电信网络等各种基础设施水平很高，世界各大银行都可在阿联酋找到，大型展览中心等种种设备提供了优良的商业环境。此外，阿联酋出入境方便，办理签证容易，尤其对大陆华人入境的审核，不像欧美般严苛。这也自然造成华人把阿联酋视为拓展公司业务的最佳据点。

迪拜港（Dubai Creek）以东的一个老城区——德拉，历来就是中东知名的批发市场。在华人进入这个市场之前，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伊朗人，早已在此经营买卖，势力稳固如老树盘根。华人近十年才进入市场，可是，走在德拉的下城区，不难发现华人也已占一席之地。穆沙拉大街上，“中国贸易城”5个字老远就可以看到。中国贸易城隔壁还有一座中国轻工城，再加上邻近的志远鞋城，形成了一个全华商的批发市场。这片市场背后的推手，就是温州商会会长陈志远。

	穆沙拉大街上的中国贸易城。

除了商场，整个德拉的大街、巷弄里，都有不少华商夹杂其中，尤其木须巴扎市场以及纳莎广场附近，更是华商集中地，挂着红灯笼的小店到处可见。夫妻小店成了整个德拉贸易市场的主调。别看这些店铺面积小小，一间不到20平方公尺的小店，一年租金至少要16万迪拉姆。不过，木须巴扎是个远近驰名的老市场，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者都汇聚在此，一个月要达到100万迪拉姆的营业额并不困难。

华商的涌现，难免对当地的劳工就业市场以及贸易市场造成冲击。中国产品也逐渐取代了印度、巴基斯坦产品的位置。华人人数虽然不如南亚人，但华人在经济上的影响力，毋庸置疑。

迪拜淘金的热潮方兴未艾，可是，每一名受访华商皆异口同声表示，进场的黄金时机已过去了。“竞争太激烈了，生意越来越难做啊。”他们纷纷摇头感慨。

90年代初，迪拜华商不足100家，中国商品奇货可居，利润可达成本一倍以上。可是，这两年来，华商大量涌进迪拜，引发激烈削价战，中国商品的利润往往只剩下3%至5%。而实力雄厚的企业，为了垄断市场，甚至在短期内亏本卖货，以把对手逼出市场的做法，也时有所闻。在迪拜，商场成了名符其实的残酷战场，“这是一个大鱼吃小鱼的地方，没有实力的企业，还是不要进来。”迪拜华商说。

高昂的营运成本也使华商压力越来越大。来自温州的许佩佩和丈夫张荣在木须巴扎批发牛仔裤，因为租金涨得太厉害，3年间，他们搬了又搬，一直寻找着便宜的地方。像许佩佩那间仅跨几步就能走完的小店铺，一年租金就高达18万迪拉姆。仓库费、住所等，又是另一笔庞大费用。根据《绿洲报》报导，2008年迪拜一间两室的公寓，平均年租金为12万，比过去一年涨了50%，涨幅惊人。

- 许佩佩的店铺不足300平方尺，年租金高达18万迪拉姆。

华商认为，迪拜房子的租金本来没有那么贵，房价都是中国人炒起来的。

许多华商盲目听信传闻，误以为迪拜有掘不尽的金矿，抱着雄心壮志来阿联酋大展拳脚，结果条件稍差的一些，在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最后实在亏不下去了，淘金梦碎，黯然撤退。

- 木须巴扎市场，放眼四望还是南亚人多，不过，高悬的红灯笼显示了里头的店主是华人。

年轻精英齐聚迪拜

阿联酋华人主要是商人。可是，到此谋职的华人也为数不少。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在7个酋长部落中石油产量最丰，石油工业最集中，许多华人白领精英在此从事石化工作。而迪拜是中东区的金融与商业中心，自然更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年轻华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能说流利英语，并且都是相关领域的杰出人才。

迪拜可说是一个大工地。4座世界最大的人造岛（朱美拉棕榈岛、杰贝阿里棕榈岛、德拉棕榈岛、世界群岛），耗资40亿、占地460万平方公里的运动城，建在海底的酒店，高度已经超过688公尺并且还在继续往上建的世界最高楼迪拜塔，高科技智能大楼The Pad，都在如火如荼地建筑中。

除了这些举世瞩目的建筑项目，全城各处都在发展新的商业区、住宅区，可谓到处有建筑工程。这波建筑热潮预料会持续十多年，目前迪拜的人力市场中，需求最殷切的当属建筑师、工程师。除此之外，华人子弟的身影还出现在金融业、电信业等各个领域。他们的月薪高达三千至两万美金，还可获住房、车子津贴等优厚福利。

另外，由于阿联酋的华商与华人旅客直线上升，成了阿联酋酒店的十大客源国之一，阿联酋的酒店与餐厅乐于聘请华人当服务员。全世界最奢华的七星级帆船酒店的中国籍员工，就高达10%至20%。

此外，许多酒店与餐厅集团，也和中国旅游学院合作，录取中国学生到阿联酋实习。董云菲与丁文婧是来自山东旅游职业学校的大专生，阿联酋朱美拉集团（帆船酒店与Al Qasar Hotel等，都是该集团旗下的酒店）与该校有实习生课程合作。每年，朱美拉集团都会派人到中国面试学生，甄选出十来名赴阿联酋。

被选中的学生等于是酒店的正式职员，可以一直在酒店工作下去。可是，新一代的中国学生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知道，只要有了一纸文凭，再加上在朱美拉集团工作的资历，他们可以轻易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找到好工作，直接进入管理层，因此，绝大部分学生都会在实习结束后，回到中国。

在这些大酒店当最低层的员工，一个月薪水有1000迪拉姆。有趣的是，懂得中文的学生，还可得到每个月300迪拉姆的语言津贴。迪拜的星级酒店，汇集了来自全球各国的人才，“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不同国家的人，第一次接触到国际化的工作环境，并学习先进的酒店与餐饮业管理系统。这经验太宝贵了。”董云菲说。

她初到迪拜时，英文不好，无法和人沟通，非常寂寞，再加上工作辛苦，有几度很想放弃。可是，坚持下去后，她发现自己英文进步了，眼界开阔了，人也成长了。

- 阿联酋另一酋长国沙迦，距离德拉只有20公里，公寓租金却只有迪拜的1/3，因此一些把店铺开在迪拜的华商，都住在沙迦，每天两地来回。近年也有华商开始在沙迦开拓市场。这里的家具、建材市场，本来多由印度人经营，中国人来了之后，看到印度人卖的都是中国货，还那么好赚，于是也纷纷到这里开店，令沙迦成了远近驰名的家具、建材市场。还有一名温州人魏建亮租下沙迦Rolla Mall二楼走道，设立柜台售卖电子产品，令该购物中心成了颇有名气的中国香港科技数码城。
- 在Hotel Qasar实习的山东旅游职业学校学生丁文婧与董云菲。

贫富悬殊 天堂地狱

和所有高速发展中的国家一样，阿联酋贫富悬殊严重。迪拜是富人的天堂，却也是贫者的地狱。

一条迪拜港，把华人分成两个世界。迪拜港以西的朱美拉（Jumcirah），是所有国际大企业的所在。这是一块新开发的地方，马路宽敞，现代化大楼林立。

在这里，生活节奏不像其他国际大城市般紧凑，人们可以享受一切物质所能带来的快乐，大量国际时尚品牌在此汇集，从名牌服饰到名牌家具，应有尽有。Mall of Emirates、Ibn Battuta Mall这些购物广场几乎可以满足所有人的购物欲望。除了猪肉，他们可尝到世界各国的高级美食，还可以到各大酒店的舞厅、酒吧饮酒作乐，气氛不亚于其他国际大城市。这里的迪拜，是个享受人生的地方。

	马来西亚籍工程师曾永胜与香港籍妻子罗加欣，在迪拜的生活舒适，闲暇时到酒店喝茶，享受人生。

迪拜港以东，也就是华商云集的德拉区，和朱美拉形成强烈的对比。这里发展较早，建筑物非常密集，市内交通堵塞严重，夏天空气粘滞闷热，除了一些正宗的中餐厅能吸引白领华人偶尔光顾，就没有其他吸引人的地方了。“除非有绝对必要，否则我不会踏足德拉。”一名在跨国企业工作，领着月薪数万迪拉姆的中国籍人士说。

德拉的华商们，抱着淘金心态，勤奋地工作，刻苦地过日子。在这边苦个数年不要紧，最重要是能尽量多赚，回国后再过好日子，是当地华商的普遍心态。由于迪拜消费高昂，他们平时也不太舍得花钱。

他们的生活没有多少享受可言。以在伊朗市场从事眼镜批发的罗丁海与张淑卿夫妇为例，他们下班时已是晚上9点多，回到沙迦的公寓，夫妇俩一起做饭，11点左右才能吃上晚餐，第二天9点又要准时开店。至于午饭，也都是自己准备的便当。

	眼镜批发商罗丁海与妻子张淑卿，生活清俭刻苦。

在中国贸易城附近开上海超市的白大婶，虽然年纪颇大，可是，为了帮女儿看管超市，一样过着早出晚归的生活。白大婶每天7点多就得起床准备开店，然后一整天守在小小一家便利店里，直到晚上11点多关店。回家后一家人一起做饭，晚饭吃完，一般已经是凌晨2点了。

	上海超市的白大婶，每天起得早睡得晚，为女儿掌店。

德拉市场的老板，总算还有自己的一套公寓，而德拉市场的打工仔，则住在称为“大家”的廉价宿舍。这种公寓一般有三四间房，每间房住上7至12人，这类室内充满油烟味、汗酸味的公寓，一个床位，月租也要700迪拉姆。不过，艰苦的环境并没有击垮年轻华人，他们把这视为磨练，并且尽量保持乐观，住在“大家”的林元说：“中国人算不错了，印巴人还要睡马路！”

阿联酋还有一些活在社会边缘的民工。由于整个迪拜市到处都是建筑工程，因此这里也涌现了大批华人建筑工人。沙漠夏季气温高达40至50度，在这里铺路盖房，宛如在烤箱里工作，如果忘记戴手套，一接触到金属，皮肤马上被烫出水泡。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周末还要加班。有人形容，这些华工是“住在‘集中营’，吃的食物连狗食都不如”。恶劣的生活条件，犹如现代版的“卖猪仔”。

工人被中介公司欺诈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据一名在工地当管工的中国人透露，当初他来迪拜时，中介公司告诉他两年能赚十万迪拉姆，但他只拿了6万迪拉姆，那还是主管级的薪水，技术工人薪水更低。再加上这一两年中国汇率升高，兑换后他们赚的钱无形中变得更少。华工也没有获得医疗福利的保障，该名管工患肾结石，却因医疗费用太高无法就医，只好痛到无法忍时才自己掏腰包到医院打一支上百美金的止痛针。生活没保障，环境不好，消费又高，不少华工情愿回国工作。

问他们为何不一走了之，他们说护照被中介公司扣着，哪里都去不了。该名主管申请回国就医，却不获上级批准。据了解，在阿联酋，扣押工人护照属于违法行为，可惜，因为大部分工人文化程度不高，不了解自己的权益，只好任人欺凌。

这些华工是被遗忘的一群。曾在迪拜工作的白领华人陈裴瑶说，他有时在街上看见这些民工，只觉他们犹如动物般，一脸木然。他们出现在迪拜每个角落，却又仿佛是隐形的一群。今天，迪拜在向世界夸耀他们最耀眼的建筑奇迹时，这些华工的血汗，实在不容忽视。

另外，华人性工作者也在阿联酋悄悄滋长。许多中国劳务公司为谋私利，对迪拜作出不实宣传，宣称这里工作机会多，报酬高。交了大笔中介费来到迪拜的中国女性，却完全找不到工作。为了出国，她们已经欠下大笔债务，不能就此回国。许多人迫于无奈，只好卖身。由于华人性工作者的数量，在阿联酋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对当地华人的形象造成了一定影响，因此开始引起当地华社的关注。

- 阿联酋阿吉曼聚集了许多跑展览会的华商。他们在展览会摆小档位，哪里有展览会，他们便往哪里跑。选择阿吉曼落脚，是因为那里房租便宜，他们租了楼房，既可住人，又可放货。

华商多 商会更多

阿联酋华人多，华人社团更多。这些社团多是地缘性商会，譬如温州商会、台州商会、河北商会、徐州商会、义乌金华同乡会等等，此外，在龙城营业的商家也组成了龙城商会。大大小小的商会多不胜数，可惜除了少数商会外，多数商会并不活跃。

华人在阿联酋历史尚浅，而且，不同于其他移民国家，华人并没打算在此长留。许多长袖善舞的华商，找了几名志同道合的同乡，就办起一个社团，联络乡谊，开拓商机。不过，既然只是过客，搞起社团也就不太认真，缺乏长远规划。商会成立之后，只是联谊吃饭，接待外宾。由于社团注册手续非常繁琐，又要每年更新执照，因此，很多社团甚至没有注册。由于这些小商会并没搞什么大集会，因此倒也没有碰到过什么问题。

目前，阿联酋办得最出色的商会，当属温州商会与台州商会，此外，中国商会虽然不如以前活跃，却也相当有名。温州人最早到达迪拜，人数也最多，约有一万名。有鉴于温商多是中年人，外语不好，又不熟悉当地文化，做生意常碰到困难，温州商人陈志远于是萌生了创立商会的念头。2004年，温州商会正式成立，陈志远出任会长至今。当

商会成员和当地政府发生纠纷，或当同行间互相杀价，产生矛盾时，商会都会介入调停。

与其他国家的商会相比，阿联酋华人的商会力量小，结构也松散得多。当地华商最迫切需要的，也许是一个强势的商会，规范华商的市场行为，通过价格约束、品牌塑造等方面，提升华商的地位，并把华商团结在一起，争取华商在阿联酋的权益。

除了商会，迪拜尚有一家阿联酋华人社区中心，对当地华社贡献很大。阿联酋华人社区中心是一家非营利民间组织，由TT特快汇款的老板何家财出资成立。社区中心每星期五都有一个免费让会员参加的英语沙龙，协助会员提升英语能力。此外，社区中心还开办了收费的阿语和英语培训班。

负责该中心运作的，正是TT特快汇款的员工。在这群充满热情的年轻人的带领与协调下，社区中心成了阿联酋最活跃的华人社团之一。他们办过文艺晚会，也办过群英会，邀请成功的商业人士聚会，讨论市场状况，华社前景等。

不过，该中心最主要的功能，还是帮助落难华人。该中心提供咨询服务，为华人解答法律、宗教、投资经商等方面的问题。当华人遭遇劳资纠纷、商业欺诈、意外事故时，也可直接到该中心求助。中心内有个法律顾问阿都拉曼（Abdurehman Wubuliyasheng），协助华人进行翻译，及到相关部门立案、辩护、调解纠纷等。

该中心自成立以来，每年受理200至400多宗案件。阿都拉曼表示，该中心受理的案件以劳务纠纷、签证等为主。

到社区中心寻求咨询服务，每一次只象征性收费20迪拉姆，和外头律师每小时数百迪拉姆的收费比较，非常便宜。当碰到完全没有能力，又迫切需要帮助的华人时，社区中心还会提供免费帮助。阿都拉曼说，能看到别人的笑容就是他最大的酬劳。

- 根据阿联酋华人社区中心的统计与分析，缺乏法律常识是华商的最大弊病。华商相信口头承诺，总是不找律师打一份正式的合同，或是随便乱签合同，等到有麻烦才后悔。华人也不看管好自己的重要文件，有一名华人曾把护照借给同事，该同事又用他的护照到银行开户口，并开出了21万迪拉姆的支票，结果该华人被银行追债。
- 阿联酋华人社区中心的法律顾问为上门求助的华人解答法律疑问

在沙漠浇灌基督之花

和其他海湾国家一样，回教在阿联酋受到绝对保护。尽管如此，迪拜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迪拜的杰贝阿里（Jebel Ali）工业区，就有个地方专门让其他宗教进行活动，天主教、基督教、锡克教等教堂，全都集中在这个特定的园区内。不过，法律也规定，外教人士不得向本地人宣教，一旦走出教堂大门，也不准有任何非回教的宗教活动。

佛教在阿联酋并不活跃，迄今并无寺院或佛教徒的聚会出现。基督教近年在迪拜却发展蓬勃，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基督教徒一起在教堂内进行崇拜，有的还自动自发在家里办起圣经研究班。

阿联酋华人教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当时，有一名虔诚的华人基督徒欧阳仪珠，眼看迪拜其他种族的基督徒都有教会，于是，就和一些来自新加坡及其他地方的华人姐妹，在家里举办祷告会。1997年开始，每逢星期二，基督徒开始聚集在欧阳家里祷告查经、唱赞美诗歌。2002年，在美国大使命中心的王永信牧师及欧阳仪珠的推动下，沙迦举行了第一届波斯湾华人宣教研讨会。会后，华人信徒在United Christian Church of Dubai（UCDD）国际教会开始礼拜，华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教会。2003年2月，会众正式以“杜拜华人基督教会”（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Dubai）为名，成立了迪拜第一家华人教会。

目前，迪拜比较有规模的华人教会共有3家，分别是由刘得贵牧师带领的杜拜华人基督教会、海湾华人基督教会以及由施约瑟牧师带领的华人福音普传会。

杜拜华人基督教会大概有200多名教友，每个星期在杰贝阿里的迪拜福音教堂中心（Dubai Evangelical Church Centre）有早晚两次崇拜聚会。有趣的是，为了配合当地的周休时间，基督教的主日崇拜，一律改为星期五，而非星期日。

华人基督教会常向当地的华工分发食物和传福音。这些华工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农村的年轻男子，生活苦闷，生活条件也不好，因此比华商更容易接受基督教。由于工作时间的关系，他们只能出席晚上的主日崇拜。住在附近的工友自己走路过来，住得远的，则有教堂派巴士接送。信教后，他们的精神有所寄托，打架斗殴的事件也比较少了。

- 早在20多年前，欧阳仪珠就带领一群姐妹，在家举行祷告会。（照片由欧阳仪珠提供）
- 晚上的崇拜聚会，以劳务人员居多。

创刊热潮席卷迪拜

阿联酋的华人超过16万，对资讯流通需求迫切，掀起华文报刊创办热潮。

每隔一段时期，阿联酋就有新的华文报刊冒出来，但很多发行了几期后就销声匿迹，也有些消失了一阵子又复刊。这些报刊当中，多数缺乏长远规划，也没有阿联酋新闻部发出的出版准证。不过，也有几份报刊，办报态度较为严谨，始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绝大部分华文报刊以商业资讯与广告为主，新闻与休闲娱乐内容的比例小于50%，可于各大小超市、华人经营的旅馆及中餐厅等地方免费索取。

几家拥有高发行量和知名度的报刊分别是《绿洲报》、《新民商报》、《华人时报》、《华人之窗》与《东方商报》。近期在阿联酋创刊的刊物还有《大家文萃》、《名报》等等。

《新民商报》创刊于2004年，是第一家获得阿联酋新闻文化部出版准证的当地华文报刊。据统计，《新民商报》在迪拜及阿联酋北区每期的发行量高达一万份，另有5000份发行到其他国家，是海湾地区发行量最高的华文周报。

《新民商报》的内容包括阿拉伯文化介绍，与侨民相关的当地政策、经济与商业情报、当地华社动态等等，跟其他当地报章比较，内容算是比较齐全，编辑方针也较严谨。难得的是，把这份报刊搞起来的，正是TT特快汇款和阿联酋华人社区中心的职员。他们利用工作空档，收集与整理新闻，再把资料发到中国去排版。

此外,《新民商报》也和上海的《新民晚报》合作,推出了《新民商报·新民晚报阿联酋版》。这个合作版每周一期,每期两版,内容与排版,全由《新民晚报》供应。为此,《新民商报》的排版设计,也尽量依循《新民晚报》,以统一风格。在阿联酋拿起一份《新民商报》,恍惚中,有种回到上海的亲切。

中东最早创刊的报纸是2001年问世的《绿洲报》。该报创办人为湖北省的李明,曾在中国政府机关工作。因为历史最久,《绿洲报》知名度也比较高,发行量达到5000份,版面虽只有杂志大小,却高达44版。

另一份办得颇出色的报刊是《东方商报》。这份每月逢5、20日出版的报纸,由阿联酋东方投资顾问展览公司创办。内容包括中东地区的金融与物流、投资建设、中东贸易、房地产以及全球的经济新闻为主,特别适合中东地区的华商与投资者。这份报纸也是海湾地区投资最大、最有企图心的华文报。该报有一个正规的编辑团队,记者持有阿联酋政府颁发的记者证。

不过,在阿联酋,传媒并无太大的出版自由。华文报刊在出版前必须把所有的标题翻译成英文,让政府审查。任何有违当地宗教、法律、风俗的新闻以及敏感题材,都不会刊登。

虽然华文报刊越来越多,可是,《新民商报》负责人肖琼小姐说:“市场是无限大的,华文刊物没有达到饱和的说法。能不能经营下去,要看你怎么去开发市场,和你自己的利益点在哪里。”

网站方面,阿联酋华人社区中心管理的www.enterwto.com,以及温州商会副会长王伟胜和朋友刘海涛创办的迪拜华人网www.dibai.com,都是服务华人的网站。这些网站张贴了许多关于阿联酋的资料,从领事馆讯息、海湾新闻、商业资讯乃至餐饮购物资讯等,让投资者得以进一步认识这个地区,也让当地华人有个交流的空间。

- 2006年8月1日,中国人王伟胜和刘海涛收购的电视台“亚洲商务卫视”(Asia Business TV)正式开播。该电视台覆盖中东及北非地区21个阿拉伯语国家的4亿观众,节目包括《品位中国》、《周游中国》、《中国著名品牌》、《中国百业之窗》等,把中国与中国商品介绍给阿拉伯观众,协助中国商品在阿拉伯国家建立品牌知名度。
- 肖琼既是TT特快汇款的经理,也得负责《新民商报》与阿联酋社区中心的运作。

华文班留住孩子的根

1998年,中国大使的太太在一场饭局中向欧阳仪珠提议开办中文班,几个月后,迪拜第一个中文班便宣告成立。

今天,欧阳仪珠办的中文班共有40名学生,5名老师。学生多是来自中国和新加坡的华人的孩子,每周上两个小时课。中文班因为得到迪拜学院(Dubai College)赞助,可以免费使用课室,因此学费不高,3个月共550至600迪拉姆。

2007年,迪拜又出现另一个由中国人闯海鸥与新加坡华人潘惜娇开办的中文班。目前,该中文班共有50多名儿童与少年学生。

闯海鸥表示,家长送孩子来学中文,主要抱着两种心态,一种是让孩子多学习一种国际语言,另一种则要孩子把母语学好。如果是为学好母语而来上课的,她会采取新加坡小学的教材,不但要求小孩懂得用华语沟通,还得会写中文。如果只为兴趣而学华语,

课程就以趣味性为主,以激发和保持孩子对中文的兴趣。

除了中文,闯海鸥也希望孩子对中国和中华文化有一定的认识。譬如四川大地震时,她要求老师向同学解释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并发动筹款活动。北京奥运期间,老师们也会分享奥运的消息,以期激发华人孩子的民族自豪感。

“师资是我比较头痛的问题。”闯海鸥表示:“迪拜华人虽多,但都是做生意或工作的,不像欧美国家有很多中、英语都很好,又有教学经验的大学生。在迪拜上国际学校的孩子完全不觉得学中文是种责任,因此中文班的老师要懂得生动教学,否则难以保持孩子的兴趣。”

在这些有心人的努力下,随父母来到迪拜生活、受教育的孩子,有了学习自己的母语与文化的机会,中华文化也得以在阿联酋的土地上,延续下去。

- 中文班创办人闯海鸥(右)与教师罗兰。

其他资讯

国际城内有龙城

德拉人满为患，许多有意进军迪拜的华商欲求一店而不得，于是，龙城商场应运而生。龙城是中阿两国政府合作发展的项目，刚开始时，号称是中国在海外建立的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中国商品集散中心。龙城坐落在国际城（International City）内，从德拉开车前往龙城，须经过一片漠漠黄沙，约半小时才能到达。国际城是个新开发的区域，到处是未竣工的建筑工程。

龙城长达1.2公里，可容纳近4000家店铺。一眼望去，约30%还是空铺。这是个干净敞亮的地方，里头除了餐厅、小超市，还有长椅让人休息，和木须巴扎那些小巷弄里的华人商家相比，环境舒服多了。龙城在招商时，强调这里是做批发的贸易城，开业后却似乎成了零售式的购物广场。

龙城开业之初碰上不少问题，如装修没弄好，店铺内连电源都没有，只能靠走廊上的灯做生意，加上地点偏远，宣传不足，生意很清淡。坚持了3年多后，龙城生意开始上轨道，许多外国商家也慕名前来采购货物。当地商家坦诚这里的生意尚远远比不上德拉，但对龙城的前景非常乐观，认为只要守多几年，龙城生意会更火红。

在龙城经商与打工的中国人约有四五千，不过，在国际城定居的华人可不止此数。由于这里租金便宜，所以在德拉工作的华人也跑到这里来住，每天开车来回。迪拜政府发展这个区域之初，本意是要把来自世界各国的人集中在这里，故名国际城。谁知，这里竟然成了一座唐人城。

- 坐落在国际城内的龙城。
- 龙城内的华商陶传富与外甥女徐挺挺。

结语

今天迪拜的情况类似当年的纽约。这里汇聚了全球形形色色的人，尤其华人，更遍及了各个领域。有的华人用血汗建筑起这城市的一砖一瓦，有的华人则以丰厚资本与商业经验为这城市带来繁荣。和纽约不同的是，来到迪拜的华人，始终没有视此为家。在一块肯拼搏就有希望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理想家园是美国华人的梦想。迪拜华人也有一个迪拜梦——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取最多金钱，然后离开。也因此，迪拜梦和美国梦，有了不一样的深度。

- 商业大厦林立的迪拜呈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观，是现代华人的新“淘金梦园”。

阿曼

引言

阿拉伯半岛的南端，有片宁静的土地。它名气不大，却是阿拉伯半岛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这个被古代中国称为祖法尔的地方，如今就是富庶的阿曼苏丹国。

早在公元前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阿曼就有乳香交易的出现。它更曾是该区域的造船中心，海上通商贸易非常繁盛。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被引入阿曼。从1154年至1624年，阿曼进入巴尼那巴汉王朝（Bani Nabhan Dynasty）。由于苏丹与部落之间长期战争，葡萄牙势力乘虚而入，阿曼多个海港城市被葡萄牙占领。经过多年不屈不挠的抵抗，阿曼最终在1624年，逐出外国军队，建立亚里巴王朝。18世纪建立的赛义德王朝，更将势力拓展至非洲海岸，以及印度与巴基斯坦的一些地方。1920年，阿曼分裂为马斯喀特苏丹国和阿曼伊斯兰教长国，长期的内战使这个曾经与欧洲争辉的强大王国，陷入贫困落后的窘境。

把阿曼带上现代化道路的君主，是苏丹卡布斯。在苏丹卡布斯上台之前，阿曼只有两所小学，连一所中学都没有。1970年，苏丹卡布斯发动不流血政变，废父登基，从此，阿曼渐渐迎头赶上富裕的邻国，如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等。

阿曼大部分国土属热带沙漠气候，热季时气温高达40℃以上，凉季清爽宜人，平均温度约为24℃。约40%的阿曼人从事农渔牧业。乳香是阿曼名产，此外，阿曼也出产大麦、椰枣、棉花等作物，煤、铜、金、铬等矿物产量也很丰富。阿曼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开采石油，如今，石油与天然气已成了阿曼的经济命脉。石化工业的发展，吸引了许多华人专才到此就业。由于发展较晚，虽然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如科威特等国，仍不失为一个富足康裕的国度。

华人移民简史

乳香是中国古代的贵族所钟爱的熏香。乳香来到中国之后，还成了一种功效极多的中药，适用于内科和外科，能活血行气，通经止痛，消肿生肌。公元11世纪，阿曼每年都向中国出口数十吨、甚至上百吨的乳香。而阿曼的佐法尔（Dhofar），在古时候就被中国昵称为香岸。

唐朝时期，中国的航海业和海外贸易极其兴盛，广州、泉州和扬州等都是知名的商港。那时中国的商船已经能够远航至阿曼湾以及波斯湾一带。中国海上商队将精美的丝绸和瓷器卖到海外，同时也把阿曼的乳香带回中国。阿拉伯的历史学家麦斯欧迪曾在《黄金草原》中提及：“很多中国船只多直航阿曼。”

据《星槎胜览》及《瀛涯胜览》二书的记载，郑和下西洋期间，也曾三度到达祖法尔。那时，郑和的船队一停泊在港湾，当地的居民就齐聚码头，敲着阿拉伯大鼓欢迎中国朋友的到访。

另一方面，阿曼人也同样曾远渡重洋访问中国。在公元8世纪时，阿曼的航海家奥贝达驾驶一艘名为“苏哈号”的双桅木船，历时两年抵达广州。在《一千零一夜》中有关辛巴达的海上历险记，就是取材自奥贝达的故事。在宋朝时期，还曾经有阿曼富贾在中国官府当过差，官至广州“蕃坊蕃长”。

中国和阿曼两国民间频繁的交往，直至清朝，才随着日渐保守的政治趋势嘎然而止。

到了近代，华人大胆走向世界各地，到海外追求事业上的理想以及梦寐以求的生活。尽管如此，到达阿曼的华人却少之又少。最早来到阿曼的华人，包括中医师、护士、体育教练和一些华商。1986年，一名来自上海的医生在马斯喀特（Muscat）开了一家诊所。他是如今阿曼华社所能打听到的最早在阿曼落脚的华人。

90年代，中国卫生部在全国各地征选专业能力出色以及能说英语的医护人员，派遣他们到中东地区工作。1995年，中国卫生部派出第一批为数14人的医护人员抵达了阿曼。在这队医护人员当中，有两名是中医师，其余全是护士。两名中医师一男一女，分别负责为男女病人看病。当时，女中医师李晓桂被任命为队长，负责跟卫生部及使馆联系。目前，仍然留在阿曼的，只剩下李晓桂和护士张小燕二人。

2001年及2003年，阿曼又分别来了两批护士，不过，目前他们也大都已经离开。这些外派的护士皆正值花样年华，除非愿意嫁给穆斯林，否则，在阿曼很难找到对象。为免耽误青春，她们一般在合约期满之后就回国；再不就是练好英文之后到别的国家去当护士。

2003年以后，中国开始重视阿曼市场，许多国有企业纷纷在阿曼设立分公司，自此，阿曼的华人人数才随着中资公司的入驻而有激增。

当今生活风趣

引言

阿曼是个富裕的国家，人均收入高达1.43万美元。加上这里政局稳定，治安良好，投资环境稳定，因此也吸引了一些勇于闯荡的华人到此经商，从事餐饮、家具、服装与小家电等行业。此外，也有不少华人在阿曼的中医针灸、按摩、医疗护理等领域工作。

不过，阿曼华人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还是中资公司的职员。中石油、中水电、华为、中石化、中铁、中建材等中国大型企业，皆在阿曼设立了分公司。根据阿曼中资企业联谊会的统计，阿曼中资企业中方员工的人数已经达到1500名左右。

加上到阿曼经商或在私人企业打工的华人，阿曼华人的总数保守估计已达2000多人。绝大部分的华人来自中国大陆，来自台湾的只有十名左右、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华人则有20多名。

虽然华人人数不多，可是阿曼却有一个阿曼中资企业联谊会，以及一个完全由华人自发组织的阿曼华人华侨协会。虽然这个民间社团还很年轻，却已经改变了当地华人社会的面貌。

突飞猛进的中国企业

在华人迁徙的地图上，阿曼是最新的热点。这个盛产石油的国家，不像邻国卡塔尔、阿联酋那般拼命地发展、建设。在阿曼的首都马斯喀特，看不到迪拜、多哈那种到处是建筑工程的蓬勃景象。阿曼对于外资，更是采取谨慎态度，有条件地对外开放。华人对这个国家所知不多，阿曼对外资企业的挑选，也非常严格，因此2003年以前，阿曼只有零零星星的华人。

2003年可说是中国企业在阿曼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年。这一年，中国企业在石油钻探、油田服务、通讯、道路建设等等项目上纷纷中标，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旗下的数家公司，还有华为技术、中铁18局、中水远洋渔业等等先后在阿曼设立了分公司。中铁18局集团有限公司标得苏尔—古赖亚特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这项总投资5亿元人民币的项目，有多达300多名技术人员参与。而华为技术则标得阿曼全国骨干网项目，中水远洋渔业公司也获得合作捕捞项目。

于是，2003年以后，阿曼华人以倍数增长。“2005年，我出席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时，只有4个家庭的华人出席。2006年使馆办的招待会，已经多出了好多中国人。”阿曼华人华侨协会的会长王志梅说。

除了中资公司外派的中国籍职员，阿曼也有不少华人在外国公司任职。石油是阿曼经济的支柱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43%来自石油工业，石油占出口总值的90%。这些在外国公司上班的华人，多投身于石油领域。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已经取得英、美、荷、日等国的国籍，譬如在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 Corporation）工作的美籍华人杨先洪、王薇夫妇，以及在阿曼石油开发公司（Petroleum Development Oman LLC）上班的美籍华人莫涌、朱富萍夫妇等等。

这些外籍华人凭着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专业知识，在各自领域内取得耀眼成绩，是石油工业里不可或缺的顶尖人才。他们很早即从中国移民到美、欧等地。在接受公司外派到阿曼来之前，他们都做过慎重考虑。经过多番打听，他们发现阿曼社会安定，生活环境相当不错。孩子还在上学的家庭，甚至连当地的学校都细心比较过，才做出决定。朱富萍夫妇申请外派空缺时，有几个选择，马来西亚和阿曼都在考虑之列。夫妇俩颇为喜欢马来西亚丰富多元的文化，可是由于该国没有特别优秀的国际学校，反观阿曼的国际学校则办得很好，名牌大学录取率很高，因此最后选择了阿曼。

	石油公司高层莫涌、朱富萍夫妇在考虑和比较了孩子的就学环境后，才决定过来阿曼工作。

这些白领精英们在阿曼领着优渥的薪水，过着丰裕的生活。

和白领精英们一样，华商同样很满意阿曼的生活和投资环境。阿曼的华商非常少，50名都不到。他们多数从事纺织品、家具、建材等行业，也有一些从事餐饮业等。阿曼并不是他们最初的目标；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先到迪拜做生意，后来才转战阿曼。在阿曼批发窗帘、沙发套的华商李向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李向东1995年就到迪拜打工，1998年自己当上老板。在迪拜站稳阵脚后，2003年他第一次到阿曼考察市场。结果，那短短的几天内，他量布量到手都举不起来。既然货物在阿曼这么受欢迎，他干脆就把生意扩展到这里。现在，为了兼顾两边的生意，李向东每个月都在两地之间来回奔忙。这也是许多阿曼华商的生活写照。幸亏，迪拜和马斯喀特之间不过数个小时的车程，还不至于太累人。

比较迪拜和阿曼两个地方，他认为阿曼的投资环境对外国人更有利。“在迪拜，外国人占的股权一定要低于本国 人，也就是最多只能占49%。在阿曼，15万以上投资额的生意，外国人则可拥有高达70%的股权。此外，阿曼竞争远低于迪拜，因此利润比较高，但生意量不大。而在迪拜做生意，生意量虽然大，不过利润少，开销大。”

此外，阿曼也更适合小资本企业的生存。迪拜有个批发聚散中心，市场往往被大型批发商垄断，大鱼吃小鱼，资本不足的商人难以生存。而阿曼的商人分散全国，因此批发商很难垄断市场。

除了以上种种，阿曼还有一个更吸引李向东的原因：“阿曼除了投资环境更佳，也是个适合生活的好地方。这里人心纯朴，华人之间也没有利益冲突，因此沟通比较简单，不像迪拜，太商业化，人和人之间无法放心交流。”也因此，在阿曼和迪拜都买了房子的李向东，更愿意呆在阿曼。他还积极参与阿曼华人华侨协会，并担任华协的社会事务理事，和当地华人相处愉快，享受着迪拜华社所欠缺的浓郁人情。

阿曼发展虽然比其他海湾国家慢，但前景更为乐观；它开始大力发展经贸，但却不急不躁，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地做，它对外资控制得很严格，经题，一旦批准了外资进入，对外资还是比较公平的，阿曼华商稀少非因为华商不愿意来。如果不是签证难办，相信会有更多华商涌入阿曼。

中华医学在阿曼扎根

1995年，中国卫生部向阿曼派出的第一批医护人员中，包括了两名中医师。从那时候起，中华医学就渐渐在阿曼扎根。虽然在此之前，阿曼就出现了数名中医师，不过，他们一般都在私人诊所行医，譬如大约在1994年抵达，至今仍留在阿曼的中医师施有奇。直到1995年，阿曼的政府医院，才开始有常驻的中医师。

这以后，又有数批中医师与医护人员被派到阿曼。在政府医院行医能更全面地接触到来自各层面的病人，而且也更容易获得病人的信任，因此是个把中华医学介绍给阿曼普罗大众的绝佳平台。不过，在政府医院上班的中医师只能给病人做针灸、拔罐，不能施药。

李晓桂是1995年第一批被公派到阿曼的中医师。在阿曼政府医院工作了一年，她曾给阿曼国王的妹妹看病。她笑说，当时皇家医院的院长亲自把她带到阿曼南部撒拉拉（Salalah）的另一所皇宫，给国王妹妹做治疗。刚开始时，她压力很大，担心国王妹妹排斥针灸，也忧虑自己针扎得不对。很快地，她就发现公主非常平易近人，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 第一批被公司派到阿曼的中药师李晓桂，至今仍留在阿曼。

“我很高兴能在阿曼传播中医医学，让阿曼人认识针灸。”李晓桂说：“我刚来时，敢针灸的阿曼人不多，现在他们都接受了。在其他中东地区如阿联酋，大家多做按摩保健，不敢扎针，可是阿曼人却没问题，有的还主动要求。”

李晓桂有感中医师在阿曼比在中国受政府重视，感觉自己仿佛成了中医权威，很受尊重。许多部长夫人生病，都到医院让她看病。

多数政府外派的中医师在合约到期后，都选择回国。像李晓桂留那么久的非常少。目前阿曼中医师共有十几名，大多数都自己开私人诊所。要申请在阿曼开诊所的中医师，都由李晓桂负责面试评估。

张新平于1997年抵达阿曼。和李晓桂不同的是，他是私人诊所的中医师。他工作的那家诊所可谓“老字号”，从1986年就开始经营，担保人是Sheikha Mohammed Hamed Al Ghazal。这位当官的阿曼人到过中国，看过中医，对中华医学很有信心，眼看其他海湾国家纷纷有了中医诊所，因此起了在阿曼开中医诊所的念头。1997年张新平来到阿曼时，只是以打工的身份在这里当医师。2000年，张新平辞去工作，回中国发展。几个月后，担保人找上了他，提出让他当老板经营这家诊所，他答应了。

如今，张新平既是诊所的医师，也是老板。诊所规模不大，有两名医生和两名助理，但多年来，已经建立了忠实的顾客群。未来，张医师还想拓展推拿业务。

- 张新平本来以打工身份到阿曼当中医师，后来获得担保人赏识，得以接管诊所，自己当老板。

目前，阿曼的私人中医诊所达十几家。和政府医院不同，中医诊所能用中草药。在阿曼，草药属于灰色地带，没有明确的审核标准。张新平希望将来中草药能正规化，不过，他也表示，由于手续繁杂，以他个人之力，不容易办到。

在欧美国家，曾发生中医师因为给病人进行刮痧、拔罐等治疗，而被控告虐待病人的事件。不过，张新平表示，类似的医疗纠纷，在阿曼从来没有发生过。“阿曼人对中医的接受度很高，也很相信自然疗法，因为两地的医学系统相当接近。当地的Hajama和中医的拔罐就很相似。因此，中医并没有碰上很大的阻力。”张新平表示。

虽然中医的前景在阿曼一片光明，不过，阿曼中医师却有隐忧。这是因为近来坊间开始出现一些“推拿中心”与“按摩中心”，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色情场所，令阿曼人对中医有了负面印象。

最近，阿曼又来了一批天津中医学院的中医师，他们都在阿曼的第凡皇家医院服务。天津中医学院是中国顶尖的中医学府，阿曼的华人都认为这批年轻的中医师必然也相当杰出，因此对他们抱以极大的期望。阿曼对中医的接受度本来就相当高，在所有阿曼中医师的努力下，中华医学不难在阿曼发扬光大。

华人华侨协会改变华社面貌

对早期在阿曼生活的华人来说，阿曼这地方正如它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一样，是一片“宁静的土地”，可是，宁静得过分，未免成了枯燥。

直到阿曼华人华侨协会的出现，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华人的生活。

2005年，王志梅与朱富萍于同一天抵达阿曼。这两人原本素不相识，也在不同的公司上班。可是，在阿曼的相遇，注定了这两名女士，要携手成就一些事情。

朱富萍与丈夫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石油公司工作。王志梅的丈夫是石油公司的高层职员，夫妇俩在荷兰与英国等国家待过多年。在欧美国家生活了多年，他们早就习惯了欧美庞大而活跃的华人社群。来到阿曼，发现这里虽然华人越来越多，却是各自为政，鲜少有机会聚在一起，两人于是决定为阿曼华社做一些事。

“另外，我们也感到华人在阿曼的形象似乎不是太好，尤其是华人女性。这几年，不少‘小姐’从迪拜涌到阿曼，搞到华人女性常被人问价钱。我们希望通过社团，提高华人形象。”王志梅无奈地表示。

两位女士都在欧美受过高等教育，非常重视法纪，她们可不愿意随随便便找几个人开个会就当成立了社团。为了令社团有个合法地位，她们经历了不少波折。首先，阿曼政府规定一定要有40名以上的会员，才能申请注册。两人好不容易收集了足够签名，政府又把最低人数的门槛上调到100多名。“刚开始时找会员确实很不容易，大家都不看好，还有人泼冷水。”王志梅说。

后来，他们打听到阿曼石油开发公司（PDO）的外籍职员能在公司内成立社团，而朱富萍又恰巧是PDO的职员，于是，就先在PDO成立了阿曼华人华侨协会（以下简称华协）。不过，朱富萍想到自己迟早会离开阿曼，因此，两位女士和几名理事，不辞劳苦，到处拜访华人争取签名，好向政府申请注册。

华协的第一届会长是朱富萍。第二任会长（现任会长）是王志梅。除了有正副会长、秘书长与财务，华协还有体育、社会服务、公关、旅行等等理事，分别负责不同事务。会员由最初成立时的20多人发展到今天，已有140多人，包括中国、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荷兰等国籍的华人。

	协现任会长王志梅。

除了中秋晚会、元宵聚会等等“例行公事”之外，在王志梅的带领下，华协还举办过许多活动，譬如在国际市场日开设中国美食摊，大家亲自动手做了饺子、春卷、包子、炒饭、茶叶蛋等，让各国人士品尝。这次义卖的收入，部分交给国际市场日组委会用于阿曼的慈善事业，部分用于中国的慈善以及帮助在这里陷入困境的中国人。

马斯喀特的奥运火炬境外传递是阿曼华社的盛事。由于前几站遭到政治异见人士的破坏，阿曼华社对此严阵以待，华积极配合中国大使馆，把华人组织起来到现场助威，并为保安情况做了一些部署。在那段期间，华协也给当地报章发了新闻稿，向阿曼社会介绍中华文化以及在当地生活的华人社会。

2008年除了奥运圣火传递，中国还发生了南方雪灾和汶川大地震等事件，华协积极号召华人和其他社团人士为灾区人民踊跃捐款。

把小孩也带到阿曼一起生活的华人父母不多，主要以已经移民欧美或其他国家的海外华人为主。可是，这为数不多的几个华人家庭，对孩子的中文教育丝毫不敢松懈。华协会会长王志梅为了还在国际学校念小学的女儿，也为了其他的华人小孩，毅然挑起了百年树人的重责，在家办起免费周末中文班，亲自上阵教孩子们中文。中文班在家长们的坚持下一直办了下来，并另外找了课室和曾当过老师的华协会员来教。可是王志梅也没歇下，在一些对中文很感兴趣的老外要求下，又义务开了个成人中文初级晚班，还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在上班的公司开设中文课。

华协成立不过两年多时间，却对当地华社颇有建树，除了使华人渐渐凝聚起来，也促进了华人和阿曼其他族群的交流。

华协的成立，在生活上对阿曼华人之间的互动起了推动作用。首先，除了元宵、中秋这些大型晚会，其他大小，正式与非正式的聚会也多了起来。在华协一众理事的撮合下，来自社会各层面的华人，得以经常聚在一起，大家变着花样做几道菜，为思乡的胃解馋。老华侨李晓桂的家，是阿曼华人的其中一个聚会场所。在她家的聚会里，谁都可以轻易感受到阿曼华人融洽相处的情况。参加聚会的华人，既有石油公司高层，也有中医师与护士，既有在

欧美生活多年的华人，也有第一次踏出中国的华人。大家的人生经验与社会背景都各不相同，但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却能齐聚一堂，过得很开心。

- 李晓桂家办的聚餐，把不同背景的华人聚在一起，享受异乡生活。

热爱运动是阿曼华人的特点。阿曼华人常有篮球比赛、网球比赛，为平淡的生活带来不少乐趣。

华人之间固然和睦，和阿曼人也同样相处愉快。许多华人都表示，阿曼人是个热情好客的民族。29岁的中国小伙子熊飞，就表示阿曼人情味很重，给了他一个家的感觉。“路边等车时，偶尔还有人停下来载你。去乡区旅行时，向当地人问路，他们会亲自把你带到你想去的地方，有的甚至带你到处参观，以尽地主之谊。”熊飞说。

华协有一次办了个假日团出发到阿曼海边看海龟产卵，向路人问路时，生性好客的阿曼人就带他们到处游览，还把他们带回家里做客。临别时华协为了聊表谢意，想给他们一些酬劳，他们还坚决不收。

在这方宁静的土地上，华人享受到了久违的慷慨和仗义之情。

- 2003年，一位英国人Peter Copperwheat开始在阿曼传教，用中英对照的圣经教华人护士英文。一个中文教会渐渐成形。Copperwheat离开阿曼后，中文教会由其他人接任，不少华人受洗。2009年3月13日星期五，在热心的基督徒朱富萍的组织下，华人基督徒在Protestant Church of Oman提供的一间小课室内，开始了第一次中文查经班。

生活虽惬意 却非久居地

阿曼社会近年发展迅速，而马斯喀特的面貌，年年在变。

1995年，被中国卫生部外派到阿曼的医护人员刚到马斯喀特时，整座城市静悄悄的，道路很窄，车子很少，没什么高楼，都是传统阿拉伯式白色房子。当时没有大型的购物商场和超市，买菜要到蔬菜店，买牛肉要到牛肉店。

阿曼国王卡布斯非常重视古迹与传统文化，就连对于城市楼房的高度，都有法律限制，以保留马斯喀特的特色。在竭力保护自身文化古迹的同时，阿曼近年亦不忘加快现代化进程的脚步。“近几年变化很大，道路拓宽，到处都有大型的百货商场。”在当地生活过一段日子的华人纷纷表示。

台湾人胡耀文回忆3年前刚到马斯喀特时，公司附近还是一片荒芜。可是，短短时日里，公司附近就开了又大又气派的购物商场和超市，生活方便了很多。

阿曼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比起来，算是相当开明的。虽然阿曼人不吃猪肉，但也不严加禁止，在特定地方还是可以买到猪肉。这里也允许女性独自开车，在中餐厅还能偶尔见到阿曼女性单独或数人一起用餐，无须男性陪伴。

华人女性大可随心所欲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不像沙特阿拉伯，规定外国女性也必须戴头巾。不过，华人女性一般还是“入乡随俗”，到哪里都穿得端庄得体。嫁给阿曼人的华人女性一般更是把自己包得密密实实，也不太参与社交活动，非常尊重夫家的宗教与文化。驻阿曼国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李自正认为：“这应该是华人女性的自我设限。同文同教的女人，如黎巴嫩、埃及这些地方嫁过来的，反而敢穿短袖短裤。”

在如此一个治安良好，开明友善的地方生活，许多华人开始对阿曼心生眷恋。朱富萍表示，很多外派人员都和她们家一样，爱上了阿曼。他们公司的外派合约，一般一签就要签4年，可是一般外派人员在合约到期后都选择续约，以便在阿曼多待几年。朱富萍和丈夫莫涌，就已经续签了两年合约。

对华人来说，阿曼生活纵使有些枯燥，他们还是可以找到娱乐的方式，因此普遍上不会觉得日子太难过，甚至有的人还觉得，这里赚钱多压力小，可说是个天堂。可是，在一个回教国家里，当华人数太少时，始终还是难以长期留住年轻华人。对单身华人来说，除非你愿意嫁给穆斯林人，否则，择偶始终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因此，单身华人留在阿曼的时间，往往比把家人带过来的华人短得多。

在阿曼留了13年的李晓桂，愿意留在阿曼那么长的时间，主要是因为孩子的缘故。因为工作表现得到上级认可，她多年前获准把儿子韩绪龙接到阿曼一起生活。儿子今年16岁，在American British Academy国际学校上学。李晓桂表示，在国际学校上学没压力，着重于启发孩子的思考能力，他希望儿子能在阿曼完成中学教育。当儿子上大学后，她才会开始考虑回国的事情。

阿曼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外籍人士很难在此获取公民权。再者，阿曼消费高昂，如果没有工作，在这里退休也是难以享受生活的。也因此，再怎么喜爱这个国家，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地方只是生命中的驿站，不可能在此落地生根。

- 华人在阿曼享受宁静平和的生活。
- 蓝天下的阿拉伯白房子，宁静的社区。

协助更多东亚公司立足阿曼

“阿曼一直属于欧美的势力范围，这里有很多欧美公司，来自东亚的公司很少。我想要把更多东亚的公司带到阿曼。”Seven Seas Victory Knights Company LLC的董事经理许建章（Nicholas Koh）说。

Seven Seas Victory Knights Company LLC是一家市场发展顾问公司，旨在协助有兴趣前来阿曼发展，而又不了解阿曼国情，缺乏实际经验的外国公司。据悉这也是阿曼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新加坡公司，除了新加坡籍华人，公司还有台湾和中国大陆员工。

许建章几年前来到阿曼，就发现阿曼和新加坡刚开埠时的情况很相像，有很大的发展潜能，只要好好发展，很有可能成为中东区的新加坡。因此，他想把新加坡的经验，移植到阿曼。

他从2005年开始到阿曼研究当地政策、商情与投资环境，积极建立人脉与商业网络，并深入了解当地文化、思想、政策。“我们会告诉客户公司这项业务是否适合在阿曼发展，如果成功的几率很低，我们会直接告诉他不合适。除非成功几率高，我们才会鼓励他前来投资。”许建章说。他也表示公司不只提供情报与咨询服务，也积极参与客户公司的运作，担任客户公司与当地担保人之间的协调者，确保客户能在阿曼取得成功。许建章的公司于2007年正式投入运作。阿曼亲王Shihab al Said是该公司的董事，有亲王做后盾，因此很占优势。

阿联酋的迪拜是全球商家必争之地，而卡塔尔也努力吸引外商，不少新加坡公司都把区域分公司设在多哈。问许建章阿曼和前两个国家相比如何，他认为阿联酋及卡塔尔竞争太激烈，新公司要在那边发展比较困难，营运成本也太高。而阿曼还是有个有待开发的新市场，充满潜能。

- 新加坡华裔许建章（中）与两名得力助手，来自台湾的胡耀文（左）与来自中国大陆的熊飞（右）。

结语

近代华人闯荡天下，可说很晚才到达阿曼。直到二零零三年后，一个华人社会才逐渐在阿曼成形。

因为社团活动办得不错，仅有数千人的阿曼华社，却展现了海湾区华社少见的活力。华协成功地把各个国籍以及各种不同背景的华人，凝聚在一起。各方华人摒弃成见，在异乡同欢共乐。

其实，想到阿曼发展的华人不少，可是阿曼未必肯全面开放，让那么多华人进入。阿曼要是对中国有多一些了解，肯开放给中国人进来，这里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因此，阿曼的华社会不会继续壮大，取决于中阿之间的对话有没有进一步展开。

- 年青有活力的阿曼华社。

也门

引言

3000多年前，阿拉伯半岛南端，濒临红海与亚丁湾的也门，已有关于乳香等事物的文字记载。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525年，这个中东古代文明的摇篮曾先后出现过麦因、萨巴和赫米叶尔3个辉煌的王朝。7世纪时，一股新的势力入侵也门，从此彻底改变了也门的文化、宗教与政治风貌，这股势力，便是至今仍深植也门的伊斯兰教。

富饶强盛的也门曾多次遭受外敌入侵，奥斯曼帝国从1535年开始占领也门部分地区，1918年才被彻底逐出也门。英国于1839年控制了也门南部区域，繁华的亚丁成为英国保护地。1934年，英国趁也门发生内乱，迫使也门王室承认其对南部的统治权，也门被分割为南北两区。北也门于1962年成立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南也门于1967年驱走英国殖民势力，成立南也门人民共和国，3年后改名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成了阿拉伯第一也是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虽然南北也门人民渴望统一，但因为政治的分歧，以及内外势力的角力，两边关系紧张，数度发生血腥冲突。经过多番斡旋，1990年南北也门终于宣布统一，也门共和国诞生，定都萨那。统一后的也门，政治比以前稳定，但恐怖袭击事件时有发生，国际形象也被盖达组织蒙上阴影。也门至今仍是最贫穷的阿拉伯国家之一，约半数人不识字，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因为经济落后，到也门从商的华人不多，来到也门的华人多是中资公司的公派职员或医疗

队的医护人员。

华人移民简史

公元650年，阿拉伯帝国势力如星火燎原般向四面八方蔓延开来，擅长远航的阿拉伯人从世界各地收集并整理了各种知识，数学、医学、科学都极为先进。当时，也门已懂得进行精细的手术，对麻醉以及消毒都很在行，对眼科等疾病也都有丰硕研究成果。

从那时起，唐朝便不断派出医师到阿拉伯世界去学习精湛的医术。而这段历史，不论是在也门或中国的各种文献，如公元659年的阿拉伯文献《药材》，或穆斯林医师李锡旺的《草药》中，均有清楚的记载。那期间，中国人单单从亚丁采集的药材就多达41种，在整个也门，更收集了142种药材。今天，很多华人耳熟能详的中药如没药、茉莉、乳香、红花及指甲花等，皆源自阿拉伯。两国的医药交流，大大地推动了中华医学的发展。

除此之外，两国的商贸来往也是古已有之。阿拉伯世界刚被伊斯兰教统一的那段时期，中国正处于大唐盛世，双方的文化、商贸都空前鼎盛，而且来往频繁。当时，也门的亚丁是国际大港，世界各地的商人都到此开设商店，许多商人还与当地人通婚，落地生根。一位其亚德王朝的国王在他的著作《国家》中，也有提及亚丁湾上处处停泊着中国船只的情况。中国商人在此贩售丝绸、瓷器、麝香，并从也门购得香水及香料。两国之间的商贸往来直至宋代仍然非常频繁。

明朝初期，明太祖与明成祖皆十分重视海上商路和对外关系。郑和七下西洋期间也曾经走访亚丁等地，进行外交以及贸易活动。

亚丁被英国占领后，依然保持其国际大港的地位。当时，英国各殖民地的人民皆可自由往来，因此有许多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等地的华人途经此处，或在此地做生意。但是，由于当地气候炎热、加上语言不通，很少人愿意长期留下。

到也门独立以前，在亚丁的华人约有300名，他们大多数来自印度，主要从事电焊技工、钟表修理等行业。当时，曾有一位叫作顾锦模的中国人在此开设船员宿舍和餐厅。独立初期，中国人入籍也门并不困难，顾锦模的数名孩子都已入籍也门，并在也门生活至今。

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交通部对外援助办公室（即中国路桥公司的前身）派出了一队工程人员，协助也门建筑一条从荷台达（Al Hudaydah）通往萨那的公路。这是中国在也门最早的援建项目。当时，西方的建筑公司曾估计艰险的荷萨公路需要20年时间才能竣工，但中国援建项目组仅仅用了4年时间便完成。

公路建成之后，埃及军队曾经通过这条公路增援也门革命军，推翻了伊玛目时代的封建政体，建立共和国，故此，荷萨公路也被称为革命之路。

今天，荷萨公路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用。萨那属于山城，没有工业，物资均靠进口，荷台达港口的所有货物通过荷萨公路进入萨那，大大地缩短了运程。

从1979年到1998年之间，中国公司于也门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有近12家中国公司到也门承包工程，并且建立合资企业。

除了协助也门建设公路、医院以及桥梁等基础设施之外，1962年，中国也开始向也门提供医疗援助，派遣医疗团队到也门去照顾于战争中受伤的也门士兵。曾经有一次，伊玛目的势力包围了萨那，其他国家的医生都已经撤走了，只有中国医疗队义不容辞，坚持留下来和当地医务人员一起救助伤者。

此后，中也两国又在1972年、1977年、1979年和1981年，于萨那签署了卫生议定书。直至今日，中国仍不断地向也门派出医疗队，以改善也门乡村和城市的医疗卫生服务。

一千多年以前，中也两国便开始了医学方面的交流。今日，双方重续这一份情缘，让可贵的人道和互爱精神流传下来。

- 萨那老城区里，人们仍在有数百年历史的高楼里生活。

当今社会风趣

引言

也门北方雨水充沛，是阿拉伯半岛上少数能发展农业的地区。也门南方地理位置优越，水产资源也丰富，亚丁自古就是重要港口。可惜到了近代，也门成了阿拉伯半岛上最贫穷的国家，对华人的吸引力也一直不如其他阿拉伯国家强。也门人口超过两千万，华人却只有1000人左右。

也门华人主要来自中资公司和医疗队。中国医疗队自1960年代起，就一直留在当地，为也门人民提供医疗服务。萨那、亚丁、塔兹（Taiz）、荷台达、木卡拉（Al Mukalla）和赛永（Sa'yun）都有中国医疗队，每个医疗队大约有20人左右。医疗队里的医生护士们，一般都服务数年后回国。

华人在也门从事的经济活动，以大型企业为主，主要集中在石油、电信、矿业、工程几个领域。这些外派到也门的企业职员，一般只会在也门逗留几年。民间消费能力不高，搞贸易的民间华商，自然也不多。

虽然华人稀少，萨那倒是有7家中餐厅。这大概说明了中餐在也门还是相当受欢迎的。

贫穷中显现美丽 安全里潜伏危机

一般华人初到也门，心情恐怕都得先经历数次起落。从机场到萨那市区的路上，触目俱是残破不堪的建筑，小贩沿街摆卖旧书报或旧鞋，蒙面纱穿黑袍的女人用力拍打每一辆停在交通灯前的车辆，乞讨一些施舍。“也门连一国之都，都破落至此吗？在这地方日子要怎么过？”到此打工的华人想到将在此地生活好几年，难免心里起了疙瘩。

不过，要爱上也门，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来到也门的华人，绝大部分都住在萨那。不用多久，他们就会发现，其实生活必需品在萨那都可买到，生活不至于太不方便。这里没有其他富裕海湾国家美轮美奂的购物中心，却有密密麻麻的小店铺、小饭店，贩卖各种小吃的路边档也到处都有。也门人摩肩接踵，在嘈杂的街道上寻找他们需要的物品。他们贫穷，但是快乐。

	华人在路边小档口买小吃。

萨那是座美丽的城市。它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据说洪水退却后，诺亚的长子闪决定在此建城。萨巴王朝时，这里就是繁华的都市，赫米叶尔王朝也定都于此。今天，萨那老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城里1万4000多座土楼，每座都有千百年历史。在这世界上最早出现摩天楼的城市里，现代文明的浪潮还未席卷过来，也门人仍然过着俭朴生活。大人们做着小买卖，小孩在巷子里戏耍，当地华人闲来到老城区逛逛，很容易就感染上也门人的快乐。

也门人对外国人友善而热情。看见亚洲人，也门人会微笑着尝试用日语问好。日语行不通，他们马上改成华语：“你好。”在一个华人如此稀少的城市里，也门人能用华语打招呼，可见华人在也门人心目中的分量。

萨那位于阿邦山和纳卡木之间的盆地，海拔2200米，气候温和。阿拉伯半岛上大部分地区夏季时热如烤炉，萨那夏季温度却很少超过30度。海拔高、气压低、氧气稀薄这些现象虽然存在，不过因此产生高原反应的华人不多。一些健康欠佳的华人初到萨那，会感觉头痛、头晕、胸闷、厌食，但只要多休息多喝水，一般数天后都能适应。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2008年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index），也门在170多个国家里排名138。虽然它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可是，和附近其他同样贫穷的国家比较起来，也门的治安无疑好太多了。

不过，小型犯罪不多，不代表也门的华人就可以高枕无忧。2001年，曾有一位中资公司的职员马卫东被恐怖分子绑架。自此，每当发生恐怖袭击或绑架事件时，华人不忘互相提醒，出门要小心。

- 为防恐怖分子，中国公司的宿舍几乎都聘用持枪的保安人员。

2009年3月，一个韩国旅行团在也门西巴姆古城观光时，被炸弹袭击，4死4伤。短短3天后，武装分子再次对韩国派来的代表团发动自杀式袭击，一时间，华人圈子人心惶惶。在也门遭受袭击或绑架的，向来多是欧美人士，华人还可自我安慰，恐怖分子对亚洲人兴趣不大。可是，这次韩国人被袭，华人开始担心自己将成为下一个目标。“这次事件，可能意味着恐怖分子已经不再选择对象，不管是欧美人或亚洲人，只要是外国人，都格杀勿论。也可能他们

只是针对韩国人，不过华人跟韩国人外貌分别不大，也门人怎么分得清？所以，不管是哪个原因，华人的处境都有危险。”在海默油田服务公司打工的华人陈钰表示。

这次事件发生后，中资企业机构协会通过电邮，给也门的中国人发送《安全周报》，指导华人如何做好防范措施。中资公司不鼓励职员离开宿舍，并且告示加强保护人身安全，减少夜归。中资公司一般有自己的厨师，路桥的宿舍里更有乒乓、篮球、台球等设施，下班后大家一起运动或打扑克牌，即使不外出，日子也不算太难过。

- 在大使馆的推动下，也门中资企业机构协会于2007年成立，标志着也门第一个华人社团的诞生。协会属于半官方机构，不过，个体华裔也可参加。协会宗旨包括督促中资企业更自律，遵守当地的法律，为有兴趣到也门发展的中国企业提供讯息，以及帮助遇难华人等。
- 华人吃不惯阿拉伯食物。大多数中资机构都会从中国聘用一名厨师，照料员工的饮食。

工程质量获佳评 中资公司信誉高

自从中国交通部对外援助办公室于1958承建荷萨公路之后，中资公司就在也门占有了一席之地。虽然荷萨公路是援建项目，可是，高质量的工程却为中国赢得了信誉，自此，中国公司在也门的投资日渐增加，发展稳健。

1979年，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了中国公路桥梁工程公司（简称路桥公司），开始承包对外项目。由德国政府提供资金的“1986-1990年萨那一塔兹道路修复项目”，是路桥在也门的一个亮点项目。这条道路连接萨那与塔兹两个新旧首都，自1990年修复完成后至今，路况仍然非常良好，令中国的工程再次受到也门一致好评。

- 路桥公司承建的洛岱尔莫卡拉斯公路，地形险峻，于1992年竣工。

此外，亚丁海堤路修复项目、亚丁污水项目、也门伊卜扎马尔给排水工程，阿木兰—哈贾援建项目等工程，也为路桥公司赢得了更高的声誉。

路桥驻也门分公司全盛时期，员工人数高达1400多人，单是办公室就有20多人。路桥目前正进行着全长14.8公里，双向8车道的“萨那一阿木兰”道路拓宽项目。该项目的工程师、工头等都是中国人，不过，由于也门劳力市场的工资比中国低廉，因此民工都是当地人。

中国在修桥筑路以及建筑方面，占了相当的市场份额。此外，中资公司在通讯领域也有耀眼表现。而中国CMEC公司在亚丁承建了哈斯沃电站扩建工程，中国石化则在也门进行石油勘探。

不过，据了解，近年有不少外资公司，由于对市场了解不足，不了解也门政府的付款能力和办事效率等，因此都亏了钱，最后黯然离场。

路桥公司总经理范振江表示：“也门本土工程企业发展很快，工程承包市场竞争激烈，利润下降，在工程承包市场赚钱已经越来越困难。不过，路桥属于老公司，对也门风俗、市场相当了解，而且声誉好，因此能生存下去。”此外，物价疯狂上涨也是导致许多公司亏的原因，他补充说：“从2007至2008年，沥青就涨了60%。”

- 中国路桥公司总经理范振江。

可以说，华人在也门的发展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老一辈的也门人，都知道荷萨公路是中国路桥建的，这也是也门人对中国最早的认识，因此对中国人一直很友好。

扶伤救难的中国医疗队

从1960年代开始，中国就开始了的对也门的医疗援助计划。1962年，第一批到达也门的中国医疗队人员，经历了惊险的北也门革命，救助了无数受伤的士兵与平民。此后，中国又与也门签订了多项合约，一批又一批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不断到达也门，服务当地百姓。根据这些合约，中国政府向也门派出的医疗人员，每批高达100多人，累计到今天，曾在也门服务的医护人员已有约3000人之众。医生护士们必须留在也门服务两年或数年。

目前，萨那、亚丁、塔兹、荷台达、木卡拉和赛永都有中国医疗队，每个医疗队大约有20人左右。这些医护人员的工作环境相当艰苦，被分配到萨那、亚丁等城市的还好，被分配到偏远地区的医护人员，需面对更大挑战，这些地方通讯设备落后，生活条件差，且交通不便。从萨那乘车前往一些坐落在乡区的医院，要在弯曲破烂的山路上走数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才能抵达。可是，这些华人医护人员，还是秉承着救人济世的精神，尽力向当地的穷困百姓伸出援手。

2006年9月12日，也门总统大选的演讲现场，发生了踩踏事件，一时间伤者无数。中国医疗队的全体人员紧急动员，抢救了伤者近百人。这次事件令中国医疗队受到当地社会广泛赞赏。

根据2007年的一项统计，分布在也门12家医院的163名中国医疗队医护人员，共诊治病人13万人次以上，实施了2万2000多宗大小手术，抢救了严重病患3177人次。

因为中国医疗队对当地的贡献，华人赢得了也门人真诚的尊敬。

民企在穷困土壤上默默耕耘

也门不是富裕国家，国民消费能力不高，难以成为华商看重的市场。可是，也有一些独具慧眼的华商，努力在也门贫瘠的土壤上，寻找利益点。

也门本来连一家外资开的旅行社都没有。一位姓雷的华商由于经常需要到也门处理公务，发现当地旅行社的服务、效率和信誉都欠佳，因此萌生了自己开旅行社，以后自己订机票的念头。2007年11月，也门第一家外国人投资的旅行社——康辉旅行社，在萨那正式开张。

旅行社开张没多久，也没多做宣传，就已有不少外国人自己找上门来订购机票，甚至还有一些国际大公司主动要求合作。近来，康辉的顾客也多了不少也门人。康辉决定乘胜追击，计划下半年在多哈和迪拜开设分社。

陈媛是康辉旅行社的助理主席，旅行社大小事务全由这位年龄仅20多岁的中国女孩负责。她刚到也门时，在石油领域的公司工作，后来老板决定开旅行社，才调派她管理康辉。在此之前，她对旅游业一点概念都没有，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学。经过一年摸索，康辉业务竟然很快就步入正轨。

- 年纪轻轻的陈媛，负责掌理康辉旅行社。

为了响应员工当地化政策，康辉的职员除了陈媛，全是也门人。陈媛表示，聘请也门人也有不少好处，也门人的工资只需中国人的一半，而且中国职员不会愿意长期留在也门，流动性大，每年要放长假回中国，又要顾虑他们不适应也门环境。

可是，聘请也门员工，也有意想不到的烦恼。“也门员工的水平高低不一，而且工作理念和公司不太一致。中国人对服务品质的要求高些。”陈媛说。为此，康辉花了很多时间培训员工，并提供不同的课程给员工进修。

海默油田服务公司是来自中国的民间企业，主要业务是为石油天然气工业提供测量数据、石油天然气设备和整体解决方案，以及优化生产等服务。在国际油气井多项测试技术领域，海默以短小灵活的民企姿态，傲然与多家历史悠久的大品牌争雄。

海默在阿联酋和阿曼都有分公司，而该公司进驻也门，只不过一两年时间，却已经取得亮丽业绩，成功争取到壳牌、康菲、道达尔、中海油等客户，成了也门最成功的中国公司之一。法国道达尔公司曾给他们写过推荐信，盛赞他们的环境安全与健康措施的标准、数据质量以及专业服务都有过人之处。

- 在也门的海默公司全体职员。左一为陈钰，右二为总经理张俊涛。

49岁的丁美玲，是相当早到也门发展的华商。她原本在中国开领带厂，有一次，朋友拿了她的货到也门卖，卖了个满堂红，两人于是决定跑到由门做贸易，2000年，两人来到也门，当时也门市场上很少中国货，全都是廉价印度货。丁美玲经验不足，不知道当地市场能接受低档次的货物，结果，她从中国进口的高档货，全部滞销。

可是，她并没有打退堂鼓。“我抱着中国人不服输的心理，哪里亏了钱，就要从哪里赚回来，坚持继续做下去。”她说。经过几年时间，她摸熟了也门人的品味，在中国大使馆附近开了一家中档的服装、婴儿床零售中心。

零售生意做稳后，丁美玲又做起废塑料回收的生意。另一名华商戴建克经营的塑料回收厂是也门规模最大的工厂。丁美玲和戴建克两家中国公司，就占去了也门塑料回收很大的市场份额。

丁美玲到了也门不久，就把大女儿、大女婿和小女儿都接到也门。大女儿和女婿帮她打理生意，而小女儿陈吉正上着当地政府办的学校。“不选国际学校，是因为要学好阿拉伯语，还是在当地学校念书较好。”丁美玲解释说。一家人经过几年打拼，生意已经有了根基，和各方面也建立了关系，展望未来，也门商机也还不错，丁家母女都有长期留下发展的意愿。

- 在商店里忙着招呼顾客的丁美玲（左一）。

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从商，安全是华人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关于这点，丁美玲认为问题不大。“也门人对中国人不错，一般不会骚扰外国人。不过因为国家贫穷，小偷小摸是难免的，但不会破门打劫或半夜入贼。我们店里装了防盗器。抓到小偷，也不报案，只要他们乖乖把偷的东西交出来就放他们走。”她说。

2008年末金融海啸后，也门的中国人骤然增加了不少。许多其他国家的华商在当地做不下去，纷纷跑来也门寻找活路。

已经年届50岁的安徽人韩明生，和几位朋友下岗后，想到国外闯一闯。他们曾在非洲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待过一阵子，但有感非洲市场太零散，生意难做大，且非洲太多中国企业，竞争激烈。经过仔细比较，他们发现也门虽小，但是萨那人口稠密、政治稳定，因此结束了非洲的生意，转到也门发展。

- 韩明生到也门之前，曾在非洲呆过一段时间。

他们打算在萨那开一家汽车修理厂。“萨那到处都是旧车子，但这里的修车厂技术很差。在这里开修车厂，肯定好赚。”韩明生信心满满地说。修车厂还在筹备中，没能那么快开张。可是，商业嗅觉灵敏的韩明生，很快又发现了一门生意。“在萨那买不到豆腐！”韩明生说：“一斤豆腐在中国只能卖人民币几块钱，在这里我可以卖到人民币15块多。阿拉伯人不吃豆腐，但可以卖给欧美人。”

于是，他们又“顺便”开起了豆腐厂。豆腐厂的筹备过程比较简单，于是，修车厂还没开，豆腐厂倒是先开了起来。豆腐厂投入生产的第一天，韩明生带着一名翻译和一袋袋豆腐、豆干，一家一家找客户，卖给各大超市。“在也门开工厂虽然成本比中国高，但收入相对也高。”韩明生说。

萨那还有一家中国人开的中也文化麦尔佳交流中心。这家中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也门人，涉及的业务相当广泛，包括汉语培训、帮也门人办中国签证、中阿语翻译等等，最特别的是还开办武术训练班。创办人吕鹤松是中国回族，曾在也门科技大学和萨那大学上学。他发现也门人热衷学习汉语，而且随着中也两国商贸来往日增，对翻译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因此萌生创业念头。

- 中也文化麦尔佳交流中心主任吕鹤松（左）与同事杨怀念。

武术班由他亲自开班授徒，教也门年轻人心意拳和回族的查拳。高峰时期，武术班的学生曾高达60人，暑假班更有上百人的纪录。

交流中心自2005年7月开办至今，知名度渐高。回想刚开始时面对的种种问题，吕鹤松不胜唏嘘：“刚开始时资金窘迫，办公设备、租金等都没有。好不容易开成了，又不断有安全局或税务局等的人员来找麻烦。中国人在此创业，这方面还是比较需要领事保护的。”

也门虽然不发达，但不缺商机，留下来的中国人都找到了一条活路。

也门原来规定，外资公司须让当地人占至少51%股份。现在，也门出台了最新政策，允许外国人独资，无须担保，而且只要六七万美元的资金就可获准经营。这项政策实行后，相信将吸引更多华商到也门开辟市场。

其他资讯

张工墓：中也友谊的象征

萨那近郊山坡上，有一处埋葬着华人先贤的墓地，俯瞰着整个萨那城。这座墓地，就叫张工墓。墓地旁那条蜿蜒盘旋在崇山峻岭中的公路，正是闻名的荷萨公路。

1962年，荷萨公路建成，一名叫张其弦的工程师，在检查施工现场时，不幸因车祸过世，英年39岁就客死异乡。也门政府感念中国工程队的贡献，在荷萨公路旁拨了一块地，让中国驻也门大使馆在这里修筑一座墓园，把张其弦葬于此处。墓园里一块硕大的碑文“张其弦工程师之墓”，由时任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题字。从此，这块墓园就成了当地华人口中的“张工墓”。

每逢清明节，驻也门中国大使馆、各中资机构以及医疗队的代表，都会到这里扫墓，以鲜花和美酒祭奠英灵。

5000多平方公尺的墓园处处栽满鲜花，芳草萋萋傍碧亭。40多年来，在也门亡故的华人超过100名，其中50多名葬在此处。这些华人，有来自路桥、中建等公司的工程队人员，有也门各地中国医疗队的医生护士，也有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不管来自什么领域，他们对也门的发展，都有过贡献，也在此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 张工墓里一座座坟墓，躺着一个个回不去的中国人。

一家餐厅两代情

在亚丁机场，只要告诉出租车司机，你要到“中餐厅”，他们就会直接把你载到众胜餐厅（Chinese restaurant）。众胜餐厅如此深入人心，不只因为它是亚丁唯一的中餐厅，更是因为它从亚丁还是英国殖民地时就开始营业，见证了也门争取独立，步入统一，走向共和的过程，陪伴也门人度过了几十年岁月。

这家餐厅简陋得令人意外。陈旧的桌椅、冰箱、灯、电风扇，以及几盏蒙尘的灯笼，昭示了一段悠长的岁月，令人霎时时空错乱，仿佛回到战前的时光。

餐厅老板顾升贤62岁，出生在中国大陆，潮州汕头人。1948年，父亲把他和母亲接到也门；那年，他两岁。父亲顾锦模是船员，由于当时打仗，船停在亚丁开不了，于是就留了下来。1950年至1963年，顾锦模开始在亚丁经营船员宿舍。每当有船入港，他就亲自到港口招徕生意，他的宿舍包吃包住，费用廉宜，因此很多中国船员都到他那里下榻。

顾锦模过后再陆续把弟弟和母亲也接到亚丁。他后来再娶了一位也门太太。二太太的父亲是印度迁来的华人，母亲则是也门人。顾锦模和这名太太，共生了3个女儿和两个儿子。

后来，亚丁船务骤降，港口萧条，船员宿舍的生意一落千丈。顾锦模决定改行，1963年6月15日众胜餐厅正式开张。隔年，中学毕业的顾升贤就在爸爸的餐厅帮忙，然后继承父业，一直到现在。顾升贤在英国殖民政府办的学校上学，说得一口流利英语。

餐厅的厨师是香港聘来的，主要做英国人生意。由于父子没有经验，刚开始时餐厅一直亏钱。南也门独立后，英国人走了，餐厅生意反而更兴隆。当时众胜餐厅在也门算是比较高级的，也门官员要请客，一般都会到他的餐厅。

多年过去，众胜餐厅的辉煌已在时间里褪色。现在，众胜餐厅只是亚丁一家毫不起眼的小餐厅，是也门人不忍挥别的记忆。餐厅的顾客一半是忠实的也门顾客，一半是慕名而来的华人及欧美人。曾有一些中国人在此开中餐厅，不过没几个月就关门大吉了。“有我在，别人开不了，他们无法和我竞争。”顾升贤自豪地说。

不过，他没打算扩张营业。“不能太贪心，有赚就好了。正如阿拉伯语说的，用两只手吃饭会噎着。”他说。

顾升贤晚婚，娶了一个香港太太。他的父母有感二太太所生的两个小儿子都不像中国人，不会说华语，完全阿拉伯化了，因此坚持要顾升贤娶中国媳妇，把血统保留下来。目前，顾太太和3个女儿都在香港，只有他孤身在也门。“女人在这里没地位，我不想女儿嫁给也门人，这里也没有别家中国人，所以女儿到了开始上学的年龄，就叫太太回香港，让女儿在香港接受教育。”他说。

独立前亚丁曾有约300名中国人，现在全都走光了。他的父亲、母亲、奶奶都过世了，叔叔也回中国了。亚丁常住的中国人，只剩顾升贤一人，其他的都是在此短暂逗留的中资企业员工。他说自己不太留恋亚丁，打算退休后就回香港。“会一直留在也门，只是因为经济问题。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感觉自己还是个外国人。脸孔不一样，去到哪里，都还有人要查看我的护照，很没意思。”他说。

他的店面是租的，租金每年上涨，餐厅利润逐年下降，令他意兴阑珊。到他决定离开也门那天，屹立多年的众胜餐厅，也将走入历史。

- 历史悠久的众胜餐厅，令人犹如跌入时光隧道。
- 众胜餐厅老板顾升贤，两岁就来到也门，一辈子都在经营这家餐厅

结语

在阿拉伯半岛上，也门是如此与众不同。也门曾是阿拉伯半岛的文化与经济中心，如今，却是最贫困的国家。当生活在其他海湾国家的华人，出入于星级酒店、豪华阿拉伯风洋宅、大型购物商场时，在也门生活的华人，穿梭于古老建筑林立的小巷里。他们无法享受现代化城市的便利，却能沉浸于也门独特而浓郁的文化氛围中。

在也门，华人真正受到了阿拉伯人的接纳，没有歧视，没有敌意。这除了是因为也门社会贫穷，人心单纯，也许，也因为近代华人为也门作出了不少贡献，而也门人和华人之间，更有一段千年前深植的情缘。

- 闹市中席地而坐的也门人与古老的建筑相映成趣，连华人也感受到那份悠闲氛围。

约旦

引言

上亿年前，这里曾经是被海水覆盖的大洋深处。随着地壳的隆起，海洋变陆地，奇迹般的地貌，赋予了约旦独特的美丽——红色的岩石、连绵的沙丘、辽阔的荒漠，仿佛讲述着这片国土所曾发生的故事。

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约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佩特拉王国，这里曾是当时的陆路交通要塞。从历史遗迹中，往日的繁华，依稀可见。经过世代的变迁，原是巴勒斯坦一部分的约旦，先后被亚述、巴比伦、波斯、马其顿、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英国统治，如今是由哈希姆家族统治的独立王国。

约旦只有4%的土地可以耕种，其余都是戈壁、沙漠，水资源严重缺乏，而且充斥着数量极大的巴勒斯坦难民。现实的贫困与失业问题，让很多约旦人纷纷到他国打工，这些侨民的汇款是约旦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有人走出去，同样也有人走进来。虽然约旦的经济并不发达，但是社会较为稳定、安全，这吸引了一些人来到约旦谋生，其中也包括近万名华人。

华人移民简史

最早定居于约旦的华人，来自台湾。

在1977年，即约旦和中国大陆建交之前，它长期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那时，出现在约旦的华人，基本上全都是来自台湾的政府官员、工程人员或商人，他们在约旦、台湾之间往来穿梭，待工作结束之后便离开。

其中，有两家华人因与约旦王室的不解之缘，决定安顿在这个遥远的阿拉伯国家。

20世纪60年代，蒯松茂以台湾大使馆武官的身份来到约旦。两年之后，他的妻子杜美如，即当年上海滩传奇人物杜月笙的女儿，也获准前来定居。由于约旦王室对中华文化情有独钟，蒯松茂在这段时期和王室成员交上了朋友。一次闲谈中，他们聊到世上许多国家都有中餐厅，为什么约旦却没有？但是，当时他们只是一笑置之，双方都没有认真看待这个现象。在约旦与台湾断交之后，蒯松茂回到台湾去，然而，已经适应约旦生活的他，开始感到迷茫，于是又返回了约旦。

这时，叫他意想不到的，王储哈山居然将“约旦之星”的称号颁发给他。这在当地是最高荣誉，作为一名外国人的蒯松茂，感到光荣之余，自是感动不已，更是坚定了留在约旦的心愿。于是，蒯松茂在退役之后，一次过取出了自己所有的养老金，然后在安曼开设约旦的第一家中餐厅——中华饭店。

	年逾80的蒯松茂和他的中餐厅“中华饭店”。

而另一位老华侨来到约旦的经历，更是叫人意想不到。1974年，出访台湾的约旦国王，爱上了跆拳道，便选中当时仍在服兵役的陈秋华到约旦皇家卫队担任教官。在70年代的台湾，当时的经济刚刚起飞，百姓的生活已经算是很不错，而远在中东的约旦又是那么令人感到陌生。陈秋华无法想象这个沙漠中的小国情况究竟如何，还让妈妈和弟弟到部队去替自己求情。然而，“军令难违”，陈秋华最终还是来到了约旦。

在约旦，虽有翻译帮助授课，但像乘搭公车、上街买菜这样的日常生活，就成了问题。陈秋华在每天工作结束后，自己一个人从皇宫跑步到城市中心学习英文、阿拉伯文。而约旦那以大饼为主的食物，也与中餐相去甚远，让他实在是吃不消，“那时的我一个月瘦了几公斤”。不过陈秋华扎实的身手，以及踏实努力的品格，深受王室的看重，很快地，他就被钦点为王储的健身教练，国王甚至还决定将跆拳道推广为全国运动。

偶然的约旦之缘，不只是成就了陈秋华的事业，也赋予了他一个完美的家庭。来了约旦3年之后，陈秋华就在安曼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道馆，还把同样懂得跆拳道的弟弟陈得雄接过来，帮助他一同训练约旦国家队。不仅如此，他也正因为来到了约旦，巧遇当时担任约旦航空公司空姐的香港女子高怡怡，两人共结连理，并且选择留在约旦定居。陈秋华如今已入籍约旦，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十分满足。“我很感恩，这30多年来，所有的一切都是这片土地赐给我的，我甚至从来没有问过自己的薪水究竟是多少。”

继蒯松茂和陈秋华之后，来到约旦长期居住的华人一直稀稀落落。除了十来位因为通婚而到来的妇女，就是数量少之又少的华人留学生。

直到1999年，约旦和欧美国家签署纺织品免税协议，对出口服装需要配额的中港台地区而言，到约旦来投资建服装厂，无疑是个不错的商机。于是有香港商人在这里设立了第一家华人制衣厂——永芳厂，随后，大量的台湾商人纷纷抢滩登陆，这种趋势在2002年达到高峰。鼎盛时期，华人制衣厂共有22家，华人厂主、管理人员以及工人的人数加起来多达三四万。

2000年，约旦亚喀巴（Al'Aqaba）免税区开放了。消息灵通的中国商人开始进入约旦一探门路。2003年，约旦为了扩大其海外投资规模，曾经短暂实施对持中国大陆护照的公民施行落地签证的政策，这些因素也令前往约旦的华人人数日渐增加。

当今社会风貌

引言

随着经济的衰退，华人制衣厂纷纷关闭，一些华商也撤退了，如今约旦华人人数已经回落到一万左右，这其中有七八千人是在制衣厂工作的女工。她们来自中国各地，以江苏居多，居住在约旦的3个工业区：伊尔比德（Irbid）、沙哈（Sahab）和卡拉克（Al Karak）。而以浙江人为主的华商都聚集在亚喀巴，数量有100多人，流动性较强。除此之外，真正长期居住、生活在约旦的华人，计有200余人，大部分安家首都安曼。

真实的约旦与人们对中东国家的印象大相径庭，这里平静而安全。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华人总是这样安慰初来乍到的华人：“约旦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经济颇为繁华的免税区——亚喀巴，更是一派悠游、闲适的景象。那里的商人说：“即使你手里拿着十万块走在街上，也没有人抢。在穆斯林的脑海中，没有‘眼红’这个词。”

不同于其他阿拉伯国家，在约旦的华人移民中，入籍并不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因约旦皇室对中华文化的兴趣浓厚，与王室往来，对于一些华人来说，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遥不可及。有的华人也因此得到了约旦的国籍，为他们在当地的生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约旦的相对宽容，也使华人的佛教和基督教组织在当地出现，并且与当地人有深入的互动。如此情况即使在很多非穆斯林国家也是不多见的。

身兼多职的约旦华人

在约旦安家置业的华人，数量不多，但日子都过得很惬意。虽然谈不上豪宅名车，但至少居住宽敞、出外方便。其实约旦的贫富差距颇为悬殊，能够留下定居的华人，都较富裕。不过他们并不是做什么大生意，而是个体户的业务经营，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因为约旦华人少，做什么都能赚钱。不过赚的钱也只是够过我们的小日子，供孩子读书，为自己养老。”

因为国家小、经济欠佳、市场有限，约旦的华人都是身兼多职，事必躬亲。“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大家的口头禅，因为一种生意总是做一段时间就淡了。为了保持收支平衡，一定要做多重准备。

无论是留下来的华人留学生，还是因为机缘巧合停驻于此的外派人员，每个人几乎都做过华人能够从事的所有行业：贸易、中餐、翻译、制衣厂、承包工程、中医推拿等，事业起起落落、生活忙忙碌碌，倒也都赚得一份安稳、平静的好生活。

陈士忠十年前来到约旦。曾经在中国江苏国有皮鞋厂做厂长的他，因为工厂倒闭，带着一批员工到海外的华人工厂“再就业”。在公司打工的5年里，他前后换过15个岗位。现在已经有了自己公司的陈士忠，既经营工厂食堂，又为其他工厂提供食材，还代理劳务公司的管理业务。只要所属劳务公司的中国工人在约旦出现任何纠纷，不论罢工还是交通事故，都由他出面处理。“我的手机24小时不关机。”陈士忠虽也做中餐生意，但生活却很阿拉伯式，他说这是因为公事繁忙，“一边开车，一边吃大饼，就当做一顿饭了。”如今陈士忠的“梦想”都已成真：买房、买车，送孩子到美洲读书。“我没有白来约旦，出国前为自己制定的5年计划，都已经实现。现在，我在为实现第二个5年计划努力。”

与其他中东国家相比，约旦华人觉得经商的限制并不算大。“我们都是小本生意，所以没人管。”尽管如此，人在异乡还是难免要受委屈。像很多国家一样，在约旦做生意也是必须与当地合伙人合伙经营，人地生疏，自然要付出高昂的“学费”。

在约旦已经15年的俞舟，前后被合伙人骗光了10多万美元。做贸易被骗货，做餐馆被骗走厨师和场地，开公司被骗钱。他曾一气之下，远赴塞浦路斯摆摊卖货，几年后才又卷土重来。

在俞舟第三次东山再起，创立了约旦的第一份华文、阿拉伯文、英文3语商业报纸——《金桥商报》，以3种语言为中、阿商家刊登广告。让他感到又惊又喜的是，第一期报纸就已经取得盈利了。报纸不但摆放在约旦的商铺、饭店内，在中国义乌阿拉伯人聚居的阿拉伯村也能看到，而这些都是俞舟一个人张罗。虽然他有自己的公司，但是约旦员工只负责拉广告。其他所有的排版、印刷、发放，他都一个人一手操办。每天俞舟把报纸放在车子里，谈生意、办事情，哪怕只是吃顿饭，临走前，总会向店主询问，可否放一些自己的报纸在店里。不过他现在再也不担心被欺骗了，因为“我的合伙人就是我太太”。此外，他还同时兼做旅游、贸易、工程等多个项目。

- 在约旦居住了十多年的华人都身兼多职，相聚一次不容易。从左到右为从事餐饮业的陈士忠、《金桥商报》主编俞舟和中医苏先生。

红海边上平静淘金的华商

坐落在红海边上的亚喀巴，风景秀丽，港口风平浪静，是约旦唯一的一个出海口和贸易进出口集散中心。自从2000年这里设立了免税区开始，擅长靠中国货打天下的华商也开始挺进亚喀巴淘金。他们有的直接来自中国浙江、福建，有的是之前的华人留学生，有的则从东欧、迪拜一路下来。

陈先生是第一个到亚喀巴开店的华人。在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捷克都闯荡过的他，第一次到约旦考察，就被这里的安宁与平静吸引。“这里的警察不贪污，给钱都不要。虽然约旦的市场有限，但对比之下，仍比为了赚钱搭上性命的环境好上百倍。”陈先生当时就决定把大本营转移到亚喀巴，并选择了市中心办公楼下层的门面作为自己的店铺。

	第一个来到亚喀巴的华商陈先生在自己店内。

其实做生意都不会一帆风顺，陈先生也不是一下就掌握了这里的生意秘诀的。初到约旦，习惯了欧洲进货方式的陈先生一次进了几货柜同样的商品，结果夏季摄氏50多度的高温，热得所有的鞋子都开胶了。“而且约旦人口稀少，这么多的货哪里卖得出去。”

那时他和太太只能每天看着满屋子的鞋子干着急。后来经朋友指点，陈先生才开了窍，在约旦上货，一个货柜至少要有几十样货品，以零售为主。他开始针对上班族的喜好，主打品质好、价格适当的商品，生意渐渐好转，也积累了不少回头客人。开始几年，他的年收入可以达到六七十万人民币，颇为可观。现在，由于整个贸易环境的萧条，年收入降到了三四十万人民币。

不久后，华商的主力军——浙江人也来到了亚喀巴。他们看中了市中心平民价位的闹市区，租下一幢店屋，楼下卖货，楼上住人。七八家华人商店，就这样分散在阿拉伯人的商铺里，没有华文招牌，没有特色服装，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与其他店铺的差别。但是当地人还是喜欢进去逛逛，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是华人卖的货，价格一定不会太高。“我们的脸就是招牌。”华商们指着自己说笑。

2006年，亚喀巴出现了中国城。其实，这个中国城只是一座3层小楼，外面有用阿拉伯文和英文写的“中国城”字样，里面有25家华人商店，都设在一层。因为华商知道阿拉伯人懒得爬楼梯，所以没人愿意租用二三层的商铺。虽然商城只有一层有商家，但每到周末，客流量还是相当庞大，很多客人从安曼特地过来血拼。中国城的老板是一位约旦的地产商，华商多来自中国义乌，几年经营下来，在约旦已经逐渐为人所知。

- 亚喀巴中国城外观。

在亚喀巴，华商们除了琢磨生意，担心的事情并不多。安定的治安和纯朴的民风，让华商们感到“约旦人是全世界最好的”。华商小王19岁刚到亚喀巴时，不懂阿拉伯语也敢到街上看市场、找店铺，他说：“这里95%都是好人，即使是坏人也坏不到哪里去。如果遇到事情，10个人中至少有9个人会来帮忙，那你还怕什么？就算有时你自己生气，约旦人还会来劝你不要生气、不要着急。”

对于这些商人来说，惟一不能忍受的是天气。每到夏季，亚喀巴的平均温度就要高到50度左右，天干地燥，十分不适合人类居住。在室外暴露3秒钟，皮肤就有焦灼的感觉，走上100米路更是不敢想象。这些华商们每天在太阳升起前就要把空调的冷气开足，等到太阳落山，才会把当天卖出的货补上。

虽然大家总抱怨约旦人少、收入低、购买力差，但是和其他国家危险又饱和的贸易环境相比，华商们还是不会轻易离开亚喀巴这块平静、悠闲的好地方。

- 中国城内的华商店铺。

制衣厂——约旦华人大本营

华人移居他国，经常是凭借着这个国家的某些看似不足称道的政策。当年的一个“零配额”，就使约旦的华人口因华人制衣业的发展而激增。如今，约旦的华人有八成都生活在工业区的制衣厂内。他们中有港台的工厂老板和管理人员、大陆的技术和后勤人员，以及数量庞大的女性工人，大家称之为厂妹。

制衣厂刚刚进入约旦的时候，可谓困难重重。约旦最大的华人制衣厂富绿公司的负责人吴厂长说，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才使生意步入正轨。“刚来时很苦，什么都没有，都是自己慢慢建起来的。而且语言不通，出货、招工都有困难。尤其是生活适应很难，别说适应文化，就是华人工人适应水土都要一段日子。那时全厂从上到下，大家常常生病。”

- 台湾富绿制衣厂吴厂长和他的女儿。

在工厂，一般的管理人员每4个月可以回国一次，探望亲眷；而厂妹们为期两年的合同，虽有春节探亲，但是大都舍不得昂贵的机票和高额的加班费用，一干就干满两年。这些女孩子们非常年轻，多数在20岁左右，“想出来看看世界”是她们选择来到约旦的最大原因。然而她们工作在工厂，吃住在宿舍，工作朝八晚五，有时还有2到4个小时的加班，每天下班后已经很疲惫，洗漱后就快要到凌晨了。只有周末的时候，工厂的大巴才会载送她们到附近的市区去买些生活所需。

两年下来，别说世界，就连约旦对她们来说，都还是陌生的。即使有少数大着胆子毁约偷跑出来的，也很难找到生存空间。好在她们每月收入最低的也有400美元，如果努力加班可以拿到七八百元，平日里又没什么花销，大部分都可以存起来做积蓄。

制衣厂老板都喜欢聘请华人员工。“约旦人虽然纯朴，但是没有技术，而且出勤率低，做事拖拉，每天喝茶、上厕所、聊天、打扮就要占去很长的时间，加上当地法律规定，穆斯林女子不可以加班。反之，华人吃苦耐劳，出来了就是为了多赚钱，都喜欢加班。”

作为厂主，近年来的管理压力越来越大。欧美的订单客户会定期来工厂检查工人的工作环境，食堂饮食、居住条件、休闲生活都成为衡量厂方是否压榨员工的标准。富绿制衣厂就在厂区内为员工设立了电影室、图书馆、棋牌室、卡拉OK厅和长途电话房。他们还从大陆聘请了一位大夫，每日与员工一起上班，以防某些工人突发疾病。

随着近年来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中国薪水的提高，使制衣厂招工越来越艰难。大多是独生女的女工，也不如以前的工人受得委屈，维权意识也越来越高。工作时间稍长、汇率下降，都会引起工人的罢工，但是毕竟异国他乡，她们还是受制于雇主，不敢随便卷铺盖走人。谈起这里的生活，女工们说：“满意度还算可以，就是有些枯燥，工作压力不小。”

- 制衣厂内壮观的工作景象。

宗教团体传播华人关爱

在保守的穆斯林国家竟可以找到华人基督教和佛教的踪迹，并发展得颇具规模，是约旦华人社会的一个惊喜。

在约旦，大部分长居此地的华人都安于经营自己平淡的家庭生活，很少有人抱有弘扬中华文化的远大目标。因此，除了台湾驻约旦的经济文化办事处组织的旅约华侨联谊会和每周一次的华文补习班外，约旦鲜有民间的华人团体。

但是华人基督教会的信徒在约旦却有250余人之多，主要是制衣厂的工作人员，主持者是来自新加坡的徐君华牧师及其夫人。

教会的礼拜在伊尔比德市一间阿拉伯人的教堂内进行。每到周五的傍晚，这间教堂都被华人挤得满满的，偌大的教堂，一时之间非常热闹。传到街道上的赞美诗的声音，与清真寺的祷告声，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约旦的基督徒不超过全国总人口的5%，因此当地的阿拉伯基督徒十分乐意把教堂借给华人使用。他们说，这样可以鼓励当地人参加礼拜。

- 约旦华人基督教会的礼拜，每次都会聚集200多人。

工厂女工参加基督教会，起初都是因为约旦的工厂生活实在太枯燥，出于好奇或者无事可做，过来看看。她们在这里畅吐心事、祈求祝福。平日里徐牧师与他的太太还会到各个厂区的宿舍去探望、讲经，久而久之、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空虚，因宗教的渗入而得到了舒缓、解放，寂寞的心灵也得到了鼓励和安慰。

徐牧师和徐太太从新加坡来到约旦已有七八年之久，一直居住在离工业区较近的伊尔比德，为工厂女工们传播福音。开始的时候，他们对这里的饮食、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都不适应，“新加坡人很直接，这里的人却很含蓄；新加坡人很守时，而这里5分钟就是半天。”

- 来自新加坡的徐牧师和太太。

不过这么多年下来，早已入乡随俗的徐牧师感到自己十分幸运，“在穆斯林国家传播基督教有很大压力和困难，但是这里华人基督教会的土壤非常好，当地的阿拉伯基督徒也十分友善。”

而在约旦活动了十余年的慈济，更是深为当地人所接纳。在约旦，为慈济工作的志工有45人之多，他们不分宗教、种族、国籍、天主教徒、回教徒、台湾人、大陆人、约旦人，甚至连约旦的公主都是他们的会员。

而约旦慈济的负责人，正是老华侨陈秋华。他与太太和弟弟陈得雄，每月都深入到当地生活最困苦的贝都因人、巴勒斯坦人的家庭，送上生活用品，询问是否有困难需要帮助。

他们每到一户，都双手合十，行礼问候，而当地人虽然是穆斯林，也跟着以双手合十来回应。小孩子们还模仿说“阿弥陀佛”，然后亲热地互相亲吻脸颊。供养孩子读书、提供医疗费用、帮助生活所需，都是约旦慈济对当地社会的回馈。

陈秋华说：“一个月探望一次，根本不能够解决他们一个月的生活困难。我们做的就是陪伴他们生活，传播爱。很多困难的家庭，我们都是一直陪到老人往生。”

知足、感恩、善心、包容是约旦慈济人一直在传达和自勉的精神。陈秋华说，“我们做这些，其实是让自己得到更多，更加欢喜。”

其他资讯

约旦的第一个华人女婿

在约旦，华人间总是笑说，俞舟是约旦华人“第一人”。这个“第一”并不是指他来得最早，也不是说他是华人首富，而是指他开创了华人与当地妇女通婚的先例。

十多年前，俞舟的父亲来约旦出差，看到几元钱的中国商品，在这里都可以卖出上百元的价格，感到阿拉伯国家商机无限。回国后，便把还在读书的儿子送到约旦留学。

毕业后，俞舟就操着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和英语开始在约旦做生意。但是由于几度合伙人选择失误，让他亏得血本无归。正当对约旦彻底失望，打算返乡回国时，俞舟认识了现在的太太苏哈。

苏哈说：“我可能是约旦唯一——一个嫁给华人的女人。很多人都不理解我的选择，包括我家人，直到结婚一年后，他们才接受我的丈夫。”与穆斯林结婚必须要加入伊斯兰教，俞舟因此也成为了穆斯林，把家永远地安顿在约旦。

两种文化因为爱情而结合，看到的更多是对方文化中的传统美德。“阿拉伯女孩内心善良单纯，人好、勤劳。我是在我最失意的时候结婚的，因为生意刚刚失败，所以也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只在家里请了几个朋友，喝喝茶、吃吃中国带来的瓜子，但我太太没有一点怨言。”俞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觉得心存亏欠。

而在苏哈眼中，她的丈夫就是真主赐予的礼物，善良、能干、英俊，做饭一流、做生意也是一流。“当时我惟一的烦恼就是，他是不是一个好人。我们在药店相识，直到决定结婚以后，我才知道我的丈夫有很好的房子和自己的生意。”按照苏哈的说法，穆斯林认为，别人的金钱是别人的，与己无关，即使已经拥有的钱财，也可能随时消失，因此是否富有，并不是她选择丈夫的标准。惟一让苏哈有一点小小的不满的就是，华人很难接受阿拉伯人向往的12个孩子的大家庭。

如今他们的二儿子已经开始咿呀学语，俞舟的生意也很平稳，苏哈便与丈夫合作，成为约旦第一份华、阿、英3语报纸的老板。虽然家庭内外、大小事情都要两人亲自动手，但是两种文化的融合，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这个中阿合璧的家庭生活方式很华人化。约旦物价奇高，因此平时的生活用品、中餐调料等，大到家具电器，小到文具用品，都随着俞舟的集装箱从中国运来。平日的三餐，也是中餐居多，就连他的太太做起中餐来，味道也很地道。

他们的两个儿子，都有着中、阿两个名字，对中华文化充满了亲切与好奇。字正腔圆的“这是什么？”是他们每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苏哈说：“我希望他们从小就学习华文，因为他们是华人。”

- 幸福的中阿合璧家庭。

约旦跆拳道——华人的重大贡献

跆拳道是约旦在世界竞技比赛中，成绩最好的项目，也是约旦人最喜欢的全民运动之一。现在全约旦约有十万人学习跆拳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仪式上，在为数不多的约旦代表团团员中，有一位黑头发黄皮肤的团员，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台湾华人陈得雄——约旦国家队跆拳道的教练。

跆拳道传入约旦仅有30多年的时间，它能在全国普及，要归功于陈秋华。当年陈秋华因跆拳道来到约旦，从事跆拳道的训练工作，约旦的许多军警都是由他训练出来。

从1977年，陈秋华成立约旦第一家道馆——安曼道馆到现在，约旦已经有了近百家跆拳道馆，影响巨大。

因陈秋华与陈得雄两兄弟都是慈济的成员，跆拳道也成了他们喜结善缘的桥梁。不少贫困家庭的孩子都在陈秋华的道馆免费学习。不仅如此，他还每月支付他们20第纳尔作为每次来学习的交通费。“车费足够让孩子们从家里往返市中心，但是从市中心到山上的道馆，我要他们自己走路来，不能让孩子们太娇气。”陈秋华不仅传武，也育德。同时道馆也提供一些清洁和看守的工作机会，让生活困难的家庭有一些收入。

在陈秋华的道馆中，最年长的学生已年逾花甲，最年幼的才3岁。学生中既有达官显贵，也有贫困的难民，所有的学生若聚在一起，可以称得上是约旦社会的缩影。

- 陈秋华的跆拳道馆中最年长的学生和最年幼的学生。

结语

很多约旦华人都说，自己没有白来约旦。外人眼中保守的穆斯林国家，能做到让外来移民对它心存感激，必有它的迷人之处。

尽管在小小的约旦没有华人巨商富贾，也没有华人州长议员，但是一介平凡百姓能够实现自己的小小愿望，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就是一种成功。这些平凡的成就，华人在约旦做到了。

- 约旦华人的店铺外头，挂着传统色彩浓厚的古典灯笼，象征着他们的身份。

叙利亚

引言

叙利亚可能是被外界误解最深的国家。它地处伊拉克与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些冲突不断的地区之间，又一直被欧美一些国家冠以“邪恶轴心”的称呼，这让大部分人对它感到既陌生恐惧，又难以接近。

其实，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人类居住。它的首都大马士革，传说中曾是犹如天国一般的玫瑰之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首都之一。叙利亚拥有多种文明留下的遗迹，《一千零一夜》的古老传说、罗马帝国时期“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帕米拉（Palmyra）、阿拉伯帝国的伍麦叶清真寺等，数不尽的历史在这里交汇，见证着人类的文明。

作为阿拉伯半岛历史上最为繁荣的区域，在7世纪以前，叙利亚是基督教的发祥地和传播中心。而后，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东地区的扩张，特别是在因反抗十字军东征而名垂青史的萨拉丁统治时期，大马士革更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中心。

正因为文化底蕴的深厚和历史的辉煌，大马士革在19世纪下半叶，发展为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阿拉伯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中心。而在之后的反对侵略、殖民和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叙利亚也是阿拉伯国家中的急先锋。

对西方文明的强硬抵制，使很多人对这个阿拉伯的文明中心望而却步。只有走进叙利亚并生活在其中的人才会真正了解这片土地的浪漫神秘和多姿多彩。而在叙利亚为数不多的华人，对这里也是赞美有加，被天方夜谭的神话彻底征服。

华人移民简史

叙利亚作为海陆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华人在唐代便已经踏足于这片土地。叙利亚的沙漠绿洲帕米拉，以及丝绸之路最西端的阿勒颇城（Aleppo），也都被记载于中国历史文献中。

尽管两国之间很早就已经有了通商往来，但是，对于大部分华人而言，叙利亚一直都只是存在于天方夜谭的神话传说中，犹如阿拉丁神灯般神秘莫测。即使到了1956年，叙利亚和中国建交，两国有了商业往来，也因当地的诸多限制，没有华人愿意到这里定居。

第一个真正移居叙利亚的华人，直至1963年才出现。她是为了爱情而放弃一切，跟随丈夫来到叙利亚的香港华人谢丽霞。她与叙利亚第一个被派到中国的留学生亚谷在武汉大学相识，他们俩既是邻居，又选修同一科系，双方因而有着共同的语言，从相识、相知到相爱，一切都仿佛是那么顺理成章。

在那个年代，他们的爱情受到家人、朋友、校方的重重反对及阻难，最终乃是通过当时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批准，始得共结连理，并在亚谷毕业后移居叙利亚。“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谢丽霞在回忆这一段轰轰烈烈的往事时这么说。因为这段婚姻，家人也与她断绝了关系。一直到了1967年的中东“六日战争”，远在香港的父母因惦念女儿的安危，才与谢丽霞恢复了联系。

从1963年到1980年间，定居于叙利亚的华人一直就只有谢丽霞一人。直到1981年，才开始有来自台湾的华人女性，跟随在台经商的叙利亚丈夫返回叙利亚生活。她们陆陆续续来了大约有好几十个，有些因为后来孩子在台湾求学而往返两地；有些则移民至其他国家，如今长期扎根叙利亚的只有十几个而已。

随着中国大陆的对外开放，叙利亚商人也开始到中国大陆去经商，因此，在90年代之后，有更多来自大陆各地的妇女嫁到叙利亚。同时，一些华人也通过留学或餐饮业的劳务输出等方式来到叙利亚。

到了1995年，这里已经有三四间中资公司，华人总数达到100多人。2004年，个体贸易华商也开始进入叙利亚的市场大展拳脚。

当今生活面貌

引言

如今生活在叙利亚的华人约有2000多人，其中中资企业的员工就逾千人，其余的则是通婚女性、回族华人留学生和少数的商人及餐饮业业主。他们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各地及台湾，在叙利亚主要聚集于大马士革，在阿勒颇（Halab）和塔尔图斯（Tartus）等城市也散居着少量华人。

通婚的老华侨都是女性，新来的华商还不成气候。因此叙利亚华人在人口相对密集的当地，显得少之又少。正因为稀少，大家来往频密，仿佛家人一般。他们曾经完全不相识、隔着海峡、来自五湖四海，甚至不同国度的华人，因为这个陌生的国家，而相知相伴。他们间没有经济利益的冲突，有的只是共同的华人血液。

出生在毛里求斯的克利斯汀（Christine），在叙利亚已经生活了13年。她从没去过中国，不会讲华语，也不清楚自己的华文姓氏，但是纯正的华人血统，让她肯定自己是华人，并热情地参加每次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举行的中秋、春节联欢会。而中国使馆也仿佛变成了华人的“娘家”，有些老华侨子女的婚礼，使馆人员还作为亲友代表出席，并陪同主家迎娶新娘。

在宗教开放、自由的叙利亚，华人虽身处穆斯林国家，却感到自在随意。女性不但在生活上可以行动自如，在事业上，只要愿意，也有足够的发展空间。

安享闲适生活 找到精神归属

“这是一个任何人都能生活得很好的地方，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这里没有枪林弹雨，有的只是平静、友好。”远嫁到叙利亚的华人太太们几乎没有人说这里不好的。

作为叙利亚华人的主要群体，这些异族通婚女性，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但都像谢丽霞一样，有着同样为爱走天涯的爱情故事。“我们都是随缘来到这里，因为遇到了一个叙利亚男人，结了婚，有了孩子，孩子当然要了解自己父亲的国家，我们就跟着来了。”在叙利亚生活了十多年的邬凤娥如是说。

到了叙利亚，发现这里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糟糕。古老传说中的繁华景象，如今依然历历在目。古宅深巷里放学的孩子背着书包嬉笑追赶；密集的商铺中贩卖着大马士革著名的玫瑰香料；茶馆内外总是坐着悠闲的阿拉伯老人，一边吸着水烟，一边下着阿拉伯棋；清真寺定时传出绵延不断的祈祷……一切安详平静得仿佛千万年未曾改变，让来到这儿的华人太太们竟有一种误打误撞地发现了世外桃源的暗喜。

“每天早上起床后，我会和先生一起喝咖啡，然后游泳、健身；下午有时去朋友家串门聊天，有时自己开车出去逛逛，但最多时间还是和家人在一起。”这就是来自台湾的张淑萍的日常生活，很是舒缓惬意。除了叙利亚，她在埃及、约旦和美国也生活过不短的时间，但最后还是觉得叙利亚最好。“这里更有生活的感觉。”素养良好的人民，节奏缓慢的生活，对华人友善的态度，赢得了不止张淑萍一名华人的心。不少华人都是先到叙利亚，再到别国生活后，最终又选择回到这里。

因为这些华人妇女的丈夫不是商人，就是曾留学中国的专业人士，所以她们在叙利亚的生活还算富裕，而叙利亚人热情、有礼、正派、宽容，社会风气纯良，宗教观念开放，让她们感到心舒气爽。唯一需要适应的就是语言，虽然她们和丈夫可以用英语或华语交流，但是在与婆家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交往中，阿拉伯语还是很重要。

在叙利亚有90%的人口为穆斯林，因此华人与伊斯兰教徒组建家庭后，学习阿拉伯语、加入伊斯兰教便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华人基督徒，除了周日的基督教礼拜外，每天的社交、工作也还是要融入周围的穆斯林文化。

虽然在叙利亚这样的阿拉伯国家，宗教是一切的基础，但是这些因婚姻而加入伊斯兰教的华人，并没有感到任何的束缚。他们对穆斯林文化从陌生到了解，反而发现了它与传统中华文化的共通之处。

这些中阿合璧的家庭，房间不论大小，大厅里一定摆放着一大圈沙发。当地人说，这是回拉伯人大家庭观念的表现，在叙利亚，人人重视家庭，讲究孝敬老人，孩子要和父母一起分担家务，这些和传统中华文化中提倡的伦理观念不谋而合。“现在越来越国际化的大城市里逐渐丧失的美德，在这里还郑重地保留着。所以定居在叙利亚，对家庭的经营和孩子的成长都有利无弊。”古老的传统，让这些华人妇女们得到很多精神上的满足。已经习惯了以物质衡量一切现代女性，在可兰经和阿拉伯的生活习俗中，又找回了心中最美好的本质。

加入了伊斯兰教后，更为她们的生活提供了说不尽的方便。尤其是对一些还在兼顾生意的华人太太们，谈判时，只要说上一句“真主保佑”，对方马上会问你是不是穆斯林，如果得到肯定的答复，立即就亲热起来，如兄弟姐妹般的对待。曾经有一名异族通婚的女华商，在与欧洲的竞争对手旗鼓相当时，就因为这句话，最终拿到了竞标项目。

叙利亚学习语言和宗教的百余名留学生，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的回族。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他们倍感亲切。有的人本来对宗教仪式已经淡漠了，来到这里，因为环境的熏陶，每当清真寺的祷告声通过喇叭传来，他们便和当地人一起走进附近的祷告场所，虔诚地礼拜，每天5次，毫不含糊。有些女孩子，在中国没有戴头巾的习惯，来到叙利亚后，也入乡随俗，漂漂亮亮地用各种颜色的头巾把头发包裹起来。“有种找到家的感觉。”她们发自内心地说。

- 中国回族女子来到叙利亚，也愿意把头发包裹起来。

“第一批吃螃蟹”的华商

华商在叙利亚历史短浅，只不过五六年，总人数仅有几十人。这些华商既然敢把宝押在这个冷门国家，就有着超乎常人的沉着与本事。

其实每年到叙利亚考察的华商，一直以来从未间断。但是叙利亚消费能力不高，在外界媒体报道中，又政局混乱，因此绝大多数人都不看好这个被美国“制裁”的国家，看上一眼，就匆忙走人。不过，还是有人看好这个市场，成为第一个勇于“吃螃蟹”的人。

这个人就是来自中国浙江的女华商周东云。来叙利亚之前，她在中国、迪拜、阿根廷、意大利、利比亚等众多国家都有经商经验。2004年，周东云本是来谈一单生意的，却被这个鲜有华人问津的市场吸引了。

阿德拉自由贸易区对21个阿拉伯国家实行零关税的政策，又地处叙利亚通往伊拉克唯一一条高等级公路旁。贸易区距伊拉克边境城市仅200公里，公路上每天奔驰着成百上千辆伊拉克的卡车、巴士、集装箱车，从叙利亚发往伊拉克的所有货物均在自由区办理出关手续，而正值战后重建中的伊拉克又潜藏着巨大商机。这里旺季时每天约有150个货柜转口至周边国家，就算是淡季也有50来个货柜的交易量。而这些货物，大部分都是中国商品。“为什么华人不自己做？”周东云立即决定在自由区内买地盖房，建一座叙利亚中国城。

因此，先有中国商城，再有移入的华商这种特殊情况便在叙利亚出现了。

2006年，中国城顺利建成，占地一万平方公尺，可容纳150家商户。可是叙利亚的左右邻居伊拉克和黎巴嫩都陷入了混战。虽然叙利亚绝对安全，但是来考察的华商们，无论怎样都对局势不放心，再看到周东云只是一个温婉的女子，都打起了退堂鼓。很多人暗自替她惋惜，怪她为何这样“傻”，把钱砸在如此危险的地方，倘若一个炸弹落下，一切都将成了泡影。“这里真的很安全，只不过是叙利亚的国际形象被曲解了，中国城也就受到影响，我便跟着倒霉。”无人信任，让周东云感到很无奈。

- 叙利亚中国城入口。

但是最后还是有些华商愿意冒险一试。一些来自中国江浙沪地区的商人，因中国城而来到了叙利亚，成为当地的第一批个体批发贸易商贩，多出售纺织品和床上用品。“真正来了，才知道这里也没什么可怕的，比哪儿都安全。”亲眼所见、亲身所感后，华商终于相信了叙利亚的稳定。

不过毕竟市场刚刚起步，华商数量少，影响也小。他们坐在店里守株待兔等不到生意，只好自己去开拓市场。分别来自江苏和浙江的胡先生和胡太太，回想初到时，不是没有后悔的。“一开始很辛苦，没有客户。在这么陌生的市场，语言又有障碍，建立客户资源太困难了。那时我们只能一家一家店铺地上门推销。

出乎意料的是，叙利亚人对华人充满了好感和好奇，每一家都客气地请我们进去喝茶、聊天。很多时候，坐了半天，虽然生意没有做成，但还是相谈甚欢。”两三年下来，他们积累下固定的客户，短期内也不打算回国了。

原来在上海做生意的胡太太，来到叙利亚后，压力一下子不见了。“刚来时最痛苦，因为太闲了。”货物迟到，叙利亚客户也不催促；货到了，和客户约好见面，他们又迟到得离谱。早上醒来，想出去逛逛，店铺都未营业；到银行、车行交款办事，也要折腾上好几回。“没有压力，反而更着急，自己每天的计划无法完成，急得夜夜失眠。”

渐渐地华商们发现，只有自己急是没有用的。再怎样焦虑，当地人不配合你的办事节奏也无济于事，还不如索性迁就他们的习惯，按照阿拉伯人的作息时间行事。早晨11点起身，下午两三点吃午餐，晚餐推迟到八九点，凌晨两三点入睡，所有的会面都安排到下午四五点或晚上十点以后。

无聊的时候，有的人就重返校园，花上几百美元，报一个阿拉伯语课程，学学外语。另一项有趣的休闲就是洗澡。在叙利亚窄窄的街道旁，还保存着不少正常营业的地道土耳其浴室。整个人被包裹得密密实地送进浴室烘烤、洗刷，让本来压力就不大的华商们，更是放松到了极点。

虽然叙利亚国民的人均收入不高，但是当地人没有存钱的习惯，只要有钱就花掉，因此华商在这里还是有生意可做。华商的生活条件虽不比家乡，但相对于当地居民，要好得多。租住一套不错的公寓只要三四百美元，车子虽然较贵，不过华商也都负担得起，就是缺少蔬菜，在市场上所能买到的，不外乎土豆、番茄、腌橄榄加大饼的老搭配。

中餐馆成了华商之家

目前在叙利亚只有5家中餐馆，其中两家是叙利亚酒店里的中餐部门，另一家则规模很小，业主是叙利亚人，所以真正的中餐馆就只有龙餐厅和家餐厅这两家。

虽然当地华人不能独自经营餐厅，但是这两家餐厅里的华人与他们的叙利亚合伙人都是多年交情的老朋友，餐厅也以华人厨师的手艺、纯粹的中华文化气氛而闻名。

龙餐厅走高档路线，它的叙利亚老板以前就在五星级酒店管理中餐部门，他与大厨程兆如从1995年饭店开业就一直合作至今。饭店在营业之初，并不被当地人接受，叙利亚客人仅占三成，其余都是各大使馆或者国际公司的外国职员。随着叙利亚与中国生意往来密切，叙利亚人对中餐的认识也越来越多，龙餐厅的生意渐渐红火起来。程兆如说，现在的客人比例正好相反，本地人占了七成，甚至连叙利亚总统都是这里的常客。

家餐厅走的是中档路线，叙利亚合伙人几乎不参与餐馆的管理，因此它可以说是当地唯一一家华人经营的餐厅。家餐厅为来自中国南京的丰雷和他的好朋友共同拥有，目前只有丰雷一个人在叙利亚打理生意。它坐落在大马士革古城的基督教区，开业已有四五年了。一个人撑起整间餐馆是十分辛苦的事，丰雷自己既做老板，又做厨师，只请了两名服务生和一名帮厨帮忙洗碗、备料，每逢吃饭时间，丰雷在闷热的厨房里，总是炒菜炒到大汗淋漓。

竟受叙利亚的生活条件所限，做生意的华商们不会选择把家人带在身边，大部分都是一个人在外打拼。他们工作虽然辛苦，但是与无法填补的亲情相比，算不上什么。好在这里的华商少、没竞争，大家无事便聚在一起，让异乡的生活不再那么无聊。

华人每到一个地方，一定要找中餐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来到叙利亚也是如此。因为华人少，所以这几家中餐厅的华人厨师，和当地华人都成了朋友。尤其是相对独立的龙餐厅和家餐厅，华人客人一进门，不用服务生领位，就直奔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可吃的”。而家餐厅更成了华商们的“家”，一周里有5天，他们都在这里聚餐，有时想吃什么，他们干脆自己买好材料，或者发货时随集装箱从中国运来，送到厨房，让丰雷为大家解馋。“我们天天在一起吃饭、打牌，感情像亲人一样。”而在叙利亚，即使同是做餐饮业的同行，也不存在竞争，大家总是在一起互通有无。

丰雷说，餐馆起名字叫“家”，就是想给人“家”的感觉，这里的装修既强调东方特色，但也力求亲切感，比如外国人并不陌生的京剧剧照和通俗简单的华人流行歌曲，都特别受当地人的欢迎。不过丰雷没想到，最令他喜爱的，还是在叙利亚偶遇的这些华人朋友。而龙餐厅在当地的名字发音是“Canoun”，意思为大家围坐烤火，这种温暖、团聚的意境其实与家餐厅殊途同归。

- 华人在家餐厅聚集享用火锅。

叙利亚华人第一人

谢丽霞不但是移民叙利亚的第一个华人，还是叙利亚哈萨省的第一个女工程师和第一个华人公务员。

谢丽霞来到叙利亚后，语言不通，气候和饮食皆不习惯，人一点点瘦下来。但是生性好强的她，不愿意像大多数阿拉伯妇女一样，在家相夫教子，而是迫切地想出外工作。她的丈夫来自当地的一个基督教家庭，不但支持她工作，还主张谢丽霞一定要做自己的本行，让所学的专业得以发挥。不过，对于一个外籍女子来说，在阿拉伯国家从事土木工程谈何容易。首先是要过语言关，然后再经过多道繁琐的手续公证学历文凭，最后还要通过考核，才能加入当地的工程师协会。而这些只是找工作的第一步。为了能顺利地申请到政府建筑工程部的土木工程师职位，她加入了叙利亚国籍。

用了6年的时间，谢丽霞终于在1969年成为了叙利亚哈萨省建筑工程厅工程师。“找工作虽然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一做就是30年。”在这几十年间，谢丽霞工作得十分卖力，“尽管我入籍了，可我的脸还是华人，就算生活100年，当地人也觉得我是中国人。所以我不希望给中国人带来不好的影响，一定要表现得很出色才行。”就连很多男性都不愿意接受的工作任务，谢丽霞也会毫无怨言地去执行。一次她要爬上30公尺高的水塔检查工程，大家都说太危险了，直接盖好章就算了，但是她最后还是一个人蹬着梯子上去了。“我心里也很矛盾，但是这是我负责的工程，一定要看过才可以盖章通过。建筑工人能上去，我也能，只要当天没有风就可以。因为我太瘦了，担心会被风刮下来。”

幸运的是，正因为谢丽霞在叙利亚人眼中，永远都是“外国人”，她的女强人作风在穆斯林为主的社会并没有受到排斥。

在叙利亚生活了近50年，谢丽霞对这里饱含深情，不仅是因为叙利亚人的修养与热情，以及对华人的友好，让她感到没有来错地方，更因为自己在叙利亚设计、监管的无数工程散布各处，让她对这里的每条路、每座桥都充满了感情。

现在已经退休的谢丽霞，从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她的大半生既轰轰烈烈地爱过，也兢兢业业地努力过。如今她和先生亚谷居住在大马士革知识分子区域的公寓里，平静地享受着阿拉伯式的晚年生活，爱情、亲情、家庭、事业，都美满得无可挑剔。当儿科医生的长女、当内科医生的长子和担任物理教授并掌握9种语言的次子是她最大的欣慰。因为家庭语言是华语，她的孩子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华语，称自己是“半个华人”，而孙子们则调皮地说：“我是四分之一华人。”

华人留学生的丝绸之路

叙利亚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昔时曾有各国商旅带着五花八门的物品汇集于此进行交易，促成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几千年后，发达的国际贸易取代了这种极具冒险和传奇色彩的贸易形式，往日的繁荣和神秘只能在一座座古城废墟中寻找踪迹。

在今天的叙利亚，这种边走边卖的流动市场依然存在，而且里面竟然还有华人的身影。

俄罗斯有一批穆斯林每年去沙特阿拉伯朝觐。出发前他们装满集装箱车，在朝觐的路上，遇到城镇便停下卖货，货卖光了，便就地取材，在当地上货，继续前行。每到一月的时候，朝觐车队都会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停留一个月，组成暂时市场兜售商品。当地人叫它“扎哈拉”市场。

此时在叙利亚留学的华人学生正值假期，灵敏的商业嗅觉，让他们很快就加入了这个队伍当中。租上一辆敞篷货车，从当地华人批发商手中进些服装、鞋帽和床上用品，来到市场，找好地方，铺上一块垫布，就开始和俄罗斯人一起摆地摊。

- 华人留学生开着小货车在流动市场上卖货。

因为是来学习语言和宗教的缘故，这些留学生中既有20岁不到的青年，也有40多岁的中年。有的女人头戴头巾、男人头顶毡帽，用阿拉伯语吆喝着，难辨他们究竟是哪国人。“来到这里就要融入当地，和他们穿的一样、吃的一样、说的一样，才能做成当地人的生意嘛。”曾经自己读书，现在陪女儿学习的一名云南华人这样分享她在叙利亚的生存心得。

一个月后，朝觐的车队便离开，赶往下一站，学生们的假期也结束了。下一次摆摊，就要等到穆斯林的斋月了。虽然一年只有两个月的赚钱时机，但是如果赶上好时机，每次都可以有六七千美元的收入。这些钱，足够支持他们在叙利亚一年内的所有开销。

结语

来到叙利亚定居的华人都有着异于常人的勇气，无论是对家庭、爱情的付出，还是事业上的魄力，华人发挥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对这个国家的充分信任。因为这份难得的信任与勇气，叙利亚用自己最美好的一面来回报他们。纵然外界把这个国家形容得万分可恶，但是它给予当地华人的却是平静的生活、可贵的美德、丰富的文化。决定留在叙利亚的华商们坚信，这里的市场总有一天会为他们带来惊喜。

黎巴嫩

引言

在人们的印象中，黎巴嫩是一个战乱不断的地方，多年内战，黎以（以色列）冲突、黎叙（叙利亚）恩怨，形形色色的教派与政党、盘根错节的国际关系，使这个弹丸小国成为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的战场。

硝烟弥漫的战场，掩盖了黎巴嫩曾经的辉煌与灿烂。黎巴嫩人的祖先——腓尼基人，曾以发达的航海业和丰富的雪松资源，使黎巴嫩成为地中海的贸易大国。他们发明的腓尼基字母，是如今希腊语、拉丁语和斯拉夫语字母的起源。黎巴嫩曾被许多民族占领过，最终于1943年脱离殖民统治，宣布独立。之后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中东的贸易、金融、旅游和文化中心，首都贝鲁特更被誉为“东方小巴黎”，繁华风光堪比日后的中东贸易中心迪拜。

1975年以后，连年内战、以色列轰炸、叙利亚驻军、游行及爆炸事件，导致黎巴嫩元气大伤。连绵的雪山、茂密的森林及碧海的蓝天依旧，但散落四处的残垣断壁，无不使黎巴嫩人对往日的繁华扼腕痛惜。很多人选择了离开，以致现在生活在海外的黎巴嫩人超过本土人口的两倍。但是，黎巴嫩却也汇集了来自各国的人民，包括短期居住的年轻记者、上了年纪的欧美商业顾问、菲律宾女佣、周边经济稍差国家的打工者。这当中也有少部分华人，他们长久生活于此，已经以黎巴嫩为家。

华人移民简史

中国和黎巴嫩自古以来的交往历史可回溯到千年以前，中国的陶瓷及丝绸曾经通过黎巴嫩口岸运往欧洲各国，黎巴嫩的空心玻璃器皿制造工艺和紫色颜料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不过，华人真正定居于黎巴嫩，则是从1980年代初才发生的事。

最早来到黎巴嫩的一批华人，是从台湾及香港过来的女性。她们嫁给在海外经商或留学的黎巴嫩人，并随着丈夫返回黎巴嫩。

根据当地华人的说法，来自台湾的罗宝珍是第一个定居于黎巴嫩的华人。1980年代初期，她随着从商的丈夫从台湾来到黎巴嫩展开新生活。那时，内战还没结束，炮声时而不远处传来，导致他们每日出门都提心吊胆，只能尽量留在家中。罗宝珍和丈夫在黎巴嫩生活了一段时日之后，基于安全理由，唯有无奈地返回台湾，直至内战结束，才又迫不及待地回到黎巴嫩。罗宝珍的丈夫开了一间大型超市，会说流利阿拉伯语的她，每天都到超市帮丈夫打理生意，而且还特别在超市开辟了一个角落，专门出售中餐的食材。目前他们全家已经离开了黎巴嫩。还有好些年罗宝珍一样早期嫁来此地的华人太太，待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也都移居他国去了。

如今依然生活在黎巴嫩的华人当中，经敏敏算是来得最早的一个。她是上海人，自幼在香港长大，中学毕业以后就被家人送到美国去深造。她与丈夫在大学校园内相识，由于丈夫在毕业之后一定要回到黎巴嫩接管家族的果园，于是，出嫁从夫，习惯了都市生活的经敏敏就跟着丈夫去到黎巴嫩北部的乡下果园。

经敏敏于1982年12月抵达黎巴嫩，虽然那时内战尚未熄火，但是生活在千亩果园旁的百年大屋中，她并没受到太大的影响，只是频繁的停电及湿冷的气候常常让她感到不适。经敏敏表示，她几乎是用了5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全习惯这里的生活。

- 香港华人太太经敏敏在的黎波里的家中。

如今，经敏敏全家居住在黎波里（Tripoli）市区，并已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看着一对儿女都长大成人了，她感叹道：“开始时，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完全错误的，但是现在看孩子们，才感到当初的决定是对的。这里的青年比较保守，不像美国或香港那样随意和自我。对于培养下一代而言，黎巴嫩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可惜局势不太稳定。另外，孩子们在长大以后都喜欢到国外去工作，很难继续留在父母身边。如今当了人家的母亲，我才能理解自己当年来黎巴嫩时，我的母亲为什么会那么生气了。”

除了这些嫁到黎巴嫩的华人太太之外，来自北京的姜俊升则可说是第一个到此工作创业的华人。在1980年代初，他被公派到黎巴嫩负责建筑工程，结果一干就是8年。在这8年期间，黎巴嫩的内战未曾停息过，可是姜俊升却喜欢上这里秀美的景致，以及那热情的人民。回国之后，待战争平息，他便让儿子姜浩到黎巴嫩来经营中餐厅。随后，他再次踏足黎巴嫩，并且还开设了一间公司，承包交通系统的各类工程项目。姜氏家族无疑是黎巴嫩来得最早的华人家庭，之后，有很多从事餐饮业的华人，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来到黎巴嫩的。

到了1990年代，在内战结束了之后，从事贸易、异国通婚、经营餐厅、中资公司的华人都陆续进入黎巴嫩，只是人数稀少。而那些从事贸易的华人，曾经尝试开拓服装、空调以及发电机的市场，但是却面对黎巴嫩极为严格的商品入境检验，以及一些无良黎巴嫩商人的刁难。

从2000年至2005年间，黎巴嫩的局势十分稳定，这时的华人人数就达到了两三百人。2003年，也曾有一两百名华人从迪拜来到黎巴嫩，他们摆地摊、卖领带、并且开设按摩院，但是由于后来涉及一些不法行为，没多久以后就被驱逐出境。

当今生活风趣

引言

作为一个异乡人，能对这样一个随时都可能被狂轰乱炸的国家不离不弃，若不是已经以此为家，便是因为对这里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现在居住在黎巴嫩的约200名华人，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各地的华人太太，个体创业者和打工者，以及中资公司员工和中国政府公派教师。黎巴嫩的华人分散而居，只有贝鲁特较集中。

黎巴嫩华人胆敢选择在此地长久生活，肯定拥有超出常人的勇气。事实上，除了适应动荡社会的生存能力外，他们还具备乱世中永不消极、发掘美好的豁达心胸，以及历经危难依然重情讲义的真挚性情。

人数过于稀少，局势动荡不安，使这里的华人社团无法正常发展。华人的社团组织和宗教团体还是一片空白。有一些台湾太太曾经组织开办华文班，但由于华人孩子太少，坚持了一两个月后就仓促解散了。

华人太太 各显神通

黎巴嫩局势动荡不安，但社会却相对开放、包容，阿拉伯语、法语、英语在这里皆通用，为华人融入当地、寻找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正如一名华人太太所说：“自己就像一颗种子，在哪里都能发芽。”生活在黎巴嫩的华人太太，从家庭主妇、华文教师、音乐教师、瑜伽教练，到建筑师、商人、美容师、中医师，各行各业都有所涉猎，仿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将自己的十八般武艺发挥得淋漓尽致。

来自北京的赵颖，现在是黎巴嫩孔子学院的协调人，被大家称为黎巴嫩传播中华文化的第一人。2001年，她随在中国留学的丈夫返回黎巴嫩北部的家乡生活。刚到第二个月，赵颖便在当地的健身中心找到瑜伽教练的工作。性格开朗的她，工作不但比丈夫先一步稳定下来，还为丈夫的中医诊所招徕不少客人。

- 黎巴嫩孔子学院的协调人赵颖。

华人积极进取，赵颖也不满足于住大房、有工作的生活状况，反而鼓励丈夫去贝鲁特发展事业。“首都人口密集，人们容易接受新事物，中医诊所才会有更多的顾客。”当时正怀有身孕的赵颖，帮忙丈夫到贝鲁特为诊所选址、装修。孩子出生后，她到贝鲁特一家健身中心当起瑜伽兼游泳教练，之后还教起了华文。渐渐地，丈夫的诊所在当地有了名气，从开始的一个月一个病人到现在的一天几十个病人，身后的太太功不可没。

2006年，在一次中国使馆的活动中，她得知孔子学院打算在黎巴嫩创办，便开始积极参与筹划。如今，孔子学院已经运作了几年，招收的学生逾百人，成绩超乎预期的好。不仅如此，赵颖还成为黎巴嫩与中国交流的桥梁，她不但写文章介绍黎巴嫩的文化和美景，还帮助两国商人寻找各种商机，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时局不稳定，使黎巴嫩人习惯了做多重准备，如持双重国籍、做多份工作等，华人自然也受到影响，虽然稍有动荡，就可能失去工作，但是这些华人太太们相信，只要自己有一技之长，就不怕找不到工作。

学习中国民乐的何笑静从上海嫁到黎巴嫩，几经波折，找到了一份英语学校音乐老师的工作。她说：“像当地人般工作，压力很大，不但面对语言的挑战，还因为我的亚洲面孔，必须承受更多能力上的质疑。”进入学校后，她的考察期比当地任何一个老师都长。何笑静通常每天早上6点多就要出门，从比布鲁斯（Byblos）开车赶到贝鲁特上班，晚上有时还要兼职教华文，或去高级酒店演奏，回到家常常已是晚上七八点。

其实，华人太太们大可不必如此操劳。很多嫁给有钱人的全职太太，家用十分宽裕，即使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家庭，基本生活也不成问题。太太们需要的，不过是事业上的成就感。

曾在上海同济大学和比利时学习建筑的何彬嫁到黎巴嫩前，曾在上海最好的建筑师事务所工作。来到黎巴嫩的两个月后，她便到自己丈夫的设计公司上班。不久后，她就在当地数一数二的建筑师事务所任顾问，并在一所大学授课。

即便如此，何彬仍感到事业发展的限制，她说：“黎巴嫩土地都是私人所有，无法规划，所以想承包公共建筑的规划项目是不可能的。况且作为华人，在这里并不容易受到承认。”

不过，有的人还是从工作中得到了满足感。来自中国东北的王薇，1990年代初随中国医疗队公派到黎巴嫩做英语翻译，与黎巴嫩籍丈夫结婚后，便定居当地。她发现黎巴嫩盛行美容、整形，有人甚至向银行贷款整形。直觉告诉她，这个行业绝对潜力无穷，于是她马上开始学习纹眉。十多年下来，她的技术在当地已经声名远播，很多歌星和政界夫人都成了她的客户。只要一打开电视，就会看到王薇的作品。“这个眉是我纹的，那个唇线是我做的”，满满的成就感溢于言表。

中餐厅 倾注心血难割舍

长年的战乱，使黎巴嫩的经济大幅度下滑，但由于黎巴嫩是个小国，恢复起来也较为容易。另外，黎巴嫩国穷民富，大量的海外侨汇和一代代的祖传财富，还是让当地人维持着相当的消费能力。

黎巴嫩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汇集世界各地风味的餐馆。喜欢享受生活的黎巴嫩人，几乎人人都是美食家。他们平日很少在家用餐，而是喜欢到外面的餐厅品尝美食。

在当地成百上千的餐厅中，有二三十家是中餐馆。这些餐馆大部分由当地人经营，雇用来自中国、菲律宾、苏丹和埃及等地的厨师。真正由华人经营、华人掌勺的只有“小中国餐厅”、“熊猫餐厅”、“好好中餐”3家。这3家高、中、低档餐馆定位不同，互不竞争。

小中国餐厅坐落在繁华的贝鲁特市中心，旁边就是当地最有名的酒吧街，店内氛围古香古色，墙壁上挂着清朝皇帝图，烘托出餐厅的尊贵之气。小中国老板徐祝明还记得十多年前刚到贝鲁特的情景，“那时，这里的马路坑坑洼洼，楼房都是弹孔。我根本没想长呆，打算一年的合同到期后，马上背包回家。”谁知他一做，便做了十多年，不但从伙计变成老板，还把太太和孩子都接到了黎巴嫩。“黎巴嫩越住越美，环境干净，百姓单纯。因为我们开中餐厅，所以周围很多邻居都认识我们这家人，走在街上，常常就被陌生人邀请到家里喝茶、做客。”

即使在2006年以色列轰炸得最为猛烈的时候，徐祝明也没有离开黎巴嫩。他独自一人留下，以确保餐厅正常营业。那时，已经没有什么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出门吃饭，他的工作就是为华人记者做晚饭，有时给使馆送些食物。每天打烊后，在没有一盏街灯的道路，除了自己的汽车外，徐祝明再也看不到别的车子。“未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我不会离开黎巴嫩，不会扔下小中国，毕竟我十多年的心血都在这儿了。”

其实，这次战争爆发前，黎巴嫩的连环爆炸案就层出不穷，连当时的总理哈利里和几名政要都相继被炸身亡，战争之后，黎巴嫩又开始闹静坐、搞游行。接连几年下来，小中国的生意备受影响。不过，徐祝明总是对自己说：“明年就会好的。”

让徐祝明一家更加坚定留在黎巴嫩的原因，是孩子的教育。黎巴嫩语言环境得天独厚，在这里读完高中的学生，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一般都不成问题，而且还可以直接进入欧美的大学。“因为华人少，孩子在学校里就像中国熊猫一样宝贵，老师、同学都喜欢。孩子开心，我们也就安心留下，尽全力为他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每当看到孩子能用4种语言和不同的人交流，就是徐祝明和太太最大的安慰。

熊猫餐厅的苏晓岚，也是从当年的餐厅打工族做到老板。她的餐厅开在贝鲁特北部的亚美尼亚基督教区，受到战争的威胁较小。苏晓岚并不觉得在外打拼有什么辛酸，对近在身边的战争也不感到有多可怕，“仿佛就是听别人讲了一个故事”。对于苏晓岚来讲，黎巴嫩就是气候好、人漂亮，虽然餐厅的营业只能度日，不能发财，但是生活了十多年、她已经适应了这里的悠闲。

在比布鲁斯帮助黎巴嫩人经营中餐厅的冯予捷，就算2006年身陷枪林弹雨中也没有离开。黎巴嫩面积很小，以色列的飞机在上空盘旋，很快就飞完一圈，飞机的嗡鸣声不绝于耳。餐厅新来的中餐厨师一听到这种声音就害怕，表示“像苍蝇一样，简直没办法工作”，没几天就辞工走掉了。看着自己精心布置的餐厅摆设、亲手绘画的壁画，冯予捷实在舍不得走，而且餐厅老板当时已经去了美国，她再离开的话，餐厅就必须关门。况且，战时很多人都躲到餐厅所在的基督教区，因此生意特别好，冯予捷只好自己亲自上阵，又当厨师，又做服务员。现在，她已经在这个小城生活了近十年，走在街上，到处都能见到相识的老朋友，很多当年在餐厅里玩耍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要是真的回去了，还真有些不舍。”冯予捷已经渐渐变成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 充满中国风情的好好中餐馆。
- 比布鲁斯的冯予捷对她亲手装修的中餐厅充满感情。

活在当下 享受今朝

在黎巴嫩，如果问当地人明天有什么计划，一定会被视为笑话。在一个不安定的国度里，“谁知道明天会怎样”成了黎巴嫩人的口头禅，他们能够确定的只有今天。

“经历过战争的人，对生活的理解就会不同。”这是华人走过黎巴嫩战火的心得。战争让黎巴嫩人的心灵变得更加单纯，他们只为拥有生存的机会欢呼，不会为不可测的死亡杞人忧天。在生死的考验中，黎巴嫩人泰然对待战争，豁达看待生命，比谁都能轻松享受生活。就如他们自己所说：“不管发生了什么，太阳还是要晒的，咖啡还是要喝的。”

当地普通人每月收入介于500到700美元之间，但电费、汽油费和通讯费偏高，连外出吃一餐饭也要花上二三十美元，很多人都入不敷出。即便如此，黎巴嫩人还是该喝酒时喝酒，该唱歌时唱歌，一个周末就会花掉一周的薪水。每个黎巴嫩人的家里，不管房子好坏，室内的装修几乎都很富丽堂皇，而且每家一般都有几辆汽车，差别只在于富人的座驾是名车、新车，而穷人开的是普通车、二手车。这种“没有明天”的生活方式，说是浮夸也好，说是浪费也罢，但不管怎样，都是快乐的。

黎巴嫩人这种乐观坚强的精神，深深吸引和感染着在这里生活的每一个华人。大家都不能预知明天，但都相信明天会好起来，战争总有打完的一天，每个人能做的，就是活在当下，享受今天。

因此，这里的华人也更懂得享受生活。尽管黎巴嫩处处都有战争的痕迹，城市中遍布着被炸毁的房屋，街道拐角处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守着坦克，但是黎巴嫩华人几乎都把当地的景点玩遍了。从比布鲁斯腓尼基古堡到巴尔贝克（Baalbek）的罗马神庙，从白雪皑皑的雪山到海风习习的沙滩，从北卡（Bekaa）山谷的酒庄到雪松环绕的纪伯伦故居，黎巴嫩秀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古迹，让每个生活在这里的华人心醉不已。

“上山滑雪、下海游泳可以在同一天实现。”人们总是这样形容黎巴嫩。山海相接的地理位置，让黎巴嫩拥有完全不同于中东国家的秀丽景色。住在北部的冯女士经常沿着海边的高速公路往返贝鲁特，“车子一边是碧海蓝天，一边是雪山丛林，我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黎巴嫩更美丽了。如果没有战争，这里就是天堂。”

一些全职的家庭主妇会不时相约喝下午茶，聊聊煮饭买菜的话题。饮上一杯花茶，吹吹海风，她们在黎巴嫩就是这样消磨时间的。

- 全职的家庭主妇会不时相约喝下午茶。

除了照料家庭，一华人太太也会帮助丈夫处理生意上的信件和订单，或者潜心于宗教，常到清真寺上课修行、定期斋戒。来自台湾的华人太太施女士，因对伊斯兰教怀有浓厚兴趣而深入钻研，还设立了古兰经教学网站。她说：“在黎巴嫩就是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

- 停电，是黎巴嫩华人的共同话题之一。由于当地政府电力供应不足，因此黎巴嫩所有的用电设施都需要私人发电机与政府供电相互配合使用。一般上，一个区域内的普通居民用电，都由一户富人家庭的发电机提供，而不少华人家庭也拥有自己的发电机。不过发电机每隔几小时便需要更换一次内芯，所以在黎巴嫩突然停电两分钟，是生活中稀松平常的事情。

其他资讯

难以磨灭的战争记忆

2006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境内持续轰炸，当地近200名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华人，大部分跟随中国大使馆组织的撤侨行动，暂时离开黎巴嫩。选择留下的，不是居住在未直接受战火影响的地区，就是不愿意离开丈夫与孩子的母亲，以及几名放不下黎巴嫩事业的创业者。

一名留下的华人太太，丈夫是当地医生，因有很多重症病人需要持续治疗而无法离开。面临战争的危险，作为人妻人母，她不愿意扔下丈夫一个人在黎巴嫩，更不能在几岁的孩子面前显出一点恐惧。“当地人已经不把战争当作一回事了，我们只要不看电视，就没有太大的感觉。”每次爆炸声响起，她总是平静地告诉孩子，这是在放烟花，设法不给孩子留有一丝阴影。

那些选择撤离的华人，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还心有余悸。以色列轰炸黎巴嫩的机场和主要公路，也封锁了海港，使馆只能花高价租用客车载送他们，从偏僻小路辗转撤离。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穿着防弹衣，四处奔走，联络分散居住的黎巴嫩华人。陆路交通已经十分不安全，大家只好用中国国旗遮盖着车顶逃难。

有的华人恰巧正在其他城市出差，为了赶回贝鲁特随使馆撤离，花了上千美元才租到一辆车子。“车子在山里蜿蜒行驶，为了安全又不能开车灯，只要有爆炸声就要停下来，手抱住头部等着轰炸平息。平时两三个小时的路程，足足走了一夜。”回到贝鲁特，每个人身上的衣服都被吓出的冷汗浸透了。

- 撤离时被吓出的冷汗浸湿的外套，上面汗迹斑斑，当地华人特地拍下照片作为纪念。

随着战事的恶化，陆路的安全已经无法保障，使馆只好借助希腊的撤侨船只，让最后的20多名华人从海上撤到塞浦路斯。

幸运的是，没有一个华人在这次黎以冲突中受到伤害。然而，不管是对黎巴嫩人还是当地华人而言，战争还是在每个人心中留下了难以忘却的伤痛。

黎巴嫩的华人武术师

2002年，出身于北京什刹海武术学校的武术高手陈朝阳，听朋友说黎巴嫩没有人教武术，搞个中国武术俱乐部应该很有发展。于是，他心血来潮，带着两个集装箱的货物就闯到了黎巴嫩。

由于考察不足，来到以后才发现，个人投资办俱乐部并不容易，而且带来的货物根本卖不出去，最后都砸在手里。无奈的他只好自己碰碰运气，到各个健身中心寻找当武术教练的机会。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陈朝阳在自己住处附近找到一家当地的武术俱乐部。俱乐部对这名送上门来的中国武术高手欢迎之至，马上就聘请他在此授课。他的加盟，让俱乐部一下成为贝鲁特最有名的武馆。很快地，陈朝阳受黎巴嫩武术协会之邀，担任国家武术队的总教练。

他的幸运只是刚刚开始。“好教练遇到好学生，和好学生遇到好教练，都是可遇不可求的。”陈朝阳在众多学中发现一株习武的好苗子——瓦池。孩子的父亲全力支持，甚至把自己工厂的厂房改装出一个房间，专供陈朝阳训练和居住。

经过教练、孩子、家长的共同努力，瓦池在2006年的欧洲武术锦标赛中，获得少儿组的长拳、武术和棍术3枚金牌。他在多哈亚运会上的精彩表现也引起各界瞩目，被誉为阿拉伯国家武术界的明日之星。

然而，在这些成就的背后，陈朝阳也有很多无奈。由于黎巴嫩战事不断，很多重要的国际比赛，国家都无暇支持，所以很多时候都要教练和学员家长自掏腰包去参加比赛。“出国比赛，住宿、饮食经常自己贴钱，但是没有办法，谁叫我在黎巴嫩呆了这么久，教了这么多学生。现在已经离不开了，因为这就是我的事业。”

让陈朝阳感到安慰的是，他和弟子们已经亲如父子。尤其是瓦池，由于常常去中国集训，生活饮食已经很中国化了。“没想到来黎巴嫩同化了一个当地孩子。”陈朝阳开心地说。不过，他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就是华人孩子习武的太少，目前只有华人太太赵颖的儿子在学习。“毕竟血液里有中华文化的因子，如果用心培养，成绩将不可限量。”

- 武术课上的陈朝阳。前排中间的男孩就是班里唯一的华人孩子。

结语

黎巴嫩华人说，有时候天堂与地狱只是一步之差。在这个既美丽又动荡的地方，愿意不离不弃而留下的华人，都是因为对黎巴嫩有着真挚的喜爱。

无论是华人太太，还是意外留下创业的华人，他们心中永远有着「自己的黎巴嫩」，尽管没人知道这里的明天将会如何。

日本

引言

提起“日出之国”——日本，总让人联想起勤奋、自律的日本人民。日本，如今已成为世界人口排行第十的国家，地狭人稠，平均每平方公里住着337人，最繁华的东京圈人口则高达3千万。

国民不屈不挠的精神，使日本在二战后迅速摆脱了“战败国”的形象。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年均增长率超过10%。此后，日本经济一直稳健发展，特别是在汽车制造业、电子产业等领域表现卓越，傲视全世界。

2007年，日本更创下4385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可惜好景不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与此同时，日本人口老化现象继续恶化，劳动力短缺，但日本政府却始终拒绝接纳大规模的移民。

如今在日本两百余万名外国人当中，华人人数已超过70万，成为在日本的第一大外来族群，其中11万左右已入日籍。

华人移民简史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之间在历史上的两场人尽皆知的战争，是两国人民心底的疙瘩，尽管如此，也磨灭不了他们这两千多年交往所建立起的深厚情谊。

华人迁移日本最早的记录可追溯至秦汉时期。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命令徐福率领3千童男童女以及能工巧匠东渡，以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倘若“徐福东渡”的事迹属实，那么徐福就成了最早旅居日本的华人。

南北朝时代，中国政局动荡，出现了集体东渡的现象，不过自隋唐开始，集体东渡的现象便有所减弱，大多数华人用个人身份迁移日本，其中以商人及僧人居多，他们主要是到日本经商和弘扬佛法。此外，也有一些专业技术人员与学者侨居日本，他们将中国的农耕、制陶、建筑、炼铁和纺织等技术引入日本。同时，日本也派遣了“遣隋使”和“遣唐使”到中国观摩学习，将中国的礼仪以及制度传回当地。中日的频密互动对日本的文明进程起了关键作用。

宋元时期有更多的华人抵达日本。当年，他们大多都聚居于福冈市（Fukuoka）的博多（Hakata）。12世纪50年代，居住在博多的宋人已经高达1600人。当时，宋人聚居的博多蓑崎宫前一带建了许多中国式的房屋和祠堂，被称为“宋人百堂”。

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开始动荡，沿海一带有不少百姓逃往日本。他们和大部分旅居日本的明朝商人一样住在长崎（Nagasaki）。17世纪，华人在长崎先后建了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和圣福寺，合称“唐四福寺”，四福寺成为当时两千多名华人的礼佛以及联谊中心。

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实行了“开国”政策，解除海禁，到长崎进行贸易的清朝商人因而逐年增加。接着，日本也开始“安政开国”，先后开放横滨（Yokohama）、长崎、神户（Kobe）和大阪（Osaka）这些港口城市，吸引了许多中国以及欧美商家前往经商。欧美商家鉴于与日本社会之间的语言及文化隔阂，经常雇用华人充当买办或代理商。此时，在各开放的港口城市均出现了华人聚居地，横滨自1859年正式开埠以后，便迎来了大批的外国商社，在开埠初期，大约有四五十名华人在此居住，1870年，登记在册的华人人数已超过一千人，成为华人人口最密集的港口城市。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登陆日本的华人多数来自广东、福建、山东、浙江、江苏及江西三省（在日华人社会统称为“三江”）等地，他们大多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其中也有不少是“三把刀”业者（即厨师、理发师和裁缝）。

自1871年，中日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后，旅日华人的数量便开始激增。虽然名义上华人可以自由进出并进行贸易活动，但现实中，华人在居住和经商时都受到了不少的限制。为了生存及发展，在长崎、神户、大阪、东京、横滨、函馆（Hakodate）等城市的华人便基于地缘和血缘建立起各自的乡团组织，团结起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尽管日本政府制定了各项法令限制华人在日本的活动及就业，但是当地华人人口仍然不断地增长。

19世纪后期，日本奉行军国主义，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便开始对中国进行多次侵略。此外，日本也极力限制华人入境，且对在日华人加以羞辱。华人数量在动荡的局势中缓慢增长，1930年，全日华人人口约2万7千余人。东京后来居上，华人人口超过一万人，成为华人最密集的地区；神户华人人口约有八千余人，位居第二；横滨5千余人，位居第三；而华人早期的聚集地——长崎的华人人口却只有两千余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在日华人社会的发展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华人经济一蹶不振，社团被强行解散，侨校也被下令停办。在日华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期间，有逾一万名华人放弃在日的家业，返回中国投入抗日的洪流。

二战结束以后，有不少华人前往日本寻亲、经商、工作，并定居下来，导致华人数量大增。旅日华人以“战胜国”侨民的身份得到了优待，不论是在经济或是社团组织等方面，都迅速恢复元气，发展也颇为顺利。

20世纪60年代，有不少在日华人迁居至欧美等地，导致在日华人人口滑落。直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华侨华人的数量始终保持在5万人左右。

从1980年开始，以留学、研修等名义前来日本的华人迅速增加，日本华人社会呈现出一番全新的景象，朝气蓬勃。有人将1980年以前旅居日本的华人，称为“老华侨”，而1980年之后才登陆的，则称为“新华侨”。

虽然华人社会在日本的历史悠长，但在中日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华人社会发展始终受限，影响力也不会太大。中日两国的关系至今仍然十分敏感，两国的人民均无法完全卸下沉重的历史包袱，彼此之间的关系既亲密又疏离。

- 孙中山深受中、日两国人民爱戴，他的革命事业，获得了日本华人和神户不少日本企业家的支持。当年他于革命期间多次流亡日本，前后造访神户市达18次之多。在神户舞子公园处，就有一座由该市政府管理的孙文纪念馆。
- 1995年1月17日，爆发了阪神大地震，当地华人很快成立了神户华侨赈灾对策总部，与日本当局戮力合作，积极展开抢救和善后行动。唐人街严重毁坏，但不少中餐业者仍在短时间内，冒着寒风，为灾民送上热腾腾的食物，显现出中日人民同舟共济，团结奋斗的精神。（神户华侨博物馆提供）

当今生活风貌

引言

站在东京最繁华的涩谷街头，熙攘的人群里，实在难以辨认谁是华人，谁是日本人。

华人说：“只要不开口，很少人会怀疑你不是日本人。”由于华人和日本人外形相似、文化相近，因此，华人在日本社会中，并不特别引人注目。

华人主要聚居在东京、横滨、大阪和神户。另外，在名古屋（Nagoya）、长崎甚至北海道（Hokkaido）也有不少华人。换言之，华人的足迹已遍布日本各地。

如果说日本的经济是一台精密又复杂的机器，那华人就像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和别的部件一起默默维持着系统的正常运作。这些年来，华人无论是为了融入当地，还是为了中日友好，总是不懈地努力着。他们涉足各行各业，与日本人一样长时间埋首工作，敬业乐业。

日本消费水平偏高，人人都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华人自然也不例外，但他们坚信只要肯努力付出，安定、舒适的生活并不难求。中产阶级的华人最多，其他多半是工薪一族。他们不刻意追求物质享受，较重视生活的质量，华人家长更是全力让子女接受优质的教育。

今天，大部分“老华侨”在日本已经扎稳了根，安享丰收时刻。“新华侨”则仍处于挥汗撒种的耕耘期，他们坚信，只要肯努力，终有一天，他们也能像“老华侨”一样，在日本安居乐业，成为这大家庭的一员。

“老华侨”固守旧行业

早期定居日本的“老华侨”，几乎都与“三把刀”行业扯上关系。

由于文化水平偏低，加上当年日本政府严格限制外国人的职业选择，他们唯有依靠劳力谋生。“三把刀”中，剃刀（理发业）、剪刀（洋服业）已为时代所淘汰，仅有菜刀（餐饮业）留存下来，还在日本各地发扬光大。

如今，餐饮业成了新老华侨奋斗的领域。日本的中餐馆总计有多少家？很多人都答不出来。有人这样比喻：“日本中餐馆的数量可比得上日本人最爱的‘帕青高’游戏中心（Pachinko）的数量。”

中餐魅力大，受到日本社会的欢迎。忙碌一天之后，很多日本男人都爱到中餐馆来吃顿饭，喝杯酒。每当傍晚霓虹灯亮起，中餐馆便开始觥筹交错、高朋满座。

华人、日本人的饮食习惯，相似之处很多。例如，日本人的拉面、馒头及糯米等，近似华人的饮食风格。中国的普洱茶、乌龙茶、烤鸭、上海螃蟹等，如今也广受日本社会的欢迎。随着华人人口的上升，上海菜、四川菜、广东菜和北京菜，在当地都有了市场。

华人笑道：“日本人、华人饮食上最大的区别，就是日本人吃的，华人都吃；日本人不吃的，华人照样吃。”如今，普通华人超市售卖的中式速食越来越多元，如冷冻馒头、汤圆和饺子已成畅销食品，华人和日本人都喜爱。一些大型华人超市还售卖起中式熟食如红烧猪蹄、炒猪耳等，华人视为珍宝，但日本人则不敢恭维。

日本人做事细心，对吃很讲究，要求色、香、味俱全。因此，日本的中餐一般手工精致，卖相极佳，水平、价格都位于中上标准。

除了餐饮业，“老华侨”也活跃于商业贸易领域。“老华侨”创业经商最讲求信誉，作风踏实，曾创出不少知名品牌。不过在日本素有“富不过三代”之说。日本中华总商会一名理事指出：“政府征收的遗产税偏高，遗产越传就越少，到了第三代，往往就所剩无几了。”正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能继续发扬家族企业的例子并不多。不少由华人创办的企业，最终都渐渐演变成上至董事，下至生产操作员，几乎清一色是日本人的情况。

一些土生土长的“老华侨”后代，对继承家族小生意缺乏兴趣，倾向自行创业，一些则选择在大学毕业后，找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过安稳日子。另外，从事医生、律师、工程师等职业的华人专业人士也为数不少。

“老华侨”刻苦耐劳、勤奋谦虚，为整个华人社会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他们受到日本民众的肯定与尊重，是华人与日本社会沟通的主要桥梁。

“新华侨”勇闯新市场

近二十多年间，“新华侨”通过留学、研修、经商、公务、文化交流等渠道，陆续登陆日本。其中，以留学生身份入境的人数最多，完成学业后，他们一般就在日本工作、安家，扎下根来。

住房问题，成为所有在日的“新华侨”所要面对的第一件事。当过留学生的华人回忆道：“大家都有过挤四迭半的苦日子。那小小的空间，总是潮乎乎、软塌塌的。”

所谓四迭半，就是相当于9平方米左右的空间，约有4张半榻榻米面积大小。许多单身赴日的华人，尤其是经济能力有限的学生，都曾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度过了在日本最初的岁月。日本的房产价格奇高，不少人奋斗了大半生，依旧没能力拥有自己的房子。约90%的在日华人，都住在租来的公寓或政府组屋里。

“新华侨”大多是单枪匹马到日本闯天下。他们散居在日本各城市，以东京首都圈人数最多。东京的池袋，更已成了“新华侨”的聚集地。在池袋，华人的杂货行、旅行社、食品公司、书店及报馆等，各处林立。穿梭在街上鱼贯的人群中，耳际不时传来熟悉的华语。

近几年，涌入日本的“新华侨”不乏高学历、高收入的青年才俊。选择创业的“新华侨”，除了驰骋于商业贸易、餐饮业等传统行业外，还进军科技、信息和文化等领域。华人在日本创立的数百家软件公司，几乎全由“新华侨”创办。此外，他们也出版中文报及中文杂志，开拓华文媒体的市场。

与“老华侨”低调、朴实的作风相比，“新华侨”显得更具信心和野心。“老华侨”一般稳守江山，“新华侨”则努力进军、开拓新市场。“新华侨”善于利用各种宣传渠道，注重包装，积极树立品牌的口碑、形象。因此，他们特别喜欢经营连锁店，企盼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市场，赚取高额盈利。目前已有几家“新华侨”创办的企业在日本成功上市，这些上市企业，一般都拥有数千名员工，全年营业额超过百亿日元，业绩骄人。

随着中国不断开拓海外市场，一些赫赫有名的中国企业，如中远集团等，都已经进驻日本。此外，中国的一些银行，也纷纷到日本来设立分行。

1999年，由新老华侨，以及拥有中资背景的日本企业共同组成的日本中华总商会正式成立。这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华侨华人经济团体，拥有百余名会员，定期举办各种经营管理讲座、交流会和经济论坛等。日本中华总商会成立至今，不断发展壮大，努力推动着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促进中日友好关系。

新老华侨中人才辈出，除了在经济领域表现出色，更有不少华人学者、专业人士在大学、研究机构中任职。如今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中已有超过3千人取得博士学位，约2千人在日本大学担任教授和副教授。

由华人博士、教授创立的“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会”，组织在日华人学者，自资结集出版了中、日文学学术报告，也定期举办交流会，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中文热潮中的华侨名校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日商贸合作日益紧密，中文热潮也在日本蔓延开来。在密密麻麻的外语招生广告中，“中文班”的招生广告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显眼。不少华人父母都认为在未来的就业市场上，掌握中文和日语的双语人才必定最吃香，因此，他们都鼓励孩子学习中文。

目前在日本约有2万5千名年龄介于5至14岁的华人儿童及青少年，但仅有五所全日制的华侨学校。它们分别位于神户、横滨、大阪和东京，总共只能容纳约2千名学生，供不应求，故入学竞争非常激烈。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近几年，那些为新移民子女特设的周末中文学校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解决了“新华侨”子女学习中文的问题。

由于华侨学校在法律上不受日本政府承认，得不到教育部津贴，主要依赖华侨社会的捐献、学生的学费及各单位提供的补贴，故校方在短期内根本没能力扩建校舍来容纳更多学生。

神户同文学校校长金翼无奈地说：“报读人数逐年增加，我们唯有通过小学入学考试的方式，让学生公平竞争，以获取入学资格。”

华侨学校主要提供小学和初中教育，有些还设有幼儿园。在小学阶段，课程内容都是根据中国大陆、台湾的教材编写，让孩子从小接触中华文化，了解民族的历史。一名老师说：“上课时，我们中、日语交替使用，因为大多数家庭都把日语当母语，孩子完全没有中文基础。”

对这些小学生而言，中文比日文难学得多。尽管在听、写方面还能应付，但一开口说起中文，却又信心不足。一个华人少年，操着不甚流利的中文道：“小时候，身边的朋友都说日语，中文没人听得懂，所以我觉得中文没什么用，就不太愿意去说了。”大部分年轻人是在升上大学之后，才体会到掌握双语的好处，并开始自动自发，重新学习中文。

由于华侨学校的文凭不受承认，学生念完初中后，必须到日本学校继续念高中。为了让学生们顺利升学，华侨学校的初中课程，完全采用日本初中教育的教材。

神户华侨学校的训导主任杨震雄说：“无论黑板上、课本上，或是学生的笔记，写的都是日文。只不过，老师们仍用中文讲课，让学生始终能有鲜活使用中文的机会。”

大部分华侨学校毕业的学生，都能顺利考入日本高中，例如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高中升学率为100%。因此，华侨学校成了日本社会眼中的名校，不少日本家长都想送孩子前来报读。

华侨学校向来也是华侨社会相互联系的纽带。在日本，凡有华侨学校的地区，华人子女大都毕业于该校。华人即使初次见面，只要说出自己是华侨学校的校友，彼此马上熟络起来。在神户同文学校执教超过30年，退休后担任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馆长的蓝璞走在神户街上，总有许多受过他教诲的学生亲切地唤他一声“蓝璞老师”！有些还恭敬地90度鞠躬呢！

对“新华侨”来说，子女的教育问题是最大的烦恼。华侨学校不多，收生名额少，他们年幼的孩子大多就只能接受当地的义务教育。中文虽是家中沟通的语言，但一旦踏出家门，便无用武之地，中文水平也就难以提升。

日本的周末中文学校，主要就是为这些“新华侨”的子女而设，让他们通过每周约90分钟的时间来学习中文。目前，拥有12年历史的同源中国语学校，已成为东京规模最大的周末中文学校，分布在东京十个不同的地区，学生人数达1千人左右。理事长杨林说：“父母的表现很积极，风雨不改送孩子来上课。然而小孩的兴趣、耐力不足，程度一加深，就想放弃了。”

日本的华侨华人，始终在困境中认真办学，华社热切希望日本政府，能及早予以华侨学校应有的法律地位，让它能突破重重困难，造福更多的华人子女。

- 1898年成立的大同学校是在孙中山首倡、梁启超和康有为协助下，在横滨由华侨创办和独自经营管理的全日制学校，可称得上是世界上第一所近代华侨学校，也是今天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的前身。

在融入与归化之间

日本社会总给人一种守礼、严谨的印象。平日电车门一开，一大群西装笔挺的男士、套装齐整的上班族一拥而上，个个脸上神情冷静，营造出日本社会严肃、低调的整体形象。至于那些“老华侨”、土生华人，或居住超过三五年的“新华侨”，无论气质或生活细节上的表现，已俨然是一个“日本人”了。

“日本社会讲究团体精神，华人的融入，可说是很自然的，而顺着主流社会的方式去生活，也轻松得多。”这是在日华人最大的体悟。在日华人受日本文化影响的部分还真多。例如，彼此碰面或告别时，以鞠躬代替握手，说话时语调轻柔，与人相处不过分热情，学生和上班族都习惯带便当出门等。

此外，华人也跟日本人一般，开始讲究“空间文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总保持着适度的距离。华人说：“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正是这个意思。”举凡串门子之类的活动，在当地华人社会并不多见，他们尊重彼此的隐私，公私分明。平日也都忙着各自的工作，往来不多。

欣然融入当地生活是一回事，归化为日本国民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中日之间复杂的历史纠葛让在日华人在选择时多了一层犹豫和顾虑。

目前，日本政府希望透过教育，以及更宽松的归化条件，吸引华侨归化为日本公民。不过，一些早已落地生根的老华侨，却始终不愿入籍日本。

“他们贡献良多，单是长期缴纳的税务就是天文数字。不过不入籍，他们就永远没有参政的权利。”年轻华人惋惜地说。

近年来，入籍的华人越来越多，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本身对日本没有深厚的情感，纯粹是为了旅游、事业及生活的方便等因素，而选择归化；第二类则是因为打从心底喜欢日本，才毅然选择归化。一位入籍日本的华人说：“归化前不知道何去何从，归化之后，家就在这里了。”

但无论入籍与否，华人对传统文化的情感还是会深埋在心底。一些传统节庆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依旧会激起在日华人的热情。对华人而言：“形式上是元旦热闹，但内心深处，还是春节最重要。”

由于春节并非公假，大多数华人仍须照常工作、上学。结束忙碌的一天后，有些人回到家边吃饭边收看电视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感受热闹的过年气氛；也有人通过长途电话向远方的亲友拜年。

许多国际婚姻下出生的孩子，或在日本土生土长的华人子女，对春节并无深切的感受，甚至缺乏具体的想像。因此，有些父母会带孩子去逛一逛春节色彩浓厚的唐人街，顺便向孩子解释华人传统春节的点滴。

近年来，日本政府也费尽心思在华人春节期间举办一些旅游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前往日本观光，营造热闹的春节气氛。尽管整体而言，日本的年味是淡了些，但每次春节的来临，还是让许多在日华人深感温馨。

至于元旦，则是日本社会最重视的节庆，举国放假一星期。国情如此，许多在日华人干脆就把元旦当作春节来过。不少华人家庭全家聚集在一起包饺子，吃中式烹调的日本年糕，有些父母也会给孩子发压岁钱。

此外，华社之间也会互相拜年祝贺，往往还有热闹的团拜活动。横滨的中华街及神户的南京町，每年都呈现舞狮舞龙，以及传统中华舞蹈、杂技等表演，与日本社会一同欢度新年。

此外，每年清明节也是“老华侨”非常重视的节日。在神户，华侨拥有自己的中华义庄。清明这一天，中华会馆就在义庄的祝堂举行公祭仪式，而其他华侨家庭，也会在清明前后的一个星期，到义庄来扫墓，以寄孝思。

- 神户南京町的“春节祭”，以独特的中国风味吸引了大量游客。（照片由神户华侨博物馆提供）
- 位于神户的华人义庄。（照片由神户华侨博物馆供）

“新华侨”成中文媒体生力军

目前，在日本约有60多家平面、电子中文媒体，其中90%都是“新华侨”在经营。自《留学生新闻》于1987年创立以来，日本中文媒体圈越发热闹，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营运超过15年的《东方时报》和《中文导报》，称得上是实力强，表现突出的中文报。

近年来，日本东京的池袋，成为新一代中文媒体的集中地，《半月文摘》、《华人周报》、《阳光导报》等中文报都在此营运。

身为传媒大国的日本，日本大报——《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每日发行量超过1千万份。相比之下，中文报在当地可谓小巫见大巫，微不足道。《中文导报》的主编杨文凯坦诚地说：“日本政府从不严加管制中文报，因为它对当地主流社会的影响微小，没有任何威胁力量。”

如今“新华侨”已成为中文报的主要读者群，陪伴报馆一起成长的老读者越来越少。一部分“老华侨”平日已习惯阅读日报，听日语新闻，另外通过华侨总会或各宗亲团体发行的会讯、月刊来掌握华社发展动态。不过在进入科技时代后，日文或中文报纸对年轻人而言都不重要，他们能吸收资讯的渠道太多了。

读者群的流失，对中文报的收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更大的威胁，却来自于免费报。不少企业集团纷纷办起免费报，给传统报业带来了激烈的竞争，更影响了传统报业的发展。

现在，大多数办报人已将办报看作一门生意，而非文化事业。坚持内容质量的报人不得不感叹：“文人办报，已成过去。”大多数的免费报纸都以广告为主，如同广告合订本，正如一名中文报记者所说：“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的资讯，大家还能要求什么呢？”

随着近年来日本的中文热不断升温，有人相信中文报业必定能找到生存的空间。目前，中文报除了为华人读者提供讯息外，对学习中文的日本人来说，更是最生动鲜活的教材。

- 《中文导报》报社内，编辑们正忙碌地编写新闻。
- 日本中文报种类丰富，风格各异。

其他资讯

横滨中华街

横滨规模最大、最繁忙的中华街，就坐落在横滨中区的山下町。岁月悠悠，它见证了老华侨在日本创下的辉煌成就。

横滨开埠140年，中华街风雨相伴，对横滨的发展影响很大。

如今，山下町住着3千名左右的华人，中华街是他们生活、工作、休憩及休闲玩乐的所在。

2004年，横滨的高速铁道开始运作，不但“元町－中华街站”被设为终点站，还有电车直达中华街。交通网络发达，使中华街的知名度大幅度提升。除了年均游客增至1800万人次外，直接的经济效益更高达500亿日元之多，令人刮目相看。

中华街各处，色彩鲜艳、古典精致的牌楼林立。走过牌楼的霎那，人仿佛坠入了神秘的时光隧道，来到了繁华的旧上海。两旁街道上尽是中餐馆、杂货行和会馆等，古色古香的中式建筑鳞次栉比，散布在中华街的各个角落。

漫步街头的游人，偶尔抬起头来放眼望去，还会看到那传播中华文化的展览空间——“九龙陈列窗”，将中华街的特色展露无遗。

这条街上，不但洋溢着浓厚的华人色彩，还充满了生命的热力。

横滨唐人街团体联合协议会副会长曾德深指出：“这里的惯例是华人开餐馆，日本人供应食材。”多年来，中、日双方合作密切，打造了这条和谐繁荣的中华街，横滨市民更一致推介中华街为不可错过的旅游景点。“日本人一直都是中华街的主要消费群。”一名华人商家说。

- 横滨中华街上的牌楼。
- 横滨中华街繁忙的下午。
- 中华街上，以可爱熊猫玩偶为主的产品种类繁多，深受日本顾客的欢迎。

香火不断的关帝庙

在不少国家，宗教团体总是华人圈子里最活跃的团体。然而，在日华人中的“新华侨”，却多数没有宗教信仰，只有部分华人信仰佛教、基督教、道教或神道教。“老华侨”们则大多对于民间信仰较为重视。

由日本华侨建立起来的关帝庙，在当地名气非常大。在日本列岛上兴建关帝庙，已有120多年的历史。目前，在神户、横滨、长崎和函馆，都耸立着富丽、庄严的关帝庙。

其中，位于横滨中华街上的关帝庙，不仅作为横滨华人的守护神，也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尽管它曾多次毁于火患，但华人却一次次合力将它重建。位于神户的关帝庙，也曾遭受空袭、火灾、地震等摧残，但每一次也都在华社的协力襄助之下，重新修复起来。

横滨关帝庙，经年香火不断，除了华人信徒的膜拜，来访的日本、外国游客，也总是络绎不绝。每年的关帝诞，横滨关帝庙都会举办盛大的庆典，中华街上的每一户人家，每一间商店，都热烈地参与。热闹的游行，精彩的舞狮、舞龙、踩高跷、民族舞蹈等表演，吸引了大批群众围观，连日本电视台都特地前来拍摄。

每年8月中旬，神户的福建同乡则会在神户关帝庙里举办“水陆普渡胜会”，超度亡魂。诵经之余，大会上也焚烧金银纸品，祭奠十方冥灵。1997年，“水陆普渡盛会”还被列为“神户市地域无形文化财产”，受到充分的肯定。“不过，传统上必定出现的纸扎‘鬼王’却没了，因为日本人觉得鬼王的造型实在太可怕了。”当地华人笑着说。

近年来，神户关帝庙也成了华人、日本人赏月的好去处。烟霭氤氲的庙宇，显得古色古香，空气中飘扬着悠扬的二胡声。人们一边欣赏着素色流辉的月华，一边品尝月饼和中国茶，过个不一样的神户中秋节。

- 横滨关帝庙气势恢宏，时有虔诚的日本人和华人信徒前来膜拜，更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前来参观。

结语

一位日本老华侨给儿子出了这么个问题：“一场足球赛，若碰上日本对垒中国，你会支持哪一方？”儿子想了想，答道：“我心里支持中国。不过中国赢了，我也不会表现得太兴奋，还要顾及日本朋友的感受嘛！”这个回应，也是大多数华侨内心深处，最真切的答案。

如今，日本华侨社会正逐渐转型为华人社会。然而，许多华侨在归化后，心理上却从未放弃“华侨”的身份，这份矛盾的情感总是难以厘清。

韩国

引言

大韩民国简称韩国，位于亚洲朝鲜半岛上，北部以北纬38线与朝鲜相隔离。由于朝鲜与中国大陆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两国人民互动频密，经常越境进入他国。有学者更认为朝鲜半岛是世界上最早有华人的国家。

首都首尔（旧称汉城）人口大约为1063万，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朝鲜半岛最大的城市。20世纪60年代的贫穷国家韩国，通过高储蓄率和高教育水准，在短短的40年间，经济迅速起飞，跻身经济发达国家之林。

虽然在1997年因金融风暴而受到挫折，但是经过国民同心协力，韩国在短时间内克服了危机，重整汽车、造船、电子等主力产业，恢复了国家竞争力，表现杰出，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华人移民简史

华人正式以侨民身份定居韩国，是从1882年壬午兵变的那段时期开始的。那时候，山东登州的吴长庆将军受清廷的指示，率领3千名士兵前往朝鲜协助平息兵变。随行的还有40名商人，而他们也正是最早抵达韩国的华商。

那一年，朝鲜和中国还签署了《朝清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中国商人开始大批涌入朝鲜。当时选择移居到韩国的华人主要来自山东，也有一部分华人来自河北及江浙闽粤等省份。

嗣后，华人在汉城的商业活动范围从观水洞和水标洞，逐渐向南大门一带扩张。在汉城商业集中的中心区——钟路市场，也可看到许多华商经营的店铺。这些华商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主，商品包括麻布、棉织品、丝绸、麦粉、烧酒及金属铁器等。

除了商业活动，也有部分华人在韩国从事农业耕种。后来因为中国的局势动荡及经济衰败，导致不少华人到韩国去当土木建筑业工人。华人在各领域皆勤奋刻苦地工作，因此很快便在韩国积累起一定的经济实力。

然而，日本发动战争并进一步控制朝鲜之后，韩国华侨社会蒙受了相当严重的损失。1894年的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不断诱导韩国人仇视华人，借故在群山、仁川（Incheon）等地发动排华运动，并成功利用韩国人来打击当地的华人。

在排华高峰期，超过16万的华人仓皇逃往中国驻汉城领事馆寻求庇护。在许多老华人的心灵上，这段悲惨的过去是无法磨灭的伤痕。

1945年，朝鲜摆脱日本的统治，当时物资匮乏，华人抓紧机会从香港、澳门等地输入各类杂货以及日用品。因为贸易的蓬勃开展，华人口口开始直线上升，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行业，中餐馆如雨后春笋般在韩国发展起来，而专为中餐馆提供食材、炊具等用品的供应商也趁势崛起；为华人提供服务的理发业、裁缝业等同时受惠。这时，华人享有较好的社会地位，并称自己为“一等公民”。不过，这段繁盛的经济复苏期却仅是昙花一现。

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当地华人的地位便开始直线滑落。为了保护本国的公民，韩国政府颁布许多限制外国人发展的政策，其中尤以《外国人土地管理法》对华人的打击最大，该法律规定华人不得拥有土地，不少华人只好忍痛出售家族好几代人曾经住过的房子和土地。

有些华人被迫请韩国人代为注册，结果财产却遭人私吞，血本无归，申诉无门。此时，华人除了觉得生活毫无保障之外，更深感前路茫茫。离开，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约有两万多名华人离开韩国，美国成了这批华人的首选，有些则移居澳洲、加拿大等国。他们大多数拥有雄厚的资产，虽然已经身在国外，却仍然极关注韩国境内华人同胞的权益和发展。

后来，华人外流的现象逐渐减缓了下来，但是韩国华人的经济发展仍然处处受限，因此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当今生活风貌

引言

目前定居韩国的华人有两万多人，大部分散布在首尔、仁川和釜山（Busan）。他们通常以定期居留的身份在韩国居住，选择入籍的并不多。另有数十万中国朝鲜族长期旅居韩国，不过他们与汉族华人社会缺乏交流和联系，多数已逐渐融入韩国社会。

华人在经济上的表现并不耀眼，从事小本生意者居多，在韩国几乎找不到华人创办的大企业。年轻华人则逐渐融入主流社会，在韩国企业或机构打工。曾经辉煌一时中文教育在华人外移潮后也面对华人学生生源不足的问题，年轻华人的中文水平偏低，华语说得流利的年轻人寥寥可数。

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从大陆入境的华人人数每年都急速增加。2007年，中国留学生的总人数已经突破3万人。新登陆的中国大陆移民已大大超越原本定居在韩国的华人口口。

新老华人的相互配合，期盼能为华人社会注入新活力，进而扭转长期不振的颓势。

炸酱面撑起华人中餐业

中餐馆是韩国华人从事的传统行业。正如当地华人所说的：“如果说华人把生与死都寄托在餐饮业上，一点都不为过。”

韩国中餐馆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才算真正兴盛起来，在五六十年代的巅峰期，大约有58.2%的华人从事餐饮业，中餐馆共有2300多家。当时人们认为上中餐馆用餐是一件体面的事。

从70年代开始，因政府法令限制，很多中餐馆难以为继。不少韩国人学徒在学满之后，也纷纷自立门户。到1999年，华人经营的中餐馆只剩下680家，而且规模一般都不大，通常只能招待6至10桌的客人，稍具气派的中餐馆更是屈指可数。

唯一不变的是，炸酱面依然是韩国人最爱的中华料理，甚至成了“镇馆之宝”。仁川的中餐馆是这种韩式炸酱面的发源地。早年仁川开港，大批苦力到来，为苦力们提供三餐的华人餐馆，创出这经济实惠且可口的韩式炸酱面。

炸酱面的成本很低，如今售价也仅约三四美元，可算是最便宜的一道中华料理。一般受薪人士每周会吃上4至5次。虽然一些韩国人把华人戏称为“炸酱面”，但薄利多销的炸酱面还真是养活了不少华人。如今就连在美国，也有很多来自韩国的华人在中餐馆出售这独一无二的“韩式炸酱面”。

中餐馆主要的客源都是韩国人，因而口味都较为清淡。无论是炸酱面、小笼包或饺子等，上桌时都一定会附上韩国人最爱的泡菜和其他酸菜。韩国人曾千方百计地拒绝外国人和外来文化，但华人却把中华美食融入韩国的日常生活，进而征服了韩国人的味蕾，可说是华人在韩国的一大成就。

年轻一代的韩国华人一般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因而不像父辈一样局限于餐饮业之类的传统行业里。

一名年轻的华人大学生说：“华人子女在韩国升学时压力并不大，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外国人’，可以以优惠分数进入不少热门科系，比如医科。”不过，外籍身份让他们在择业时受到颇多限制，华人绝少有机会担任律师、教授或公务员等职位，大多专注于传承和发展家族事业，或自行创业，或加入其他企业机构成为工薪族。

华人的就业圈其实非常狭小，可供选择的职业并不多，中医在韩国被称作“韩医”，是华人社会中的常青职业。韩国人对韩医学的接受度相当高，并且深受影响，就连畅销韩剧《大长今》也大力宣扬韩医学。由于“韩医”书籍都以汉字书写，掌握汉字的华人子弟就占了优势，学习起来更省功夫。在韩国由华人经营的韩医院超过百间，药房也有数十家。华人当“韩医”，一般都拥有不错的收入，也受到社会尊重。

除了“韩医”，一小部分成绩优异的华人子弟，则成功考上韩国大学的医学系或牙科系。从医的华人可以晋身上流社会，过舒适生活，也容易被韩国社会接受，甚至受到重视，他们可算是最不想离开韩国的华人群体。

旅游业是另一个受华人欢迎的行业。近年来，韩剧风靡亚洲，慕名前来观光的华人游客不断增加，兼通韩语和汉语的韩国华人就成了最佳的导游人选。拥有足够资金的韩国华侨则开办旅行社，除推出吸引华人的韩国旅游配套外，也为韩国人设计中国观光团。随着两国人民的往来日渐频密，不少华人旅行社仅以代购机票为主业亦能生存。

此外，随着韩国流行文化在各国大受欢迎，亚洲华人对韩国商品如服饰、礼品、化妆品等青睐有加，有些韩国华人看准时机，成立了包装公司，为来韩国选货的商家包装商品，然后寄往海外销售。

与此同时，“中国风”也吹向韩国，韩国人学习汉语的热情在不断高涨。为此，许多韩国华人或华人留学生做起中文辅导老师，向韩国人传授中文。不少从台湾留学归来的韩国华人也投身教育，把所学知识传授给当地华人，继续推广中华文化。有些华人更在大学里任职中文系讲师。

- 中华料理在韩国十分流行，除了华人，很多韩国人也经营中华料理，一些华人特别在招牌上注明“华商”二字，让顾客易于辨识。
- 韩式炸酱面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酱料，如今在韩国只有两家厂商拥有它的制作秘诀。
- 旅居中国的中国朝鲜族使用韩语沟通，生活方式与韩国人一样，非常容易融入韩国的社会。如今，华人社会仍在辩论是否要将朝鲜族归为新华人移民统计，若是加上这些朝鲜族人，韩国的华人总人口可能已经超出了十万人。

生活安稳 内心惶惑

与韩国华人谈起生活，他们总是欲语还休，眼神中有矛盾，语气中有些许失意。他们在经济上没有骄人成就，最叫人困扰的是模糊的身份。他们生活安稳，却总觉得不踏实，当然也就无法真正地快乐起来。

华人中，约90%祖籍山东，持台湾护照。他们生活的重心都在韩国，有些已经在韩国繁衍至第四代，但家族中却无人申请入籍。在韩国他们被当成中国人看待；到台湾或中国大陆，他们则被看成韩国人。华人苦笑说：“真是生的不亲，养的不爱。”

未取得韩国国籍的华人在生活上面对不少障碍。经过多番争取后，在2002年3月，韩国政府终于给他们颁发永久居留权。在这之前，他们只能以“定期居留”的身份在韩国生活，每三、五年必须更新居留申请。有些人因错过了申请期限，而离开韩国。

现在华人申请入籍的条件放宽，程序也已经简化，比如不需要参加韩文考试，入籍时也不需要宣誓效忠韩国。不过，许多华人并不积极申请入籍，从1992年至2006年，入籍的仅有2004人。

获得永久居留的身份之后，华人所享受的福利并没有提升，比如无残疾福利和医药福利。在日常生活中，许多网站和手机服务依然把永久居留者当成外国人，而无法注册和使用相关服务。华人无奈地说：“虽然可以永久居住，但我们依然只是个外国人而已。”

虽然华人都要像韩国公民一样，定期缴纳各类税金，但却没有被给予参政的权利。2006年，韩国政府终于让居留三年以上的华人拥有地方选举投票权。不过，不少华人却认为，华人居住地不集中，零零散散的华人选票，在地方选举中发挥不了作用，也难以以为华人争取到任何福利。

人数不多的华人并没有形成一个密集的华人住宅区，他们大多分散居住在韩国各地。不少华人碰面时，总会讨论起哪一处的房子比较好，哪边的房子价格便宜等，从而推荐亲戚朋友一起居住，当起邻居，形成小小的华人圈子。与许多韩国中产阶级一样，华人大都有能力买房子，最多人选择在公寓的小单位里，筑起自己的安乐窝。

其实，韩国的房价不算贵，一般中等收入的华人家庭，都有能力购买房子。但由于之前政府对外国人购买房地产加以管制，即使再富裕的华人，也无法拥有太多的房地产。“现在虽然政策已经开放，但多数华人的经济状况并不允许我们把钱花在房地产投资上。”一名年长华人透露。

华人虽然保住自己的国籍，但要保住中华文化却不容易。许多华人家庭虽仍吃着中餐，但餐桌上无时无刻不能缺少的，是韩国人最爱的泡菜。许多华人离开韩国去旅行或探亲，最挂念的就是韩国泡菜。他们说：“对泡菜，从一开始的不能接受，到现在不能割舍，我们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泡菜文化的入侵，其实象征着韩国文化早已一步步入侵华人生活的各层面。

走在韩国街头，男性上班族都穿着西装大衣；女性则化上亮丽妆容，装扮优雅，大家都穿上最流行的服饰，画面和谐，乍看之下，根本分不清谁是韩国人，谁是华人。居善堂文化协会主席毕可信说：“韩国社会不喜欢大红色，所以即使过春节，也甚少看见华人穿上大红色衣或传统服饰招摇过市，我们的品味，也与韩国人越来越接近。”

华人较为坚持的就是红白事的习俗。比如每逢婚宴喜庆，韩国人爱用高雅白色为主色，华人却喜欢以热闹的红色增添喜气。红彤彤的请柬、红包封，和韩国人的全白装饰，正好形成强烈的对比。至于殡葬礼仪，也已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简化，如今选择火葬的华人比土葬的多，但许多华人仍坚持出殡当日，灵车须绕过往生者住宅，才送往坟场或焚化场。

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华人已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但潜意识里，华人并不希望自己变成韩国人。“要我们穿上传统韩国服装过韩国节庆是绝不可能的事！”一位华人男子坚决地说。中韩两国的历史包袱，经过百年的岁月洗涤，似乎还没完全放下。

中韩通婚家庭的文化撞击

在这个提倡自由恋爱的年代，即使许多父母对韩国人没有太大的好感，他们却阻止不了下一代与韩国人恋爱和通婚的情况。

浪漫的韩剧风靡全世界，然而，生活在韩国的华人女性却感叹：“现实与电影的落差实在太大了！”韩国社会还保持着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一名家长说：“我们通常不反对儿子讨个韩国媳妇，却并不希望女儿嫁给韩国男人。”大多数华人父母都不忍心看着心爱的女儿嫁入韩国家庭。在韩国家庭里，太太必须为家人准备三餐，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把小孩照顾得无微不至，还要对长辈千依百顺。

繁重的家务把妇女压得喘不过气，而与韩国婆婆的相处之道，更是令许多华人媳妇费尽心思。每年多次的祭祖活动，媳妇都必须参与准备工作，如果是长媳更责无旁贷，一般必须扛起祭祖的重担，为此媳妇们必须向婆婆学习祭祖的每一个细节，小至贡品摆设，都要依照婆婆的指示，令华人媳妇头痛不已。

一名从台湾嫁到韩国的太太说：“韩国男人一般只负责挣钱养家，家里的大小事务，包括孩子的教育问题都由妻子打理，许多男人连孩子念几年级都答不出来。还有，韩国人嗜酒如命，丈夫下班后若有工作应酬，常常都要喝个通宵，太太也不能过问或抱怨，只能默默为丈夫守门。”

从相识相爱到相守，不少中韩通婚的家庭都面对了重重考验。台湾新娘游晴惠由衷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都摒弃各自的文化包袱，找到属于每个家庭独有的文化，才能拥有幸福的婚姻。”

韩国华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休闲活动很单调。空闲时，他们最爱的消遣就是搓麻将、和三五知己小酌聊天、唱卡拉OK、打高尔夫球、或在家中追看中国和韩国电视剧。韩国的科技和网络非常发达，年轻人都非常喜欢上网，玩线上游戏、聊天、听歌、写部落格等等。

随着网络日趋发达，年轻华人和海外的中文流行文化完全接轨。华人世界流行的综艺节目、歌曲、电影、偶像剧等，他们都了如指掌。不像以前，香港“四大天王”和台湾F4走红的年代，网络还不发达，追星族要到一些华人开的书店才能买到相关的光碟。中华书店的老板回忆：“当年香港的四大天王当道，每天都有歌迷排队等着买光碟、杂志等。F4也不赖，在这里的华人圈中足足红了两年。”不过，近年韩国娱乐圈和流行文化走势凌厉，不少年轻华人转而崇拜韩国偶像。

- 中韩通婚，华人采用红色柬，内容则印上中文和韩文。

华文教育惨淡经营

曾经，仁川是华人口最密集的地方，由早期华人筹办的仁川华侨学校，至今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至2007年，韩国共有24所华侨小学和4所华侨中学。大多数的华侨学校创立于华人社会最繁盛的时期。各校采用的教材全由台湾侨务委员会提供，除了韩文和英文课之外，所有科目都以中文授课。

韩国政府不承认华侨学校，因此不予津贴。学校经费主要来自学生学费及华人的捐助，台湾和大陆方面则不时给学校增设硬体设备或财政补助。学生人数较多的汉城华侨小学及汉城华侨中学，校舍以及硬体设施都健全，但一些地点偏远、人数又少的华侨学校，学习环境则不太理想。汉城华侨中学校长孙树义说：“华侨学校给教师的待遇不俗，所以优秀的教学人才并不难求。”毕业自台湾或韩国大学的华人教师占大数，也有少数韩国教师。

近几年，各华侨学校内中韩混血儿的比例不断增长。在汉城华侨小学和中学，大约40%的学生母亲都是韩国人。此外，一些韩国家长把孩子送到华侨学校来学汉语。如今，华侨幼稚园和小学的韩国学生比例也逐渐超越华人学生。

在釜山华侨小学，韩国学生占了该校总学生人数的80%。釜山华侨小学校长说：“虽然看似越来越多韩国家长选择了中文教育，但这并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华侨学校‘学生荒’的困境。许多家长为了让孩子学好韩语，以方便日后升学，往往会在小四时把孩子转到一般的韩国学校学习。结果，华侨学校总会突然流失大量高年级学生，这情况不止打乱班级编排，还影响教学进度。”

除了汉城华侨小学和中学的学生人数符合理想外，仁川华侨学校的中、小学加上幼稚园的总人数不足500人，和高峰期的千多名学生相比，相差甚远。其他华侨学校更是惨淡经营。

华侨教育之路真是困难重重，家长对华侨教育的信心也开始动摇。大多数家长希望孩子掌握好中韩双语，了解中华文化，加强孩子对“华人”的身份认知。可是也有一些家长认为华侨学校的中文教学水平偏低，无法媲美中国大陆或台湾。为了提升学生们的中文水平，校方不得不规定学生在校内不许说韩语，但每次下课钟声一响起，同学、家长就自然地以韩语交谈。华语的使用，仅局限于课堂上。

家长感叹，连小朋友最爱的卡通人物都讲韩语，孩子又如何能抗拒韩语和韩国文化呢？在韩国，最缺的正是鲜活使用华语的环境，孩子们在家中、邻里、朋友圈内，主要都以韩语沟通。一名家长说：“很多年轻华人虽懂中韩双语，但说韩语时突然出现华语词，说华语时又夹杂着韩语词汇，非常混乱。换言之，双语的整体水平都下降了。”有些家长为避免孩子两种语言都学不好，干脆把孩子送到韩国学校去，专心学好韩语。

“汉语热”在韩国慢慢升温中，不少大型书店内售卖的汉语学习教材也越来越多元。至于华人经营的小书店，对汉语爱好者来说，更是个小宝藏，中国历史、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等书籍一应俱全，比许多韩国大型书店的中文图书更丰富多元。一位书店老板说：“最受韩国社会欢迎的还是汉语教学和玄学之类的书籍。”

- 仁川华侨学校走过百年风雨，如今同样逃不过生源逐年减少的命运。
- 校园内挂起“请说中国话”的布条，鼓励学生在校园内多使用华语交谈。在日常生活中，华语的地位已逐渐被韩语取代。

华文媒体、华人社团缺乏生气

华人已经习惯了生活在一个以韩语为主的环境。韩文书报、电台和电视节目，是华人社会吸收资讯的主要管道。华人经营的中文报章《韩中日报》因经费短缺，于2007年7月停刊，然而这对华人社会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冲击，华人几乎都能从韩文报章中吸收最新资讯。韩国电视节目精彩多元，也满足了大部分华人的需求，少数华人则透过卫星电视收看中国电视台。

近年，韩国当地报章如《朝鲜日报》和《东亚日报》，开始在各自网站设立中文版，希望华人能更了解韩国的各大政策，也希望韩国人民更清楚中国的发展动向，以加强两国的联系和交流。

2007年11月28日，韩国第一份由韩国人创办的中文报纸《亚洲日报》正式出版发行，主要以报道中韩两国经济、产业和文化新闻为主，还设有华语学习栏目，为了突出中文报纸的特色，《亚洲日报》在韩国招聘了50余名经验丰富的新闻从业员，其中在韩华人占了大部分。驻韩的中国人、华人团体，以及关注中国的韩国人都是该报锁定的主要读者群。

中文媒体既无法负起宣扬文化的责任，华人社团就扛起了这个使命。1949年后，各地纷纷成立华侨协会。目前运作尚好、规模较大的有汉城、仁川、釜山等地的华侨协会。华侨协会具有一定行政职权，比如帮助华人登记户籍和办理结婚书等。

近年来，不少新的华人团体陆续诞生。其中，华商团体最为突出，如1999年成立的韩国华侨商人协会和2004年设立的韩国中华总商会。后者2005年在首尔成功主办了第八届世界华商大会。此外，2002年2月，华人正式成立韩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不过，总的来说，华人对社团活动不甚热衷，许多团体在成立后就渐渐沉寂，活动很少。

- 韩国曾把佛教列为国教。源自台湾的佛光山在首尔设立了会所，成为华人及韩国佛教徒礼佛交流的平台。每年韩国社会隆重庆祝佛诞节，华人佛教徒也积极参与这一庆典。战后基督教在韩国发展迅猛。在华人较多的地区，宣教人士用华语广播来宣传教义，吸引华人聆听。长期以来，华人都有稳定的信徒人数，同时不少地区也开设华人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有人预言未来华人基督徒人数会不断攀升。

中韩习俗 互相交融

中韩两国关系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对韩国社会的影响深远。反映在节庆习俗上，春节和中秋节，成了华人和韩国人同庆的佳节。

农历新年是韩国华人最期待的传统节日。春节举国放假三天，韩国人都赶回家和家人团圆。除夕夜里，华人家庭成员聚在一块，包饺子，吃团圆饭。一些熟知传统的华人笑说：“如果新年正好赶上本命年，那么就要在除夕夜穿上大红内衣裤来冲喜。”长辈在除夕夜会给小辈派发压岁钱或红包。初一到初三，华人要么到亲友家拜年，要么参与华人社团主办的春节团拜活动。这里的春节没有传统的放鞭炮，不过小孩仍可点点烟花，增加欢乐气氛。

中秋时节，韩国举国上下同样休假三天，华人对中秋节的重视程度不如韩国人。一名华人说：“除了中韩通婚家庭外，一般华人家庭最多吃月饼庆祝，但韩国人一定要赶回家团聚，并举行祭祖仪式。”韩国人喜欢在中秋节送礼给亲友，不少华人也入乡随俗，在佳节期间赠送礼品给家人或韩国朋友。

- 中秋节，韩国街头售卖各种口味的月饼。

其他资讯

名不副实的唐人街

坐落于首尔明洞中国大使馆旧址前的馆前街，是早期华人聚居和经商的地方，一度被称为“唐人街”，但现在街上大部分都是韩国人经营的商店，华人店铺已所剩无几，汉城华侨小学、汉城华侨协会以及居善堂文化会是馆前街上最具活力的华侨组织。

首尔之外，在仁川的善邻洞，有一条“中华街”。华丽的牌楼上写着“中华街”三个大字，穿过牌楼，映入眼帘的是红彤彤的建筑物、汉字招牌及大红灯笼等华丽的装饰，与寂静的大街形成强烈对比。只有在周末，这里才会显得较热闹。很多韩国人为了品尝中华料理而来，另有不少是随旅行团到来的观光客。这被精心打扮过的中华街，万事俱备，却缺少了最重要的元素——人气。

在釜山亦有一条唐人街，因釜山与上海结为姐妹城市，所以政府在釜山开辟了一条“上海街”。“上海街”经过翻修后，韩国政府还特别举行了启用仪式，不过街上只有少数由华人经营的餐馆、杂货店及卡拉OK歌厅，而半数左右的商店几乎都由俄罗斯人经营。看到迎面而来的俄罗斯人比华人还多，不禁让人叹息：这真是一条名不副实的上海街啊！

2005年，中韩双方签约，决定在首尔西北的京畿道（Gyeonggi-do）高阳市（Goyang）建造一个新的中国城，首期工程耗资1.2亿美元，在2007年启用。可是在所谓的中国城里，韩国人经营的商店远远超过了华商经营的店铺。

“要发展成一个真正的中国城，我们必须让那些离开的华人回来，或者带来新的华人。如果没有华人，我们怎么能叫它中国城呢？”这是中国城内一名华商的心声，相信也反映了其他华人的看法。

- 仁川唐人街的牌楼。
- 巨幅广告矗立在人烟稀少的中华街上，感觉特别冷落。

居善堂文化会

居善堂文化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华人团体。它的前身是华人礼佛拜仙、祈福保平安的寺庙，也是华人举办红白事的地点。1982年，居善堂在原址修建成6层现代大楼，并将原本供奉的神祇迁至五楼，每天都准时开放给华人礼拜。可惜信奉道教的华人日益减少，楼层高又不方便前来烧香，殿堂内总显得寂静冷清。

居善堂从早期华人的宗教场所，演变成今天的居善堂文化会，除延续早期供奉神祇的功能之外，还每月出版会刊，定期颁发奖学金给家境清寒的华人学生，以及每年年末举办大型同乐晚会。如今，道教在华人社会日渐没落，居善堂里保存的具有历史价值的神龛、神像、香炉等，显得更加珍贵。

- 居善堂文化协会供奉的神像和古董摆设，都是无价的历史宝物。

结语

在国外的一些韩国城一带，许多韩国料理、超市的经营者，都是韩国华人。华人在韩国与韩国人的关系疏离，但到了海外，彼此却延续着一种微妙亲密的关系。

韩国华人对韩国的情感是矛盾复杂的。历史上两国之间的关系、上一代的境遇，都成了华人肩上无形的包袱。曾在仁川华侨学校执教的孙老师说：“也许我们应该想想能如何为这个国家付出，如何去回馈当地社会，不是一味把自己当外人看。”

韩国政府目前开始颁发永久居留证给华人，留学韩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也在直线上升，中韩两国贸易日益繁荣，未来华侨社会是否能摆脱之前那抑郁不得志的形象，重新出发，着实叫人期待。

印度

引言

印度具有极其浓郁的宗教人文气息，这种独特的气息使它蒙上一层谜样的色彩，并且散发出慑人的魅力。此外，印度的美食、手工艺品、庙宇及娱乐业，也都一直引起国外的高度关注。

近年来，印度的农业和工业都有迅速的发展。只是，几千年的种姓观念依旧根深蒂固，贫富悬殊仍是无法跨越的鸿沟。加上近年来失业率、文盲率高居不下，传染病频频肆虐，这一切，都延缓了印度前进的脚步。

华人移居到这个荷花、孔雀和菩提树的国度，已经超过两百年。然而，随着传统行业的没落，华人纷纷移民国外，如今只剩下3千人左右，显得分外渺小、脆弱。

于是，一种寂寥、落寞之感，笼罩着整个印度华人社会，更弥漫在当地唐人街萧瑟的大街小巷之中。

华人移民简史

1770年，一位名字叫作杨大钊的广东茶商，由于在海上遭遇风浪而迷航，结果鬼使神差地漂到加尔各答（Calcutta）下游的胡格利河畔。杨大钊将错就错，干脆在当地定居下来。

与时任孟加拉总督华伦·哈斯丁（Warren Hastings）经过几番交涉之后，杨大钊把河畔周围的土地开辟为甘蔗园，再从中国引入数百名劳工到园子来工作。这批中国劳工均有幸获得当时英国殖民政府的承认和保护。

不久后，杨大钊在印度逝世，其员工继承了他的甘蔗事业，不过业绩却差强人意。最终他们只好把甘蔗园、土地及机器都转卖掉，大伙儿一起移居加尔各答，迎向新生活。

在当时的加尔各答市中心，也聚集了许多中国水手以及船务工人。船只停泊期间，他们往往必须在印度呆上几个月，而边等边打工，则是最实际的做法。船员们凭着木工和机械维修的手艺，逐渐于当地闯出了名堂。一些华人在获得稳定的工作后，决定终结四海为家的漂泊生活，自此在印度定居下来。

早期的印度华人，辛勤工作，所赚足资糊口。有不少远在中国的华人风闻在此的境况而蠢蠢欲动，尤其是那些具有特殊技能的华人，便从动荡的中国南来，到这里投靠亲友，展开新人生。

1930至1940年间，是华人移居到印度的高峰时期，那时华人人口一度高达5万人。主要原因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许多华人携带家眷涌入印度来避难。此外，一些不愿意受日军操控的缅甸华人也移居到这里来。

印度华人日益增多，而加尔各答也成了华人扎根印度的集中地。据印度独立时的官方记录显示，当时全印度总共有3万名华人，单是加尔各答就已占了三分之一。

那时，华人大多数都抱着落叶归根的观念，待时机成熟了，就携带家眷重返中国。但是，二战结束之后，国共之间的激烈内战，导致境内满目疮痍，风声鹤唳，华人返乡的心愿于是纷纷落空。然而，华人并没有就此怨天尤人，反而卯足全力打拼事业，决心在印度建立起美好的家园。

在这里，各籍贯的华人都各有所长，称霸于不同的经济领域，也渐渐形成稳定的传统行业。客家人对皮革加工情有独钟；广府人擅长于机械维修以及木器制作；手艺出色的湖北人就擅长镶牙、纸花制造；人数比较少的上海人则从事洗衣业。

大多数华人都经营家庭式的小生意。异地创业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华人还不至于如同贫困的当地人般露宿街头。他们大部分都有自己的房子，生活简单而安定，孩子们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在这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度里，华人可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之战，两国原本的友好关系顿时生变，并且导致一连串的排华事件，使华人深受折磨。不但商店屡遭查封，数以千计的华人还被送进了集中营，在那拥挤而脏乱的营房中，健康、自由和意志几乎都被磨灭殆尽。

在排华期间，有两百名左右华人被驱逐出境，其中包括中文教育工作者。最终，约有五分之一的华人含泪离开此地。

至于那些自愿，或者由于个人因素而留下的华人，至今仍然在印度过着平静的生活。时移境迁，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逐渐和缓，双边贸易也开始增长。然而，在许多长辈的心底，排华事变的阴影还是挥之不去，偶尔夜半扪心暗思量，结疤的伤口仍然在隐隐作痛，每每忆起这段往事总会令人黯然神伤。

- 后人为了纪念杨大钊，把他所开发的胡格利河畔平原命名为阿钊坡，并立下墓碑和土地公祠。
- 加尔各答Cheenapara的唐人街附近，有一条中山街，以及一条鲁迅街，这两个街名均沿用至今。近年来，印华文化发展协会积极向政府争取在唐人街设立路标以及牌楼、打造美食街、兴建文化馆等等，为未来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 穿梭于加尔各答大街小巷的三轮车以及黄包车，最初都是由华人传入的，如今，已经成了印度最廉价、最传统的一种交通工具。

当今生活面貌

引言

区区3千名华人，在印度犹如沧海一粟。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后，印度华人在经济、生活上遭受沉重打击，移民热潮开始在华社延烧。短短数十年间，华人人口大量流失，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成员在海外生活。“希望下一代能拥有更好的将来”，往往是华人选择离开的原因。

祖辈们最早落脚的加尔各答，至今仍是华人最密集的地区；塔坝中国城，更是客家人稳守多年的堡垒。至于孟买（Bombay）、新德里等城市，只有少数华人定居。

客家人乃是印度华社最大的群体，其次是广府人。华人们大多跳不出传统经济的框框，恪守着多年形成的传统行业，各自谋生。

近几年，由于传统行业的发展出现瓶颈，华人开始尝试开拓新兴领域。餐饮、时尚、美容业纷纷崛起，犹如一股新气息，注入疲态毕露的华社。

年轻一代的华人，终于摆脱了挥汗卖力的生涯，一般拥有高中以上的学历，成为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华人坦承，自身在印度的发展空间太有限了。年长的一辈曾经沧海，对生活早已无所奢求，情愿终老印度，留着一辈子建立起来的事业和家园。然而，长辈们都会鼓励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勇敢走出印度，到外头更辽阔的世界龙腾虎跃一番。

客家皮革厂创奇迹

印度华人曾以皮革业闻名全世界，而印度最大的华人皮革中心，就坐落在加尔各答市的东向边缘，一个叫塔坝的地方。

19世纪初，一名熊姓商人开始在此设厂。从此，一代代广东梅县客家人，在这十多平方公里的沼泽地上，创建了第一代皮革王国。

今天，在塔坝社区入口处，立起一个以中文、英文、印地文和孟加拉文写着“塔坝中国城”（Tangra China Town）的路标。高高的城墙，将塔坝中国城与四周的贫民窟相隔开。然而，城墙外的破旧、脏乱，却一路延伸到城里。

那狭窄而长年失修的街道上，汽车、牛车、摩托车、自行车一路颠簸，行驶途中，还忙着闪避坑洞和积水，险象环生。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恶臭味，被皮革厂化学染料渍成浅蓝色的沟渠水，缓缓地流动。

灰色的围墙，搭配红、蓝色的大铁闸，是皮革厂数十年来不变的形象，也是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皮革厂是塔坝客家人挣钱的地方，而房子通常与皮革厂毗邻而建，仿若他们的命运，始终与皮革业浑然相连，紧密难分。

种姓观念强烈的印度，对皮革业成见很深，普遍认为最低贱的人才去从事这种肮脏、低贱的工作，但华人始终用心经营这被当地社会唾弃的行业。华人皮革厂一般属于家庭式经营，多由男性参与其事。它不仅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当地华人，也为无数印度贫民提供了工作机会。

1980年代是皮革业的全盛时期，塔坝共有超过230多家的皮革厂，生产量占全国的五分之一。然而，基于皮革业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大理院法庭于1995年4月谕令塔坝皮革厂一律迁往新工业园，而皮厂所占之土地将不获赔偿。正当彷徨无助之际，加城华人联合会于同年7月成立，代表全体皮革厂业主，向政府提出上诉。最终，土地归业主所有，惟往后不得经营污染环境的行业。

对大规模的皮革厂而言，迁厂所需的费用虽不成问题，但对于新环境的设备及未知的将来，始终心存疑虑。小皮革厂则因为资金短缺，陷入了动弹不得的窘境。幸亏西孟省政府对迁厂之事抓得不紧，皮革厂主才得以苟延残喘，有的仍悄悄运作，直到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另一些皮革业主，早已万念俱灰，将生意结束或转让，举家移民到国外。

如今，皮革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连印度穆斯林也开始在制革领域大展拳脚。跟华人相比，他们资金更雄厚、技术更先进，可谓来势汹汹。

于是，55家迁到新工业园的华人皮革商，联合成立了“环保制革商会”，旨在捍卫华人皮厂的权利，向政府争取更多的福利和援助。此外，他们希望能与中资企业合作，因为无论资金或技术方面，中资企业都能给予印度华人很大的支持与协助。

然而，皮革业主们认为，这一行的前景仍不明朗，“印度政府非常善变，很多政策都不明确。除了等，我们也不能再多做些什么了。”言毕，犹疑与无奈交织在他们的脸上。

- 塔坝中国城。
- 塔坝城内，印裔员工推着载满牛皮的木车往返皮革厂。

塔坝城内小中华

塔坝中国城是全印度华人最集中的地区。在这座快被世人遗忘的客家村里，华人在熙攘的人潮中，用高墙筑起了自家的文化堡垒。

高墙外，世界天天在变；高墙内，客家人过着怡然自得的淳朴生活。

华人将皮革厂的大铁闸，漆上象征吉祥的大红色，门口还有大红灯笼高高挂、大红对联两旁贴，那艳丽的姿态，与灰蒙蒙的街景形成强烈对照。

华人的皮革厂或住家，一般灯光昏暗，只有祖先灵位、神龛上的电蜡烛，不分昼夜地闪着小红光。大部分家庭都还保留着供奉祖先的习俗。除了早晚上香外，华人在春节、清明节等传统佳节，也不忘杀鸡宰鸭，敬祭先人。

塔坝中国城也许不能跟世界各地派头更大的其他唐人街相比，但它那醇厚、道地的客家文化，总是散发迷人的魅力。在客家家庭，从长辈到幼童，一般都能操一口纯正的梅县客家话。尽管抗拒不了印度咖喱的香气，但一日三餐，仍以正宗的客家菜为主。

自从卫星电视、网际网络进驻小城后，年长的华人终于找回了听中文歌曲、看中文戏剧的记忆。“不过我们的子女，就比较喜欢印度和西方的流行文化！”他们不得不承认，高墙挡不住那无孔不入的主流文化。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华人外移，中国城内盛景远逊当年，但凝聚力丝毫未减。每逢婚丧喜庆，更是邻里互助，全城参与。“每年回来除了拜年，还忙着喝喜酒呢！”一名移民加拿大的华人兴致勃勃地说。

长年散居各地的亲友，难得在春节千里团圆，新人们便趁着花好月圆、亲朋好友济济一堂之际，共结连理，大宴宾客。如今，印度的春节，已成为华人的结婚旺季。

此外，春节也是华人相亲的好日子。移居国外的华人，新春返乡过年，也顺道物色佳人快婿。“我们希望另一半也是同乡，那么生活及文化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隔阂。”华人笃定地说。

在塔坝，许多华人仍旧将终身大事交由父母决定。相亲与自由恋爱结合的比例，大概是6比4。“我们这些50多岁的，多数通过相亲而结合，家庭也都很美满呀！”言罢，客家阿叔神采飞扬。

皮革业衰退之后，塔坝城渐渐岑寂了下来。塔坝位于加尔各答的黄金地带，若发展起来，必定是块福地。印度政府也曾在报上大事宣扬，要将塔坝打造成崭新的中国城，然而，华人对这套说辞，只是姑妄听之：“政府只是提出建议，资金和策划等一切事务，都要靠华人自行解决。”

面对印度政府的善变、高深莫测，塔坝华人摇摇头说：“这是一个梦，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 简陋的房子里没有高档家具，却有珍贵的温情。

餐饮美容拓新局

近几年来，人们对塔坝的印象已不仅止于皮革厂。更多时候，他们想到的是菜香扑鼻，令人食指大动的中餐。

中餐馆的崛起，与皮革厂的没落息息相关。许多没有能力迁厂，却又不想移民的旧皮革厂业主，干脆把心一横，将皮革厂改建为中餐馆。

目前，塔坝区的中餐馆至少有50家之多，高低档次都有。塔坝摇身一变而为美食天堂。每逢周末，城内车水马龙，名流使节纷至沓来。

大半辈子在皮革厂挥汗操持的华人，如今纷纷手握锅铲，凭着对印度人的了解，新创出美味别致的“印度中餐”。菜单中最热门的几道菜，不外是炒饭、炒面、酸辣汤、辣椒鸡和炸虾。“这当然不是正宗的中餐啦！印度人口味很重，因此我们的菜肴以香辣为主调。”

塔坝城内，倒也还能找到几家数十年历史的正宗客家餐馆。顾客主要是客家人，他们说：“传统的客家菜，让我们吃出家乡的味道！”

中餐馆唤醒了印度食客的味蕾，华人美容院，更俘虏了印度美娇娘的心。

走在印度的大街小巷，会发现许多店铺的招牌上标志着“Beauty Parlour”，而有些美容院更挂上中文招牌，如王后、月宫、兰花等。

华人妇女说：“印度女人比我们更爱美。我们通常在家里动手修眉护肤，印度妇女却舍得花钱，请别人将她们打扮得漂漂亮亮。”

华人美容院在印度有着悠长的历史。远在英国殖民时代，它主要为英国人及华人服务，今天的主要客户则是印度女性。关注仪表的印度女性，一般从十二三岁起，便到美容院进行手部、足部除毛。此外，华人美容院提供的美发及美白服务，也大获她们的青睐。

当世界各地的美容院都靠采用先进仪器来吸引顾客的当儿，印度华人美容师只需一条细长白线，就能替顾客修眉、除毛、美肤。这种称为“挽脸”的传统技艺在中国大陆已渐渐失传，在印度却流传、盛行至今。

皮革业衰退之前，许多在美容护理方面有一技之长的华人太太，都留在家中相夫教子。然而，随着皮革业发展逐渐走下坡，不少华人美容师毅然重操故业，帮助丈夫分担经济上的压力。

近年来，印度人也开设了不少美容院，一般装潢高雅，收费昂贵，主要为上流社会服务。华人美容师说：“我们的收费更加合理，平民都能负担，加上采用传统的美容技术及天然护肤品，还是大受当地社会欢迎。”

在传统皮革、制鞋业日薄西山的今天，中餐馆和美容院，已成为印度华人经济的新宠。他们迫切希望能从中看到振兴的曙光，重拾华人当年的风采，再现昔日辉煌。

- 华人皮革厂改建成的中餐馆。
- 华人太太重返美容服务业，凭自身技能减轻家庭经济压力。
- 华人开设的酱油厂。

中文教育有待龙腾

华人经济不振，使中华文化的传承更加艰难。这几年，印度华人社会日渐岑寂、清冷，年轻人一批批如燕雀离巢，远走高飞，新生儿的出生率也偏低。

曾几何时，那些盛满华人子弟欢快童年回忆的中文学校，不是一家接一家地关闭，就是体制轮替，今非昔比。

印度第一所中文学校——建国学校，如今虽仍归华人所有，但已改用英文教学。学生以印裔穆斯林孩子为主，一张华人脸孔也没有。此外，华人创办的圣心学校，也改由基督教会管理，以英文教学，同样以印裔学生为主。另外，由客家人创办的梅光学校，已于1989年关闭，校舍一直空置到现在。

坐落在塔坝城里的培梅学校，是现今全印度硕果仅存的中文学校。它由客家梅县人创办，取“培梅”之名，意在“培育客家梅县子弟”。

学校的全盛时期，是在中印战争爆发之前。校友们回忆，当时的培梅设有小学、中学部，学生人数高达数千，每个年级三个班。楼高三层的校舍，每间课室挤满了学生！

此刻，崭新的校舍，犹如失去了玻璃鞋的灰姑娘，弥漫着人去楼空的苍凉。偌大的校园，再难听见朗朗的读书声，以及成群孩子的嬉闹声。校园里，只剩下幼儿园和小学部，学生寥寥50人左右，加上校长，华人老师总共只有3名。

由于学生人数有限，两个年级的学生因此凑在一起上课，却仍无法将所有座位填满，场面稀落。华人说：“只有塔坝华人在校园举行春节联欢会等活动时，校园才恢复勃勃的生气。”

一名华人父亲感慨道：“我们没有忘本，只是必须考虑到孩子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如今培梅只剩小学部，毕业后我们就要四处奔波为他们申请中学。印度人口那么多，样样都得抢，孩子们若想升上优秀的英文中学，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小让他们报读英校。”

如今，90%以上的华人子弟，都在英校或教会学校接受教育。中文一般可作为第二语言供选修。为了应付考试，孩子们大多会报名中文补习班。培梅学校每天下午，也会为孩子补习中文，离校较远的孩子，则参加假期期间特设的补习班，平日多半自修，整体水平有待加强。

近几年，中印的双边贸易蒸蒸日上，中文的价值在印度提升了许多，许多印度华人开始重视中文，就连印度政府，也让一些驻守中印边界的印度军官学好中文。

此外，印华文化发展协会，也为印度政府策划、推动军官的中文速成班，将其中的盈利，用作推广华人学习中文的资金。如今，协会在圣心学校开办中文会话班，收费廉宜，任何年龄层的华人学生，都欢迎前来上课，学好中文。

整体而言，汉语热潮目前仍处于逐渐升温的阶段，还未完全在印度蔓延开来。但当地华人深信，随着中国的腾飞，中文教育及中华文化在印度发扬光大的那一天，应该不会太远。

- 培梅学校的学生人数日渐减少，教室显得空荡荡。

硕果仅存唯商报

在印度，年轻一代的华人主要用英语沟通，大概五六十岁以上的华人，才有读、写中文的能力。硕果仅存的中文报纸《印度商报》，是这群华人的集体记忆、精神寄托。

《印度商报》于1969年3月问世，每日4版。几十年来，物价翻腾了几倍，但这份报纸的售价，仍然维持在2.5卢比。

《印度商报》一度是全世界仅存手抄的中文报。耐心的编辑仔细抄写，再付油印，手抄一版耗时4小时。直到2005年4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访问加尔各答时，送了一台电脑给报社，才结束了“手抄”历史，迈入电脑排版的时代。《印度商报》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报馆里只有编辑，没有记者。编辑杨小红笑道：“加尔各答的每一名华人，都是我们的记者。”华人圈中无论发生任何大小事情，例如婚丧喜庆等，人们都会主动将“新闻”送到编辑室。有了电脑和网络后，《印度商报》还能转载新华网的新闻，内容更加丰富、充实。

然而，报上刊登最多的，依然是华人的婚丧广告。春节前后是报馆收入最丰的时候，华人结婚广告特多。此外，华人也喜欢在报章上刊登春节贺词，让各方共享温煦的祝福。

《印度商报》目前共有三名编辑、两名派报员。前主编逝世前，曾说：“印度华人需要一份中文报，让大家了解外头发生了什么事。”持着这个单纯而坚定的理念，《印度商报》在这片中华文化沙漠上，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

如今，除了春节大年初一至初五例常休假日之外，每天早上8点左右，《印度商报》总是风雨不改地送达订户们的家。1970年代，每月的发行量曾达五百多份，如今只剩下两百份左右。华人不断移居国外，读者人数逐年下降，加上办报主力日渐老去，这份报纸，究竟还能维持多久？

- 印度的华人若在春节前不久逝世，丧礼通常就会选择在春节期间举行，好让回来过节的亲友们送往生者最后一程。因此，往生者的遗体将在太平间冷冻一段时间，出殡当日才运到灵堂入棺。
- 报馆的三名编辑鞠躬尽瘁、劳苦功高，敬业的精神令人钦佩。
- 手抄版的《印度商报》，字迹娟秀而工整。

其他资讯

印度最早的唐人街Cheenapara

早期抵达印度的华人，一般都是在加尔各答的中心地带落脚的。当时在这里聚居的华人当中，人数最多的是广府人，其次为客家人，及少数的湖北人和上海人。他们在这里安家，也逐渐构筑了印度的第一个唐人街。作为传统华人社会的缩影，唐人街也是窥探华人生活的一扇窗口。

自1940至1962年间，是唐人街的全盛时期。华人店铺星罗棋布，中餐馆更是耀目的主角。华人说：“那时最有名的是南京饭店。二战期间，不少中国的将军都来这里吃饭，华人、印人名流，也均是座上常客。”

华人所从事的行业十分多元，包括裁缝、洗衣妇、医生、理发师、鞋匠及木匠等。在唐人街上，华人的烧肉店、药材店、古董店、金店、杂货店等更是应有尽有。

唐人街的会馆也很多，有些甚至还办起了华文学校，如南顺会馆内的建国学校、忠义堂所创办的梅光学校等，皆是华人求取知识的地方。至于华人庙宇，主要是供奉关帝和观音。

从清晨到午夜，唐人街总是熙熙攘攘的。天刚露出鱼肚白，菜市场早已人头攒动，叫卖声不绝于耳。菜市场是华人最佳的情感联络站、资讯流通站。若想探听最新的八卦，或派发结婚请柬，到这里准没错。每天晚上，小食挡摆售各类华人最爱的小吃，简直就是夜宵的天堂。

活力充沛的华人，把唐人街打造成一个繁华地带，不过也同时带来了帮派、赌博及鸦片。当夜色降临，三教九流之士，纷纷涌向烟馆或赌场。据说，当时四个男人中就有一个染上鸦片瘾，而那些在牌桌上倾家荡产的华人更是难以计数。

不论是繁华之地还是罪恶之乡，这一切，均被1962年中印交恶的滚滚狂潮席卷而去，唐人街也就从此步向没落。

华人纷纷移居海外，唐人街因而人去楼空。今时今日，遗留下来的中式建筑都已经残旧斑驳，就连充满中国味儿的黄包车也都破烂不堪，无精打采地瑟缩在角落，静候瘦弱的印度新主人前来拖曳。

华人的身影，早已淹没于密密麻麻的印度人潮当中。

而今，唐人街仅住着极少数的华人。早晨是此处最热闹的时段，华人与印度人都会前来“饮茶”吃早点。老华人叹道：“只有在那几个小时里，我才能感觉唐人街再次复活了。”

- 唐人街上的会馆门面斑驳，风光不再。

春节——印度华人的年度盛事

印度华人最重视的节庆，非春节莫属。一千多人的塔坝华人社区，春节期间，可以飙升到一万余人。移民美、加等国的华人像候鸟一样，春节一到，都从四面八方飞返印度老巢。他们深情地说：“回到塔坝，才有过年的感觉。”

年三十大清早，家家户户都忙于祭祖的活动。杀鸡宰鸭、焚烧红黑色的天地衣帽，客家人的习俗历历在目。塔坝青年会，在除夕夜还出动醒狮团，敲锣打鼓，挨家挨户去拜年。

新春正式降临，塔坝更展现出惊人的活力。大年初三、初四，培梅学校在校园里举办春节联欢晚会。

另一个重头好戏，就落在春节一周后的礼拜天。不同籍贯、地域的华人，都会到阿钊坡拜祭开路先驱——杨大钊。那里有一座超过百年历史的土地公祠，人潮汹涌，香火不断。

“这里的签很灵，过年时若求得上上签，一整年都会顺利如意。”华人一脸虔诚地透露。

中午时分，醒狮队会在土地公祠的空地上助兴，鼓声喧天，引来众多印度人围观。华人家庭则在临时搭建的帐篷下，全家席地而坐，吃起午餐来，活像一家大小在野餐，别有一番风味。

- 土地公祠，经年香火不绝。

结语

印度，从未赐予华人富裕的生活，却奇迹般地在他们的心灵镌刻下难以磨灭的印痕。在这肤色、文化及价值观皆大异其趣的国度中，不少华人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甚而萌生停靠下来的念头。

移民他国或许是年轻华人总是牵肠挂肚的心事，至于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中年华人，则并不十分向往外面的花花世界。他们说：“其实我们并不期待离开，在印度挣钱虽不容易，但渐渐适应下来，也得以轻松度日。”这些年过半百的华人，早已习惯了印度朴素、淡然的悠悠生涯。

很多远走高飞的华人，心却徘徊在印度老家，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没断过。然而，为了下一代美好的生活，选择离开的人越来越多。有人感慨：“照这样走下去，印度华人消失，是早晚的事。”

亚洲其他国家与地区

引言

在南亚与西亚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横亘着一片片沙漠、山地和高原。这些地区潜藏着全球最丰富的石油，不过这里的大部分国家，却陷入延绵不断的战争，遍地硝烟，导致它们仍处于落后与贫困的窘境。这地区散居着数量不多的华人，他们占全球华人总额不足1%。与其他地区不同，这里的华人除了汉族以外，还参杂了维吾尔族及回族等少数民族。大多数华人从商，但也仅能糊口于四方，绝少大富大贵者。在某些国家里华人受到歧视与排斥，于是出现了再移民欧美国家的现象。

本篇章将论述南亚、西亚、中亚诸国华人简史及现状。南亚包括巴基斯坦（Pakistan）、孟加拉（Bangladesh）、斯里兰卡（Sri Lanka）及马尔代夫（Maldives）；西亚包括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巴林（Bahrain）、伊拉克（Iran）、以色列（Israel）及阿富汗（Afghanistan）；中亚包括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土库曼斯坦（Turkmenistan）及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

南亚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的全名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位于南亚次大陆的东北部，东接印度，东北与中国比邻，西北与阿富汗相交界，西傍伊朗，是仅次于印度的南亚第二大国。

基斯坦是个多元民族、宗教复杂的国家，独立后不久，全国即陷入政治动荡的局面，政府更迭频繁。在长时期里，巴基斯坦有过好几次军人政变，实行军法统治，甚至发生政治暗杀的悲剧。国家的长期动乱，自然影响到经济的稳健发展。

农业在巴基斯坦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主要农产品有小麦、稻米、花生、棉花与茶叶；工业基础薄弱，拥有一些小规模工业生产，其中以纺织业较大宗，其他还有制糖、烟卷、电力、水泥及化肥等工业。

巴国近年来对于引入外资不遗余力，但碍于基础设施如通讯、交通、电力供应的不足，成效不大。不过，由于这里具有廉价而充足的劳动力，可生产丰富的棉花、棉纱及皮革；再加上巴国产品输往欧盟及美国，均享有优惠关税，所以仍然吸引了少数港台及东南亚的商人前往投资。

1999年，巴基斯坦便已有华裔约4000人，其中汉族约占80%。另外的族群是维吾尔人与哈萨克人，约占15%；其他的则是藏族等少数民族。巴国华人多是早年从印度迁徙过来的，尤其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后，印度华人受到排斥而不得不离境。年轻一辈多移民加拿大与美国，年纪比较大的，一部分返回中国，另一些则流落到巴基斯坦。此外，也有少数华人来自东南亚以及港台。

与印度华人一样，早期巴国华人多数原籍广东梅县、湖北天门和山东，鼎盛时期数达两万人。由于早期华人在巴基斯坦的前景不太乐观，所以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们便陆续再迁居到其他国家。有的全家迁徙，有的则送子女到加拿大与美国念书，完成学业后就定居下来。

然而，有人离境，也有新移民入境。80年代以后，来自江浙一带的新移民来到这里，人数众多。加上近年来大批到此工作的中资公司员工，如今巴国华人人口已达8万人之多。华人多聚集在首都伊斯兰堡（Islamabad）、拉合尔（Lahore）、卡拉奇（Karachi）等城市。

至于维吾尔人与哈萨克人，原是新疆的主要族群，19世纪下半叶之际，在俄国沙皇的挑唆下，聚众背叛清朝，清朝派左宗棠率大军前往镇压，击败叛军，追剿余党，逼得他们向西逃亡，跨越边界，有些逃到中亚，有些流落到印巴，在这些地区安家落户，一代代繁衍下去，直到今天。这些新疆人的后裔，大抵靠做些小买卖，或是出卖劳力为生。另有一些人还是过着畜牧生活。

巴国华人的经济活动，可说是印度华人职业的延伸。华人多经营制革、制鞋、牙医、餐馆、服装、成衣与杂货等业。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则以经营畜牧及贩卖日用品居多，港台及东南亚华商投资的行业，则有制鞋机械、医药用品、加工业等，兹分述如下：

1. 制革业：华人经营的制革厂有30多家。大、中、小型各占三分之一。巴国华人的制革业是印度客家人传统职业的延伸。1962年，在印度从事制革业的华人搬迁到巴国来时，眼见巴国盛产牛皮及羊皮，不乏制革业的原料，所以他们就干起了老本行。他们的工厂多设于卡拉奇近郊，现已辟建为加工出口区，供专业加工制造皮革，产品行销欧、亚两洲各地。

2. 制鞋业：华人经营的制鞋厂约有50余家，其制鞋技术均传自印度，以手工缝制。近年来当地鞋匠也采用来自台湾的塑胶皮产品，推出市场，价廉物美，颇为畅销。华人工厂散布于卡拉奇、拉合尔、白沙瓦（Peshawar）及金塔等城市地区。

3. 餐饮业：华人的餐馆多分布在伊斯兰堡及卡拉奇，有粤式与北方式的菜肴。正宗的粤菜选材广泛，烹饪技术多样，为中国名菜系之一。但当地的中餐馆，为迎合食客口味，已变质为杂碎及炒面炒米粉之类。而北方式的菜肴，要以鲁菜为代表。南北式的菜肴各有特色，都能适合不同顾客的口味。

4. 纺织业：巴国盛产棉花，纺织业发达，也有港台华商投资生产成衣的。华人经营成衣的有十余家，分设于各大城市。

此外华人开设小商店，贩卖食品与用品，还有流动商贩、木匠及工匠，赚取不多，仅够糊口。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位于印度东南隅，西部隔着保克海峡（Palk Strait）和马纳尔湾（Gulf of Mannar）与印度遥遥相对，是南亚次大陆南端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位居海上交通要冲，是印度洋的航运中心。

斯里兰卡旧称锡兰，1815年沦为英殖民地，经过长期斗争，终于1948年2月4日取得独立，1972年宣布成立斯里兰卡共和国。

农业是斯国的主要经济支柱，农业人口达全国就业人口的40%，农产品主要有稻米、椰子、甘蔗、橡胶及茶叶等，斯国原是最大的茶叶出口国，但由于国内长年陷于内战，大大影响农业的生产。工业以农产品加工为主，有制糖、榨油、橡胶轮胎、制革和造纸等工业。近年来积极引进外资，增辟工业区，开拓外国市场。

华人足履斯国，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那时斯国还是荷兰殖民地，1740年，爪哇巴城发生了华人抗拒荷兰政府的压迫而揭竿起义的事件，也就是所谓“红溪惨案”，事后有一批华人“罪犯”，被强行押送到斯里兰卡来服苦役，服刑期满的华人可能有部分滞留下来。又据1911年的人口普查，引述在1816年，约有80至100名华人抵达锡兰，嗣后在各地安顿下来。他们并不像其他地方的华人勤俭刻苦，却沉溺于烟馆，爱好斗鸡。他们中也有与当地妇女通婚的。直至1911年的近百年间，华人人口并没有显著增加。

30年代初期，来自山东的一批商贩，带来了丝绸与刺绣品等物品，沿街兜售；也有人到乡间去，和乡民交换农产品及宝石，最终有一部分人定居下来；同一时期，来自湖北、广东、江浙的手工艺者及农民，也流落到这里谋生，后因战争爆发，无法归国，于是只好留居下来。

除了20世纪30年代曾有过一阵华人移民浪潮外，华人人口的增长，就只靠自然生殖。直至1948年斯国独立时，也只不过350人。到了1982年，华人激增至3000人，这可能是由于7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移民涌入所致。

据1999年《华侨经济年鉴》的统计，斯国华人共约4000人，目前则有5000人左右。他们散居在首都科伦坡（Colombo）及第二大城市坎迪（Kandy）。斯国对居留的华人规定甚严，华人如欲取得公民权，需父母都得在本地出生，才能获得批准，因此近年来华裔青年陆续移居美加等国，华人的流动性颇大。为了吸引外来投资，政府近年来逐渐放宽居留权条例，可是成效不大。

华人经济活动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商业、制鞋业与服务业等，兹分述如下：

1. 餐饮业：中餐馆约有20余家，散处于科伦坡及坎迪。其中较具规模及历史较久者有：北平饭店、乐宫饭店、新新饭店、馥莲店及中华咖啡馆等等。

2. 制鞋业：为梅县客家人传统行业，多分设于科伦坡及康地两大城市，总共约十余家。

3. 牙医业：多为湖北天门人所经营，医所有4家，开设于科伦坡市内，执业者都有较高学历及专业资格。

4. 贸易及杂货业：多为山东籍华人经营，零售与批发货品多是“中国制造”，包括服装、雨衣、鞋袜、塑胶制品、电器、电子零件及医护器材等。

5. 绸布业：绸布庄多为山东与江浙籍人经营，约有十余家，多开设于科伦坡市内。其业务为经售丝绸及布匹，亦兼售日用品及手工艺品，均从中国大陆进口。

6. 旅游业：华人投资经营的旅馆有两家，均开设于科伦坡，一家属馥莲饭店兼营的旅馆，另一家为国际观光旅馆。

7. 制造业：在斯国有十家台商设厂，从事生产螺丝、螺帽、手工具、成衣、毛织衣、电话机及鱼网等。

近年来，中国与斯里兰卡改善了邦交关系，促进了两国政治、外交、经济与文化交流。中国不但给予斯国无息贷款，更派遣技术专家与建筑工人，为斯国承建巨大工程，如兴建班达拉奈克纪念国际会议大厅（BMICH）、最高法院大厦、中央电讯交换中心及医院等。

孟加拉

孟加拉东、西、北三面与印度接壤，东南与缅甸交界，南濒临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19世纪下半叶成为英属的一省。1947年印巴分治，巴基斯坦分为东西两部分。1971年3月东巴宣布独立，1972年1月正式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孟加拉是世界上最穷困的国家之一，人口密度更为世界之冠。

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人口占全国总就业人口之半。主要农产品有稻米、小麦、黄麻、甘蔗、橡胶与椰子。黄麻产量居世界第二，多供外销。孟国南临辽阔的海域，渔产资源丰富，但由于捕鱼设备落后，运输交通不足，使其渔获量及商业价值欠佳。孟国的工业并不发达，以黄麻加工业及纺织业为主。近年来政府积极吸引外资，在外资的挹注下，吉大港（Chittagong）已有电子、五金、自行车等厂进行生产。

孟国的华人人口不多，大部分为早年从印度移居过来。据资料显示，1971年有华人约500人，20年后（1992年）也不过700人，可见这期间几乎没有华人移民入境，人口增加主要靠自然生育。华人祖籍多为广东梅县，少数为湖北、山东。过后大陆新移民涌入，人口才增加至1000人左右。华人多聚居在达卡（Daka）与吉大港两大城市。

孟国华人的职业多与印度、巴基斯坦的雷同，经营的大都是传统的行业，包括制鞋厂、中餐馆、牙医、零售店等。

近年来，孟国的政局较为安定，经济也纳上正轨，政府积极推出各种优惠措施，以吸引外资来发展工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少港台及中国大陆的商人，挟资前来投资，有的开工厂，有的做贸易，有经营中餐馆及旅馆也有兼营多种企业的。投资设厂的华商，以经营成衣厂、印染厂及制鞋厂较多。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孟国的成衣出口逐年增加。现有成衣厂4000多家，成衣出口额居世界第四位。随着成衣业的扩展，印染布料的工厂应运而生。成衣厂所用的布料，一般都是从外国进口坯布，然后按照服装设计所需的颜色到印染公司印染布料。台商到孟国投资设厂的有花旗国际鞋业公司，投资总额约370万美元，专营欧洲市场的鞋业订单，为新兴事业中较具规模者。另有少数人从事农业与畜牧业。

中国的建筑公司也到这里发展，并承建了横跨首都达卡河流上的中孟友谊大桥，及一些较高尚的住房。在达卡市还有一座中国无偿援建的孟中友谊会议中心，规模庞大，于2002年竣工。

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位于印度半岛西南隅，是印度洋上的群岛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岛国，它由1190个珊瑚岛组成，其中只有200个岛屿有人居住。1887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965年独立，1968年11月11日成立共和国。

马国小国寡民，土地面积狭小，农业生产不足国内的需求，天然资源贫乏，渔产资源虽然丰富，但碍于捕捞技术与设备落后，运输和加工业不足，所以独立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百废待兴。

独立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大力改善港口、电力、通讯等基础建设，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极力发展旅游业与渔业。前旅游、进口贸易、建筑和运输，已成为马国的四大经济领域，其生产总值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60%，2002年的年均收入达到2090美元，是南亚地区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

马国的旅游业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尤其是促进了建筑业、运输业与银行业的增长。马国的华人很少，据资料1999年只有约100人，如今可能略有增加。他们多从事与旅游相关的行业，如开设商店，贩卖迎合游客的商品；经营中餐馆、旅行社与旅馆。

马国自1965年独立后，即与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中国也给予马国无偿的经济援助。从1985年起，中国公司开始进入马国工程承包市场，为马国承建巨大建筑工程及公寓，两国的贸易额也逐年增长。

西亚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是西亚最大的王国，占阿拉伯半岛面积的五分之四。西濒红海、东临波斯湾，周围接壤的国家有：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阿曼及也门。19世纪英国侵入，1924年统一，1932年建立了沙特阿拉伯王国，以迄于今。

沙特实行自由经济政策，石油工业是国家的经济支柱，巨额的石油收入使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政府充分利用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建立外向型企业，逐步改变过度依赖石油的单一经济结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经济多元化政策，同时发展工农业。政府鼓励自由经济和自由竞争，支持私人及合资企业。这一来，也促进了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通讯业及旅游业的发展。

沙特居民以阿拉伯人为主，其他种族约占30%，包括一部分华人（这里“华人”包括汉人及中国少数民族）。据《华侨经济年鉴》的统计，1999年这地区的华人约有2万7000余人，其中有两万人聚居在西部，以新疆的维吾尔族最多，占百分之90%，其次是回族约1000余人，他们来自甘肃、宁夏及青海等省，还有藏族400余人，汉人有1000多人。根据当地华人提供的资料显示，如今沙特华人已达4万人。

华人多聚居在西部，如塔伊夫（At Taif）、麦地那（Al Madinah）、吉达（Jeddah）及麦加（Makkah）。此外，首都利雅得（Riyadh）、延布（Yenbo）、达兰（Dhahran）等地也有华人。维、回族人95%已入籍，改革开放后入境的中国新移民则仍持中国护照。

汉族人数虽较少，但在各经济领域较活跃，经济地位较高。汉人经营的多是传统行业，包括杂货业、百货业、饮食业、贸易出入口业、运输业及建筑业等等。吉达有一家大型中国商业城，多是由汉人经营的商店，售卖各式各样的中国小商品，琳琅满目，价格廉宜。家电、服装、玩具、食品、皮革制品、钟表、瓷器以及机电、汽车和重工业机械设备等中国商品在沙特随处可见。那里的华商生活都过得不错。少数台商投资经营的企业，如台湾荣民营建公司、德仁建设公司等，资金雄厚，规模宏大。较大型的中餐馆，有台商的来来餐厅及新加坡人的中国餐厅。除此之外，其他大都是小本经营。台商也有投资设厂的，生产食品加工及肥料。

沙特阿拉伯约有12家中资企业，包括建筑工程、石油管理、远洋运输及通讯网络等，其中规模较大、资金较雄厚及员工（技术专家及普通工人）较多的，要算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江苏第一建筑安装有限公司。2009年中国土木工程公司标得承建利雅得—卡西姆铁路线路的部分工程，营业额高达7.2亿美金。江苏建筑公司也承包库巴市区的阿拉锡德大厦，工程浩大，营业额达5.25亿美元。华为公司也被选中，负责沙特阿拉伯领域内的网络运营，网络优化和备件管理等业务。

至于维吾尔族与回族之迁徙沙特，源远流长，早在19世纪下半叶，清朝的左宗棠率领大军前往新疆镇压维、回族的叛乱，叛军被迫向西逃亡，几经辗转，最终流落到沙特定居下来。另一次大规模移民，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军阀盛世才大肆屠杀维吾尔族，使他们不得不越境逃亡，最终在沙特安家落户。现居沙特的新疆人，都是当年逃亡者的后裔。经过了好几代的繁衍，物换星移，他们早已融入主流社会，入籍成为沙特王国的公民，对他们来说，故国新疆是那么遥不可及，他们早已遗忘了。今天在沙特的维吾尔族人，有些从事跨国性的商贸活动，有些经营杂货店生意，有些做烤饼（特米斯）及抓饭买卖，有些当劳工，有些做回老本行，从事畜牧业。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亚洲东南部，阿拉伯半岛东北部。北接土耳其，东邻伊朗，西界叙利亚、约旦，南傍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东南濒临波斯湾。伊拉克的两河流域，曾创造了古代巴比伦的灿烂文化。1920年它获得完全独立，1958年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国。可是立国以来，伊国却长期陷于战乱，先是爆发了8年的两伊战争（1980-1988年）。1990年，伊国又入侵科威特，翌年引爆了海湾战争，伊拉克大败。2003年3月，美国又借口伊国储存巨大杀伤力的核武，向伊国动武。经过多年战火的蹂躏，加上联合国的禁运与制裁，制造业器材、原料、组配件难以入口，石油等产品不能外销，国家元气大伤。

据台湾《华侨经济年鉴》的统计，1999年，这地区的华人人口约有1000人。由于长期战乱，所以很少有华人移民入境。相反地，因逃避战乱而离境的华人日多。如今，在巴格达（Baghdad）危城的中国人已经很少了，而相对比较安全的伊拉克北方的库尔德自治区（Iraqi Kurdistan），却有数百名中国人。

在2003年伊拉克发生大规模战争之前，伊国的华人多从商，有的开设商店，贩卖中国的日用品，大到发电机组、铁路机车，小到针头线脑、服装玩具，应有尽有。有的从事进出口贸易与批发，主要进口与批发中国货品。有的经营中国餐馆。有的承包建筑工程，在巴格达的中国建筑公司，有多达十余家。但是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华商都纷纷结束营业，避乱到邻近的约旦、科威特及阿联酋等国家去。

伊国是个死亡陷阱，人们的生命朝不保夕，可是对一些精明而勇敢的华商来说，这里也是商机处处，容易发财致富的好地方。战争时期的伊拉克，生产陷于停顿，加上西方国家的禁运与制裁，所以市面上的食品、日用品与医药，都严重短缺。华商勇闯龙潭虎穴，进入伊国寻找商机，创立基业。至于那些暂时退避邻国的华商，对伊国虎视眈眈，伺机而动，他们早已在邻国囤积了堆积如山的货物，等待伊国战火平息，形势好转之后，便蜂拥而入，抢夺先机。那些承包工程的建筑公司，也早已着手进行相关的准备工作。战后的伊拉克，必将进行大规模重建，时机一到，他们便可大展拳脚了。

目前在伊拉克营运的，还有两家中国通讯公司，它们是华为和中兴。伊国的通讯项目还得交给中国公司来做，因为先前的通讯系统主要是由中资公司承包的，要是不让中资公司参与重建，伊拉克现有的通讯网络便动弹不得。

巴林

巴林王国位于波斯湾西南部，介于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由35个列岛组成，巴林岛是巴林最大的岛屿。巴林小国寡民，是西亚最小的国家。

巴林的石油资源丰富，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支柱，石油及石油产品占国家收入60%以上。政府推行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成效卓著。处于四面环海的优越位置，渔产丰。巴林的工业颇发达，有炼油工业、炼铝工业、石油化学工业、造修船工业及炼钢工业等等。长期以来，国家政治稳定，经济蓬勃，国内基础设施良好，金融制度稳健，其国民年收入高达1万7000多美元。

据中国银行巴林代表处首席代表郭京思说，巴林目前有华人约2000人，大多是改革开放后迁移过来的，当中有少数台湾人。约有200人经商，有些经营杂货店，有些开中餐馆，业主包括中国大陆移民及台湾商人。中资机构则有中建公司、华为公司、中石油公司及中兴公司等。中建公司于2007年获得签署承建Zallaq五星级酒店的合同，合同额高达7846万美元。中石油公司于2009年获得巴林海上“二号区块”勘探工程，工程进行顺利。也有由中国政府派来的农业技术专家及大使馆人员。

这里也有远嫁到巴林来的华人媳妇，如来自台湾的郭芬惠女士嫁到巴林来已有27年；还有一个名为埃达的法国华侨，嫁给在巴林工作的丈夫而来到麦纳麦（Al Manamah）。

阿富汗

阿富汗是西亚的内陆国，西邻伊朗，北部接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东部与南部界巴基斯坦，东北部隔着瓦罕走廊（Wakhan Corridor）与中国接壤。境内多山地与沙漠，没有出海口，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由于阿富汗地处中亚和西亚进出南亚与南下印度洋的要冲，战略地位重要，所以19世纪后，这里便成了英国与沙俄逐鹿的战场。1878年英国发动侵略战争，把阿富汗沦为英国附庸。1919年阿富汗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阿富汗，更是充满动乱，70年代的阿富汗发生了两次政变，1978年成立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次年苏联出兵阿富汗，直至1989年才撤军。苏联离境后，阿国境内各派系爆发内战。1997年塔利班政权获得了控制权，改国名为阿富汗。

汗伊斯兰酋长国。由于塔利班支持恐怖活动，2001年美国以反恐为名，推翻了塔利班政权，扶持以卡尔扎伊为首的政府，进行艰巨的重建工作。多年来的战乱，使阿富汗经济备受摧残，人口严重流失。

据粗略估计，目前阿富汗约有800名华人。这些人当中，大多数是国有或私营企业职工，主要从事修路与电讯工作。此外还有一些个体户，做着铝合金、副食品及餐饮业等各种生意。

这些年来，塔利班的势力卷土重来，尤其在南部坎大哈（Kandahar）一带，经常发动自杀式的袭击、绑架、勒索及杀害员工，使这里的中国生意人与工人都有撤离的打算。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公司（简称“中水”）于2007年在喀布尔（Kabul）以东修建一条外国军车经常通过的公路。5月23日，该公路施工处发生一起针对外国军车的自杀式爆炸事件，造成“中水”雇用的警察和另外3名平民死亡。事件发生后，四五名中国工人坚决要求回国。韩国人质事件发生后，“中水”员工情绪再次波动，他们唯一的想法就是：早点干完活，尽快走人。目前还有几家中国国企也打算在完成现有项目后撤出阿富汗。

喀布尔的中餐馆约有十多家。第一家中餐馆是在2002年11月开张的，那时正是塔利班政权倒台后一周年。开张后生意红火，为了品尝中国风味，食客不惜排长龙等候。因为经营餐厅有利可图，餐馆接二连三冒起，竞争激烈。

以色列

以色列地处亚洲西部，地中海东岸，东北与叙利亚为邻，东界约旦，南濒亚喀巴湾，西南部与埃及接壤，北傍黎巴嫩。据1947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规定，以巴分治，1948年以色列建国。自建国以来，它与邻近国家发生了6次战争，占领了埃及的加沙走廊、约旦河西岸与东耶路撒冷、叙利亚的戈兰高原及黎巴嫩部分土地。

以色列土地贫瘠，资源短缺，坚持走科学强国之路。以色列高新技术产业举世瞩目，尤其是电子、通讯计算机软件、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工程、农业以及航空等方面拥有的先进技术和优势。

据2008年的统计，以色列华人人口高达2万3000人。有些是中国官方机构人员，有的是留学生，也有来自港台的企业家，及中资公司的人员，不过绝大部分是劳工。单单在以色列打工的中国人就数以万计，劳工占以色列的中国人90%以上。中国政府允许输出中国劳工以赚取庞大的外汇，以色列是主要输出国之一，所输出的劳工大部分是建筑工人，主要来自福建与江苏。自1994年至2002年，中国输出到以色列的劳工超过两万人，总营业额高达3亿美元。中国工人的建筑技术获得当地人的赏识，尤其是瓷砖粘贴与墙壁装饰技术，令以色列雇主非常满意。

有些以色列华人是开设中餐馆及杂货店的。以色列的中餐馆有几十家，多在特拉维夫（Tel Aviv）及海法（Haifa）等地。但正宗的中餐馆很少，大部分是西化了的中餐馆。

以色列华人中，还有一位中医李洪芬，开了一间诊所，专医肿瘤病患。由于医术精湛，仁心仁术，救人无数，获得了以色列永久居住权。对一位非犹太人来说，这是一项殊荣。

也有台商来以色列投资，主要是入股投资，较少介入实际经营。目前和以色列业务有密切来往的业者，包括旺宏电子、宏基电子、华邦电子、台积电、中华开发工业银行、东元电机、台翔航太和东讯企业。

中亚

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南部，南接阿富汗，东北、东南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西部与土库曼斯坦比邻。19世纪被沙俄侵占，十月革命后加盟苏联，1990年苏联解体后，翌年宣告独立，建立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乌国的经济，在中亚地区比较发达，国民经济支柱是“四金”，即黄金、白金（棉花）、乌金（石油）与蓝金（天然气）。有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由于过度专业化，大部分耕地用来种植棉花，粮食不能自给自足，需靠外地进口。从总体而言，仍未摆脱落后状态。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共有129个民族，其主体民族是乌兹别克族，约占人口总数的73%。乌国独立后，其主体民族开始当家作主，一切都以主体民族优先，其他民族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迫使他们纷纷离境。过去中资企业或独资或合资，有160多家，现在只剩下40多家了。中国私人投资的企业也不多。境内也有一些老华侨，依靠经营小买卖过活，境况堪怜；新移民则多是石油与建筑工人。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与中国维持了良好的政治、外交与经济关系。除了两国首长互访与促进贸易外，还签订了经济与文化协定，中国政府给乌国提供无偿援助与无息贷款。政府也派遣了汉语老师前往教中文，以提高乌国学生中文水平，进一步促进两国文化交流。

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都在里海以东，北接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东邻中国，南界伊朗、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在历史上，它们同样被沙俄征服，十月革命后，加盟苏联，1990年苏联解体后，翌年都宣告独立建国。

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与石油资源非常丰富，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规模开采。自1996年以来石油价格节节上升，导致土库曼斯坦的炼油工业迅速发展，吸引了外资的到来，从而推动了其他工业如电力工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及建材工业的发展。轻工业方面的纺织业及食品加工业都有良好的表现。

至于塔吉克斯坦天然资源贫乏，多年来政局不稳，持续的内战与动乱，使工农业生产衰退，物价暴涨，失业率飙升，是中亚最贫穷的国家。

两个国家都是多元民族结构，土库曼斯坦有100多个民族，以土库曼族居多，占总人口的72%；塔吉克斯坦有86个民族，主体民族塔吉克族占68%。两国都有少量的中国少数民族和汉族。

华人涉及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商业与服务行业。如近几年来，土库曼斯坦的商业逐步走上繁荣，在零售商品中，食品类主要有肉类、鱼类、蔬菜水果、食糖、面包和茶叶等，用品包括服装、鞋袜、家具及电器等，其中有不少是“中国制造”的，由当地华人批发商与零售商经营，由于中国货价廉物美，很适合这些国家人民的低消费需求，甚是畅销。在服务行业方面，华人参与的有交通运输业与旅游业。

据民间估计，土库曼斯坦的华人多达1万2000人。他们多是石油技术工人与商人，从事修理油井、建筑工程与贩卖小商品。在土库曼斯坦卡拉库姆大沙漠西部和东部，一支中国石油修井工人在修理油井的同时，利用8年时间艰辛地创建了一座“中国城”，里面有宿舍、库房、料场等，作为工作与生活休闲之用。到了2002年，工人再度以惊人的毅力与刻苦的精神，在荒漠上建起了第二座“中国城”，建筑里有电视厅、医务所、会议室、厨房、浴室、卫生间、换气与空调设施，一应俱全，而且有24小时热水供应。这同“中国城”外的荒漠形成鲜明的对照。

即使在贫穷的塔吉克斯坦，漫步在首都杜尚别（Dushanbe）的大街上，触目所见的，都是“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商店的橱窗里，“中兴”手机赫然在目；体育商店的柜台上，中国制造的健身器材被摆在最醒目的位置上。在钱币兑换处，人民币被列为可自由兑换的币种之一。中国的新移民主要是建筑工人，其他则多是小商人。

结语

南亚、西亚多个国家长期以来，战争绵延不绝，遍地烽火，军人平民死伤无数。尽管兵凶战危，处处是死亡陷阱，但也阻止不了华裔的闯荡进入。这地区的华人，大部分是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他们踏遍千山万水，远道而来，在危机中寻找丰富的商机。但有些由于远景不明朗，华人陷于困境，因此有的打道回府，回归中国；有的再移民，勇闯欧美国家，再从头开始创业。

排华历史所带来的启示

引言

早在宋（960 - 1279年）元（1279 - 1368年）时期，中国商人已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到东南亚各个商港来贸易。华裔在东北季风吹送的季节，乘船南来，带来了中国精美的丝绸与瓷器，以换取当地的土产及奇珍异宝，再趁着西南风扬帆北归。不过那时的华裔多是过客，少有定居。但自从明朝（1368 - 1644年）以来，尤其是郑和下西洋（1405 - 1433年）之后，南来的华裔越来越多，并定居下来，形成了许多聚落。他们与当地人融洽相处，皈依当地的宗教，并与当地妇女通婚，繁衍了混血的后代，生生不息。

可惜的是，随着东南亚国家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种族间水乳交融的状态遭到侵蚀。尽管华人流血流汗，为各居留地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仍受到各殖民地政府的排斥与屠杀，埋下了排华的恶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当家作主，狭隘的民族主义气焰高涨，排华恶行蔓延各地。华人成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的对象。排华酿成的悲剧，华人固然是受害者，但实际上是两败俱伤，有关方面宜三思而行。

本文将分两部分来阐述这个课题，第一部分是东南亚的排华事件，这个地区的排华行为，其历史与演变有共同的脉络及规律，可作为一个单元来阐述。第二部分是东南亚以外的国家，包括美、加、澳等国。这些国家的排华运动，也有相似之处，不过各国因情况各异，大同中亦有小异，可作为另一单元来阐述。

东南亚的排华事件

除中国之外，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约有4千多万，其中大约有90%聚居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的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就占了约3100万，其他越南、缅甸及菲律宾也各有超过100万的华人。华人移殖东南亚以后，开疆拓土，流血流汗，为东南亚的城镇建设，与促进经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创建了辉煌的业绩。可是华人也历经悲壮凄惨的命运，那就是屡遭歧视、排斥、甚至大屠杀。尤其是战后数十年间，排华浪潮此起彼伏，华人如惊弓之鸟，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生命财产备受屠戮与摧残，损失惨重。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除了新加坡与文莱以外，各国无不爆发了排华暴行，标志了华人噩梦的开始。各国排华悲剧的大小程度不一，有的频频发生，犹如狂风暴雨，暴民聚众呼啸，烧杀掳掠，极尽残暴之能事，如印尼即为典型的例子。有的排华运动时断时续，手段较为温和，造成的损失较为轻微，如越南、缅甸与菲律宾。有的偶尔迸发，震慑力和缓，犹如和风细雨，并达到了同化华人的目的，诸如泰国。

为什么会发生排华的现象呢？综合而言，有以下几个原因，即：

1. 殖民政府种下的祸根：

荷兰统治东印度群岛（印尼）历经300余年，长期以来，荷政府在不同的种族间，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对华人一味高压，限制华人居住在特定的地区，除非有特殊的通行证，否则不得擅自离开。华人从事的职业，不能随心所欲，受到立法的限制。华人需交纳沉重的苛捐杂税，稍有抗拒，便加以逮捕、监禁，甚至屠杀。高压的政策同样施诸土著的身上。荷政府实施的强迫制裁，把印尼人民视为奴隶，迫使他们无偿提供劳役，栽种政府指定的经济作物；稍有抗命不从，便以严刑峻法伺候。更绝的是，政府采用各种挑拨离间的手段，使两个种族互相猜疑与嫉恨，加深种族间的敌视，种下了仇恨的祸根。

西班牙殖民政府统治菲律宾，长达三个半世纪。对华人既爱又恨，政府既要利用华人来发展殖民地，又嫉恨华人势力的迅速膨胀，采取高压与限制的政策。华人稍有反抗，便不惜报以大屠杀或集体驱逐出境。另一方面，西班牙政府更在种族间挑拨离间，煽动菲律宾人对华人的仇恨清绪，加深种族间的裂痕。

其他如英、法殖民政府，分别在马来亚、缅甸及越南实施偏袒土著政策，并挑拨不同种族的矛盾，种下了种族间仇恨与敌视的祸根。这些由来已久的潜伏危机，到了战后，土著以当家作主的姿态，掌握政权，傲视一切，目中无人，视华人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

2. 根本原因是贫富悬殊：

印尼的政客、极端种族主义者、回教原教旨主义者、以及别有居心的人士，都异口同声地说，华人都是富有的，是“经济强者”，而土著都是贫困的，是“经济弱者”。他们也夸大其辞地宣称，人口只占3%的印尼华人，却操纵了国家70%的资源与财富。他们恶毒地咒骂华人是吸血鬼、是剥削者，把华人的财富建立在印尼土著的劳力与血汗上，因此华人是造成社会贫富悬殊的罪魁祸首，土著若要摆脱贫困，便要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包括烧杀掳掠或集体驱逐出境，迫使华人财产均分。这些对华人的偏见，经过了舆论的曲意渲染，更使广大的印尼人信以为真，使土著与非土著（华人）间的阶级不平等，升华为种族的矛盾与仇恨。一旦国家陷于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物价腾贵，土著便嫁罪于华人，在政客与种族主义者的煽动下，沸腾的种族主义情绪，便一发不可收拾，爆发了排华暴行。

实际上，富有的华人，只是少数的资产阶级，大多数华人是中产阶级，以及低层的商贩、工人与贫农。华人也并非操纵了印尼的经济，国家的石油及天然资源，多是国营或与外国则团合营，通过贪污或其他不法手段，官商勾结，使这些少数的土著富豪，积聚了大部分的财富。少数的华人富豪只不过分得了一杯羹。

在英殖民政府时代，马来亚政府致力于推行“马来人务农，华人经商”的政策，导致了马来人贫穷与落后。那时，马来人多数居住在乡村，华人大多在城市经商生活，族群的经济地位差距颇大。1957年独立后，联盟政府基于土著优先的原则，积极扶持马来人，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于是大量马来人从农村流入城市，在政府机构任职。并在政府贷款计划下，马来人建立了成衣、木薯粉、橡胶等产品的加工企业，开办了批发和零售商店，另外还组建和经营了国有巴士公司。而且马来人的公司股权比例也提高了。经过政府多年的努力，华人与马来人群间，无论是在就业、收入、贫富及公司股权等方面的差距也逐渐缩小了。

3. 土著与华人间文化的歧异：

美国学者亨廷顿强调，不同的宗教文化是难以调和的。他认为不同的文明迟早要导致更大的冲突，这就是他的文明冲突论，只有主流文化去同化其他族群文化才是解决冲突之道，而他心目中的主流文化应是盎格鲁萨克逊文化。放眼世界，因宗教不同而产生种族摩擦，最终导致种族战争的例子，比比皆是。文化的歧异，尤其表现在宗教信仰的不同。在印尼与马来西亚，土著绝大部分是回教徒，而华人却多是佛教徒与基督教徒。宗教的不同往往造成习俗的偏见，互相不能融合与信任。土著执政者强迫推行同化政策，要华人信奉回教，鼓励异族通婚，并不为多数华人所接受，这种潜伏的种族内在危机，往往成为煽动排华的火种。印尼与马来西亚的排华暴行，往往是以回教为号召，高举圣战的旗帜，来煽动盲目群众仇恨的情绪。

4. 华人政治效忠意识受猜疑：

一些土著怀疑华人虽然入籍成为印尼公民，其实并非基于效忠居留国，而是要保护其固有财产。华人仍然不能忘怀于中国，仍然把大批资产用于中国家乡的建设与对乡人的接济。华人甚至被怀疑是中国的“第五纵队”，为中国政府服务。因此每当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恶化，海外华人便成为代罪羔羊。另一方面，一旦居留国稍有风吹草动，出现危机，华人资本家便把资产转移国外。土著怀疑华人不忠于居留国，加深了对华人的不信任与怀恨，往往就散播了排华的种子。

排华的形式是多样化的，计有以下数项：

1. 暴力排华

在印尼，暴力排华的次数最频密，手段也最残忍。排华事件往往是在政客与军人的煽动与策划下，鼓动暴民，成群结队，四处呼啸，手持武器木棍、铁条与利刃，砸车烧屋，掠夺财物，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极尽残暴之能事。最近一次大规模排华暴行，发生在1998年5月13至15日，被称为“黑色的五月”。这是一场惊心动魄，骇人听闻的排华悲剧，为三十多年来所仅见。动乱波及各大小城市，而以雅加达最严重。暴徒杀人放火，掠夺财物，集体轮奸华妇，而且先奸后杀，有的更活活被烧死。暴徒手段之残酷，人神共愤，天地同悲。这场惨绝人寰的动乱，是由军方及极端势力幕后策划的。

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爆发了一场排华事件。事缘当年5月11日大选揭晓后，执政的联盟损兵折将，很多席位落在反对党手中。反对党在庆祝胜利游行中，向马来人作出挑衅的行为，引起了马来人的报复，群起闹事。13日傍晚时分，马来人开始向华人发动攻击，杀人放火砸车，华人措手不及，死伤惨重。嗣后华人展开反击，事情闹大，政府宣布实施戒严令。军警奉命维持秩序，却把枪杆子向华人扫射。事后首相东姑下台，由敦拉萨接任，大权在握。“513事件”是马来西亚历史的里程碑，标志了国家格局走上一个新阶段。

2. 通过立法，限制华人从业，提高土著经济地位：

自战后独立以来，民族主义浪潮高涨，一切均以土著利益为依归，政府实施的政策，都以维护土著利益，提高土著经济地位为前提。于是国会通过一系列的立法，限制外侨（多是华人）自由从业，多项职业保留给土著经营。即使是过去多年来由华人垄断的行业，也一声令下，强制华人停业，把华人的资产充公，交由土著接替。

自20世纪50年代中叶开始，菲律宾政府便颁布一连串的非化法令，接二连三，层出不穷。先有零售业非化法，限制华人不得经营零售业，由菲律宾人取代。接着有米黍业非化法，在该法令下，过去由华人垄断的碾米厂都要关门大吉，而由菲人接手。还有专门职业非化法通过后，工程师、建筑师、律师等专业，都把华人拒于门外。

早在苏加诺执政时期，印尼政府就在50年代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限制外侨（主要是华人）从事多项职业，这些法令包括限制外侨进口企业、限制华侨汽车商行营业、限制华侨经营碾米业、限制外侨经营木材业及禁止外侨零售商在县以下地区营业。其中以1959年的禁止外侨零售商法令对华人影响最大。那时乡村的零售商有80%至90%是华人，直接受影响者达50万人之多。华人被迫结束营业，而政府又没有给华人适当的安置与补偿，使广大华人顿时陷于失业，无所适从。

苏哈多执政时期，经济政策稍作修订，一方面继续限制华人职业，另一方面却要利用华人资金发展国内的经济，因此兴起了华人资本家与印尼官方及军人的联营企业，这就形成了所谓“阿里巴巴”联营企业，或称“主公制度”，即由华人资本家出资经营，并负责管理技术，而官商或军人只是挂名董事，却能分得营业利润。苏哈多家族就从联营企业中，积聚了巨大的财富。

南越吴庭艳政权当政期间，也于1956年颁布了第53号法令，禁止外侨经营鱼肉、杂货、柴炭、燃油、丝棉织物、钢铁、粮食、运输、碾米等11种行业。

缅甸独立以后，吴努政府除了宣布外侨职业限制外，实行私营企业、工商业国有化政策，把外侨企业收归国有，华人经营的企业也受波及。自1962年尼温政变执政后，国有化政策更是雷厉风行，缅甸华人的工厂、商店、商行及酒家全部收归国有，华人辛苦累积的资产，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及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513事件”的产物。1970年马来西亚政府宣布的新经济政策（1970 - 1990年），目的是要：1. 消除贫穷；2. 废除以职业分野来辨识种族，重组社会。据估计，在1970年，有限公司的股份资本持有者，外国人有63%，华人有34%，而马来人只有2.4%，因此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重新分配国家的财富，增加马来人拥有的股份资本，在20年内增至30%。政府要剥夺华人公司部分拥有权，分配给马来引起华人的不满。

1975年，政府又颁布了工业协调法令，给华人中小型企业平添了种种障碍。繁文褥节，助长了滥用职权及贪污的风气，对中小型企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压制了华人企业的发展。

新经济政策推行后，成效显著，华人的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在金融业、矿业及农园的持有权，逐渐转移到土著手中，而土著的经济势力大为扩张，据称1999年，马来人的公司股份资金已达致19.3%，但土著公司及国营公司在银行业、保险业、船务与电讯等业的支配权已大为扩充，所持有的股份资金应超过19.3%。

在推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显然已趋向种族化。原本的目的是不分种族，消除贫穷，但结果是华族穷人的生活没有获得多大改善，乡村的马来农民也没有多大受惠，只是制造了少数的马来特权阶级。20年过去后，统治阶级声称，马来人尚未达到30%的目标，因此新经济政策仍要继续推行下去。

3. 强迫华人入籍，推行同化政策：

执政者认为，华人具有强烈的中国意识，爱中国多于爱居留国，不利于居留地的发展，必须实行同化政策，让他们彻底成为居留国的一分子，完全效忠于居留国的政府，因此强迫华人入籍。此外执政者也认为，华文学校、华文报章及华人社团，是培育同情与效忠中国分子的温床，必除之而后快。于是强制关闭华校、华报与华团，彻底摧毁中国意识的根苗。

印尼的国籍法较为复杂。简单地讲，在1980年之前，政府并非采取出生地主义的原则，尽管华人在印尼出生，却不能自动成为印尼公民。要成为印尼公民，尚需附有其他条件。不但有许多繁文褥节，还要缴纳高昂的申请费，加上即使申请成为公民后，也只是二等公民，所以许多华人不愿成为印尼公民，仍然保有中国国籍，或是无国籍民。据1965年印尼政府公布，中国籍民有113万多人，印尼籍民200多万，其他还有少数持台湾护照或是无国籍民。但1980年以后，政府却要迅速解决外侨问题，放宽公民权的申请条件，简化申请手续，减低申请费用，鉴于大势所趋，华人纷纷申请入籍。时至今日，绝大多数华人已入印尼籍，只有少数中国籍民与无国籍民。

在苏加诺时代，政府即开始推行华人同化政策。首先是加强对华校的管制，取消对华校的津贴。50年代后期，政府开始管制外侨报刊。迨至1965年“9.30政变”苏哈多上台后，强迫同化政策雷厉风行，政府下令关闭所有华校，华文报章停刊，禁止中文书刊、华语影片与华语录影带进口，禁止公开的华族节日庆典，并强迫华人改名换姓。

南越吴庭艳政府也推行华人同化政策，强迫华人入籍。政府采取出生地主义原则，规定凡是在越南出生者，即使其父母是中国籍，也一律是越南籍民。当局更采取种种措施，强迫华人改变国籍。1975年，越共统一南北越后，一改过去善待华人的政策，开始迫害华人，强迫华人入籍。并以职业限制作为要挟，迫使华人加入越南籍。

菲律宾的国籍法，也是采取出生地主义的原则，即在本地出生者，达到法定年龄，即可归化成为公民。至于外侨要申请入籍，则需至少居住十年，并须经过语言测试，也因费用高，手续繁琐，申请时间长，所以归化的人少。但1975年后，政府简化入籍手续，鼓励外侨归化，放宽入籍条件，反应热烈。据说，1975年至1986年间，约有20万华人加入菲籍。

50年代中期，菲政府为了防止共产党势力渗透华校，开始对华校严加管制。1967年宣布停止成立新华校。到了70年代中期，绝大部分华校已实现菲化。菲化以后，华文学校主要教授英文与菲文，中文课程每天以100分钟为限。至此，华校已然变质，并日渐萎缩。

马来西亚独立以后，政府锐意要使华校变质，成为国民型的学校，纳入国民教育的体系。所谓国民型学校，即以英、巫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而华文的教学时间大大缩减，每周只有五六个小时，而且要有一定的学生人数才开班。后来经过华社、董总与教总的不断争取，终使华文小学得以保存下来。至于华文中学，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津贴，只好由华社自行开办独立中学，成绩斐然。

4. 集体驱逐出境：

中国与邻国关系的好坏，往往决定了当地华人的命运。国与国之间关系良好，华人便受居留国政府的善待；一旦关系变恶，华人便成代罪羔羊，任人宰割，歧视、排斥、殴打、囚禁、关在集中营、甚至集体驱逐出境，越南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1975年以前，中越关系良好。中国政府倾全力援助越南对外战争，当地华人也与越南人民并肩作战，抵抗外国的侵略，那时越南的华人获得当地政府的善待，人民的尊敬。但1975年越共统一越南以后，由于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两国渐行渐远，终致关系恶化。于是越共政府对当地华人的态度，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以怨报德，对华人横加迫害与打击，为了要改造华人，强行遣送华人到荒芜的“新经济区”去，任其自生自灭。在越南当局的迫害下，越南华人难以求存，只得沦为“船民”，投奔怒海，不知有多少人葬身鱼腹，成为海底冤魂。

至于越南北部的华人，也同样遭到迫害。自1977年，越南政府就在与中国比邻的省份推行“净化”边境地区的行动，把中国边民成批驱赶回中国境内。也有成千上万的华人，被越南从陆路赶至中越边境的老街、同登、芒街等地，然后赶回中国。截至1978年6月7日，被赶回国的华人已超过11万人。

东南亚以外国家的排华事件

自19世纪中叶以来，排华运动就不断上演着。就排华的时间与激烈程度而言，美国、加拿大、澳洲及纽西兰要算是先锋。而中、南美洲等国家，也东施效颦，开始有排华的举措，但程度上较缓和。不过到了第二次大战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些国家政府不得不放宽移民政策，容纳更多华人移民入境，政府也以较宽容平等的态度，对待入境的华人新移民。不过这不等于说，这些国家的华人都受到平等宽待。在某些方面，华人仍然受歧视与排斥，而民间依然潜伏着仇视的心态。随着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大规模华人新移民浪潮，触发了族群间的商业竞争，以及其他生活上的冲突，在欧洲、非洲与大洋洲等国家，也爆发了暴力排华事件，幸而都是规模较小的孤立事件，没有酿成巨祸。

以下就各国排华的原因与形式作综合性的论述。原因有下列数项：

1. 白人的优越感：

早期美、加、澳、纽的欧洲移民，有些是无恶不作的罪犯，即使是自由移民，也有些是流氓地痞、奸商无赖之徒，偏生移民到新殖民地之后，便以新主人自居，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优秀民族，高人一等。在他们眼中，华人是劣等民族，因此轻蔑鄙视中国人，侮辱性地称他们为“中国狗”（Chow）、“中国佬”（John Chinaman）。白人羞与中国人为伍，为了维持“白人社会的纯洁性”，他们高喊“中国人必须滚出去”、“加利福尼亚乃美国人所享有”的口号。澳洲的白澳政策，就是贯彻“澳洲是白人的澳洲”的理念。

2. 职业与商业的竞争：

华人秉性勤劳刻苦，诚实可靠。他们不计较工作酬劳，也不计较工作的性质，白人遗弃的矿地，华人再去挖掘，白人不愿做的低贱工作，华人欣然接受，而且做得更好。因此白人矿主与园主，都乐意聘用华人为雇员，引起白人工人的妒恨。至于经商，华人的零售店与餐馆，一早就开门营业，到午夜才打烊，一天工作十余个小时，一年当中，除了春节休业几天外，天天都做生意。而且通过地缘、血缘与业缘的组织，华商编织了严密的网络，便于货物供求与资金周转，当地商人无法与华商竞争，因此产生排华的心理，这也是排华最基本的原因。

3. 文化的差异：

华人与白人生活习惯不同，宗教信仰各异，因而引起种种的冲突。白人认为中国人是永远不能同化的。他们把所赚得的钱都汇回中国接济家人，漠视当地的利益。华人文化、教育程度不高，时常沉迷烟赌与娼妓，不讲卫生，传播麻风、天花等疾病，对白人的生命安全是一大威胁。总之华人的道德文化对白人产生不良的影响。实际上，华人固然有许多恶习，但白人又何尝没有酗酒、赌博与嫖妓等行为。反而，华人的勤劳、节俭、温和、奉公守法、诚实可靠等美德恰恰是白人所欠缺的。

排华的形式是多样化的，计有以下数项：

1. 暴力排华

美国人的暴力排华，早在19世纪50年代即已爆发。首先发生在加州的金矿区，白人暴徒杀害中国矿工。此后遭杀害的华工几乎无日无之；有的被集体驱逐。据中华会馆的了解，1862年，被杀害的中国人计有88人，而凶手却大多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逍遥法外。

1877年7月23日，爆发了所谓“暴动夜”，一连三天，暴徒在三藩市华埠聚众闹事，放火烧屋，洗劫商店，幸军警及时赶到，将暴徒击退，维持秩序，华人才得以幸免于难。

嗣后，暴徒杀害华人的暴行，从三藩市蔓延各地，洛杉矶、科罗拉多的丹佛市、内华达州、怀俄明的石泉矿区及西雅图等地，都爆发了排华暴动，造成华人生命财产严重损失。

19世纪中叶以后数十年间，加拿大西部的金矿区，不断发生白人欺压与杀害华人的暴行。如1869年在奎斯尼河口华商广利行的房屋被放火，十名华工遇难。

意想不到的，100多年以后的加拿大，又因港台及中国大陆移民的激增，引起了加拿大人与华族群的紧张关系。加拿大对新移民到来造成的负面影响怀恨在心。如港台企业家投资房产，把地价炒高。又如华人移民兴建的高楼大厦，破坏了加国的风景线。华人的喧嚣吵杂，扰乱了宁静的环境。华人不良的社会行为，有损于加国文化与团结。这些负面的因素，都加深了族群潜伏的紧张关系。

19世纪中叶，澳洲盛产金矿的维多利亚州，也爆发了排华事件。华人集体被驱赶。流氓冲进华人商店，放火抢劫杀人，有数名华人遭杀害。1860年12月，新南威尔士的金矿区，发生了蓝坪滩事件。蓝坪滩矿区的排华事件的特点是持续时间之长，暴徒手段之残酷。从12月至翌年8月间的8个月里，共发生了7起暴徒袭击华工的暴力事件，平均每个月一次。暴徒烧房屋，杀人殴击，劫掠财物，华人死伤惨重。暴乱事件蔓延到昆士兰、墨尔本与悉尼等地。

20世纪以后大量中国新移民涌入南太平洋岛国、非洲与欧洲等地，华商在商场的大事活动，尤其是在零售业与餐馆业的成就，引起与当地商人的激烈竞争，而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华商居上风，这一来导致了当地商人的嫉恨，从而掀起了排华的浪潮。

2006年4月18日，所罗门群岛的首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排华行为，前后延续了两天。这次暴动的原因，主要起源于多年来土著对华人的积怨。这里的华人有2千多人，他们控制了岛上的零售业、批发业、木材业与渔业，这些都是国家的主要经济资源，所以引起土著对华人的嫉恨。而直接导致排华爆发的，是缘于4月5日的大选。选民怨恨大选舞弊不公，认为总统利尼（Rini）的中选，是由于华人资本家行贿的结果，而总统也答应选中后，将给华人许多好处。在反对派的煽动下，最终爆发了排华暴行。在两天的暴动中，暴民冲着华埠而来，放火焚毁华人的商店，大事掠夺华人的财物，华人惊慌逃命。澳洲与纽西兰派遣军警来镇压，政府施行戒严令。至20日，首都终于恢复秩序。

2006年11月16日，在南太平洋汤加小国首都，也爆发了暴力排华事件，暴民聚众群起呼啸，手持木棍刀矛，火烧华人商店，掠夺华人财物，所幸没有造成人命伤亡。汤加的华商拥有首都大部分的商业，这里的华人约有500多人，他们多已入籍，视汤加为故乡。暴动发生后，华人向各处逃难，中国大使也呼吁政府须保护中国侨民。

2009年5月13日，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发生了反华暴乱，当时百多人参加游行，最后演变为暴力和抢劫。15日，暴乱蔓延到第二大城市莱城（Lae），成千上万的暴民涌入当地华人商店大肆抢掠，使整座城市限于瘫痪。暴乱造成一死数人受伤。据说许多当地人抱怨，近年来涌入大批华人移民，把本地人挤出了规模不大的商业市场，还有说华人老板虐待员工，华人犯罪率增加，以及向当地官员行贿，激起当地人的公愤，以致最终引起暴动。

1962年爆发了中印边境战争。印度人民群情汹涌，反华情绪高涨。舆论也推波助澜，厉声怒吼：“中国人掠夺我们的土地”、“中国人该死”。印度境内的华人首当其冲，横遭迫害。数千名华人被围捕，囚禁在沙漠中的集中营，达数年之久。另外几千名华人，被集体驱逐出境，回返中国。其余的华人，有的逃往邻国的巴基斯坦及斯里兰卡，有的投奔欧美国家。加拿大的多伦多，就有好几千名来自印度的华人青年。

港台及中国大陆新移民活跃于工商业舞台，很快就在工商业上占尽上风，把当地的小商人与小工业家挤出竞争的行列，引起他们的嫉恨。其他如工商业之间的纠纷等因素，都会加深族群间的矛盾与仇恨，欧、非的某些国家，在政客与野心家的策动下，便把矛头指向华人，进而爆发了排华暴行，试举例如下：

意大利米兰市保罗萨比（Paolo Sarpi）已经成了中国人的唐人街，这里商店摆卖的成衣、皮鞋、皮包等日用品，业主都是中国人。近十年来，大量华人新移民涌入意大利，其中大部分是浙江温州人。官方估计中国移民总数达11万4千人，但因非法移民很多，真实数字可能达到50万人以上。

保罗萨比大道与附近几条街的商店，几乎都被华人买下或承租，这个地区已逐渐成为华人的批发商区。住在这一带的意大利人，反而感觉自己像个外国人或少数民族群。他们常投诉，抱怨这一带环境脏乱、嘈杂，违规停车，交通混乱。他们常组织队伍，示威游行，表示他们很难与中国新移民相处。

意大利官方明确表示，中国新移民自成一个社会，使用自己的语言与生活习惯，已形成封闭的群体，华人区是米兰的“城中城”。由于语言的隔阂，造成误会，冲突事件时有发生。种族矛盾不仅存在于意大利，欧洲华人移民近年激增，跟当地居民在文化上、法律上不断出现大大小小的冲突，如果处理不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酿成巨祸。

非洲赞比亚的首都卢萨卡（Lusaka），1997年10月2日也爆发了排华事件。事缘中国人投资的铜矿公司，雇用了大批赞比亚员工。可是工作环境恶劣，薪酬低微，激起了工人的愤慨，中国老板被认为是工人的剥削者。此外，廉价的中国货向赞比亚市场倾销，威胁到赞比亚公司的生存。而且华人口迅速膨胀，已达3万人，过去十年间，华人在当地的经济力量日益壮大，引起赞比亚人的嫉恨。多年的积怨终于在1997年10月2日迸发，暴民在首都发难，华人在市内的商店与建筑物，成为暴民焚烧与掠夺的对象。经过两天暴乱后，终于10月4日恢复平静。

2. 立法排华

经过多年的酝酿与波折，美国国会终于1882年5月6日通过了排华法令。规定在十年内，停止熟练与非熟练华工进入美国；非经正当途径入美的中国人，于法案通过之日起，将被驱逐出境；已在美国的中国人，无权申请美国国籍。

1888年，国会又通过了“禁止华工进入美国法案”，该法案对华工入境更为严厉，从第一法令的“停止”，进一步跃升为“禁止”。1882年的法令十年期满后，国会又于1892年通过了吉里法令（Geary Act），把禁止华工入境再延长十年，又增加了更苛刻的条文。此后1904年、1911年、1912年及1913年，国会更接二连三通过排华法令，对华人移民入境的限制与禁止，越来越严苛，入境的华人移民因此越来越少。1924年又制定了新移民条例，对华人移民入境的限制更严厉，是最严酷的律令。

加拿大的限制华人人境，也步美国后尘。先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通过“1884年管制华人条例”。1885年联邦会议通过“限制和管治华人移民条例”，向入境移民征收十元人头税。另规定运载华人到加国船只每载重50吨只能接载一名华人。为了进一步限制华人移民少境，后来又把人头税增加到100元。

加拿大限制华人入境的条例越来越苛刻，1923年联邦会议更通过“华人移民条例”，进一步从“限制”跃升到“禁止”，因为条例共有43条，一条比一条苛刻，华人称之为“四三苛刻”。

1855年6月，澳洲维多利亚州国会通过限制中国人入境法令。规定赴澳船只载重十吨限载一名中国移民，而且得征收十镑人头税。嗣后，南澳、新南威尔斯等州也通过类似的限制华人移民法令。1901年，澳洲6个州成立了联邦政府，统一了限制移民政策，联邦会议通过了“语言测验法”，规定申请者必须能听能写任何一种欧洲文字50个字以上，并能填写申请书及签名，才算合格。否则即被视为违禁的非法移民，不准入境。若入境被查获，当局有权将他们驱逐出境。这法令显然是针对华人移民而设，堵住了入境的大门。“语言测验法”是白澳政策的顶峰，而白澳政策的最终目的是要维持“澳洲是白种人的澳洲”，不许华人及有色人种污染。嗣后订立或修订的移民法令，更进一步规定不许华人入籍澳洲成为公民。1958年的移民法，才准许杰出人士与技术移民入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联手对日本作战，为了表示对中国友好，美国国会于1943年底通过废除禁止中国人入境律令。在该法令下，中国移民每年有105个名额入境美国，并允准中国人归化美籍。到了50年代，政府颁布了新移民法令，进一步放宽移民入境。美国华裔公民享有永久居留权，其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子女、未婚子女、前妻或前夫子女也享有入境权。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新移民法令，给予各国申请人（包括中国人）同等待遇，允许每个国家每年两万名移民入境。尤其欢迎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及资格良好的专业人士移民美国。此外留学生、难民也获准永久居留权。再加上非法移民蜂拥而来，使美国的中国移民人数激增，至今已超过300万人。

战后的加拿大政府也放宽了限制移民政策。1962年政府宣布，废除以人种、肤色及国籍为接纳移民标准，重视移民申请人的教育水平与技术训练。加国当年即吸纳了一大批香港移民。1967年政府宣布新移民条例，以平等对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申请人以教育程度及技术训练为取舍标准。自法令实施后，每年平均约有18万移民入境。入境后的新移民，也可以申请眷属移民加国。80年代以后，有更多华人移民涌入，他们分布在加国如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卡尔加利与埃德蒙顿等大城市。

澳洲政府也于1966年颁布新移民条例，初步废除白澳政策。1974年实施“澳大利亚公民法”，最终否定了实行一百多年的白澳政策。此后港台投资移民与技术工人、东南亚等地的移民及留学生、以及印支难民纷纷涌入。80年代以后，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及留学生，更是络绎不绝，使澳洲华人人数激增。

排华事件的比较

对比东南亚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排华事件，便会发现两个鲜明的特征。在对待华人的移民政策上，战前东南亚地区的西方殖民政府，是采取自由放任政策。除了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那几年限制华人入境外，其他时期华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境。移民浪潮尤以20年代达致巅峰。由于地理上的接近，以及自由放任的移民政策的结果，东南亚地区是华人聚居最密集的地区，接近全球华人的90%。那时期，殖民政府虽然对各个不同的种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挑拨离间，加深族群间的矛盾与仇恨，但政府基于殖民地的经济利益，不愿意爆发暴力的排华事件。一旦发生了暴力排华行为，政府便迅速派军队镇压，恢复社会秩序。所以战前的东南亚很少发生暴力排华的悲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这期间，由于东南亚独立政府普遍患上“恐共症”，对中国政府深怀戒心，把华人视为中国的“第五纵队”，所以严禁中国移民入境。因此战后东南亚华人人口的增加，完全得力于自然增长率。正如前述，战后东南亚国家的排华暴行，此起彼伏，持续不断。而且往往是政客及种族主义者在背后煽风点火，使星星之火，扩大为燎原之势，造成华人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

然而，在东南亚以外的其他国家，尽管华人流血流汗，挖掘金矿、种植作物、修筑铁路及建设城镇，到头来却遭受歧视与迫害。从19世纪中叶起，各国政府就立法严禁华人入境，强迫华人缴纳沉重的税收。华人居住的矿区、乡镇与华埠，屡屡遭到暴民的屠杀与焚毁。百多年来，排华暴行陆陆续续上演。

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迁，美、加、澳等国一改其战前严禁移民政策，变为宽大放开的政策，接纳各地移民入境。战后几十年来，这些国家成为各地移民的目标，蜂拥而来。不但港台、中国大陆的移民倾巢而出，其他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等地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也都纷纷再次向欧、美、加、澳等先进国家进军。经过了一番移民大洗牌之后，使全球华人流布的比例重新分配，美国华人的人口，1980年估计只有80多万，1990年增至160多万；2009年已超越300万大关。加拿大1980年华人人口只有28万多，1990年激增至68万多，21世纪初年已超过100万。澳洲华人人口1960年只有12万多，1980年激增至30万。估计1990年全球的华人人口约有3700万，比1980年增长了约1千万。亚洲的32个国家中，占了3200多万（88%）；美洲的32个国家中，占了320多万（9%）；欧洲的25个国家中，占了77万（2%）；大洋洲的14个国家中，占了37万多（1%）；非洲的33个国家中，占了约11万（少于1%）。

战后数十年来，这些国家虽然发生了零星的排华行为，但规模者环大，造成的损失也不太严重。但种族的歧视与排斥还是存在的，仍然潜伏着族群间的矛盾与仇恨，它就像埋在地下的定时炸弹，必须谨慎处理与预防，否则将会酿成巨祸。

消弭排华恶浪

长期以来，华人出国谋生，所到之处，开疆拓土，为地方的建设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中国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海外华人已摒弃了落叶归根的观念，代之以落地生根。时至今日，绝大部分的华人已入籍成为居留国的公民，身为公民的一分子，华人已经身无旁骛，把居留国视为祖国。何况第二、三、四代的华裔，他们已经完全融入主流社会，思维与生活方式都已西化或本土化，对他们而言，中国是遥不可及的外国，不再有很多的牵连。

不幸的是，一旦爆发了暴力的排华事件，暴民砸车、掠夺、放火、杀人、强奸，极尽残酷之能事，造成了生命财产严重的损失。在21世纪高度文明与人权至上的世界里，这是不能容忍的，难怪成了千夫所指、人神共愤的行为。排华行为的爆发，造成社会动荡，给所在国带来严重的后果。首先是所在国的华人心惶惶，觉得这里并非栖身之所，伺机移民欧美国家，连带带走雄厚的资金，而这些资金是国内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更何况这会造成原有外资的撤出，新外资裹足不前，缺少外资的投注，国内的经济是不能发展起来的，人民的生活是不能改善的。因此掀起排华浪潮是智者所不取的。

长期以来，经过了华人不断的努力，已经为居留国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华人编织了严密的商业网，遍布各地，建立与促进了本国与外国的贸易来往，使货畅其流，供求不绝。华人的工商企业与金融业，成了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可或缺。可是排华动乱却发生，或者政府立法剥夺了华人营运的权力，转由土著经营。由于土著资金短缺，又缺少管理技术，虽然接收了华人的营业，却无法使其适当营运，反而造成了混乱。例如在菲律宾，米黍业菲化以后，就造成市场米粮供应短缺，米价飞涨。由土著接收的华人零售店，很快就出现了货源不足的问题，不仅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破坏了人民的生活节奏。

千千万万的华人已定居入籍，成为居留国公民，因此要把他们集体驱逐出境，是不切实际的事情。当政者应正视华人的资金及技术，视为国家的财富，给华人公平合理的待遇，让他们死心塌地留下来，将资金与技术留在国内投资设厂，从事企业生产，为国家制造财富，并为本地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缓解失业问题。华人专才也是国家的宝贵资产，服务人群，造福社会，政府也应予以平等优惠的待遇，设法使他们留下来，或设法把他们吸引回国。否则如一味发动排华，或立法限制，造成人心惶惶，见异思迁，蝉曳别枝，到头来国家流失了资金、技术与人才，毕竟是国家的损失。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古有名训，愿当政者三思而后行。

另一方面，海外华人如能入乡随俗，吸纳当地文化，融入主流社会，言行举止优雅，变更思维与生活方式，改善人际关系，建立起完美的形象，将有利于消弭排华现象。

华人羁身海外，寄人篱下，中国的崛起与强大，固然有助于提高华人的地位，而居留地的大使馆与领事馆固然以护侨为主要职责，但碍于国际公法，不得干预他国内政，以及维持国与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中国政府往往会尊重当事国法律，无法发挥全方位的护侨工作。因此华人唯有自助自救，避免贻人以排华的口实。

言行举止优雅得体是必要的。尽管个人的自由不可少，但要以不妨碍及破坏他人的自由为原则，更不应扰乱及破坏他人优雅的社会。

法律是维系整个社会与国家安宁的基本准绳，因此华人须奉公守法，不作奸犯科，不破坏社会的安宁。数百年来，老华人及其后裔，都能守法不渝，持之以恒，予当地人良好形象，这种形象须保留并发扬光大。

华人靠勤俭起家，多年拼搏，成功创业，集聚财富，过着安逸的生活，固然无可厚非。但生活起居，不宜过分炫耀，以免招致他人的忌恨，予当地人以华人都是富有的剥削者形象。相反，华人应具有“取诸社会，用诸社会”及“人溺己溺”的精神，慷慨解囊，救助弱势群体；尤其是发生天灾人祸之际，应及时伸出援手，减除他人燃眉之急。华人对他人友善，必会善有善报。在某些国家，经常由于一桩寻常的交通意外，或是华人的虐佣事件，成为酿成排华的借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华人应提高警惕。据闻南太平洋某小国爆发了排华行为时，在华人聚居的地区，挺身而出，手持武器捍卫华人者，正是华人平日善待的土著，华人也应紧记勿忘。

华人初来乍到，一时无法适应陌生的环境。由于语言的障碍与文化的差异，以致自我孤立，困守在华人的小天地，不与当地人交往，引起诸多误会，成为排华的根源。为了促进彼此的了解，华人有必要学习掌握当地人的语言，与他人交往，吸纳他人的生活习俗与文化，融入主流社会，庶几突破种族间的藩篱，改善人际间的关系。

总之，华人必须放下涣涣大国国民的心态，改变自私自利的心理，在保留中华文化之余，吸纳当地人的文化，融入主流社会，与当地人并肩创业，迈步走向共存共荣之道，才是上上之策。